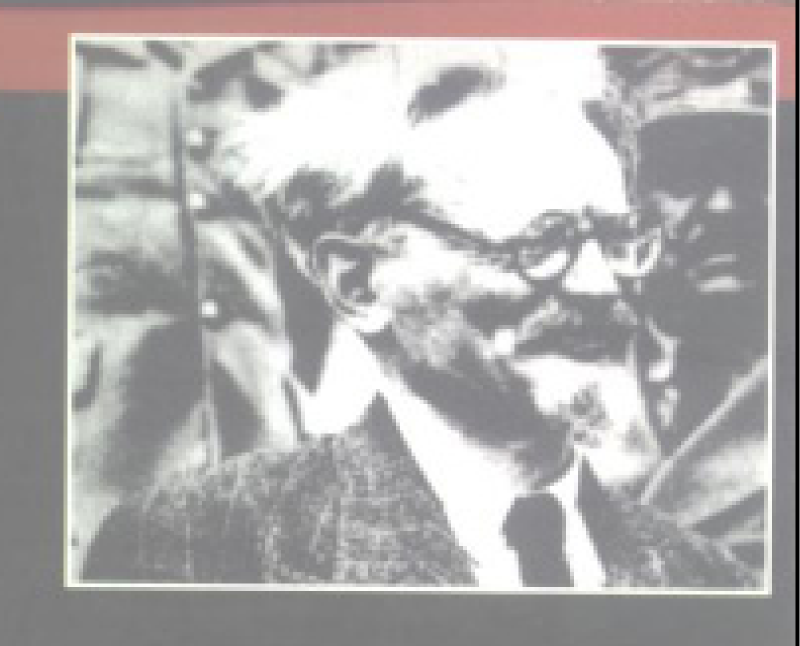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

TROTSKY 1921-1929

托洛茨基

先知三部曲

[波] 伊萨克·多伊彻/著



先知三部曲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

托洛茨基：1921—1929

〔波〕伊萨克·多伊彻 著
周任辛 译
刘 虎 校

中 央 编 译 出 版 社
1998年·北京

前　言

卡莱尔(Carlyle)曾写道，他作为克伦威尔传记的作者，首先得把这位英国摄政者从压在他身上的垃圾大山和大量的诽谤与诬蔑下拖出来。作为托洛茨基传记的作者，我也要做同样的事。不同的只是：当我要向我面前的垃圾大山进攻时，巨大的历史事变已经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击着它了。在我写完作为我的托洛茨基研究第一部分的《武装的先知》时，斯大林还活着，而且对他的"个人迷信"看来仍然不可动摇，堆砌在托洛茨基头上的诬蔑之词也似乎是不可消除的。然而，读过《武装的先知》的多数评论家都赞同一位英国批评家的意见："一本书抹去了斯大林分子30年来的污言恶语。"不过，无论是对于这本书还是对于它所引用的文献资料，苏联

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自然是连一个字的评论也没有,他们只是偏狭地盯住出现于西方的"苏联学"的每一块碎片上,哪怕只是垃圾也罢。后来,斯大林死了,二十大开过了,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一场地震震塌了这座垃圾山,把它的一半撒向四面八方;看来过不了多久那另一半也将会荡然无存。30年来,在苏联刊物上第一次可以历史地、如实地叙述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了。尽管这些叙述是贫乏不堪的、羞羞答答的,但毕竟揭示出,历史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在这里是何等密切,而问题本身又是何等微妙!

当斯大林这个偶像被打碎和斯大林对历史的歪曲受到公开、断然的谴责时,斯大林主要敌手的幽灵不可避免地会唤起人们的好奇,这种好奇尽管是困惑不解的,却是新鲜生动的。不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北京,不论是在华沙还是在东柏林,人们又一次想知道:托洛茨基向斯大林作斗争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原来所有的历史档案对于年轻的历史学家还都是尘封着的,现在却突然对他们开放了,他们贪婪地从陌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记录中去寻找答案。当赫鲁晓夫宣布斯大林伪造莫须有的罪名以消灭他的党内批评者时,历史学家们自然期待着为大清洗中的被害者明确地恢复名誉。普天之下都认为给受害者恢复名誉是理所当然的事。例如在波兰,人们就引用并出版了托洛茨基、布哈林、拉柯夫斯基和拉狄克的著作,以便提供急需的资料来解开斯大林时期的谜(我自己的著作和文章的目的也是如此)。

然而,对"垃圾山"进攻的前进道路很快又被堵塞了。到了1956年底或1957年初,由于匈牙利骚乱事件所引起的反应,莫斯科下令中断了对历史真相的甄别。现行政策的进退两难、动摇不定的尴尬局面再一次反映在对历史的论述中,仿佛再一次集中在如何对待托洛茨基的问题上。自那时以来,斯大林那本臭名昭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已被官方新的党史纲要所取代。这本

新党史尽管改头换面，语调有所缓和，但仍力图把诅咒重新泼到托洛茨基头上；而在苏联期刊上那些蓄意含沙射影诋毁托洛茨基的论著，其数量甚至比斯大林时期最后10年中还要多。

但是，原先曾作为一出正剧的东西现在却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闹剧了。斯大林派的恶毒咒骂尽管荒唐无稽，但毕竟有它自己的"逻辑性"和"一贯性"：因为斯大林懂得，如果不去全面、系统、不择手段地篡改过去的历史，他就无法使人们相信这种恶毒咒骂。赫鲁晓夫则试图不求助于赤裸裸篡改历史的手法而禁止托洛茨基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他只满足于一帖"温性药方"，即歪曲事实；但仅此一点，他就把咒骂变得荒唐可笑了。这样，新版党史的作者在颂扬1917年军事革命委员会与内战时期军事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时，却只字不提托洛茨基是这两个机构的首脑；然而与此同时，当他们必须指出这个委员会或这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失误时，却又不忘提到这一事实。（这就好比一个人看到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还没有学会捉迷藏游戏，他拉着母亲的裙子高声叫道："我在这儿，你来找吧！"）赫鲁晓夫式的历史学家显然以为苏联读者还没有聪明到足以看出，无论是颂扬还是责难都是针对同一个人的。斯大林尽管使用了他独有的卑劣手段，却能深刻觉察到他手下臣民的悟性。因此，他宁可不提任何事实，以免为异端分子提供推测的根据，也不给这种推测留下余地。新版党史同样片面夸大了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但是，随着久被隐瞒的列宁著作的发表和档案材料的公开，党的新领袖们事实上已直接做好了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所需要做的一切事情。今天，想再一次把托洛茨基从俄国革命史册中抹掉的一切企图都已经是枉费心机的了。

※ ※ ※ ※ ※

托洛茨基的幽灵显然一直在困扰着斯大林的继承者。我相信,读者起码可以从下列叙述中找到对这件咄咄怪事的部分解释。尽管自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苏联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或者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所争论的一些关键问题在今天仍同过去一样活跃。托洛茨基曾揭露工人国家里的"官僚主义堕落",还指出斯大林领导下所谓"坚如磐石"、"一贯正确"的党正面临着言论自由、争论自由、批评自由等迫切要求的挑战,并相信真正自愿遵守共产党的纪律只能也只应该建立在这些要求的基础上。他的声音在20年代的苏联社会里被窒息了,但是随着苏联工业、教育和社会多方面的进步,他的声音又重新恢复了生命力,赢得了不少共产党员的心。赫鲁晓夫与米高扬、哥穆尔卡、卡达尔与陶里亚蒂,更不用说铁托与纳吉了,在他们说实话的短暂时刻里都不得不对此说出他们的颂辞。他们每一个人对"非斯大林化"所作的贡献不管是多么三心二意、支离破碎,其中都包含着"托洛茨基主义"的基础。诚然,在说实话的时刻里,托洛茨基是作为这些人的前辈巨人而出现的,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对斯大林主义的探讨的深度、广度和思想批判的力度上都不能与托洛茨基媲美。自那以后,所有这些人都被自己的虚张声势唬住了,走了回头路;而苏联政权和共产党则每前进两步又后退一步,远远没有克服"官僚主义怪胎"。

迄今为止,托洛茨基提出来的问题充其量也不过解决了一半,这个事实足以说明,托洛茨基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历史现在具有了更多而非更少的原则意义。在托洛茨基影响到我们时代的斗争中,他与斯大林的对抗不是唯一的方面。本书大部分叙述集中在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后期布尔什维主义的孤立自保政策之间的冲突上。甚至还在斯大林时代结束之前,这个冲突就已重新出现并且变得愈加尖锐;而自那以后,天平的一端就

开始向国际主义一侧倾斜。这是唤起了人们对与20年代争论的新的兴趣有关的另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斯大林的继承者对托洛茨基幽灵之所以如此恐惧,是因为他们害怕触及托洛茨基大大超越他那个时代而千方百计地要解决的那些问题。他们的行为一部分可用客观环境来解释,另一部分则是由惰性所致,因为赫鲁晓夫及其一伙,即使在背叛斯大林主义的同时也仍然是斯大林的追随者。他们同样是从狭隘的自保动机出发而行动的。1957年6月,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生的一个插曲便足以说明他们的尴尬处境。在那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回顾了大清洗运动,自斯大林死后这个问题在所有秘密辩论中一再被提出来。他提议开除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卡冈诺维奇(Каганович)和马林科夫(Маленков)。赫鲁晓夫指着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鼻子大声说:"你们的双手沾满我党领袖以及无数无辜布尔什维克的鲜血。"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也向他嚷道:"你的双手也不例外。"赫鲁晓夫回答说:"不错,我也不例外,我承认这一点。但是大清洗期间我不是政治局委员,我只是执行你们的命令,对政治局作出的决议,我不负责,应负责的只是你们。"后来,当米高扬向莫斯科共产主义青年团报告这件事时,人们质问他为什么不把斯大林罪行的同谋者送上法庭受审,据说米高扬回答说:"我们不能审判他们。因为一旦我们把这帮人送上法庭被告席,那就谁也不知道该怎样收场了。我们所有人在大清洗中都有份儿。"这样一来,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单只是为了保护他们自身免受追究就必须把斯大林的某些受害者的幽灵紧锁在法庭的被告席上。至于托洛茨基,与其将他供奉在革命的万神殿上,还不如就让他照旧躺在那座用诽谤堆起来、已半倾圮的金字塔下,那不是更保险吗?

※　※　※　※　※

我不相信并且从未相信过,托洛茨基的名声需要依赖统治者或党的领袖来为他恢复。(我认为,恰恰是他们才需要为自己洗刷罪名,只要他们能做得到!)不过,我绝没有纵容对托洛茨基的任何个人迷信的意思。

我确实认为托洛茨基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革命领袖之一。不论作为战士、思想家或殉道者,他都是最卓越的。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刻意杜撰一个没有丝毫缺陷或污点的光辉形象。我力图将托洛茨基按其真实才干、真正力量,连同他的一切弱点如实地描述出来;我力图显示他非凡的才能、丰富的想象力和思维的创造性,但也决不放过他的失误。在讨论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思想作出独特贡献的那些思想时,我力图将我认为是客观的、经得起考验并很可能要长期保留的东西从仅仅反映一时情况、主观感情和判断错误的东西中剥离出来。我尽可能地对托洛茨基的英雄个性持公正态度,而我发现他的英雄个性在历史上只有少数人能与其媲美。但是,我也展示出他在不少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和踌躇不决:当优柔寡断时,他像巨人泰坦那样摆开阵势,却不去攻城掠地;当踌躇不决时,他则躺倒下来听凭命运摆布。我将他看做是斯大林主义之前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斯大林以后共产主义的开路先锋。但我并不认为共产主义的前途将维系于托洛茨基主义。我倾向于认为,历史的发展正在超越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正在展现出比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更为广阔的前途。但二者可能将以不同方式被"超越"。苏联和共产主义从斯大林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主要是其实际成就;而在其他方面,诸如行政方式、政治活动、原则、理想以及"道德风尚"等,斯大林时代的这一类遗产可说是糟糕透顶,把它清除得越快越好。

而恰恰就在这些方面，托洛茨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政治的发展几乎不可能超越他了，只能是汲取他思想中的精华并运用于超出他想象的更先进、更变幻莫测、更错综复杂的现实中。

※　※　※　※　※

早在《武装的先知》一书的前言中我曾表示过，将用单独一卷《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介绍 1921 年以来托洛茨基的生平及其工作的全部历史。有一位评论家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写道：他怀疑是否能以相应的规模在单独的一卷中写出这一阶段的全部历史。他的怀疑被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一卷只能写到 1929 年 1 月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国境为止。此后 12 年里，托洛茨基风风雨雨的流亡生活及其最后的盖棺定论，只好让给另外一卷《流亡的先知》去承担了。这三卷本是规模更大的三部曲的一部分，三部曲还包括 1949 年问世的《斯大林政治传记》和尚在准备中的《列宁生平》两卷本（如果能掌握足够的历史资料，我打算再写一本《斯大林的最后岁月》作为斯大林传的补充）。

这三卷本理所当然是互相关联的。如果放宽一点儿来看，就是整个三部曲的组成部分。但我在安排这三卷本时尽可能使每卷各自独立，让读者把它们作为单独著作来读。本卷的叙述在许多方面涵盖了苏联形成时期的那些年代。本卷从 1921 年内战余波开始，此时托洛茨基仍处于权力之巅；到 1929 年结束，此时托洛茨基已被驱逐出国，流亡君士坦丁堡，而苏联正进入强力推行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历史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戏剧性斗争就是在这几年中展开的。自列宁逝世后，这个党突然被投进了政治争论的漩涡中去。这场争论是现代史上声势最为浩大、程度最激烈的争论。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摇摆不定，方向难以捉摸，陷进了异常紧张的

社会与政治局势中,陷进了一党专政的逻辑泥潭中,终于屈服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托洛茨基作为斯大林的主要对手、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唯一候选人、工业化和计划经济"过早"的倡导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批判者、维护无产阶级民主的先锋,自始至终都处于斗争的中心。

作为本书论述基础的大量文献迄今尚未为人知晓。我充分利用了托洛茨基档案,从多方面深入考察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活动,考察布尔什维克党内各派别的工作;利用了已经披露的托洛茨基、拉狄克、拉柯夫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索斯诺夫斯基以及许多其他杰出的布尔什维克之间往来的浩繁信件;利用了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记录;也利用了当时俄文和非俄文报纸和期刊;还利用了已发表过或未发表的目击者的报告。我也从私人接触中获益不浅,其中包括托洛茨基的遗孀娜塔利娅·谢多娃、亨利希·布兰德勒、阿尔弗雷德·罗斯默、马克斯·伊斯特曼以及这场斗争的其他参与者和幸存者,他们都以极友好的态度回答了我的提问,有时还乐意接受长时间的反复询问;至于我试图重现那个时代的背景和"气候",我本人的经历或许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从本世纪 20 年代中期起,我就积极参加了波兰党内的活动,它比其他任何党都更接近布尔什维主义;不久,我成为深受托洛茨基影响的的党内反对派的主要发言人。1932 年,我获得了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而被波兰共产党开除出党的第一名党员的殊荣。

我认为,由于我能接触到一些尚未公开的资料来源,这使我有可能对许多重大事件和历史情节提出全新或部分新颖的看法。比如关于:列宁在其晚期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列宁身后斗争的变迁;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以及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反斯大林主义的各反对派的形成及其失败;托洛茨基流放于中苏边境第一年的事件,特别是早已存在于托洛茨基

主义反对派内部的分歧，在莫斯科审判许多年以前就已经预示了这个派别的瓦解——对所有这些重大事件几乎都是根据迄今尚未为人所知的事实加以论述和分析的。如同在第1卷中一样，我也特别注意作为文人的托洛茨基，并以很大篇幅论述他对科学、文学和艺术的看法，尤其是论述他在20年代初期作为俄国主要文学批评家时的著作。这些著作以托洛茨基博大精深的见解、抛弃党对科学与艺术的任何干涉的明确观点而著称，因而对于当前局势也具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在斯大林主义之后的"解冻"时期，苏联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进展都是沿着托洛茨基思想所指明的方向演变的，尽管像托洛茨基那样大胆而又非教条主义的观点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在苏联再度出现。

我很想恢复这出历史剧的各种特点和细节，但我从未从思想中排除悲剧性主题，这主题自始至终贯穿全书，并且笼罩着几乎每个有关人物。这是托洛茨基本人曾界定过的那种现代悲剧（参阅第三章）。他说："只要人类还没有成为他的社会组织的主人，这个组织就会像厄运那样凌驾于人类之上。……我们时代的悲剧就是个人与集体之间或者以个人为代表的两大敌对集体之间的冲突。"托洛茨基认为"很难预见革命艺术能否来得及创造出'崇高的'悲剧"。苏联的剧作家当然还没有把它创作出来；但是什么样的现代索福克勒斯或埃斯库罗斯能创造出跟托洛茨基本人的一生那样崇高的悲剧呢？但这毕竟是一种"乐观主义的悲剧"，其中的人所遭受的一切痛苦和牺牲并非都是枉然的——难道这是过分的奢望吗？

※　※　※　※　※

我十分感激唐纳德·泰尔曼先生。他不但读了我以前作品的手稿,而且也读了本卷手稿,并始终是我永不衰竭的鼓舞源泉。我还应该对丹·达文先生、约翰·贝尔先生给我提出最珍贵的文体批评和建议表示由衷的感谢。我的妻子一如既往是我唯一的研究助手,是最严格的、也是最不受拘束的第一个批评者。

伊·多·

目　　录

第一章

权力与梦想

布尔什维克进行1917年十月革命时深信:他们已经开始的事业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他们看到,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资本主义秩序正在土崩瓦解,阶级社会正在分崩离析。他们坚信,全世界各民族终于起来了,不甘做无组织社会生产力的玩物,不能容忍无政府状态的生活方式。他们设想:全世界人民已经完全准备好,要把自己从为谋生而不得不做牛做马、流血流汗的苦难命运下解放出来——并准备好去结束人统治人的时代。他们欢呼新世纪曙光的到来,在这新世纪中,全人类及其解放出来的活力和能量一定能得到自我满足。他们以自己能为人类“开辟了从史前时期进入历史的道路”而感到自豪。

这个辉煌灿烂的前景不但使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们,也使布尔什维主义的梦想家振奋起精神和勇气。它同样也点燃了他们的广大追随者们的希望和热情。他们在内战中英勇搏斗,对敌人毫不怜悯,对自己也不宽容。他们深信,只有这样才能为俄国、为全世界赢得机会去完成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伟大飞跃。

当胜利终于属于他们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发现,革命的俄国因好高骛远而失败,被抛进了一个可怕的深渊中。没有任何别的国家仿效她的革命榜样。俄国处在周围世界的一派敌意,起码是冷漠无情的包围之中,它孑然一身,鲜血流尽,饥寒交迫,浑身颤栗,因疾病流行而憔悴,因情绪忧郁而沉痛。在流血与死亡的腥风血雨中,俄国人民疯狂争夺那一口新鲜的空气、一线微弱的灯光、一片可怜的面包屑。人们不禁要问:"这就是自由王国吗?这就是伟大的飞跃要把我们带向的那个地方吗?"

领袖们是怎样回答的呢?他们的回答是:先前的那些伟大辉煌的革命也同样遭受过无情的挫折,但无论如何,在后人眼里他们自身和他们的事业仍然被证明是正确的;俄国革命也必将以胜利者面目出现。在谈论这个问题时,谁也不能比本书主人翁所提供的论点更具有说服力了。面对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饥饿大军,托洛茨基回顾了革命的法国在巴士底狱被攻破以后许多年中所忍受的艰难困苦,并且告诉他们,共和国第一个执政府的执政者每天清晨都躬临巴黎市政府,忧心忡忡地眺望着少数农民用手推车把粮食从乡村运进城市,而每天上午当他离开市政府时深知巴黎市民依然还要挨饿。[①] 这个类比是何等真实;然而,不管这个类比是多么真实贴切,用历史的相似性来宽慰自己是绝不能填饱俄国人民的辘辘饥肠的。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2卷第318－329页。

谁也无法估计这个国家陷得到底有多深。在深渊中，无数双手脚一起在暗中摸索，在寻找坚实的支点，在寻找什么可依靠的东西，想牢牢地抓住点儿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了爬上去。革命的俄国如果一旦爬上去了，那肯定无疑地将重新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但怎样才能爬上去呢？怎样才能把深渊底层的一片喧嚣平静下去呢？又怎样去组织这些绝望的群众，并领导他们往上爬呢？苏维埃共和国怎样才能克服这骇人听闻的苦难和混乱，然后继续去实现社会主义的诺言呢？

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最初并不打算掩饰或美化其困境，也不想欺骗他们的追随者。他们试图用真话来鼓舞他们的士气和希望。但朴素的真理却是非常严酷的，难以减轻苦难和消除失望。因此，真理开始让位于带有安慰性的谎言。开始时谎言只不过为了掩盖梦境与现实之间的裂口，但不久以后谎言硬要说：我们早已到达自由王国了——自由王国就在陷坑的深处。"当人们不再信仰时，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谎言逐渐扩展开来，显得更巧妙、更复杂、更大——犹如它本来要掩盖的裂口那样宽广。谎言在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中找到了代言人和忠实的支持者。这些人感到：没有了谎言和支持谎言的暴力，这个国家就无法从泥潭中自拔出来。但是，有利的谎言毕竟有悖于革命的初衷。当谎言扩散开来后，它的辩护人也无法与十月革命的真正领袖面对面、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因为对于十月革命的真正领袖来说，革命的使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不可侵犯的。

后者并未立即发出抗议的呼声。他们甚至未能马上认识到谎言的实质，因为谎言本身是缓慢地、悄悄地潜入的。革命领袖们在开始时也不免被这谎言迷惑住了；直到后来，他们终于一个接一个地、犹犹豫豫地挺身而出揭露和谴责谎言，援用已被破坏的革命诺言来反对它。但在这深渊深处，他们那一度曾是强有力的、鼓舞人

心的声音只不过成了空谷足音,没有激起饥饿的、疲乏的、已被吓倒了的广大群众任何响应。在所有这些呼声中,没有一个能像托洛茨基的呼声那样充满了深沉的愤懑,那样令人信服。此时,托洛茨基作为被解除武装的革命先知开始向他的顶点攀登,他无法依靠武力来推广信念,相反,只能依赖于信念的力量了。

※ ※ ※ ※ ※

1921年,布尔什维克俄国终于出现了和平局面。内战战场上最后的枪声沉寂下来。白军已经瓦解并且消失了。干涉军已经撤退了。俄波之间签订了和平协定。苏联的欧洲边界线划定了。

在笼罩着战场的一片沉静气氛中,布尔什维克俄国开始注意倾听外部世界的声音,并强烈地意识到她自身的孤立。自从1920年夏季红军兵败华沙城外以来,欧洲革命热潮已经消退。那里的旧秩序正处于某种平衡之中;尽管是不稳定的,但足以使保守势力从混乱不堪和惊慌失措中恢复过来。共产党人不能指望革命获得迅猛的发展;任何人为的刺激这种革命发展的尝试只能带来代价惨重的失败。1921年3月在德国中部爆发的毫无希望的、准备仓促的共产党人暴动就是很好的证明。这场暴动得到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和1919年匈牙利革命不走运的领袖库恩·贝拉的鼓励,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们煽动起来的。他们认为这场暴动定会"激励"冷漠的德国工人阶级,并促使他们行动。[1] 然而工人群众没有响应;德国政府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暴动镇压下去了。这次

① 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284-287页;拉狄克:《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2卷第464-465页;《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58页及以后各页、308页及以后各页;《列宁全集》第42卷第27-38页及同书各处。

惨败使德国共产党人陷于混乱。德国共产党领袖保罗·列维(Paul Levy)经过一番痛苦的反思、自责后便与共产国际决裂了。三月暴动进一步削弱了欧洲的共产主义力量,加深了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孤立之感。

列宁的党所领导的国家正处于崩溃边缘。它生存的物质基础受到极大的动摇。只消回忆一下内战结束时的情况就足够了。那时俄国国民收入仅仅等于 1913 年的1/3,工业生产不到战前的1/10,煤的产量不到战前的1/10,铸铁产量仅为正常产量的1/40,铁路遭到破坏,任何经济工作赖以开展的库存储备全部耗尽,城乡产品交换趋于停顿,俄国城镇人口急剧下降,以至到 1921 年时莫斯科人口只剩下一半,彼得格勒剩下1/3;两首都居民好几个月来每天只能依靠定量供应的两盎司面包和少量冻土豆来维持生活,住宅取暖也只能劈家具当柴烧——这使我们可以多少了解这个国家进入其革命的第四个年头的状况。[①]

布尔什维克无心庆祝胜利。喀琅施塔得暴动终于迫使他们放弃军事共产主义,转而颁布新经济政策,简称耐普(НЭП)。他们的直接目的是说服农民出售粮食,说服私商把粮食从乡村运往城镇、从生产者手中送到消费者手中。这是对私营农业和商业作出一系列让步的开端,这是"被迫撤退"的开端,正如列宁向他的政府公开承认的一样,是不得不对在全国处于优势地位的小有产者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让步认输。

不久以后,灾害袭击了全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饥荒降临到人口稠密的伏尔加河流域的农业区。就在 1921 年春,在喀琅施塔得暴动之后不久,关于干旱、大风沙、大批蝗虫侵袭南方及东南方各省

① 克里茨曼:《伟大俄国革命的英雄时代》第 150 页及以后各页;《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第 79 - 86 页;米柳亭的报告,载《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第 72 - 77 页。

份的报告震动了莫斯科。政府只好收起自尊心,向国外资产阶级慈善机关呼吁援助。7月间,政府担心将有1000万农民受到饥荒影响。该年年底,受灾人数已高达3600万。[①] 无数群众在风沙和蝗虫袭来之前已四处逃亡,绝望、盲目地流浪在广袤的平原上。在俄国国土上再次出现人吃人的惨象,而从各个大都市里则传来了对社会主义宏伟理想和崇高愿望的不堪入耳的嘲笑挖苦声。

世界大战、革命、内战、外来干涉和军事共产主义在7年时间内已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平常听惯了的政治概念、思想和口号几乎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俄国社会结构不单是被翻了个儿,而且是被彻底摧毁了。社会各阶级在内战中疯狂地、毫不留情地彼此搏斗,如今除了农民之外,所有的阶级不是精疲力尽、软弱无力,便是在搏斗中被碾成齑粉了。地主贵族已毁于楼房的熊熊大火之中或者战死在内战战场上,幸存者也随着望风而逃的白军残部逃亡到国外。一向人数不多并在政治上缺乏信心的资产阶级大部分死的死、逃的逃,能够保住性命且留在俄国力图适应新政权的那些人也只不过是这个阶级中的残余分子罢了。旧知识分子以及少数旧官僚也分享着资产阶级本身的命运:一些人跑到西方去啃那流亡者面包,另一些人则以"专家"身份替俄国的新主人服务。随着私营商业的恢复,一批新的中产阶级暴发户出现了。其成员被人轻蔑地称为"新经济政策分子"(耐普曼),他们迅即利用新经济政策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大发一笔横财,并且怀着在前后两道洪水夹击下随时都有灭顶之灾的感觉及时行乐。连旧资产阶级余孽也瞧不起的这个新兴中产阶级甚至都不渴望形成他们自己的政治意识。苏哈列夫卡——莫斯科藏污纳垢的黑市,就是它的社

① 参见加里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第23-26页。

会存在和伦理道德的象征。

产业工人阶级原是被指望去实现其专政的，现在也被彻底摧垮了，这就是这场斗争所带来的冷酷无情和自相矛盾的结果。最勇敢、最有政治头脑的产业工人不是在内战中献出生命，就是在新的行政机关、军队、警察、企业管理及和大批新建社会机构与公共团体中担任要职。这些从无产者中来的人民委员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出身而引以为荣，但事实上他们已不再属于工人阶级了。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逐渐成为工人的陌路人并被官僚主义的环境所同化。大部分无产阶级也失去了其社会地位。在饥荒年代里，大批工人群众从城镇逃亡到乡村；他们原来大都是第一代城镇居民，还没有丢掉乡村的根子，因此很容易重新被农民阶层所吸收。在新经济政策初期，相反方向的人口迁移开始了，人们离开农村涌向城市。一些老工人又回到城市，但大多数新来者都是未经训练的、没有文化的农民。他们没有政治传统，更不必说文化传统了。不过，1921 年至 1922 年，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只不过是涓涓细流而已。

老的工人阶级的涣散给城市俄国造成了一个真空地带。独立自主、有阶级觉悟的昔日的工人运动（连同它的许多社会机构、组织、工会、合作社和教育俱乐部）过去总是回响着情绪高昂的论争，沸腾着政治活动——现在，这个运动只剩下一个空壳了。一小部分参加过阶级斗争的老战士时而在不同地方相聚，讨论着革命的前途。他们曾经组成了工人阶级真正的“先锋队”。而现在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他们看不到自己背后的那支阶级主力，这支阶级主力过去总是听取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指示，跟随他们投入到最激烈的社会斗争中去。[1]

---

① 参见《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布哈林、洛佐夫斯基和米柳亭的报告。

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了胜利,但无产阶级本身却差不多消失了。无产阶级从来只占这个国家人口的微不足道的少数,而它却在三次革命中都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不是由于它的数量,而是由于它的政治思想、首创精神和组织性所具有的非凡力量。在最好的时候,俄国大型工业的雇佣工人也超不过300万。到了内战结束时,大约只有半数工人还被雇用。实际上,就是这些工人大部分也由于工厂开工不足而无所事事。政府只是为一个社会政策问题才把他们保留在企业的工资册上,以便将来可以保留工人阶级的核心力量。这些工人实际上是领取救济金的穷人。如果一个工人领工资的话,那么他的工资由于卢布灾难性的贬值实际上已值不了多少钱。工人要活下去,哪怕活得很差,也必须去打零工,到黑市做买卖,或者跑到乡下去搜寻粮食。如果这个工人领到的是实物工资,特别是工厂里的产品,他就会急忙从工作台边冲到黑市上去,用一双鞋或一块布换点儿面包和土豆。到了无物可换时,他就跑回工厂偷出一件工具、一些螺丝钉或一袋煤,然后再回到黑市上去。工厂失窃普遍。据估计,有半数工人经常盗窃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①] 可以想象,饥饿、寒冷、工厂里骇人听闻的怠工、猖獗的黑市、欺诈和盗窃——这些为了苟延残喘而进行的形同动物般的生存搏斗,对于这些人的道德会产生何等严重的影响,而他们原来却被认为是这个新兴国家的统治阶级。

唯独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世界大战、内战、饥荒等当然曾使他们损失惨重,但却没有损伤农民的元气,没有削弱农民复原和再生的力量。甚至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未能使人数众多的农民消散。因为农民几乎像自然界一样是不可

① 洛佐夫斯基宣称有些工厂50%的产品被盗;据估计,工资部分在一个工人的生活费用中仅占1/5。《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第119页。

摧毁的，为了继续生存，他们只需要与自然界保持接触；而产业工人则不同，一旦他们赖以生存的人造工业机构崩溃了，产业工人也就流散了。农民保存了他们的社会特点和社会地位，并牺牲地主贵族来增强自己。现在，农民可以从从容容地来清点革命在带给他们的损失之外又带来的收益了。余粮收集制已经停止，农民指望最后能从他们增长的财富中获得完全的补偿。诚然，农民生活在赤贫中，但是贫困以及伴随贫困而来的落后都是他们的社会遗产的一部分。农民被从封建领主的庄园制度下解放出来后，却宁愿选择在他们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的贫穷生活，也不要城市鼓动分子在他们眼前展示出来的、不被他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制度下那种富裕生活的远景。俄国农夫不再经常受到城市鼓动分子演说的打扰了。他们发现，最近以来，这些人尽量避免得罪他们，甚至力图亲近和奉承他们。俄国农民一时成了急于重建城乡之间“联系”和“工农联盟”的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宠儿。由于工人阶级不能显示出举足重轻的地位，农民的分量也就愈重了。每月每周都可举出成千上万的新例证来证明农民新的重要性；农民的自信心因而也相应提高了。

然而，这个唯一能保存其社会特点和地位的社会阶级，在政治上却是天生的低能儿。马克思曾用极其生动的形象将其比做“来自农村社会的白痴”，100年前它阻碍过法国农民用自己的名义来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这形象完全可以适用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农民：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加强了。在他们进行生

> 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上,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和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了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了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了,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①]

俄国农村也是这样的一大袋马铃薯,它也证明它同样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保护自己的利益。过去,民粹派亦即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代表过它的利益,做过它的代言人。但是社会革命党因其拒不支持土地革命而声誉扫地,后来被布尔什维克赶到地下并被消灭,完全失去了作用。这袋马铃薯体积庞大,形象可怕,一声不响地躺着。没有人能离开它、忽视它或者任意践踏它而不受惩罚。它曾经击中俄国城市的要害,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不得不向它低头。然而,这袋马铃薯对于这个四分五裂、溃不成形的社会却不能提供任何支柱、结构、意志,也提不出任何建议或要求。

※　※　※　※　※

就是这样,俄国在革命后数年中不能通过自己的真正代表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693页。

管理自己的事务、维护自己的利益。老的统治阶级已经被摧毁了；而新的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只不过是它以前自身的影子而已。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宣称自己代表已经涣散的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也不能支配那个自称替它说话，并依靠它而统治国家的政党。

布尔什维克究竟代表谁呢？它只能代表它自己，也就是说，只能代表它过去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和现在它作为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先锋队去行动的抱负以及在经济改造过程中重新集合起新的工人阶级的愿望，这个工人阶级在一定的时候能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同时，布尔什维克却又采用篡权手段保持着政权。不仅它的敌人视它为篡权者，甚至按照它自己的标准和它关于革命国家的概念本身来看，它也是篡权者。

我们还记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从一开始就把十月革命以及后来1918年解散立宪会议一概指责为篡权行为。布尔什维克对此嗤之以鼻，他们回答说：他们在十月革命中从其手中夺取政权的那个政府并不是建立在任何选举出来的代议机构的基础上的；而那场被赋予政府权力的革命则得到了占压倒多数、经过选举产生、有代表性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支持。各级苏维埃具有阶级的代表性，而且按其定义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苏维埃不是在普选制基础上选举出来的。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已经被剥夺了选举权，农民代表所占的比例不能影响城市工人的优势地位。工人并非是以个人身份在传统选区里投票，而是作为构成他们这个阶级的生产单位的成员在工厂或车间里投票。自1917年以来，只有这种阶级代表性才被布尔什维克确认是有效的和合法的。[①]

然而，按照布尔什维克关于工人国家的严格概念来看，列宁政府已经逐渐失去了代表性。名义上，它仍然是以苏维埃为基础的。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42－246页；托洛茨基：《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

但是跟1917年的苏维埃不同,1921年至1922年的苏维埃没有也不可能具有这种代表性——它们不可能代表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工人阶级。苏维埃只是布尔什维克的工具。因此,当列宁政府宣称它的特权是从苏维埃手中得到的时,实际上是从它自身得到的。

布尔什维克已经把篡权者角色强加在自己身上。工人阶级一旦瓦解了,党就不可能再实行它的原则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能做些什么呢?或应该做些什么呢?难道它应该认输,拱手交出政权吗?一个进行过一场残酷而具有毁灭性的内战的革命政府是不会在胜利后的日子里放弃权力的,也不会向已被击败的敌人屈膝投降,听任敌人雪耻报仇,哪怕它发现不能按照自己的理想进行统治和不再能赢得它在内战期间所赢得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失去那种支持,并不是因为原来的追随者的思想发生了截然变化,而是因为追随者的队伍涣散了。他们心中明白:他们统治共和国的那张委任状没有获得工人阶级——更不必说农民了——的及时延期。他们同样明白:他们处在真空的包围中,这种真空只有在若干年内才能慢慢填实;暂时还没有谁能够给他们的委任状延期,也没有谁能废止他们的委任状。这是一种社会灾难,亦即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们变成了篡权者;因此,他们拒不承认自己是篡权者。

一个富有活力的、战斗的社会阶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而且内战所导致的社会衰退构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而又并非唯一的历史现象。在以前的历次伟大革命中也是如此,社会被拖得精疲力竭,革命政府发生了类似转变。英国清教徒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最初都是倡导代议制政府的新原则,反对旧政权的。清教徒派维护议会权利,反对王室。当法国第三等级的领袖们建立国民议会时,也是同样反对王室的。骚动和内讧接踵而至,结果是,旧政权势力再也不能统治社会,而支持革命的各个阶

级由于彼此间严重分歧被搞得精疲力尽，也无法执掌政权。因此，没有一个代议制政府有可能存在下去。唯有军队是具有统一意志、统一组织和统一纪律的实体，足以制止一切混乱。军队自称是社会保护者，建立起武力统治，这是赤裸裸地篡夺权力的政府形式。英国革命的两个主要时期都体现在同一个人，即克伦威尔身上。他首先率领英国下议院反对王室，然后以摄政者护国公的身份同时篡夺了王室和下议院的大权。在法国，革命的两个时期之间有一个明显的中断期。每一个革命时期内都有不同的人物跑到前台来，篡权者波拿巴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并未起重要作用。

而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所提供的是受一个意志所激励、紧密团结和严守纪律的组织，它有能力来管理并统一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先前的历次革命并不存在这样的党。清教徒的主要力量集中于克伦威尔的军队，因此他们不得不受军队的控制。雅各宾党只是在骚乱过程中诞生的，它是波涛汹涌的革命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革命浪潮的衰退，雅各宾党也就随之衰落，乃至消失。与此相反，布尔什维克早在1917年之前很久就已经成为一个坚强而集中的党，这使它能在革命高潮中掌握领导权，在革命退潮后，能在数十年中起到了革命的英国和法国军队所能起的作用，能保持稳定的政府，能统一并改造整个国民生活。

如果按照思想传统和政治传统来判断，布尔什维克对于篡权者的角色有着充分准备，然而却极不适应。列宁曾经将他的信徒训练成为工人运动的"先锋"和精英。布尔什维克从来不满足于反映工人阶级的现实情绪和现实愿望，他们还把激发工人阶级的情绪、激励和发展工人阶级的抱负视为自身的使命。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导师，并且坚信，他们作为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比被压迫的、无知的工人阶级更懂得什么是工人阶级的真正的历史利益以及怎样来促进这种利益。我们应记住，正是因

为这一点,年轻时的托洛茨基曾经指责他们想要用自己的党来“取代”工人阶级并漠视工人阶级的真正愿望和要求。[1] 托洛茨基在1904年第一次公开提出的这个指责,远远地走在了事实的前头。1917年,如同在1905年一样,布尔什维克参与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完全取决于他们可能呼唤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支持程度。列宁及其全体干部用冷静而清醒的目光仔细观察了工人政治情绪上哪怕是最微小的波动,小心翼翼地使自己的政策适应这些波动。那时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念头:没有工人的大多数或工人农民的大多数的批准他们也能夺取政权。直到革命前、革命中以及革命后的若干时期内,他们仍然始终自愿地让自己的政策服从于“无产阶级民主裁定”,亦即服从于工人阶级的表决。

然而,到了内战结束时,“无产阶级民主裁定”已成为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当工人阶级已经涣散并失去其阶级地位时,这个裁定又怎能表现自身呢?难道是通过苏维埃选举吗?或是通过苏维埃民主的“正常”程序吗?布尔什维克认为,若是他们的行动服从意气沮丧的工人阶级残余分子的表决或服从在影子般的苏维埃内形成的偶然多数的情绪,那么对他们来说是极其可笑的。最后,他们——托洛茨基也一样——事实上以自己的党取代了工人阶级。他们把自身的意志和思想等同于他们相信是属于朝气蓬勃的工人阶级——如果这样的工人阶级还存在的话——的那种意志和思想。他们惯于把自己视为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的作风使这种包办更加轻而易举。作为一个老先锋队,这个党认为对于它是很自然的事是:在这种奇怪的和它希望是短暂的时期,即无产阶级处于瘫痪状态的时期,它应该充当无产阶级利益的代理牧师。这样一来,不但从自身传统中,而且也从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布尔什

[1] 参见《武装的先知》第三章。

维克就为自己扮演篡权者角色找到了道义上的辩词。

但是布尔什维克传统是多种因素的微妙结合。党的自力更生精神、优越感、革命使命感、内在纪律性和关于权威是与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信念——所有这些素质构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独裁部分。然而，由于党同现实的而不仅是理论上的工人阶级亲密无间，由于党真诚地献身于这个阶级，由于党怀有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幸福就是革命的出发点和革命的目的以及工人阶级最终将是新国家的真正主人这样炽热的信念，上述这些素质受到了抑制。这是因为，历史最终会通过自己的口对所有的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及其整个事业作出严肃公正的判决。无产阶级民主这个概念是同这种态度分不开的。只要布尔什维克涉及到这个问题，它就会对形式上的、具有欺骗性的资产阶级民主表示轻蔑，如有必要，它就准备践踏所有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各个阶级；同时，它还感到在责任上理应尊重工人阶级的意志，即使它暂时与此意志相悖。

在革命初期，无产阶级民主成分在布尔什维克的特性中还居主导地位。而现在，独裁的领导倾向已经成为它的主要特点。即便在没有处于正常状态下的工人阶级做后盾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布尔什维克根据其长期习惯仍会祈灵于这个阶级的意志，以便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进行辩护。但是它之所以祈灵于工人阶级的意志，仅仅是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推断和行动上的思想准则，一句话，当做了某种神话。它在自己的党内开始看到了宝库，其中不仅有抽象的社会主义理想，而且还有工人阶级的具体要求。每当一个布尔什维克，不论是政治局委员还是支部的普通成员宣告说“无产阶级坚持”、“要求”或者“决不同意”这样那样时，就意味着是他的党或者党的领袖“坚持”“要求”或者“决不同意”这样或那样。没有这种半自觉的神秘色彩，布尔什维克的头脑就会失灵。党甚至不

能向自己承认,党已不再有任何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诚然,每当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正视现实时,他们自己也会坦率地谈到他们的困境。但他们总是希望时间、经济复兴和工人阶级的重建会解决这一困难。他们继续不断地谈论着、行动着,仿佛这困境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仿佛他们仍然按照工人阶级明确而有效的指令而行事似的。[①]

※ ※ ※ ※ ※

现在,布尔什维克终于把所有其他政党镇压下去,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独裁。他们很清楚,倘若他们允许自己的反对派自由发表意见并诉诸苏维埃选民,那就会使自己和革命冒极大的风险。一支有组织的反对派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混乱和不满转变为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因为布尔什维克无法调动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是决不肯让自己和革命冒这种风险的。由于党以自己的名义代替了无产阶级,因此党同时也用自己的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无

① 在1921年12月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同那些一再自称为"无产阶级代表"的人们争论时说道:"对不起,请问什么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在大工业中从事劳动的阶级。可是大工业在哪里呢?你们的工业在哪里呢?它为什么停工了呢?"(《列宁全集》第42卷第350页。)1922年3月,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又一次地争论道:"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这里进工厂的根本不是无产者,而是逃避打仗的人。难道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说进工厂的是真正的无产者吗?这样说是不对的。这符合马克思的说法,但是马克思说的不是俄国,而是15世纪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对过去的600年,这是正确的,而对现在的俄国不适用。"(同上,第43卷104页。)施略普尼柯夫在代表工人反对派发言时这样回答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昨天说,无产者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并不存在(于俄国)。请允许我向你们祝贺,你们是不存在的阶级的先锋队。"《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第109页。这番嘲弄的话表达了一个痛苦的真理。参见季诺维也夫的讲话。同上,第408-409页。

产阶级专政”不再是工人阶级的统治了，成为苏维埃有机成分的工人阶级已经把权力委托给布尔什维克，尽管在宪法上他们仍有权罢免布尔什维克或者把他们从政府机关里召回。无产阶级专政现已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独占统治的同义语了。无产阶级不能“召回”或罢免布尔什维克，如同不能“召回”或罢免它自身一样。

布尔什维克在镇压所有其他政党的同时也引起自身政治环境的根本变化，因此他们自身不可能不受影响。布尔什维克是在沙皇政权统治下，在半公开半秘密的多党制下，在激烈的争论和政治角逐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虽然布尔什维克作为革命家的战斗团体拥有使他们有别于所有其他政党的自己的信条和纪律，但毕竟布尔什维克呼吸着的是他们周围的同一空气；而多党制则决定了他们党的内部生活。在同自己的对手不断展开论战的同时，布尔什维克也在他们自己的队伍内部养成了辩论的风气。一个党员在发表反对立宪民主党人或孟什维克的演讲之前，首先要在他自己的党支部或委员会内部反复探讨他要谈的问题，探讨对手的情况、对敌方的答复以及党的立场和策略步骤等等。如果他认定党在某一点上观点有错误或领导不当，他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并且还可以设法说服他的同志转到他自己的观点上来。只要党是为了工人的民主权利而战斗，党就不能拒绝自己的成员享有那些权利。[①]

布尔什维克摧毁了多党制，却对其后果一无所知。在他们的想象中，没有多党制，他们也仍然一如既往是一个纪律严明但又自由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同盟。他们想当然地以为，通过例行的

---

① 即使在革命后的第五个年头，一党制与布尔什维克仍是难以调和的，这从季诺维也夫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的这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是唯一合法存在的党，……可以说，我们垄断了一切。……宗法制同我们党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已经取消了我们对手的政治自由……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第412－413页。（着重号是我加的——多伊彻）

意见交流和理论上与政治上的相互争论,党的集体意志定能不断地形成。他们不懂得当他们禁绝党外的一切争论时就不可能保持党内的生动活泼局面;他们也不懂得,当他们任意废弃全社会的民主权利时就不能单独为他们自己保留民主权利。

一党制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一党本身已不再是普遍意义上的党了。它的党内生活必然凋残枯萎、停顿熄灭。布尔什维克的基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如今只剩下集中了。党保留下来的只是它的纪律而不是它的民主自由。不可能有另外的选择。如果布尔什维克现在可以自由展开争论,如果他们的领袖可以公开阐明分歧,如果基层组织都可以批判其领袖及其政策,那么,他们就会为那些不肯放弃争论和批评的非布尔什维克带了一个头。如果一个执政党允许它的党员结成派系和小集团并在党内形成特殊观点,又怎能禁止党外人士去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并制订他们自己的政纲呢?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只让1/10的人有发言权而让9/10的人缄口无言。列宁的党既然把沉默加到了非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头上,到头来也就把沉默加到了自己的头上。

党不可能轻易屈从于这种沉默。那些从不盲从权威、惯于怀疑公认真理并且以批判的眼光去审查自己的党的革命者是绝不可能在转眼之间就毫无异议地、服服帖帖地向权威俯首就范的。即使表示服从,他们仍然继续提出质疑。1921年第十次代表大会宣布禁止党内派别活动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仍然传来了争论的声音。思想相同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联盟,提出政纲,发表论文,对其领袖进行严厉的抨击,同时还威胁着要挖掉一党制的根基。在镇压了它所有的敌人和对手之后,布尔什维克现在除了不断地自我镇压之外是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

布尔什维克的成长和取得成功的环境驱使它走上了这条道路。早在1917年,在整个俄国它还不到23000名党员。在革命期

间，党员增至三四倍。1919年，当内战最激烈的时候，有25万人加入这个党。党员人数的增长反映了这个党对于工人阶级具有真正的吸引力。1919至1922年之间，党员人数又一次增至3倍，即从25万人增至78万人。但是，大部分新增加的党员的动机不纯。现在布尔什维克是胜利者，赶浪头的热潮正在高涨中。不论在政府机关、工业部门、工会以及其他方面，党必须填补无数的岗位空缺；而且把那些接受党纪的人们填补进去是有利的。在广大的新党员中，真正可靠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变成了很小的少数了。[①] 他们感到已被异己分子所淹没了；他们忧心忡忡，焦急地要求去伪存真。

但是该怎么办呢？要把那些抱着无私目的入党的人与那些叛徒和贪图名利者区别开来是异常困难的事。但更困难的是难以确定那些并无可耻动机的入党者是否坚持党的宗旨和党的愿望并准备为此而奋斗。只要有若干个政党同时存在，阐述政纲、吸收党员这种不断的竞争就能确保人才的适当挑选及其在各党之间的分配。那样，刚刚跨入政治领域的新来者就有机会去比较各种竞争者的纲领、行动方法和政治口号。如果他决定加入布尔什维克，那么他这样做就是出于自觉的选择。但是，那些在1921到1922年间跨入政治领域的人们却没有这样的选择机会，他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布尔什维克党。如果在另外一种环境下，他们的意向也许会引导他们加入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或者别的集团。现在，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渴求只能引导他们加入那个唯一存在的党，唯一能够为他们的活力和热忱提供出路的党。正如季诺维也夫所称呼的那样，多数真诚地把自己设想为"优秀的布尔什维克"的新党员都

① 根据季诺维也夫的说法，在1922年，1917年2月前战斗在地下的布尔什维克只占党员总数的2%。《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第420页。

是“不自觉的孟什维克”或者“不自觉的社会革命党人”。[1] 这些成分的大量涌入有改变党的性质、削弱党的传统的危险。其实,在1922年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就宣告说:在布尔什维克组织内部早就存在着两个或更多的潜在的党了,这是由那些诚心诚意、错把自己当做布尔什维克的人所组成的。就凭党是单一的党这个事实,这个党就在失去单一的意志;它所禁止的各党派,其替代的雏形开始在它自己中间出现。社会背景及其所有受到压制的各种不同利益与各种不同政治心理重新表现出来,向唯一现存的政治组织施加压力,并从四面八方渗透到其中。

党的领袖决心维护党而反对渗透。他们发动了一场清洗。清洗的要求是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由工人反对派提出来的;并在1921年进行了第一次清洗。警察、法庭没有介入清洗。监察委员会,亦即党的法庭,在公开会议上对每个党员的历史和品行进行审查,不论其职务高低。听众中不论男女人人都可以站出来为受调查者作证,赞成他或反对他,然后监察委员会宣布受调查者是否有资格保留党籍。不保留党籍的人并不受到惩处,但丧失了执政党的党籍,就等于被剥夺了晋升和担任重要职务的机会。

在很短的时间内,约占党员总数1/3的20万党员被开除了。监察委员会把那些被开除出党的人划分为好几类:庸俗野心家,反布尔什维克的各党的前党员,特别是在内战结束之后入党的前孟什维克,受权力和特权腐蚀变质的布尔什维克,最后还有政治上不成熟、对党的原则缺乏基本认识的人。[2] 其过失仅仅是批评党的政策和党的领袖的人,看来还没有被开除出党。但很快就清楚了,

---

①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第413-414页。

② 1921年11月15日《中央委员会通报》(第34期);H.波波夫:《联共(布)党史纲要》第2卷第150页。

这场虽是必要的清洗运动变成了双刃剑，给那些不择手段的无耻之徒以威胁他人的机会和公报私仇的口实。基层群众一方面为叛徒、腐化分子受到清除而欢呼，另一方面却为清洗扩大化而迷惑不解。大家知道，清洗将定期反复进行。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说一年内有1/3的党员被开除出党，那么下一年，或者今后若干年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在敢于冒险进言，或敢于采取任何在下一次清洗中将被扣上政治幼稚、意识落后等帽子的步骤之前，态度谦恭和行为慎重是人们不得不三思而行的结果。清洗的初衷是作为纯洁党和捍卫党性的手段，但现在它却注定要变成最致命的自我镇压的工具了。

我们已经看到，当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力量而消失时，党便会在一切重大现实生活中用它自己来取代阶级。但此刻党也仿佛变成了跟它所取代的那个东西一样捉摸不定的、幽灵般的实体。一个党，仅在一年间就宣布1/3的党员不合格而把他们开除出党，在这样的党内还会有什么实质内容和自主生活呢？看来，20万已被清洗出去的男女党员此前都曾正常地参加党内生活程序，投票赞成决议，选举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大部分都正式参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不过，他们被清除出党并没有使党的政策发生任何明显的改变。党的机体通过一次大的外科手术被切除了1/3，而党的外貌甚至连丝毫的变化都没有。仅仅这个事实就证明，广大党员群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对于党内事务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由党内一小部分人所决定的，他们以自己取代了整个的党。

这一小部分人是由谁构成的呢？列宁本人就毫不含糊地回答了这个问题。1922年，他写信给当时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莫洛托夫说："只要不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成分，而是取决于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

数不多的党员所独有的巨大威信。"[①] 列宁当时将这个近卫军看做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唯一宝库、党的委托人、最后是工人阶级的代理牧师。整个近卫军是由几千名真正的革命老战士所组成。按照列宁的看法,像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的庞大的党正受到混乱不堪、无政府主义社会的侵蚀。即使是对最有出息的年轻党员也需要进行耐心的培养和政治教育,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样一来,党与无产阶级的等同就变为老近卫军与无产阶级的更狭义的等同了。

甚至这个近卫军也不容易在它所达到的令人目眩的高峰上站稳;它也不可能抗拒时间、疲劳、权力腐蚀以及社会环境压力等的恶劣影响。在这个老近卫军的统一体中已经出现了裂痕。列宁在致莫洛托夫的那封信中又写道,"只要这层党员中间发生小小的内部斗争,其威信即使不毁掉,也必定会削弱到不再起决定作用的地步",以至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因此,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老近卫军的团结一致,坚持它对自身崇高使命的意识,并保证它在政治上的至尊地位。党进行定期清洗是不够的。还要对吸收新党员加以严格限制;新党员要经受最严格的考验。最后列宁建议道:在党内需要建立一种特殊的等级制度,以功勋和为革命服务期限为基础。某些重要职务只能由最迟在内战时就已入党的人来担任。另一些责任更为重大的岗位只向革命初期就已为党工作的人敞开;至于最高位置,只能留给参加过反对沙皇专制的地下斗争的老革命家。[②]

但这些规定并没有庸俗庇护的气味。老近卫军仍然生活在严

---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19 页。

② 参见《苏共决议汇编》中党的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 1 卷第 595－596、612、628－630 页。

格自律的革命道德准则里。按照最高限额的规定,即使担任最高职务的党员也不得领取高于工厂里熟练工人的工资。诚然,某些权贵早已利用各种各样的遁词和漏洞,通过名目繁多的津贴来弥补菲薄的收入。但这样的漏洞毕竟是例外。职位分配的新规定并不是刻意要向老近卫军行贿,而是要确保党和国家在他们手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可靠工具。

老近卫军是令人敬畏的团体。把他们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对英勇豪迈的共同斗争的回忆,是对社会主义毫不动摇的信念,是那样一种确信:在这普遍的崩溃和麻木中,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甚至仅仅寄托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行动时,既富有权威性又十分傲慢;他们既忘我无私又野心勃勃;他们既具有最崇高的情操又能干出无法无天的恶行。他们把自己与革命的历史命运等同起来,也把革命的历史命运与他们自己等同起来。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忠心耿耿,以至把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看成是他们独占的事,甚至是私人事务;而且他们习惯用社会主义的理论术语为他们的行为甚至个人野心进行辩护。

在这些年的艰难困苦中,老近卫军的精神力量是布尔什维克的无价之宝。私人贸易的重新出现和财产权的部分恢复使党的队伍中弥漫了一种沮丧心理。不少共产党人焦急、疑虑,不知列宁命令的"退却"到底要把革命带向何处——看来列宁准备竭尽全力去鼓励商人和私有农民。由于农民不愿为了一文不值的纸票而出售粮食,于是在军事共产主义制度下曾被当做旧社会遗物而加以鄙视的钱"复活了",并且十分坚挺。没有它什么也干不成。政府砍掉了付给国营公司的补贴;在最艰苦的年月里始终坚持在工厂做工的工人现在失业了。国家银行用仅有的一点儿财源以信贷方式来鼓励私人企业。然而中央委员会向党保证道,只要我们掌握大型工业的"制高点",国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控制国民经济。

但是,这些“制高点”呈现出来的是一片可悲的毫无希望的景象:国营工业停滞不前,而私人贸易则开始欣欣向荣。当时,列宁曾邀请过去的租让权获得者和外国投资者重回俄国做生意;只是因为这些投资者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才使资本主义重要因素没有再度出现。布尔什维克怀疑:如果过去的租让权获得者果真作出反应,将会发生什么事呢?同时耐普曼越来越自信了,他们在饥饿的城镇里纵饮狂欢并嘲笑革命。乡村中的富农分子企图把雇农再一次置于他的支配之下,富农及其仆从开始到处操纵乡村苏维埃,而他们的儿子们则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地方支部的领头人了。大学师生们发动反共示威和罢课,而共产党人被操纵着去高唱革命圣歌——国际歌。哪儿是退却的终点?在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在公众集会上,工人反对派向列宁抛出这个问题。列宁一次次许诺要停止退却;而事变进程却一次次迫使他退却得更远。理想主义者惊慌失措了,“背叛”的叫喊声从他们的队伍里发出来。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工人——赤卫队的老战士出现在党委会前,憎恶地撕掉党证,把它对准党委书记的脸扔过去。像这类具有时代色彩的事件是如此之多,以至可以在许多当时的小说中找到对这类现象的描写,而党的领袖则怀着毫不掩饰的忧虑神情谈到这种情况。[1]

看来,在所有这些令人气馁沮丧的气氛包围中,革命只能依靠老近卫军,依靠他们的坚定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了。但是,这可能吗?

---

[1] 例如,曼努伊尔斯基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抗议以下事实:一位内战时期的老战士撕掉他的党证,竟然还被罩上了英雄主义的光环,其实应该把他当做叛徒来处理。他还比较了1849年和1907年革命失败后人们对待革命低潮的那种基本心情。《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第461-463页。

※　※　※　※　※

内战结束了，托洛茨基走出了他的军用专列。这辆军用专列曾经是他的战地指挥部。在那决定命运的3年里，他乘坐这辆专列沿着8000公里的前线行进，哪里危险就冲向哪里，只有短暂的磋商或者出席莫斯科的公众集会才暂时打断他的行程。这辆军用专列被放进了博物馆；它的机组人员，包括司机、机械师、机枪手和秘书等也都一一遣散了；托洛茨基享受着自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假期。他在莫斯科附近的乡间度假——狩猎、钓鱼、写作、准备谱写他生平事业的新篇章。当他回到这些年来他一直作为它的代言人的莫斯科时，他几乎成了一个陌生人。他首次瞥见这座古都是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候，当时他被遣送到羁押解送监狱等候流放到西伯利亚；正是在囚车的铁栅栏后面他首次看到了这座与他未来成败命运所系的城市。直到20年后，即1918年3月，他才又回到了莫斯科。这时正值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时期，也正是布什维克政府撤出彼得格勒搬进克里姆林宫以后。不久，他又离开莫斯科到前线去了。每逢他回到莫斯科，那不规则的"皇村"——斯拉夫主义者的第三罗马、其拜占廷式的教堂、亚细亚式的集市和没精打采的东方宿命论似乎总让他感到很别扭。无论是在1905年还是在1917年，他的革命生涯都是跟彼得格勒联系在一起的，它是莫斯科的对手、俄国的欧洲之窗；他总觉得同彼得格勒的工程师、造船工人、电气工人在一起，比与莫斯科的工人相处更自在，因为莫斯科工人大半是纺织厂的，他们的外表和行为与其说是像城市居民，倒不如说更像俄国农夫。

那克里姆林宫四周的城墙和塔楼，那古堡中弯弯曲曲的小径，那回响着古钟声的城垛的荫蔽处，那大教堂、军火库、大兵营、监狱和钟楼的幽森处，那金碧辉煌的古王宫大厅——四周装点着由历

代沙皇从各征服地劫掠到的数不清的神奇圣像，他生活于其中的这一切尤其让他感到别扭。托洛茨基和妻子、孩子们一起在前宫廷官吏居住的骑士大厦里占用了四个小房间。在走廊的另一头住着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两家共用一个餐厅和一间浴室——人们经常看到列宁在走廊上或浴室里跟托洛茨基的孩子们一起做游戏。有时，某一位老朋友，如拉柯夫斯基、曼努伊尔斯基等人因公从外省而来，便会同这家人住在一起。托洛茨基的家庭生活一如当年流亡中他住在巴黎的阁楼上或维也纳的租用套间里一样简朴。也许是因为穷困吧，即使在克里姆林宫，食物也很缺乏。[1] 托洛茨基的孩子廖瓦和谢尔盖在1921年时，一个15岁，一个13岁，他们几乎没有享受到父母的照顾：他们见到妈妈的时间甚至都有限；因为她的时间都用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该委员部下属的艺术部门的领导工作上了。

克里姆林宫富丽堂皇的气派跟它新住户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奇特的对照。托洛茨基曾描写过生活中这样一个滑稽的尴尬场面：一位老宫廷管家第一次服侍他们时，总把饭菜放在绘有沙皇盾形纹章的盘子中端上来，在大人和孩子们面前摆放盘子时十分小心，唯恐把沙皇的鹰徽颠倒了——但愿不会！[2] “莫斯科的阴沉和野蛮”从各个角落盯住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每当古老的钟声闯进了他们的谈话时，托洛茨基和列宁就“彼此相视，似乎有同样的感受：过去的幽灵在角落里偷听我们的谈话……”，往日的历史不仅仅是在窃听他们的谈话，而且还在抗拒他们。正如托洛茨基自己所坦率

① 亚瑟·兰塞姆谈到，1917年他送给布哈林少量沏茶用的糖精，这就是很厚的礼物了；而在季诺维也夫的指挥部里，一餐饭只有“碎马肉汤……一点儿粥……茶和一块糖”。《俄国六周》第13、56页。

② 《我的生平》第2卷第77页。

承认的那样，无论如何习惯不了克里姆林宫的摆设。他与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唯有他的历史嘲讽感才因革命闯入了莫斯科的神圣殿堂而得到满足。

他有一种苦恼的心情：内战结束之日就是他的恶运来临之时。他力图用自觉的乐观主义把这种苦恼的心情压下去，一个革命者是永远不应抛弃乐观主义的；他期待着事业和他个人的新胜利。然而，在他的演说和文章中，弥漫的净是那些对业已结束了的革命与内战的英雄时代的怀旧之情。但这并不是他把那个时代理想化了，如同他指出的那样，在那个时代里，农民的棍棒是革命的"最好的工具"，过去俄国农民就是凭着这一原始武器才把拿破仑驱逐出去的，而现在他们也是凭了它才把地主赶出了俄国。他也没有忽视那个时代的沉重遗产——农民由内战而释放出来的破坏性的怒火，现在它却反过来向转入建设任务的苏维埃共和国复仇泄恨了。尽管有这一切苦难、贫困和残酷，但破坏的年代毕竟也是创业的年代；因此托洛茨基又重温了他们当年的所向披靡、英勇无畏和凌云壮志；他意识到在他们身后留下的裂缝。①

托洛茨基的头脑和精力现在只使用一半。军事人民委员部不再是政府的轴心了，军队大部分已复员，到了 1922 年初，它被减少到只有初创时的 1/3，也失去了革命理想与激情。内战时期的老兵早已离去，军营里新动员来的一批年龄相同的士兵似乎跟沙皇时代来到军营里的农民儿子一样没精打采和冷漠麻木。环境迫使军事人民委员把他将军队改造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的民兵的夙愿搁置下来了，强加在他头上的是枯燥无味的日常管理工作和训练工作。他的时间都消耗在发动部队灭虱、擦靴子、擦枪等杂务

① 参见托洛茨基 10 月 25 日对莫斯科卫戍部队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的讲话和 1921 年 9 月在部队演习结束时的演说词。《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 3 卷第 1 册。

上了,再则就是用于请求最优秀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留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他力促中央委员会制止共产党员从部队大批流走,而中央委员会也正式发布了禁令;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效果。托洛茨基在全国会议上一再呼吁政治委员抵制"传染病式的和平主义情绪",他为红军士气低落而痛惜哀叹。他力图保持部队不受"苏哈列夫卡精神"的污染,并想利用部队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斗争的工具去反对道德败坏、文化落后、对所谓俄罗斯母亲的迷信,总之,他要保持部队内那种生气勃勃的革命传统和国际主义自觉性。[①]

当时正值内战时期的年轻指挥员(其中有些人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元帅)受过严格的训练,而且红军本身也有了自己的法令规章。托洛茨基是所有这些积极因素的鼓舞者和重要部分的缔造者。比如说,若是注意一下托洛茨基的《步兵细则》和克伦威尔的《士兵手册》之间的近似性,那是很趣的事情。《步兵细则》教导红军士兵说:"你们都是平等的同志,""你们的上级是你们的更有经验、更加训练有素的兄弟。在战斗中,在训练时,在兵营里,在工作上,你们必须服从他们。一旦离开了军营,你们就是绝对自由的。""如果有人问你用什么战斗,你应回答说,我们用步枪、刺刀、机关枪战斗,但我也用真理的语言去战斗。我把这些话对敌军士兵讲,他们本身也都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他们应能懂得我的确是他们的兄弟而不是他们的敌人。"

他娴于辞令,不论是用质朴的语言还是用华丽的辞藻都得心应手;他的形式感和色彩感交织成了一种绚丽多姿的新风格。他力图用这种新风格去唤起新兵的想象力,在部队中形成一种意识,

---

① 参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附录中的中央委员会年度报告,第637－664页;《苏维埃政权五年》;《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各处。

即部队绝不是有严密组织的炮灰。在五一劳动节和革命周年纪念日，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卫戍部队司令的陪同下，骑在马背上，通过克里姆林宫的斯巴斯基城门，前往红场去检阅已经集合起来的卫戍部队。回应他那"向同志们致敬！"的节日问候，部队中响起了"为革命服务"的回声。这回声震动着瓦西里大教堂的塔尖，荡漾在克里姆林宫墙边革命烈士墓的上空。那时还没有一成不变的浮夸仪式。检阅后，军事人民委员同那些从摇晃的木制看台上或从拥挤的军车上下来的其他中央委员一起加入士兵和工人的游行行列。[①]

托洛茨基的露面和演说仍然能激动群众。但是他似乎再也找不到他在内战中准确无误地找到过的那种与听众之间亲密无间的联系了，而这种联系，列宁总是能通过他那平易近人的外表和纯朴自然的表情恒久地建立起来。站在讲坛上的托洛茨基比他本人的形象高大得多；他的演说回荡着昔日英雄的基调。然而这个国家已倦于英雄主义、远大憧憬、崇高理想和激烈的姿态了；更何况托洛茨基由于他最近企图要将劳动军事化而名望有所下降。尽管这样，他的雄辩才能仍能对任何集会的听众具有吸引力，但是这种吸引力已经蒙上一层怀疑甚至反感的阴影了。他的伟大形象和革命功勋是谁也不会怀疑的；然而他不也过于出风头、过于张扬或者过于野心勃勃了吗？

---

① 莫里兹：《在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时代里》第108－111页。塞尔日和罗斯默在他们的著作中对这几年中的托洛茨基作了生动而善意的描写。对大量善意的或者恶意的目击记和人物素描，这里只能提到很少一部分：L-O．弗罗萨尔：《在饶勒斯的征象下》和《从饶勒斯到列宁》，B．巴扎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在一起》；路特·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F．布鲁普巴赫：《持不同政见六十年》；克莱尔·谢里登：《俄国画像》；拉狄克、布哈林、萨杜尔、伊斯特曼、霍利彻、路易·费舍等人的早期作品。

他那舞台式的做派和那英雄式的风度不再使人感到当年由于与时代悲剧相吻合而具有的那种奇妙之处了。现在人们只把他的这种做派和风度看做是舞台做戏。但是他的举止一如既往,因为他不可能有别的举止。不是他故作姿态地想要表现出比他自己更高的形象,而是因为他不可能不这样。他说那种紧张而戏剧化的语言,不是因为喜欢或追求什么舞台效果,而是因为这就是他最自然的语言,最适宜于表达他那激动人心的思想和热烈的情感。人们尽可以把黑兹利特(Hazlitt)那句形容与他不一样的人——伯克(Burke)的话应用到托洛茨基身上:这个人"想制服他的敌手时,总是把感情、想象和说理交融在一起",而"人们由于不习惯于政治领域中的这种情景而受到蒙骗,分不清春华与秋实……";"世人"总是"排斥任何华而不实的东西";然而"他这块金子若做成优雅的式样也并不会减少其价值";而"一个人的认识能力并不是总能得到如他所希望那样的恰当评价。但他的认识能力丝毫不失其真实可靠性,因为这并不是他所仅有的能力"。

托洛茨基和伯克一样"健谈、滔滔不绝、辞藻华丽"。他跟私人包括跟他的家人和亲友交谈时也如同在公众场合演说一样,运用的是他通常在讲坛上和文章里所用的同样的形象、同样的妙语,甚至同样的旋律和同样的节奏。如果他是一个演员,那么他就是一个无论幕前、幕后或者自己的家都对他毫无区别的演员——一个把舞台和生活融为一体的演员。他在历史活动中确实是一位英雄人物;但正因为如此,他在这平庸偏狭的一代人眼中就显得是如此不真实、不自然;也正因为如此,在早期新经济政策的非英雄化气氛中,他似乎就格格不入——成了一个局外人了。

不过,不必对托洛茨基性格中这浪漫主义的一面花费太多的笔墨。他一如既往保持着坚定的现实主义。不管怎么说,他并不是一个"赖在舞台上不肯下来"的老演员。他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新

经济政策所提出来的新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中去；他决不用革命原教旨主义的三棱镜来透视新经济政策。他在专心致志地钻研财政、工业、贸易、农业问题的同时，还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提出有关政策性的专门建议，关于这些专门建议，后面还将详加阐述。他运用他那振奋人心、滔滔不绝的辩才为那并不令人欢欣鼓舞的“退却”进行辩护，并在 1921 年、1922 年共产国际的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以新经济政策阐释者的身份出现。[①] 他用了比过去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共产国际的活动，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抵制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倾向，后两者鼓励不合时宜的、轻举妄动的国外起义，例如德国的三月行动。他负责共产国际法国委员会的工作，并参与制定共产国际每一重要部门的行动。

然而，军事人民委员部的例行公事，国内经济紧急问题和共产国际的活动仍然未能耗尽他的全部精力。他还要忙于许许多多其他任务，而其中每一项对于一个精力较差、能力较低的人来说都是要占用其全部时间的。比如说，他领导着由雅罗斯拉夫斯基（Ярославский）接管前的无神论者协会。他以哲学启蒙精神来领导它，从而基本避免了伤害宗教信徒的过火行为，而这种过火行为却是雅罗斯拉夫斯基领导下的无神论者协会工作的特点（他甚至还领导着一个没收和搜集教会财产的秘密委员会，这笔财产预定用来支付为减轻伏尔加河流域的饥荒灾情而从国外进口的粮食）。[②] 此时，他还是俄国知识界的主要精神鼓舞者和主要的文学批评家。他时常与之谈话的听众中包括科学家、医生、图书馆馆员、新闻记者以及其他专业人员，他向他们解释他们所从事课题中

---

① 参见《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第 74 - 111 页；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五年》第 233 - 240、460 - 510 页。

② 托洛茨基档案。

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此同时,他反对党内日趋明显的倾向——强使国家的文化生活趋向僵死的千篇一律。[①] 他在许多文章和演说中以更加通俗平易的语调坚持自己的观点:必须使粗野的俄国生活方式文明化,培养良好的习惯,讲究卫生,提高自从革命以来已经受到贬损的口头语言和书写语言的规范化,扩展和陶冶党员的情趣,等等。在列宁时代的最后几年里,由于列宁早已很少在公众中露面,托洛茨基在这些方面已经成为党内首要的、最有权威的发言人了。

迄今为止,他的浪漫主义气质尚未使他去反叛使党或毋宁说老近卫军得以建立并巩固其政治垄断权的那种严酷的现实主义。在新经济政策宣布前后,他确是一个严峻的纪律执行者,尽管他号召守纪律是以令人信服的论点为基础并诉诸理智的。他大加赞扬的仍然是党的"历史继承权";[②] 他争论道:无产阶级的民主程序不可能在社会的动荡与混乱中得以遵守;革命的命运绝不能依赖于人数减少并士气低落的工人阶级的不稳定情绪;布尔什维克对社会主义的责任就是通过他们所能掌握的一切手段来保持"钢铁般的专政"。他曾经表示过,党的政治垄断权只是一种紧急措施,一旦紧急局面结束,就要撤销它;但这并不是他现在要说的话了。在喀琅施塔得暴动一年多之后,他就经济复苏的征兆以及各方面引人注目的"上升运动"在《真理报》上撰文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结束一党制或者至少应对孟什维克取消禁令的时机是否到来了呢?他的回答是坚决否定的。[③] 他现在为政治垄断辩护的理由与其说是因共和国的内部困难,倒不如说是这样的事实:共和国是

① 参见本书第三章。

② 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十三章。

③ 《真理报》1922年5月10日;《共产国际五年》第373-374页。

个处于四面围困中的堡垒,在这样的堡垒内是决不能容许任何反对派存在的,哪怕只是一个弱小的反对派。他呼吁在俄国处于国际孤立的整个时期内强化一党制,但却没有料到它竟然持续了如此漫长的时间。当他回忆过去自己曾一度嘲笑各式政府企图镇压政治反对派但最终却显出无能时,便以下列理由为自己今日态度的明显改变进行辩护(这些理由有朝一日还会调转头来反对他自己):“如果一个犯了时代错误的政府或政权想要用镇压措施来反对新的、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势力,那是达不到目的的。但是在具有历史进步性的政府手中,这种镇压措施却可能成为有效的工具,把那些早该退出历史舞台的势力迅速地清扫出竞技场。”

1922年6月,在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著名审判中,他又重申了这个观点。他对被告的揭露既才气横溢而又激烈,他判定他们对多拉·卡普兰刺杀列宁以及其他恐怖行为负有政治责任。这次审判是与在柏林召开的“三个国际协商会议”同时举行的。布哈林和拉狄克代表布尔什维克出席了这次旨在建立共产党人与西方社会党人之间的“联合战线”的大会。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抗议这次审判;布哈林和拉狄克为使谈判顺利进行,答应不对被告处以死刑。但列宁对布哈林和拉狄克“向敲诈勒索行为屈膝投降”并“容许欧洲改良主义者干涉苏维埃内政”极为愤慨。托洛茨基与列宁一样愤怒。但为了避免谈判破裂,托洛茨基提出折衷的审判方案:判处被告死刑,缓期执行,其明确的条件是:社会革命党今后不得再从事恐怖活动和鼓动恐怖主义的图谋。①

托洛茨基严格执行纪律的态度也同样在党内表现出来。他代

① 《真理报》1922年5月16日、18日,6月18日;《列宁全集》第43卷第135－139页;《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维也纳联盟》;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11－212页。

表中央委员会向党和共产国际指控工人反对派。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工人反对派的行为和观点已受到谴责,但此后它对党的领导的攻击之激烈程度更是无以复加。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攻击政府助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的利益、践踏工人权利、粗暴背叛革命。他们既在党内受到挫败,又受到列宁驱逐出党的警告,于是向共产国际控诉列宁。托洛茨基在国际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了反驳他们的理由,因而他们的申诉未予受理。[①] 1922年春天,俄国党召开了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再次对这个问题进行判决,而托洛茨基再次担任了起诉人。[②] 他的发言不带任何恶意和怨恨,甚至对工人反对派抱有一定的同情;但是他仍然铁面无私地确认指控。他说:工人反对派采取向国际控告俄国党这种空前的举动,这是它的权利。而他反对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的是他们在其抗辩中所使用的那种令人无法容忍的狂妄语调以及谈到自己与党的时候使用“我们”与“他们”这样的词语,仿佛施略普尼柯夫与柯伦泰已经筹建了另外一个党。他说,这种态度会导致分裂,并给革命的敌人提供一切有利的机会。他为政府的农业政策和对私有财产的让步进行了辩护,也为它的受到同样强烈攻击的观点——将“长期与资产阶级国家和平共处和有效合作”——进行了辩护。[③]

工人反对派并不是唯一泼冷水者。在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亲眼看到他自己和列宁遭到最亲密的老朋友的攻击: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也说党向富农和外国资本主义屈膝投降,[④] 梁赞诺夫则大声谴责普遍流行的政治腐败和

---

①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附录》。

② 同上,第138-157页。

③ 同上,第144页。

④ 同上,第80-83页。

政治局统治党的随心所欲的专横态度;[①] 乌克兰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与斯克雷普尼克(Скрыпник)抗议政府的权力过分集中,认为这与那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旧俄国别无二致;[②] 始终是民主集中派的布勃诺夫谈到了党的“小资产阶级堕落”的危险;[③] 此外,还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是主要的经济理论家之一,也是前中央委员会书记。[④] 谁能想到,这些批评者绝大多数有一天会成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头面人物;谁能想到,托洛茨基自己有一天会像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一样也向共产国际控诉俄共中央委员会。但在目前,托洛茨基还受到列宁的由衷赞扬,他作为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喉舌,加之于反对派的是纪律、纪律,还是纪律。

但是,他仍然只是老近卫军中的外人——在近卫军之中,但却不属于近卫军。即使在1922年这次代表大会上,那时还是亚美尼亚一位年轻代表的米高扬(Микоян)就在讲台上公然表达了这个意思而没有受到任何驳斥。在辩论过程中,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都对党政不分表示关切和不安,并谈到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各自的职能分开。当时米高扬说,从托洛茨基的嘴里听到这类看法,他并不感到惊奇,因为托洛茨基是“政府成员,而不是党的成员”;但是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怎么也能有这样的想法呢?[⑤] 米高扬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说出这番话的。他不过说出了许多老近卫军心里想说但没有公开说出的话而已:在他们眼里,托洛茨基是政府成员,而不是党的成员。

现在,当老近卫军突然发现自己上升到未曾梦想的高峰,高踞

① 《俄共(布)十一次代表大会附录》第83-87页。

② 同上,第77-79页。

③ 同上,第458-460页。

④ 同上,第89-90页。

⑤ 同上,第453-457页。

于人民、工人阶级和党之上时,便开始精心编造它自己的历史,甚至是关于它的神话;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怀着一种虔诚,这种虔诚对任何一群老近卫军战士来说都是不会缺少的,是植根于他们对那些共同进行的伟大战斗、共同赢得的伟大胜利的记忆中的。整个国家对于那些从隐蔽的地下活动中升起、站在它前头的那些人,可以说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现在是时候了,要告诉人民,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业绩。党的历史学家们去挖掘档案,着手再创造他们那史诗般的故事。历史学家们的故事所讲述的几乎都是超人的大智大勇和对事业的忠诚。这些故事并非是他们蓄意编造的。其中大多数是真实的;连并不完全真实的事,他们也真诚地相信。当老近卫军的成员们从往事的灰暗镜子里看自己时,他们理所当然地看到镜子变得明亮了,而他们在镜子里的形象则在所追忆的胜利的革命光焰照耀下膨胀起来。但是,当他们再仔细往镜子里看时,却不可避免地在托洛茨基身上看到了他们的对头:孟什维克、孟什维克盟友、八月联盟领袖、尖锐辛辣的论战者,而这位论战者即使单枪匹马也是他们的危险敌人。于是,他们就重温托洛茨基与列宁在公开争论中互赠的那些辛辣绰号;此外,所保存的不为人知的手稿与信件的档案也提供了两人加诸对方的许多其他尖刻评论的证据。每一份与党的历史有关的文件不管多么微不足道,都受到毕恭毕敬的对待和公布。问题发生了:托洛茨基昔日反布尔什维克的那些激烈言论是否应从公布的文件中撤出来?当托洛茨基于1912年写给齐赫泽的一封信在沙皇宪兵队的档案里被发现后,主管党的档案的奥里明斯基(Олиминский)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在信中称列宁是“阴谋家”、“瓦解组织的能手”、“利用俄国的落后谋求私利的行家”。[1] 托洛茨基反对公布,

① 托洛茨基档案。托洛茨基致奥里明斯基,1921年12月6日。

他说纠缠于旧账是很愚蠢的；更何况他并不认为过去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全都错了，只是他不想让有关历史的辩驳牵住鼻子。这份攻击性的文件没有印出来，但是它的内容很有刺激性，其复印件在忠诚的老党员中传抄开了。他们议论道，瞧，托洛茨基在信中是怎样诽谤列宁的。给谁写的？齐赫泽，一个老叛徒；而他竟然还说他并非全错！当然，自那以后，托洛茨基只要有必要就作了大量纠正；1920年当列宁50诞辰时，托洛茨基赞颂列宁，他写了一篇短文概括介绍列宁的性格，既有透彻的心理真实性，又充满着崇敬之情。[①] 尽管这样，过去的零星插曲仍然在提醒那些对党的缔造者除了崇拜别无他想的人们：托洛茨基皈依布尔什维主义只不过是最近的事。

不仅仅是对昔日纠纷的回忆妨碍着老近卫军承认托洛茨基是自己人。他的坚强个性没有湮没在老近卫军中，也没有披上它的保护色。托洛茨基以其敏锐的思维能力和坚定不移的意志超越了老"列宁主义者"。他得出的结论哪怕与别人相吻合，也总是通过独立思考而不是根据党的传统所确立的公式得出的。他阐述自己思想时的轻松自由与列宁的多数门徒囿于正统公式来表达思想的那种拘谨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像那些抄写员，他说话是有权威的。他的智力兴趣之广博丰富，让一些人心中暗生猜忌，他们或出于需要，或出于克制，或出于嗜好，惯于把自己狭隘地局限在政治和组织方面，并且将他们的狭隘当做美德而沾沾自喜。

因此，几乎他所具备的一切，诸如丰富的内心世界，雄浑奔放的辩才，文字上的独创性，行政才能和魄力，完善的工作方法，对同事和部属的严格要求，超然的态度，不拘小节，甚至不擅聊天——所有这一切都在老近卫军成员中引起了一种自卑感。他一向讨厌

---

① 《真理报》1920年4月23日。

向这些人卑躬屈膝,而且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念头。他不但不能容忍这些蠢人,而且总是让他们感到自己是蠢人。老近卫军们同列宁相处则要自在得多,因为他们一直接受列宁的领导,而列宁也总是不伤他们的尊严。例如,当列宁抨击某种政治立场而且又知道其信徒中也有人持这种立场时,就小心翼翼地不把这种立场归咎于他们,而希望他们能从中摆脱出来;因此,他总能让他们不失体面地退却。每当列宁着意要把某个人争取到自己的观点方面来时,他总是采取一种巧妙的谈话方法,使这个人离开时深信他是通过自己的思考而非列宁的压力而得出这种新观点的。而在托洛茨基身上,这样的巧妙艺术却几乎一点儿也没有,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去提醒别人犯了错误,而坚持自己高人一筹和有先见之明。

他的先见之明并不因其炫耀而失去真实性,然而却是得罪人的。他那活跃的、富有创见的头脑永远令人震惊,令人不安,令人恼怒。他不容许他的同事和部属沉沦于环境惰性和思想惰性之中。党刚刚决定一项新政策,他就马上揭示它的那些"辩证的矛盾",抓住它的后果,预言新的问题和新的困难,力促作出新的决议。他天生就是一个爱找麻烦的人。他的判断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证明是正确的,也多半会引起抵制。他的头脑运转得如此之快,搞得别人气都喘不过来、精疲力竭、牢骚满腹,结果是对他敬而远之。

然而,尽管他在莫斯科城里、克里姆林宫内、老近卫军中几乎是一个陌路人,但在列宁的支持下,他仍占据着革命舞台的中心。

※　※　※　※　※

1922年4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给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投下了一层阴影。4月11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列宁建议任

命托洛茨基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托洛茨基断然地并且多少傲慢地拒绝接受这项任命。托洛茨基的拒绝及其拒绝方式颇使列宁恼怒，于是，一场新的争论中的许多麻烦都因此引起。新怨加上旧恨导致了政治局的分裂。①

列宁希望托洛茨基会同意作为他的代理人领导政府。列宁是在斯大林已经成为党的总书记一星期之后提出这项建议的。尽管总书记只是被指定去执行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但是对斯大林的任命却使人猜测是为了加强组织纪律。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列宁早就要求把工人反对派的领袖们驱逐出党；但他在中央委员会中仅以一票之差未能获得必要的 2/3 多数。② 他指望斯大林能强制执行在第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所宣布的严禁党内组织反对派的命令。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总书记窃取更广泛的任意决定权，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事了。

列宁对任命斯大林忧虑重重；但是局面既已形成，显然是为了抵消斯大林的影响，他才要把托洛茨基安排到人民委员会内，使之拥有可与之匹敌的权势和责任。列宁也许早有打算，想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职位分配作为一种手段，实现党政分开，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历来坚持这种必要性。为使党政分开有效地实现，看来需要找一个跟管理党的机关的人同样意志坚强的人去指挥国家机关的工作。

但是，在列宁的计划中，托洛茨基并不是唯一的副主席。曾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曾任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Цюрупа)都已获得同样的资格。列宁后来还建议加米涅夫也应

① 托洛茨基档案。

② 此事发生在 1921 年 8 月 9 日——这个事实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被一再提到。《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第 605 - 608 页及同书各页。

担任同样的职务。[1] 每位副主席主管某几个行政部门或某几个人民委员部。托洛茨基名义上虽然只是三位或四位副主席中的一位,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在列宁的意图中,他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第二把手。但即使没有任何正式名分,托洛茨基无论怎样也都已尽了这一职责,将其卓越的首创精神运用到了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中;列宁的这个建议是有意将托洛茨基的地位合法化并且使之得到加强。

列宁期望托洛茨基占据这个位置的迫切心情可以从下述这件事实看出:他一而再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在9个月里多次提出同一建议。当他在4月间第一次提出这个建议时,他还没有病倒,因此,他也许还没有想到关于他的领导地位的继承问题。但他工作过度劳累,心力交瘁。他长期患有失眠症,被迫减轻他自己的公务重担。5月底,他第一次中风,到了10月才恢复工作。9月11日,列宁仍在病中,医生还警告他要绝对休息,他就打电话给斯大林,请他把托洛茨基的任命问题以最正式、最紧急的方式在政治局上再一次提出来。最后,在12月初,继承问题已使列宁极为焦虑,他又一次提出这个问题,而这一次他是直接跟托洛茨基私下商谈的。

托洛茨基为什么要拒绝呢?这也许是因为在形式上把他安排在与其他副主席同样的地位上有损他的自尊心,而他们只是列宁的下级助手。他说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设立这么多副主席;他带着挖苦的口吻提了意见,认为这是职能重叠、分工不明确。[2] 同时,他还对政治权势作了"虚"与"实"的区分,认为列宁给他的只是虚名,政府的杠杆掌握在党的总书记手中,也就是掌握在斯大林手中。他与斯大林之间的对立在内战后仍然存在。即使是现在,这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147-155、181-183页。

② 参见托洛茨基档案中托洛茨基在1922年4月18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种对立也在政治局里继续着，表现在关于政策的分歧和关于任命的争执中。托洛茨基毫不怀疑，即使作为列宁的代理人，他的每一步也都得取决于总书记处的决定。而总书记处可选派布尔什维克到政府的各个不同部门去，单凭这一点就能有效地控制这些部门。在这一点上，他的态度跟列宁的态度一样是自我矛盾的；他需要党，更确切地说，是需要老近卫军去绝对控制政府；但是他又想防止党的机关干涉政府工作。只要老近卫军与党的机关基本平行，即使不完全平行，这两件事就不可能同时做到。托洛茨基在拒绝了列宁的建议之后，首先推行他自己的对行政机构大检查计划；但后来他又确信，只要党的总书记处（以及组织局）的权力不被削弱，这样的计划就不可能产生预期效果。

个人间的敌对和行政上的争执通常是与政策上更广泛的分歧交织在一起的。

现在，政治局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纲领没有引起争论。大家一致同意，军事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了，必须代之以一种混合型经济，其中私人"成分"与社会主义"成分"（即国营经济）可以互相共存，并在某种意义上互相竞争。大家看到，新经济政策不仅是权宜之计，而且是长期政策，这个政策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大家都认为新经济政策理应有双重目标：当前目标是借助私营企业的帮助复兴经济；而基本目标则是促进社会主义成分，并保证其逐步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如果说在这些一般原则上政策可以取得共识，那么，当一般原则落实到具体措施时，意见分歧便产生了。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首先认为有必要鼓励私营企业，而另一些领导人虽然并不否认这种必要性，却迫切希望促进社会主义成分。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头几年里，普遍的情绪是对军事共产主义的强烈抵触。布尔什维克急于要说服国人不必担心倒退到军事共

产主义去;他们自己也深信这样的倒退是决不允许的(除非发生战争)。再没有比把经济从废墟中抢救出来更重要的事了;而他们看到唯有农民和私有商人才有可能开始这种抢救。因此,他们绝不认为对农民和商人的鼓励是太放任了。其后果不久便显示出来了。1922年,农民的收获量大约达到战前正常年份收成的3/4。这使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里,一次好收成就会产生奇迹。饥荒和瘟疫得到了控制。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成就立刻缓和了危急的形势。但工业复兴的步伐仍然很慢。1922年,工业产值仅为战前的1/4。但即使最初这几年有一些的进展,主要也是发生在轻工业部门,特别是纺织业。重工业仍然是瘫痪的。国家没有钢铁、煤和机器,这再一次使轻工业受到生产停顿的威胁,因为机器得不到修理或更换,并且缺乏燃料。工业品价格已猛涨到非用户所能承担的了。价格猛涨是由于需求远未得到满足,工厂开工率低,原材料奇缺。形势的日趋恶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在工业管理中缺乏经验以及官僚的无能。工业停滞对农业产生有害的作用,并且使城乡之间本来已脆弱的“联系”再一次受到了中断的威胁。如果农民有钱买不到工业品,他也就不愿意出卖粮食了。对个体农业和私人商业让步尽管是必要的,但这些让步还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指望把问题扔给“市场”,通过供求关系的自发作用使它得到迅速解决,同时又无损于政府的社会主义初衷。

政府看不清楚该如何去应付这个局面。它只能得过且过。它采取的是治标办法,而治标办法的选择则是受对军事共产主义的普遍抵触所支配。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由于鲁莽地废除一切市场经济而烧伤了手指,因此现在涉足市场时就格外小心。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他们根本不想阻止向农民索取粮食和原料;而现在他们却迫不及待去安抚农民。他们希望对消费品日趋强烈的需求会驱动工业车轮的运转,同时也希望重工业能蹒跚着走向恢复。同样的态度

也在财政政策上显示出来。在军事共产主义期间，货币与信贷被当做旧秩序的遗物受到唾弃，并被认为是正处在消亡之中的东西。现在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重新发现了货币与信贷的重要性，宁愿把资金投放于获利见效快的企业，而不愿投放于关系到国家命脉的企业里。他们把信贷抽放到轻工业部门，而忽视了重工业部门。就某一意义来说，这种对军事共产主义的抵触是自然的，甚至是有益的。但是像负责经济和财政部门的李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之类党的领袖，则把这种抵触推向了极端。

应该记住，就新经济政策的颁布来说，托洛茨基与党的其他领袖没有什么分歧。甚至早在中央委员会最终接受它的一年之前，他本人就已提倡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了；也正因为这样，他因政府竟把紧急的经济问题拖延了两年或一年半之后才去解决而指责列宁，就不是无缘无故的了。[①] 然而，尽管托洛茨基是拥护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人，但他决不向抵触军事共产主义的极端倾向让步。他并不像他的政治局的同志们那样相信对农民和商人进一步退让能保证经济恢复，也不相信发挥市场的自发作用能恢复工农业之间以及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平衡。他也不像索柯里尼柯夫和李可夫那样对重新发现的正统财政观念价值抱有新的热情。

在 1921 年和 1922 年初，这些意见分歧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农业和私营贸易尚未迈开大步。但不久之后，严重的争论便展开了。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成就要求对工业政策作出紧急修改，而加快工业复兴的步伐已经刻不容缓。轻工业的“繁荣景象”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基础是狭窄的；除非轻工业部门的生产机器有可能得到修理和更新，否则持续不了很久（农业同

① 托洛茨基档案，1921 年 8 月 7 日和 1922 年 8 月 22 日托洛茨基对政治局所作的声明。

样需要农具来保持发展)。因此,必须集中力量冲出重工业的死胡同:政府应当从全局出发,制订出工业上的"全面计划",而不是依赖市场和供求的自发作用。经济发展孰先孰后的次序应该是固定的,而且必须优先考虑重工业。资源和人力必须合理地集中在那些对国民经济起着根本作用的国营公司,而那些不能有效迅速地促进经济复苏的企业应当关闭;即令这会使这些企业的工人暂时失业也应在所不惜。财政政策必须服从工业政策的需要,接受国家利益的指导,而不是受利润率的支配。信贷应当面向重工业,国家银行应当对重工业设备的更新进行长期投资。托洛茨基主张,由于私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之间不平衡而迫切需要对政策作这样的方向性调整。现在,一方面私人企业已是有利可图,而且积累资本和不断扩大;而另一方面大批国营工业则处于亏损状态。两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对比,威胁着政府政策的社会主义目标。

在30-40年代之后,托洛茨基的这些见解已经成为起码的常识,而当初看起来却似乎是牵强附会的。而更牵强附会的看来是托洛茨基坚持计划的必要性。计划性之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本质的东西,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言而喻的原则,当然也为布尔什维克所熟悉并作为基本原则而接受。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他们以为已经处在可以立即建立羽毛丰满的计划经济这样一个阶段了;当托洛茨基提出需要"统一计划"来确保经济重建的平衡时,他没有遇到任何反对意见。① 1921年2月22日,正当军事共产主义结束的前夜,政府决定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但是,自从新经济政策实施以来,由于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215-232页。但甚至那时列宁就在写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一张短小而意味深长的便条中说道:"我们穷得像叫花子,像食不果腹、囊空如洗的叫花子。……完整的、完善的、真正的计划,目前对我们来说='官僚主义的乌托邦'。"《列宁全集》第50卷第103页。

全力转向活跃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这个概念便黯然失色了。在俄国人民心目中，计划经济这个概念同军事共产主义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跟它沾边的东西都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不错，在新经济政策刚颁布不久的 1921 年 4 月 1 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了，克尔日扎诺夫斯基(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任主席。实际上这个新机构有名无实。它的职权界限模糊不清；也没有人想搞清楚。它无权制定长期政策和计划，也无权将计划付诸实施。它只能就日常发生的行政忙乱现象向工业管理部门提出一些建议罢了。[①]

托洛茨基几乎从一开始就对这种状况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随着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计划性的需求不是降低，而是越来越迫切了；如果政府仅仅将它看做是次要的、纯理论的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托洛茨基主张说，正因为人们又一次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才必须设法控制市场，并且增强自身的控制能力。他重申"统一计划"的必要性，他说，如果没有统一计划，就不可能使生产合理化，不可能把资源集中到重工业，不可能重新达到各经济成分之间的平衡。最后，他要求明确地确定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权限，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充分资格的权威性计划机构，使它有权审定生产能力、人力和原材料储存，从而能提前几年确定生产指标，确保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必不可少的比例平衡"。早在 1921 年 5 月 3 日，托洛茨基就已写信给列宁说："不幸的是，我们的工作在毫无计划并且也不懂得计划必要性的情况下进行着。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有意否定这种必要性——即为最近的将来制定出一个切实有效的经济计划。"[②]

---

① 《苏维埃政权五年》第 150 – 152 页。

② 托洛茨基致列宁的这封信(事关伊·沙图诺夫斯基的一本小册子)存于托洛茨基档案。另见《列宁全集》第 50 卷第 300 页。列宁在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便笺中说"托洛茨基火气极大"。

他在政治局里得不到响应。列宁反对他。列宁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计划性只有在经济高度发达和高度集中的国家里才是有效的,而不是在拥有2000多万个分散的小农户、涣散的工业、私人商业的野蛮落后的国家里。列宁并不是否定长期发展计划的必要性,他本人就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提出了一个俄国电气化的计划,并把它概括为一个著名公式——"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等于社会主义"。但列宁认为涵盖整个国有化工业的"全面计划"这种想法是不成熟的、无益的。托洛茨基则主张说,若不是建立在全面计划的基础上,列宁的电气化计划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他质问道:假如缺乏用来建设电力厂的工业产品,何来电气化计划呢? 他也意识到,在现有条件下,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所预期的那种计划类型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它预先假定有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并且充分社会化了的现代社会的存在。但他所要求的全面计划只包括国有工业,而不包括私有成分,因此他并不认为现在实施计划经济为时过早。他看到了在国家所有制这一事实与政府有意允许多种多样的国营企业各行其是之间的矛盾。他说,全民所有制已把整个工业转变为一家康采恩,如果没有统一计划,这家康采恩的经营管理就不可能是卓有成效的。[①]

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见解。而更为大胆的是托洛茨基在1922年就开始阐明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想法。[②] 这是托洛茨基在一个不发达国家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对马克思的一个历史观点的运用。当正常的资本原始积累几乎还没有开始或者

---

① 托洛茨基甚至在新经济政策颁布前夜就已对这些问题进行过论证。参见《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215-232、233-235页。

② 参见1922年10月11托洛茨基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同上,第21卷第294-317页。

还很弱小，不能容许工业根据它自身资源也就是自身利润来发展时，现代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初期就被马克思称做原始积累时期。早期的资产阶级毫不犹豫地采用一切暴力的和超经济的手段，努力把生产资料集中到自己手中；并且继续不断地采用这些办法，直到资本主义工业强大起来，能够获取利润，足以把巨额利润重新投入到生产中并在它自身结构内获得自我生存和自我扩展为止。对自耕农的剥削，对殖民地的掠夺、海盗行为以及后来的低工资制，都曾是这种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这种原始积累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曾经持续了好几百年。只有当这个过程向前推进到一定程度时，正常的资本积累时期方才到来，而“合法的”利润为大规模投资及持续工业化构成了主要基础，尽管不是唯一的基础。

那么，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设想过，社会主义也必须经过一个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相类似的发展阶段。他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必将在资产阶级社会所积累起来的并且国有化了的现代工业财富的基础上兴起。但在俄国还不存在足够的那种财富；而且经过这些年的破坏和蹂躏，留下的财富就更少了。布尔什维克在宣布以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之后，却发现俄国缺少的正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他们必须首先奠定这个基础。托洛茨基主张他们必须进行原始积累，但这是跟他们的先驱者不同的原始积累，这种原始积累应当在社会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

托洛茨基当然无意暗示社会主义政府应该或者可以采取那种“血腥可耻”的掠夺和剥削的办法，那是马克思将之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联系在一起的；他也无意暗示社会主义来到世上也同资本主义一样“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加强和加速资本的形成则是必要的。俄国工业的发展不能按照把利润重新投入到生产中去的正常过程来进行。大部分俄国工业仍然

亏损，即使不亏损，也仍然产生不出巨额的剩余部分来维持社会主义建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加速工业化。国家公积金的增加既可以用牺牲私营商业和农业年收益作为代价，也可以用牺牲全国工资总额作为代价。只是在一段时间以后托洛茨基才开始力促对耐普曼和富裕农民课以重税。而眼下，即1922年，他仅仅着重指出，唯有牺牲工人利益，经济机体才得以运转、重建和发展。例如，10月间他在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说："我们接管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我们国家的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已被推向这样一个阶段，可以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我们不能满足于使用1914年以前的工厂。它们已被破坏殆尽，我们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力才能把它们一步一步地重新建设起来。"他又说：工人阶级"唯有作出重大牺牲、竭尽全力、鼓足勇气、不惜流血，才能走向社会主义"。[①]

他的呼吁立即招致了反对。工人反对派早已说过，新经济政策允许对无产阶级进行新型剥削；而这种讽刺挖苦的话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口号。托洛茨基的论点仿佛是对这种责难真实性的注解并为它提供依据。难道他实际上不是说服工人屈从于这种新型剥削吗？他反驳道，只有当一个社会阶级被迫为另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流血流汗、做牛做马的时候才谈得上剥削。而现在他要求的是工人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流血流汗。他说，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也只能被指责为让工人"自我剥削"，因为他号召工人为自己的无产阶级国家、为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而作出"牺牲"和不惜"流血奋斗"。[②]

这已不是托洛茨基第一次把他的论点建立在将工人阶级与国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
② 同上。

家等同起来的基础上了。在1920年与1921年间，他说过同样的话去反对工会自治。他说，工人阶级并无自己的利益需要保护以免受到国家的侵犯。列宁当时回答说，托洛茨基所求助的无产阶级国家仍然是一个抽象物；它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人国家，它还必须维持工农之间的平衡，更糟的是，它已向官僚主义蜕变。工人当然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国家，但他们也应该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这个国家的侵犯。[①] 当托洛茨基此刻再次声称工人阶级与其国家利益相一致时，他就使自己面临着同样的批判。他不正是借这个抽象观念的名义来敦促工人肩负起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副重担吗？官僚阶层、富农分子和耐普曼不正是主要的受益者吗？如果工人阶级拒不承担这副重担，那么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如何才能实现呢？这些问题在随后几年里愈益突出。托洛茨基立即回答道，他所提倡的政策不能、也不应强加在工人头上——只有取得工人的同意，政策才能得以推行。因此，主要困难是属于"教育性质的问题"：应当使工人们认识到，什么是必需的，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因为没有他们的自愿和社会主义热情就什么事也办不成。[②] 他又一次试图拨动工人阶级英雄主义的心弦，就像他以前曾做过的那样：在1919年当白军威胁着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时他做得极其成功；在1920年与1921年之交冬天的喀琅施塔得骚乱前，他又一次尝试却遭到彻底失败。应当补充说，他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在此阶段内并没有遇到政治局内的反对，尽管政治局里大多数成员不愿意自己的声誉受到连累，也不愿把不惜"流血奋斗"的坦率要求摆到工人们面前。

这些就是托洛茨基在新经济政策早期所阐明的主要经济思

①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208页及以后各页；《武装的先知》第十四章。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

想,他当时实际上是苏联计划经济的先驱之一。但他并不是这些思想唯一的首创者。他的言论代表了一小部分接近托洛茨基的理论家和行政人员的集体思想,尽管其中有些人不赞同他那拘泥于纪律的态度。根据托洛茨基自己的说法,最早发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个新词的人是曾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任职的民主集中派领袖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Владимир Смирнов)。[①] 叶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应当被看做是这个思想的主要理论家,他在1925年问世的著作《新经济学》有别于托洛茨基的论述,他所阐明的理论根据更深刻、更严密;无疑,他在1922年至1923年间就提出了他的这些思想。尤里·皮达可夫是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灵魂,他也主张统一计划经济,为当时重工业的形势而忧虑,批评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的信贷政策。[②] 毫无疑问,托洛茨基从这些人,或许还从其他人那里借用了某些观点。但是,所有这些人不是拘泥于理论上的探讨,就是沉溺于行政工作,不可能提出比抽象议论或者经验主义的局部结论更为深刻的东西了。唯独托洛茨基能把他们的思想和结论转化为政策纲领,并在政治局里为其辩护,在全国听众面前为其解释。

列宁仍然对"统一计划"和"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权力"没有多少兴趣。他把他的电气化计划描绘为"争论中唯一严肃的工作",并把"全面计划"斥为"空谈"。斯大林也持相同的态度;而且他还不遗余力地扩大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裂痕。[③] 那些二流的

①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321页;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第1卷第1部分第57页。

② 参见托洛茨基档案。

③ 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0页,他在致列宁的信中把托洛茨基关于计划性的观点说成是"一位中世纪的手工业者,一个自命为负有用古代传说'拯救'俄国的使命的易卜生剧作的英雄……"的观点。

领导人，诸如李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则视托洛茨基的政策侵犯了他们的职责。他们怀疑计划性，反对授予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大的权力。他们曾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散布过流言蜚语——眼下则公开指责：托洛茨基之所以要求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权力只是因为他觊觎它的领导权；当他不再是国家军事独裁者之后就一心想当国家经济的老板。我们不知道托洛茨基是否真想成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首脑。即使如此，这愿望也无可厚非。他曾严厉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现任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说此人不称职，[①] 但他从未提议他本人作为候补者，他完全是就事论事。然而，个人野心和本位主义的忌妒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进来。因此，他的敌手们认定，一个权力加强了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必然会同以列宁为主席、以托洛茨基为副主席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相抗衡。1921 年 8 月 7 日，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托洛茨基反驳道，在他看来，劳动国防委员会仍应掌管重大政策，而国家计划委员会则应把政策化为具体的经济计划，并监督执行。他没能说服中央委员会采纳他的意见。[②]

与这些争论同时，又发生了有关工农检查院的冲突。斯大林从 1919 年起就一直任工农检查院的首脑，直到 1922 年春他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时为止；但即使在后来他也对工农检查院施加了强大影响。工农检查院拥有广泛多样的职能：它有权审查全体公务员的道德品质问题而无需事先警告，它可以检查任何一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它可以监视整个行政系统的工作效率，并且有权制订提高效率的措施。按照列宁的意图，工农检查院应当发挥相当

① 列宁在 1922 年 5 月 5 日致政治局的信中提到这个批评，参见《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181－183 页。

② 托洛茨基档案。

于超级人民委员部的作用,有了这样的人民委员部,可使尚未实现民主管理的行政机构自己监督自己,并且保持严格的自律。实际上,斯大林却把工农检查院变成了他在政府内部的私人警察机关。早在1920年,托洛茨基就抨击工农检查院,宣称它的检查办法是浪费时间、毫无效益;而它所干的一切也只不过是扰乱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他说:"你不可能创造一个特殊部门,能够集政府智慧于一身,并能够监督、检查所有其他部门。……在政府各个部门里谁都知道,每当需要改变政策或者需要在组织上进行重大改革时,若期望工农检查院的指导,那是徒劳的。工农检查院本身就是政府法令与政府机制之间缺乏协调性的惊人例证,它本身正成为慵懒无能和反复无常的一个强大因素。"无论如何,工农检查院这样的机构所需要的正是"广阔的视野,是关于国家事务和经济事务方面的广阔视野,是比执行这类工作的机构所具有的要更加广阔的视野。"他把工农检查院比做灰心丧气的不称职者的庇护所和避风港,这些人被所有其他人民委员部踢了出来,"同真正的、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工作完全断绝了关系。"托洛茨基甚至不止一次提到他认为斯大林是一个爬上高位的超级不称职者。[①]

列宁为斯大林和工农检查院辩护。他因政府公务人员的无能和腐化而恼怒,因而寄很大希望于工农检查院。他认为托洛茨基是在泄私愤,所以感到气愤。[②] 托洛茨基争辩道,起码在经济部门里,那种慵懒无能是组织不完善的后果,而这种组织不完善反过来又反映了经济政策中缺乏任何指导性原则。依靠工农检查院的检查不可能改变这种局面——医治的办法只能在计划性和改组了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中找到。"无能"这种病症也不可能用突击处理和

① 参见《托洛茨基全集》第15卷第223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第181－183页,上述引文及同书各处。

通过斯大林的人民委员部对政府公务人员施加威胁恫吓而得到根治。托洛茨基说，在一个有着政府历来野蛮腐化这种糟糕传统的落后国家里，主要的任务是要去系统地教育政府工作人员，并且用文明的工作方法去培训他们。

考虑到这种种分歧，托洛茨基不肯当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他不能违心地接受这样一个职位，因为如果接受了，他就不得不去执行他认为缺乏中心思想的经济政策，不得不去指挥他认为结构不合理的行政机构。1922年夏天，当列宁敦促他利用这个职位发动一场反官僚主义滥用权力的运动时，托洛茨基回答道：最糟糕的滥用职权根子就在党的最高统治层。他抱怨说，政治局和组织局粗暴地干涉政府事务，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他们甚至没有征得各人民委员部领导的同意，就擅自作出有关各人民委员部的决议，因此，只要这种罪恶行径还在党内到处泛滥，通行无阻，那么向行政机构中的慵懒无能作斗争就是徒劳的。[①] 但列宁没有领会托洛茨基的意思。他信赖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不亚于他信赖作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的斯大林。

1922年夏天，围绕着莫斯科对非俄罗斯共和国和苏俄各州的控制方式发生了进一步的分歧。布尔什维克曾保证让这些共和国拥有自决权，其中明确包括退出联邦的权利；这个保证已载入1918年的宪法。同时，他们又坚持严格的集中制政府，并在实际上践踏了非俄罗斯共和国的自治权。人们记得，托洛茨基早在1921年就抗议过对格鲁吉亚的征服和占领，而斯大林则是这一行动的主要鼓动者。后来托洛茨基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甚至还专

① 参见托洛茨基档案中1922年8月22日和1923年1月15、20、25日托洛茨基致政治局的信件，另见《我的生平》第2卷第216页。

门写了一本小册子为这次征服辩护。[1] 更晚一些时候，即于 1922 年春，在党召开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指控列宁政府抛弃自决权原则，恢复“统一而不可分的”旧式俄国时，托洛茨基则保持沉默。但很快他本人就在政治局秘密会议上提出了同样的指控，仍然是针对格鲁吉亚问题以及斯大林在那里的所作所为，结果使冲突极度激化。

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正是他下令镇压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的。当格鲁吉亚的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如姆季瓦尼(Мдивани)和马哈拉泽(Махарадзе)对此提出抗议时，斯大林企图恐吓他们并压制他们的抗议。[2] 他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根本趋向的，因为若是在莫斯科取缔孟什维克党是对的，那当然没有什么明显理由说在梯弗里斯就不能做同样的事。托洛茨基签署过俄罗斯的禁令，但抨击它在格鲁吉亚的延伸。他指出，俄罗斯的孟什维克党人由于其反革命立场已经名声扫地，但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人仍然享有强大而普遍的支持。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他的论点要令人信服，唯有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仍然建立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不过，既然托洛茨基也接受下述观点：布尔什维克为了革命利益有权保持他们的政治垄断而不管他们是否享有人民的普遍支持，那么他的攻击就有些虚伪了。从一党制的实现到迫害反一党制的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其间只是一步之差，尽管这是从言行一致到荒诞不经的一步之差。当斯大林企图恫吓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时，这是他第一次把镇压的措

---

① 《武装的先知》第十三章。

② 姆季瓦尼、马哈拉泽、奥尔忠尼启则、叶努基泽、斯大林和布哈林对这次冲突的报告，载《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 150－176、540－565 页。另见本书作者著的《斯大林政治传记》第 236－246 页。

施应用到布尔什维克身上去。他也严重损害了布尔什维克对待非俄罗斯民族的政策原则性，斯大林自己曾是这个政策的提倡者，而布尔什维克也曾以这个政策的宽宏而自豪。

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在自我辩护中转而反对斯大林政策中极端的中央集权主义原则。他们质问道，莫斯科人民委员会有什么权力可以决定梯弗里斯的政治生活呢？民族自决权跑到哪里去了？难道说弱小民族非得被迫回到那个"统一而不可分的"俄罗斯帝国不可吗？这都是击中要害的问题。在此同时，斯大林却变本加厉地准备一部新宪法，它比原1918年宪法具有更加强烈的中央集权主义色彩，它打算剥夺和废除非俄罗斯民族的权利，变苏维埃联邦为苏维埃联盟。因此，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其他共和国一致起来反对这部新宪法。

当所有这些抗议提到政治局面前时，托洛茨基支持它们。现在证实他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正是这种担忧使他最先提出反对兼并格鲁吉亚。他在斯大林的行为中觉察到对权力的丑恶的、公然的滥用，它把中央集权主义推到一种无限危险的境地，亵渎了非俄罗斯民族的尊严，使他们警觉到"民族自决权"只不过是一个骗局。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则准备了一份对穆迪瓦尼和马哈拉泽的诉状，断言：这些"民族分裂主义者"反对苏维埃货币在格鲁吉亚流通，拒不与邻近高加索各共和国合作，拒不与它们共享仅有的食品，而且他们在根本上是受民族利己主义的精神所驱使，不利于苏维埃联邦的整体利益。如果说这种指控是真实的，那么这样的行为在党员中是不能容许的。托洛茨基不相信这种指控是真实的。列宁与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则把这场冲突视为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两派之间的内部纠纷；而从他们的考虑来说，政治局最慎重的方针就是接受斯大林的观点。斯大林是政治局里有关这些问题的专家；列宁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斯大林竟会如此恶毒地触犯

自己同胞的民族尊严,因为,在所有的人当中,后者是著名论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作者,而且正是这部论著就是党对自决权的经典解释。列宁再次感到,托洛茨基是从个人意气或个人主义出发行事的,而这点导致了托洛茨基在许多其他问题上反对政治局。1922年10月,列宁恢复办公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谴责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支持了斯大林的权威。

※　※　※　※　※

当我们的思维一直跟随着政治局内的意见分歧并考虑了托洛茨基在这些分歧争论中的作用时,我们就会被大约一年后在托洛茨基身上所发生的变化而感到吃惊。1922年上半年,托洛茨基仍是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一位守纪律者说话;下半年,他已与守纪律者们发生了冲突。这种对比在他对许多事情上的态度上表现出来;当人们回忆起他在这一年的年初代表政治局在党和共产国际面前指控工人反对派时,这种对比就更明显了。然而到这一年的年底,看来他自己提出的意见正是工人反对派(以及民主集中派)迄今所提出过的意见。正是这个工人反对派最早而又杂乱无章地表达了布尔什维克基层群众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并且主张需要赋予新经济政策以社会主义方向。正是这个工人反对派最早抨击新官僚主义,抗议滥用职权,斥责新特权。也正是这个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起来反对党的机关的权力过分集中,大声疾呼要重建党内民主。起初,托洛茨基严厉地批评他们,警告他们说,布尔什维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用诸如“我们”和“他们”的措词把自己与党的领袖对立起来。但在1922年一年中,看来他接受了他们的大多数思想,采取了他们那种立场,这种立场也必然使他用“我们”和“他们”的措词同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展开论争。这真像是在驯服

工人反对派的过程中他自己反而转到了它的观点上去，并成为它的最杰出的生力军。

事实上，他在这段时间里他同整个党一直在与两难困境搏斗着——只是他比其他任何人搏斗得更为紧张。这就是自由与权威之间的两难困境。托洛茨基对这两者的要求几乎同样敏感。只要革命还仅仅是为了纯粹的生存而奋斗，他就主张权威第一。他使红军实行集中制，主张劳动军事化，力图把全国工会组织起来，鼓吹一个强力而文明的官僚机构的必要性，压制无产阶级民主，压制党内反对派。然而，即使在这个时期里，他的思想深处仍然活跃着一位社会主义"自由的鼓吹者"。在他严格要求遵守纪律的全过程中回响着它的对应旋律——社会主义自由的最强音。在他那最严厉无情的言行中仍流露出人性的温暖，这就是他区别于其他大多数鼓吹纪律者的鲜明特色。在革命的最初阶段，他就已把讨伐的手指向没教养、多疑和妄自尊大的"新官僚"：他们是致命的"压舱物"，"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真正威胁"；这个事业只有当每一个男女劳动者深感他或她的生活比以前更舒适、更自由、更美好和更富尊严性时，才能充分证明它本身的正确。[1]

武装斗争的结束加剧了布尔什维主义内部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同时也加剧了托洛茨基内心的紧张对立。工人反对派以及接近于它的那些政治集团是反对权威的。托洛茨基之所以不同意他们，只是因为他深刻把握着局势的现实性。他不能轻易放弃扎根于现实的权威要求。但当他眼看到自由——社会主义自由——被连根拔去的时候，他又无法保持心境的平静。他是在真正的两难困境中搏斗，而工人反对派只抓着了其中的一端死不松手。托洛茨基力图在布尔什维克的纪律和无产阶级民主之间保持平

① 《武装的先知》第十二章。

衡。天平的一端越是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权威,他就越是支持无产阶级民主。1921 年至 1923 年之间发生了平衡倾覆的决定性转变;在这几年中,他愈益用党内民主的要求去对抗纪律的要求。

然而,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对权威的侵害表示愤慨的单纯的"自由鼓吹者"。他仍然是一位布尔什维克政治家,一如既往地坚信集权制国家和强大的党的领导的必要性,也一如既往地注意到他们的特权。他攻击的不是原则而是对这些特权的滥用。当他义愤填膺地对官僚主义发动排炮式的攻击时,当他以饱满的激情为党内民主进行辩护时,在他身上仍然响彻着纪律鼓吹者的对应旋律。当他意识到"在人类发展中,官僚主义代表着一个尚未结束的整个时代"时,当他意识到官僚主义的罪孽同"人民群众的开明程度、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成反比地出现"时,[①] 他小心翼翼地不去引发人们的幻想:以为这些罪孽可以一扫而空。迄今为止,他甚至还没有笼统地反对官僚主义——他宁可呼吁其中进步的开明者去反对落后的专横者,并且希望前者同进步的工人一起去制裁、去再教育后者,如果有必要就淘汰他们。他的确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愈加靠近工人反对派及其类似的政治集团,隐约认识到他们反对权威的合理一面。但是与他们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反对狂,不是简单地"拒绝"官僚主义。他仍然在真正的两难困境中徘徊着,但是现在他的立场跟以前不同了,而且跟反对派一方也不同。

正由于这个原因,不可能准确描述托洛茨基在立场上的改变,也不可能更确切地说明是什么事件在什么时间导致了这种改变。导致改变的既不是唯一的事件,也不是某个特定的时间。政治局的政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在工人民主和集权国家之间摇摆不定。托洛茨基的观点也随着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摇摆而摇摆——只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 15 卷第 218 - 221 页;《武装的先知》第十三章。

不过是朝着相反的方向。他开始反对初露端倪的过分的中央集权主义，开始维护那些已经受到侵犯的弱小民族的权利。他同党的“机关”发生了冲突，因为这个机关已独立于党而膨胀起来并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由于他所抗议的这个过程是潜移默化地发展着的，因而他的抗议反应也是潜移默化的。他并不觉得自己的观点现在有什么地方需要作重大的修正，因为他现在在反官僚主义阶段所说的话同时也就是他在纪律鼓吹阶段早已说过的话，尽管当时并没有加以强调，而且是在不同的场合下。他几乎不知不觉地从一个阶段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在政策的摇摆不定之中，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问题突出出来——这就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对抗。我们记得，甚至在内战进行期间，这种对抗就已产生了。这几乎是从气质、出身、政治倾向和个人抱负的本能对立中发展起来的对抗。在这个对抗中，斯大林扮演的是主动进攻的角色——他由于处在较低的职位而感到屈辱。托洛茨基迟迟才意识到这个对抗，并且也只是无可奈何地对此作出反应，被卷进了这个对抗的旋涡。迄今为止，这个对抗仍然停留在受列宁的强大个人作用所左右的背景范围之内；它还不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为它尚未跟任何明显的政策和利害冲突相一致。到了1922年，这种一致开始出现了。斯大林作为党的机关的总管，并且还暂时得到列宁的支持，就把权威推向极点，强制提出要求，迫使他人服从。政策和利害方面的一种深刻冲突开始形成，把个人的敌对情绪揉合进去，甚至把焦点集中于个人的敌对，直到个人的敌对被一次更大的冲突所遮蔽并加强时为止。

※　※　※　※　※

将托洛茨基与列宁、斯大林和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争执列—

份清单,可以给我们留下他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所处实际地位的一个方面的印象。本传记作者应该突出这些事件和局势,因为托洛茨基此后与斯大林的斗争都是从这之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同他的命运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但在当代人眼里,这些事件和局势却并非同样突出。在决定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领袖中所占地位,特别是他同列宁的关系方面,这些分歧也并非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争论局限在政治局里,全党和全国毫不知情。公众的舆论仍把托洛茨基的名字同列宁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在全世界人民眼中,他仍是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主要鼓舞者之一。老实说,如果把他跟列宁之间的不和与他们的共同工作,特别是与他们在无比广阔的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团结一致和紧密合作相比较,实在是微不足道。

托洛茨基作为军事人民委员继续得到列宁的充分支持。甚至在内战结束之后他还必须同"军事反对派"作斗争,而他们在前几年就向他的政策提出过挑战。图哈切夫斯基仍想争取党支持他的建立红军国际总参谋部的得意之作。受到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鼓励的伏龙芝和伏罗希洛夫仍力图使他们的"无产阶级战略"和"进攻性军事学说"获得正式批准。这些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秘密举行的专门会议上进行了详细讨论。[①] 托洛茨基最后否决了他对手的要求;有个事实帮助了他,即他背后有列宁的权威。列宁历来高度重视他的军事工作,差不多是主动地接受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判断。可以举出一件有趣的事加以说明。当喀琅施塔得暴动之后,列宁曾向托洛茨基建议解散或"关闭"波罗的海舰队。他认为,水兵们是不可靠的,海军是无用的,它只会

① 托洛茨基在那次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收进《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2册第244页及以后各页。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十三章。

消耗全国最缺乏的煤、粮食和服装，因此解散波罗的海舰队有百利而无一弊。但托洛茨基反对。他坚决要求保存海军并深信他能重建海军、转变舰队的思想风貌。这件事就这样随随便便解决了——通过托洛茨基和列宁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彼此传递的潦草便笺。列宁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保证，海军因此便被保住了。[①]

列宁也曾不止一次向党和共产国际表明，他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他全心全意地支持托洛茨基在俄国文化生活中所起到的杰出影响（关于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活动，将在后面讨论）。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致反对那帮吵吵嚷嚷的作家和艺术家，特别是倡议"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野心。在内战后他们视为头等大事的教育事业以及一切有关倡导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两人都同意要耐心和宽容；两人都坚决阻止生硬作风、骄傲自负和狂热，这些苗头在许多有影响的党员身上已开始表现出来。

在外交方面，托洛茨基同样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和恒久的创造性。重要的外交问题是由一个小型委员会决定的，它由列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组成，并邀请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常常还有拉狄克参加协商。当时苏维埃外交应致力于巩固和平，并同资产阶级欧洲建立国际关系。我们应当记得，托洛茨基曾利用他的一切影响终于在1921年同波兰签订了和平协定，而列宁对这个和平协定却并不是那么热心。他同样想尽办法争取到政治局的同意，与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小共和国划定边界，签订了和平协议。[②] 早在

① 这件事发生在1921年3月27日会议上。参见托洛茨基档案。数月后，托洛茨基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又提到了这件事。《革命是怎样被武装起来的》第3卷第1册第81页。

② 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十三章。

1920年，托洛茨基就敦促列宁同英帝国和解；只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这个建议才付诸实现。但是他在外交领域最重要的创举则完成于1921年，当时他进行了一系列大胆而又极巧妙的活动，终于促成了与德国签订拉帕洛条约，在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到1939年德—苏条约的20年中，这是苏联外交史上最重大的功绩。

作为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渴望用现代武器装备红军。但原始落后的苏维埃军事工业无法满足供应。他通过在国外的代理人到处搜购军火，甚至远到美国去买。但这种购买远水不解近渴，而且，红军依赖国外的军火供应是危险的。因此，托洛茨基想利用国外援助建立起俄国的现代军事工业。然而问题发生了：从哪里能得到这种援助呢？有哪一国资产阶级乐意援助一个共产党政府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呢？他能够寄托成功希望的国家只有一个，这就是德国。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制造军火，欧洲最现代化的德国军火工业便闲置不用。倘若这笔生意有足够的吸引力，那么这些企业主是否愿意提供设备和技术指导呢？1921年初，曾在维也纳《真理报》工作过的前孟什维克党人维克多·科普（Виктор Копп）代表托洛茨基，与克虏伯、布鲁姆—沃斯和阿尔巴特劳斯等大公司进行了秘密接触。1921年4月7日，他报告说，这些公司同意合作，愿意提供在俄国制造飞机、潜艇、大炮以及其他军需品所需的装备和技术援助。整整一年中，双方使者穿梭来往于莫斯科和柏林；而托洛茨基则向列宁和契切林通报谈判的每一步发展。政治局授权他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在所有这些准备阶段内，他已掌握了通向拉帕洛条约的各种线索，就等着外交家们出面了。①

① 科普的报告、托洛茨基和列宁的便条均收入托洛茨基档案。

随着谈判的进行，交易的范围扩大了。在德国，闲置的并非只是军火工业，旧日出色的军官们也都赋闲在家。因此他们乐意承担训练俄国士兵和飞行员的任务。作为交换，他们可以在俄国境内秘密训练德国的军事干部，而这是在他们国内办不到的。这样，德国国防军与苏联红军之间长期合作的基础奠定了，这项合作在托洛茨基被免职后还持续了整整10年，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军事力量的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直到1922年春天，所有这些活动仍在试探进行中，莫斯科和柏林双方都踌躇不决，因为各国外交界一直希望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谋求同协约国各国和解，这是第一次准备邀请德国和苏俄参加的国际会议，它们至今还是外交界的弃儿。只有当所有这些希望落空之后，拉帕洛条约才得以签订。这个条约与其说是真心诚意的同盟，倒不如说是一笔"认真务实的"交易。布尔什维克急于想通过互相让步为自己尽可能多地获取利益，因此照例小心地不去鼓励德国修改条约和进行复仇运动，尽管他们出于原则，一开始便谴责了凡尔赛条约，当时他们的政府甚至还没有被德国承认，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也还记忆犹新。

托洛茨基格外小心不让苏俄的政策同德国的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后来在拉帕洛条约签订之前，他力图改善俄法关系。1922年秋他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爱德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原左翼联盟的领袖，当时的法国总理。赫里欧后来详细地描述了这次访问，并回顾了托洛茨基为改善两国关系所提出的充分理由。托洛茨基使赫里欧确信，只因为协约国的盲目敌意才迫使苏俄跟德国先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尔后在拉帕洛签订了协议；但拉帕洛条约中没有一款是针对法国的。他重温法国雅各宾党的传统，呼吁法国政治家和舆论界更广泛地理解俄国革命。赫里欧回

忆道,当托洛茨基谈到雅各宾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密切关系时,一队红军士兵用法语唱着《马赛曲》走过来了,"我们为自由而死"的歌词通过敞开的窗户,飘入会议厅。①

外交活动此刻在苏维埃事务中所表现出来的重要性是与俄国境外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直接相联系的。欧洲的革命浪潮已经消退,共产国际已经搁浅。共产国际所属的各党只能领导欧洲工人阶级中的少数,他们若向资产阶级制度发动正面攻击,则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然而,大多数共产党拒不承认失败,想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继续举行暴动、政变,他们希望,只要坚持下去就能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他们一边来。重新确定共产国际的方针已是刻不容缓的事,而这也正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共同工作。在共产国际的问题上,他们两人之间具有一种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一经确立起来,就不会因为任何微小的意见分歧而受到干扰。②

不论托洛茨基还是列宁都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根本信念,即俄国的十月起义开辟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而托洛茨基则在此后的整整 20 年里直到生命结束都坚守这个信念。但此刻他终于认识到,俄国以外的阶级斗争比他本人及其他人最初所设想的要更复杂、更漫长。他不再想当然地断言阶级斗争的结果。他所关心的是要消除这种自满情绪和共产国际内的"极左"幻想。1921 年 7 月,他对那些坚持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③ 他说,预先决定社会发展进程的这种

① E.赫里欧:《新俄罗斯》第 157 - 158 页。

② 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名誉主席的唯一两位苏联领导人。参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 16 页。

③ 《共产国际五年》第 266 - 305 页。

信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机械式的"曲解。

> 人类并不总是永远不变地向上发展。……人类历史上曾有过长期停滞,也有过向野蛮阶段的倒退。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例……当一个社会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高度,是不可能使自己停留在那个高度上的。……人类永远不可能停滞不前。任何均衡由于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结果,在本质上都是不稳定的。如果一个社会不再上升,那就必定后退。一个社会,若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确保其优势,那么这个社会就必定崩溃。于是,通向野蛮之路便敞开了。

古代文明崩溃的主要原因正是如此:罗马和希腊的上层阶级已经腐朽不堪了,而被剥削阶级——广大奴隶又天生没有能力进行革命和发挥政治领导作用。这种情况可做我们这个时代的殷鉴。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已是不可否认的了。的确,美国的资本主义仍然是一支生气勃勃的、扩张性的力量,尽管社会主义在美国已经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合理地开发国家资源而更能促进社会的福祉。但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在其历史意义上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它不能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起任何进步作用,也不可能开辟任何新的远景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我们这个时代一切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就都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梦想。然而,尽管欧洲资本主义正在继续衰退,但资本主义制度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自行崩溃。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被推翻,而唯有工人阶级才能通过革命行动推翻它。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其著作《西方的没落》中所做的可悲预言就将成为现实。历史已向工人阶级提出挑战,似乎在

对他们说:“你们应当懂得,如果你们不去推翻资产阶级,你们将在文明的衰落中毁灭。努力吧,去完成你们的使命!”[①]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经受住了世界大战和战后危机的冲击。西欧有产阶级已从俄国革命中汲取教训:他们不会让自己再像沙皇帝国那样被打个措手不及。他们已经动员了所有的资源和战略思想。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便是这个总动员的信号——托洛茨基是在1922年说这番话的,这一年正是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的那一年。他又补充说,存在着“一位德国的墨索里尼”攫取权力的危险。[②]

所有这一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发展都是不祥之兆。这整个发展进程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未曾预见到的一系列特殊现象可能使社会主义处于不利地位。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首先发生在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背景的美国,就会产生最佳的结果,如果发生在英国,则会产生次佳的结果。但与此相反,革命却首先在俄国赢得胜利,而它在那儿展示其优越性的余地却很有限。如果革命发生在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亚、非国家,那么它将发现自己的处境最为不妙。这使托洛茨基作出了忧郁的评论:“历史似乎是从相反的一端来解她的结的。”也就是说,从最不成熟的国家开始。[③]

托洛茨基并没有抛弃他的希望,即“结”也会从西方一端,亦即欧洲一端解开。在他看来,革命的延迟、反革命的动员、阶级斗争的暗淡前途和欧洲文明衰退的可能性都并非是命定的必然;而是必须去反抗和阻止的一种危险。时机仍然以压倒之势有利于革

① 《共产国际五年》第266-305页。
② 同上,第563页。
③ 同上,第429-430页。

命;但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共产党的态度。共产党的使命就是要把欧洲社会引出死胡同。他们必须去夺取领导权。他们若想成功,只有成为战斗的、自觉的党,只有通晓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并且习惯于在严格的国际纪律下协同作战。如果他们仍然只是旧的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激进变种,如果他们仍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抱有幻想,并且只在本国政治的框架内行动,他们就非失败不可。但是,如果他们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时却使自己成为狭隘、自我中心、思想与策略僵化的宗派集团;如果他们仅仅满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制度采取纯粹消极的、无力的抵制,而不是从这些制度内部去促进革命思想;如果他们总是尝试着去袭击资本主义堡垒,而不去相应地注意环境条件和力量平衡,那么他们也肯定会失败的。

各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不是直接的革命时机。他们的任务是积聚力量并赢得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没有它的支持,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

托洛茨基与列宁一起制订了"统一战线"的策略。[①] 这个策略的要点是:各国共产党由于仍然弱小,还不足以推翻现行社会体制,因此他们必须成为工人"日常斗争"——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争取民主自由的最积极的参与者。他们不应把社会主义思想变成工联主义和议会改良的一枚小银币,而应当把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目标引入实现"局部要求"的斗争中去。他们必须使工人们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能赢得的一切利益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要通过争取这类利益的斗争把他们团结起来作最后的斗争。

---

① 1921年6月23日,托洛茨基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了《关于世界危机和国际任务的报告》,拉狄克代替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策略的报告》,当时季诺维也夫倾向于"极左"反对派。《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社会民主党是通过将工人的战斗力局限在资本主义框架中这种方式去领导工人为实现“局部要求”而斗争的;而他们惯用改良去转移革命目标。共产党人则恰恰相反,应当利用改良作为革命的跳板。

既然共产党人不得不为局部利益和局部改良而战斗,那么他们与社会民主党人和温和的工联主义者就有了共同的基础,不管这个基础是多么狭窄。共产党人应当努力争取同他们在统一战线内协调行动。这样至少可以防止改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不可弥补的根本裂痕所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克服工人阶级的分裂,防止力量的分散。当共产党人和改良主义者在分别行动时,每当受到资产阶级的威胁或者可以从资产阶级手中争取让步时,他们就应当联合起来去反对它。联合行动还应当扩大到议会和选举中去,共产党人应当作好准备在议会选举中支持社会民主党人。但统一战线的主要战场是在议会外,在工会中,在产业部门里,在“街头”。共产党人应当追求双重目标:他们要尽力夺取统一战线的直接胜利,同时在统一战线内申明自己的观点,旨在使社会民主党工人从改良主义的思想惰性中摆脱出来,助长他们的革命自觉性。

列宁早在1920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就已经详细阐述了这些观点,他强调指出,不可理喻、极端激进派的宗派主义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无比危害。在1921年德国的三月暴动之后,对极端激进主义正式进行严厉谴责的必要性变得格外迫切了。就在那时,列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了新政策的建议。他遭到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库恩·贝拉等人的强烈反对。一时间,极端激进派似乎不可一世。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列宁和托洛茨基联合对抗反对派之后,才说服了执行委员会批准“积聚力量”政策,同时授权列宁与托洛茨基在即将召开的共产

国际代表大会上阐明这个政策。[1]

在1921年7月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极端激进派负隅顽抗。他们对德国党、意大利党、荷兰党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它们从充塞整个国际的那股高涨情绪中汲取了力量。各国共产党是在同老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才得以生存下来的，他们指责这些老牌社会民主党人支持1917—1918年的“帝国主义大屠杀”、随后对欧洲革命的镇压、对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谋杀，指责他们对欧洲干涉俄国革命所采取的暧昧态度。因此毫不奇怪，当许多共产党人现在听到列宁和托洛茨基力促他们承认失败——哪怕是暂时的失败，而且还要他们同那些可憎的“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和“社会民主党叛徒”合作时，他们大为惊愕，甚至义愤填膺。在极端激进派看来，这种行为无异于投降，甚至是背叛。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如同早先在执行委员会上一样，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得不运用他们的影响和辩才去阻止反对派占据上风——他们甚至威胁说不惜分裂国际，如果共产国际支持极端激进派的话。

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了新政策，但是，仍有思想保留，对所涉及到的问题还没有明确理解。列宁和托洛茨基向各国共产党提出双重任务，即同改良主义者并肩战斗去反对资产阶级，同时要把工人

---

① 在《列宁领导下的莫斯科》一书的第172－188页中，阿尔弗雷德·罗斯默对这几天的情况提供了资料丰富的报告。另见拉狄克：《共产国际五年》第2卷序言。列宁在这次执行委员会上发了言，他声明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并严厉抨击极左派发言人库恩·贝拉，多次将库恩称为“傻瓜”。列宁的发言全文，我多年前就已读过，但在写作本书时却未在手头。托洛茨基在他的《反对派通报》(1932年12月出版)中刊登了列宁发言的摘要。列宁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抗议库恩·贝拉的演说，库恩是反对托洛茨基的，而不是维护托洛茨基的——如果他希望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就应该这样做……托洛茨基同志是一千倍地正确……我认为，在一切基本问题上支持托洛茨基同志已经说过的话，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列宁也支持托洛茨基反对加香和弗洛萨尔，他们在大会上代表极右派。(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阶级从改良主义者的影响下争取过来。统一战线的观点体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整个策略经验，布尔什维克的确曾以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一道首先反对沙皇帝国，然后反对立宪民主党和科尔尼洛夫，直到最终战胜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胜利，不仅仅是由于党的领袖们智勇双全，而且还由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和继之而来的整个阶级革命典型的从右到左的转变。这样的策略——从共产党的观点看来，没有任何其他的策略是现实可行的——能否运用到俄国境外而取得同样的胜利呢？在欧洲，旧秩序已经重新恢复了某种程度的稳定，出现了一种既混乱而又明显的从左至右的转变。仅此一点就确立了改良主义者在任何统一战线内的优势。欧洲的共产党还没有一位领袖能像列宁或托洛茨基那样善于运用策略。因此欧洲共产党被证明不善于兼顾统一战线的两个方面。有的共产党人只记住他们的任务是真诚地同社会民主党合作，有的则一心要搞臭社会民主党。有人将统一战线视为不遗余力地团结工人阶级去为局部要求奋斗，还有人仅仅把它看成是一种巧妙的计谋，更有人摇摆于两种对立的观点之间。这样，国际便开始分裂为右翼和左翼，中间分子和过激集团，“稳健派”和“极左派”。

在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和列宁主要是跟极端激进派的反对意见进行争论，这使他们有时像是在鼓励右翼分子。特别是托洛茨基，一谈到极端激进派，便流露出尖刻辛辣、鄙弃轻蔑的表情来。例如对柏林共产党组织领导人阿尔卡季·马斯洛夫（Arkadi Maslov）和路特·费舍（Ruth Fischer），托洛茨基把他们描绘为感情冲动、没有头脑的人，认为他们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并且很有可能转变为最无原则的机会主义。[①] 托洛茨基博得了大会全体

① 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五年》第288页及以后各页。

温和派的热烈掌声;当著名的德国共产主义老战士克拉拉·蔡特金代表与会的大多数代表们向他致以庄严而激动人心的颂词时,大会掌声雷动,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①]

在下一次亦即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已经病魔缠身,发言简短而又吃力;托洛茨基则作为共产国际的战略战术的主要阐述者而引人注目。他再一次倡导统一战线。他进一步敦促各国共产党有条件地支持社会民主党政府,在特殊的条件下,即在革命即将爆发的形势下,如果这种联合能为无产阶级专政铺平道路,甚至可以加入他们的政府。[②] 这使反对派勃然大怒。共产国际自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声明了其政策的一条原则——任何一个共产党决不加入任何联合政府:它的任务就是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构,而决不试图从其内部来夺取它。但是大会接受了战术策略革新;各国共产党受命等候时机与社会民主党一起组织联合政府。这个决定在1923年秋天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折点上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意义。

托洛茨基(以及列宁)所推行的策略就是如此,他们始终希望能从“正端”来“解开革命之结”,也就是说从欧洲一端解开。

※ ※ ※ ※ ※

1922年整个夏天,政治局内关于国内问题的意见分歧仍毫无结果地延续下去。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不同意见仍然存在。9月11日,列宁从莫斯科郊外哥尔克村休养回来后与斯大林进行了接触,责成他在政治局上再次以最迫切的形式提出动议,任命托洛

---

①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58页。

② 参见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共产国际五年》。

茨基为副主席。斯大林用电话把动议通知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他本人和李可夫投票赞成任命;加里宁表示无异议,而托姆斯基和加米涅夫弃权。没有人投反对票。托洛茨基再次拒绝接受这个职务。[①] 列宁坚持这项任命是迫不及待的,因为李可夫即将调离。托洛茨基回答说,他自己也该去休假了,而且手头还堆满了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工作。所有这些借口都不相干,因为列宁本来就没有打算把这项任命仅仅用来延续因休假而中断的工作。但托洛茨基未等政治局作出决定便离开了莫斯科。9月14日,政治局召开会议,斯大林在会上提出了极不利于托洛茨基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斥责托洛茨基擅离职守。[②] 各方面情况表明,肯定是列宁促使斯大林作出这个决议案的,或至少斯大林是得到他的同意的。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件意外事件结束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论。10月初,中央委员会通过有关外贸垄断权的几项决议。苏维埃政府为自己保留着对外贸易的垄断权曾决定把所有对外商务交易集中在手里。这就是"社会主义保护主义"的决定性措施——该术语是托洛茨基新创造的。[③] 其意图是保护基础薄弱的苏维埃经济免受世界市场的敌对压力以及未可预料的经济波动的影响。垄断权还可防止私人商业挤进外贸,防止它输出必需品并输入非必需品或进一步打乱全国的经济平衡。中央委员会在托洛茨基和列宁缺席之际通过的这几项新决议,虽然还没有走得太远,尚不至允许私人商业打入外贸,但它们确实使中央对国外的苏俄贸易机构的监督放松了。这就有可能使在国外经营的个别国营公

① 托洛茨基档案。

② 同上。

③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第79页。

司纯粹为了局部利益而独立活动并以此破坏“社会主义保护主义”。迟早总有一天，私人商业可能从这种破坏中捞到好处。[1]

列宁马上表示反对这些决定，认为这是对苏维埃经济的严重威胁。他震惊、愤怒，因而加重了病情。他在医生与护士监护下偷空口授通知、备忘录、抗议和警告，但他已不可能亲自干预中央委员会了。后来，当他得知托洛茨基所持观点与他一致时才松了一口气。在将近两个月过程中，问题一直悬而未决。12月13日，列宁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恳请您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观点，即保留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是绝对必要的。”托洛茨基欣然同意。至今他已多次警告过列宁和政治局，说他们的政策只会鼓励政府消极地屈从于不受控制的市场经济力量，他指出，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决定证明他的所有警告都是对的。他再次强调协调和计划以及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广泛权力的必要性。列宁仍然想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搁置起来，请求托洛茨基集中处理对外贸易垄断权的问题。列宁再次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我认为我们已经完全谈妥了。请您在全会上声明我们两人意见一致。”如果他们两人在全会上不能取得多数票，那么托洛茨基就要声明，他们两人将不惜任何代价反对投票结果：他们将公开谴责中央委员会。[2]

事实上，无需采取这样激烈的行动。同列宁所担心的恰好相反，12月下半月，当中央委员会重新审定这个问题时，托洛茨基轻易说服全会推翻了这些决议。列宁非常高兴。“在福斯特教授[3]

---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220－223页。

② 参见1922年12月12－27日间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通信；托洛茨基档案；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第58－63页。

③ 福斯特教授是列宁的医生之一。

的同意下"他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张便笺:"看来我们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①

这次意外事件使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比前一段时间更加密切了。几天以后,列宁进一步地回顾了最近两年来托洛茨基对经济政策所作的批评,他在12月27日的信中把回顾的结果通知了政治局:

> (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个思想……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也有合理的思想,即国家计划委员会……虽然实质上掌握着正确判断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却有点被置于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我想,可以而且应当赞同托洛茨基同志的是这一方面……。②

列宁意识到,由于这封信中有潜在的认错意味,它会令政治局委员们失望。果然,政治局由于列宁的突然转变而感到困惑,不顾

① 1954年时我写下本卷的头两章主要是根据托洛茨基档案的文件。仅仅两年后,在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进行揭露后,上述一些重要文件第一次在莫斯科得以公布,以后这些文件被收入专门一卷(即第36卷),增补到列宁全集第4版中。对照这些文本,我无需把托洛茨基档案中的引文改动一个标点符号。但是,托洛茨基档案中所存的列宁通信即使现在也不过发表了一部分,更不必提其他文件了。

② 托洛茨基档案;《列宁全集》第43卷第344-345页。实际上,列宁已经完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除克尔日扎诺夫斯不胜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这一断言之外。

托洛茨基的抗议，决定不发表列宁的意见。[1]

在这一年最后几周的日子里，在其他一些把他们两人分开的问题上，列宁也为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而采取主动。12月初，他再次力促托洛茨基接受副主席的职位。[2] 这次是列宁与托洛茨基私下谈的，而不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的。继承问题在列宁头脑里已成为头等大事——他就要写他的遗嘱了。但是他对托洛茨基毫无暗示。相反，他以忧心忡忡的口气谈到了他认为越来越严重的滥用职权以及抑制这种恶习的必要。托洛茨基这次并没有完全拒绝列宁的动议。他只是反复强调，只要党的领导机构中仍然容忍这种歪风邪气，那么在政府部门中发动反官僚主义恶习的斗争就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列宁的回答是，他愿意与托洛茨基结成“联盟”，联合起来反对官僚主义，不仅在政府部门里，而且也在党的机构里。他们两人心照不宣，不需指名道姓。这次行动的矛头所向的唯一目标就是斯大林。但是他们没来得及继续研究和讨论任何行动计划。几天以后，列宁又一次中风。

在他们最后一次谈话中，列宁并没有告诉托洛茨基他又仔细思考了他们有过分歧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即斯大林处理格鲁吉亚的政策问题。这一次他最终也打算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了。此刻他的心情犹如一个一只脚已跨进坟墓的人那样，不安地回顾自己一生的工作，强烈意识到其工作上的缺陷。早在几个月以前，即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他曾经说过，他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仿佛一名汽车司机突然发觉他的汽车不是按照他所操纵的方向开去。有几股强大的势力正把苏维埃国家从正确的道路上推

---

① 托洛茨基档案。斯大林支支吾吾地说：“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印发列宁的评论，特别是我们没有得到列宁的批准。”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15－217页。

开:半野蛮的俄罗斯农民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包围的压力,特别是不文明的俄国专制政府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1] 每当疾病发作之后回头重新审视国家机构的动向时,列宁就更为警觉,他怀着感伤却又坚定的信心,力图把方向盘抓到自己已经瘫痪了的手中。

他察觉到"这辆汽车"又陷入了——噢,多么熟悉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老轨道。12月下半月,列宁重新审查了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这次冲突的前因后果,在这次冲突中他曾站在斯大林一边。他仔细地搜集、筛选、清理与核对事实。他终于明白了斯大林及其副手奥尔忠尼启则在梯弗里斯的粗暴举动。他发现他们加诸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都是虚假的,他很生自己的气,因为他允许斯大林滥用他的信任并蒙蔽他的理智。

12月23日至25日,列宁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口授了那封给他的追随者的信,这封信实际上成了他最后的遗愿与遗嘱。他要让党了解那些将受命领导党的人。他扼要地概括了领导核心每人的特点,让党知道每一个领导人在他心中的功与过。列宁抛开个人的好恶,斟酌着每一句话,将其使判断建立在多年观察的基础上而不是出自一时的冲动。

他写道,党应当注意到分裂的危险,即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现时中央两位杰出的领袖"在其中将作为主要的敌手而彼此对峙。迄今为止,他们的对抗还没有表现为根本的阶级利益或原则性的冲突:他认为还仅仅是个人意气之争。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他"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有一种使他与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的个人主义倾向。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这些当然都是重大缺点,会削弱他的合作能

[1] 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第85页。

力和判断力。但列宁又补充说,党不应该纠缠于他在革命前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分歧。他通过这告诫暗示先前的那些分歧都早已过时了;但列宁有一种预感:他的意思不一定能为他的信徒们所接受。

关于斯大林,他只是说了这样一番话:"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个警告只是一种暗示,还不是断言。列宁尽量避免提出直截了当的意见,也不表明个人的爱憎态度。如果说只是因为他关于托洛茨基的品质谈得更多一些,那么看起来他更强调的是托洛茨基的缺点,而不是斯大林的缺点。但不久他又有了新的想法。1923年1月4日,他又写了那份简要而意味深长的补充。他说斯大林的粗暴"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他建议他的追随者们"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必将发展得更尖锐,最终危及全党。[①] 列宁毫不怀疑他的"调开斯大林"的建议只能确立托洛茨基的领导地位。

由于列宁的遗嘱写得很含蓄,甚至其补充也同样,因此没有清楚表明列宁新近对斯大林的愤怒以及他要一劳永逸地使斯大林身败名裂的毅然决心。在12月25日至1月1日这几天中,列宁下定了这个决心。当时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刚刚召开,斯大林在会上宣布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来取代根据1918年宪法而制定的联邦。[②] 列宁原先一直支持对宪法作这样的修改,但他现在却怀疑,这将会完全取消非俄罗斯共和国的自治权,并且必然会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8-340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0页。

重新建立起"统一而不可分"的俄国。他又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斯大林利用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必要性来掩盖对弱小民族的镇压。当列宁再一次地深入观察斯大林的个性时，这种怀疑就转变为断然的肯定：在他看来，斯大林是一个粗鄙、狡猾、虚伪的家伙。12月30日，正当斯大林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时，列宁再次谎报病情，哄瞒医生，开始口授一系列有关对待弱小民族政策的评论。这实际上是列宁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后遗训了，其中充满内心的反省、噬心的懊悔与神圣的愤慨。[①]

列宁写道，他深感"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病魔妨碍他这样做，尽管他已把忧虑和猜疑透露给季诺维也夫。但是，只有现在，当他听到捷尔任斯基关于格鲁吉亚的报告之后，他才完全明白这个党已经掉进"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在格鲁吉亚以及别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根据这样的主张，即政府必须拥有统一而不可分的行政机关。列宁问道："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上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对于弱小民族来说，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他们事实上已遭受到"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现在正是时候，要保护非俄罗斯各民族免遭"真正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②]之流侵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2－353页。另见《苏共历史问题》(1957年第4期)中Л.А.福季耶娃的回忆。

② 杰尔席莫尔达系果戈理《钦差大臣》里的一个粗暴野蛮的警察，动辄打人。——译注

……我还担心……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

列宁在新年前夜继续写道：

> ……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伟大，只不过是像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尊重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事情的这一方面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地随便给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地道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那么这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团结的利益……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①]

斯大林为了替“对待被压迫民族的准帝国主义态度”辩护，就鼓吹集权制政府的必要，但是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比这种必要更为重要。列宁的结论是，如有必要的话，在斯大林主持下通过的新宪法必须连同新集权制政府一起废弃掉。

列宁本人如此痛苦和无情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后，显然他想在心里将这个问题考虑得更成熟一些，想出应该采取的行动步骤。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没有向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出示过他的便笺。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2－353页。

※ ※ ※ ※ ※

使列宁改变了对许多重大政策问题的看法的思想波动比1921年和1922年间在托洛茨基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更为惊人和突然。这也是革命理想与革命权力之间的尖锐冲突,这冲突发生在列宁身上,但又不仅仅发生在列宁一个人身上。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理想,它本应是严守纪律而又具有内部自由和献身精神的革命者团体,不会受到权力的腐蚀。党本身承担着遵守无产阶级民主、尊重弱小民族自由权利的责任,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社会主义。在追求革命理想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建立了强大而又集中的权力机构,然后他们逐渐将他们的理想——无产阶级民主、弱小民族的权利、最后还有他们自己的自由——都一点点地交给了这个权力机构。如果他们要实现理想,他们就不能放弃权力;但是现在权力却压制蒙蔽着他们的理想。最严重的两难困境出现了;而在坚信理想者与死抱住权力者之间的深刻裂痕也出现了。

这裂痕的界限还不那么明确,因为理想与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可分割的。布尔什维克由于献身革命而驾驭了权力机构,但权力机构却按照自己的规律、根据自己的动能发挥作用,要求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全心全意地依附于它。因此,坚信理想者不再想打碎权力机构,而是将自己等同于权力者,但也并不全然放弃理想。同一些人,也许此一时倡导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一面,而彼一时却跑去拥抱它的另一面。1920年到1921年间,谁也没有像托洛茨基那样走得更远,他要求一切利益、一切愿望都必须完全服从"铁的专政"。但当这专政开始吞没理想时,托洛茨基又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中第一个转而反对这专政机构的人。后来,当托洛茨基卷入

继承列宁这场斗争时，许多人听到他呼唤着革命理想，就怀疑他的诚意，怀疑他仅仅是利用革命理想作为争夺权力的借口。唯独列宁超越于任何猜疑之上。列宁是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他在自己一生活动的最后几周以内疚的心情承认，他没有充分抵制强者对弱者的新压迫，并且在他已用尽了最后一点儿力气去打击过分集中的权力机构的时候，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动机。列宁以深沉、无私和带有自责的献身革命的精神出发，为革命本身呼唤革命目标。在最后时刻，列宁，一个临终的人——但思想依然敏锐——还在为把革命从沉重的枷锁下解救出来而行动。此刻，列宁向其求助的盟友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

•

第二章

革出教门

自从内战开始以来，政治局便起着党的头脑和最高权威的作用，尽管党章条文里没有规定它的存在。每年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只选出中央委员会，并授予它最广泛的权力去决定政策、掌管组织、负责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选出政治局。最初，政治局只在两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之间每隔一周或两周对所发生的紧急问题作出决定。后来，随着中央委员会必须处理的事务范围扩大，其中包括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以及随着中央委员所承担的各部门职责日益增多并常常离开莫斯科，中央委员会便逐渐把它的特权非正式地委托给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原先只由十多个委员组成，但后来规模变大，机构臃肿，行动效率不高。1922 年，中央委

员会两个月内只开会一次,而政治局委员天天接触,联系密切。在工作中,他们严格遵守民主程序;如有意见分歧,则采用多数决定这一简单方式。正是在这个组织内,列宁以其德高望重而执掌着最高权力。[①]

从1922年12月起,关于列宁的接班人问题在政治局议程中占据了首要位置。但实质上这个问题尚不成其为问题。不论列宁在或不在,大家都认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统治全党的代理机构;政治局的意志就是其多数人的意志。因此,问题不是谁接列宁的班,而是当列宁不在时政治局应如何调整和形成怎样的多数才能保证领导的稳定性。迄今为止,领导的稳定性仍至少部分地依赖于列宁的无可争议的权威,依靠他的说服力和策略艺术,这使他能在每一个问题上确保自己的建议获得多数票。列宁毋需为此在政治局内形成自己的特殊派别。1922年12月,或1923年1月,当列宁终于不能参加政治局工作时,变化发生了,一个特殊派别形成了,其唯一目的就是防止托洛茨基掌握多数,使他不能取代列宁的位置。这个特殊派别就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三驾马车。

驱使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动机是十分清楚的。他们之间的对抗一直可以追溯到早在1918年的察里津战役时。[②] 而当前托洛茨基对工农检查院与总书记的尖刻批评更加深了对抗。1922年12月前后,斯大林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有一个由列宁与托洛茨基酝酿好的反对他的"联盟",还不知道列宁决心要解除他的总书记职务,还不知道列宁准备抨击他在格鲁吉亚的政策以及他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但是他已意识到危险了。[③] 先是在贸易垄断权问题上,尔后在国家计划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1卷第525、576-577、657-658页。

② 《武装的先知》第十二章。

③ 参见《苏共历史问题》第4期中福季耶娃的《忆列宁》。

委员会问题上,他发现列宁与托洛茨基行动一致。他又听到列宁猛烈抨击官僚主义恶劣作风。他大概从季诺维也夫那里得知列宁对格鲁吉亚事件感到不安。斯大林作为总书记已经攫取了庞大的权力:书记处(以及组织局)从政治局手中接过绝大部分行政职权,只给它剩下最高政策决定权了。但在名义上,政治局还控制着书记处和组织局;而政治局有权延长或者不予延长斯大林的任期。斯大林深信,他不能指望从托洛茨基所支配的政治局得到好处。在这个阶段,斯大林所操心的仅仅是保住已获得的势力,而不是取代列宁的位置。他懂得,党只是将他看做是党的机关的一名高级技术员和操作者而不是党的决策者和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而党要求列宁的接班人正是具备这后两个条件的人。无疑,由于没有得到这种评价,斯大林的野心深受伤害;但是他的谨慎使他保持着克制。

季诺维也夫是仅次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深孚众望的政治局委员。他是共产国际的主席。这几年,由于俄国共产党尚未把共产国际纯粹当做一件工具来利用,而是自居于其道义权威之下,因此共产国际主席一职就成了每一个布尔什维克都想占据的最崇高的位置。季诺维也夫同时是北方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是力量惊人的鼓动家和演说家;在党的眼中,他几乎永远是革命巨人之一,是一往无前、战无不胜的布尔什维克美德的化身。但是他的这种颇受欢迎爱戴的个性形象与他复杂而摇摆不定的真实性格并不相符。他的情绪变幻无常:热一阵冷一阵;一会儿信心十足,一会儿垂头丧气。他总是醉心于大胆的设想和大胆的策略,而这却需要最大勇气和坚定毅力去追求。然而,他意志薄弱,优柔寡断,甚至懦弱无能。[①]他最善于抓住列宁的思想,而且是列宁声音的洪亮而

---

① 在致伊万·斯米尔诺夫的信中(1928年写于阿拉木图),托洛茨基谈到了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同列宁的一次"简短谈话":"我告诉列宁,让我惊讶的是季诺维也夫。至

富有感染力的代言人;而他本人却没有自己的主见。他善于表现崇高的情操。他在最得意的时候以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气质给他的听众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可以在持续3小时之久的用外语发表的演说中批驳最出色、最有权威的欧洲社会主义理论家,说服分裂的、踌躇不决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加入共产国际。①他能牢牢抓住俄国群众的想象力,以至被目击者形容为"神通广大,法力无边"。②然而,他却能从这种崇高情操的境界之中转脸就去搞最卑鄙无耻的诡计,说最廉价的蛊惑人心的空话。在西欧陪伴列宁多年,他敏捷的头脑汲取了大量世界知识,但这些知识却是芜杂粗糙的。他的性格既温和、富有感情,又粗野、残酷。他既是一个真诚地忠实于国际主义原则、具有"国际视野"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心胸狭隘的政客,爱用讨价还价、要弄小花招来处理重大问题。他已攀登上一个梦想不到的高位,但被野心所驱使,他还想爬得更高。但就在往上爬的时候,他又为心中没底和不自信所苦恼。

季诺维也夫的一生中最引为自豪的是1907年至1917年这10年,他当时是列宁最亲密的学生;这10年是反动的10年,孤立的10年,失望的10年。那时候,他和列宁一起为党的生存并为党准备那伟大日子的到来而奋斗;也正是齐美尔瓦尔德代表大会和昆塔尔代表大会召开的时期,他与列宁一起向全世界提出了第三国

于加米涅夫,我非常了解他,知道在他身上革命者在哪儿结束,而机会主义者在哪儿开始。但我却不了解季诺维也夫的性格(1917年前);而根据他的言行举止来看,我猜他是一个什么都干得出来、什么也不怕的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此回答道:"如果说他什么也不怕,那只是说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事……。"参见托洛茨基档案。

① 参见《在哈勒举行的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决议记录》和季诺维也夫:《在德国十二天》。

② 此外,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及安热利卡·巴拉巴诺娃也有过同样的描述。

际的概念。季诺维也夫的最大耻辱是经不住1917年十月革命的考验,他本人及其同志或许也都是这么想的。列宁因他反对起义而斥之为“危害革命的工贼”。他的政治生涯就在这耻辱和自豪之间几乎全部毁掉了。他力图抹去1917年的回忆;列宁在这方面帮助了他,列宁甚至主动要求全党不要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再提起“历史的错误”。1923年,大多数党员几乎已经忘掉了这一严重的事件,不想再纠缠旧账。老近卫军也乐于既往不咎,只要十月革命前夕的裂痕能因此弥合。何况不少党员现在都站到季诺维也夫一边。老近卫军中的历史学家和传奇编造者们更加起劲地把聚光灯转向季诺维也夫最引为自豪的早期。如果说有谁能在列宁不在的时候代表老近卫军说话,那么这个人肯定就是季诺维也夫。

现在要季诺维也夫接受托洛茨基的领导,那是不可想象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记忆里还充塞着那些革命前的往事:当时他得到列宁的鼓励,时常在争论中痛贬托洛茨基。[1] 也不仅是因为他那最大的耻辱与托洛茨基最大的光荣所在——十月起义息息相联。自从1917年起,他几乎在一切关键时刻都是反对托洛茨基的。他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在内战时期他暗中怂恿反托洛茨基的军事反对派。1919年春,托洛茨基到达彼得格勒并组织防御力量抵抗尤登尼奇的进攻,这恰恰是在季诺维也夫这位在任的市政领导于惊慌失措中撒手不干的时候。在喀琅施塔得暴动时期,托洛茨基责备季诺维也夫毫无必要挑起这次事变。另一方面,在关于劳动军事化和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季诺维也夫是反对托洛茨基的人中叫得最响的批评者之一。[2] 后来在政治局里,他在经济政策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上投票反对

---

① 《季诺维也夫全集》第1、2、5卷;季诺维也夫:《反潮流》。

② 《武装的先知》第十章至第十三章。

托洛茨基，只是当列宁"转向"托洛茨基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被击败了。甚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他也被托洛茨基再次击败了，因为后者与列宁一起迫使国际通过了统一战线政策。毫不奇怪，季诺维也夫对待托洛茨基的态度是：暗自钦佩，却又搀杂着忌妒和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正是托洛茨基在众多老近卫军心中所引起的感觉。

季诺维也夫的态度照例也就是加米涅夫的态度。这两个人在政治上的伙伴关系如此密切，以至布尔什维克管他们叫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①]然而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使他们在政治上结合成为一对孪生兄弟的却不是他们精神气质上的相似，而是他们的差异。加米涅夫虽然只是莫斯科市党组织的首脑，远不如季诺维也夫出名，但在领导人圈子内部却更受尊敬。在公众讲坛上，他缺乏自信，缺乏演说家的华丽辞藻和勃勃英姿，但他却更坚强，更有文化修养，性格更坚定。不过他没有季诺维也夫那样的激情和想象力。他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宣传家。与季诺维也夫不一样，他往往容易接受折衷观点和折衷策略，但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却制止他走向折衷主义——他的理论主张与他的政治倾向相矛盾。他那妥协性格使他很适合担任谈判角色：早年列宁就时常起用他作为党的主要代表去同其他党派接触，特别是当列宁渴望达成妥协的时候。（在党内争论中，加米涅夫也是一个磨掉棱角的人，总是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之间寻求共同点。）但是他的折衷倾向也一再使他与列宁发生矛盾。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杜马中的

① 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希腊神话中的孪生兄弟，当一个战死后，另一个不愿独生，请求宙斯赐死，于是宙斯将一个的永生权分给另一个一半。据说宙斯由于感动，就使他们成为双子星座（即天文学上的北河二和北河三）。卡斯托尔和波鲁克斯后来成为难兄难弟的代名词。——译注

布尔什维克代表受到所谓"叛国"审讯时,加米涅夫从被告席上站起来声明,他不是列宁的"革命的失败主义"的支持者;1917 年 3 月至 4 月间,在列宁回到俄国之前,他领导党与孟什维克妥协;10 月,他是起义的反对者。这并不是因为他缺乏勇气。他也不全然是一个看风使舵的人物。他冷静、克制,没有过分的虚荣心和个人野心,在他不动感情的外表后面隐藏着对党的无限忠诚。正是在十月革命的那天,他的性格充分地表现出来:他曾公开反对起义,但起义一旦开始,他便出现在起义指挥部里,甘受驱使,全心全意地与他们合作,就这样承担起自己所反对过的那个方针的担子,承受着一切有关的政治风险和个人风险。[①]

把加米涅夫强烈地吸引到季诺维也夫这边来的因素或许正是他们性格上的不同。他们各自身上都有着相互排斥的冲动,然而同时又有着强烈的克制力,抑制了他们相互排斥的冲动,使他们在两个对立极端之间彼此吸引在一起。

加米涅夫对待他的前妻舅托洛茨基没有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那样强烈的敌意,他比他们两人更能容忍托洛茨基的领导。他转而反对托洛茨基,纯粹是由于对老近卫军的绝对忠诚和与季诺维也夫的友谊。不管他个人的倾向和情趣如何,他对老布尔什维克中的主导情绪却非常敏感,并受这种情绪的支配。当这种情绪表现为反对托洛茨基时,加米涅夫尽管很悲哀伤心,但仍站在它一边。他加入三驾马车,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的企图,他没有要成为列宁接班人的野心。但他还是支持和鼓励那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孪生兄弟,一部分原因是,他深信这样做不管怎样都是无害的,季诺维也夫不可能取代列宁的位置,三驾马车实际上将集体领导党;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他的温和性格。加米涅夫确实害怕

---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41 - 143 页;参见《武装的先知》第九章。

托洛茨基的居高临下、孤高傲慢的个性，害怕他的冒险主张和冒险策略。

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尽管他们的性格、动机各不相同，却是老近卫军的血与肉；他们三人似乎体现出党的生活和党的传统的各个方面。在季诺维也夫身上可以找到布尔什维主义的活力和普遍号召力；在加米涅夫身上则是它更为严肃的理论建设的抱负和成熟；在斯大林身上则可以找到它的自信心以及牢固的、经过战斗锻炼的秘密小组的实干意识。当他们携手将托洛茨基排挤出领导层时，他们表达的是多数老近卫军对托洛茨基的不信任和下意识的反感。但是他们无意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党，甚至也不想把他赶出领导核心。他们承认托洛茨基的功勋。他们只愿意让他在政治局里占据显要地位，但并不认为他有资格占据列宁的位置。然而让他们感到恐惧的是，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来反对他，那么他就确有可能接替列宁。

三驾马车彼此约定要步骤协调、行动一致。[1] 这样他们便自然而然地控制了政治局。当列宁不在时，政治局仅由 6 人组成，即三驾马车、托洛茨基、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即使托洛茨基把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争取过来，票数仍然持平。但既然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并没有形成一个派别，并且是按照各自意志投票，那么只要他们中有一个投票赞成三驾马车或弃权，就足以使三驾马车获得多数票了。三驾马车早就知道托姆斯基与托洛茨基不和。托姆斯基作为一个正直的工人、老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工会领袖，是最谦虚的政治局委员。他在一定限度内谨慎地坚决维护工人的要求

---

① 1923 年 4 月，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首次公开承认三驾马车的存在。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184 页和本书作者所著《斯大林政治传记》第 257－258 页。

和工资权益。1920年,他第一个反对托洛茨基提出的劳动军事化,而当托洛茨基威胁要“整刷”工会时,又是他第一个掀起风暴。托洛茨基严厉批评他是一个旧式工会主义者,说他只会根据革命前的老习惯鼓励工人队伍中“消费者型”的观点,而毫不理解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者型”的远大理想。有一段时间,托姆斯基实际上领导工会造了党的反。他被免去中央委员的职务,被派到土耳其斯坦,那不过是变相的流放。新经济政策颁布后,他又回到克里姆林宫,并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但是烙在他身上的伤痕是不可磨灭的。他的态度反映出他对劳动军事化的首创者托洛茨基的敌意,这是自1920年以来许多布尔什维克工会会员的共同点。

布哈林是唯一能与托洛茨基保持友谊的政治局委员。他还在30岁时就已经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了,而且是党内主要的理论家,他才能出众,学识渊博。列宁批评他的思想带有烦琐哲学和执著不化的教条主义的倾向。然而布哈林的这些思想甚至对列宁也产生过强烈的影响,因此列宁经常采纳他的思想,同时赋予这些思想更现实、更灵活的表达方式。[①] 布哈林的头脑确实是执著不化的,他更迷恋的是抽象命题的严谨逻辑,而不是毫无规则的混乱现实。然而,智力上的执著在他身上是与艺术的敏感及冲动、个性上的纤雅、有时几近小学生般的快乐与幽默感结合在一起的。他对严格推理的逻辑和对抽象与对称的追求导致他采取极端立场:多年来他曾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袖,但经过一个急剧转变过程,他又成了党内右翼的领袖了。

布哈林常常与托洛茨基发生冲突,也常常与托洛茨基意见一致。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时期,他领导主战派反对“可耻的和平”。在内战时期,他同情那些反对托洛茨基在红军中加强纪

① 关于布哈林同列宁在理论上的相互关系,可参见本书作者写的《列宁生平》一书。

律和集中组织的人。后来，在工会问题的辩论中，他又靠拢托洛茨基。他跟托洛茨基一样，甚至比托洛茨基更加热情地维护非俄罗斯民族的权益，坚决站在所谓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一边。但不管他是否与托洛茨基完全一致，他总是深情地敬慕托洛茨基，并且被托洛茨基的人格所打动。[①] 托洛茨基曾描写过这样一件事：1922年，当托洛茨基因染微恙卧床时，布哈林来看望他，告诉他关于列宁第一次中风的事。

> 那时候，布哈林是以纯布哈林的方式对待我，即半歇斯底里、半孩子气地依恋着我。布哈林对我讲完了列宁的病情，倒在我的床上隔着被子抱住我，拖着哭腔说：“您可不能生病，求求您，千万别生病。……只有两个人的死最叫我害怕……这就是伊里奇和您。”

还有一次，他双手抱住托洛茨基大声哭诉：“我们搞的是什么名堂啊！我们把党搞成了一堆臭大粪，简直把党毁了。”[②] 在政治局里只有这一个朋友，托洛茨基不可能有所作为：在他面对三驾马车的时候，布哈林的哭泣和叹气毫无用处。

除了这些正式的政治局委员之外，还有两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和国家名义首脑加里宁。两人都是“温和的”布尔什维克。两人都是农民出身，都保留着更多俄罗斯农民的习性和眼光。对俄国农村的情绪，对农民的希望和恐惧，甚至对他们的某些偏见，这两个人比任何其他领导人都敏感得

① “托洛茨基是十月起义中杰出的、英勇的领袖，是热烈的、不知疲倦的革命宣传家……，”布哈林在他有关1917年事件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07页。

多。他们两人代表着党内的本地人——"真正的俄罗斯人",而这意味着本能的反知识分子偏向、对欧洲因素的不信任、对其社会出身的骄傲和一定程度的视野狭隘,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们两人反对托洛茨基铺好了道路。谁都知道,农民最珍惜的是他们重新得到的私有财产和私人贸易的自由,而最害怕的莫过于退回到军事共产主义去。李可夫和加里宁就是党内这种害怕情绪的代言人。谁也没有像他们两人那样强烈地感到,在托洛茨基关于计划经济的设想中存在着这种倒退的危险。托洛茨基每次谈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缺乏指导思想,谈到自由放任主义会使苏维埃变质这种倾向时,他指的就是李可夫。而在李可夫这方面,他从托洛茨基提出的计划委员会新方案中看到的则是对他本人特权的侵犯,尤其是对新经济政策基本原则的侵犯。李可夫于是成了第一个指控托洛茨基敌视农民的人,这种指控在未来几年反托洛茨基运动中将反复响起。[①]

加里宁则相反,他对托洛茨基怀着深深的尊敬和友好的感情,即使在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高潮的顶点时,他仍然流露出这种感情。这也许同下述这一事实有关,即在1919年时正是托洛茨基大力支持加里宁作为国家首脑候选人,理由是加里宁对农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②] 但是当李可夫谈到托洛茨基对农民的敌视时,加里宁无疑受到了影响。他本来对托洛茨基的政策建议并无特别的看法,事实上也了解得不多,但是他的结论(并不怀有恶意)是:最安全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扼制托洛茨基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可能危及"工农联盟"。

①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6-7页;《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100-102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17卷第2册第542页。

此外还有两个人，即捷尔任斯基和莫洛托夫，尽管此时他们还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与政治局关系密切。捷尔任斯基是契卡和格别乌的首脑，同时也是这批领导人中唯一不属于老近卫军的一员。他原先属于由罗莎·卢森堡创建的波兰与立陶宛王国的社会民主党；只是在 1917 年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大约跟托洛茨基同时。他原先的党在罗莎·卢森堡的指导和鼓励下对布尔什维克党所采取的态度与托洛茨基并无不同：往往既批判孟什维克，也批判布尔什维克；这个党在社会党国际内是唯一赞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党。捷尔任斯基虽然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但仍然反对列宁关于非俄罗斯民族自决权的主张。他仍然追随卢森堡，主张社会主义应当克服而不是鼓励弱小民族的分裂倾向。不难理解，这种国际主义的逻辑推理使这位贵族出身的波兰人去支持斯大林的极端集权主义政策，使他作为新的"统一不可分的"俄国的发言人去面对格鲁吉亚人。

然而，捷尔任斯基的意见迄今并未受到党的重视。尽管他作为革命安全工作的领导其地位相当重要，但他毕竟不是一位政治领袖。当布尔什维克决定要建立非常委员会去与反革命作斗争时，首先要征召的是政治警察，因此他们需要找到一个人，这个人要有一双绝对干净的手去干这种"不干净的工作"。结果他们在捷尔任斯基身上找着了他们所需要的人。他廉洁奉公、坦荡无私。他又是一个具有诗人般浓烈感情的人，弱者和不幸者永远能激起他的同情心。[1] 同时，他对事业的无限忠诚使他成为一个狂热的信徒，只要他深信这是事业需要，就不惜采用任何恐怖手段。捷尔任斯基生活在持久的精神紧张状态中，一方面他富有崇高的理想

---

① 捷尔任斯基私人信件曾在《波兰战地》及其他波兰刊物上发表，从这些信件中可以洞察捷尔任斯基的性格。

主义,另一方面他的日常工作却是高度紧张的屠杀;他的生命力就像火焰一样燃烧,无怪乎他的同志们管他叫萨沃纳罗拉型[①]的不可思议的"革命圣者"。他的不幸在于其廉洁奉公的个性与他那坚定敏锐的头脑不协调。他需要为事业服务;但他却把事业等同于他所选择的党,又把党等同于党的领袖列宁,尔后等同于托洛茨基,而现在又把党等同于三驾马车,他在他们背后看到了老近卫军。他本人并非老近卫军的一员,但他比谁都更坚决地维护老近卫军的利益。这样,他就变成了比老布尔什维克还要布尔什维克的人,照列宁的说法,比俄罗斯人更甚的大俄罗斯主义者。

莫洛托夫则全然缺乏特色,与捷尔任斯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不到30岁时就已在领导集团中占据高位了:当斯大林成为总书记之前,他就已是中央委员会书记了。后来他在斯大林手下成了后者的主要助手。甚至在这个时期内,他的狭隘和迟钝就已在布尔什维克圈子里传为笑谈。他似乎缺乏任何政治才能和创造性。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他通常以第二流或第三流报告人的身份出场讲话,而他的发言总是那样枯燥乏味,令人厌烦。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家族的后裔,伟大的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的亲戚。但他却根本不像是一位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他并非完全没有一点闪光——这闪光曾在1917年闪耀过一阵——可现在已完全熄灭了。

莫洛托夫几乎是从革命者转变为官僚的十足典型;而他的地位上升就在于他转变得十分彻底。他一贯得益于他所具有的几点特别的长处:无限的耐心、冷静沉着、对上级卑躬屈膝,而在上级眼里,他那不知疲倦的机械般劳作恰好弥补了他的庸碌无能。他很早以来就像影子一般依附于斯大林,也是很早以来就对托洛茨基

① G.萨沃纳罗拉系15世纪意大利教士,因要求废黜罪恶荒淫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而被革出教门、处以死刑。——译注

怀有一种交织着恐惧的强烈反感。有一则轶事说，托洛茨基有一次来到书记处，对那儿的什么事情不满意，就指着莫洛托夫的鼻尖奚落书记处里那些愚蠢的官僚；莫洛托夫结结巴巴地叫道：托洛茨基同志，托洛茨基同志，并非每个人都是天才啊！[①]

※　※　※　※　※

因此，在接班人问题的斗争开始之前，托洛茨基在政治局里几乎已是孑然一身。1923年初的头几个星期——距列宁逝世还有整整一年，托洛茨基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现斯大林以过去少有的凶暴和恶毒对他进行攻击，他才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政治局里存在着一股串通起来反对他的力量。[②] 斯大林攻击他顽固拒绝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质问托洛茨基的动机，并影射说托洛茨基拒不接受职位的调动是因为他觊觎权力而不满足于担任列宁的副手。然后，斯大林把莫须有的罪名都堆在托洛茨基头上，什么悲观主义、信念不坚定乃至"失败主义"等等。为了证实托洛茨基的"失败主义"，斯大林在托洛茨基一次私下里对列宁说过的一句话上大做文章，即托洛茨基说的"杜鹃鸟不久就会为苏维埃共和国唱丧歌了"这句话。[③]

斯大林心里有各种各样的盘算。他一直认为列宁有恢复工作的可能性，因此他抓住列宁所建议的任命问题，指望在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敲进一根楔子。他深知，要置托洛茨基于绝地，莫过于暗示托洛茨基觊觎列宁的位置。这种算计很精明，触到了托洛茨基

① 巴扎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一起》第139页。

② 托洛茨基档案。

③ 在斯拉夫民间文学中，杜鹃鸟是预兆之鸟。

的痛处。他比斯大林有更充分的理由盼望列宁恢复工作,以使他们两人的"联盟"活动起来。即使抛开这点不说,托洛茨基对于自己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自己比对手更占优势这点也有着充分的自信,因此,他无意为接班问题而斗争。他甚至不试图寻找伙伴和合作者;他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为谋求地位而耍手腕。然而斯大林的攻击和影射却使托洛茨基左右为难:驳斥吧,对他来说荒唐可笑;不理睬吧,又有危险。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垮托洛茨基,就是要从托洛茨基口里挤出否认或辩解的话来,这正所谓"为自己辩护等于承认错误"。一个处于与托洛茨基相同处境的人,一旦受到觊觎权力的指控,那么无论他怎样否认和辩解,都无法驱散已经引起的猜疑,除非他立即辞掉一切职务,跑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甚至停止发表一切意见。托洛茨基当然不会这样做。他反复说明,他看不出他作为这样一个职能重叠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能有什么用:政府中分工不合理,因为"每一个人民委员要干太多的工作,而每一件工作又有太多的人民委员去干"。他又补充说,如果作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将没有工作机构,也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认为,任命我担任这项工作,将从政治上把我抹掉。"他否认了关于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等罪名。诚然,他说过"杜鹃鸟将会为苏维埃共和国唱丧歌"。但当时他只不过是想让列宁对经济浪费和官僚作风带来的毁灭性后果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目的——这还用说吗——在于医治那些弊端,而不是散布恐慌。[1] 政治局陷入这类捕风捉影的争吵之中,而且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托洛茨基控制着自己,没有反击,他等待着列宁回来。

他的等待是有理由的。有关列宁健康的医疗报告是令人鼓舞的。列宁甚至在病床上也给了斯大林一次又一次打击。对列宁那

---

① 参见托洛茨基档案中 1923 年 1 月的文件。

样坚定不移、毫不留情地反对斯大林的态度,连托洛茨基也深感诧异。托洛茨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把主动权留给列宁是唯一合适的做法。2月初,列宁首先严厉批评了工农检查院,并将此事通知政治局。尽管斯大林早已退出工农检查院,但列宁的抨击对斯大林个人影响很大。因为列宁认为该院在斯大林任职期间彻底失败了,而且让人对此没有怀疑的余地。他谈到该院的缺点时所使用的措辞几乎同托洛茨基曾经使用过的一模一样,如"没有文化"、"糟糕透顶","官僚主义恶劣作风","反复无常"等等;而且他还插进同样要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等尖刻的话。列宁最后决定,要对工农检查院本身进行一次大检查,缩减人员编制,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来执行工农检查院的多数职能。好几个星期以来,托洛茨基要求公布列宁的批评,但政治局拒绝了。[①]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提出了对中央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进行大改组的计划。为了提出这个计划,他对党的状况进行过详细考察。他强调指出,中央委员会已失去了同下层群众的联系而成了傲慢的官僚机构。这就是第二年秋天爆发为公开争论的问题。但在1月和2月间,托洛茨基在政治局里提出这个问题时,比他后来在公开论争中还要坦率得多。在某些具体细节上,比如中央委员会的规模、它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关系等,托洛茨基的方案与列宁的方案有所不同。三驾马车则尽力夸大这些不同,说什么托洛茨基不仅蔑视列宁、拒不担任副主席,而且还力图使党偏离列宁的组织思想路线。在这个阶段,领导集团内的高层成员也被引入了政治局中的争论,而在他们的眼里,若要毁掉托洛茨基作为假定的列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3页及以后各页;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1923年2月23日,托洛茨基档案。(另见《苏共历史问题》1957年第4期中福季耶娃的回忆。)

宁接班人的地位,莫过于搞一场流言攻势,说他不论在什么问题上都是反对列宁的。三驾马车的言论都是为了挑起这样一场战斗。他们的指控都被写入政治局会议的记录,然后借口要进行审查而向全体中央委员公开,而中央委员们则很快就将这些秘密泄露给他们的朋友和下级。

当托洛茨基首次对流言蜚语作出反应时,运动早已进行一段时间了。1923年2月23日,托洛茨基在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有些委员……提出一种看法,说列宁同志的方案旨在维护党的团结,而我的方案则是制造分裂。"他指出,这种含沙射影的说法是由一个小集团酝酿炮制出来的,而这个小集团实际上向全体党员隐瞒了列宁的信件。他揭露了在政治局中所发生的事:"当政治局多数人……甚至连列宁的信件都不同意发表时,我……不但坚持要发表,而且捍卫了信件的基本思想,更确切地说,捍卫那些我所认为是基本的思想。"他最后说:"如有必要,我保留在全党面前揭露事实真相的权利,驳斥这种含沙射影的攻击。(要弄这种伎俩的人)如此肆无忌惮,只因为我一直没有对此作出反应。"[①] 揭发的时机将在4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的一个特点是只会采用威胁态度。他认为,根据党内忠诚这个不成文法,若他要发动一场运动来反对他的对手的话,就不能不预先通知他们。但这样他就失去了出奇制胜的有利条件,反而给了他的对手们避开打击的时间。这与斯大林的策略正好相反。托洛茨基甚至连威胁也不想付诸实施。他的目的仅仅是抑制一下斯大林、争得时间、等待列宁恢复健康。他争取到的直接的后果是:3月4日的《真理报》终于刊登了列宁抨击工农检查院的文章。

3月5日,当托洛茨基也因病卧床时,他接到列宁一封极其重

---

① 托洛茨基档案。

要、紧急的短信。[1] 列宁请求他在即将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上旗帜鲜明地为所谓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辩护。自从12月间他们谈到"联盟"以来，这是托洛茨基第一次与列宁联系，也是他第一次得知列宁在格鲁吉亚事件上改变了立场。列宁写道："这一事件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审理'，但是我不能指望他们秉公处理，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为这一事件进行辩护，那我就放心了。"列宁还附了一份对斯大林民族政策的评论的副本（这在前面一章中已概括地说过了）。这些评论使托洛茨基第一次充分了解了列宁主张进攻的坚决态度——相比之下，列宁对工农检查院的批评就似乎是温和的了。列宁的秘书补充道，用列宁自己的话说，他已准备好在党代表大会上向斯大林投一颗"炸弹"。此外，在脑力和意志因紧张而衰竭的最后时刻，列宁敦促托洛茨基不可有任何软弱和动摇的表现，不要相信斯大林可能作出的"不可靠的妥协"，最后一点，但并不是最次要的一点，就是要不发出警告就向斯大林及其同伙进攻。第二天，他本人又给所谓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送去一封短信，表示热烈的同情并答应要为他们讲话。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从加米涅夫处得知，列宁已经写信给斯大林，威胁要与他"断绝一切私人关系"。[2] 斯大林曾以极其粗暴的态度对待克鲁普斯卡娅，只是因为她为列宁收集了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当列宁知道此事后，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据克鲁普斯卡娅告诉加米涅夫说，列宁已经决定"要从政治上搞垮斯大林"。

这真是托洛茨基在道义上获得满足和胜利的时刻！如同先前

---

① 《我的生平》第2卷第220－221页；《斯大林伪造学派》第69－70页。

② 这封信由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宣读过，并收在由美国与英国公布的赫鲁晓夫演说辞中，但没有刊在《列宁全集》第36卷中，也没有刊在1956年的《共产党人》第9期中。福季耶娃仅仅暗示此信的存在。

许多场合中所表明的一样,列宁最终还是承认了托洛茨基是正确的。也如同以前常有的情形一样,托洛茨基的大胆远见曾注定他在政治上的暂时孤立,导致他与列宁之间的意见分歧;然而事变进程恰恰证明了他的正确,使列宁最后得出跟他同样的结论:先是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尔后是关于工农检查院和"党的官僚主义"问题,而现在事实本身又证明他在格鲁吉亚问题上也是正确的。托洛茨基坚信,三驾马车必将垮台,斯大林必将失败。他是胜利者,可以提出自己的条件了。他的敌手们也是这样想的。3月6日,加米涅夫代表三驾马车前来看望托洛茨基,他显得垂头丧气,准备接受惩罚,并急于安抚托洛茨基。①

但并不需要什么安抚。托洛茨基的报复就是以德报怨。他忘了列宁的告诫,竟欣然接受了"最不可靠的妥协"。列宁原先打算把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撤职,并因奥尔忠尼启则(曾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在梯弗里斯的暴行而打算把他驱逐出党"至少两年"。托洛茨基立即向加米涅夫作了保证,他本人不会建议采取如此严厉的报复举动。他说:"我反对清除斯大林,反对开除奥尔忠尼启则,反对解除捷尔任斯基的职务……但我实质上同意列宁的意见。"②他所要求于斯大林的一切仅仅是他应该改正自己的行为方式:让他忠诚地对待同事;让他向克鲁普斯卡娅道歉;让他停止侮辱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刚刚准备好有关非俄罗斯民族政策问题的"文章",将向代表大会提出——他将以中央委员会报告人身份就该议题向代表大会作报告。斯大林急于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就把重点放在对"地方民族主义"的谴责上。托洛茨基建议,斯大林应该重新修改决议案,需要插入一段文字,谴责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统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23-224页。

② 同上。

一而不可分的"俄罗斯集权主义,并向格鲁吉亚人和乌克兰人坚决保证,今后一定尊重他们的民族权利。这就是托洛茨基要求于斯大林的一切——既没有严厉谴责,也无需亲自道歉。基于这些条件,托洛茨基准备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

面对这些条件,斯大林当然准备屈服,或至少伪装屈服。他发现自己正面临着政治毁灭的威胁,感到列宁的雷霆之怒将倾泻在他头上。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眼看着托洛茨基向他伸出宽恕的手,这简直是幸运的奇迹,对此他唯有感激涕零。他立刻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条件,重新修改了他的"文章",将托洛茨基为他所作的一切修正统统加了进去。至于其他一些"情况",比如说,他对托洛茨基的冒犯和伤害,据他自己的解释都是出于误会,而他十分渴望加以澄清。

就在加米涅夫一直充当中间人的这段时间,列宁又一次中风了。他又活了10个月,但已经全身瘫痪,大部分时间不能说话,周期性地昏迷不醒;而使他最痛苦的则是:在昏迷的间隔中苏醒时,他清醒地意识到幕后正在进行阴谋勾当,但他却对此无能为力。列宁再次中风的消息让三驾马车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谦卑地屈服于托洛茨基才仅仅几天,便再一次行动起来,以加倍的努力而又格外小心地要把他从接班问题上连根排除出去。而他还一直以为自己占了上风。他并没有放弃列宁可能复原的希望。不管怎样,他手中握有列宁的亲笔信。倘若他将这些信件,特别是关于格鲁吉亚事件的笔记拿到党的代表大会上,那么列宁究竟站在谁一边,党是绝不会有丝毫怀疑的。他坚信,三驾马车无疑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害怕揭露而必然会坚守承诺。

托洛茨基曾答应过列宁要他出面处理所谓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事件并将列宁的意见通报党的代表大会的要求,这些情况三驾马车是了解的(加米涅夫读过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笔记)。此

刻斯大林的当务之急是劝托洛茨基不要实践这个诺言。难道斯大林没有做到托洛茨基所要求他做的一切吗?不错,他都做到了;因此,托洛茨基同意把列宁的信件只提交到政治局,并让政治局决定是否或者用哪种方式把信件传达给代表大会。政治局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公布列宁的信件,只有经过挑选的代表才可以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了解信件的内容。这可不是列宁所期望于托洛茨基的,列宁敦促他要坚定不移地、毫无保留地向党代表大会通报且不得掩盖任何分歧。但是这些敦促、告诫在托洛茨基身上全都落了空,他反而宽宏大量地帮助三驾马车向世界隐瞒了列宁的临终忏悔——列宁为沙皇专制精神在布尔什维克国家里复活而感到羞愧和内疚。于是,在长达33年的时间里,党对列宁关于非俄罗斯民族政策的信件一无所知。[1]

事后看来,托洛茨基的行为真是愚蠢得不可想象。此刻正是他的政敌们占据要津的关键时刻;而他的每一步都似乎是在为他们铺平道路。若干年以后,托洛茨基感慨地说道,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如果他借助列宁的权威把话说出来,他很有可能在当时击败斯大林,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可能仍是斯大林赢得胜利。[2] 事实在于,托洛茨基太过于自信而高枕无忧了,所以克制着没有去进攻斯大林。当时没有一个人——更不用说托洛茨基了——能在1923年的斯大林身上看出他日后竟会成为一个可怕的大人物。在托洛茨基看来这是天大的笑话:斯大林,这个躲在幕后的猥琐狡猾而又卑劣笨拙的家伙会成为他的对手。托洛茨基并未将斯大林放在眼里,也不想向斯大林乃至季诺维也夫卑躬屈膝。而最主要的是,他不想给党留下一个印象,即他也参与了列宁的信徒们围着

① 列宁的信件于1956年6月首次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19页。

列宁尚未入殓的空棺材玩的那种不光彩的争权把戏。托洛茨基的行为就像一个刚扮演完高雅戏剧的角色又突然卷入滑稽剧演员的行为一样笨拙可笑。

至于滑稽剧,那倒是不少。当政治局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夕召开会议时,斯大林提议让托洛茨基代表中央委员会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而这个角色历来是为列宁保留的。托洛茨基拒绝了,说斯大林作为党的总书记理应是政治报告人。斯大林十分谦卑地说:"不,党不会理解的,……这个报告必须由中央委员会中最有声望的委员来作。"[①] 这位"最有声望的委员"仅在几星期之前还被指控为觊觎权力,此刻为了证明斯大林的攻击毫无根据而不肯出头。就这样,他让三驾马车轻而易举地把自己征服了。最后政治局决定,这个过去照例由列宁向全党作的政治报告由季诺维也夫来作。

4月中旬,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在开幕式上就出现了自发地向托洛茨基致敬的场面。如同往常一样,大会主席宣读了从全国各地涌来的党组织、工会、工人和学生团体致的贺词。几乎所有的贺词都是给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只是偶尔有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贺词,而斯大林的名字几乎没有提到。贺词的宣读贯穿在好几次会议中,如果此时向全党提出选谁做列宁接班人的问题,那么还会有什么疑问呢?[②]

三驾马车感到震惊和恼怒,但他们没感到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列宁并没有到大会来投出他的"炸弹",而托洛茨基也答应过不去引爆它,他恪守着他的诺言。他甚至丝毫没有向党代表大会透露他与三驾马车有任何分歧,他安然地呆在不惹人注目的地方。而与此同时,三驾马车却在幕后加紧活动。他们的代理人在代表中间散布领

---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66页。

②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89、496、502－503页。

导危机的舆论,甚至连大会刚刚向托洛茨基表示敬意一事也被他们利用来反对他。他们竭尽全力使各省代表感到有一种危机,而他们断言危机就在于托洛茨基那非凡的威望:难道法国革命的“掘墓人”波拿巴不正是在一片欢呼声中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吗?谁能相信这个专横跋扈的、野心勃勃的托洛茨基不会滥用他的威望呢?当列宁不在时,由党所了解和信任的稍逊一筹的人物组成的“集体领导”难道不比他的卓越才能更可取吗?所有这样的问题都是在令人不安的窃窃私语声中提出来的,足以引起代表的警觉。布尔什维克一向习惯于回顾伟大的法国革命先例,并以历史类比来思考问题。他们不时地在自己的领导人中寻找那个无法预言的人物,即可能会给革命带来意外危险的丹东或“准波拿巴”。在所有的领导人中,看来没有人比托洛茨基更与丹东相似的了,也没有人比托洛茨基更适合这副波拿巴面具的了。在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的眼里,托洛茨基的卓越才能是一种不利的条件;权衡之下,似乎最保险的莫过于由一群不那么杰出但更为可靠的同志来领导党。[1]

---

① 对于我在《斯大林政治传记》一书中谈到的这个流言蜚语运动(第257页),一位评论家是这样写的:“他(托洛茨基)被某些共产党人视为潜在的波拿巴,这是最近以来像多伊彻先生那样的作家的一大发现。……这种说法在当时并未被认可。”(G.L.阿诺德:《二十世纪》1951年7月版)并非每一个作家都能为这个“流言蜚语运动”找出确切的出处;我在《斯大林政治传记》中谈到这个特殊运动时,是根据我在莫斯科所听到的情况,写书的当时我对此事还记忆犹新。另外,阿尔弗雷德·罗斯默已经发表了他的回忆录。1923年时,他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正在莫斯科,对托洛茨基本人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写道:“但现在(即1923年),人们到处可以听到的一种谣言,证实了存在着一个已经准备就绪的大阴谋……‘托洛茨基是波拿巴’,‘托洛茨基想当波拿巴’。这谣言散布到全国各个角落。来到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前来把这个谣言告诉我;他们意识到正在酝酿着某种反托洛茨基的事情,并催促我说:‘你应当去提醒他’”。罗斯默:《列宁统治下的莫斯科》第283页。有关这个“流言蜚语”的资料还可以在现代文献中找到。伊斯特曼:《列宁逝世以后》一书中有整整一章是叙述这个特殊运动的,题为《反波拿巴派》。

三驾马车的行动十分小心谨慎，他们声称，他们要求党给予信任的唯一权利是因为他们三人是列宁的忠诚的、久经考验的学生。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带头颂扬列宁的丰功伟绩，而这种举动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个人崇拜。[①] 这种颂扬无疑有一定的诚意；因为这是第一次列宁没有出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而党已感到要失去列宁了。三驾马车正是要利用人们的这种心情，因为他们知道，对列宁的颂扬也会使全党公认的他的最早的学生得到荣光。但他们还得努力使代表大会相信，他们是以列宁的声音说话的。代表们深感不安。当季诺维也夫以报告人身份出现时，他们用忧郁和沉默来迎接他。季诺维也夫那夸张的，甚至可笑的颂辞只能引起那些明智的人和富有批判精神的人的厌恶，可惜这些人只占少数，而且他们也没有提出抗议，唯恐会被别人误解。

三驾马车乘胜追击，呼吁加强纪律和团结一致。当党失去领袖的时候，它一定要使自己的队伍团结得更加紧密。季诺维也夫宣称："对党的路线的任何批评，即使是所谓'左'的批评，目前在客观上都是孟什维克式的批评。"[②] 他向柯伦泰、施略普尼柯夫及其追随者发出这个警告，并且慷慨激昂地对他们说，他们甚至比孟什维克还要危险。他的话表面上看似乎只是针对工人反对派的，而实际上却包含着更广泛的暗示：它们指的是他所能遇到任何一种谴责性批评。这种将每一种批评预先视为孟什维克异端的准则倒是一种新货色——类似的东西以前还从来没有提出过。然而，这种准则却可以从季诺维也夫在上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论点中推导出来，当时他说，由于政治垄断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发现党内已

① 参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② 同上，第46－47页。

经存在两个以上潜在的党,而其中一个是由“不自觉的孟什维克”组成的。只关心夺权的直接条件、踌躇满志的季诺维也夫此刻走得更远,又把领导集团中的每一个反对者说成是那些不自觉的、没有发言权的孟什维克的实际代言人。这就是说,每个领导人——不管他们是谁——都有权甚至有责任去镇压党内的反对派,如同他们过去镇压真正的孟什维克一样。这样,季诺维也夫就炮制出了布尔什维克自我镇压的法规。

这种对纪律的号召和关于团结的新观点在大会通过时并不是没有遇到挑战。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和其他持异议者登上讲台谴责三驾马车,要求解散它。卢托维诺夫这位出色的党的工作者抗议这种“教皇式的一贯正确性”,并反对季诺维也夫代表政治局所要求的批评豁免权。[1] 另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柯秀尔指出,党正被一个小集团统治着,总书记处迫害批评者,斯大林在其任职的第一年中就对乌拉尔和彼得格勒这样重要的组织的领导人降职的降职,杀害的杀害;他还指出,集体领导的说法是一个骗局。在一片喧闹声中,柯秀尔提请代表大会撤销1921年关于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禁令。[2]

然而,三驾马车支配着整个党代表大会:加米涅夫是会议主持者,季诺维也夫阐明政策,斯大林操纵着党的机关。他们不再掩饰三个人的伙伴关系;在回答工人反对派提出的挑战时,竟挑战式地承认三人执政的存在。[3] 但是在三驾马车内部出现了位置的变动:季诺维也夫正在失去车老大的地位。他自己弄巧成拙,与许多

---

①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105-106页。

② 同上,第92-95页。另一位发言者谈到在代表大会期间流传着一份匿名传单,它要求把三驾马车从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去。他猜想这份传单是工人反对派散发的。同上,第136页。

③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84页。

代表对着干，把来自下面的大多数攻击招惹到自己身上。斯大林则以较为谨慎的举动为自己赢得了信任。当颇有影响的、温和的老中央委员诺根开始歌功颂德——颂扬总书记做出的虽不引人注目但却是关键性的指导工作时，代表们把钦佩的目光转向了斯大林。诺根说："中央委员会从本质上来说是个最基本的政治机构，它开展全国所有的政治活动，而书记处则是这个机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①] 有些不满者讨厌趾高气扬、造谣生事的季诺维也夫，反而觉得斯大林更平易近人。

斯大林的地位在关于对非俄罗斯民族政策辩论中得到了加强，这场辩论本来是会使他声誉扫地的。格鲁吉亚人来到莫斯科，原指望得到列宁允诺给他们的强大支持。[②] 但是他们一无所获。拉柯夫斯基负责处理这件事，他是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但在莫斯科却没有足够的影响。莫非莫斯科要像沙皇时代的宪兵那样使弱小民族俄罗斯化吗？他问道。[③] 但是，当格鲁吉亚人听到斯大林本人义愤填膺地抨击对非俄罗斯民族的欺凌时和发现他们自己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谴责被写进斯大林的"纲领"时，感到大惑不解。由于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妥协的结果，这个尴尬局面成了对他们所有的抱怨和抗议的嘲弄。他们要求至少要当众宣读列宁的几个短笺，但是徒劳，政治局委员们保持着奇怪的沉默。他们中唯有布哈林挺身而出，打破严守秘密的约定，作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捍卫了弱小民族的利益，揭露了斯大林的假仁假义——这是布哈林作为左派共产主义领袖的天鹅绝唱。他指出，斯大林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否定是彻头彻尾虚伪的，这一点可由这次集中了

①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63页。
② 同上，第150－151页。
③ 同上，第528－534页。

全党精华的代表大会的气氛得到证实:从讲台上发出的反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每一句话都激起暴风雨般的掌声,而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哪怕是最微弱的暗示也会遭到嘲讽,受到冰霜般的冷遇。[①] 代表们正是用这种冰霜般的沉默对待布哈林的演说。斯大林被代表大会的气氛壮了胆,现在他可以肆意掩盖列宁对其政策的攻击所具有的意义及其重要性了,可以挖掉"异端分子"了。

托洛茨基对会议进程抱着冷淡的态度,有时故意缺席。他严守同三驾马车的君子协定和政治局的"内部团结"这一原则。但这一原则却没有阻止季诺维也夫连讽带刺地说他"迷恋计划经济"。[②] 托洛茨基对此不予理睬。当工人反对派的演说家们要求解散三驾马车并抨击总书记时,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没有给伤心的格鲁吉亚人以任何鼓励,正当民族问题辩论开始时,他离开了会场,藉口说他忙于准备将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③]

最后,4 月 20 日,当托洛茨基在党代表大会讲话时,他故意避开这个吵到白热化的问题,而把他的讲话严格限制在经济政策的问题中。[④] 经济政策无疑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他认为这是解决所有其他问题的关键,而他终于有机会面向全国听众全面地阐述他的观点,这观点迄今为止还只是在少数领导者的小圈子里泛泛地提出过。作为他与三驾马车君子协定的一部分,他有权将他的观点作为正式政策的声明提出,尽管政治局赞同他的意见的程

---

①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 561 – 565 页。

② 同上,第 45 – 46 页。

③ 同上,第 577 页。但仅在一个月之后,托洛茨基就在《真理报》上再一次不指名地攻击斯大林在格鲁吉亚的政策。他写道,如果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在高加索一意孤行,那么苏维埃侵犯高加索将被证明是犯下了"滔天罪行"。《托洛茨基全集》第 21 卷第 317 – 326 页。

④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 282 – 322 页。

度不超过他赞同斯大林的非俄罗斯民族政策的程度。他非常重视能把他的经济政策作为党的正式“路线”提出来；在他的眼里，这也许部分地证明了他向三驾马车作出让步是对的。实际上，在讨论他的报告时，没有一位政治局委员表示公开反对。

他向全党发出呼吁，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要解决伟大而艰巨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任务。他回顾了新经济政策实施以来两年的经验，并且重新阐发了它的原则。他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就是开发俄国的经济资源并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去。工业生产的增长仍然很慢，远远落后于私人农业经济的恢复。因此，这两大经济成分之间的差别变得突出起来，并且反映在工业产品价格高与农产品价格低而形成的“剪刀差”上（托洛茨基创造的这个比喻术语不久之后就被全世界经济学家所沿用）。[①] 由于农民买不起工业品，又没有真正的物质利益刺激他们出卖产品，因而“剪刀差”又一次造成切断城乡经济纽带与破坏工农政治联盟的威胁。缩小“剪刀差”，只应是降低工业产品价格而不是提高农产品价格。这样，工业就必须合理化、现代化、集中化，而这就要求实行计划经济方针。

计划经济是他的主要命题。他并没有像他的反对者们后来宣称的那样鼓吹为了计划经济而放弃新经济政策。他力促全党在新经济政策的限度内从“后退”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进攻。他说：“新经济政策是我们自己在同私人资本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阵地。我们建立了这个阵地，使之合法化；我们就要在这个阵地上进行严肃长期的斗争。”[②] 列宁曾经说过，新经济政策应当“认真地、长期地”予以实行；而计划经济的反对者最爱引用这段话。托洛茨基反驳

①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 292－293 页。

② 同上，第 285 页。

说:"不错,认真地、长期地,但并不是永远地。我们推行新经济政策,目的在于从它自己的阵地上,而且主要用它自己的办法来击败它。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有效地运用市场经济法则……并通过国有工业在这些法则起作用时进行干预和系统地扩大计划经济的范围。我们最终就能将计划经济扩大到整个市场,从而融化并取消市场。"[①]

布尔什维克对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仍然极其模糊。多数布尔什维克都认为新经济政策与计划经济几乎是无法相容的。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看做是对私有制的让步,而这是他们迫于自身的薄弱不得已而为之。他们认为,这种让步还需要持续多年,因此有必要强调新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加强农民和商人对这种稳定性的信心。只有在相对遥远的将来党才能取消对私有财产已经作出的让步,也只有在那时才可能确立计划经济。这种认识在以后10年之内将始终是斯大林政策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斯大林先是以新经济政策名义抵制计划经济,然后再以计划经济名义下令"废除"新经济政策,"消灭"私人贸易,摧毁个体农业。

根据托洛茨基的概念,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私有制。它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两种经济成分之间长期合作、竞赛、斗争的一个框架。合作和斗争在他看来是辩证的,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对立面。因此他号召全党要保护和扩展社会主义成分,哪怕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向私有制妥协和帮助它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会在一天之内突然取代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当在这种混合经济的范围里发展壮大,直到社会主义成分通过它不断增长的优越性而逐渐吸收、改造或消灭私有成分,乃至冲破新经济政策的框架。因此,在托洛茨基

①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331页。

的日程表上没有给任何突然"废除"新经济政策、下令禁止私人贸易以及用暴力摧毁个体农业留有余地，恰如没有给任何用行政命令宣布"过渡到社会主义"留有余地一样。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之间的这种立场差别只是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才鲜明地表现出来。但是，眼下因为托洛茨基坚持进攻性社会主义政策的必要性，许多人就觉得他似乎是从根本上反对新经济政策的。

在此没有必要详细探讨托洛茨基的经济论点或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问题——有关他的这些思想在前面一章里已经扼要论述过了。只需要提到下面几点也就足够了：托洛茨基所作的报告和所提交的"提纲"是苏联经济史上最关键的文件；他在其中描绘了今后几十年的苏联经济远景，在这几十年里，苏联的演化取决于在一个不发达的，但却是大规模国有化的经济中强制形成资本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确可以把那几十年——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几十年——当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来加以分析或描述；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可以借用托洛茨基在1923年所阐述的观点中的那些术语。①

但是，不管托洛茨基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出了多么巨大的历史功绩，也不管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多么巨大的意义，这都无助于改善他在所面临的那一场斗争中的地位。整个说来，他的中心思想已经超越了他的听众的理解力。他像往常一样给代表大会留下了印象，但这次留下的印象与其说是由于讲话的内容，倒不如说是由于它的热情奔放。他的讲话中的一些言外之意使广大代表不禁竖起耳朵，甚至产生了疑心。有些人甚至在琢磨，他原来是要号召全党放弃新经济政策，回到令人谈虎色变的军事共产

① 在以后的几年中，托洛茨基本人即便不是绝口不提，也很少再谈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主义。当他要求必须把工业生产集中在少数规模大、效率高的康采恩的手里时,问题便发生了:那些效率不高的工厂关闭后,失业工人怎么办呢?当他申辩说工人阶级队伍必须挑起重建工业这副重担时,他根本就没想到怎样把他的话说得更委婉些。相反,他对他的思想强调到这般地步,以至令许多工人感到惊骇。他说:"可能会有这样的时刻:国家不付给你们工资,或者只付给一半工资,而你们,工人们,得(将另一半)借给国家。"[①] 斯大林后来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即"拿走工人的一半工资",加速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但是那时他却告诉工人说,国家付给他们的工资是他们以前所得的2倍或3倍。然而,当托洛茨基以他特有的坦率和无情的真诚在代表大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使工人们惊骇的却只是他的冷酷无情而不是他的真诚。他们不由得反问,难道他又要像他当时组织劳动军时所告诉我们的那样要我们必须持一种生产者的观点,而不是消费者的观点吗?三驾马车的代理人要证实工人这方面的猜疑,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另一些人问,托洛茨基的政策对农民会有什么影响呢?会驱使党跟农民发生冲突吗?李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两人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早就给了肯定的回答。在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一件重要插曲更使这个问题加重了分量。托洛茨基的一位老同志克拉辛直接向他提问,他是否充分思考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含义?克拉辛指出:早期资本主义不仅仅只是克扣工人工资或依赖于企业主"节约"来加速原始积累,它还剥削殖民地,掠夺整个大陆,毁灭英格兰的自耕农,摧毁了印度农家的织布工,而正是在"印度平原白茫茫"一片尸骨之上,现代纺织工业才得以兴起。难道托洛茨基

①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315页。

要将这种相似推向其必然的结果吗?[1]

克拉辛提出这个问题并没怀有任何敌意。他是从特定的角度出发提出这个问题的:他作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试图说服中央委员会:需要更多的对外贸易——需要对国外资本作出更大让步。他希望代表大会特别考虑到,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绝不能去剥削农民、掠夺殖民地——谁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必须设法吸引外资,外资可以帮助俄国进行原始积累并避免在西方伴随积累而来的恐怖。但是布尔什维克现在却发觉,以可接受的条件吸引国外贷款的机会微乎其微;因此克拉辛提出的问题非常有力:为加速积累所需的资金将从哪儿来?当克拉辛谈到对农民的掠夺和印度农村织布工人的"一片白茫茫尸骨"时,托洛茨基跳起来抗议说,他的"建议根本不是这个意思"。[2] 这当然不错。但不管怎样,他的立场的逻辑发展不就是将导致"对农民的掠夺"吗?托洛茨基跳起来否认这一点,说明他已感觉到有一片疑云正在他的头顶上聚拢来,虽然还不到巴掌那么大。

这样说,不仅可能把自己与工人对立起来,也可能在党内引起害怕与农民发生冲突的恐惧,而且托洛茨基还招致了工业界经理和行政官员的敌意。但是,他深信他所说的话是极其重要的,并认为他的责任就是把它说出来,所以他就不能不说出这些最不受欢迎的事。另外,他以这样暗淡的色调描述了工业情况,这样无情地揭露了新经济官僚主义者的骄横自满、独断专行、颟顸无能,以至官僚主义者为他的鞭挞所激怒并力图发泄怨恨。工业界经理们回答说,托洛茨基以如此暗淡的色调描述工业情况,对他们的工作如

①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351-352页。
② 同上。

此不满,只因为他以计划经济的乌托邦而沾沾自喜。[1]

于是,最终导致托洛茨基失败的各种条件就慢慢地,但不可抗拒地展开并结合起来了。他错过了挫败三驾马车并使斯大林名声扫地的机会。他令其盟友们失望。他辜负了列宁对他的期望,未能坚定地成为列宁的代言人。他没有在全党面前支持他曾在政治局里支持过的格鲁吉亚人和乌克兰人。当党内民主的呼声从底层发出时,他却保持沉默。他所阐释的经济思想和历史的警告吓跑了他的听众,却使他的政敌们易如反掌地加以歪曲,以致立刻在工人、农民和官僚层之中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托洛茨基并不是他们所能寄予希望的人;各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一想到他可能成为列宁的接班人就感到不安。与此同时,三驾马车则百般殷勤地讨好每一个人,允诺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都能得到好处,迎合形形色色的骄傲自满、吹牛拍马的人。

而当托洛茨基声明"毫不动摇地"与政治局及中央委员会保持团结一致并号召党员群众在此"紧急关头"要保持严格的自我约束和最大的警惕性时,他终于亲手直接加强了三驾马车的地位。当谈到列宁不在时有关呼吁团结和纪律的运动时他宣称说:"在我们当中,我绝不是最后一个去捍卫并促进(这个运动)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无情地反对所有企图破坏运动的人。"[2] 他继续说:"如果说,党在目前特定情况下就某些可能危及党的问题而断然警告你们,即使这警告是夸张的,那么这是因为这些问题在其他的情况下也许没有危险,而在当前情况下则会两倍或三倍地危险。"三驾马车当然会发觉,这种人心惶惶、猜疑重重的时刻对于他们来说真是表现自己并镇压反对派的天赐良机。托洛茨基和他们同样感到不

①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第 322 - 354 页及各处。

② 同上,第 320 页。

安，担心列宁死后党将遭到的冲击；但是他迫切要加强党的地位，却削弱了他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无疑，他信赖三驾马车的忠诚。尽管他瞧不起三驾马车，但始终以同志般的情谊对待他们，也期望他们能投桃报李。托洛茨基没有料到，他们竟然利用他的无私胸怀去捞取可马上兑现的个人好处。

※ ※ ※ ※ ※

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选举出来的扩大的中央委员会重新任命斯大林为总书记。托洛茨基无意阻止这件事——总之，他没有提出任何别的候选人，但他知道列宁会怎样做。若列宁不在，无论如何他是没有机会罢免斯大林的。三驾马车像以前一样指挥着政治局，并通过政治局指挥着中央委员会。他们同时还支配着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被选举出来作为党的最高法庭。被指定主持该委员会的人是斯大林的亲密伙伴古比雪夫。

三驾马车还没有理由向托洛茨基摊牌。因为他并没有向他们挑衅；同时三驾马车也拿不准若使冲突公开化党内会有什么反应。不过斯大林却是分秒必争地操纵局势，他利用手中广泛的任命权，把可能追随托洛茨基的人从中央到各省的重要位置上清除掉，并用三驾马车的追随者或他自己的亲信来填补空缺。他精心为每一例提升或降级寻找说得过去的功过理由；而列宁规定的原则这时大大帮了斯大林的忙，即任命时须考虑党员为党工作的年限。这项原则自然有利于老近卫军，特别是它的核心集团。

就在 1923 年这一年当中，斯大林充分利用他这一庇护体系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党的主宰。那些由他任命为地区或地方书记的官僚们很清楚，他们在官场中的地位及其这一地位的巩固并不依赖于当地组织的成员，而是依赖于总记处。他们自然会愈加俯首

贴耳地听命于总书记的驱使,而对当地组织的意见却置之不理。这个由书记们组成的群体逐渐以它自己"取代"了党,甚至取代了他们组成其中重要部分的老近卫军。他们愈习惯于在总书记的命令下一致行动,这个总书记就愈有可能直接取代党。从理论上说,党仍然是受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的支配。但后来党代表大会仅仅成了一块骗人的招牌;照例只有总书记处任命的人才有机会当选为代表。

托洛茨基目睹着党内的这种变动,意识到了它的严重性,却一筹莫展。他唯一可以采取的办法就是公开号召党的基层组织起来抵制总书记处的强迫命令。但是由于斯大林得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多数的支持,这个办法只会将矛头指向新选出的、通过正常途径建成的领导层。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甚至是享有最高威信的人敢冒险走这一步,更不必说此时的托洛茨基了。他向全党隐瞒了他与三驾马车的分歧,信誓旦旦地保证同他们完全一致,发誓做一个最热烈、最警惕的纪律捍卫者。如果他试图鼓动全党反对三驾马车,他必然被看做是一个伪君子——仅仅为了报私仇,为了满足取代列宁地位的野心。

他只能暂时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部反对斯大林。但他十分孤立,他的意见不被理睬。甚至布哈林也更倾向于三驾马车了(在40个新中央委员中,托洛茨基的政治盟友不超过3个人:拉柯夫斯基、拉狄克和皮达可夫)。有他出席的政治局会议愈益成为一种例行公事,他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而真正的政治局却只是在他缺席时才工作。因此,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刚过不久他就开始尝到自己贻误战机的苦果了。他已经成为三驾马车的政治俘虏。他既不可能在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去反对他们,也不可能在外部采取任何反对行动,他只能等待时机,指望柳暗花明那一时刻的到来。

※　※　※　※　※

1923年夏，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突然受到一股政治热潮的冲击。从7月初直到8月末，工业部门异常动荡。工人们感到被压上了过分沉重的工业复兴的重担。他们只能领到微薄的工资，就是这一点儿工资甚至还经常领不到。工业界经理们由于经营亏损而被剥夺了国家对企业的补助和贷款，没有钱支付职工工资，甚至一连拖欠他们好几个月，只得靠不光彩的欺骗手段克扣工资。工会既不想干扰工业复兴，也不肯压制民意。终于，"疾风暴雨般"的罢工在许多工厂发生了，并到处蔓延，还伴随着不满情绪的大爆发。工会惊慌失措，党的领导也都如此。一次总罢工的威胁迫在眉睫；而运动似乎正处于转变为政治骚乱的关头。自从喀琅施塔得暴动以来，工人阶级还从没有如此紧张过，领导集团也从没有如此震惊过。

这场冲击由于其出乎意料而愈益严重。领导集团一直对经济形势沾沾自喜，夸耀着不断的进步。他们没有及时收到灾难逼近的信号，或者即使得到了警告也置若罔闻。在突然惊醒之后，他们就去追查煽动工人的嫌疑犯。在基层，在党支部，骚乱使人们更认真地探究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新经济政策公布两年以后不满情绪仍然如此强烈。他们质问道：官方关于进步的报告到底有什么价值？党的领袖们不是过于骄傲自满吗？他们不是脱离了工人阶级吗？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追查嫌疑犯是没有什么用的。

嫌疑犯很难追查出来。对于罢工骚乱查不到任何根源，诸如反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残余等——因为这些政党经过彻底镇压早已销声匿迹了。官方的怀疑转向工人反对派。然而他们的领袖们也为罢工所震惊；工人反对派因为慑于被放逐的不断威胁而已然偃

旗息鼓,而且四分五裂了。不过那些分离出来的小集团倒是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了罢工骚乱,但罢工主要是自发的。在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工人集团,由3位工人领导,他们是米亚斯尼科夫(Мясников)、库兹涅佐夫(Кузнезов)和莫伊谢耶夫(Моисеев),都是至少1905年前入党的布尔什维克。在4月和5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刚刚闭幕,他们就散发宣言,谴责对无产阶级的新剥削,并敦促工人为苏维埃民主而战斗。[①] 5月末,米亚斯尼科夫被逮捕了,但他的追随者仍继续宣传他的观点。当罢工爆发时,他们还在琢磨着是不是应当跑到工厂去号召总罢工。当格别乌把他们抓起来时(总数约20人),他们仍就这个问题争论不休。[②]

党的领导发现诸如工人真理派之类的团体在工厂活动,不禁十分惊恐,其惊恐程度跟罢工骚乱的成因似乎很不相称。但是,这些集团尽管规模很小,他们在党内和工会内却有不少联系。基层布尔什维克抱着或明或暗的同情倾听他们的观点。对于工人的抱怨,工会没有表态,而党又不予理睬,因此力量弱小的政治派别只要不停止活动,就有可能迅速地获得广泛影响,成为不满情绪的代表。喀琅施塔得暴动中的煽动分子本来人数不多,影响不大;但那里堆满可燃物,一点火星就可能形成燎原大火。党的领导竭尽全力要扑灭火星。他们决心镇压工人集团和工人真理派,借口是,这些组织的成员不再认为自己应受党纪约束,并且半公开地煽动骚乱反对政府。捷尔任斯基被委以镇压之责。但是他调查这些假设嫌疑犯的活动时发现,甚至绝对忠诚的党员也把那些人视为自己的同志,并且拒绝作证去反对他们。于是他转向政治局,请它宣布任何党员都

---

① 1924年,工人集团的德国同情者在柏林发表了这份宣言,题为《俄国共产党工人集团宣言书》。

② 维·桑林:《工人集团》第97-112页。这个集团在莫斯科约为200人。

有责任向格别乌揭发那些在党内对公认领袖有攻击行为的人。

当问题提到政治局时，托洛茨基刚与三驾马车发生过几次冲突，他们的关系因此恶化；而捷尔任斯基提出的要求则是他无法忍受的。他丝毫无意为工人集团以及类似的持不同政见者辩护。当他们的追随者被投入监狱时，他也没有提出抗议。尽管他认为他们的不满大多是合理的，他们的许多批评也是有道理的，但他并不同情他们粗暴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宣传鼓动。他也不支持工业部门的动乱。他看不出政府怎么能满足工人的要求，如果工业产量仍是这样低；倘若工资买不到商品，提高工资又有什么用？他明白由于工业复兴的延迟所导致的罢工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但他不肯沽名钓誉，不肯乱许不负责任的诺言或者去利用工人的不满情绪。相反，他一再力促实现已经太迟的经济政策的转变。他也无意去支持工人反对派及其分散的小集团以极端形式提出的苏维埃民主的要求。但是他抗议三驾马车和捷尔任斯基所建议的处理骚乱问题的方式，抗议他们的顽冥不灵：只盯住不满情绪的表面现象而忽视其潜在原因。政治局命令党员们互相监视和告发这种做法令他非常厌恶。

捷尔任斯基的上述要求提出了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因为布尔什维克对待格别乌的态度中丝毫没有正直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通常看待任何政治警察的那种高傲的轻蔑。格别乌是一柄“革命的利剑”，每个布尔什维克都以帮助它完成反对革命敌人的工作而引以为荣。但在内战之后，当人们开始厌恶恐怖行径时，许多曾自愿在格别乌中服务的人们都巴不得离开这支队伍。难怪此时捷尔任斯基对拉狄克和布兰德勒诉苦说：“唯有圣徒和流氓能在格别乌中工作。但现在圣者离我而去，只剩下我与流氓为伍。”[①] 然而这个被

① 此事是布兰德勒告诉本书作者的。

人瞧不起的格别乌却仍然是布尔什维克独裁政权的捍卫者。迄今为止,它一直捍卫这个政权,而反对的只是外部敌人,如白卫军、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现在问题在于:为了捍卫独裁政权,格别乌是否还应该反对假想的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呢?如果是这样,那么除了在党自身内部大动干戈之外别无选择。

托洛茨基并没有明确告诉政治局应当拒绝捷尔任斯基的要求。他避开问题而强调其内在的原因。1923 年 7 月 8 日,他在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向党组织报告某些支部正受到敌对分子的利用这样的事实,这本来就是党员的基本义务,因此在十月革命胜利 6 周年之后,还要为此通过一个专门决议,看来是毫无必要的。要求通过这样一种决议的要求以及其他类似明显的要求,是一种令人极为惊讶的迹象。"[①] 这表明现在有一道鸿沟正把领袖和党员群众分隔开来,这道鸿沟自从党的十二大以来已变得特别宽,斯大林的庇护网使它变得更深了。

当托洛茨基这样陈述时,三驾马车提醒他,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他正是通过自己的提名者去统治工会的。托洛茨基回答说:即使在内战最紧张时期,"党内任命制度的规模也不及现在的 1/10。现在州委书记的任命成了一种制度。这就为州委书记创造了基本独立于地方组织的地位……。"托洛茨基并没有明确地向总书记的特权提出质疑,他只是要求总书记谨慎节制地使用这些特权。托洛茨基承认,在上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当他听取对无产阶级民主的呼吁时,其中许多"在我看来似乎都是夸大了的,并在相当程度上带有蛊惑性,因为充分发展的工人民主与独裁政权是无法相容的。"然而,党不应当继续生活在内战时期纪律的高压下。这种状况"应当让位于更活跃、更广泛的政党责任制。现在的政权……比

---

① 马克斯·伊斯特曼:《列宁逝世之后》第 142 - 143 页。

军事共产主义高潮时期的政权更远离任何工人民主"。"书记的选拔"就是造成"党的机关空前官僚化"的原因。书记集团"炮制了党的观点",压制党员发表意见的自由,甚至不许他们有独立见解,仅仅用命令和号召口吻向党员群众说话。因此毫不奇怪,不满情绪"无法通过在党的会议上公开交换意见或者通过党员群众向党组织施加影响而得以消除,……于是就在私下里不断积累起来,形成剑拔弩张的局面"。①

托洛茨基再次抨击了三驾马车的经济政策。他说,工业的动荡加剧了党内的动乱;而工业的动荡则是因为缺乏经济远见。他此刻才发现,他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那样多的让步才使三驾马车允诺给他的唯一果实也是一场空;代表大会通过了他的工业政策决议,但这些决议至今仍不过是一纸空文。经济管理仍像从前一样一塌糊涂。他们没有为使国家计划委员会成为经济领导中心做任何工作。政治局建立了一些委员会,但只是调查危机的表象,而不是去挖掘其根源。托洛茨基本人曾被邀请参加一个调查物价的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拒绝了。他声明说,他无意参加这样一种旨在搪塞问题、拖延解决的活动。

就在托洛茨基作出这些批评之前,他刚跟三驾马车发生了冲突,这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了。有些冲突跟审议德国局势有关;托洛茨基认为,在德国,因法军占领鲁尔地区而引起的动乱为德国共产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另一些冲突是由三驾马车建议改组托洛茨基所主持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引起的。季诺维也夫一心想把斯大林本人或者至少是伏罗希洛夫和拉舍维奇插进革命军事委员会。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季诺维也夫提出这个建议的。或许他与斯大林商量好,要为三驾马车在控制军队方面争得一份决定

① 马克斯·伊斯特曼:《列宁逝世之后》第142-143页。

权,或许他安排了一条反斯大林的狡计,要把他从总书记处赶出去。[1] 但当季诺维也夫将其动议提交讨论时,托洛茨基受到刺伤,十分愤怒,他声明说,作为抗议他要辞去所有的职务,如军事人民委员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等部门的职务。他要求作为一名"革命战士"被派往国外协助德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准备工作。这个想法并非事出无因。德国共产党领袖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刚抵达莫斯科,他对他本人及其同志们能否胜任领导一场革命起义没有把握,就热切地询问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意见,问托洛茨基能不能化名前往柏林或萨克森负责革命军事行动。[2] 这个主意打动了托洛茨基,使命的危险性更是激起了他的勇气。俄国政事的转变令他失望,政治局的阴谋活动令他厌恶,而且可能也使他十分厌倦了,他便请命到德国去。与其去啃革命胜利的腐烂果实,不如再次为革命斗争夺取胜利,这更加符合托洛茨基的本色。

三驾马车不能放他走。他在德国对他们会更加危险。如果他去了,一旦成功并且胜利归来,那么他将作为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公认领袖睥睨他们。倘若他发生了不幸,比如落在阶级敌人手里或战死沙场,则全党必将猜疑他们是为了铲除他才派他去担负一项毫无希望的使命的;而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他的同伙都不能冒这种猜疑的险。他们不能让托洛茨基去摘取新的革命胜利的桂冠,也不能让他去享受烈士的哀荣。为了摆脱困境,三驾马车把这痛苦的一幕变成了一出滑稽剧。季诺维也夫回答说,他本人作为共产国际的主席,愿意作为一名"革命战士"代替托洛茨基前往德国。这时斯大林插进来,做出一副和蔼可亲、通情达理的样子说,

① 参见本书第四章。

② 消息来源于布兰德勒。

政治局不可能免掉这两位最杰出、最受爱戴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政治局也不可能让托洛茨基辞去军事人民委员和中央委员之职，因为这将给党带来莫大的耻辱。至于他，斯大林本人，只要革命军事委员会能平安无事，他宁愿呆在外面。政治局接受了斯大林的解决办法；而托洛茨基感到它十分荒唐，便在会议中途离开了会场，并“把门重重地关上”。[1]

在捷尔任斯基提出建议或托洛茨基写下10月8日信件之前，政治局的事态就是这样。托洛茨基在信中向三驾马车提出了明确的挑战。但三驾马车不大在乎，因为托洛茨基没有使争论公开化：他的信件只向有权了解政治局内部秘密的中央委员宣布。

然而，一星期之后，即在10月15日，46位资深党员联名发出庄严声明，矛头直指官方领导，批评它的政策，他们所使用的词语几乎与托洛茨基所使用过的词语完全一样。他们声明说，国家正处于经济崩溃的危险之中，因为“政治局里的多数派”拿不出政策，看不到对工业实行有目的的指导和计划性的必要。他们并没有要求对领导层作任何明确的人事变动；他们只是敦促政治局警醒起来认清自己的目标。他们也抗议书记集团的统治以及对言论的扼杀，声称正常的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由于安插私人亲信已经失去了代表性。46人甚至比托洛茨基走得更远，要求取消或放宽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禁令，因为该禁令只有利于一个小宗派，成为它对党实行独裁统治的掩护，驱使不满的党员结成秘密团体，并滥用

[1] 斯大林的前秘书这样强调这个插曲的荒唐：“这一幕发生在皇室会议厅。大厅的门很厚重。托洛茨基朝门跑过去，使尽全力去拉门，但门很慢很慢才打开。有些门是无法砰然作响的。但托洛茨基在盛怒之下并未注意到这一点；他又使尽全力去关门。遗憾的是，门仍然只能慢慢地关上，就像它开时那样。因此我们看到不是表明历史突变的戏剧性姿态，而是一位可悲的、无助的人物与大门的格斗……。”巴扎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一起》第76－77页。

他们对党的忠诚。"党内斗争进行得越野蛮残酷,这种斗争越会在暗中秘密地进行。"最后,声明签名者要求中央委员会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局势。①

46人如此忠实地反映了托洛茨基的批评,以至三驾马车不能不怀疑,他即使不是抗议声明的组织者,那么也是他们的直接鼓舞者。② 三驾马车以为46人已经结成了一个牢固的派别。实际上,托洛茨基的态度比三驾马车所想象的有更多的保留。不错,在46人中有他亲密的政治盟友:尤里·皮达可夫,一位最能干、最开明的工业管理者;叶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经济学家,前中央委员会书记;列夫·索斯诺夫斯基,《真理报》的天才撰稿人;伊万·斯米尔诺夫,征服哥萨克的胜利者;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十月起义的英雄,现为红军第一政治委员;穆拉洛夫,莫斯科卫戍部队司令员,等等。托洛茨基曾把自己的思想和忧虑对这些人吐露过,甚至把他和列宁的私人谈话都告诉过他们。③ 他们组成了所谓1923年反对派的领导核心,代表着其中"托洛茨基主义"的成分。但46人并不是一个完全一致的派别。他们当中也有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拥护者,例如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萨普龙诺夫、柯秀尔、布勃诺夫和奥辛斯基等,他们的观点与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不一样。许多签名者在共同声明中对一些特定问题有明显的保留意见或坦述自己的异议。共同声明同等地强调了两个问题:经济计划性和党内民主。但有些签名者主要对前者感兴趣,而另一些则更关心后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皮达可夫等人要求批评自由和争论自

---

① 托洛茨基档案。

② 托洛茨基应否对46人的行动负责,这是1924年1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所争论的中心议题。

③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15页。

由，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反对特定的经济政策，希望通过争论使别人转变到他们方面来；而萨普龙诺夫和索斯诺夫斯基等人加入反对派主要是因为他们为了党内自由而要求党内自由。前者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官僚层中先进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的愿望，而后者则只是表达了对整个官僚层的反感。这 46 人远不是铁板一块，而只是不同群体和个人结成的一个松散联合体，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只是一种共同的、朦胧的不满和抗议。

很难说托洛茨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被视为这次联合的直接发起人。托洛茨基本人否认这种说法，而他的政敌则断言，他的否认只是一种花招，好使他逃避组织宗派的罪名。[1] 但反对者并未提出具体证据；而 46 位签名者也不像是一个具有确定路线和纪律性的统一派别。甚至在托洛茨基死后许多年，那些紧紧追随他的人也声称，他严格遵守党纪，不可能充当这一次特定抗议示威的发起人。根据所有已知的有关托洛茨基在这些事态中的行为来看，这种说法是可靠的。然而值得怀疑的是他是否像他声明的那样事前对 46 人的行动一无所知或者他对这次事件是否感到意外。毫无疑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穆拉洛夫或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一直向他通报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且做这些事时也不会没有他的某种鼓励。因此可以说，即使托洛茨基对他们的行动并没有正式的责任，他也应被视为其实际鼓舞者。

46 人将其抗议提交给中央委员会时附带请求：中央委员会应按早已确立的惯例让全党知道此事。三驾马车拒绝了这个请求，并且威胁说，若是签名者自己在党员中散发该文件，就要对他们进行纪律制裁。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的代理人被派到各支部去谴

①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 46、92－102、104－113 页；《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 156 页及以后各页。

责尚未公布的抗议书的作者们。尔后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特别扩大会议来处理46人声明和托洛茨基10月8日的信件。[①] 三驾马车在答复托洛茨基时一再重复了斯大林1月和2月在政治局会议上对他的指责。他们断言,托洛茨基被权力欲所驱使,坚持"孤注一掷"的方针,不但拒不担任列宁的副手,甚至放弃了正常的职责。然后他们列举了近年来他与列宁有分歧的所有问题,但在一件事上他们却装聋作哑,即在几乎所有这些问题上列宁最终发现自己是与托洛茨基一致的。中央委员会肯定了这些指责,并批评了托洛茨基。中央委员会同时还申斥46人,把他们的联合抗议书称做是对1921年禁止派别活动禁令的破坏。至于对托洛茨基,中央委员会并没有明确指责他组织小宗派,但是认定他应对46人犯下的过错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这种谴责更加突出了一个怪圈,其中任何反对派刚一露头便被置于1921年禁令的纪律约束之下。46人是为了要求取消或者放宽这些条令挺身而出的,但是,他们仅仅要求修正这些条令就足以使他们遭到已经违反条令的指控。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禁令是自我永恒的,不可磨灭的,任何修正的企图在其中都无立足之地。禁令在党内确立了军营纪律,这也许有利于军队,却是政治组织的祸害。这纪律无异于"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三驾马车很难把这次特殊的"造反"镇压下去,因为这些造反者不是普通的小兵,而是46位革命将军。他们每个人在政府和党内的地位都很重要。多数人都有一部内战英雄史。许多人是中央委员。有些人是在1917年与托洛茨基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还有一些人则早在1904年就已入党。他们的抗议是抹不掉的。三驾马车在各支部中声讨它,并号召各支部参与声讨,但又不肯公开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10卷第766-768页。

抗议声明，于是引起了强烈的猜疑。全党因危言耸听的谣传而哄动起来。三驾马车不得不稍稍打开安全阀门。在11月7日，十月革命6周年纪念日，季诺维也夫发表庄严声明，答应恢复党内民主。以此为信号，《真理报》以及其他报纸开辟争论版面，并邀请党员坦率写出他们感到困惑的所有问题。

"沉默三年"之后重新发动争论是一桩冒险的事。[①] 三驾马车对这一点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他们允许在莫斯科公开争论，而在其他省份则按兵不动。但是，他们刚一打开安全阀，就立刻遭受到意想不到的压力的攻击。莫斯科的党支部造了反。他们对官方领导人报以敌意，而向反对派发言人报以欢呼。在大工厂的某些会议上，三驾马车遭到嘲笑，票数明显下降。[②] 讨论的焦点马上集中到46人声明上，现在他们可以自由地向基层群众阐释他们的观点了。皮达可夫是他们当中最激进、最能打动听众的发言人；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轻易赢得极大多数群众支持他们的直言不讳的决议。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党的各卫戍部队组织里发表演说；在争论开始后不久，至少有1/3这样的组织已经站在反对派一边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以及莫斯科多数共青团支部也都站在反对派一边。大学里则是群情激奋；绝大多数学生支部都宣布热烈支持46人。反对派领袖们踌躇满志。有这样一种说法，他们如此得意，居然私下讨论在分享三驾马车对党的机关的控制时什么样的比例是他们可以接受的，。

三驾马车大为震惊。当他们发现各卫戍部队支部将以何种方

① 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拉狄克谈到了争论之前的"三年沉默"。参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135－137页。

② 这是拉狄克所述。同上，第83－91页。另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有关党内危机的描述。同上，第104－113页。

式投票时,便决定不让这些支部进行投票,立即解除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红军政治部主任职务,借口是:他威胁中央委员会说,武装部队将“像一个人一样地”支持“革命胜利的领袖、组织者和鼓舞者”托洛茨基。[①] 实际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并没有用任何军事造反之词相威胁。他所指的和说的只是军队各支部“像一个人一样地”做托洛茨基的后盾。这无疑是一种过火的说法,但距真相并不很远。何况,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也并非违法地要把争论带到军队支部中去。这些支部同地方支部一样,同样有权参加任何争论,投票表决政策。而他们的这种权利以前也从没有被否认过。但是,不管安东诺夫的行动是否无可非议——托洛茨基认为,他处在这种微妙的局面下还应当更慎重些——三驾马车还是决定不能再让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留在红军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紧接着是对其他批评者的处分。书记处违反党章,解散了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任命新人来取代它。[②] 纪律处分也同时落在反对派的其他支持者身上,一切可以想得出来的手段都被用来阻挠争论的深入。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未能缓和紧张局面。三驾马车决定用摹仿反对派的办法来挫败反对派。他们拟定了一份专门的决议,直截了当谴责“党内官僚集团”,其用词听起来就像是从托洛茨基和46人那里剽窃来的;他们宣称要公布一项新方针以保证党员享有充分的发表意见的自由和批评自由。

11月里,整个莫斯科群情激动,但托洛茨基却未能参加公开争论。一次偶然的害病迫使他沉默。10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在一次去莫斯科郊外沼泽地狩猎的途中,他患了流感,继而发起了高烧;就在这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几个月中,他因发烧而卧床不起。如

---

①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124页。
② 同上,第459页。

果稍为留心一下，那些由更为固定的形势因素所决定的事态的发展趋势是怎样受到这种意外生病——先是列宁，后来是托洛茨基——的影响，那是十分奇妙的。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评论道："我能够预见革命和战争，却不能预见秋季猎鸭之行的后果。"① 毫无疑问，这对托洛茨基极为不利，因为值此关键时刻，他不能运用他那强有力的呼声去直接打动听众了。

> (他妻子写道)这是非常沉重的日子，这是列·达·在政治局与它的成员作紧张斗争的日子。他单枪匹马抱病与所有其他人作斗争。因为列·达·有病，会议就在我们家开。我坐在隔壁卧室里听他的发言。他在用他全部身心说话，我感到这样的话他每讲一次都会失去一部分力量。他对他们肝胆相照，推心置腹。但我听到的却是对此报以冷漠的回答。……在每一次这样的会议之后，列·达·的体温总要急剧上升。他从书房出来时浑身湿透。脱衣服睡进被子，内衣和外衣都像淋透雨一样，必须烤干。②

当三驾马车决定通过新方针声明的传播来挫败反对派时，他们一心想让托洛茨基在声明上签字。他们要求托洛茨基在这份从他那里剽窃来的文本上、在三驾马车的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不能拒绝，否则就会给全党造成一个印象，即正是他本人阻挠了自由之路；何况他也希望在公开争论正式开始后至少能把他在政治局秘密会议上与三驾马车较量过的那些问题公开出去。然而他又

① 《我的生平》第2卷第234页及以后各页。

② 同上，第240页。

充满了这样的疑虑:要求他签署的会不会是一个空洞的诺言。仅在几个星期之后,反对派的一位领袖就将此声明比做1905年的十月宣言,当时末代沙皇在其衰弱时作出了立宪自由的许诺,但是一旦重新强大时便将它收回。[①] 1905年10月,年轻的托洛茨基在第一次出现在彼得堡革命群众面前时曾亲手把沙皇的宣言撕得粉碎,并且警告群众说:"今天,他把这纸上的自由给了我们,而明天他就会收回去,撕得粉碎,如同我现在当着你们的面将它撕得粉碎一样。"[②] 现在已是1923年了,他再也不可能走到群众中间并当着群众的面把"新十月宣言"撕得粉碎。因为这宣言是以他作为其中一员的政治局的名义发布的;而且他力求的是改组而非推翻现行政府。因此,当政治局把新方针动议带到他床头时,他只能设法提出修正意见,旨在使党内自由的诺言尽可能明确有力,以此来约束三驾马车。政治局接受了他提出的所有修正意见,并于12月5日一致投票通过了动议。[③] 然而,尽管托洛茨基投了赞成票,却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他在1905年的姿态。

为此,他给《真理报》写了若干短文,这些短文后来都收进他的小册子《新方针》中。[④] 这些短文扼要概括了他的主要思想,这些思想立刻成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标志。政治局投票决定新方针的前一天,即12月4日,他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这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自己的部门、军队以及"所有别的地方"的"官僚作风"所进行的潜在的抨击。他写道,"如果人们习惯于一种形式而不考虑其内容,洋洋得意地使用现成的词语而不考虑其含义,习以为常地下达

① 参见萨普龙诺夫的讲话,载《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131-133页。
② 《武装的先知》第五章。
③ 正文刊于1923年12月7日的《真理报》上。
④ 以下各页中的引文均引自这本小册子的美国版,但个别地方译文与原文有出入。

命令而不问其是否适当，或更有甚者，害怕每一个新鲜词语，害怕批评，害怕主动精神，害怕独立自主精神，那么这就是说，最危险的因循守旧顽症已侵蚀到各个方面了。"[①] 那种"胜利之雷震天响"的谎言是因循守旧习气的每日口粮。这种情况能在红军史和内战史中找到，在那里，真实情况已成了因循守旧的神话的牺牲品。"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英勇的传奇故事。你看：在我们的队伍里，人人都是英雄，个个勇往直前，敌人总是在数量上占优势，我们所有的命令都是高明的，执行得都很圆满，如此等等。"这种神话的教育效果本身也是一种神话。红军战士聆听这种神话正如"他父辈听圣徒传一样，听起来很有教益、很壮丽，但对实际生活却不适用。"

> 在军事上如同在革命事业上一样，最伟大的英勇精神是老实和负责的英勇精神。在这里，我们谈论老实并不是从某种抽象的道德观点出发的：什么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说谎和欺骗自己亲近的人。在存在着利害冲突、斗争和战争的阶级社会里，这种理想主义的原则纯粹是伪善。尤其在军事上，如果不用诡计、伪装和出其不意这些手段，即不进行欺骗，那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为了人们为之献身的事业而有意识地、预谋地欺骗敌人是一回事，而由于虚伪的自尊心或者为了讨好和献媚……而散布有害的"一切顺利"的谎报则是另一回事。

然后，他将军队与党作了比较，特别是将他们对待传统的态度作了比较。年轻的共产党员与老近卫军的关系正如军队中的下属

① 托洛茨基：《新方针》第99－105页。

与他们上级的关系一样。不论在党或军队里,年轻人跨进的现成组织是他们的长者不得不从零开始创建起来的。因此,传统关系到处成了"绝顶重要"的东西——没有它,就休想稳步前进。

但是,传统不是死的教条或因循守旧的浪漫精神。把传统背得烂熟是不行的,像领悟福音书那样去领会它也不行,单纯相信老一辈的"真话"也是不行的,传统需要通过深刻的内心修养来获得,需要独立地、批判地去研究,需要积极地去掌握。否则,整个房子就等于建立在沙滩上。我曾经描绘过那些"老近卫军战士"……他们仿照法穆索夫[①]的榜样给青年人灌输传统,说什么"你们最好跟老年人学习,比如我,或已故的大叔"。而无论是向这位大叔或者是向他的侄子学,都是什么好东西也学不到的。

毫无疑问,我们老一代指挥人员为革命事业确实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部队青年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很好,因为这保证了高级与低级指挥员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既保证了指挥员之间的联系,也保证了指挥员与红军士兵群众之间的联系。但这里有一个不可缺少和极端重要的条件:老一代的威望无论如何也不应使年轻一代失去个性,更不应使他们感到恐惧。……只知道说"是"的那种指挥员以及一般的人,是毫无用处的。老讽刺作家萨尔蒂柯夫形容这种人说,他们"说来说去只会说是、是、是,搞得你一筹莫展"。[②]

① 法穆索夫是俄国古典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一个人物。——译注

② 托洛茨基:《新方针》第104页。

这是托洛茨基第一次抨击老近卫军。但是他的措词如此笼统隐晦，以至极少有人懂得它的意思。全党和全国对他与政治局的分歧仍然一无所知，还以为他对官方政策负有责任。情况正是如此，当46人向各支部发表演说，声称他们得到托洛茨基的支持时，斯大林回答说，他们没有这种权利，因为托洛茨基跟反对派远非一致，他是所有领袖中最坚定的纪律维护者。[①]这最后的一击使托洛茨基忍无可忍。12月8日，他写了一封致全党的公开信，明确阐明他的立场。[②] 他把新方针称为历史的转折点；但是他警告全党基层群众：党内某些领导人口是心非，试图在实际上废除新方针。他说，党的任务和职责就在于把党自身从其领导机关的暴虐中摆脱出来。党员群众必须并且只能依靠他们自己，依靠他们自己的理解力、自身的主动性和勇气。诚然，党不能没有它的机关，机关也不能不以集中方式工作。但它必须是党的工具，而不是党的主人；对集中的需要必须同民主的要求相协调和平衡。“在最近一段时期，党内却没有这样的平衡。”

“大家都了解或至少感觉到党的官僚主义几乎到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警告的呼声高涨起来了。关于新方针的决议就是党内发生转变的第一个正式的十分重要的表现。这个决议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就要看全党40万党员愿意和能够实现的程度。”有些领导人害怕这一点，就诡称党员群众还没有充分成熟到使党采用民主方式管理自己的程度。但恰恰是官僚式的包办阻碍了群众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对于要求入党并愿意留在党内的人们提出严格要求”是对的；但是一经接纳了他们，他们就可以自由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369－370页

② 托洛茨基：《新方针》第89－98页。

地运用为党员保留的一切权利。他又明确呼吁，年轻人应维护自身权利，切不可把老近卫军的权威绝对化。“只有老一代和年轻一代在党内民主的范围内经常相互影响才能保持老近卫军这一革命因素”。否则，它就会僵化并堕落为官僚主义。

这是托洛茨基第一次但十分有力地向老近卫军提出“官僚主义的堕落”的谴责。他运用历史类比法支持这种谴责；他回顾了那个历史过程，即第二国际的老近卫军从一支革命力量蜕变为改良主义势力并把它的伟大和历史使命拱手交给它的党的机关。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仅受到两代人疏远的威胁。更大的威胁是党脱离工人阶级。产业工人仅占全体党员的13%或16%。他要求“应有大量的不断增加的工人阶级成分涌入党内”。他以热烈的战斗呼号结束了公开信：

> 消极而机械地服从首长、毫无个性、阿谀逢迎、升官发财——所有这些现象都应当被清除！布尔什维克并不只是守纪律的人，不，他是这样一种人，他埋头钻研，在任何问题上都有自己的坚定不移的见解，勇敢地、独立地捍卫自己的观点，不但在对敌作战时如此，而且在自己的党内也是如此。今天他也许处于少数地位……他就服从……但这并非意味着他总是错的。他可能比别人更早地发现并理解新的任务或者转变的必要性。他将坚持不懈地再次、三次乃至十次地提出问题。他以此对党作出贡献，帮助党在迎接新的任务或实现必要的转变的时候能够充分武装起来，避免组织上的震动和派别痉挛。[1]

---

① 托洛茨基:《新方针》第94页。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他提出一种观点，即党应允许党内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自由存在，只要这些思想倾向与党的纲领相容。他用这个概念来对抗铁板一块的党的概念，后者是三驾马车视做布尔什维主义的精髓而提出来的。当然，党不应该被“切割成为小宗派”，但“宗派主义”不过是对过分的集中主义和官僚集团的专横态度的一种极端的、病态的反应。只要这个根源继续存在，宗派就无法根除。因此，必须“更新党的机关”，“要用与党的整体生活紧密相关的生力军去取代僵化的官僚主义者”，而最重要的是，要把“那些一听到批评、反对或者抗议就挥舞起惩罚雷电的人从领导岗位上拉下来……新方针必须一开始就使每个人感觉到，从今以后再没有人敢威吓党了”。

延迟了将近9个月之后，他终于单枪匹马地扔出了这颗本想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与列宁一道投出的炸弹。但这一延迟是致命的。斯大林早已完成了党的机关的大换班，把他自己的亲信和季诺维也夫的少数下属提拔到最敏感、最机密的岗位上，安插到所有组织部门中去。他已通过暗示、呵斥或大声私语等手段使他们作好将与托洛茨基发生冲突的充分准备。现在，他要调动他的书记方阵投入行动了。

当托洛茨基的公开信在党的会议上宣读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人把公开信看做是他们期待已久的信息，是伟大的革命家发出的鼓舞人心的号召；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终于横眉冷对法利赛人，[①]重又站到卑贱者和被侮辱者的前头来领导他们了。甚至不久前托洛茨基曾以原告辩护人的身份反对过的反对派成员们也热烈响应他，他们意识到，尽管他曾以严厉的态度对待他们，但他

① 法利赛人系古代犹太教的上层祭司，耶稣基督的迫害者，后被基督徒当做伪善者的代称。参见《新约·福音书》。——译注

是出于纯洁的、崇高的动机。一位反对派成员写道:“托洛茨基同志,我们向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袖致敬,您的革命思想始终是与那种等级特权和心胸狭窄的思想格格不入的。”另一位反对派成员写道:“托洛茨基同志,我将您看做是苏维埃俄国的领袖之一,像您这样的领袖绝不会有政治报复的想法的。”① 但是许多布尔什维克也因为他把党描绘得那样阴暗并使用那样生硬的词语而震惊;而有些布尔什维克则被激怒,认为这是对党的无端攻击——如果不说是在背后捅了一刀的话。各级书记到处引导和组织这后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意见,添油加醋,将其推至极端,并赋予了不符合其实际程度的重要性,把所有可供发表的手段,把预定用于会议争论的大部分时间以及把在各州形成意见中起巨大作用的主要报纸、地方简报和书刊都交给这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去自由支配。

在党支部会议上,不论在数量方面还是思想表达方面,反对派的支持者对党的机关往往都占有压倒的优势。但是充满了他们的声音和愤怒的支部会议一旦开过,毕竟是书记们代表支部说话,他们玩弄通过的决议,决定是否要把决议压制下去,若压制不了,那么就限制其传播范围。如果这次会议让一个书记感到十分棘手,他便精心策划下一次会议,把自己的心腹塞进去,把反对派排除出去,再不然就迫使他们默不作声。

争论预定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开幕前结束。会议的筹备工作同样操纵在书记们的手里。代表的选举是间接的,需要通过好几级选举才能产生。而在每一级,书记们都盯着有多少反对派的同情者当选;然后他们想方设法在高一级选举中使其落选。莫

---

① 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引用了这批信件,其用意是要败坏托洛茨基的声誉。《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125页。

斯科基层支部选举中投票赞同反对派的选票究竟有多少，从来没有公布过。46人声称：在比基层支部高一级的地区会议上，他们获得的选票不少于36%；而在更高一级的州会议上的获选比例减为18%。这个说法没有被否认。反对派的结论是：如果它的代表人数从基层支部到最后选举一直按照相同比例减少，反对派仍将成为莫斯科组织的最大多数。[1] 差不多可以肯定这是真实的，不过，高踞于这最大多数之上的却是书记们。

三驾马车急于给这次争论做出结论。他们以振耳欲聋的反控告炮火回答托洛茨基的公开信。他们说：托洛茨基与全体政治局委员一起投票赞成新方针，然后又对政治局的意图进行诬蔑，这是他的不忠诚；煽动年轻人反对革命美德与革命传统的体现者——老近卫军，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力图发动全党广大群众反对党的领导机关，这是他的邪恶伎俩，因为每一个优秀的老布尔什维克深知，党一贯多么重视其机关，党对其机关又是何等关怀和爱护；他对禁止派别活动的禁令态度暧昧，明知禁令对于党的团结至关重要，因而不敢明目张胆地主张取消它，但是他力图在暗中破坏它；当他把党的政权描绘为官僚主义时，他在制造谎言；当他在群众中激起过分的、危险的民主欲望时，他在玩火；他假装代表工人阶级说话，实际上却是在讨好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就是迎合小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他谈到党员群众的权利和责任，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不负责任、权力欲和被挫败的独裁的野心；他对党领导机关的仇视，他对老近卫军的轻蔑，他那狂妄的个人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传统的冒渎不敬，是的，还有他那臭名昭著的对农民的"轻视"——这一切都清楚表明，他在内心深处始终是党的陌路人，与列宁主义格格不入，是一个不知悔改的半孟什维克；他同意充当形形色色反对

---

①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131－133页。

派集团的喉舌,把自己树为所有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代表,哪怕这是不自觉的;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从四面八方向党进攻,力图破坏它的团结,把他们自己的情绪、偏见和倾向注入党内。[1]

※　※　※　※　※

在党内反对派的漫长历史上,与 1923 年的反对派相比,还从来没有一个反对派承受过如此严厉的谴责,受到党的机关如此无情的镇压。比较起来,工人反对派所受到的待遇还更公平宽大些;1921 年以前积极活动的反对派在表达思想和组织方面还照例享受着不受限制的自由。那么现在怎样解释党的机关在压制它的主要批评者时的那种猛烈和狂怒呢?

三驾马车不能在这场论战中与托洛茨基公平争论。他的抨击实在太危险了:他的公开信和关于新方针的几篇论文像强劲的钟声,发出警报,倾泻愤怒,充满了战斗精神。而三驾马车不仅仅是采取歪曲和镇压的手段,他们还揭出和制造托洛茨基立场中的许多弱点和矛盾,有真的也有假的。他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对权力的垄断;他比三驾马车更有说服力地号召全党将这种权力作为革命果实的唯一保证去加以捍卫;他重申了自己捍卫和巩固这种权力的愿望。他所反对的只是老近卫军从党内攫取并通过机关而保持的那种权力垄断。但是托洛茨基的政敌不难证明: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而党只有授权给老近卫军,才能保住垄断地位。托洛茨基反驳说,应当信任 40 万党员运用他们自己的判断,允许他们参与制定政策。他的政敌质问道,那么为什么最近几年来,在列宁

[1] 参见斯大林的答复,载《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5 卷第 313 - 316 页和第 6 卷第 7 - 24 页。

的鼓励下并得到托洛茨基的同意，党没有给党员群众以这种信任呢？难道不正是因为党内已经渗透了异己分子、前孟什维克、叛徒甚至耐普曼吗？难道不正是因为某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已经脱离了自己的同志并被权力和特权所侵蚀腐化了吗？托洛茨基曾经说过，将数以万计的党员开除出党的清洗将足以使党纯洁化，恢复党的完整。但是列宁及中央委员会不是反复强调情况并非如此吗？难道他们不是预定了新的、周期性的清洗吗？难道他们不是全都不同意季诺维也夫的这种意见：由于党对权力的垄断，因此不可避免理应容纳“不自觉的孟什维克”和“不自觉的社会革命党人”吗？只靠一次清洗是不能清除掉这些异己分子的，更不必说那些思想不成熟的人了。这类人被开除出党，但还会重新出现：在每群新入党的党员中都是真诚者和钻营者兼而有之。如果在一年之内就得开除 1/3 的党员，那么“这个党”又怎么能信任群众的判断力，怎么能允许他们行使充分的权利呢？

托洛茨基抗议布尔什维克这种荒唐透顶的自我镇压，但是这种自我镇压却是布尔什维克镇压其一切敌人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党内各种政治倾向的自由竞争是可以容忍的话，为什么就不能允许“不自觉的孟什维克”畅所欲言，结成确定的舆论实体并分化党呢？垄断体制使参差不齐的群众忘掉了自身的“参差不齐”，迫使他们噤若寒蝉；这样一来，党只能机械地保持其统一。三驾马车的某些高明的追随者也意识到托洛茨基指出的危险是充分现实的：老近卫军有可能蜕化变质；垄断体制会滋生出不满，引起同样会导致分裂的零星骚乱。但是，党不得不面对选择某条道路的危险。在垄断体制的控制下，至少分裂运动不像在以民主方式管理的组织中那样容易蔓延。党的机关可以及时发现这种分裂，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中，使党的其余部分或多或少保持免疫力。

换言之,党正处在丧失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未来的危险中,正处在“蜕化变质”的危险中,而且,不管它是将方向交托给广大党员还是交托给老近卫军都一样。困境来源于以下事实:全国大多数人看不到社会主义方向;工人阶级仍然四分五裂;革命既然没有传播到西方去,俄国就只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退守到自己的资源上。这种情形必然具有“蜕化变质”的可能性;有待判定的只是它的主要根源是来自意见分歧的党员群众还是老近卫军。自然,老近卫军,或者毋宁说它的大多数,信赖自己的社会主义传统和特点要远胜过信赖40万名义上党员的判断力和政治本能。诚然,托洛茨基并没有要求老近卫军抹掉它自己——他只是敦促老近卫军用民主方法保持它的权威。但老近卫军感到——也许它是对的——它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害怕承担风险;而且它的既得利益要求它把持住已经获得的政治特权。

托洛茨基所拥护的党内改革可以被看做是恢复党在1917年力求建立的那种苏维埃自由制度的第一步;也就是说,作为回到工人民主和逐步废除一党制的开端。这个观念与托洛茨基的思想相去不远;[①] 但是托洛茨基并没有把它提出来——这或者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又不相信怀疑与削弱一党制的时机已经成熟;或者是因为他不想将自己暴露在危险的攻击火力之下而无益地使争论复杂化。很可能两种动机都有。但他实际上主张的是布尔什维克享有双重性的特权:既垄断自由又垄断权力。这两种特权是互不相容的。如果布尔什维克希望保存他们的权力,就不能不牺牲他们的自由。

在托洛茨基的看法中还有另一处破绽。他要求党坚持无产阶

① 参见托洛茨基关于苏联无记名投票的评论,见《致友人的一封信》1928年10月21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级一社会主义方向。同时他又指出，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只占党员总数的很小部分——1/6。多数党员都是工业界经理、公务人员、部队军官、政治委员、党务人员等等(其中有些人出身于无产阶级，但已愈益同化为苏维埃从沙皇制度中继承下来的那种职业官僚)。这样一来，恰恰是在党内民主的支配下，工人阶级的影响必然微不足道，而官僚集团必然会占上风。因此，托洛茨基力促党要补充更多的工人，为的是"强化其无产阶级细胞"。但是他又坚持说，党应该谨慎行事，认真控制从工人阶级中吸收新党员的工作，以免党被政治上不成熟的、文化不高的党员所淹没。[1] 这种状况不论从那一个角度来看都显得极其悖谬。运用民主管理并不能使党民主化，因为这只能加强其官僚主义；而如果党把大门向工人阶级敞开，党也不会更开明和更具有社会主义性。

那么，党的无产阶级方向是什么呢？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包括托洛茨基在内，谈到的只是一种与党的社会成分及其对工人阶级的真正态度不相干的神话而已。布尔什维克的内部争论是不折不扣以准神话的术语进行着的，至少部分是如此，其中反映出一种包办主义，它使党(然后是老近卫军)自封为工人阶级的代理牧师。争论双方都不能坦率和彻底地承认这种包办。双方谁都不说，倘若他们追求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而没有无产阶级支持的话，他们就应受到谴责，而这样的供认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个传统。他们必须精心炮制出某些论据和具有自身规定的一套独特的花哨说辞，以便对这种可悲的状况自圆其说。三驾马车在这方面是最恶劣的罪人：这种包办主义的神话最终凝结为日后对斯大林主义的僵硬迷信。甚至托洛茨基本人，当他试图部分地扭转这种包办主义进程和奋力要撕碎新

① 托洛茨基：《新方针》第 20－21 页。

神话的这块厚厚的遮羞布时,也不免感到棘手。[1]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官僚集团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国家都已是唯一有组织的、积极的政治力量。它窃取了从工人阶级手中失落的政权;它凌驾于社会各阶级之上,并在政治上独立于它们之外。然而党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神话。这不仅在于布尔什维克官僚集团主观上将自己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并以自己的模式培育无产阶级革命传统,还在于客观上——由于环境的力量,它不得不成为国家向集体主义发展的主要代表和推动者。从根本上支配着官僚集团的行动和政策的是这一事实,即它对苏俄公有工业资源的掌握。它代表着经济上与"私有成分"的利益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利益,而不是代表任何阶级的特定利益。只有"社会主义成分"的总利益在一定范围内与工人阶级的总利益或"历史"利益相一致时,布尔什维克官僚主义者才能宣称代表该阶级的利益。

"社会主义成分"有其自身的要求和发展逻辑。它的第一个要求是:必须确保避免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甚至避免私人企业局部的但是大规模的重新侵入。它的发展逻辑要求计划性、一切公有经济部门之间的协调和迅速的扩展。否则就会收缩与衰退。扩展只能通过至少部分地兼并"私有成分"的资源和以牺牲"私有成分"为代价而进行。这就引起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布尔什维克官僚集团只能断然站在"社会主义成分"一边。

---

① 孟什维克和自由党人将布尔什维主义比做雅各宾主义,托洛茨基斥之为"肤浅的、自相矛盾的"。他写道,雅各宾党的垮台是由他们的追随者的社会经验不足所导致的,但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的地位却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无产阶级组成(俄国)革命的核心力量和左翼。……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是如此强大,以至在一定限度内允许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它使农民可以……直接参与……行使国家权力。"托洛茨基:《新方针》第40页。(重点号是我加的——伊·多·)

当然，即使这样也不能算实现了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前提是：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教育程度和总的文明程度高，消灭明显的社会差距，废除人对人的统治，精神风貌与社会总变革相一致。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是它的主要基础。完全可以想到，即便在这个基础上，社会主义大厦也未必能够建起；但若说没有这个基础也能建起这个大厦，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布尔什维克官僚集团不得不去捍卫的正是这个社会主义基础。

在本书这里写到的这个时期，即1923年—1924年间，布尔什维克官僚集团才仅仅模糊意识到他们所依附的那种利益的性质。可以说，它为自己前所未有地控制着全国的工业资源而感到困惑和惊愕；而它又不十分清楚怎样去运用这种权力。它不安地甚至担心地看待财迷的农民；它一度甚至更倾向于满足后者的要求，而不是“社会主义成分”的要求。只是经过一系列冲击和内部斗争之后，布尔什维克官僚集团才被推动着将其自身跟“社会主义成分”及其需要绝对地、不可改变地等同起来。

托洛茨基的不幸恰恰在于，当他向官僚集团政治上的野心和傲慢宣战时，他又必须试图唤醒它身上的“历史使命”。他主张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也正是针对着这一点。然而，在其得以进行的环境下，这样的积累差不多是无法同工人民主相容的。不能指望工人会自愿地把“一半工资”奉献给国家，如同托洛茨基为了促进国民投资而要求他们做的那样。国家只能用强迫方式拿走这“一半工资”；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剥夺工人的一切抗议手段和消灭工人民主的最后残余。托洛茨基在1923年所阐述的这一计划的两个方面被证明在最近的将来是无法相容的；这就是托洛茨基处境的基本薄弱点。官僚集团愠怒地反对他的计划的一部分，即要求工人民主的部分；而经过多次抵制、犹豫和拖延之后，它被

迫去实现该计划的另一部分,即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部分了。

※ ※ ※ ※ ※

在这一年的年底,当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准备工作以及打击反对派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托洛茨基的健康恶化了。他持续发烧,体力衰竭,精神不振。他快要被一种失败的意识压垮了。他仍然感到反对他的运动及其谴责、诽谤、阴谋的无情炮火不像是真的;而这愈在他心底引起一种孤独感。他只能去辩明自己的清白,而他的辩解被淹没在一片喧嚣声中。(甚至《新方针》的出版也被出版当局借故推迟了,以至这本小册子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开幕之前还未送达各支部。)他的心情时而紧张,时而麻木。因此,当他的医生们劝他离开这冰天雪地的莫斯科——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到黑海边上的高加索海滨养病时,这给了他一个逃脱首都沉闷气氛的机会。[1]

1924年1月16日,正当托洛茨基准备好外出旅行时,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开幕了。三驾马车早已准备好了一份决议,气势汹汹地给托洛茨基和46位签名者横加上一个"偏离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派性"的罪名。会议进程几乎全被这个问题占据了。在托洛茨基缺席的情况下,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和拉狄克起而为反对派辩护。三驾马车及其追随者用极为恶毒的语言进行答复;而且他们的答复充斥了各种报刊。

---

① 由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科和克里姆林宫5位医生署名的托洛茨基健康简报上谈到,托洛茨基患有流行性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扩张,持续发烧(未超过38°C.),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工作能力降低。医生们认为病人必须免除一切操劳,劝他离开莫斯科去进行"起码两个月的气候治疗"。简报是1923年12月21签发的,刊于1924年1月8日《真理报》。

结局当然在预料之中。由于投票完全被书记处操纵，因此只有3票反对谴责托洛茨基的动议。即使是根据季诺维也夫以及斯大林追随者们在会议上对反对派影响的估计，这次投票也是虚伪荒唐的，以至它只能成为粗暴可耻的笑料。[①] 但三驾马车蓄意违反所有正常政治行为的规范。他们的目的在于让全党知道，什么也阻挡不住他们，任何抵制或抗议都是徒劳的。各支部现在明白，不管他们多么愤怒或抗议，都不会对正式决议产生任何影响。仅此一点就足以显示出反对派的软弱无力，并使消极情绪在其队伍中弥漫开来。

1月18日，托洛茨基不等会议的裁决便出发到南方作缓慢的旅行了。3天之后，他乘坐的火车暂时停在梯弗里斯。就在那里，当火车还在调轨时，他收到斯大林发来的一封密码电报，通知他关于列宁逝世的消息。这个打击对托洛茨基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直到最后一刻，列宁的医生们还相信他们能够挽救列宁的生命，托洛茨基甚至比他们还坚信这一点。托洛茨基吃力地向各大报匆匆发了简短电文，哀悼已故领袖。他写道："列宁不在了。这几个字落在我们心坎上，如同巨石掉落在大海中一样沉重。"[②] 希望列宁还能回来制止三驾马车的阴谋活动、撕碎他们那恐吓性的决议这最后一点火花也已经熄灭了。

托洛茨基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是否应当返回莫斯科。[③] 他立即跟斯大林联系，征求他的意见。斯大林告诉他，已来不及赶回

---

① 根据李可夫的说法，皮达可夫在向莫斯科各党支部发表演说时获得了赞成反对派动议的多数票（参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83－91页。）雅罗斯拉夫斯基宣称，在首都卫戍部队小组讨论会结束之前，约有1/3军队党支部投票赞成反对派，绝大多数学生支部也是这样。同上，第123－146页。

② 托洛茨基：《论列宁》第166－168页。

③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50页。

来参加次日的葬礼,并劝他留在南方继续治病。事实上,列宁的葬礼是在数天之后即1月27日才举行的。无疑,斯大林居心叵测,他让托洛茨基在他们精心策划的葬礼期间继续留在南方,而三驾马车则通过葬礼向全世界表明,他们自己才是列宁的接班人。托洛茨基因发烧而感到头晕,因而从梯弗里斯继续前往黑海海滨疗养地苏呼米。在半热带的阳光底下,在棕榈树丛间,在这儿的含羞草和山茶花盛开时节,他每天久久地躺在疗养所的阳台上,独自回忆着他与列宁相联系的奇特命运:1902年列宁在伦敦第一次会见他时的友谊,他们之间随后的尖锐的意见分歧和最终的和解,以及在那狂风暴雨般的胜利年代里他同列宁并肩站在一起掌握着革命航船的舵轮。现在,仿佛他身上那胜利的一部分也随着列宁进了坟墓。

数不尽的往日回忆,降不下的热度,眼前一片阴暗,无限孤寂。此时,只有列宁那疲惫不堪、抑郁优伤的遗孀发来的一份温暖的电文给这个曾以他无比的英勇和才华震惊当今世界的人带来些许慰藉。她写道:列宁就在逝世之前还重读了托洛茨基已经写好的《论列宁》,显然深受感动,特别是对托洛茨基将列宁与马克思所作的比较;她希望托洛茨基知道,列宁直到最后一刻还保持着他们在伦敦第一次会见时对他形成的友好感情。①

不久,忧思又来咬噬他的心;病人的想象交织着昔日的回忆,直到他儿子廖瓦来信,才把他拉回到现实的苦恼中。廖瓦描述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富有戏剧性的宏大葬礼,无数群众列队走向列宁的灵柩;而他对父亲的缺席感到痛苦和惊讶。

① 过了好多年,当托洛茨基被流放之后,克鲁普斯卡娅告诉米·卡罗雷依伯爵夫妇:"他(托洛茨基)深深地爱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他得知列宁逝世的消息时,他昏厥过去了,失去知觉达两个小时之久。"参见《米歇尔·卡罗雷依回忆录》第265页。

看来，只在此时，当他读了年轻儿子的伤心沮丧的来信后才意识到，这次没有回莫斯科去也许铸成了大错。送葬的群众通过列宁的灵前，密切注视着守灵的政治局委员，却发现托洛茨基缺席。富有象征意义的葬礼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各种想象；他们怀着这种心情猜想托洛茨基没有参加守灵原因。是不是真的像三驾马车所说的那样，意见分歧使他与已故领袖闹翻了，或是因为他那“偏离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派性”呢？

托洛茨基的缺席不仅仅在莫斯科滋生了流言蜚语，还给他的政敌们留下了自由活动的余地。现在正是克里姆林宫里积极活动并作出重要决定的紧要关头。政府内及党内接列宁班的问题正以最正式的方式决定下来。李可夫占据了列宁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而李可夫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的职务由捷尔任斯基担任（李可夫之所以被指定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因为他一直是列宁的副手——倘若托洛茨基接受了副手这个的位置，就很难把李可夫提到托洛茨基之上）。三驾马车然后实施了更坚决的新图谋来控制军事人民委员部。他们撤销了托洛茨基的忠诚助手斯克良斯基在军事人民委员部中的职务，并派了一个代表团专门去苏呼米通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伏龙芝将接替斯克良斯基的位置——而一年之后正是这个伏龙芝接替了托洛茨基本人继任军事人民委员。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也在落实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反对反对派的决议：越来越多的反对派拥护者被开除、降级或受到惩罚。宣传部门开足马力确立对列宁的个人崇拜，在此名义下，列宁著作被当做福音书来引证，用以反对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和批评者，这种个人崇拜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思想武器”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三驾马车还窃取并实施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托洛茨基曾强调“无产阶级支部”的薄弱是党的官僚主

义怪胎的主要根源,并力促党从工人阶级中吸收更多党员。无疑,他的这个要求为他在工人当中赢得了同情。三驾马车决定立即在工厂中发动一次轰轰烈烈的征集新党员运动。但与托洛茨基建议的要小心选择所不同的是,他们却决定大规模地接受一切要求入党的工人,取消一切考察和各种条件。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他们建议一举接受10万名工人入党。在列宁逝世后,他们把党的大门开得更大:仅在1924年2月至5月间,就有24万工人登记入党。[①] 这无异是对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的嘲弄,这个原则要求,作为无产阶级优秀分子和先锋队的党只应接受在政治上成熟的并且经过战斗考验的人入党。在大量吸收进来的新党员中,政治上不成熟者、落后分子、思想麻木者、唯唯诺诺者、往上爬者和钻营私利者占了很大比例。三驾马车熙熙攘攘地用乐队、花车来欢迎新党员,鼓励他们,恭维他们,吹捧他们是带着敏锐和一贯正确的阶级本能和政治意识入党的。

这次征集新党员——"为纪念列宁征集"——似乎体现了工人阶级对列宁的自发忠诚,体现出党的年轻化。而事实上三驾马车正要以此向托洛茨基表示:"你鼓动工人反对官僚主义,鼓吹必须加强党内无产阶级成分,你以为这样你就能搏得工人阶级的欢心。但我们已经加强它了,我们用不着你的操心也做到了——我们已经把25万工人输送到党内来了。结果如何呢?党不是更光彩、更民主、更具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方向了吗?官僚主义不是已经削弱了吗?""为纪念列宁征集新党员"在实际上给三驾马车输送了一批俯首贴耳的追随者,他们很快就要驱使这批人去与反对派斗争了。托洛茨基深知对他观点的这种蛊惑人心的利用意味着什么;

① 参见莫洛托夫的《为纪念列宁征集新党员》报告,载《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516页及以后各页。

但他对"为纪念列宁征集新党员"却有苦难言。如果他说不同意，那就会引起一片鼓噪，被说成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伪君子；他起初假装渴望看到党内有更多的无产者，而现在却暴露出对他们的恐惧和自己真正的小资产阶级本性。因此，他只得对这种恶毒手法笑脸相迎，甚至不得不附和着公开颂扬为纪念列宁而征集新党员。[1]

在这样一个对他的命运和党的命运如此关键的时刻，托洛茨基忧郁地回避，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他的患病引起的。但更削弱他的是有一股潮流正逆他而动这种感觉。这是一股深不可测的潮流，他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它进行探测和评估。他的结论是：革命处于退潮，他与他的朋友们正遭受着反动风暴的袭击。反动的性质是混乱的，而且还在继续混乱下去：它在一定程度上看起来似乎是革命的延伸。他深信反抗是他的责任，但是他看不清用什么方法反抗，而反抗的前景又会如何。正是这股污浊肮脏的潮流使他后退了。他们在政治局里曾较量过的那些重大问题没有一个有明确的结果，一切都含含糊糊，最严重的问题也被降低到卑鄙肮脏的阴谋诡计的水平上。如果真像他的政敌们所断言的那样他贪图个人权力，那么他的行为无疑会截然不同。但是纵观他的一生，他总是躲避权力的争夺；也许他是半自觉地愿意摆脱出来，

---

① 托洛茨基于1924年4月11日在梯弗里斯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最近几个月来，政治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工厂工人大批涌进我们党的行列。这是(工人阶级)……表现自己的意志、投票信任俄国共产党的最好形式。……这是一场真正的、可靠的、完美的考验……远比任何议会选举真诚得多。"(引自托洛茨基：《西方与东方》第27页。)12年之后，托洛茨基回顾这场"考验"时写道："统治集团利用列宁逝世宣布'为纪念列宁征集新党员'……是一个政治花招，其目的是利用不成熟的、俯首贴耳的人来摧毁革命先锋队。……这场阴谋成功了……'为纪念列宁征集新党员'给了列宁的党以致命的打击。"《被叛卖的革命》第97－98页。

躲进他在高加索的忧郁和孤寂的生活中。

春天,他的健康有了起色,回到了莫斯科。党正在筹备预定在5月召开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全体中央委员以及资深代表在5月22日集会,听取一直由克鲁普斯卡娅保存的列宁遗嘱。列宁遗嘱的宣读犹如一个晴天霹雳。到会的人们极为困惑地听取遗嘱原文。遗嘱严厉批评了斯大林的粗暴和不忠诚,并敦促党把他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斯大林似乎要完蛋了。他的命运又一次面临着毁灭。在悼念列宁的庄严气氛里,在无限敬佩和宣誓"坚持列宁神圣遗言"的旗帜下,党若违背列宁的告诫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由于他未来的牺牲者的信任,斯大林又一次得救了。掌握着他的命运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急忙跑来搭救他。他们恳求同志们保留斯大林的原职。他们用尽一切热诚与表演的才能来说服同志们。他们说,不管列宁怎样归罪于斯大林,但错误并不严重,而斯大林已经有了很大的改正。季诺维也夫解释道,列宁遗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如果列宁本人能够像他们大家一样亲眼看到斯大林是怎样真诚努力地改正错误,他也就不会要求党调离斯大林了(其实斯大林的窘境正合季诺维也夫的心意,因为他早就防着斯大林,只是不敢撕破他们的伙伴关系。季诺维也夫一心希望斯大林感恩图报,使他仍能稳当三驾马车的车老大)。

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了托洛茨基:他会不会挺身而出揭穿这出闹剧而要求必须尊重列宁的遗嘱呢?然而,他一言不发,只是用皱眉、耸肩这样的表情来表示对这种滑稽场面的轻蔑和厌恶。他不肯在这个显然涉及他个人地位的问题上明确表态。于是列宁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建议终于未被采纳。但是这样做,列宁遗嘱就不能公布,否则会暴露出为了对列宁个人崇拜而举行的所有仪式的荒唐可笑。尽管克鲁普斯卡娅提出抗议,中央委员会仍然以绝对多

数票通过，将遗嘱扣起来不予公布。托洛茨基仿佛由于憎恶而麻木，僵坐在那里，始终保持沉默。[1]

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了。三驾马车要求代表大会用革出教门的威胁口吻再次诅咒托洛茨基。而早在1月间举行的权威性较小的代表会议上就已发出了这种诅咒。这次代表大会变成了恣意声讨托洛茨基的大会。季诺维也夫怒气冲天地声称："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千倍地坚如磐石。"[2]几个月前，他就催促他的同伴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甚至逮捕他；但斯大林冷静地拒绝了，反而急忙在《真理报》上声明说，不存在任何反托洛茨基的行动意图，党的领导集体没有托洛茨基是不可想象的。[3] 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再次跳了出来；在此生死攸关、孤注一掷的时刻，他要求托洛茨基不但要"放下武器"，而且要在大会上公开改变观点。他声称，只要托洛茨基没有做到这一点，党内就不会有和平。[4] 要求一个党员公开改变观点，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尽管这次代表大会是狂热诅咒托洛茨基的大会，但它也不能不感到震惊。克鲁普斯卡娅并不支持托洛茨基，但她仍提出强烈严正的抗议，反对季诺维也夫的"精神上难以忍受的要求"，广大代表起立向她鼓掌。[5]

---

① 担任会议秘书的巴扎诺夫曾对他目击的现场情况作了描述（《在克里姆林宫和斯大林在一起》第43－47页）。托洛茨基确认过巴扎诺夫记录的真实性（参见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76页）。在《被隐瞒了的列宁遗嘱》的小册子中，托洛茨基又补充了这一细节："在宣读列宁遗嘱时……拉狄克坐在我身边……他凑近我说：'现在他们不敢反对您了。'我回答说：'恰好相反，他们必然要开足马力来反对我，并且越快越好……。'"第17页。

②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112页。

③ 《真理报》1923年12月8日。

④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113页。

⑤ 同上，第235－237页。

托洛茨基只为自己辩护了一次。[1] 他的发言平静而有说服力,他含蓄地承认失败,但他坚决拒绝收回他的任何批评。他小心翼翼地不去火上加油,也不破釜沉舟。他答辩说,他的一切批评都是根据政治局关于新方针的决议,并且他说过的和写过的一切没有不是他的政敌们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说过或写过的。他甚至同46人中要求党内派别活动自由的某些人拉开距离。他说:"关于我支持派别活动这一指控是不正确的。的确,我错在关键时刻生了病,因而没有机会……否认这项及其他指控。……要想把派别和小集团区别开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又重复说,正是由于错误的政策、错误的党内制度,才使得本来只应是暂时的不同观点固定和强化了,从而导致"宗派主义"。对于季诺维也夫让他公开承认错误的要求,他回答道:

> 一个人在自己的党的面前承认错误,不论在道义上或政治上来说,都是再简单、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了不起的道德上的英雄气概。……同志们,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希望反对党是对的,或者可以是对的。最终说来,党永远是正确的,因为党是工人阶级为解决基本任务所掌握的唯一历史工具。我已经说过,最简单、最方便的事莫过于在党面前声明所有的批评、宣言、警告和抗议从头到尾都是错的。但是我不能这样说,同志们,因为我不是这样想的。我知道一个人反对党不可能是正确的。只有紧跟党并通过党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还没有创造出任何其他方法来实现人的权利。英国有一句名言"不管对与错都是我的祖国"。我们有更

①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153－168页。

多的理由说:不管对与错——也许在特定时刻、在某些局部的特定问题上错了——都是我的党。……在这里进行任何个人的申辩只能是可笑的、极不合适的,但是我希望,在必要时我会证明我绝不是布尔什维克最差的街垒中的一名最差的士兵。①

他结束辩解时说,他愿意接受党的裁决,即使这裁决是不公正的。但是接受裁决对他来说只意味着在行动上服从纪律,而不是在思想上。"我不能这样说,同志们,因为我不是这样想的。"在他那充满巧妙推理、犀利论据和动人呼吁的发言中,这些话以其极度质朴和坚定不屈而显得格外突出。托洛茨基的平静和克制激怒了党的书记们。服从而不屈服,遵守纪律而不忏悔,反而更冒犯了他们。他的声音在他们的耳朵里鸣响,仿佛就是他们自己不安的良心发出来的呼声;他们企图以辱骂来压倒他的声音。他们没有从他那儿得到任何答辩。只是当党代表大会闭幕时,他才前往红场向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儿童——"少先队员"的集会发表演说。他向这些"新的接班人"致意说,他们总有一天会来到革命的阵地上,取代那些年迈力衰、蜕化变质的人们。②

※ ※ ※ ※ ※

这时,整个共产国际都被卷入了论战。三驾马车不得不向外

①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165-166页。(重点号是我加的——伊·多·)

② 这篇演说辞附在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上。同上。马克斯·伊斯特曼出席了党代表大会,他回忆说,他曾敦促托洛茨基采取更富战斗性的态度,在主席台上宣读列宁的遗嘱,但托洛茨基不肯听从他的意见。托洛茨基于1928年从流放地阿拉木图致穆拉洛夫的信中证实了伊斯特曼的记载(托洛茨基档案)。

国共产党解释，并为他们自己的态度辩护。他们迫切希望从外国共产党那里得到对托洛茨基谴责的明确认可，以便将其带到俄国共产党中去。但是欧洲共产党——这些年里国际的影响实质上仍只局限在欧洲——因莫斯科所发生的一切而担心，对托洛茨基的猛烈攻击使他们震惊。对欧洲共产党来说，托洛茨基一直都是俄国革命的化身，是革命英雄史诗的体现，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由于他那欧洲化的言谈举止，他比其他任何俄国领导人对他们都更有吸引力。他曾经是轰动世界的共产国际宣言的作者，这篇宣言在思想上、语言上、风格上都使人们想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他既是共产国际的鼓舞者，也是它的战略家和策略家。欧洲共产党无法理解季诺维也夫这位共产国际的主席以及其他俄国领导人为什么要反对托洛茨基；他们担心冲突会给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后果。因此他们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去捍卫托洛茨基。

1923年年底之前，两个重要的共产党即法国共产党和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抗议莫斯科对托洛茨基的诽谤，呼吁敌对双方以同志式态度解决意见分歧。[①] 此前不久，布兰德勒刚刚代表他的党要求托洛茨基负责领导德国共产党计划中的起义。三驾马车厌恶这些抗议，并担心在俄国党内失败的托洛茨基会使共产国际转而反对他们。季诺维也夫从欧洲这三个党的行动中看到了对他的主席权威的挑战。

恰好在此时，共产国际因在德国刚刚遭到失败而不安。同失败联系在一起的许多问题，如导致失败的危机以及德国党的政策

① 苏瓦林谈到了法国共产党在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抗议。（《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371－373页）。波兰党的抗议载人波兰共产党档案（多伊彻：《两次大战期间波兰共产主义的悲剧》，载《现代报》1958年3月）。

这些问题已为争论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因而立即同俄国党内的争论纠缠在一起。①

德国的危机早在1923年法国人占领鲁尔地区时便开始了。德国人的抵抗烽火燃遍了鲁尔地区；很快，抗议凡尔赛条约及其后果的强大的民族运动席卷了整个德意志帝国。最初领导这个运动的是各资产阶级政党；而共产党则被撇在一边。但这些资产阶级政党因对运动的后果并无把握而开始摇摆起来，甚至退缩了，特别是当社会斗争预示着将加深政治动乱的时候。德国经济失去平衡，货币以灾难性的速度贬值。工人的工资因通货膨胀而不值钱，他们愤怒了，急切地要采取行动。自从1921年3月起义以来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人感到他们的革命风帆已经鼓满劲风。7月，德共中央委员会号召工人阶级作好发动一场革命的准备。然而，它对于自己领导革命行动的实力和能力缺乏信心；而所有关心其政策的人也不尽赞同行动。拉狄克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德国的代表警告莫斯科，德国共产党的看法过于乐观了，很可能会导致另一次流产起义。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则积极策动德国人举行起义，但又提不出任何明确的行动方针。在7月这一阶段，托洛茨基说，他对德国局势没有充分了解，无法发表意见。

托洛茨基很快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确实面临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不仅应当鼓励德国共产党采取一条大胆路线，而且应当协

① 关于德国危机的记载，其资料来源有：托洛茨基写的若干论文；布兰德勒写给本书作者的回忆和说明；路特·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塔尔海默：《1923年，一次错误的革命吗？》；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分析；库西宁的论文《德国事件的教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4年1月讨论德国问题会议的记录），载《捍卫列宁主义》；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和德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记录，在上述历次会议中，这个问题经过反复多次讨论，最后，从1924年起，在国际共产党报刊上范围更广泛的讨论继续进行了10年。

助它制订出一个以武装起义为高潮的明确的革命行动计划。起义日期应该提前确定，以便使德国共产党能在初级阶段就引导斗争，使工人阶级有所准备并根据最后决战的要求来部署其力量。但执行委员会举棋不定。不仅拉狄克，而且斯大林也同样怀疑“革命形势”的现实性，认为应该阻止德国人。[①] 季诺维也夫继续鼓动他们，但面对起义计划时却犹豫起来。政治局埋头于国内事务之中，讨论这个问题时草率随便；季诺维也夫将政治局的泛泛的意见通报给共产国际领袖们。国际多少有些敷衍地决定给德国共产党以关于革命的指示，协助它作好军事准备，最后，甚至连举事的日期也确定下来了。这个日期要尽可能接近布尔什维克起义的纪念日——它要成为“德国的十月”。

9月，德国共产党领袖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到达莫斯科，征求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意见。他早年当过瓦工，是罗莎·卢森堡的信徒，一位聪明谨慎的策略家和干练的组织者，他不相信局势对革命有利。当他向季诺维也夫吐露自己的疑虑时——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前夕也正是怀着同样的疑虑——季诺维也夫此时正在犹豫彷徨与渴望革命行动这两端之间无所适从，于是他虚张声势，甚至大拍桌子来压制布兰德勒反对起义的意见。布兰德勒屈服了。在他的党内，特别是在路特·费舍和阿尔卡季·马斯洛夫领导下的柏林支部中，行动的渴望和信心已经发展到了顶点。他认为他在莫斯科找到了同样的信心，因为他以为季诺维也夫是代表整个政治局说话的。他迟疑地得出结论：如果说唯一胜利了的共产党领导人同柏林人想到了一块儿，都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那么他就应当撤回自己的反对意见。

正如布兰德勒本人所述，在这关键时刻，他深感自己不是“德

---

① 参见本书作者的《斯大林政治传记》第393－394页。

国的列宁”，就要求政治局委派托洛茨基领导起义。但政治局却授权给拉狄克和皮达可夫代替托洛茨基。行动计划制订出来了，将以布兰德勒的家乡——萨克森州为中心，那里共产党的势力强大，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着州政府，他们与共产党已结成统一战线。布兰德勒及他的几位同志加入了萨克森州政府，利用他们的影响去武装工人。起义将从萨克森蔓延至柏林、汉堡、德国中部和鲁尔地区。根据布兰德勒的说法——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证词得到其他资料的证实——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把这个计划压在他的肩上。[①] 此外，季诺维也夫通过其在德国的代理人加快了事变的步伐，以至萨克森州的联合政府都是根据莫斯科发来的指示组成的；在布兰德勒返回德国途中，他从在华沙火车站买到的一份报纸上得悉，他已是一名部长了。[②]

即使德国的局势对革命有利，但牵强草率的行动计划以及远距离的指挥控制也足以导致失败。何况局势并不像以前所想象的那么有利，德国的社会危机也不像以前所想象的那么深刻。自从夏季以来，经济已开始复苏，马克币值稳定，政治气氛显得平静得多。中央委员会未能唤起广大工人群众准备好起义。武装工人的计划也失败了：共产党发现萨克森州的武器库里空空如也。中央政府从柏林派来一支远征军讨伐这个红色的州。因此，当起义的时刻到来时，在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的支持下，布兰德勒取消了战斗命令。只是因为联络上的错误，汉堡的起义者才投入战斗。他们孤军作战，经过持续几天无望的战斗之后，起义军溃败了。

---

① 路特·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第 311 – 318 页；季诺维也夫演说辞收入《德国事件的教训》一书中第 36 – 37 页及以后各页、《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 158 – 178 页和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

② 这是布兰德勒本人对本书作者讲述的。

这些事件对苏联是一次强烈的冲击。它们破坏了此后许多年中德国和欧洲的革命机会。它们使德国共产党士气消沉、四分五裂,并与波兰和保加利亚的类似挫折相呼应,影响到整个国际。它们造成俄国共产主义的一种深刻而明确的孤立感,一种对欧洲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怀疑——甚至藐视。从这种情绪中逐渐发展出俄国革命的孤芳自赏与自我中心的倾向,它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学说中体现出来。德国革命的溃败成为俄国人争权夺利的一个缺口。俄国和德国共产党着手追查失败的原因,并急于追究责任。在政治局中,三驾马车和托洛茨基则互相指责。

表面上看来,德国革命的失败与俄国党内争论之间没有联系。分歧的方向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抵触的。两位"托洛茨基主义者"拉狄克和皮达可夫一开始至少跟斯大林同样怀疑德国革命的可能性;正是他们支持布兰德勒取消起义命令。另一方面,季诺维也夫经过一番踌躇还是批准了以托洛茨基为其倡导者的起义计划;但是他也批准了撤销起义的命令。托洛茨基坚信德国党和共产国际错过了唯一的革命时机,而且认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起码负有跟布兰德勒一样的责任。三驾马车则回答说,现场葬送起义的是两个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抓住布兰德勒的"机会主义",坚持要撤掉他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职务。

面对布兰德勒,三驾马车的动机是复杂的。德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激烈反对他,柏林的组织嚷着要开除他。季诺维也夫急于平息吵闹,挽回他本人及共产国际的声誉,就想把布兰德勒当做替罪羊而撤掉他,任命费舍和马斯洛夫为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便把德国共产党变成了他自己的封邑。他想用布兰德勒杀一儆百还有一个原因,即他怀疑布兰德勒及其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朋友同情托洛茨基。在指责布兰德勒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时,季诺维也夫还企图让托洛茨基承担布兰德勒的"投降主

义"的罪责。最后,对这场龃龉实在莫名其妙的布兰德勒急于把德国问题从俄国争论中摆脱出来,并且力图挽回自己的地位,就声明支持俄国正式领导,即三驾马车。但是这样做也没能救得了他。

这就是 1924 年 1 月的形势,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会对德国起义失败进行正式调查。会议召开之前首先作了各种幕后策划,在外国各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内进行大换班,旨在预先确保执行委员会对季诺维也夫的支持。当执行委员会开会时,托洛茨基正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一个乡村里养病。他没有表明自己的观点,但他请求拉狄克转达他们两人对关于布兰德勒的降级处分以及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的人事变动的联名抗议。拉狄克虽然转达了抗议,但他主要感兴趣的是捍卫他本人及布兰德勒的政策,他的转达给执行委员会留下的印象是:托洛茨基本人与德国共产党的政策是一致的;这使三驾马车再一次把托洛茨基与德国共产党的"右翼"绑在了一起。① 事实上,托洛茨基从来没有停止对布兰德勒行为的批判;而且布兰德勒声明支持三驾马车这件事也没有给托洛茨基留下好印象。无论如何,托洛茨基从根本上是反对在莫斯科为外国共产党领袖设置"断头台"的。他认为,应当允许外国共产党从他们自己的经验和错误中学习,允许他们管理自己的事务,选举他们自己的领袖。对布兰德勒的处分开启了一个有害的先例。

因此,托洛茨基向共产国际提出他曾向俄国党提出过的内部自由的同样要求;但结果也是同样的。季诺维也夫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国际。好几位曾呼吁政治局克制对托洛茨基的疯狂攻击的外国共产党领袖被他免去了职务。另一些领袖则乖乖就范,并为

① 《德国事件的教训》第 14 页。另见托洛茨基就该事件于 1931 年和 1932 年写给 A.特伦特和 A.努伊拉斯的信,发表于 1938 年 2 月的《新国际》。

自己的舛误悔过。结果,虽然执行委员会对德国问题未能调查出明确结果,却使季诺维也夫的声誉完好无损;而且它还批准了由季诺维也夫提出的降级和晋升命令。这使他很快得到了国际对三驾马车反对托洛茨基与46人的行动的批准。

5月,在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所有的欧洲各党的新老领导人都在主席台上就座,响应对托洛茨基的挞伐。只有一位外国代表,即《人道报》编辑,半俄国血统半法国血统的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发出了反对的声音。他声明说,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22票对2票决定抗议对托洛茨基的攻击,因而不需要声明法国党与反对派一致。但是苏瓦林声明他本人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并且不会放弃它们。苏瓦林孤零零的声音只突出了托洛茨基的失败。[①]

一个月后,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即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为将托洛茨基革出教门盖上最后印记,附带对拉狄克和布兰德勒的谴责。路特·费舍的演说表达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典型情绪。这位巧舌如簧的年轻女人虽然缺乏任何革命经验和革命功勋,却是柏林共产党盲目崇拜的偶像。她攻击托洛茨基、拉狄克和布兰德勒是什么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以及"对德国和欧洲革命失去信心"的"革命原则的取消主义者"。她号召建设一个以俄共为榜样的坚如磐石的国际,在这个国际中,一切思想分歧和争论都必须排除干净。"这次世界代表大会决不允许把国际转变为各种倾向的大杂烩,它必须奋勇前进,踏上一条通向唯一的世界布尔什维克党的道路。"[②] 法国、英国和美国代表团的发言人也跟着鹦鹉学舌;而且在肆意咒骂和凌辱时,他们向托

①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371－373页。

②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175－192页。

洛茨基提出挑战，要他向代表大会陈述他的观点。[①] 托洛茨基拒绝介入任何争论。一方面，他感到一切争论都是无济于事的；另一方面，他已经受到若再卷入任何争论将被开除出党的威胁，这使他怀疑挑战是个陷阱。因此，他声明愿意接受俄国共产党的裁决，而无意就此向国际申诉。然而，他的沉默却被认为是其邪恶的证明：代表们充当了季诺维也夫的应声虫，穷追不舍地要求托洛茨基低头认罪。[②] 他置之不理。在整整三个星期的会议期间，代表大会听不到别的，只有对这一个人的肆意诋毁，而在以前的四次代表大会上人们曾怀着深深的敬慕倾听这个人的讲话。这一次没有一个声音敢于为他辩护了（苏瓦林由于翻译并出版了托洛茨基的《新方针》，现已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③] 但托洛茨基仍然为这次代表大会写下了宣言——他那几篇伟大的共产国际宣言中的最后一篇。他没有再当选为执行委员会的正式委员；斯大林取代了他的位置。

怎样解释发生在共产国际中的这种变化呢？仅仅几个月前，它的三个最大的党还有足够的勇气和尊严去谴责三驾马车。而现在一切都让位于屈服与自卑。同时，我们知道，季诺维也夫任意撤换、改组和分解了德国、法国和波兰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但是这三个中央委员会以及站在它们背后的党为什么会受他的摆布呢？大多数被撤掉的领导人从建党之日起就领导着党，并享有极高的道德威望；但是无论在哪儿都没有基层组织支持他们、拒绝接受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和拒绝承认季诺维也夫所任命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仅用了几个星期，至多不过几个月，就使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发

①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 1 卷第 550 - 559 页。

② 同上，第 2 卷第 156 - 157 页。

③ 同上，第 181 页。

生了看来是全面的剧变。而他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说明了国际内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弱点。唯有病残之体才如此不堪一击。

当列宁和托洛茨基创建国际时,他们期望起码是欧洲工人运动的多数很快都会集合于它的旗帜之下。[①] 他们期望国际的是它应确实名符其实:一个国际的党,超越了民族界限和民族利益的党,而不是像第二国际那样成为各民族政党客客气气的柏拉图式大联合。他们相信全世界革命进程的基本共性;这个 共性构成了他们观点中的核心,即这个新组织应该具有强大的国际领导和国际纪律。在 1920 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旨在给国际提供一个符合其目的的章程,此外也旨在以执行委员会建立一个集中的、强大的领导核心。托洛茨基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个章程。[②] 章程本身并非有意确保俄国共产党在国际中的优势地位。执行委员会以民主方式代表着所有的党。它的少数俄国执行委员在原则上并不享有特权。顾名思义,国际主义即民族国家的观点要服从整个运动的更广泛的利益,而肯定不是服从什么俄国的民族观点。如果革命在任何重要的欧洲国家里取得胜利,或者至少欧洲共产党在力量和信心方面有所增长,那么这样的国际领导和国际纪律就会变成现实。但是,欧洲革命的衰退使国际成了俄国共产党的附属物,欧洲各国共产党的自信心削弱了,而且年复一年地削弱下去。失败了的党逐渐形成了一种自卑感;它们最终指望布尔什维克这个唯一胜利了的革命实践者替他们解决问题、为它们排忧解难、给它们作出决定。布尔什维克承担起这份责任,起初是出于团结一致的愿望,尔后是出于习惯,最后是出于自私,直至热衷于操纵各党的"领导之弦",而外国各党则心甘情愿

---

① 《武装的先知》第十三章。

② 同上。

把他们自己套在这根弦上。国际领导和国际纪律事实上已成为俄国领导和俄国纪律。“二十一条”曾经授予列宁和托洛茨基寄予厚望的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广泛的权力，现在所有这些权力都几乎不知不觉地转到了执行委员会中的俄国委员手里。

列宁曾被这种情况所困扰。他提到恩格斯关于第二国际内德国社会民主党优势地位的预感，指出俄国共产党优越感的危害性也许同样严重。[①] 他试图给予外国共产党人更大的自主权，甚至建议把执行委员会从莫斯科迁到柏林或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以便排除来自俄国的利益和偏见的不断压力。然而，大多数外国共产党人宁愿看到他们的国际中枢留在安全的红都莫斯科，而不愿意让它暴露在资产阶级首都警察的迫害和袭击下。

结果证明列宁的担心是非常正确的。随着岁月的推移，执行委员会中俄国委员对外国共产党事务的干涉愈益频繁。季诺维也夫统治着国际，他只凭个人好恶，趾高气扬，既不老练，也不三思。但即使托洛茨基本人也察觉到，他作为执行委员会中的一名成员也不免行使监护人的权力，这是当时的情况所造成的。他作为共产国际法国委员会主席，有全权监督法国共产党人的日常事务。德、意、西以及英国共产党不论在重大问题上或其行动的细节上都渴望得到他的建议；而他也就无拘无束地提了意见。

这使他不断发表声明，进行大量通信，而这些信件本身构成了对这些严酷年头的历史的连续评论，它们富于深刻的思想，闪耀着智慧之光，而且常常是惊人的远见。[②] 但其中部分信件也反映了

---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286－288 页。列宁关于这方面更明确的评论在列宁在国际执行委员会上所作的声明中，未发表。

② 参见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五年》(英文版标题为《共产国际第一个五年》)第 1 卷和第 2 卷。

包办倾向。例如,他时而断然号召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弗罗萨尔(Frossard)去对抗在莫斯科的国际巡回法庭虽然严厉但并非不合理的指控,时而批评共产党员编辑,并为之规定策略路线,甚至规定报纸标题和语言风格。他还时而指责《人道报》发表可疑撰稿者的文章,时而又为法国共产党限定一个必须开除所有共济会会员及“一切野心家”——就像它以前做过的那样——的日期。有好几次,他还充当了对立派别之间的仲裁人并给他们制订规则。[1] 诚然,这只不过是少有的几个特殊例子。托洛茨基从未像季诺维也夫以及后来斯大林那样对他在国际组织中的副手们进行过恐吓拉拢。他总是希望他们能对俄国党内事务坦率地谈出心里话,如同他对他们党内事务也坦率地发表意见一样。如果说外国共产党人缺乏足够的自信谈出他们的心里话,那么这不是他的错。他始终把执行委员会当做一个真正的国际组织,从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则而不是从任何特殊的俄国角度出发去代表国际行动。他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去行使“二十一条”授予执行委员会的广泛权力的。

然而,俄国共产党轻而易举地利用自己的实际优越地位,以“二十一条”作为组织框架建立起事实上的俄国专政。这就是季诺维也夫在1923年以前干的事,即使那时他仍然受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约束。以后所有的约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尤其是,内部民主在俄国共产党内凋零之后也不可能在共产国际内残存下去。“包办主义”的习惯渗透了整个运动;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首领们不但把他们自己看做是俄国工人阶级的监护人,而且也看做是世界工人阶级的监护人。

1923年到1924年间,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果然着手按照新的

---

① 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五年》第124-184页;罗斯默:《列宁领导时代的莫斯科》第236-260页;弗罗萨尔:《同列宁相处的日子里》。

俄国形象重塑欧洲运动，他们不能容忍共产国际内的反对派，一心想将其扑灭在他们自己党内。正如他们曾经利用俄国1921年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禁令摧毁托洛茨基在国内的影响一样，现在他们也在“二十一条”的名义下利用手中掌握的广泛权力摧毁他在国外的影响。无论是1921年的禁令，还是“二十一条”，托洛茨基都曾签过字。他的政敌们对其行动的策划使得他们进行的每一步看起来都完全是在运用托洛茨基的原则和惯例，这些原则即便不是他首创的，起码也是经他同意的。他们是在用托洛茨基自己的武器来打倒他——而他却从来没有用这些武器来达到任何类似的目的，从来不具有类似的残暴。他只是偶尔用纪律制裁来吓唬一下外国共产党人，他的政敌们却整批整批地把他们降级、开除乃至对他们指控。托洛茨基曾经要求共产国际应按其纲领不得宽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共济会和“社会护国主义”。但他的政敌们则从中清除迄今为止几乎就是共产主义同义语的“托洛茨基主义”。

※　※　※　※　※

5月，俄国共产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结束了随着新方针的宣布而开始的争论。托洛茨基如果重开争论，就不能不招致破坏纪律的指责；而且他也无意重开争论。他曾以赞赏的口吻描述过饶勒斯的自我纪律约束——一旦需要就会把“他的牛脖子套在党的纪律的牛轭下”。他现在就是把自己的脖子套在更坚硬的牛轭下，克制着不去公开讨论已宣布为禁区的党的经济政策和内部体制。但他不甘被打上“偏离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半孟什维克这种罪名的烙印。既然不准讨论重大的、原则性的政策问题，他便转向历史来为自己辩护。这个机会自动到来了，国家出版局为了贯彻中央委员会原先关于出版托洛茨基全集的决定，正准备付印

全集第3卷,该卷收录了托洛茨基1917年的演说和文章。他自己写了长篇序言,题为《十月的教训》。全集第3卷于1924年秋一问世,立刻掀起了一场风暴。

托洛茨基在1917年发表的演说和文章对把他丑化为不肯悔改的孟什维克是一个强有力的回击,因为它们使党重新记起他在革命时期的作用和他用以对抗孟什维克的坚定的战斗意志。这一提醒是必要的。因为人们对于国家、各社会阶级和各政党的历史记忆总是短暂的,特别是在大动乱时期更是如此。在这样的时期,一年里各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事件会从人们头脑中挤掉先前多年的事件;在政治生活中一代又一代人会以飞快的步伐相互交替;参加早期斗争的老战士在人数上迅速减少、分散或精疲力竭;而年轻人投入新斗争时对过去所发生的事都不太了解。到1924年时,那些从1917年早期就已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已不足党员人数的1%。对于广大年轻党员来说,革命已成为一种神话:革命的壮丽和革命的朦胧仿佛是水天一色。早期政治斗争及其所有那些纠缠不清的结盟显得愈益遥远和飘渺了。比如说,年轻的共产党员总是想当然地以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就像在他们记忆里那样总是彼此敌对、势不两立。对他们来说几乎不可思议是,多年里双方竟然在同一个党里形成两个派别,援引着共同的原则,却又彼此争吵,彼此分裂,同时又不断地试图调和。更不可思议是,许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居然直到1917年还想方设法同孟什维克和好。

因此,当年轻人得知军事人民委员曾是一个孟什维克或半孟什维克时,不免大吃一惊;当三驾马车坚持说一个人一旦成了孟什维克就永远是一个孟什维克时,许多人就不由得相信了他们。人们要想从根本上动摇这种相信,唯有仔细阅读托洛茨基在1917年的演说和文章,它们揭示出最近反托洛茨基的运动只是弥天大谎。托洛茨基就是这样仅仅靠重版他的旧文章向他的政敌提出了挑

战;但是,他的直接挑战还是长篇序言《十月的教训》。

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对党的历史和传统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这个解释不仅为他自己申辩,而且也批判了他的多数政敌的历史。他写道,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泾渭分明的时期:为1917年作准备的革命前年代;1917年的决定性考验;革命后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其各自的问题、特点及其重大意义。但唯有在第二时期布尔什维主义才达到最高峰。一个革命党在实际革命中接受考验正如一支军队在实际战斗中接受考验一样。对其领袖和成员的判断应当根据他们在这场考验中的行为;相比之下,他们在革命准备时期的行为就不那么重要了。对一名布尔什维克的判断,不应当根据他在1917年革命前混乱的、部分说来是"毫不相干的政治流亡活动"中的言行,而应根据他在1917年革命时期的言行。托洛茨基的这个论据尽管具有不带个人色彩的历史叙述方式,但确实是为自己辩护:他在革命前与孟什维克的结合是毫不相干的政治流亡活动,而他作为十月起义领袖的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根据同一标准,他的政敌们的历史活动却是不利于他们的。他们在革命准备年代里也许是优秀的"列宁主义者",但在1917年革命时期,他们则成了无能之辈。

托洛茨基谈到了党在1917年经历过的两大危机:第一次是在4月间,列宁不得不克服来自党内右翼亦即列宁本人称之为"老布尔什维克"的阻力才说服全党制定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第二次是在十月革命前夜,同样是这帮右翼分子阻挠起义。托洛茨基指出,某些领导人的踌躇和失误并没有阻挡住布尔什维克的伟大胜利。党是富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尽管也存在着阻力和意见分歧。然而,布尔什维克应当认清这个事实:即使一个革命的党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保守分子,他们阻挡党的前进,特别是党面临急剧转变关头并且必须采取大胆决定的时候。托洛茨基在第一个例子中提出的论

据,其锋芒不仅直接指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名"破坏革命的工贼",而且还指向反对列宁在1917年的革命政策的李可夫、加里宁以及其他老近卫军的领导人。实际上,托洛茨基唤起了对三驾马车作为布尔什维克原则的唯一真正阐释者这种权利的怀疑,更广泛地说,是对老近卫军自诩纯而又纯地代表列宁主义传统的怀疑。他的叙述所包含的意思既含蓄又明白,即这个传统决非人们所以为的那样简单和一成不变:老近卫军所代表的是列宁已放弃了的那个"老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它固守着过时的口号和不合潮流的怀念,而托洛茨基的立场则与1917年党在其旗帜下取得胜利的那个布尔什维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托洛茨基从历史与时局分析又谈到最近的重大事件,即共产主义在德国的失败。他的《十月的教训》一文中的主题是关于党对革命形势的领导以及起义的战略和策略。他说,任何一个共产党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革命时机,因为革命时机只能是社会制度相对缓慢衰朽的结果;但是一个党可能会因为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而错失良机。在革命事业中也会有高潮到来,那就必须"充分利用";一旦错过,也许几十年内它不会再来。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长久生存于尖锐紧张的社会危机中。如果这个社会不能通过革命摆脱那种紧张局面,那么它就将趋向反革命。至于是转向这个方向还是那个方向,很可能仅仅取决于几个星期或者几天。如果在这几个星期或几天内共产党人在革命起义面前畏缩不前,拖延行动,如果以为革命形势可以延长、还会给他们提供新的时机,那么,"他们的生命航船必将搁浅触礁。"如果十月起义的反对者得逞,布尔什维克的航程也必然遭此同样下场;而德国共产主义航船正是这样在1923年搁浅触礁的。革命的领导所起到的决定作用,俄国为之提供了正面的证明,而德国提供了反面的证明。与布尔什维克右翼分子在1917年所表现出来的保守心态相同的心态就是德

国革命失败的根源。托洛茨基的结论刺向什么人，那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曾在 1917 年十月革命时充当布尔什维克右翼分子的代言人而现在是共产国际主席的那个人。

三驾马车以大规模的反扑来作答；他们号召大批宣传家、历史学家甚至外国的共产党作家进行反击。[①] 在整个秋冬两季，国家的政治生活完全被这场论战所淹没了，但它却以“文字辩论”这一古怪的名称载入布尔什维克的史册。由于无法断然否定托洛茨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 1917 年的态度所作的陈述，他们的辩护者就回答说，他无限夸张了他们的错误，他们与列宁之间的分歧只不过是偶然的、表面的，党内从未存在过什么特殊的右翼或保守的意见倾向。他们说，托洛茨基这种蓄意编造的目的就是不仅要诋毁老近卫军的声誉，而且要诋毁整个列宁主义传统，并且要将整个臆想出来的功绩都归于自己和托洛茨基主义。

为了证明这一点，三驾马车及其历史学家们不得不以他们自己对 1917 年事件的看法来对抗托洛茨基的解释，意在提高自己的威望、贬低托洛茨基所起的作用。他们这样做时开始还是羞羞答答的，但很快就肆无忌惮地任意歪曲事实真相。托洛茨基所起过的卓越作用起初还未被一概否定；但是据说它并没有超过他现在的政敌们所起的作用。然后斯大林本人又插进他自己的看法。他声称，托洛茨基所主持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根本不是十月起义总部，并不像迄今为止所有的历史记载毫无例外地所肯定的那样。至于那个多少是虚构的“总部”，斯大林还断言，托洛

① 答复托洛茨基的最重要的文章被汇编成篇幅浩大的一卷《捍卫列宁主义》——它的撰稿人有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索柯里尼柯夫、克鲁普斯卡娅、莫洛托夫、布勃诺夫、安德烈耶夫、克维林、斯捷潘诺夫、库西宁、科拉罗夫、古谢夫和梅利尼昌斯基。

茨基甚至连它的成员也不是,而是由他斯大林坐镇之下指挥起义的。[①] 这一说法是如此荒唐,以至连斯大林派成员开始时也只是把它当做令人困窘的一个讽刺。但是这个故事一经抛出,便开始固执地挤进新的历史记载,一直写进教科书里,在那里被当做唯一权威性的定论,一直延续了30年。对历史的天方夜谭式的篡改就这样开始了,它顷刻间以排山倒海之势淹没了俄国理性的地平线:最初这只不过是为了支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声誉,但最后,他们两人连同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以及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也都被打成为十月革命的怠工者、叛徒和外国间谍了。而在1924年,这个篡改阴谋的大多数未来受害者却抱成一团,丧心病狂地要给托洛茨基抹黑。

然而,只要托洛茨基站立在1917年事件的基础上,他的地位就是无法动摇的。因此,三驾马车竭力要把他从这个基础上推回到革命前时期,即他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时期。他们确立了两条准则:一条是党的政策具有严格的连续性,另一条是党的政策在实际上的一贯正确性。他们断言,不论是谁,只要像托洛茨基那样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一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那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这种错误在他以后的态度中也会表现出来。这两条准则的发明者拙劣地摹仿宿命论,向党的头脑里灌输了一种思想,即:任何政治上的错误或偏离,不论是集体的或个人的,都不能视做是偶然现象(当然,这条规律不适于三驾马车自己的错误);在任何一个特定集团或特定个人的特定表现中,如小资产阶级等,每一个错误都有其深刻的原因或"根源":一个人若犯了严重错误,就会背上致命的原罪重负;因而托洛茨基的堕落可以追溯到他早先的孟什维克时期,不仅仅在于"流亡时期的政治活动",而且还在于他对当时重大问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84－287页。

题的基本立场。在十月革命那段时间里，他那小资产阶级灵魂在拼命邀宠；党希望帮助他，“同化”他。但是他那顽固的孟什维克劣根性却一再发作。

据此而论，托洛茨基自革命以来同列宁的不和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邪恶意义。他与列宁有过两次重大分歧：一次是关于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另一次是关于工会政策（其他的意见分歧由于列宁自己承认了错误而被忽略不提）。无数的小册子和论文发表了，抓住这两件事大做文章，重新加以发挥，以证明托洛茨基在这两件事上都表现出根深蒂固的反列宁主义倾向，并将他同列宁的龃龉跟他对列宁继承者的攻击直接联系起来。昔日争论的来龙去脉、实际的结盟、动机、踌躇不决、自我矛盾以及人的素质和论战者各自的缺点，在重新解释时都一概不予考虑。呈现在党面前的只是党自身和党的领袖们的画像，它们就像中世纪初以“最后的审判”为主题的那些壁画一样：圣者满脸虔诚的表情迳直攀向天堂，而罪人则负载着一切罪恶的象征被抛进地狱。

争论的问题时前时后，最后又回到1905—1906年，托洛茨基所有的错误和背离的基础终于在他的不断革命论中找到了。这被判为他的主要异端邪说。但是自从1917年以来，党对于这个理论一直未持什么异议；托洛茨基这方面的早期论文作为对共产主义的权威论述都已经以原文重版并译成了许多文字。甚至直到现在，它的两个主要原则——俄国革命必须从资产阶级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这将是世界革命的序幕——还仍然是党的看家思想；对这两个原则是不能公开驳斥的。政敌们就把列宁在1906年时作过的些许尖刻评论挖掘了出来：列宁本人一直坚持俄国革命只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并且说，托洛茨基谈到社会主义是其顶点，这是因为他“跳过了”资产阶级阶段，“低估了”农民的重要性。从1917年所发生的一切来看，这些评论已失去了现实意义。但是这

并不能阻止他的政敌们轮番地重复说,托洛茨基的主要倾向是"跳过必要的中间阶段"和"低估农民"。不错,很难使这个指控同另外一个罪名协调一致,即托洛茨基是一名不肯悔改的孟什维克——因为孟什维克远没有"跳过"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也不肯超越这个阶段——而要解决这个逻辑困难,就必须拿出大量纯学术的论据来。然而,如同所有这类争论一样,重要的不是论据的逻辑性和历史真实,而是它的言外之意,是它对当前政策的影响和它对不明真相者所造成的印象。

强调托洛茨基的"低估农民"的倾向对当前政策的影响是个重点:三驾马车和李可夫甚至一年前就给托洛茨基贴上了"农民之敌"的标签。现在他们更是赋予这个标签以追溯的合法性和历史的色彩。但是更重要的是那意味深长的言外之意。在一般人的理解中,不断革命就是意味着连续不断的动乱和永无止境的斗争,意味着俄国革命不可能安定下来并获得稳定的局面。三驾马车对不断革命论的谴责显然迎合了渴望和平与稳定的普遍心理。

的确,托洛茨基的理论宣称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命运在根本上取决于革命向国外的扩展。然而,扩展革命的希望已经多次落空,最近又在德国遭到最严重的挫折。布尔什维克从未感到这样孤立过。他们对俄国革命能够自我满足的得意感遂成为他们的心理防御。托洛茨基的理论冒犯和嘲弄了这种意识。因此,只要一提到不断革命论,就会在布尔什维克的干部中激起强烈的反感。他们在感情上巴不得让托洛茨基的理论思想声望扫地。1924年秋,斯大林将自己早先的观点加以修正,形成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与不断革命论相对抗,这绝不是偶然的。斯大林颂扬俄国革命的自足性,并以此给党提供理论上的安慰,补偿了它那受到挫折的国际主义愿望。[①]

---

① 参见《斯大林政治传记》第281-293页。

不难看出,"文字辩论"为什么和怎样前所未有地削弱了托洛茨基的地位。它在公众心目中竖立了一个矛盾的托洛茨基形象,一方面是个顽固的半孟什维克,另一方面又是个同样顽固的"超级激进派"和极端分子,力图把党拖进国内外的冒险事业中去。据说,在国内,他拼命在布尔什维克党与他从不理解的农民之间挑起纠纷。在国外,他总是在并不存在革命时机的地方看到革命时机。同样的错乱导致他反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条约,并因为德国革命的失败而谴责季诺维也夫。至于托洛茨基曾批评季诺维也夫鼓励国外的流产起义,他曾反对 1920 年向华沙的进军,他一贯坚持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正常化,他第一个拥护新经济政策以便安抚农民,所有这些以及与此类似的跟超级激进派冒险分子形象格格不入的事实全都被抛到了一边。于是,事实、虚构、学术上狡辩遁词凑成了一锅大杂烩,使托洛茨基成了一位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也许他是可怜的,但也是危险的,唯有三驾马车的英明机智和政治家的才干才能抑制他、使他无害。

不少党员,甚至托洛茨基自己的一些追随者也都认为他的《十月的教训》一文中选错了作战阵地。① 他们说,托洛茨基应该抓住重要的问题,而不是纠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 1917 年的错误。诚然,他这样做是出于自卫,因为三驾马车巨细无遗地罗织有关他与列宁不和的那些久已淡忘的往事以阻挠他讨论当前问题。但是,多数人很快就忘了"谁发动了这一切",而且他们谴责托洛茨基时也并没有捐弃前嫌。官方作家们利用被扣压的列宁遗嘱来对付他,列宁在遗嘱中请求党不要揪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历史错误"不放。甚至没有忘记这一告诫的克鲁普斯卡娅也被说服出面指责托洛茨基过分夸张了列宁与其学生们之间的意见分歧,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第 90 页。

理由是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党和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立场，而不是领导人小圈子里的分歧。① 这是一个有力的批评，它指责托洛茨基反对提倡党内民主。布尔什维克的自尊心不管怎样都已被托洛茨基挫伤了，在他看来，党的领导集团只不过是一帮懒惰迟钝的家伙，若没有列宁的鞭策和推动，他们是绝不去履行自己的职责的。

争论的另外一个后果也极大地困扰着托洛茨基。被驱散了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的一些人，虽然一直对托洛茨基恨得要死，现在却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② 这是无法避免的。在一党制下，一些被政府镇压的敌人无法打出自己的旗帜进行斗争，总要向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的重要人物暗送秋波，哪怕他属于执政党，也不管他持的是什么不同政见。被统治集团诬称为自己危险敌人的每一个人都被他们视为自己的英雄。托洛茨基所要求的言论自由的环境即使只限于党内，也使他受到至少某些反布尔什维克分子的赞扬，他们由于没有言论自由而感到前途暗淡。但在反布尔什维克分子中，这绝不是主流态度。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者绝大多数人是以幸灾乐祸的心情看待应为他们在内战的失败承担罪责的那个人垮台的。三驾马车则尽可能利用在党外所能察觉到的对托洛茨基的任何同情迹象，不管是真是假；而托洛茨基则愈加谨慎地不说不做任何可能鼓励这种同情的事。他的这种态度大体上说明了他为什么要自我克制和保持长期沉默，面对共同敌人时他为什么一再强调他与三驾马车的一致。

最后，“文字辩论”对三驾马车本身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结果

---

① 克鲁普斯卡娅：《评十月的教训》，载《捍卫列宁主义》第152－156页。

② 马·伊斯特曼：《列宁逝世之后》第128－129页；巴扎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在一起》第86页。

是所有主要的论战者都身败名裂,唯一例外的是斯大林,他的声望反而增强了。托洛茨基集中攻击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曾明确反对十月起义,并被载入史册。而斯大林在1917年时态度更不明朗、更加含糊,因而现在也就更难抓住他的把柄。诚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眼下正需要斯大林的精神支持;而且他们满意地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优秀"布尔什维克"的褒奖。[1]这使斯大林当仁不让地成了三驾马车的车老大。托洛茨基就这样无意中帮助打败了自己未来的盟友,提高了他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的地位。

※　※　※　※　※

《十月的教训》一文所掀起的这场风暴使托洛茨基的军事人民委员再也当不下去了。三驾马车声色俱厉地说,他们不能让他承担这个国家军事防务的重任,尽管一年前他们还害怕接受他的辞呈。他们现在公然要把他撵出军事人民委员部了。

无论在斗争的哪一个阶段,托洛茨基根本就没有生过动用军队来反对他们的念头,他甚至制止自己的追随者们去干这种事,例如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就曾试图把军队支部拖进论战,而根据党的规定和条例,军队支部是有发言权的。应该补充的是,官方发言人也从来没有拿比这更严重的过失来指责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不存在任何准备政变的阴谋,这点没有丝毫疑问;而且他们不止一次承认托洛茨基的缓冲影响。[2] 如果有人暗指他怀有波拿巴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83页。[斯大林捍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说他们是"优秀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声明文本,在他著作中多少降低了调子(可对照原载于《捍卫列宁主义》中的声明,第88~89页),但仍说得十分清楚。]

② 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甚至官方发言人也提到托洛茨基的缓冲影响,参见罗明纳兹的演说,载《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第113页。

式的野心,那也不过是在私下里的流言蜚语而已。托洛茨基没有受到这类指责:即利用他的军事人民委员的地位策划什么活动来为自己捞取政治上的好处。托洛茨基承认政治局理所当然地具有统辖军队的权力。因此,尽管他不无抗议,但仍然接受了他的追随者从他的军事人民委员部最重要的岗位上被免职与调离,而他的敌手被任命来取代他们。[①]

倘若托洛茨基策动军事政变,他是否会成功呢?这种设想是无稽之谈。在冲突初起之时,即在总书记动手调换并清洗军队中的党务人员之前,他成功的机会还是很大的,以后就很渺茫了。他也从未试图利用这些机会。他深信任何军事起义宣言对于革命都是无可挽回的的失败,即使它涉及到他自己。他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声明,他将党看做是"工人阶级为解决其基本任务而拥有的唯一历史工具";而他不能尝试用军队的手来打碎这个工具。他认为,在与党的任何冲突中,军队只能依靠反革命势力的支持,这就判定了它将起到反革命的作用。不错,他看到党的"蜕化变质"。但这仅仅在于领袖与基层群众间存在着裂痕,在于党失去了民主基础。在他看来,任务在于重建那个基础,在于弥合领袖与群众之间的裂痕。归根结底,革命的得救只能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复兴,只能存在于社会深处。"自上而下"的军事行动却只能引来一个比现政府更悖离工人民主的政权。这就是"事物本身的逻辑";他不相信他能对抗这个逻辑。他把个人的命运和行动置于能决定事变进程的那些社会力量的框架之中;他认为自己的作用从属于这些社会力量。他的目标,亦即复兴无产阶级民主,支配了他对手段的选择。

在 1924 年整整一年里,军事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权一点点地从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 2 卷第 253 – 254 页。

他手中失去了。三驾马车通过伏龙芝和温什利赫特(Уншлихт)逐渐控制了军队的全体政治委员;现在他们将武装力量拖进党内冲突里来已经毫无顾忌了。他们把谴责托洛茨基发表《十月的教训》的决议送到军队支部去讨论,同时还召开全国政治委员代表会议,将解除托洛茨基的军事人民委员职务的动议提交给他们。这时托洛茨基又一次害上了疟疾病,看来他甚至都没有向政治委员们说明他的情况。代表会议名正言顺地通过了解除托洛茨基职务的动议。不久,他又遭到来自革命军事委员会党支部的同样攻击,这个委员会自从创建时起就一直是在他的主持之下的。更有甚者,1925年1月17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托洛茨基事件"列入了第一项议程。

1月15日,托洛茨基致信中央委员会,为因病不能参加即将召开的全会表示歉意;但是他声明他已推迟了预定离开莫斯科的日期——他打算再赴高加索休养——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回答询问,作出解释。他抑制着愤懑,简明扼要地答复了给他罗织的一些主要罪名——这是他对《十月的教训》批评家们的唯一答复。然后,他要求立即解除他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声明说:"我随时准备完成中央委员会指派给我的任何工作、接受任何职位,或没有职位都可以,当然是在党所监督的任何条件下。"[1]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政治局里建议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但斯大林又一次拒不答应,这使他们大为光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禁疑心他是要牺牲他们而跟托洛茨基讲和。中央委员会决定,托洛茨基可以继续留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但是又一次以开除来威胁他,如果他再挑动新的争论的

① 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员会信的全文载于伊斯特曼著的《列宁逝世之后》第155-158页。

话。[1] 然后中央委员会正式宣告"文字辩论"结束;但同时又指示,所有的宣传机构继续开展一个宣传运动,"使全党都能了解……从1903年开始直到《十月的教训》为止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布尔什维克性质"。另一个宣传运动是让全国——不仅仅是党员群众——都知道托洛茨基主义对"工农联盟"的危险性。因为不准托洛茨基申辩,这就成了"单方面的争论"。中央委员会最后宣布,托洛茨基不能继续留在军事人民委员部里工作。

就这样,带着被涂满耻辱的一世英名,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叫骂声,甚至都不许为自己申辩,他离开了他在漫长而又关键的7年里所领导的军事人民委员部和苏联红军。

① 波波夫:《联共(布)党史纲要》第2卷第216页;《苏共决议汇编》第1卷第913-921页。

第三章

“生活不仅仅是政治……”

《生活不仅仅是政治……》，这是托洛茨基 1923 年夏发表于《真理报》上的一篇短文的标题。[1] 尤其是对他本人，生活更不可能仅仅是政治。即使在为权力而斗争的最紧要关头，文学和文化活动仍然占去了他的大部分精力；当他离开军事人民委员部以及党内争论暂时停息下来后，他更是深深沉浸于其中。这并不是他想逃避政治。他在文学、艺术和教育方面的兴趣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来仍然是他政治活动的延续。但是他不肯停留在公共事务的表面现象上，他要把为争取权力而斗争转为为革命的“灵魂”而斗

① 《真理报》1923 年 7 月 10 日；《托洛茨基全集》第 21 卷第 3－12 页。

争;从而他把自己卷入其中的冲突推向了新的广度和深度。

从以下几个事实中可以看出,在政治局里的冲突最严重的时刻他还是多么专注于文学工作。1922 年夏,当他拒绝担任列宁的副手——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并因为继续告假而招来政治局的谴责时,他仍把大部分假期都投入在文学批评上。国家出版局收集了他在革命前有关文学的论文,要把它们在他的全集中作为专门一卷重版,他打算写一篇序言回顾革命以来俄国文学的状况。这篇"序言"的篇幅越来越大,终于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他几乎把他所有的余暇都投入进去了,但仍然没有写完。他在 1923 年他第二个夏季休假期间又继续写下去,当时他跟三驾马车的冲突已因对德国革命前途的估计不同而复杂化,并发展到了高峰;而这次他带着一本新书的手稿《文学与革命》回到了莫斯科,准备将它付印。

同年夏天,他还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俄国革命后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日常生活问题》一书。其中讨论的题目有:新政权下的家庭生活;"有文化的与没文化的"官僚主义;"文明与礼貌";"伏特加、教堂、电影院";"俄语中的骂街";等等。他曾在教育工作者、图书管理员、鼓动员、新闻记者以及"工人通讯员"的许多会议上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痛贬充斥于出版物上的枯燥、庸俗和沉闷,并力主恢复被党的行话和陈词滥调所淹没了的俄罗斯语言的纯洁与活力。同年夏天及随后的秋天,他探讨了多种多样的主题,如 19 世纪和 20 世纪贸易周期的比较分析(他在《社会主义科学院通报》上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简短而颇有影响的论文)[1] 以及心理学上巴甫洛夫与弗洛伊德两大学派之间的论争。他早就熟悉弗洛伊德的学说;他还研究了巴甫洛夫的著作,并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 12 卷第 357－363 页。

打算出面调停这场争论，呼吁研究自由和实验自由及对弗洛伊德学派的宽容。1924年，他还撰写了有关列宁的生平传略，并成书出版。他在其中表现了这位布尔什维主义奠基人所有人性的方面，因而含蓄地对官方塑造的列宁“圣像”和刚露头的对列宁的个人崇拜提出批评。

在这些论著中，他力图从根本上打击困扰革命的社会邪恶，而不仅仅攻击它的表面现象，他认为俄罗斯母亲精神上落后的严重性并不亚于她的经济落后。他谈到“文化原始积累”的必要性至少是同工业积累的必要性同样紧迫。他揭示了斯大林主义借以生长的土壤，并力图改变它得以繁荣的气候。所以，他强调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以及日常生活“小节”的重要性，指出了这些方面是如何影响国家大事的。他对这些问题的出色论述体现在他对俄罗斯特有的骂人习惯的议论中：

> 粗话和骂人都是奴隶地位和蒙受耻辱的遗产，是对人的尊严——自己的尊严和别人的尊严的侮辱。……我很想知道，我们的语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是否了解在任何其他语言中有无像俄语中这样粗俗的、肮脏的、低级的骂人字眼儿。据我所知，在国外不存在或者几乎不存在这一类玩艺儿。我国下层阶级的污言秽语是失望、痛苦的结果，尤其是毫无希望和出路的奴隶地位的结果。我们上层阶级的污言秽语，出自达官贵人和政府官员之口的污言秽语乃是阶级统治、奴隶主们的骄奢淫逸和不可动摇的权力的直接后果。……俄语中这两股骂人的语流——脑满肠肥的老爷、官吏和警察的骂人语流和人民大众的饥饿、绝望和备受凌辱的骂人语流——将整个俄国生活涂上了一层可鄙的色彩。

然而，革命的主要目的在于唤醒被认为没有个性的那些群众的人的个性。尽管革命有时也有残酷的行为，也偶然采取血腥无情的手段，但革命的标志却是……对个人尊严的日益尊重、对弱者的日益关怀。如果革命不以其所有的力量和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帮助——如果它不帮助在历史上遭受双重和三重奴役的妇女走上个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道路，那么这个革命就不配称为革命。如果革命不尽一切可能来关怀儿童，那么这个革命就不配称为革命……它就是为了儿童的利益而进行的。但是，在被老爷们和奴隶们那无所顾忌、不放过一个人和一件事的咆哮、清脆洪亮、雷鸣般的骂声毒化了的气氛下，人们怎么能创造……一种基于互相谅解、自尊自重、真正的男女平等、……充分照顾儿童的……新生活呢？为反对"下流语言"而斗争是心理卫生的必要条件，正如为反对肮脏和寄生虫而斗争是生理卫生的必要条件一样……。

代代相传并且渗透整个生活环境的心理习惯是极端顽固的。……我们在俄国经常是竭尽全力地向前猛冲一下，然后又让事情照旧进行。这不仅是没有文化的群众的写照，而且也是我们现今社会制度中那些所谓负责任的先进分子的写照。无可否认，革命前的旧式下流语言直到十月革命后6年的今天还在使用，甚至在"上层"社会也十分流行。……我们的生活是由最鲜明的对立所构成的。[①]

① 《真理报》1923年5月16日；《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26－31页。

在跟这样一种植根于农奴制、顽固而又复活了的生活方式的传统进行斗争中，托洛茨基必然遭受到如同在政治领域所遭受到的同样惨重的失败。但他已经深刻、历史地洞见了自己将被其毁灭的那些力量的性质。“俄语中这两股骂人语流”将融合在斯大林主义里，并把它们的“可鄙的模式”强加于革命本身。在15年之后的大清洗运动中，这两股语流汇合膨胀成了一股洪水：首席检察官竟然对担任过党与国家最崇高职务的被告使用这样的语言：“你这笨牛、蠢猪养的！”而最高法庭庭长在结束他偏执的演说时则咆哮着：“枪毙这批疯狗！”脏话滚滚地从法庭流向工厂、农庄、编辑部和大学礼堂；它的喧嚣声在全俄罗斯大地上震耳欲聋地响了好几年。几百年来的下流骂人话仿佛在片刻间凝聚起来，借斯大林主义而还魂，突然间袭击了整个世界。

※ ※ ※ ※ ※

十月革命给文化生活带来了新动力；但同时又彻底地摧垮了它，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这是任何革命的必然后果，即使革命处在最顺利的环境下，即使这个国家受过教育的人同革命站在一起；但当革命的主要动力是被压迫的、无产的因而必然是未受教育的阶级时，这个后果便会极大地恶化。诚然，布尔什维克领袖们都来自知识阶层，有些人还受过广泛而又高深的教育，但他们仅仅是少数人。“干部”主要是由自学的工人和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受过一些教育的人所组成。党在政治、组织方面，有时在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训练过他们。然而，他们对文化事务的介入常常仅仅证明了这一点：一知半解比毫无所知更糟糕。

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抱有敌意，有的死于内战，不少人移居国外。在活下来而又留居俄国国内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是

以“专家”身份为新政权服务的。少数人甚至满腔热情地转到革命立场上来,并且尽一切力量来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但是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过于坚持保守的思想习惯,就是过分胆怯或过分平庸和奴颜婢膝,不能产生广泛而成果显著的知识影响。他们由于屈身于自学的或只受过一些教育的人民委员之下而感到委屈。另一方面,人民委员却常常缺乏自信,疑心重重,并往往通过恐吓威胁来掩饰内心的不自信。他们狂热地坚信其事业的正义性,并且断定他们从马克思主义里找到了一把万能钥匙,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包括科学和艺术,实际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知半解。而知识分子阶层则更强烈地固执于他们所特有的成见,并傲慢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东西可教给他们,其世界观仅仅是“半真半假”的大杂烩。因此,在他们与新统治集团之间横亘着一条鸿沟。

托洛茨基像列宁、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克拉辛及其他少数人一样竭力要在这道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他恳求人民委员和党的书记们要关心和尊重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则敦促他们尽量适应时代的需要并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些恳求有其效果,但是鸿沟尽管缩小了,却仍然存在,以后又变得更宽了。当党的领导集团开始摆脱各种形式的舆论监督并习惯于专制统治时,它就愈益将其命令强加在科学家、文学工作者和艺术家的头上。它开始形成自己的野心,并鼓励“文化”上的狂热,这满足了它的暴发户的虚荣心,而且看起来是在建立一种革命功勋。于是,“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艺术”、“无产阶级文学”等新口号出笼了,很快就获得了跟“无产阶级战略学说”不久前在军队中所享有的同样声誉。[①]

---

① 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十三章。

托洛茨基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抑制偏执狂和揭露这类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和艺术的口号的浮夸。但这是不容易的。无产阶级文化这个概念迎合了某些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也迎合了年轻工人，革命在他们身上唤起了对教育的渴望，但也释放出他们身上那种破坏偶像的本能。在其背景中还有农民对所有涉及贵族生活方式包括其"文化价值"的一切事物所抱的无政府主义的敌意(农民放火焚烧地主的庄园时，也常常将图书和绘画付之一炬——他们认为这都是地主财产的一部分)。热衷理论的布尔什维克们将这种破坏偶像的情绪合理化，使之成为否定、清除旧的"阶级文化"的伪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文化派"则宣布无产阶级科学与艺术的到来。这个作家与艺术家团体的教条主义者似是而非地争辩道：正因为文明史上曾经有过封建时代和资产阶级时代，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也应当创造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将贯穿着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战斗的国际主义、唯物主义、无神论等等。还有些人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构成了这种新文化。这类观点的发明者和追随者努力争取党支持他们，并据此制定教育政策的指导原则。

列宁与托洛茨基两人都驳斥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但是列宁只限于发表若干篇短小严厉的声明，而把这个领域留给更适合它的托洛茨基。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托洛茨基是怎样与"无产阶级文化派"进行论战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张无非是一种倾向的最为极端的表现，这种倾向的传播已经远远超出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小圈子，特别是在负责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党员中产生了影响——就是通过立法和用行政命令来管理教育和文化事务，并恫吓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智力很高并能独立思考因而不肯苟从的人。正是从这样的思想框框中冒出了斯大林主义的文化政策，这也正是托洛茨基要不懈地去克服的。他向教育工作者演说时说："国家是强制性的组织，因此，执政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想在

劳苦大众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和教育工作都根据这样的原则去安排:'真理就在你们面前——向它下跪吧。'当然,我们的政府是严峻的政府。工人国家有权力和责任采取强制政策。我们要用无情的权力反对工人阶级的敌人。但是,在教育工人阶级时,这种'向真理下跪'的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相矛盾的。"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中的《过渡时期的文化》一文充满了这样的劝勉和告诫。托洛茨基认为:"将行政命令施加于科学家并对其学说横加禁止,除了灾难和耻辱之外,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他预见到了斯大林对语言学和生物学——更不用说社会学中的异端了——的表态所带来的危害和耻辱。应该补充的是,托洛茨基并不是在被逼到反对派的立场之后才以这样的精神来谈论这个问题的。例如,早在1919年1月他就写道:

> 我们的党……永远不是,也永远不能是工人阶级的阿谀奉承者。……夺取政权本身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的性质,也不可能赋予它一切美德;夺取政权只是为工人阶级开拓了学习、精神发展和摆脱自身不足的机会。俄国工人阶级的领导集团通过紧张的努力已经完成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任务。但即使在这些领导集团中也仍然大量存在着一知半解、能力不足的现象。②

他不断地向"一知半解"与"能力不足"宣战。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时曾经告诫布尔什维克"必须学会做生意"。而托洛茨基补充

① 托洛茨基发表这次演说是在1924年6月,正是党的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谴责他"背离列宁主义"之后。《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133-163页。

② 同上,第97-98页。

道，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应当“学会怎样学习”。[①]

托洛茨基反复强调，用虚无主义的轻蔑态度对待过去的“文化遗产”是最有害不过的了。工人阶级必须继承这份遗产并保卫它。马克思主义者绝不应不加区别地接受它；他应当辩证地看待这份遗产并注意到它在历史上形成的各种矛盾。文明的成就迄今为止都是为双重目的服务的：它一方面帮助人类获得知识，控制自然，发展人类自身能力；另一方面又永久地使社会分裂为阶级并导致人对人的剥削。因此，文化遗产的某些因素具有普遍的意义和真实性，而另一些因素则是与已经过时的或即将过时的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②] 共产主义者对待文化遗产应该是有选择的。一般来说，历史上严格的科学思维的主要部分尽管成长于阶级社会，但它相对来说受到的歪曲较少。其中能够最直接地反映人对人的剥削的，是在意识形态的创造中，特别是在关于社会本身的见解中。但即使如此，反映阶级压迫并使之永久化的那些因素也总是跟这样一些因素——它们使人能够认识自身、深化思想、提高智力、洞察感情、学会控制自己，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人的社会环境的局限——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上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还能令现代人陶醉并一直不断地扣动人们的心弦，即使他们正从事着无产阶级革命或者社会主义建设。不错，社会主义建设者应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标准批判地重新评价所有继承下来的文化价值；但是这与全盘否定和冒牌马克思主义骗子毫无共同之处。当历史上的文化价值在受到批判之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260页。

② 托洛茨基谈到机器的双重作用：它提高了工人的生产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也是剥削的工具。然而，社会主义不能、也不会抛弃对机器的使用。这是人皆知的道理，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大多数文明成就。

前,它们必须首先经过彻底的吸收和消化;而当马克思主义者决定从他自己的角度来修订任何知识领域时,他必须先"从内部"掌握它。

※ ※ ※ ※ ※

跟老知识分子交谈时,托洛茨基则从相反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他力图说服他们,切不可单凭文化遗产生活,他们应当接受再教育,在苏联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尤其关心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世界观,向他们反复阐明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当他离开军事人民委员部并成为电气技术管理局和工业科技管理局的领导人之后,他自己对这个学科的兴趣也被激发起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他面前展开——这是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吸引过他,尔后由于革命活动而被放弃了的领域。现在他"一半是行政官员,一半是大学生"。他写道:"我对科学技术研究所最感兴趣。由于工业的集中性,这些研究所在我国可以有广阔的发展前途。我热心地参观了很多实验室,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实验、聆听著名学者的解说,在空闲时间钻研化学、流体力学教材……。"[①] 这些兴趣在他写于1925年至1926年的著作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他拜科学家们为师,同时也是他们在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方面的导师。1925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德文版和俄文版在莫斯科首次问世,托洛茨基很可能受到了这本著作的影响。虽然他没有十分明显地谈及这本著作,但若说他没有读过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某些论点上,他是紧紧追随着恩格斯的思路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托洛茨基至少有三次侧重于科学哲学的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62页。

讲话:1925年9月,在为纪念伟大的化学家门捷列夫而举行的全俄科学家代表大会上,他发表了关于门捷列夫的演说;1926年2月,他在红场俱乐部作了《文化与社会主义》的报告;在同年3月举行的为推广无线电的代表大会上,他又作了《无线电、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讲话。

托洛茨基算不上一位专业哲学家。他在认识论方面从未达到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达到的深度。他无意于系统阐述辩证法的原理;他更多的是将辩证法运用于政治和历史的分析,而不是作抽象的解说。然而,读他的著作时,若不熟悉隐藏于其后的完美哲学,不熟悉他对方法论问题进行的深刻思考,不理解他那不算系统但却十分渊博的学问,读起来是相当困难的。他轻松地运用着他的博学,没有权威的冗长叙述,而是仿佛十分巧妙地使用着业余爱好者的语言。因为这一切,或因为这一点,他关于科学辩证法的若干论文都是关于这门学科最清晰、最透彻的马克思主义的阐述。

把政治强加给科学的任何企图都是与托洛茨基的思想格格不入的。他主张,科学家有权利甚至有责任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对政治采取超然态度,但这不应当妨碍科学家认清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个别科学家的超然态度与把科学作为整体而深刻介入该时代的社会冲突这两点并不矛盾。同样,个别战士或个别革命家可以不为私利而战斗和自我牺牲,但一支军队,一个党,就必须捍卫明确的利益和理想。

超然的态度和严格的客观性在科学研究中是必要的,但还不够。科学本身最重大的利益就在于,一位科学家应该具有广阔的和符合时代的哲学观点;然而他通常并不具备这一点,因此科学家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思维分裂。在他的专业领域里或者在他的实验室中,他无疑是一位唯物主义者,然而一旦走到外面来,他的思想

却往往是混乱的、非科学的、倾向于唯心主义甚至明显的反动观点。在伟大的思想家中,这种思维分裂再没有比门捷列夫更明显的了。作为一位科学家,他是所有时代里最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之一;然而他却是他那个时代所有保守观念和偏见的俘虏,并效忠于腐朽的沙皇政府。当他系统地阐述他的周期律时,他验证了占据马克思主义思想核心地位的辩证法原理的真理性,并声明量变在某一点上就会转化为质变,不论是在自然过程还是在社会过程中。根据门捷列夫的周期律,原子的量变将导致化学原素之间质的差异。但是门捷列夫却未能预见到在俄国社会中一种伟大质变——革命的到来。

"知就是为了能够预见和行动。"这就是这位伟大发现者的座右铭。他把科学创造比做把一座铁桥扔过悬崖。门捷列夫说,没有必要下到悬崖底部去为铁桥寻找支点,只要在悬崖这一边找到一个支点,然后把精确计算好重量的拱形桥扔过去,并在另一边牢牢固定下来,这就够了。

>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整个科学思维。科学思维必须将自身建立在坚实的经验基础上;但是正像桥的拱顶一样,概括将自身从事实世界中分离出来,是为了能在另一个精确预测的点上相交……。
>
> 当概括自身转化为预测,而预测又通过实验得到成功的验证……科学创造的这种时刻,必然会让人类思想感到无比自豪、无比真实的满足。[①]

然而,公民门捷列夫却躲开一切社会学概括和政治预测。他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274页。

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在俄国的出现完全缺乏理解，而这个学派是在同民粹派就预测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论战过程中形成的。

门捷列夫的例子是现代科学家困境的证明：他对世界甚至对科学缺乏一种综合的观点。科学工作必然是经验主义的；科学进步伴随着知识的专业化和狭隘化。知识越是专业化和狭隘化，就越是迫切需要对世界的整体观——否则，思想家的头脑在他的专业领域便会受到限制，甚至他在其中的进步也会受到阻碍。缺乏哲学洞察力，怀疑思想的概括，曾是许多本可以避免的科学混乱与在黑暗中摸索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给科学家提供了一种观察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整体观。这个整体观远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臆测或形而上学的虚构，而是同各种以实验为根据的科学经验一致的。[①]

人的思维的统一性及其多样性是托洛茨基的重大主题。他再次以门捷列夫的著作为起点，考察了现代科学的结构。门捷列夫已经发现，化学的基础是物理学，而化学反应是由粒子的物理性能和机械性能引起的。托洛茨基接着继续说，生理学之于化学的关系如同化学之于物理学的关系一样，因此，把生理学称做"生命有机体的应用化学"是不无道理的。"科学的亦即唯物主义的生理学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超化学的生命力(如同活力论者及新活力论者

①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约在200年前，笛卡尔在断言宇宙中运动质量不会改变时就预示了能量守恒的科学发现。如果科学家掌握了笛卡尔的思想，他们有可能更早地得到这个发现。这个推理可以更确凿地适用于康德的"星云假说"。"如果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于(哲学)思维不像牛顿在'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啊！'这个警告中所表现的那样厌恶，那么他们一定会从康德的这个天才发现中得出结论，免得走无穷无尽的弯路……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即克服僵化的自然观，而采取将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的动态自然观)的起点。……如果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那么自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但是哲学能够产生什么成果呢？康德的著作没有产生直接的结果，直到很多年以后拉普拉斯和赫舍尔……作出了更详细的论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4、62页。

所设想的那样)来解释与它有关的一切过程。心理学反过来又是以生理学为其基础的。由于生理学家在其严格探索过程中不能采用生命力这个概念,因此他不能参照'灵魂'说来解决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他必须把心理体验同生理存在的现象联系起来。"弗洛伊德学派就是这样做的,它揭示出人的无数心理状态是以人的性欲冲动为基础的;而巴甫洛夫学派更是如此,它将人类灵魂看做是心理条件反射的一个复杂系统。最后,现代社会科学是与人类在探究支配自然的法则中所获得的洞察力分不开的;它把社会视为自然的一个特殊部分。

因此,现代科学的庞大结构就是在力学和物理学所奠定的基础上兴起的,它所有不同的分支互相关联,并且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统一性并不等于单一性。支配一门科学的法则不能用来代替支配其他科学的法则。即使门捷列夫已经证明化学过程归根结底是物理过程或机械过程,但化学却不能直接纳入物理学,而生理学更不能完全纳入化学,心理学、生物学也不能完全纳入生理学。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法则也同样不能简单地从自然法则中推导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说来,用少数带普遍性的基本法则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无穷变化仍然是科学的最终目标。[①] 但是,科学思维朝向那个目标发展的道路看来愈益远离了那个目标,也就是说,通过知识的分割和专门化,通过形成和产生不断更新的、特殊的和详细的法则而远离了那个目标。比如,化学反应最终取决于粒子的物理性能这个概念是一切化学知识的起点;但它本身并不能给任何一种化学反应提供什么线索。"化学通过自身的

① 恩格斯在上述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至少在人类现阶段所掌握的知识范围内,这些带普遍性的基本法则只能以哲学术语亦即辩证法的术语来表达,而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表达。

关键起作用,它也只有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通过实验经验以及归纳、假设和理论才能发现那些关键。”尽管生理学通过有机化学和生理化学的固定渠道与普通化学相联系,但它仍然有自己的方法和法则。心理学如此,生物学也是如此。每一门科学只是“归根结底”时才能在另一门科学的规律中找到支持;而每门科学又将自身应用于如此特定的领域中,以至其基本现象在其中以极其复杂的组合体出现,而每一个这样的领域都需要有自己的探索途径、研究方法和只适用于它的假设。科学的统一性是通过多样化来表现自己的。

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每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立性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一个认真的学生会允许自己把支配一个领域的法则同支配其他领域的法则混淆起来。只有在关于社会、历史、经济和政治的研究中,这种方法的混淆和任意使用才是特有的。在这里,任何法则都不需要得到认可;否则,自然科学的法则就会被生搬硬套到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如涉猎社会学的达尔文主义者和新马尔萨斯主义者那样。①

然后,托洛茨基广泛回顾了“最近几十年”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哲学上的含义。他断言,这种进步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几乎从未间断的胜利,但令人不解的是,这种胜利却是哲学家甚至科学

① 托洛茨基引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凯恩斯于1925年访问了莫斯科,他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发表的演说中用英国人口增长率来说明大不列颠帝国的失业问题。凯恩斯继续说:”我认为,战前俄国的贫困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太快而引起的。现在也是这样,出生率远远超过死亡率,这令人担忧。这是俄国经济发展前途的最大危机。”(引自1925年9月15日苏联《经济生活》的报道)那时俄国还有失业问题。但3年以后,计划经济确立了,而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最大危机”之一倒是劳动力的缺乏和人口增长太慢。这个事实突出证明了把马尔萨斯或新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对生存手段的压力”这个概念应用到工业不断发展的社会里是很不适当的。

家不情愿承认的。"相反,科学在征服物质方面的成功却伴随着哲学上反对唯物主义的斗争。"尤其是放射性的发现鼓励了哲学家们得出反唯物主义的结论。但是,他们的论点只是在批判旧物理学以及与它相联系的机械论时才是有效的,而这种机械论只是哲学唯物主义的变种。辩证唯物主义从未受到旧物理学的约束——事实上,辩证唯物主义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在哲学上超越了旧物理学而远远地跑到了科学家的前头。在存在与思维的关系中,唯有坚持存在——"物质"第一性,辩证唯物主义才不会将其自身与物质结构的特定概念等同起来,才会看到每一种这样的概念只具有相对的有效性——即只是经验知识发展的一个阶段。另一方面,科学家们却感到很难把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同他们对物质性质的探索中这一或那一阶段分别开来。但是,只要他们学会以更大的勇气来处理这些问题,把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结合起来,把经验思维与抽象思维结合起来,他们就能更透彻地看清自己的发现,避免赋予它们抽象的哲学重要性,甚至能更清楚地预见到从这一科学阶段向另一科学阶段的过渡。不少科学家固执于放射性具有所谓反唯物主义的意义,甚至都看不到放射性的发现会把他们引到哪里去;而且他们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原子分裂的可能性。托洛茨基在批判这种态度时,公开宣布了他的预言:

> 放射性现象直接将我们引向释放原子内部能量的问题。……当代物理学最重大的任务就是从原子里提取潜能——拔掉塞子,让潜能以万钧之力喷涌而出。到了此时,用原子能来取代燃煤和石油已成为可能,并最终变成人类的基本燃料和动力。

他在反驳怀疑论者时宣称:

> 这绝不是无望的任务，这个任务的解决将在我们面前展现出多么光辉灿烂的前景啊！……科学技术的思维正逼近伟大变革的重要关头；我们时代的社会革命将与人类探索物质性质并征服物质的革命同步。①

托洛茨基作这番预言是在1926年3月1日。他未能活着看到它的实现；而他与世长辞时几乎正好是它实现的前夕。

他的科学哲学中的旅程有一次特别值得怀念，就是他呼吁保护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弗洛伊德思想学派就遭受到蛮横的围剿，它被扫出苏联达数十年之久。对于那些对弗洛伊德学说几乎没有丝毫第一手知识的有权势的党员来说，这个过分强调性欲的学派看起来很值得怀疑，它似乎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然而，不能容忍弗洛伊德主义的并非只是布尔什维克，至少在政治保守的学术界，在巴甫洛夫的那些一心要确立其学说的实际垄断地位的追随者中间，这种态度一样强烈。他们对弗洛伊德主义占有压倒的优势，因为他们的学派是在俄国土生土长的，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在二者之间，巴甫洛夫学派似乎更像是唯物主义的。于是，党员和科学家们结成了反心理分析学派的奇妙联盟。

我们知道，托洛茨基早在1922年就为此深感不安了。他在这一年致函巴甫洛夫，试图为弗洛伊德主义辩护，并委婉地请求巴甫洛夫施加影响以利于研究上的宽容和自由。不清楚他是否寄出了这封信，但他把这封信收入了全集第21卷。巴甫洛夫似乎没有理睬他的请求。在紧接着发生的政治危机高潮中，托洛茨基无暇继续过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415页。（重点号是我加的。伊·多·）

问这件事。但在1926年他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而这一次,他则公开抗议围绕着巴甫洛夫学派的那股谄媚歪风了。他以适度的尊敬和赞赏评论巴甫洛夫本人的学说"与辩证唯物主义完全一致",并且"打破了生理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分界线"。巴甫洛夫把"基本反射看做是生理作用,把反射系统看做是意识的结果"。他也看到了"生理学上量的积累能产生新的'心理学'上的质"。但是托洛茨基以嘲讽的口吻谈到巴甫洛夫学派的自命不凡和浮夸作风,特别是它自我吹嘘能解释最微妙的人类思想活动,说甚至连诗歌创作都仅仅是条件反射的产物。托洛茨基评论说,不错,巴甫洛夫的方法是"实验的和艰苦的:它一步步地达到了它的综合:从狗的唾液出发,向诗歌进军";但是,"通向诗歌的道路几乎还望不到"。

他更强烈地抗议对弗洛伊德主义的诋毁,因为他认为,弗洛伊德学说跟巴甫洛夫学说一样,本质上都属于唯物主义。他争辩说,两种理论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研究方法,而不在于哲学方面。[①] 巴甫洛夫采取严格的经验方法,实际是从生理学前进到了心理学。而弗洛伊德则预先断定生理冲动在心理过程之后;他的方法更带臆测性。可以争论的是,弗洛伊德学派过分强调性欲而忽略了其他因素;但是这样的争论仍然处在唯物主义哲学的范围之内。心理分析学家"并不是从最低级的(生理)现象攀升到最高级的(心理)现象,不是从基本反射攀升到复杂反射。相反,他力图一跃跳过所有的中间阶段,这是自上而下的一跃,从宗教神话、抒情诗或者梦想一下子就跳到了人类心理现象的生理基础上"。托洛茨基

① 在致巴甫洛夫的信中,托洛茨基就两派学说的密切关系作了如下评论:"在我看来,你的条件反射学说已把弗洛伊德学说作为一个特殊例子包括进去了。性欲的升华……并非别的什么,只不过是在性欲基础上形成的 n+1,n+2 以及更高次的条件反射。"《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260页。

以生动鲜明的形象作了这样的对比：

> 唯心主义者告诉我们……"灵魂"是一口深不可测的井。巴甫洛夫与弗洛伊德都认为生理学是这口井的底。巴甫洛夫像一个潜水员，潜到了最深处，艰苦而细致地向上查看这口井。弗洛伊德则站在井的上面，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井底，力图看透它那永远动荡不宁的水流，探测或猜测着井底景物的轮廓。

当然，巴甫洛夫这个以实验为基础的方法对弗洛伊德部分臆测式的方法占有一定的优势，后者有时会引导心理分析学家得出荒唐的假说。但是，

> 断言心理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并对它置之不理，那就未免过于简单和粗暴了。当然，我们也并非必须接受弗洛伊德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是一种工作假说。它能产生并且也产生了指向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演绎法和推测法。实验会在适当的时候提供验证。同时，我们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禁止这样一种方法，即使它不太可靠，它试图预言结果，而靠实验方法得到这些结果要慢得多。①

托洛茨基的呼吁无人理睬。不久之后，心理分析学便从大学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430－431页。托洛茨基说巴甫洛夫的方法取得结果比弗洛伊德的方法更慢。这话是否正确，可以让专家们来判断。但他强调指出，他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捍卫不应该被误解为对资产阶级公众中流行的"庸俗的伪弗洛伊德主义"的纵容。

里被赶出去了。他还捍卫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虽然不是专门地但却更为坚决;[1] 但是,由于斯大林时代的"唯物主义"教派,相对论也受到了诅咒;只是在斯大林死后它才被"恢复名誉"。

※ ※ ※ ※ ※

尽管托洛茨基博学多才、有时也颇富灵感,但是他写的科学哲学论文毕竟多少带有业余爱好者的色彩。他的文学批评则完全没有业余性质了。他是近年来俄国主要的文艺评论家。他的《文学与革命》深刻地影响着当时主要的知识分子杂志《红色处女地》的作家们,特别是杂志主编,杰出的散文家 A.沃伦斯基(Воронский),公然声明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甚至在今天,托洛茨基写成这本书之后将近 40 年,这本书仍然是无与伦比的,它不仅是对俄国文学史上革命狂飙时代的回顾,而且也是预先声讨斯大林主义扼杀艺术创造的檄文,但最主要的是,它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典范。这本书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艺术和文学的亲切感情、独到的观察、令人陶醉的神韵和妙语,而且在书的结束语中想象力达到罕有的崇高诗意的境界。

在文学方面,托洛茨基还向破坏传统的态度和假革命的自负与傲慢宣战。他主张一切艺术和文学派别都有发展的自由,至少是,只要它们没有把这权利滥用于明显的或确定无疑的反革命目的时。当时这种破坏传统和偏狭排外的态度不仅在党员中十分明显,甚至主要不在党员中,而在各种青年作家与艺术家团体中更是典型特点。新的叛逆派别在艺术和文学领域中繁殖起来。在正常环境下,这些派别富有创新精神,敢于向公认的艺术权威挑战,并

---

① 《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第 1 期。

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激起好奇心和掀起风暴，就这样从默默无闻到出人头地，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无需在前进中挥动政治旗帜。但在他们目前所处的环境之下，各艺术派别的竞争及其论战则逸出了正常界限。一些新派别标榜自身的重大政治意义，自诩为革命先锋，并力图搞臭那些老派别，称它们在艺术意义上是过时的、在社会意义上是反动的。

大家知道，“无产阶级文化派”吵吵嚷嚷地要求正式承认它的“思想派别”，甚至垄断地位。它的作家，包括李别进斯基(Либединский)、普列特涅夫(Плетнёв)、特列季亚科夫(Третьяков)以及其他作家等，在《煅冶场》与《十月》两个刊物上开辟了他们的论坛，随后又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战斗阵地《在我们的岗位上》。由于《真理报》主编布哈林和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支持无产阶级文化派，使列宁不得不发表声明指责它的野心。因受到指责而不安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作家们便转向托洛茨基，请求他的保护，他回答说，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捍卫他们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但是对于所有那些关于无产阶级文学与艺术的口号，他却完全赞同列宁的意见，那些口号是有害的和无知的。即使是比较温和的老生常谈，如“新的社会主义艺术时代”或“文学中新的革命复兴”，也都不可取，他说：“在每一伟大时代的开端，艺术总是显得极为软弱无力。……就像智慧之鸟猫头鹰那样，诗的歌唱之鸟也只有在日落之后才会受到欣赏。白天人们有许多事要做，只有当黄昏来临，人们的感情和理智才能消化吸收所发生的一切。”

因为艺术家的悲惨命运而责备革命是错误的。“诗的歌唱之鸟”在反革命阵营中更少受到欣赏。托洛茨基在对流亡文学的一次尖锐评述中指出，尽管大多数著名的俄国作家跑到国外去了，但他们在那里也并没有拿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来。“国内的流亡作家”——那些留在俄国但思想和感情跟流亡作家一样的作家——

也没有很多值得夸耀的东西,这些作家有季娜伊达·吉皮乌斯(Зинаида Гиппиус)、叶甫根尼·扎米亚京(Евгений Замятин),[1] 甚至安德烈·别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这些作家尽管具有无庸置疑的才能,但因沉溺于麻木不仁的利己主义,不可能对他们时代的悲剧作出任何反应——至多是躲进神秘主义里面去了。甚至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人物别雷,也是"总想用自己代替整个世界,从自己出发并通过自己建造一切,在自己身上重新发现一切"。[2] 吉皮乌斯孕育的则是一种超然的、彼岸的、神秘的却又是色情的基督教精神;然而,"当一只钉靴踩着了她那抒情的小脚趾时,这位贵妇立刻现出了原形,原来在那颓废的、色情的、基督教的外壳下藏着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私有者的女巫。"(但是由于她并不缺乏才能,因此她那女巫般的叫声倒还确实有点儿诗情画意哩!)他们还留恋着被推翻的社会制度的虚假价值,跟自己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因而在托洛茨基看来,这些作家都是又可恨又可笑的人物。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旧知识阶层中毫无价值的一切。他为这个知识阶层中的一种类型——最典型的"国内流亡者"画了一幅简略的速写:

> 某位立宪民主党人美学家乘加温货车作了一次长途旅行,然后他咬牙切齿地谈起了这趟旅行:他这位受过最好教育的欧洲人镶着最好的假牙,精通埃及舞技,然而这次乡下人的革命却逼得他只好与满身虱子的背袋小贩相伴旅行。听到他的这番话,对他那副假牙、芭蕾舞技、对这一切从欧洲市肆里扒窃得来的"文化",你就会感到一

---

① 这些作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流亡作家。乔治·奥威尔摹仿扎米亚京在流亡中写成的小说《岛民》写了他的《一九八四年》。

②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36页。

阵令人作呕的生理上的厌恶涌上喉头，并且坚信，对于历史的构成来说，我们最粗野的小贩身上的最小的虱子也比这位彻头彻尾“文化的”，但在各方面都很贫乏的孤芳自赏者更为重要，也就是说，更为需要。[1]

比较扼要地揭露了“国内流亡者”后，托洛茨基进一步探讨更有创造性的文学倾向。他既批判“同路人”，又为“同路人”辩护。他创造出这个专门名词去说明，这些作家可以“与革命共走一程路”，但又不信仰共产主义，很容易同革命分手，走他们自己的路。例如意象派就是这样。叶赛宁（Есенин）与克留耶夫（Клюев）是这一文学流派中最杰出的诗人。他们把俄国农民的个性和想象带到诗中来——托洛茨基揭示了他们是怎样用农民装扮自己小茅屋的那种手法创作出诗中那些色彩艳丽而杂乱无章的形象的。在他们的诗里既可以感到吸引人的一面，也可以感到讨厌的一面，那是革命对农民产生的影响。他们用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同时把艺术张力和社会重要性赋予了他们的作品。他们是“十月革命时期的民粹派诗人”。这种精神状态必须要找到激烈的表现形式，这在一个农民国家里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也不仅仅能在意象派作家中找到。其才华得到托洛茨基高度评价的鲍里斯·皮利尼亚克（Борис Пильняк）跟他们同样留恋被革命摧毁了的、俄罗斯最古老的原始主义。因此，他“接受”了布尔什维主义而“反对”共产主义。他把布尔什维主义设想为基本上是“俄罗斯的特殊形式”，而且部分是亚细亚式的革命；而把共产主义设想为现代的、城市的、无产

---

① “背袋小贩”指内战和饥荒时期背着袋子走遍全国搜罗食品的商人。有时，一些黑市小商人也被叫做背袋小贩。由于客车被破坏，人们主要依靠货车旅行。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26－27页。

阶级的东西,主要是欧洲的东西。托洛茨基更严厉地谈到了另一位女诗人玛丽埃塔·莎吉娘(Мариэтта Шагинян),她之所以"顺从革命",仅仅是出于一种宿命论的基督教精神,以及一种——比方说——对"她的私人画室"以外的任何事情所抱着的纯艺术式的冷漠态度。(莎吉娘是斯大林大清洗后该团体中极少数幸存者之一,后来又成为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托洛茨基把亚历山大·勃洛克(Александр Блок)也看做是"同路人",但使他自成一类。勃洛克的诗从1905年革命中汲取了最初的强大动力,但不幸的是,他创作的全盛时期却偏偏落在1907年和1917年两次革命之间的沉闷时期;他从不肯同那些年的空虚和平相处。因此他的诗是

> 浪漫的、象征的、神秘的、不拘形式的、非现实的;但在诗的深处却蕴藏着十分真实的生活。……只有在对日常生活的具体性、个人特点和真实姓名加以抽象这种意义上,浪漫的象征主义才是对日常生活的脱离;……在本质上,象征主义是改造生活和提高生活的方法。勃洛克写星光和白雪的抒情诗不拘形式,它反映了特定的环境和时代……如果超出这个时代,他的诗就会像残云碎片悬浮起来。它不会比它的时代和作者活得更长久。

1917年再一次震撼了勃洛克,使他"感到了运动、目的和意义。他并不是革命诗人。但是,在革命前生活和艺术的阴暗绝境中奄奄一息之后,现在他用自己的手抓住了革命的车轮。这个碰撞就产生了《十二个》,他所有诗篇中最重要的、唯一流芳百世的作品"。托洛茨基与后来的大多数批评家不同,他并没有把《十二个》视为神化革命的礼赞,而是视为"试图加入革命行列的个人主义艺

术的天鹅之歌”。“从根本上说来，这是对即将消失的过去的绝望悲鸣；但是这悲鸣是如此伟大，这绝望是如此凝重，因而诗也就升华为对未来希望的呐喊。”

未来主义者是这些年里最热闹、嗓门最高的文学团体。他们叫嚷着要同一切过时的东西决裂，坚持所谓艺术与技术的根本融合，要把工业技术术语引进诗的语言，并把自身跟布尔什维主义和国际主义等同起来。[①] 托洛茨基对这种倾向作了一番详细的鉴别考察。他将未来主义者对技术的狂热斥为俄罗斯落后面的反映。

> 除了建筑之外，艺术对技术的依赖……只是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即技术是整个文化建设的基础。艺术，特别是语言艺术，对物质技术的实际依赖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即使生活在落后的梁赞省林区里，也能写出关于摩天大楼、飞船和潜艇的诗；一个人可以用铅笔头在粗糙不平的包装纸上写出这样的诗。只要美国有摩天大楼、飞船和潜艇，就足以激发梁赞省诗人的活跃想象力——在一切物质中，人的语言是最轻盈的。

将未来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等同起来也是值得怀疑的。在意大利，同样的诗歌流派与法西斯主义的合流并不是偶然的。[②]

---

① 这个团体的“理论家”H.阿特曼写道：“唯有‘未来主义的艺术’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唯有未来主义艺术代表着我们时代的无产阶级艺术。”，载1918年的《艺术公社》。

② 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的附录里公布了一份关于意大利未来主义的起源及其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关系的备忘录，这是应意大利共产党理论家，《新秩序》的创办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请求而写的。葛兰西回到意大利后不久就被捕，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度过余生。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深受托洛茨基信任。

在意、俄两个国家里,未来主义第一次出现时还都是艺术的叛逆者,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如果在它们来得及成熟之前没有被狂风暴雨般的政治浪潮所裹挟,那么它们有可能在文学上丰满起来,通过斗争赢得赏识和获得尊敬。然而,他们在文学上的叛逆性被围绕着它们的政治浪潮赋予了政治色彩,在意大利是法西斯主义,在俄国则是布尔什维主义。当法西斯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各自从相反的角度攻击资产阶级的政治复古主义时,自然就更是这样了。俄国的未来主义者毫无疑义被十月革命的动力所吸引;因此,他们误将他们那波希米亚式的叛逆当做革命的不折不扣的艺术副本。他们由于自己已同某些艺术传统割裂,便神气活现地藐视历史,并以为革命、工人阶级、党也跟他们一道在所有领域内与"几千年的传统"决裂。托洛茨基评论道,他们把"这几千年看得太廉价了"。只要是面对文学界的读者反对既定风格与形式的惰性,那么反传统的呼声自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呼声将是空洞的,"如果是面对工人阶级的话,工人阶级不需要,也不能同任何文学传统决裂,因为工人阶级从来就没有被任何这类传统束缚过"。对复古主义的不遗余力的讨伐只不过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杯中风暴,是放荡艺术家的虚无主义的大发作。"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是生活在传统中的,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不是革命者。"

未来主义者进一步声称,他们的艺术是集体主义的、富有进取性的、无神论的,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托洛茨基反驳道:"想通过推导方式从无产阶级的本性中,从它的集体主义、积极性、无神论等等之中归纳出一种艺术风格的任何企图,都是纯粹的唯心主义,只能产生独出心裁的编造,随心所欲的类比,以及……浅薄的业余嗜好。"

我们被告知,艺术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把铁锤:它

不是反映事物，而是改造事物。现在人们常借助“镜子”，即一张摄下运动全过程的感光胶片来学习或教别人使用锤子。……如果不照一照文学的“镜子”，我们又如何改造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活呢？

托洛茨基对未来主义者的批评看法并不妨碍他承认他们在文学上的功绩；而且由于那些有权势的党员横眉冷对他们在实验上的暧昧性和离心性，他反而更加宽容地承认这些功绩。他警告共产党人谨防“轻率、不宽容”和动辄将实验性艺术看成是欺骗行为或堕落文人的哗众取宠。

反对旧的诗歌语汇与句法的斗争，尽管……乖张，但仍是一种进步的叛逆，它反对的是那种封闭式的语汇，……反对通过一根麦秆啜吸生活的印象主义，也反对惯于在天国的虚空中撒谎的印象主义。……未来主义在语言领域里的创作是生动的、进步的，……它从诗歌中清除了许多已没有意义的词汇和习语，又使另外一些词汇与习语起死回生；而在某些场合，它成功地创造出了新词汇、新习语。……不仅对于个别词汇是这样，而且对于每一个词汇相对于其他词汇中的位置即句法也是这样。

的确，未来主义者在创新方面走过头了；但是，“甚至我们的革命也会有这样的事：这就是所有生命运动的'罪过'。过火行为不论现在或将来都是要被抛弃的，然而，从根本上净化诗歌语言并使之不容置疑地革命化将具有持久的功效”。同样道理也可用来辩护音韵和旋律方面的新技巧。不能以狭隘的理性精神来对待它们；人对音韵和旋律的需要是非理性的；而“词的音调是词义的音

响伴奏"。"当然,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跟这些问题还不相干,即使它的先锋队也还无暇操心它们——因为还有更多紧迫的任务要完成。但是在我们的面前还有一个未来。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语言——文化的基本手段——有更认真、更准确、更高明的艺术态度,不仅在诗歌中是这样,甚至在散文中也应是这样。"在运用和斟酌词汇、词义、色彩和音调时,"显微镜"是需要的。否则,粗陋的陈词滥调和例行套话就会泛滥成灾。"在它的这一方面即较好的一方面,未来主义是反对粗制滥造的一份抗议书,这是最强大的文学流派,它在每一个领域里都有其影响深远的代表人物。"从这个观点出发,托洛茨基觉得甚至应该为"形式主义"流派及其理论的主要阐释者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Виктор Шкловский)说几句公道话,尽管他也批判他们对形式的过分强调。形式主义者认为语言是第一位的,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行动是第一位的——"语言跟随行动,犹如影之随形"。

在《文学与革命》中专门有一篇文章谈到了马雅可夫斯基,这位最有才华的未来主义者后来被尊崇为共产主义的抒情诗人。托洛茨基认为,凡是马雅可夫斯基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最好的地方,就是他作为一位艺术家最差的地方。这并不奇怪:马雅可夫斯基一心要做一个共产主义者;而诗人的看法却并不取决于他有意识的思想与行为,而是取决于他的半意识的接受和下意识的感觉,取决于诗人早在童年时期就已摄取下来的大量形象和印象。革命对于马雅可夫斯基是一次"真实的、深刻的经验",因为革命以其雷霆万钧之力扫荡着旧社会的愚钝和惰性,而那个旧社会,正是马雅可夫斯基以他自己的方式憎恨着的,并且从未有一刻与之妥协过的。他热烈地追随着革命,但却没有、也不能跟它融合。他的诗歌风格证明了这一点:

与革命英雄主义的群众性和革命事业及革命工作和体验的集体主义相比，革命的活力及其刚毅豪迈的精神对马雅可夫斯基更有吸引力。就像持拟人观的古希腊人幼稚地把自然力比做自我一样，我们的马雅可夫斯基化的诗人也用自我占据革命的广场、街道和原野。……在他那里，激情常常达到极度的紧张，而极度紧张的背后却并不总是蕴藏着力量。诗人太出风头了——他给事件与事实留下的余地太少了。与障碍角力的不是革命，而是马雅可夫斯基，他在语言的竞技场中炫耀他的技艺，他的表演有时也的确是真正的奇迹，但通常他以顽强的努力举起来的却分明是空心的哑铃。……马雅可夫斯基谈到自己时历来用的是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他要抬高一个人，便把这个人抬高为马雅可夫斯基。他对最伟大的历史现象用的是亲昵的语调。……他一只脚踩着勃朗峰，[①]另一只脚踩着厄尔布鲁士山。[②]他的声音如雷声轰鸣。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地上万物之间的比例消失了，大与小也就没有了区别。因此，他在谈到自己的爱情亦即最隐秘的感情时，也仿佛在谈民族大迁徙。……毋庸置疑，这种夸张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们时代的疯狂。但是这并没有给它提供充分的辩护。大叫大嚷并不能盖过战争与革命，却很容易把嗓子喊破。……在应该说话的地方，马雅可夫斯基却总是在叫喊；因此在需要叫喊的地方，他的叫喊却有气无力了。

马雅可夫斯基笔下的沉重形象本身往往是优美的，

① 勃朗峰属于阿尔卑斯山脉。——译注

② 厄尔布鲁士山在苏联境内。——译注

但也经常破坏整体的统一,阻碍运动。

> 急剧的形象过多就会导致静止……每个句子、每个短语、每个形象都想成为至大的东西,达到最大的界限、最高峰。这就是为什么整个"事物"没有成为至大,……诗也没有高峰……。

※ ※ ※ ※ ※

对"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反驳是《文学与革命》的中心部分,也是最有争议的部分。托洛茨基在序言里对自己的论点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

> 用无产阶级的文化与艺术去对抗资产阶级的文化与艺术,这是根本错误的。无产阶级的文化与艺术一般来说是不会存在的,因为无产阶级政权是暂时的、过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和道德的崇高就在于它为无阶级社会、为第一次真正的全人类文化奠定基础。

因此,人们不应当从历史类比中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资产阶级创造了它自己的文化与艺术,无产阶级也应该创造它自己的文化与艺术。这并不完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它的目标是为无阶级文化而斗争,这就使这种历史类比不能成立。[1]这两大阶级的历史命运的根本区别尤其不允许作这种类比。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在几百年过程中有机地发展起来的,而无产阶级专政也

①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完全是为了永远结束阶级文化,并为普遍的全人类文化铺平道路。我们切不可须臾忘记这一点。"

许只能持续若干年或者几十年，不会更久了；而它的生命期充斥着残酷的阶级斗争，没有给新文化的有机成长留下多少余地，或者说根本没有余地。

> 我们仍然是行军中的士兵。我们要有喘息的日子，我们必须洗衣、理发，首先是必须擦枪上油。我们当前的一切经济、文化工作仅仅是在两次战役与行军之间的稍事休整。……我们的时代不是新文化的时代，还只是它的前夜。我们首先需要对旧文化最重要的因素实行国家占有……。

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自己的文化，是因为它在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统治下，甚至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已获得了财富、社会权力、教育以及能参与几乎一切领域的精神活动。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至多只能获得推翻那个社会的能力；而作为一个无产的、受剥削的、未受教育的阶级，它摆脱资产阶级统治时在文化上还是一贫如洗；因此，它在人类精神的发展过程中无法创造一个新的重要阶段。[①]实际上，意欲建立无产阶级文化的并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少数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个领域里也用他们自己“取代”了工人阶级）。然而，任何“阶级文化都不能背着该阶级被创造出来”，它也不能在共产主义实验室里制造出来。那些坚持说他们已为无产阶级文化在马克思主义里找到了根据的人们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既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否定，也是它的产物；而且它一直主要是将辩证法运用于对经济和政治的研究，而文化却

① “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时已被它的时代文化充分武装起来。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用来武装自己的只是掌握文化的迫切要求。”

是“知识与技术的总和,它体现出整个社会的特点或至少它的统治阶级的特点”。

工人阶级对文学艺术的贡献是无足轻重的。如果只根据少数天才工人诗人的作品就大谈什么无产阶级诗歌,那是荒诞无稽的。这样的艺术成就就像这样的诗人一样,都是拜“资产阶级”甚至前资产阶级的诗人为师的产物。他们的作品即使低劣也仍有作为人类文献和社会文献的价值。但若把这样的作品捧为崭新的、划时代的艺术,那就是对无产阶级的侮辱,是“一种民粹派式的蛊惑”。“无产阶级艺术不可能是二流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作家们津津乐道什么‘崭新的、里程碑式的、能动的’文学和绘画。但是,同志们,‘伟大的绘画和伟大的风格’的艺术在哪儿?‘里程碑式’的艺术在哪儿?它们究竟在哪儿?在哪儿?”这都不过是一些大话,用来自我吹嘘和欺负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对手们——意象派、未来派、形式主义者以及同路人;但若没有他们的作品,苏维埃文学就是一片不毛之地,只剩下无产阶级文化派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

正如可以想到的一样,托洛茨基被指控为折衷主义、跪倒在资产阶级文化面前和鼓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否定党有权利和责任“领导”文学艺术。托洛茨基反驳道:

> 艺术必须用自己的双腿走自己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非艺术的方法。党能领导工人阶级,但不能领导(整个)历史进程。在某些领域,党可以实行直接的绝对的领导。在另一些领域,党只能监督与合作。还有一些领域,党只能协作。最后还有一些领域,党只能帮助确立方向。艺术不是党可以任意指挥的领域。

过分反对个人主义会适得其反;个人主义起到的是双重作用;

它有其反动的一面,但也有进步的和革命的一面。工人阶级不患个人主义过剩,而患其不足。工人的个性尚未形成,也不够充分多样化;而个性的形成和发展跟培训工人掌握产业技能同样重要。担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艺术会削弱工人的阶级团结意识,那是荒唐可笑的。"工人从莎士比亚、普希金、歌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摄取的正是……关于人的个性、激情及其感受的更为复杂的意念。"①

在书的最后一章,托洛茨基谈到了关于前途的"必然性及其假设"。"必然性"涉及的只是"革命的艺术";至于对唯有在无阶级社会中才会产生的"社会主义艺术",人们只能作出各种猜测。革命的艺术由于与该时代的阶级冲突和政治激情一同搏动,因此只属于过渡时期——即属于"必然王国",而不属于"自由王国"。唯有在无阶级社会里,人类的团结才会充分实现;也唯有那时,"那些情感,由于已被伪君子和庸人糟蹋得不像样子而使我们革命者羞于称呼其名的那些感情——无私的友谊、对亲人的爱、发自内心的同情,将作为强有力的和弦响彻社会主义的诗篇。"②

革命的文学仍然在摸索着表现形式。它被认为应当是现实主义的。这在广泛的哲学意义上是对的:如果不能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现实,那么我们时代的艺术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成就。但是在狭义上,若把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来扶植,那就愚蠢可笑了。绝不能说这样一个流派天生就是"进步的":现实主义本身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反动的。在俄国,它的黄金时代还在贵族文学时期就已经衰落了。作为对它的反动,兴起了民粹派作家的倾向性风格,尔后它又让位于悲观的象征主义,然后又轮到未来主义反

①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166页。
② 同上,第170页。

抗它。各种风格的依次更叠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它反映出政治气候的变化;但它又遵循着自身的艺术逻辑和艺术法则。任何新的艺术风格都是从旧风格中作为对它的辩证否定而脱胎出来的,它再现并发展了旧风格中的一些因素,并抛弃了另一些因素。

> 每一种文学流派都潜藏于过去,并与过去决裂而得到发展。语言和内容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以下的事实:即新形式是在内在需要以及集体心理要求的压力下得以发现、宣告存在并发展起来的。这种集体心理要求正像人类整个心理一样,有着自己的社会根源。这说明了每一种文学流派的双重性:一方面,任何流派都会给艺术的创作技巧贡献出某种新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表达了特定的、归根结底是阶级的要求。……阶级的也即个人的,其阶级的声音是通过个人表达出来的。这也意味着民族的,因为民族的精神是由统治它并以此使文学服从它的那个阶级所决定的。[①]

文学作为一种手段为社会愿望服务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并不能给予任何人以理由去忽视或者歪曲其艺术逻辑和去企图抬高一种风格而禁止另一种风格。有些批评家粗暴地反对象征主义。然而,"并不是俄国的象征主义发明了象征。它仅仅把象征吸收到现代的俄国语言中。未来的艺术当然不会抛弃象征主义对形式的贡献"。它也不会抛弃传统的风格和形式,即使有些批评家把它们当做陈旧的东西加以唾弃,说讽刺与喜剧早已过时了,悲剧因为与唯

---

①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 172 - 173 页。

物主义、无神论的生活哲学不相容而已经死亡了。埋葬旧风格的葬礼起码现在还为时过早,“苏联的果戈理”、“苏联的冈察洛夫”还有存在的空间,他们将无情地揭露“旧的与新的垃圾”、旧的与新的罪恶以及能在苏联社会里找到的阴暗思想。[①]

那些谈及取消悲剧的人们断言:宗教、命运、罪恶、忏悔是悲剧主题的核心。相反,托洛茨基却指出,悲剧的精华在于人的意识觉醒跟他所处的压抑环境之间的广泛冲突,这种冲突与人的生存不可分离,并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来。宗教神话并没有创造悲剧,只是以“人类童年时期的幻想语言”来表现它。在宗教改革时期的艺术产物——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找不到如古人所想象的那种命运,也找不到中世纪基督教的耶稣受难。因此,莎士比亚标志着对古希腊悲剧的重大超越,“他的艺术更富有人性”,它表现了人超越其自身的尘世激情并将它转化为某种命运。歌德的戏剧也同样如此。然而,悲剧甚至还可以上升得更高。它的主人公可以是这样的人:他并非被狂妄自大、神明甚至他自己的感情所击败,而是被社会所击败:

> 只要人类还没有成为他的社会组织的主人,这个组织就会像厄运那样凌驾于人类之上。……在一个不成熟的社会里,像巴贝夫那样发动为时过早的共产主义斗争,就如同古典时代的英雄反对厄运的斗争一样。……个人激情被压抑的悲剧对于我们的时代太平淡无奇了,因为我们生活在充满社会激情的时代里。我们时代的悲剧就

① 新的讽刺作家还不得不同苏维埃的书刊检查制度作斗争。托洛茨基许下诺言,只要这位作家的讽刺作品击中社会弊端、有利于革命,他在这场斗争中就一定会助其一臂之力。

是个人与集体之间或者以个人为代表的两大敌对集体之间的冲突。我们的时代再一次成为具有伟大目标的时代……人类正要将自身从一切神秘的和意识形态的迷雾中解放出来,并且按照他自己制定的计划改造社会和自身。……这远远超过了古人的幼稚游戏……或中世纪的僧侣呓语,或某种个人主义的傲慢,那种个人主义使个性脱离集体,然后很快耗尽了它,再把它抛到悲观主义的虚无中……。①

(新的艺术家今天应)把伟大的目标编织进艺术中。很难预见革命艺术能否来得及创造出"崇高的"悲剧。但社会主义艺术肯定会给悲剧带来新生……它也将给喜剧带来新生,因为新一代人需要欢笑。它将赋予小说以新生;它将赋予抒情诗以一切权利,因为新人类将爱得更美好、更奔放……并重新考虑生与死的问题。……这些形式的解体和衰落绝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们并非是与新时代精神绝对不相容的。需要的只是,新时代的诗人应该以新的方式思考人类的思想和感受人类的情感。②

尽管一切关于社会主义艺术的预见都不过是假设,但托洛茨基认为,人们能分辨清楚朝着这个方向的那些奇特的指针,就表现在这些年里充满苏联艺术的那些混乱的、有时甚至毫无意义的创新中。在戏剧方面,梅耶霍德(Мейерхольд)探索着能将戏剧、旋律、音响与色彩综合起来的新的"生物医学";泰罗夫(Таиров)力图

①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180－181页。

② 同上,第181－182页。

> 改变只等于小学生的习作。如果说信仰只给了移山的诺言,那么跟"信仰"不相干的技术就真能移山填海。迄今为止,这仅仅是出于工业的目的(如矿井)或交通的目的(如隧道);而在将来,这一切将要根据综合性的生产—艺术规划以无可比拟的宏伟规模来实现。人类将重新编制一份山川河流的清单,并且认真反复地纠正自然。最终,人类将重塑地球,即使不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那也是按照自己的趣味。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担心人类的趣味是低劣的。

最后,托洛茨基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人类自由王国的远景,一幅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远景:

> 可憎的假面具终于落下,人类啊!
> 你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谁也不称霸。
> 人人平等,还分什么阶级、种族、国家,
> 冲破那门第、宗教崇拜,更何必疑惧畏怕;
> 命运自己掌握:正直,聪慧,文雅,
> 再没有什么激情吗?——不,还要摆脱一切罪恶和惩罚。

有一些人(用尼采的观点)争辩说,如果无阶级社会真正实现了,它就会产生过分团结一致的弊病,导致一种消极的畜群般的存在,人类就会因其竞争本能和斗争本能的消失而退化。但是,社会主义远非压抑人的竞争本能,而是将其导向更高的目的以恢复它。在一个摆脱了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不会有谋取利润的竞争,也不会有夺取政权的斗争;人的精力和激情将集中于科学、技术、艺术等

改变只等于小学生的习作。如果说信仰只给了移山的诺言,那么跟“信仰”不相干的技术就真能移山填海。迄今为止,这仅仅是出于工业的目的(如矿井)或交通的目的(如隧道);而在将来,这一切将要根据综合性的生产—艺术规划以无可比拟的宏伟规模来实现。人类将重新编制一份山川河流的清单,并且认真反复地纠正自然。最终,人类将重塑地球,即使不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那也是按照自己的趣味。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担心人类的趣味是低劣的。

最后,托洛茨基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人类自由王国的远景,一幅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远景:

可憎的假面具终于落下,人类啊!
你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谁也不称霸。
人人平等,还分什么阶级、种族、国家,
冲破那门第、宗教崇拜,更何必疑惧畏怕;
命运自己掌握:正直,聪慧,文雅,
再没有什么激情吗?——不,还要摆脱一切罪恶和惩罚。

有一些人(用尼采的观点)争辩说,如果无阶级社会真正实现了,它就会产生过分团结一致的弊病,导致一种消极的畜群般的存在,人类就会因其竞争本能和斗争本能的消失而退化。但是,社会主义远非压抑人的竞争本能,而是将其导向更高的目的以恢复它。在一个摆脱了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不会有谋取利润的竞争,也不会有夺取政权的斗争;人的精力和激情将集中于科学、技术、艺术等

领域里的创造性竞争。新的“党派”会涌现出来，它们彼此之间的竞争将会围绕着思想意识、人类住宅区规划、教育趋势、戏剧、音乐和体育运动的风格、巨大的运河工程、改造沙漠、调节气候、新的化学假说，等等。“激动人心的、戏剧性的、热烈的”种种竞赛将会席卷整个社会，而不仅仅局限于“传教士般的小圈子”。“因此，艺术将不乏各种强健的力量，不乏各种集体心理的刺激因素”，它们会产生新的思想和新的形象。人们将按气质和趣味分成相互竞争的艺术“党派”。人的个性将不断成长，自我完善，并发展其中固有的无价品质——“从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这种品质”。

毋庸置疑，所有这一切还都是遥远的憧憬。当前还是一个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内战的时期，人类在这个时期还生活在匮乏和贫困中。战胜各种形式的匮乏和贫困可能要几十年时间——而在此期间，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还会“渴求今日美国主义好的一面”，即工业的发展、破纪录的生产率和舒适的物质生活。但是这个时期同样会过去的；那时，甚至今天都无法想象的美好前景就将展现出来。

某些热心人今天怀抱着的……梦想——生活的戏剧化和人类本身的节律化正被完美紧密地编织进这一美好的前景中。……对饮食和教育的操心将不再纠缠家庭，……妇女将彻底摆脱半奴隶的状态。……社会教育经验……将获得目前难以想象的规模。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不会像海底的珊瑚礁那样盲目地形成，它将被自觉地建立起来，并受到思维的检验、指导和纠正。……人类将学会改天换地，在勃朗山的最高峰上和在大西洋的最深处建造人民的宫殿；而它将不仅把富裕、鲜艳的色彩和戏剧性的充实，而且还把高度的能动性赋予自身的存在。一

生的社会主义文化，另一方面他把无产阶级专政看做是文化真空，认为现阶段只是创造性的过去与创造性的未来之间的一片不毛之地。在1925年2月中央委员会召开的有关文学政策代表会议上，这个观点也成为布哈林所作的更具体批判的主要内容。[1] 布哈林承认，托洛茨基提出的观点使人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列宁也极其严厉地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他认为，革命的工人阶级能实现政治领导，但不能实现文化领导。然而布哈林坚持说，无产阶级能及时取得文化上的优势，并把自身特性赋予阶级社会最后一个时期的精神创造。布哈林指出：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想象无产阶级专政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一个异常短暂的时期，因而不允许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崛起，他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步调”，没有考虑到将国际革命进程分成许多个别阶段的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它们将大大延长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因而有时间形成它所特有的一种文化和艺术。

布哈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它形成了他和斯大林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当托洛茨基说“我们仍然是行军中的士兵。我们要有喘息的日子，我们必须洗衣、理发，首先是必须擦枪上油。我们当前一切经济、文化工作仅仅是要在两次战役与行军之间的稍事休整”时，他确实指望会迅速出现一系列国际革命的主要“战斗”，它们将极大地缩短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个期望曾存在于他的政治预言中，也存在于他用以阐述其不断革命论的那种强调语气中，尽管这个期望对于不断革命论本身并不是实质性的。然而，1917—1920年布尔什维克的突然进攻同下一次伟大的革命“战斗”之间的“喘息的日子”一直持续了1/4世纪以上；而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会感到诧异，中国革命

---

① 《红色处女地》1925年5月。

生的社会主义文化，另一方面他把无产阶级专政看做是文化真空，认为现阶段只是创造性的过去与创造性的未来之间的一片不毛之地。在1925年2月中央委员会召开的有关文学政策代表会议上，这个观点也成为布哈林所作的更具体批判的主要内容。[1] 布哈林承认，托洛茨基提出的观点使人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列宁也极其严厉地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他认为，革命的工人阶级能实现政治领导，但不能实现文化领导。然而布哈林坚持说，无产阶级能及时取得文化上的优势，并把自身特性赋予阶级社会最后一个时期的精神创造。布哈林指出：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想象无产阶级专政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一个异常短暂的时期，因而不允许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崛起，他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步调”，没有考虑到将国际革命进程分成许多个别阶段的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它们将大大延长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因而有时间形成它所特有的一种文化和艺术。

布哈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它形成了他和斯大林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当托洛茨基说“我们仍然是行军中的士兵。我们要有喘息的日子，我们必须洗衣、理发，首先是必须擦枪上油。我们当前一切经济、文化工作仅仅是要在两次战役与行军之间的稍事休整”时，他确实指望会迅速出现一系列国际革命的主要“战斗”，它们将极大地缩短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个期望曾存在于他的政治预言中，也存在于他用以阐述其不断革命论的那种强调语气中，尽管这个期望对于不断革命论本身并不是实质性的。然而，1917—1920年布尔什维克的突然进攻同下一次伟大的革命“战斗”之间的“喘息的日子”一直持续了1/4世纪以上；而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会感到诧异，中国革命

---

[1] 《红色处女地》1925年5月。

生的社会主义文化，另一方面他把无产阶级专政看做是文化真空，认为现阶段只是创造性的过去与创造性的未来之间的一片不毛之地。在1925年2月中央委员会召开的有关文学政策代表会议上，这个观点也成为布哈林所作的更具体批判的主要内容。[1] 布哈林承认，托洛茨基提出的观点使人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列宁也极其严厉地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他认为，革命的工人阶级能实现政治领导，但不能实现文化领导。然而布哈林坚持说，无产阶级能及时取得文化上的优势，并把自身特性赋予阶级社会最后一个时期的精神创造。布哈林指出：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想象无产阶级专政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一个异常短暂的时期，因而不允许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崛起，他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步调”，没有考虑到将国际革命进程分成许多个别阶段的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它们将大大延长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因而有时间形成它所特有的一种文化和艺术。

布哈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它形成了他和斯大林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当托洛茨基说“我们仍然是行军中的士兵。我们要有喘息的日子，我们必须洗衣、理发，首先是必须擦枪上油。我们当前一切经济、文化工作仅仅是要在两次战役与行军之间的稍事休整”时，他确实指望会迅速出现一系列国际革命的主要“战斗”，它们将极大地缩短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个期望曾存在于他的政治预言中，也存在于他用以阐述其不断革命论的那种强调语气中，尽管这个期望对于不断革命论本身并不是实质性的。然而，1917—1920年布尔什维克的突然进攻同下一次伟大的革命“战斗”之间的“喘息的日子”一直持续了1/4世纪以上；而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会感到诧异，中国革命

---

① 《红色处女地》1925年5月。

生的社会主义文化，另一方面他把无产阶级专政看做是文化真空，认为现阶段只是创造性的过去与创造性的未来之间的一片不毛之地。在1925年2月中央委员会召开的有关文学政策代表会议上，这个观点也成为布哈林所作的更具体批判的主要内容。[①] 布哈林承认，托洛茨基提出的观点使人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列宁也极其严厉地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他认为，革命的工人阶级能实现政治领导，但不能实现文化领导。然而布哈林坚持说，无产阶级能及时取得文化上的优势，并把自身特性赋予阶级社会最后一个时期的精神创造。布哈林指出：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想象无产阶级专政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一个异常短暂的时期，因而不允许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崛起，他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步调”，没有考虑到将国际革命进程分成许多个别阶段的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它们将大大延长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因而有时间形成它所特有的一种文化和艺术。

布哈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它形成了他和斯大林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当托洛茨基说“我们仍然是行军中的士兵。我们要有喘息的日子，我们必须洗衣、理发，首先是必须擦枪上油。我们当前一切经济、文化工作仅仅是要在两次战役与行军之间的稍事休整”时，他确实指望会迅速出现一系列国际革命的主要“战斗”，它们将极大地缩短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个期望曾存在于他的政治预言中，也存在于他用以阐述其不断革命论的那种强调语气中，尽管这个期望对于不断革命论本身并不是实质性的。然而，1917—1920年布尔什维克的突然进攻同下一次伟大的革命“战斗”之间的“喘息的日子”一直持续了1/4世纪以上；而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会感到诧异，中国革命

① 《红色处女地》1925年5月。

胜利之后,这"喘息日子"到底还要持续多久。毫无疑问,托洛茨基低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持续时间,同时也低估了在此期间这个专政获得官僚主义特点的程度。

不过,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最明显的错误并没有使他反对"无产阶级文化"的论点失去时效,相反,却给了这个论点以更大的生命力。无产阶级专政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远比他预期的要长久,这一事实并没有使这个过渡时期在文化上结出硕果和更有创造力。事情远非如此。斯大林主义并没有产生任何无产阶级文化。它反而致力于"文化原始积累",也就是说,异常迅速广泛地普及群众教育和吸收西方技术。这种情况发生于革命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关系框架之内,这个事实说明了进程的速度和强度,并给予这个进程以巨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这种成就仍然差不多是整个来自苏联对资产阶级和前资产阶级文明遗产的吸收,而不是来自新文化的创造。即使是这种成就,也是与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武断的专制主义、盲目崇拜、厌恶任何国外影响、害怕独立的首创精神结合在一起的。"文化积累"在不止一种意义上是"原始的",它伴随着对那些更优美、更复杂的文化价值的抑制和歪曲,而那些文化价值正是托洛茨基一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保存和发展的。当托洛茨基断言"我们的时代不是新文化的时代,我们只能强行为它打开一扇门"时,他已无意中概括了整个斯大林时期的文化史及其后果。在那整个时期,苏联只能对新文化的大门胡打乱轰,弄得浑身血迹斑斑——而现在,这扇大门仍然是半开半掩着的。

第四章

战斗间隙

托洛茨基离开军事人民委员部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党内斗争的暂时停止。这段时期贯穿了 1925 年整整一年，并一直持续到 1926 年夏天。在此期间，托洛茨基本人没有就 1923—1924 年争论中的那些焦点问题再公开发表过任何争论性的意见。甚至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关紧的大门里，他也不想挑起争论。他承认失败，并服从中央委员会加在其身上的种种限制。

在这期间，"1923 年的反对派"不再以任何组织形式存在。托洛茨基实际上解散了它。他劝告困惑不解的追随者说："此刻我们不应做任何事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公开站出来。我们只应当保持联系，保存'1923 年反对派'的干部实力，耐心等到季诺维也夫

势力耗尽为止。"[1] 如果他不这样做,而是策动反对派进行新一轮抗议或游行示威,他及其追随者马上就会大难临头,被开除出党,至少是被开除出领导机关。他有种种理由相信,三驾马车报复起来是绝不会手软的。

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多么渴望避免一场新斗争,可以从下面这件事中看出:1925 年,美国作家马克斯·伊斯特曼发表了《列宁逝世之后》一书,他在书中首次披露了围绕着继承列宁的问题而展开斗争的真相,并在书中引用了列宁遗嘱的内容。曾为托洛茨基写过题为《托洛茨基青年时代肖像》这本人物特写的伊斯特曼当时正在莫斯科,并成为反对派的支持者,他从托洛茨基本人那里得知了有关列宁遗嘱及继承问题之争的内幕;他还请求托洛茨基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列宁遗嘱。他把《列宁逝世之后》的手稿交给在巴黎的拉柯夫斯基,并得到表示完全赞同的间接答复。因此,他有充分理由认为这本著作也得到了托洛茨基的同意。[2]托洛茨基是由衷感激伊斯特曼的,他们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 10 年之后伊斯特曼转而反对共产主义的时候。然而,他发现伊斯特曼好心却帮了倒忙;三驾马车指责托洛茨基的行为极为轻率,逼迫他声明否认伊斯特曼的揭露,并且威胁说,假若他拒绝的话,将对他实行纪律制裁。托洛茨基与他最亲密的盟友们协商,他们不愿在伊斯特曼事件上卷入战斗,于是敦促托洛茨基否认对此负有任何责任。但是政治局对此并不满足。它要求直

---

① V.塞尔日:《阴暗的转折》第 97 页;《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 229 页。塞尔日曾经把"指示"归于托洛茨基本人,第二次又归于托洛茨基的助手 B.埃尔津。不管怎样,埃尔津在这个问题上表达的应是托洛茨基的观点。

② 伊斯特曼在写给作者的一封信里说:"我把手稿给拉柯夫斯基看了,并告诉他是否发表由他决定。拉柯夫斯基夫人将手稿寄回,并给予热情赞扬。我认为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所能得到的'授权'。"

接否认伊斯特曼关于列宁遗嘱的谎言；它甚至规定了否认的措词。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反对派领导小组”再一次请求他为了和平而屈服。[1] 因此，1925年9月1日，《布尔什维克》杂志刊登了一篇由托洛茨基署名的声明，声明说：“一切关于所谓被扣压或践踏的‘列宁遗嘱’的说法，都是恶意的捏造，都是完全违反列宁的真正意志和列宁作为其奠基者的党的利益的。”这篇声明被所有外国的共产党报纸转载，后来成为斯大林热衷引证的根据。[2] 尽管这一类出于策略考虑的否认在政治中并不罕见，却使托洛茨基格外难堪。因为在他对列宁的遗嘱——这是他继承身份的有效契约——被扣压一事采取差不多是消极的态度之后，现在却又不得不站出来作为见证人提出假证据来反对自己、支持斯大林——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拖延一场党内新斗争的爆发。

在这样的条件下，要“保持联系，保存1923年反对派的干部实力”是不容易的。对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来说，不管其策略考虑怎样正当，停止活动仍然是最痛苦的体验。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或许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以研究和探讨来填补空隙。但是任何一个大的政治集团，特别是由工厂工人组成的集团，停止活动往往等于政治自杀。这会使他们丧失对自己事业的信心、降低政治热情、滋长冷漠或绝望情绪。这就是等待着大多数反对派小组的后果：他们退缩了，解体了。例如，到1926年初，列宁格勒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不超过30人，他们聚集在托洛茨基的前妻亚历山德拉·勃朗施坦－索科洛夫斯卡娅的周围，彼此保持着联系，并定期集会。而先前有组织的数以百计的反对派成员则消失在政治真空

① 托洛茨基在致穆拉洛夫的信中谈到了这些情况，该信写于1928年9月11日，即他被流放阿拉木图期间，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49页。

里。在莫斯科,托洛茨基主义的“干部”人数较多而且更活跃;但是在外省大城镇,例如哈尔科夫、基辅、敖德萨以及其他城镇中,如同在列宁格勒一样,反对派的实力也已大大衰落了。

以政治和个人友谊为纽带结合在一起的反对派领袖们在托洛茨基周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小圈子,他们经常碰头和探讨问题。其中有一些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智力最出众、性格最坚强的人物。在政治才能、经验阅历和革命功绩方面,这个小圈子无疑超过了领导斯大林派及统治全党的那帮人。拉柯夫斯基、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越飞、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皮达可夫、谢烈布里亚科夫、克列斯廷斯基、伊万·斯米尔诺夫、穆拉洛夫、姆拉奇科夫斯基和索斯诺夫斯基等人都是早年革命与内战时期的杰出人物,并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职务。[①] 作为目光远大、才华出众、学识渊博、充满激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代表着党内最先进的、最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成分。

拉狄克在这些人中尽管不是最重要的人物,名气却最大。他仅次于托洛茨基,是才智最为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小册子作家。他性格开朗,是一位精明、现实的研究者与政治学者,对最不同的社会环境的动向有着不可思议的敏感,因此在外交和共产国际方面激发过列宁的一些最重要的动议。欧洲是他的故乡。他同捷尔任斯基一样,是从波兰与立陶宛王国的社会民主党转而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这个党就是深受托洛茨基观点影响的罗莎·卢森堡的党。[②] 他有过多年德国社会主义极左派的急风暴雨般的活动经

---

① 拉柯夫斯基、越飞和克列斯廷斯基此时任苏联驻伦敦、巴黎、东京、柏林的大使;但他们仍然与托洛茨基保持密切联系。

② 但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拉狄克和捷尔任斯基是卢森堡的反对者,比党内其他成员更接近布尔什维克。

历,是共产国际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十月革命之后不久他来到俄国,立即被接纳进了领导核心的内层;他陪同托洛茨基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并且同布哈林、捷尔任斯基一道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和约。当霍亨索伦王朝崩溃之后,他作为密使被列宁派往德国,协助建设刚刚成立的共产党。他越过包围俄国的边界封锁线,作了一次大胆而又冒险的旅行,在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谋杀之前化装到达柏林,但旋即被警察逮捕、投入监狱。正当柏林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他的生命危在旦夕时,他却建立了一次极其重大的功劳:他设法同德国的主要外交家、工业家和将军们取得了联系;并在自己的牢房里同他们,特别是拉帕洛时期的外交大臣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保持接触,商谈在边界封锁线上打开第一个缺口。[①] 他还从他的牢房里与德国共产党进行秘密联络,帮助它确立自己的政策方针。

拉狄克是革命社会主义的开路先锋,但在他身上也多少具有赌徒的成分。他在自己的活动范围里编织着外交密谋,就如同他曾像一只革命鼹鼠在地下穿梭一样。他具有锐利的眼光和开放的头脑,比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更早地看到了欧洲革命的退潮;他鼓吹建立统一阵线。1923 年当他回到德国时,仍然看不到革命的涨潮,于是制止布兰德勒盲目冲向他认为无望的革命。然而他那政治赌博的嗜好也使他陷入歧途;他在其"轰动一时演说"中向绝望挣扎的德国民族主义极端分子发出模棱两可的号召。当他返回莫斯科后则被迫承担德国革命失败和与托洛茨基结盟的责任。被解除共产国际欧洲分部的职务后,他于 1925 年又被任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中国革命的隆隆雷声此时已清晰可闻——而他的

---

① 参见拉狄克的回忆录,载《红色处女地》1926 年 10 月第 10 期;路特·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第 203－211 页。

工作是为中国年幼的共产主义运动培养宣传家和鼓动家。[1] 他不知疲倦,愤世嫉俗,外貌豪放不羁,语言尖刻,也有点儿玩世不恭,因此被不少人视为怪癖的甚至是可疑的人物。但他也是其政敌大加诟病的对象,这些人讨厌他那无礼的凝视和冷嘲热讽。这个人的品质无疑远比他的外表更为坚定,尽管以后那些年他在斯大林恐怖的压力下可怕地堕落了。在他那豪放不羁的外表和玩世不恭的举止背后潜藏着一向不愿外露的炽烈信念;甚至他的喜笑怒骂也充满着活力,燃烧着革命激情。

拉狄克进入反对派的领导核心后迸发出了智慧和幽默的火花。他对托洛茨基极为崇敬,两人在国际经验方面有着非常多的共同点。这种崇敬的证明就是他于 1923 年写的《托洛茨基,胜利的组织者》一文。[2] 托洛茨基多少有点儿头痛拉狄克那种心血来潮的政治即兴发挥,但对拉狄克其人却怀着一种深情,并且很欣赏他的才华。[3] 如果说他不相信作为赌徒的拉狄克,那么起码对他的观察和思想是感兴趣的,并很赏识这位杰出的诙谐大师和辛辣的讽刺家。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性格却与拉狄克截然相反。他是一位理论家,而且可能是最早的布尔什维克经济学家。他在 1904 年就已成为一名列宁主义者;他与布哈林合著的《共产主义 ABC》一度是对布尔什维克学说的出色概括;他曾是列宁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当党的纪律愈益令他无法忍受时,他离开了书记处,把位子让给了莫洛托夫。作为党的纪律的批评者,他是托洛茨基的前驱

---

[1] 1914 年之前,拉狄克曾在罗莎·卢森堡的理论机关报波兰《社会民主评论报》上分析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东方的革命发展。

[2] 卡·拉狄克:《肖像与诽谤》第 29－34 页。

[3] 参见托洛茨基档案中托洛茨基与拉狄克的通信和《拉狄克与反对派》,载《托洛茨基文集》第 1 卷第 160－163 页。

——的确，他在1922年初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批评了托洛茨基恪守纪律的态度。但在下半年两人又走到了一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托洛茨基的少数密友之一，托洛茨基只对他们才肯托出自己的计划，吐露他与列宁之间的私下谈话和他们建立反斯大林"联盟"的约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一系列重要经济史著作的作者，他的博学多才与擅长分析是少见的，他基本上是一位学者，追寻着自己的思路，不管这会使他得出多么惊世骇俗的结论，也不管这会怎样破坏他与党的一致。他根据大量缜密的公理进行思维；他在《新经济学》一书中作出了首次重大的和至今无与伦比的努力，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各种"范畴"运用于苏联经济。但是此书仅有导言一册获准出版，即使这一册也很快遭到查禁而湮灭。然而《新经济学》毕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世界上只要还存在着不发达国家，只要这些国家还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工业化，《新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过程所作的预见性分析就仍然是一个重大话题。许多人认为，反对派经济学纲领的创始人与其说是托洛茨基，毋宁说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无论如何，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奠定了它的理论基础。但是他与托洛茨基两人在观点上也隐含着分歧；然而直到1928年之前，即他们两人都被从莫斯科流放出去的那一年，分歧仍没有明朗化，也没有导致严重的政治冲突。

皮达可夫是布尔什维克中最杰出的工业管理领导人。如果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反对派提供理论，皮达可夫则把这些理论置于实践经验的坚实基础上。列宁在遗嘱中评价皮达可夫时说：他是年轻一代中两位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另一位是布哈林——和具有超常才能和魄力的行政管理者，但也是一个缺少政治判断力的人。这种片面性也是反对派的特点：皮达可夫在经济政策方面与反对派观点完全一致，但远离其"思想战场"，并在它挞伐党的

领导时畏缩不前。但是他远非一个胆怯懦弱的人。仅在几年前,当乌克兰被邓尼金占领时,他与他的兄弟还领导着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在那里,在敌人的后方组织怠工,建立游击支队,指挥战斗。白军逮住他们兄弟两人,并将他们跟其他红军战士一道绑到了行刑队前面。就在死刑执行过程中他的兄弟已被枪杀时,红军占领了城镇,并向大屠杀现场冲来,白军不得不慌忙逃走。皮达可夫就在他兄弟和最亲密的同志们的尸体旁边直接担负起指挥赤卫队的责任。这个人的经历就是如此:不论在反对派之内或之外,他都是策划者,他担任苏联工业化的主要组织者达15年之久;但是在法庭的被告席上,他却以"供认"自己是个破坏者、卖国贼、外国间谍而结束了其一生。

其他反对派领导人也大都是具有英雄气质的人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反革命统治的年代里在乌拉尔领导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赴汤蹈火、出生入死。有一次,他被沙皇警察逮捕并受到拷问,他要克伦斯基充当他的辩护律师。克伦斯基一心想救出他的诉讼委托人,就在法庭上宣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从未参与任何革命活动。被告在法庭上站起来推翻律师的辩词,当众宣布他的革命信念。他在1917年和内战初期领导着乌拉尔的布尔什维克。拉柯夫斯基,关于他在1914年前的长期英勇斗争已在《武装的先知》一书叙述过,[1] 内战期间他又在比萨拉比亚指挥共产党武装,白军悬赏要他的脑袋。他回到俄国后成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十月起义和内战时期所起的作用毋需在这里重述了。[2] 穆拉洛夫跟安东诺夫一样是1905年革命中的传奇人物之一;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他率领赤卫队攻打克里姆林

① 《武装的先知》第七章。

② 同上,第八、九、十二章。

宫。后来,他担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和武装部队监察员。托洛茨基评价穆拉洛夫是"一位卓越的巨人,既无所畏惧,又和蔼可亲"。按所受教育来看,他是一位农业专家,每当战斗间隙他就为农民提出农业方面的建议以及"对人和畜的医疗方法"。伊万·斯米尔诺夫曾经领导武装部队在西伯利亚打败了高尔察克。谢列布里亚科夫在内战前线是一位精力最充沛的政治委员。索斯诺夫斯基在前线既以鼓动家又以警醒的观察者和道德风尚的批评者而著称——在布尔什维克新闻事业中,他是最优秀的笔杆子之一。

这些人尽管具有卓越的才能和过人的智慧,但一时也感到前途茫然。他们最渴望的是留在党内;而要留在党内就必须忍辱负重。他们密切注视着事变和他们对手的举动,等待时机再展鸿图。

※　※　※　※　※

托洛茨基尽管遭受重挫,但并没有放下他的武器。他继续隐晦地批判官方体制及其政策。即使小心地不去冒犯其政敌们,他所谈到的每一件事仍能反映出他们所干的一切,甚至所想的一切——不管他谈到俄国官僚集团的野蛮、报纸格调的低下,还是谈到党在文化事务中鲁莽的做法。而且他从来没有把注意力从那些重大的国内外政策问题上转移开,未来争论的材料正在其中积累起来。

1925年5月,在他离开军事人民委员部将近5个月后,他被指派到捷尔任斯基手下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这一指派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捷尔任斯基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决策人;三驾马车把他派到捷尔任斯基手下无非是为了侮辱他。他们甚至没有征求托洛茨基的意见;而他却很难拒绝。他辞去军事人民委员部工作时曾声明他"准备在党所监督的任何条件下承担指派的任务

职";他不能收回这个诺言。他能够拒绝担任列宁副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内,托洛茨基担任三个部门的主席:租让委员会、电业技术管理局和工业科技管理局。租让委员会早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就已建立了,当时列宁希望能重新吸引前租让制的承租人和其他外国投资者来帮助俄国的经济复兴。但这些希望都成了泡影。布尔什维克对外国资本过于恐惧而难以吸收它;而外国投资者则对布尔什维克过于恐惧而难以与之合作。租让委员会成了空中楼阁。托洛茨基的办公室在克里姆林宫外一座一层楼的小旅馆里,他在那里只偶然接待过一位外国来访者,这位来访者询问在西伯利亚开采金矿或在俄国制造铅笔的可行性。

但是托洛茨基很快就把幽禁他的小小樊笼变成了他的活动据点。在那些内战时在他的军事专列上工作过的秘书们帮助下,他展开了对租让权和俄国对外贸易等问题的研究。为此他去调查国内外工业生产的成本,并对俄国和西方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研究。这次调查研究鲜明地反映出俄国工业的落后——其劳动生产率仅及美国的1/10。他用图表来说明俄国工业设备的贫乏。例如,美国拥有电话机1400万部,英国有100万部,而苏联仅有19万部。苏联铁路全长只有69000公里,而美国则有405000公里。苏联人均电力消耗仅20千瓦,而美国则为500千瓦。[①]

尽管这都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实,但一经特别指出却令人震惊。官方发言人津津乐道内战以来俄国工业的进步,事实上产量的提高接近于零;要不然他们就拿目前的生产来与1913年相比;并以此而沾沾自喜。托洛茨基则争辩道,应该运用一个新的比较尺度,最近几年的发展应该以工业化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而不是用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419-420页。

本国落后的标准来衡量。[1]如果不能无情地意识到自己的起点水平还十分低下，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崛起。“人们常说我们干得‘差不多’像德国人一样，或像法国人一样。我要向‘差不多’这个字眼儿宣布一场圣战。‘差不多’实际上等于空话。……我们必须比较生产成本，我们必须弄清楚国内和国外生产一双鞋子的成本是多少，我们必须比较产品的质量以及生产这些产品所需的时间——只有这样，才能与外国比较。”[2] 他得出结论说：“我们不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行。我们首要的基本口号是……不要在后面爬行！是的，我们远远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提出“我们不要在后面爬行”这个口号——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早了好多年；但与斯大林不同，他要努力擦亮俄国人的眼睛，让他们去看一看已经形成的差距有多大。他意识到这是在冒政治风险——一旦人们清醒地看到了俄国的贫穷落后并揭示她的苦难是如何深重，可能会悲观颓丧。而斯大林在发动工业化时却宁可让广大群众蒙在鼓里，不知道攀登的艰巨以及要求于他们的非人的代价。托洛茨基所依靠的是人民的勇气和成熟。“同志们，我们既不要愚弄自己，也不要害怕。但要牢牢记住这些数字：我们必须进行这样的估计和比较，以便不惜任何代价赶上西方，超过西方。”[3] 他就是这样从三驾马车意欲借以埋葬他的那些琐碎的管理技术工作中又浮现出来；他找到了返回核心政策问题的道路，并且提出他在 1922—1923 年就已提出过的工业化号召。

作为电气技术管理局主席，托洛茨基一心扑在电气化上。他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 21 卷第 44 - 45 页。参见 1925 年 10 月 7 日托洛茨基的演说。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大多数年代里，官方宣传都避免在俄国与西方之间进行对比。

② 同上，第 397 - 405 页。

③ 同上，第 419 页。

走遍全国城乡,调查资源,审查发电厂的设计方案,选定厂址,提出报告。他从一次调查旅行归来时便敦促政治局采纳一项利用第聂伯河急流的工程,这就是著名的第聂伯河水电工程,未来10年里工业建设的伟大业绩之一。当他在1926年初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时,政治局置之不理。斯大林说,拟议中的水电站对俄国的用处还不如一台电唱机对一个连一头耕牛还没有的农夫的作用大呢。[①] 于是托洛茨基诉诸青年人的热情和想象力。他在对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次演说中说:

> 最近,我们开发了萨图拉水电站,这是在泥炭区建立的我国最好的工业设施之一。从莫斯科到萨图拉只有100公里多一点儿。不过一箭之遥;但是两地的条件却有天渊之别!莫斯科是共产国际的都城。但你走出100多公里,就会出现荒原、积雪、冷杉、冻土、野兽。黑木小屋的村庄沉睡在积雪之中。坐在火车上,你一眼就能瞥见雪地上的狼迹。不过几年以前,萨图拉水电站所在的地方还是麋鹿出没之处。而现在,结构精密的高压电缆铁塔布满了从莫斯科来的整条路上……就在这些铁塔下面,今年春天母狐、母狼会领出它们的幼崽。这就是我们的整个文明:一方面是技术和综合思维的高度成就,另一方面是西伯利亚的原始荒野。
>
> 萨图拉矗立在泥炭地上;我们有很多泥炭地,比水电站要多得多。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燃料来源正等待着我们将它转变为电力。在南方,第聂伯河流经最富裕的工业

① 托洛茨基根据中央委员会1926年4月会议记录逐字引用了斯大林的声明。参见托洛茨基1927年4月14日的"个人声明",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区；但它却浪费掉大量的水压和古老的急流，而且还在浪费下去，直到我们给它的湍流套上笼头，用堤坝驾驭它，强迫它给城市照明，开动工厂机器，肥沃耕地。我们将驯服它！[①]

当然，工业化本身不是目的；它是“为跟我们整个文明的未来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与多年以后的斯大林相反，托洛茨基坚持认为，在争取赶上西方的同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绝不能使自己孤立于西方以外。他是对外贸易垄断权的坚定不移的辩护人，并且首先提出“社会主义保护主义”的思想；但是他争辩说，这个保护主义的目的不是切断社会主义工业同世界经济的联系，而是相反，要使其与世界经济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多方面的联系。毫无疑问，“世界市场”必然会向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咄咄进逼，迫使它接受严峻的甚至危险的考验。但这些考验是无法避免的，应当勇敢地面对这些考验。俄国由于与更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接触而面临的危险，可以用从国际劳动分工和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中所获得的重大利益来加以补偿。在孤立状态中，俄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会萎缩和停滞不前。在作这个论证时，托洛茨基又一次与官方经济思想发生了潜在的冲突，官方经济思想形成于民族自给自足这个概念：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以闭关自守的苏联经济为前提的。甚至在关于斯大林学说的争论还没有开始之前，托洛茨基的论证就已有效地反驳了它的基本前提。

※　※　※　※　※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1卷第437页。

在 1923 年的德国革命溃败之后,托洛茨基力图重新估计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前途。共产国际急于挽回自己的面子,对这次挫折的重要性轻描淡写;它预言德国会出现一次新的革命形势,并鼓励“极左政策”。[①] 当 1924 年初英国成立了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的第一届工党政府和领导左派联盟的爱德华·赫里欧成为法国内阁总理时,某些共产党领袖把这些政府视为要为革命铺平道路的“克伦斯基政权”。相反,托洛茨基却指出,需要“分清革命的涨潮与退潮”,现在德国工人阶级还需要时间才能从失败中恢复过来,不能指望英国和法国的革命会迅速发展。

但他仍然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不可能重获任何持久的平衡。他看到导致它不稳定的唯一最大因素以及整个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在于美国的上升。1924 年至 1925 年,他一次又一次地分析美国经济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的冲击。他强调地预言说,美国作为领导世界的力量必然会卷入各大洲的事务,并使其军事网络和海军基地遍及全球。他在表述其结论时用了如此强烈的措词,以至他大部分的话在 20 年代听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其时正是实行“道斯计划”的美国相对胆怯地、仅仅试探性地干涉欧洲事务的时代;而在 1929 年以后,继这种干涉而来的是向持续 10 多年的孤立主义的倒退。托洛茨基所预示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势力扩张,即使完全处于胚胎状态也仍然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胚胎中看到了发育完全的小生命,如同他经常看到的那样。扩张的经济基础在于:美国的国民收入已是英、法、德、日四国全部国民收入的两倍半。美国经济的上升伴随着欧洲的贫困化和“巴尔干化”和衰退。因此他得出

① 参见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 64 页以下各处;路·费舍的声明,同上,第 175 – 192 页。

结论：跟美国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所占的优势相比，英国在其全盛期对欧洲取得的优势不值一提。①

当然，美国和欧洲的统治阶级迟迟不能理解这个转变的全部分量——他们的思想落后于事变。"美国人才刚开始意识到它在国际上的重要性。……美国还没有学会怎样将其优势变为现实。但它很快就会学会的，而且将在欧洲人的尸骨上学会。"② 植根于地理和历史的美国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传统是扩张主义的制动器；但是这些传统必然会让位于新事件的动力。美国将发现它被推动着去肩负领导资本主义世界的责任。扩张的冲动是其经济本身所固有的；而且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必须依赖美国帮助才能维持其生存这一事实而得到强化。对此，托洛茨基提出了他那引起激烈争论的著名预言：美国"将对欧洲实行美国定额配给"并将其意志强加于欧洲。美国既然取代英国而成了世界工场和世界银行，也就取代英国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强国和帝国。③ 它用不着为此去占领殖民地而使自己背上包袱——殖民地对于英帝国主义的国力和财富资源经常是一种负担。"美国在整个世界总能找得到足够的盟友和帮手——最强大的国家总能找到它们，有了这些盟友，所需要的海军基地也能找到。"④ 因此，"我们正进入一个美国军国主义侵略本性开始露头的时代"。⑤

对那些被美国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所强烈打动因而怀疑这个前景的人们，托洛茨基回答，美国正仿效德国的榜样。它跟德国一样在工业大国中是一个后来者，但要比德国强大得无法比拟。"德国人

---

① 托洛茨基：《欧洲与美国》第22页。

② 同上，第36页。

③ 在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英国事实上放弃了传统形式的英国海上霸权。

④ 托洛茨基：《欧洲与美国》第42页。

⑤ 参见托洛茨基1925年10月25日的讲话，载《真理报》1925年11月5日。

被看做是耽于幻想的梦想家和德国被看做'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已经多久了？"但不过数十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足以把德国资产阶级转变为最残酷的帝国主义的拥护者。在美国，同样的转变所需要的时间要少得多。英国统治者徒劳地安慰自己，他们可以充当没有经验的美国人的政治导师和外交导师。他们会做到这一点，但只需短短的瞬间，美国马上就能学会帝国主义艺术并获得自信。美国的强大实力最终能说明一切。即使现在，"没有经验的美国佬"对精于世故、老练狡诈的英帝国主义者也仍具有确切无疑的优势：它足以充当亚、非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者，帮助印度人、埃及人和阿拉伯人摆脱英国的压迫；而且使世界相信它的和平主义和侠肝义胆。

但是美国的力量不足以制止资产阶级的欧洲走向没落。美国的优势本身正是德、法、英三国不稳定的根源，美国的势力扩张是以牺牲它们为代价的。欧美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将会一次又一次反映在它们的贸易、支付平衡、财政危机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动荡中。美国也没有免疫力：世界愈依赖美国，大西洋彼岸的和众国也愈依赖世界，并被卷入险恶的世界混乱之中。

结论是什么呢？"布尔什维主义最根本的、最不可调和的敌人莫过于美国资本主义了。"[1] 这就是"我们时代两个根本的敌对力量"。共产主义不论推进到哪里，它都将碰到美国资本主义所建立起来的壁垒；反之，不论美国想向世界的哪一部分扩张，它也将面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如果美国资本渗透到中国，它将在中国人民中间发现，被译成中文的不是美国主义的宗教，而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纲领。"

---

① 托洛茨基：《欧洲与美国》第47页。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不久曾提及这点，他半开玩笑地对列宁说，列宁与威尔逊这两个名字是我们时代的"启示录中的两个对立的极点"。

在两大巨人的决斗中，美国资本主义占据了所有物质上的优势。但是，布尔什维主义将向美国学习，并吸收它的先进技术。布尔什维克做到这一点会比美国资产阶级把世界置于美国支配之下更容易。“美国化的布尔什维主义将击败并粉碎美帝国主义。”[①]美国可以扮演殖民地各民族“解放者”的角色，因而促成大英帝国的瓦解；但是它不可能成功地确立自己对各有色人种的霸权；它也不能最终成功地把共产主义驱逐出欧洲。

> 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低估美国的力量。在估量革命前途时，我们的出发点应是对现实透彻的认识。……但是我们认为，美国力量本身……是欧洲革命最强大的杠杆。我们不可忽视这个事实：这根杠杆不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都会以千钧之力转而反对欧洲革命。……我们知道，一旦美国资本发现自己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将会释放出无法估量的战斗力。从历史和自身经验中我们所知道的特权阶级争夺权力的一切斗争，比起美国资本为了对付革命的欧洲而发泄出来的暴力，都会黯然失色，不值一提。[②]

托洛茨基问道，那么共产主义怎样去坚守自己的阵地呢？只要共产主义仍然局限在欧洲的东边和亚洲部分，他就不指望这两大基本对抗力量之间的冲突会继续发展。他仍然寄希望于西欧的革命；而且他坚信，要经受得住美国的进攻和封锁，欧洲大陆诸民族就必须组成“社会主义欧洲联邦”。

---

① 《欧洲与美国》第 49 页。

② 同上，第91页。

> 我们沙皇俄国各族人民顶住了多年的封锁和内战。我们曾被迫忍受苦难、不幸、贫穷和瘟疫。……我们的落后本身转化为我们的优越性。革命得以存在下去,正因为它有广阔的农村腹地可以依靠。……工业化欧洲的前途……将会不同。一个分裂的欧洲不可能坚持下去。……无产阶级革命就意味着欧洲的联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平主义者、暴发户、异想天开者和饶舌者喋喋不休地谈什么欧洲联邦,但是自身对立的资产阶级是无法创造它的。唯有胜利的工人阶级才有可能将欧洲联合起来。……我们将为社会主义欧洲充当通向亚洲的桥梁。……社会主义欧洲联邦连同我们苏联将像巨大的磁铁吸引着亚洲各族人民。……欧洲和亚洲各民族的巨大集团那时就会不可动摇地确立起来,昂首面对美国。[①]

对全球阶级斗争最后决战的这种描绘不久就被当做纯粹的奇谈怪论而受到猛烈攻讦。[②] 无疑,托洛茨基只是夸张地凸现了影响当时世界政治的诸趋势中的一种趋势。在以后的20年里其他趋势跑上了前台:美国与苏联重新陷入相对的孤立状态;随着第三帝国的崛起,欧洲再一次成为世界暴风雨的中心;希特勒的征服与统治的威胁使美国与苏联结成暂时的联盟。然而,托洛茨基在凡尔赛和平条约签订后的最初几年就作出了他的预言,那时德国尚是一个战败国,希特勒只不过是一个锋芒未露的外省冒险家,而德

---

① 《欧洲与美国》第90-91页。

② 人们还能记得,列宁和托洛茨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就主张过社会主义欧洲联邦(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八章)。这个口号还被载入托洛茨基1924年写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中。然而不久之后,社会主义欧洲联邦这个口号和概念就被共产国际斥之为托洛茨基式的白日梦。

国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自夸。两大集团之间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展开的冲突此时不过才上演了一出暧昧的序幕。而托洛茨基从这出序幕中猜到了实际戏剧的轮廓、情节和主题。他远远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以至他的很多预言在30多年后仍未被事件所证实；但是其中大部分的真实性后来却已被证明，因此几乎没人敢把他的预言统统当做梦呓而等闲视之。

在《大英帝国向何处去?》这本书里，托洛茨基根据欧美关系已经发生变化的总背景详尽展望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命运。这本书是他在1925年初写的，当时莫斯科正开始重视苏联与英国工联新建立起来的联系。在上一年的11月，由英国工会代表大会主席A. A.珀塞尔(Purcell)率领的工会代表团访问了苏联首都，并且提出与俄国革命保持友谊和团结的庄严保证。苏联领导人热烈响应，希望能在珀塞尔、库克(Cook)以及英国工联其他新当选的左派领导人中找到可靠的盟友；而且由于英国共产党力量弱小、无足轻重，他们更乐意培养一种新的“友谊”。共产国际的极左政策正走向死胡同，它将被比较温和的策略所代替。这样一个问题被提出来讨论：革命是否可以“通过工联的康庄大道进入英国”，而不是通过“狭窄的共产党小路”。5月——托洛茨基刚完成《大英帝国向何处去?》——托姆斯基率领苏联代表团参加英国工联的年会，并在政治局授权下成立了英俄工会委员会，这个英俄工会委员会成为次年党内争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托洛茨基在他的书中指出，英国最重大的社会危机已经逼近。美国的优势、英国工业设备的陈旧、帝国的紧张压力和沉重负担交织在一起来孕育着这场危机。英国尽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却已精疲力竭。胜利掩盖了它的虚弱，但是不会长久如此。英国政府努力保持同美国平稳友好的合作，但在这合作的幌子下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英国人正在“和平地”交出他们的财政支

配权、商业特权和海上优势;但是——在托洛茨基看来——他们不可能无限地这样下去——最终将爆发武装冲突。大英帝国由于其海上霸权的丧失和殖民地人民的崛起而面临不可避免的瓦解趋势,这点已无法掩盖。不列颠已经失去了岛国的战略优势。最后,1918 年以来凡尔赛体制和德国经济的崩溃掩盖了英国对德国的工业劣势。但是,德国在美国扶植下已经迅速恢复了元气,并且重新作为英国最直接、最危险的竞争者出现在世界市场上,颠覆它的贸易和打破它的支付平衡,激化它所有的弱点。托洛茨基得出结论: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英、美之间充满斗争的危险的紧张关系;证明了阶级斗争的炽烈,的确,也证明了英伦三岛的革命形势。

在这番回顾中,他的分析所具有的现实性以及对前途瞻望中的错误都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托洛茨基本人令人信服地证明与美国的军事冲突对资产阶级英国来说无异于愚蠢的自杀,但他却料想不到英国能够避免这种冲突。虽说他也许是抓住了美国新优势的所有内在意义的第一位分析者,但他对大英帝国的看法仍然带有某种几乎是维多利亚时代或者爱德华时代的特点:他无法设想英国会"最终""和平地"拱手将其霸权让给美国。而且他将英国势力的衰落看做是一种大崩溃的灾变,而不是像实际上那样是一种缓慢、长期的过程。

尽管预言有错误,但在所有对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所作的分析中,《大英帝国向何处去?》一书仍不失为最有说服力的,也可以说是唯一有说服力的分析。这是托洛茨基与费边社会主义及其"不可避免的渐进"学说的一次遭遇战;而费边主义很长时间未能从这个打击中恢复其理论元气。[1] 托洛茨基以其敏锐的

① 一位美国批评者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评论道:世界自马丁·路德以来,还从来没有听到像托洛茨基这样激烈的痛诋。

和辛辣的讥刺剥去费边社会主义的伪装，揭露它对保守党与自由党传统的依附，揭露它的陈腐、保守、狭隘、标新立异、目光短浅的经验主义、虚伪的和平主义与民族自大，揭露它对既定观念的奴颜与媚骨和对待宗教、王室和帝国的盲目崇拜——总之一句话，揭露出所有那些品质，这些品质表明麦克唐纳、托马斯、斯诺登以及当时其他工党领袖都不适宜领导战斗的社会主义运动，而是将他们转变为革命的对立面，他们愿意坐享过去斗争的果实，但在新的冲突和动荡中只会惊慌失措、畏缩不前。托洛茨基毫不怀疑，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他们视为己任的将是使工人阶级在思想上迷失方向、在精神上解除武装、在行动上失去战斗能力。

托洛茨基无情的论证因其运用幽默而充满生气，却不减其锋芒：

> 英国的养鸽人通过人工选择获得了一个特殊品种，它的喙可以不断地缩短下去。不过这样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新种鸽子的喙如此之短，以至这个可怜的小生物无法啄破它的蛋壳，于是幼鸽便死在里面，这就是强迫限制革命行动的牺牲品，是短喙品种进化的终止。如果我们没有记错，麦克唐纳先生可以从达尔文的著作里读到这个故事。如果将麦克唐纳心爱的路线与有机界作一类比，那么可以说，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艺术就在于缩短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喙，不允许他啄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壳。无产阶级的喙就是它的政党。如果我们看看麦克唐纳、托马斯、斯诺登先生夫妇，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选择短喙和软喙的工作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1]

---

① 《大英帝国向何处去?》第 67 页。

费边社以其特殊的英国传统而自豪，拒绝把这个传统与外国马克思主义掺杂起来。托洛茨基反驳道，费边派培养的只是他们民族传统的保守类型，无视或压制其进步成分。

> 麦克唐纳先生们从清教徒那里继承来的不是它的革命动力，而是它的宗教偏见。他们从欧文主义者那里得到的不是它的共产主义激情，而是乌托邦主义者对阶级斗争的敌意。费边派从过去的英国政治史上借用的仅仅是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对资产阶级的依附。历史将其下部转向了那些绅士；而他们从那里读到的东西则变成了他们的纲领。[①]

托洛茨基为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扼要重述了英国两大革命传统，即克伦威尔传统和宪章派传统。他认为，清教徒虽然披着圣经外衣，但主要是政治革新者、斗士和一定阶级利益的捍卫者，他们站在具有宗教哲学思想的德国改革派和具有世俗观念的法国革命者之间。路德与罗伯斯庇尔在克伦威尔的个性中相遇。[②] 尽管克伦威尔身上有许多东西已经陈腐了——特别是他的刚愎自用，但他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英国共产党人应当老老实实地拜他为师。托洛茨基对这位铁甲军司令的赞赏中含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意："……不能不对那些使克伦威尔军队的存在和特点同红军的特点紧密相联的特征感到惊讶。……克伦威尔的勇士首先把自己看做是清教徒，然后才看做是士兵，正如我们的勇士首先承认自

① 《大英帝国向何处去?》第47页。

② 同上，第127页。

己是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然后才是士兵一样。"① 尽管克伦威尔缺乏对议会的尊重，但他毕竟为英国的议会制度和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与费边驯狗场的许多活狗相比，这位"早已死去了的17世纪雄狮"，这位新社会的缔造者，至今仍有更强的政治生命力。战斗的宪章派也同样如此，一旦英国劳工运动摆脱了渐进主义巫术，它就会使其遗产重新焕发青春。宪章派的口号和行动方法始终远胜过"麦克唐纳甜腻腻的折衷主义和韦伯夫妇愚蠢的经济思想"。宪章派运动失败了，因为它超越了自己的时代，是"一首历史前奏曲"，但它将在"一个无比广阔的新的历史基础上复活"。②

托洛茨基视共产党为这些传统的唯一合法继承者，尽管它还很弱小。希望左派费边主义者或工会领袖能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这种企望被他斥为"痴心妄想"。英国共产党的规模微不足道，而费边主义看来是强大和不可动摇的，这都是事实。但是，英国自由主义在它作为一个党在崩溃之前不也显得强大无敌吗？当工党占据了自由主义者退出来的位置时，领导它的是独立于工党的人，而这个党原来不过是一个小集团而已。伟大事变的冲击使那些老的、貌似稳固的政治组织土崩瓦解，使新的政治组织崭露头角。这种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冲击之后曾经发生过，而且还会再度发生。费边主义的兴起"只不过是工人阶级革命发展的一个短暂阶段"，而"麦克唐纳的宝座比劳合·乔治的宝座更加动摇不稳"。

托洛茨基以抑郁的心情问道，英国共产党人能否证明可胜任自己的任务呢？但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再次使他误入歧途，如同有时也使马克思误入歧途一样。托洛茨基写道："我们无意去预测(英国革命)会有什么样的进展速度，但无论如何，它可以用年来计

① 《大英帝国向何处去?》第126页。

② 同上，第130－131页。

算,至多5年,而绝不会是几十年。"[①] 多年以后托洛茨基论证说:在1926年的关键时刻,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策略指令和英俄委员会的政策削弱了英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学家可能会怀疑:这些命令尽管是愚蠢的,但是否就是英国共产主义运动长期以来软弱无力以及它在30年之后仍然只是徘徊于英国政治运动外围的一个派别的主要原因呢?不过托洛茨基所预言的巨大社会危机的确以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为标志而爆发了,这是工业史上最长、最顽强的一次斗争;而英国则在总罢工期间濒临革命的边缘。

托洛茨基的著作在英国引起激烈的争论。H.N.布雷斯福德在《大英帝国向何处去?》一书英文版序言中首先发难。在承认托洛茨基作为一位分析者与一位作家的卓越成就和熟悉英国历史与政治的同时,布雷斯福德写道,不管怎样,托洛茨基并不懂得英国工人运动中民主的和非国教的宗教传统,也不懂得"深深刻在英国人心里的服从多数的本能"。拉姆齐·麦克唐纳、[②] 乔治·兰斯伯里[③] 以及其他人将托洛茨基的观点斥之为外国人的误解。相反,伯特兰·罗素则认为"托洛茨基对英国工人运动的特点了如指掌";而且他也同意社会主义是跟教会、王室势不两立的。然而罗素不能理解,一个并非英国人民敌人的人怎么能煽动他们革命,而革命的后果可能是美国人的封锁和战争,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注定是要失败的。[④] 另一些作家则嫌恶托洛茨基对麦克唐纳的冒渎不敬,尽管其中多数批评者在几年后麦克唐纳与工党决裂时要把这个"叛徒"撕得粉碎。

---

① 《大英帝国向何处去?》第14页。托洛茨基补充道:"此刻革命的蜂巢里已挤满了群蜂!"第52页。

② 《民族》1926年3月10日。

③ 兰斯伯里主编的《劳动周刊》1926年2月27日。

④ 《新领袖》1926年2月26日。

托洛茨基对他的批评者们多次作出回答。[1] 在一次对罗素的回答中，他否认任何出于俄国利益而煽动英国革命的企图。他写道，任何国家的工人都不应当为了苏联利益去采取任何步骤，何况苏联并不追求它自己的利益。但他仍未被罗素理性的和平主义说服：

> 革命照例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出来的。如果能够按照理性方式事先规划好革命道路，那么也完全可以避免革命。革命表明用理性主义方法改造阶级社会已是不可能的了。逻辑推理——即使罗素能把它们转变为数学公式——是没有力量对抗物质利益的。统治阶级宁愿让文明跟数学一起毁灭，也不肯放弃他们的特权。……你不可能摆脱非理性因素。如同在数学上我们应用无理数是为了得出完全理性的结果一样，在革命的政治中同样如此……人们要将一种社会制度转变成合理的秩序，唯有坦率承认社会本身所固有的各种矛盾，这才有可能通过革命手段去克服它们……。[2]

英国共产党最初欣然热情地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著作，认为这位巨人要来加强他们软弱的队伍了。[3] 但在下半年，在英俄委员会的卵翼下他们又有了别的想法，并开始为托洛茨基对左翼工会领袖的抨击而感到尴尬（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即1925年11月，他就在这一点上遭到俄裔美籍共产党人M.奥尔金（Ольгин）的批评，

---

① 《真理报》1926年2月11日，3月14日。

② 《大英帝国向何处去？》第2版第59页。

③ 可参见R.帕姆·杜特的评论，载《劳动月刊》1926年4月。

此人直到不久前还是托洛茨基的热烈崇拜者)。[①] 到了1926年春天,英国共产党就向联共政治局指控托洛茨基对它的"敌视"了;而托洛茨基不得不去反驳这种责难。[②]

※　　※　　※　　※　　※

就在托洛茨基与其政敌斗争的间隙中,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了人事上与思想上一次重大的重新组合,在它的领导和队伍中间出现了新的根本的分裂——这个分裂构成了此后15年的政治历史背景。

20年代中期常被称为新经济政策的太平年代是1917年与本世纪中叶之间苏联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享受和平生活并尝到幸福滋味的唯一时期。对这幅美景不能只看表面。这个时期呈现出来的仿佛田园牧歌式的景象在于它同前一个时期与后一个时期的对比。20年代中期没有经历任何类似20年代初期和30年代初期那样的血腥斗争、社会动乱和饥荒匮乏。时间的流程正在治愈这个民族所遭受的创伤。经济正在复苏。农民耕种他们的土地并获得收成。工业的车轮不再停滞不前。被破坏了的桥梁铁路、烧毁的房屋、炸毁的学校都在重建之中。曾被洪水淹没的煤矿已经恢复生产。城乡联系重又确立。私人贸易繁荣昌盛。商人再也不用携带满袋不值钱的纸币了:卢布的币值尽管还有些浮动,但已重新获得了金钱的神秘尊严。在城市的通衢大道和中心广场上还出现了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

但是,这种繁荣景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这个从波兰和

① 《自由》杂志1925年11月15日。

② 托洛茨基档案,1926年6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头几天会议摘要。

波罗的海边界延伸并覆盖了前沙皇帝国整个领土的庞大且已联合起来的苏维埃共和国仍然陷于极度贫穷和社会紧张局势的震荡中。全国人口只有1/6生活在城镇;工业中就业劳动力甚至还不到全国劳动力的1/10。复兴的步伐缓慢得惊人。矿山和工厂的总产量还未达到战前的3/4;它们生产不出任何引擎、机床、机动车辆、化工产品、肥料、现代农业机械。苏联国家至今还不具备现代社会应有的大多数工业要素。大多极为原始野蛮、充满欺诈的繁荣的私人贸易就像泡沫一般掩盖着民族苦难。

当然,现在农民可以享用他们扩大了的耕地上的产物,多年来第一次放开肚皮吃上了自己的面包。但这不过是文明最底层的"繁荣"。还缺乏更高层次的需求和舒适,到处是肮脏、黑暗和原始的乡村愚昧。大约1/3自己不种粮食的农村人口甚至被排除在这样的"幸福生活"之外。因为农民比以前吃得多,城镇居民就不得不比以前吃得少:与他们在沙皇统治下相比,他们消耗的粮食只有原来的2/3,肉类只有原来的一半。也没有更多的产品可供出口:俄国销往国外的谷物总量仅及过去出口量的1/4。大多数俄国人民仍跟在旧社会一样衣衫褴褛,赤足而行。似乎只在两个重要方面有显著的进步:卫生和教育。俄国人比从前使用的肥皂更多了,有了更多的学校。

在社会紧张关系中,城乡之间的慢性对抗是最危险的,城镇居民感到他们的贫寒是农民造成的,农民无疑是革命的主要受益者。相反,农民却认为他们受到城镇居民的掠夺。双方的感觉都有一定的道理。城镇工人挣的钱远远少于革命前;而且失业工人高达200万,几乎等于大型工业企业中的就业人数。工人常拿自己的匮乏对照农村中粮食的富足。农民则愤愤不平:他们必须为工业品支付高于1914年以前两倍的价格,而他们的产品价格却没有比战前高多少。这两个阶级都认为受到对方的剥削。实际上,双方

都是由于国家贫穷而受“剥削”的。

但是不管城镇还是乡村,都没有体现出任何自身一致的利益。每一方都疲于自身的矛盾。工人知道耐普曼、捎客和官僚集团骗取了他的劳动果实。他付出高价购买粮食,而农民售粮却所得甚微——因为捎客控制了9/10的零售贸易,从差价中大发横财。在工厂里,工人面对着的是代表国家雇主的经理,他们剥夺了工人参与工厂管理的那份权益,压低工资,迫使工人干更多更重的活。[①]工会官员和党支部书记站在经理一边,他们离工人越来越远,而且常常充当工业纠纷的仲裁人。国家雇主实际上极少愿意满足工人的要求。国民收入少,生产效率低,急需增加资本投入。当经理、党的书记或工会官员催促工人生产更多产品时,工人就咒骂他们的新“老板”;但他既不敢表达他的要求,也不敢放下生产工具。在工厂大门外,急于找工作的人们已经排成了长队。正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失业后备军”再一次有利于压低工资与就业条件。

农民的分化虽然不那么显著,却并非不是现实。农民从土地革命和新经济政策中得到了不同的好处。农民的中间阶层壮大了。出现了更多的小土地所有者,更多的中农,他们靠自己土地上的农产品为生,既不必为更富裕的农民种地,也不在自有土地上雇工。每10个农民就有3或4人属于这个阶层。有1或2人属于富农,他们雇工,扩大耕地,跟城镇做生意。每10个农民中约有5人属于贫农,他们从地主财产中分到了一点儿土地,但几乎既没有马,也没有农具。他们向富农租用马和农具,也向富农买种子、粮食,并向富农借钱。为了还债,贫农只好在富农的土地上干活,或者把自己的小块土地出租一部分给富农。

农村现实生活的每一步都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发生矛盾。列

① 每五六个工人中,仅有一个受雇于私有企业。

宁的政府在剥夺地主的同时颁布了土地国有化的命令。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农民只能使用土地，但并不拥有土地。禁止他们出卖或出租土地。布尔什维克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抑制不平等现象，防止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现实生活却慢慢地、不可避免地越出了这些藩篱。在行政权力无法顾及到的无数日常交易中，土地在转手之间便卖出去了；资本主义关系逐渐形成，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最原始、最粗糙的农村资本主义形式；根据任何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即使俄国的富农也只是贫穷的农场主。但是这种标准不适用于俄国。农民中新的阶级分化是在极端低下的经济水平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并未使冲突缓和，而是使它变得更加尖锐。虽然只拥有少数马匹和农具、拥有少量粮食储存和现金，但它所给予一个人直接支配另一个人的权力，比富裕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拥有更多资本所给予人支配人的权力要大得多。革命后 10 年，无地农村雇工(不能与贫农混淆)的工资还不到革命前贵族地主付给他们的工资的 40%。他们的工作日太长；而他们的生活条件却比奴隶好不了多少。旧式地主在他的庄园里有很多雇工，而富农雇工却少得多；因此雇工们不能像他们过去组织起来反对地主那样有效地组织起来反对富农和保护自己。贫农有时甚至比雇工更受剥削，更加孤立无援。

在这些关系中潜伏着剧烈的社会冲突因素；但这种冲突不会自动展开和表现出来。尽管穷苦农民可能憎恨富农的掠夺，但他们完全依赖于富农，几乎不敢挺身与之对抗。富农领导着一个百依百顺的农村公社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他们把农民的仇恨转移，把它转向城镇、工人、党的鼓动员和政治委员。

在城镇和乡村之中以及它们之间的所有这些紧张关系为苏联各主要民族之间的不和播下了祸根。我们从军事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过渡中看到了这种不和的存在，也听到了列宁将卑劣的

俄国官僚集团视做罪犯而加以挞伐。随着岁月流逝，问题愈益严重。更严格的政府集权化，其本身自然而然地有利于俄罗斯人，而不是有利于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格鲁吉亚人，更不必说苏联亚洲部分那些更不开化的少数民族和氏族了。来自莫斯科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激怒并加深了边远地区共和国人民的地方民族主义。富农和耐普曼天生就是民族主义者。在俄罗斯，他们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而在其他共和国，他们则是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知识分子极易受流行情绪的影响。产业工人中的国际主义日益淡薄。工人阶级通过吸收农村的新成分而正在重新组成和成长，这些新的成分把农民的所有政治倾向——排斥外国事物和强烈的地方主义的忠诚——都带进了工厂。

紧张局势不时地失控。1924 年秋，农民暴动席卷了整个格鲁吉亚，但遭到了血腥镇压。农民的不那么暴烈但更顽强地反抗政府的迹象随处可见。在 1925 年 3 月举行的苏维埃代表选举中，许多农村地区有 2/3 以上的选民弃权；政府只得重新布置选举。出现了一些零星的鼓动，要求成立独立的农民苏维埃。强悍的、具有政治头脑的富农到处通过现行苏维埃甚至农村党支部实现他们的利益和野心。农村中还出现了不少零散的恐怖行为。那些从城镇里派下来的党的鼓动员被棍棒活活打死。在报纸上报导对雇农剥削的“工人通讯员”被私刑处死。富农先前曾利用了新经济政策向他们提供的一切机会，而现在却感到受到了限制，因此千方百计要公开或秘密地取消它。他们要求提高粮价、允许出卖或租佃土地，要求有无限自由的雇工权，总之一句话，要求“新的新经济政策”。

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场国家危机的到来，这场危机或许可以推延两三年，但结果只会更危险。执政党必须找到出路。然而，党

和中间派。这次分裂在许多方面都有新的特点，它与早期多次派别斗争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早期派别斗争从未有过如此明确稳定的界线划分。派别和集团随着导致它们对峙的那些问题一同冒出来，又一同消失。结盟关系随着争论而变化着。这次争论中的对手在下次争论中携起手来变成了朋友，反之亦然。各派别和集团并不在意使自己永存，它们没有自己严格的组织，也没有它们自己的纪律。这种局面的改变自从喀琅施塔得暴动以来就开始了，但只是现在才完全彻底地形成。从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直到各基层组织，党都被撕裂了，尽管愈往下分化愈不明显。不但导致分裂的问题大都是新的，而且它的后果更是新的和致命的。

有时让人吃惊的倒是人们重新组合和采取新立场的方式。如同在任何政治运动中一样，布尔什维克中的某些人物历来倾向于温和立场；另一些人则表现出激进倾向，还有些人一贯是机会主义者。在当前这次重新组合中，许多人的行为仍然符合其性格。例如，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一贯远离左派共产主义者，因而十分自然地在新右派的领导行列中找到了他们的位置；大多数机会主义者，特别是党的机关的职业管理者，采取了中间立场；在一贯坚定的激进派中，有些人已经加入了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或托洛茨基派；其他人仍在考虑应该站在哪一边。但是出人意外的惊人转变也出现了。有些布尔什维克，其中有一些最出色的领导人在新环境和困难的压力下并经过苦苦思索后抛弃了原有的态度和立场，转而采取似乎否定他们至今所赞同的一切的新态度和立场。人们毁掉了他们崇拜过的事物而崇拜他们毁掉了的事物。

产生新的分歧的部分原因是：某些集团和个人行使着权力，而另一些没有。不少掌权七八年、一直发挥着重大作用并享受着政治特权的左派共产党人是从统治者的观点而不是被统治者的观点去对待公众事务的。而在另一方面，“温和”的布尔什维克这些年

来都是生活于群众之中,与群众有着共同的经历,不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他们都表达了群众的幻灭,说话也像个“极左分子”。重新组合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刚刚概述过的那种更广泛的阶级对抗由于在一党制下找不到合法的政治表现方式,因而就找到了在一党内不合法的和间接的表现方式。富农不可能把他们的代表派到莫斯科在任何全国性大会上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不可能形成压力集团。工人也不能指望他们名义上的代表能自由充分地表达他们的不满。但是每一个社会阶级和集团都会以非政治的形式施加它的压力。富农控制着城镇人口供应所依赖的粮食储备:6%—10%的农民生产出市场销售粮食量的一半以上。这就给了他们一种强大的武器:他们通过抑制供应而周期性地制造城镇中的粮食短缺。再不然他们就拒不购买价格过高的工业品;大量卖不出去的工业品因而积压在工厂的院子和仓库里。生产过剩的症状就这样出现在这个真正患了生产不足之疾的国家里。工人意志消沉,出工不出力,借伏特加浇愁。疯狂而又普遍的酗酒严重摧残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精神面貌。尽管党要竭力冲淡这些互相冲突的社会压力并使自己从中摆脱出来,但是它并没有免疫力。粮食短缺和无销路的工业品积压惊醒了党员们,使他们看清了现实。某些布尔什维克更能感受到工人的要求;另一些则对农民的压力更为敏感。城乡之间的巨大裂痕也使党内及其领导集团内产生了巨大裂痕。

自从季诺维也夫谈到“不自觉的孟什维克”以来,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身边就能找到这些“不自觉的孟什维克”,他们在党的队伍中形成了自己潜在的党。而现在却发现,更重要的是“不自觉的社会革命党”这样潜在的党。真正的社会革命党人,如他们的政治前辈——民粹派一样,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偏爱农民,他们不肯对农民作任何阶级区分,既不把

他们看做富农，也不把他们看做贫农，而是一概美化为土地劳动者。他们拒不让农民将其利益服从于产业工人的利益，而且也不认为农民争取私有财产的努力跟社会主义有丝毫相悖。理论上模糊并热衷于感情化的概括，社会革命党代表着城市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对立面——农业，一种社会主义变体——准重农学派。很自然，在一个有4/5人口生活在土地上并依靠土地为生的国家里，这样一种思想体系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布尔什维克曾经镇压了主张这种思想体系的党，但是他们却无法摧毁赋予它生气的那些利益、感情和情绪。现在那种感情和情绪已经渗透到他们自己的队伍中来了。在一个一贯敌视民粹派观点的环境里，这种情绪是不可能用通常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但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三棱镜折射，它最终用布尔什维克的声音说出来了。这一种倾向在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吸取了强大动力，三驾马车在这个运动中竭力要把托洛茨基诬蔑为俄国农民的敌人。这个指控部分是冷血动物的一种创造，但是它也概括了一种现实的情绪。新民粹派倾向不久就获得了强大实力，直到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目前暂时休止期导致党内新右派集团的诞生。

出来充当右派集团的鼓舞者、理论家和思想家的人是布哈林。他担任这个角色多少令人不解。自从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来，他一直是坚持“严格的无产阶级”观点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主要代言人。他曾激烈谴责列宁的“机会主义”，反对托洛茨基的军队纪律，维护非俄罗斯民族而反对斯大林。后来，在1923年初他曾同情过托洛茨基的激进思想。然而到了1924—1925年，他的名字却成了温和、“机会主义”和偏向富农的象征。这个变化不是偶然的。布哈林的左派共产主义思想是建立在他对欧洲尽早发生革命的期待上的，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对这个前途下了大赌注，但恐怕没有一个人像布哈林那样执著。大家都将欧洲

革命看做是俄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出路。谁也不相信一个弱小的工人阶级在千百万财迷的农民包围下能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布哈林更不相信。他热烈地渴望,西方工人能崛起,推翻他们的资产阶级,向俄国伸出援助之手。他给西方工人头上绕上一团革命理想化的光环,过分夸大了他们的阶级意识和战斗精神。他愤激地反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因为他担心布尔什维克俄国向霍亨索伦王室低头的情景会让西方工人阶级泄气沮丧,而且还担心,布尔什维主义与后者中断了来往,孤零零地同俄国农民呆在一起,那它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现在,布哈林发觉布尔什维主义真是孤零零地同俄国农民呆在了一起。他对西方革命不再抱希望了。他伙同斯大林一起宣布"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在此以前,布哈林曾充满信心地谈到世界资本主义迫在眉睫的崩溃,现在他又以同样的信心断定它是"稳定"的。从这个新的角度出发,他对国内形势有了新的看法。他在感情上无法接受原先全部推理所指向的那个结论:俄国革命走上了一条死路。相反,他却得出结论,因为西方工人无法成为同盟者,因此布尔什维主义必须承认俄国农民是它唯一真正的朋友。就跟以前他期望于欧洲无产阶级那样,他又以同样的热诚、同样的希望、同样强烈的理想化转向农民。不错,党在列宁的鼓励下一直在培植"工农联盟"。但是自从1917年以来,布尔什维克从未跟富农建立友谊;而列宁始终把中农甚至贫农看成是"摇摆不定的同盟者",他们受私有财产的诱惑很可能会变成敌人。这种如此困难和动摇的联盟现在已经不能使布哈林安心了。他希望把这个联盟建立在一种看来更广泛、更坚实的基础上。他希望说服他的同志们:必须迎合全体农民,停止挑唆贫农去反对富农,甚至应该将希望寄托在"富有的农民"身上。这就意味着在俄国农村放弃阶级斗争。或者是囿于旧的思维习惯,或者是出于策略考虑,布哈林还不敢公

然推出这些结论；但是这些结论却被他的学生马列茨基（Марецкий）、斯捷茨基（Стецкий）以及其他"红色教授"毫不隐讳地替他提出来了，他们在大学、宣传部门和报纸上到处宣传新民粹派的思想。

布哈林还有一些更实际的考虑。在新经济政策的体制内，布尔什维克与贫农共同对付富农的"联盟"即使不是一点儿效果也没有的话，那么也是没有多少积极效果。贫农甚至中农无法养活城镇。他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勉强养活他们自己。城市工人的福利乃至生存都依赖于少数富农。这些富农当然很想卖出他们的粮食；但是他们卖粮是为了致富，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他们的卖主地位是极其稳固的。的确，从前城镇对乡村的依赖还从未像现在这样一边倒，这样严重，这样露骨。政府和党要改善这种境况，是不可能采取骚扰、刁难富农以及挑动贫农反对富农的办法的。富农苦于征集、索取和价格控制，受到销售、租赁土地和雇工等方面限制的困扰，因而他们地种得更少，收成更少，卖出的也更少。政府必须作出抉择：或者是摧毁其实力，或者是允许他们积累财富。党内没有一个集团建议剥夺富农的财产——对任何集团来说，剥夺数百万农民的财产是不可设想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不允许的。[①]

因此，布哈林的结论——党必须允许富农更富——就有了一种特殊的现实性和连贯性。他争辩道，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就在于利用私人企业重建俄国经济；但是私人企业如果得不到酬报，就不能指望它会发挥作用。社会主义压倒一切的利益在于增加国家财

① 由于2000多万农场至少有10%属于富农，实施财产剥夺将马上影响到200万至300万的农场，即使中农不受损害，但中农的上层难以同富农区别开来，因此受影响的数字必然远不止于此。

富;如果群体和个人能同国家一起富裕起来,那么国家利益便不会受到损害——反过来,如果他们的钱柜装满了,他们也会使整个国家富裕起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布哈林向农民发出了他那著名的呼吁:"发财吧!"

布哈林没有看到的问题是,富农竭力牺牲其他阶级的利益而使自己富裕起来:他们付给雇工低工资,压榨贫苦农民,收购他们的土地,试图向他们和城市工人索取更高的粮价。他们逃避税收并把负担转移到贫民身上。[①] 他们竭力牺牲国家利益来积累自己的资本,因而延缓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内的积累。布哈林津津乐道的是社会画面中的那个部分,其中不同阶级和群体的利益、各种"成分"的利益是相互补充、彼此一致的,以至富农、贫农、工人、工厂经理甚至耐普曼,显得亲如手足、十分幸福。社会画面的这一方面是完全真实的,但它仅仅构成其中的一个部分。他忽视了另一部分,其中大家互相倾轧和勾心斗角,自家兄弟却变成了敌人,都想割断对方的喉咙。这个布尔什维克的巴师夏(Bastiat),[②]他颂扬新经济政策下苏联社会的"和谐的经济",并祈求不要出什么事扰乱这种和谐。他打心底发出这个祈求,因为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消灭富农阶级"的凶象将降临大地。

第一次重大争论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成为他的论敌的那次争论,布哈林在争论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托洛茨基主义根据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阶级冲突和阶级对

① 那时强制推行的单一农业税有利于富农。那些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出让给富农的贫农为了获得马匹和农具以便在剩下的那部分土地上耕作,照例得为让给富农的那块土地支付土地税。间接税在苏联预算中越来越重要,一般加于贫农身上的负担远比富农身上的重。

② 巴师夏,克劳德·弗雷德里克(1801－1850)法国经济学家。鼓吹劳资调和论,否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译注

抗，强调社会主义利益对私有利益的优先地位，这与新民粹派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而在他们各自集团的内部，这两位原是《共产主义ABC》一书的合作者，现在却分别代表着布尔什维克思想中相反的两极。1924年底，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片断出版时，这场争论随即展开。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将他的全部论点都建立在迫切需要加速工业化这一基础上——俄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整个前途都系于此。由于俄国的落后，苏联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手段来实现工业化。与布哈林的假定相反，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肯定会与私人积累发生冲突。在国际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将取决于这两个制度的相对财富、效率和文化实力。俄国是带着一种陈旧的、基本还是前工业化的结构进入竞争时代的。她无法承受同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俄国不得不采取和坚持"社会主义垄断制"，只要她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所达到的水平。[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争辩说，即使俄国已经不再孤立，即使全欧洲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统治，但全欧洲仍要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尽管更少强迫、时间更短，因为它的生产资源还赶不上美国的资本主义。）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问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实质是什么呢？在不发达国家里，社会主义工业化自身不能产生快速工业化的资源。它的利润和剩余价值只能构成所需积累资金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应当从可能成为工资基金的部分和私有经济成分所赚得的利润和收入中得到（用凯恩斯主义的话来说，国有化工业的节余与投资需要相比实在少得可怜，因此私有企业的节余应当为国有化工业提供大部分投资资本）。为了社会主义

①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第1卷第1章第101－140页。

经济成分的积累需要,只能给私有成分的积累规定严格的限制;而政府应该强迫实施这个限制。在某种意义上,工人国家在这一过渡时期内不得不"剥削"农民。它不能迎合消费者的利益;它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由此形成的消费品相对短缺意味着不同社会集团的不同消费水平,意味着管理者、技术员、科学家、熟练工人等人的物质特权。这种不平等尽管讨厌,却不会产生新的阶级对抗。享有特权的官僚集团不会形成新的社会阶级。官僚集团与工人之间在收入上的差别,不论就其性质或社会意义来说,跟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正常"差别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只是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平等,而非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对抗。这样的不平等必须、并且只能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和教育的普及而消除,财富的增长和教育的普及会使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逐渐模糊并最终被消除。同时,"我们应当采取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的观点。……我们还不是生活在生产为了消费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只是处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我们生活在积累规律的铁蹄下。"[1]

在这个过渡时期,工人国家失去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优越性,却还没有从社会主义优越性中获得好处。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中最严酷的时刻……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通过这个过渡阶段,到达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其优越性的那一点"。[2]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并没有主张产业工人的工资和农民的收入在这个过渡时期实际上要被压低(如同斯大林时期那样)。他所指的和所说的是:国民收入将会由于加大积累而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工人和农民的收入也会增长;

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第240页。

② 同上,第63页。

但是因为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投资，他们的收入可能增长得不那么快。

他强调说，积累"规律"宣告自己是一种"客观力量"，在某些方面相当于资本主义的那些"规律"。资本主义的那些规律决定人们的经济行为，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那些规律，也不管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意图如何。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将最终推动国有化工业的经理即党的领导者着手去加强工业化，而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暂时还会以忧虑甚至反感的心情接受这个建议，即国有工业为了扩展就必须吸收私有经济成分的资源；逐步使之社会化，并把数百万分散、小型、没有效益的农庄改造为大规模、机械化的生产者合作社。然而，负责经济事务的那些人的"主观看法"并不一定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我们国有经济的现有结构经常证明它自身比我们整个经济领导体制更为进步。"[①] 新的官僚集团也许会抵制过渡时期的逻辑；但它不得不按照这个逻辑而行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始终认为革命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会传播到西欧去。但即使这样，原始积累的问题"至少 20 年内还会是我们注意的焦点"。[②] 差不多 40 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并且仍旧这样处理。

托洛茨基并不完全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虽然在基本思想上他们两人是一致的。但他回避对这些分歧进行任何公开讨论。他不想为难很快就要遭到猛烈抨击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当时他们的分歧没有产生任何政治后果——只是 4 年之后，当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都被放逐出莫斯科之后，这种分歧才变得严重起来，并导致了痛苦的绝交。

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第 184 页。

② 同上，第 254 页。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其论点的那种纯粹抽象的方式很不合托洛茨基的口味。他本人对待同样的问题更多地是从经验出发，当然在方法上也不那么严密。作为一个学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强调“剥削”农民的必要性时根本不讲策略，这就让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宣传家抓住了把柄。当然，他是在严格理论的意义上谈剥削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谈到资本主义对哪怕工资最高的工人的剥削，因为他们创造出来的价值要大于他们的工资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他证明说，在两大经济成分之间的交换中，社会主义成分对私有成分会是获取大于给予，尽管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私有成分中的价值总量也同样会增长。但是官方批评家抓住了剥削这一刺激性的字眼儿，赋予它庸俗的含义，歪曲它的原意，使人们以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说使农民的贫困化及削弱是积累的必要前提。他试图纠正自己并“收回”那种刺激性的字眼儿。但事与愿违:这等于说那帮批评家一点儿没错。

读者还会记得，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托洛茨基谈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克拉辛问这是否意味着对农民的剥削;托洛茨基当时跳起来否认这一点。[1] 现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又提出同样的问题并作了肯定的回答。据内部证据，这个回答在托洛茨基看来太直率、太生硬。他无论如何不肯承认这种观点:农民照例会从始至终为原始积累付账。[2] 托洛茨基也不主张让工业化的步伐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希望的那样是强制的。他们之间甚至还有更深刻的分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参照国际革命构成了他的原理，它意味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可以由苏联单独完成，或可能由

① 参见本书第二章。

② 布哈林在争论中强调了托洛茨基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之间的这种分歧。布哈林:《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第56页。

苏联同其他不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完成。这种瞻望在托洛茨基看来是不现实的，他看不出苏联怎么能单独地把它的工业水平提高到西方国家所达到的水平；而且正是这种瞻望为在理性上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妥协打开了缺口。托洛茨基也不能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谓"客观力量"或原始积累的逻辑会将自身强加到党的领导人头上，把他们变成它的代理人，而不管他们怎样想和打算。这种观点在托洛茨基看来无疑是太僵硬的决定论，甚至是宿命论，它过分依赖社会主义的自动发展而不是依赖战斗者的意识、毅力和行动。

但是，这仍是理论性的分歧，仅仅包含着政治不和的种子。即使托洛茨基认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夸大了工业化的理由，但这毕竟是他们两人共同捍卫的理由。如果他觉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政治上对待农民不够策略的话，那么他自己也正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样批判官方对富农的迎合政策。在理论上，《新经济学》的原理设想可在单独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在政治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并不相信在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最后，尽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确信积累法则能够压倒党的领导人的经济保守主义，但他并不仅仅依赖那些法则的作用——他始终是一位斗士，号召布尔什维克履行自己的责任而不要坐等必要性来推动他们。因此托洛茨基同情地注视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点，即使对其有所保留。

布哈林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全部概念斥为"奇谈怪论"。[①] 他抨击最猛烈的是剥削农民的这个论断。他声称，如果布尔什维克根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思想行动，就会破坏工农民联盟，并表明无产阶级(或以它的名义进行统治的那些人)成为新的剥削阶级

① 布哈林：《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第21页。

而竭力将其专政永久化。国有工业不能也不应靠“吞没”私有经济成分而发展——相反,只有依靠它才能取得重大进步。[①] 按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设想,农民市场只起到从属作用;他认为国有工业产品的主要出路在于工业本身,在于它对生产者产品的不断扩大的需求。布哈林反驳说,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农民市场必须成为工业化的基础。正是乡村对商品的需求首先支配着工业发展的步伐。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所担心和恐惧的是国有经济的“寄生性垄断倾向”;而他从农民放任的经济活动中看到了对这种倾向的主要制衡,如果说不是唯一制衡的话。

然而,布哈林正是在这里陷入了根本的困境。因为他的论点反对的正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他问道,如果不是从农民市场中,那么国有工业从哪儿能找到“这样的刺激——它能推动我们前进、保证我们的发展并取代私有经济刺激即利润刺激呢?”[②]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农民所有权是与充分成熟的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因此,布哈林实际上给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打上了一个问号。他暗示,社会主义成分不能在自身中找到任何有效替代物来替代利润的推动力,因而它最终只能从私有成分中活跃的利润动力中获得刺激。[③] 布哈林以准民粹派的方式指望农民把国家从国有经济的垄断掌握下搭救出来。他主张,不但应当允许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繁荣起来,而且农民的需求应该决定国家迈向社会主

① 布哈林:《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第16页。

②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回答说,工人捍卫其消费利益的压力能从根本上抵消官僚化管理经济的寄生特点。这样的压力只有当工人阶级自由地面对国家捍卫自身利益时才能感到,那是在工人民主制条件下才能做到的。

③ 全党包括布哈林仍然恪守着列宁发展农村合作社的纲领。但是这种恪守并不影响实际政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争辩说,即使是列宁的纲领也不适合,因为它强调的不是生产者的合作社,而是别的较次要的合作形式。

义的步伐。在这样的条件下，进步将是缓慢的，甚至是很慢的；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将一寸寸地向前挪动，在我们身后拖着一辆笨重的农民大车。"[①] 关于俄国发展的这种想法更像是托尔斯泰式的而不是马克思式的。再没有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想法更与它对立的了，他认为"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通过这个过渡阶段。……我们生活在积累规律的铁蹄下。"这是两个格格不入的纲领。

只要这两位理论家一直以一定程度的专业语言进行争论，就不会在小圈子外引起太大的激动。但这些争论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采取更通俗的形式，成为更广泛的政治辩论的中心。然而并不是被迫沉默并已涣散的托洛茨基反对派首先挑起争论的。对布哈林的新民粹主义、他与富农的"调情"和他对俄国工业落后实际上的容忍，最强烈的反应来自列宁格勒。主要在由季诺维也夫领导的该市党组织内，一个新左派作为新右派的对抗者形成了。在苏联各城市中，列宁格勒一直是最无产阶级化的一个城市。它具有最强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传统。它的工人比任何人都更痛感到实行大胆的工业政策的必要。这个城市的机械厂和船坞由于钢铁供应断绝而停工。列宁格勒人比任何人都更不同意俄国农民应该决定工业重建的步伐；他们也比任何人都更不能忍受这种前途：他们只能慢吞吞地爬行，并懒洋洋地拖着笨重的农民大车。俄国城市对俄国农村这种惰性和保守主义的所有对抗都集中于这个古都。尽管它的党组织是以官僚主义方式运转的，而且长期以来已不再能代表工人了，但也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种普遍的不满。它的组织者和鼓动者不得不与大量的失业者打交道，并受到他们愤懑和焦躁情绪的影响。普遍流行的情绪立刻感染了党

① 布哈林：《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第9页。

的各级领导集团,并推动他们去反对新右派。季诺维也夫在192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领导着对布哈林派的挞伐。整个北方局都动起来了。共青团也斗志高昂地投入了这场斗争;列宁格勒的新闻界开始了猛攻。

新的裂痕也同时在政治局里出现了。三驾马车一旦击败托洛茨基并把他从军事人民委员部排挤出去,他们团结的纽带就断裂了。莫洛托夫后来回忆说,他们之间的不和在1925年1月就开始了,当时加米涅夫提议斯大林接替托洛茨基在军事人民委员部的位置。根据莫洛托夫的说法,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希望藉此把斯大林从总书记处撵走。[①] (相当早的时候,即在1923年10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有了这种打算,甚至试探过托洛茨基。但是托洛茨基当时感到同季诺维也夫携手没有什么好处,他认为季诺维也夫是他最邪恶的政敌。)[②] 斯大林本人把这次冲突的开始一直追溯到1924年末,当时季诺维也夫提议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而斯大林回答说他反对"割除和流血"。[③] 托洛茨基离开军事人民委员部之后,季诺维也夫建议让他去做管理皮革业的低级工作;而斯大林则说服政治局作出了侮辱性相对小些的任命。季诺维也夫一怒之下就发动列宁格勒党组织攻击斯大林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倾向于托洛茨基,把他们斥为"半托派分子"。

但是在这些小花招中还没有暴露出任何关于政策问题的分歧。只是在1925年4月最后一周中央委员们才注意到三驾马车之间出现了政治破裂的迹象。在为即将到来的党的代表大会准备的决议

① 参见《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484页。

② 这是伏罗希洛夫在托洛茨基在场时所作的揭露,托洛茨基没有否认。同上,第388－389页,季诺维也夫基本肯定了揭露的内容。同上,第454－456页。

③ "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17页。

文本中，斯大林打算宣布在一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这一思想他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形成了，但现在他才第一次企图使它得到正式承认，并要把它纳入党的学说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示反对。不过三驾马车谁也不想在向托洛茨基摊牌之后这样快就暴露出他们的不和去惊动全党。他们把问题掩盖起来，同意提出一种含糊的决议，在开头部分让全党知道列宁从来就不相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在结尾部分却谴责托洛茨基不相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①] 手里拿着这份自相矛盾的决议文本，三驾马车仍以共同阵线姿态出现在代表大会面前，在作出各种具有紧迫现实意义的决定时他们继续保持一致。代表大会投票赞成扩大私有农业和私有贸易的自由、降低农业税、废除对土地出租与雇工的种种限制。这些决定显示出布哈林思想学派的显著影响。但是没有一个领导人反对这些决定，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因歉收而震惊，并且都承认有必要给予农民新的刺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所有这些决定都是暧昧不清的，致使每个解释者都能从中找到他所希望的东西。

又过去了四五个月，在整个夏天，三驾马车之间的分歧仍未公开化。季诺维也夫和列宁格勒人发动运动仅仅是反对布哈林和李可夫，反对新民粹派的"红色教授"。他们这样做等于帮助斯大林巩固自己的地位。政治局一直是由以下7个委员组成的：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新右派的领袖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斯大林联手并同他一起构成了多数。政治局里的投票算术一目了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若只是急着把斯大林撵走，就必须设法与布哈林合作而不是攻击他。他们之所以攻击布哈林，是因为在这种形势下，信念和根本分歧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远比打个人算盘重要得多。

---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46－50页。波波夫：《联共(布)党史纲要》第2卷第239页。

同时,国内危机加深了。对富农所作的种种让步并不能满足他们。夏季,谷物上缴远远未达到预期之数。政府被迫紧急停止谷物输出,取消在国外购买机器和原材料的订单,因为这些订货要用输出谷物所得金额来偿付。工业复兴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尽管只是暂时的。城镇粮食短缺,面包价格上涨。党的领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该做什么才能缓和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布哈林敦促政治局向农民作出进一步的让步以给予新的刺激——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布哈林加紧向农民呼吁,号召"发财吧!"他坚持有必要最终取消那些妨碍农业资本积累的限制。对那些被他的要求所激怒并害怕富农的人,布哈林回答说:"只要我们仍然衣衫褴褛,……富农就会在经济上打败我们。但若是我们让他们把余款存在我们的银行里,他们就不会这样干了。我们将帮助他们,他们也将帮助我们。到了最后,富农的孙子将会因为我们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们的祖父而感激我们。"[①] 布哈林的信徒们又锦上添花地谈到新的新经济政策的到来;并且炮制出这样的观点,即有可能使富农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其中一位姓博古舍夫斯基(Богушевский)的人在中央委员会的政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争辩说:富农已不再是值得考虑的一种社会力量——它只不过是一个怪物,"一个幽灵",或一种"老朽的只剩下个把标本的社会类型"。[②]

列宁格勒人则报以愤怒的叫喊。它那里的工人们每天都能找到新证据来证明富农的富有及其惊人的力量——在他们的面包房中。在莫斯科委员会上,加米涅夫举出新统计数字说明缺乏生活必需品的城镇是如何依赖少数农民,并对中央委员会容忍当前事态且甚至进一步姑息支持新的新经济政策的叫嚣这种倾向提出警

---

① 《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8期。

② 同上,第9-10期。

告。列宁格勒人要求党向贫农发出新的呼吁去反对富农。他们指出，由于向富农讨好，党已站到了广大贫农、中农的对立面，并使富农成为俄国农村的实际领袖。这种批评无疑是正确的。[1] 但是批评论点中的弱点正是在于贫农甚至中农没有生产出城镇所需要的余粮。因此党的领导集团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担心"挑起农村阶级斗争"和激起富农的敌意。农村苏维埃对组织农村雇工并支持他们的要求之事十分谨慎。人们纷纷议论着即将把国有土地归还给私人。在格鲁吉亚，农业委员按这个意思公布了"纲领"，即法令草案；类似的法令在高加索及西伯利亚其他地区的公布也指日可待。斯大林本人则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该把地契还给农民"40 年或更长的时间"。他也坚决制止"在农村挑起阶级斗争"。[2]

现在争论的焦点从当前政策转向了更广泛的基本问题。列宁格勒人质问道：我们要不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难道我们为了富农的利益就应该牺牲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吗？是什么使我们的党放弃了农村阶级斗争，并把它变成了农村资本主义的鼓励者？是什么驱使我们的主要理论家高喊"发财吧"的口号？为什么我们这么多领袖都心甘情愿地对俄国的落后表示逆来顺受？我们早年的革命激情到哪儿去了？列宁格勒人得出结论：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的一切正处于危险中，党的理想正遭到歪曲，列宁主义的原则正被抛弃。他们想知道，革命是否达到了一个衰落点，就像当时其他革命——特别是法国革命那样。既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托洛茨基或其他杰出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位自学的工人，列宁格勒党组织书

---

① 在下半年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派的发言人承认了这些事实。例如米高扬声明："我们正在做巨大的努力争取中农，他们已成了富农的政治俘虏。"《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 188－189 页。莫洛托夫更委婉地说："当前我们还没有真正领导起中农。"同上，第 476 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105、144－148 页及同书各处。

记彼得·扎鲁茨基(Петер Залуцкий)第一个挺身而出,在公开讲话中将布尔什维克的现状跟衰退中的雅各宾主义作了重要的对比,第一个提出了威胁革命的"热月政变"危险的警告——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种想法正是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所有谴责的中心。[①]

扎鲁茨基说,布尔什维主义可能因为自身的消沉而没落。它的毁灭者可能就来自它的内部,来自它那些姑息反动情绪的领袖。为恢复革命声誉的呼喊已从列宁格勒发出。让我们的领袖们永远忠实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理想!让平等永远是我们的理想!"工人国家"也许穷得使我们平等的梦想还不能实现,但是不要嘲弄这个梦想!

季诺维也夫本人成为这种情绪的代言人。早在9月间,他写了一篇题为《时代的哲学》的文章,只是在他删去了最有刺激性的部分之后,政治局才允许他发表。其中一段充满着谴责:"你们可想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广大群众向往的是什么吗?"

> 他们向往的是平等。……如果我们希望成为人民群众的真诚喉舌,我们就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为争取平等而斗争的队伍前列。……工人阶级,还有站他们身后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十月革命的伟大日子里是以什么名义起来斗争的?他们以什么名义追随列宁赴汤蹈火?他们又以什么名义……在最初的艰难岁月里站到了列宁的旗帜下?……以平等的名义……。[②]

---

①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150-152页。

② 这段严词责问的话被乌格拉诺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引用过。同上,第195页。

大约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还出版了他的《列宁主义》一书，其中对党的学说的阐述同对苏联社会的批判性考察结合起来。他揭示出私有成分与社会主义成分之间的矛盾及其紧张关系，并指出即使在社会主义成分中也存在着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因素。工业国有化在其中代表着社会主义因素，但国家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官僚管理、工资差别却标志着资本主义。季诺维也夫在这里首次公开出头批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始终认为，即使苏联处于无限期的孤立状态，也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进步；但由于贫穷、落后以及置身于国内外各种危险中，它不能指望不折不扣地实现社会主义。它不可能在经济和文化上超过资本主义的西方，不可能消灭阶级差别并使国家消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前途是不现实的；布尔什维克没有必要把这样一种空中楼阁摆在人民面前，特别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意味着放弃国外革命的希望并与列宁的国际主义决裂。这就是新的分裂的症结所在。新右派在民族与孤立主义的严格框架内形成它的政策。左派则不顾国际共产主义所遭到的各种失败，仍然恪守党的国际主义传统。

在此阶段，即 1925 年夏季，斯大林及其追随者的态度属于中间派。这部分是出于信念，部分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因为斯大林要依靠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支持，因此他支持亲富农的政策。但是他抑制着他的右派盟友，否定他们最露骨的声明，如布哈林的"发财吧"。[①] 他小心谨慎，狡猾老练，对逻辑和理论细节都毫不关心，他的思想和口号都是借自右派和左派，并常常自相矛盾地把它们揉合在一起。他的力量主要就在于此。他竭力模糊一切问题，混淆一切争论。如果有人批评他的某一次声明，他总是能够提出另一个刚好相反的声明。对于官僚作风与骑墙派习惯来说，他那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146 页。

折衷主义的套话大有妙用;但也能吸引不少诚实而胆怯或头脑糊涂的人。如同任何"中间派"一样,在斯大林派中,一些人倾向左派,另一些人则倒向右派。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接近布哈林和李可夫,而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和卡冈诺维奇则是"左派斯大林主义者"。他自己的支持者中间的这种分歧也导致斯大林本人与右派保持一定距离。唯有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他与布哈林是完全一致的。

10月初,中央委员会为在年底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考虑各项准备工作。4位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和克鲁普斯卡娅提出联合声明,要求自由争论,所有党员对任何争论问题都可以畅所欲言。三驾马车中的两巨头想藉此让基层党员群众注意到他们呼吁反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意图。

索柯里尼柯夫并不完全赞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观点。在最近几年,他作为财政人民委员不遗余力地鼓励私人企业,不少人因而把他看成右派集团的台柱子。但是他也对政策的倾向和斯大林日益膨胀的权力感到不安,因此他在要求争论的联合声明上签了字。克鲁普斯卡娅则坚定地站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边,鼓励他们把政治局里的意见分歧向全党公开,而且要直言不讳。她无法接受蔑视她丈夫的遗愿而让斯大林留在总书记的位置上这件事;她也反感地注视着布哈林思想学派影响的日益增长。她曾试图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但是政治局不许她这样做。她的呼声对党员群众颇有分量,他们知道,她与列宁的合作是那么长久和紧密,不仅是作为列宁的夫人,而且还作为列宁的秘书和思想合作者。现在她急于声明支持季诺维也夫对列宁主义的解释,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这4位中央委员要求公开争论是符合规则和惯例的:党至今

还从来没有不经过预先讨论而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先例。但是，中央委员会无论如何也不肯同意公开争论，并且责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克制对官方政策的任何公开批评。现在两巨头也掉进了他们从前使托洛茨基陷入的那种两难的窘境。如果公开讲话，则违背了内阁一致的原则，他们作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要受其约束。若不讲话则违反了他们自己的政治良心和政治利益。在他们保持沉默而他们的追随者只攻击布哈林分子的时候，斯大林却不断地剥夺着他们的权力。至今为止，加米涅夫对莫斯科委员会还具有绝对的影响。但在整个夏季里，总书记已经悄悄地把加米涅夫的下属从其岗位上调走，用新多数派的可靠支持者填补空缺。但是列宁格勒还被季诺维也夫及其追随者牢牢盘踞着，斯大林暂时还对他们无可奈何。季诺维也夫本人不得不装装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门面，而他的追随者说话却肆无忌惮。他们个个义愤填膺，准备将他们对官方政策的抨击带到全会上去。

从10月到12月期间，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之间展开了紧张激烈、赤裸裸的鏖战。两个首都与会代表的选举都是被操纵的。莫斯科只选斯大林与布哈林的提名者，而列宁格勒的代表则是清一色的季诺维也夫信徒。一场公开冲突显然是无法避免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决定公开向官方的政策报告挑战，同时提出他们自己的反报告。12月18日，在代表大会开幕的那天，季诺维也夫开火了，并在《列宁格勒真理报》上对他的政敌大加鞭挞：

> 他们高谈什么国际革命；但是他们把列宁描绘成局限于民族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者。他们向富农宣战；却又提出“发财吧”的口号。他们高喊社会主义；却宣布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坚信”工人阶级；却向富农伸手要救济。

※　※　※　※　※

布哈林派和季诺维也夫派之间的交锋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三驾马车之间的冲突也酝酿了将近一年。看来，这正是托洛茨基期待已久的重新组合行动的良机。但是在这整个时期里他却置身事外，对导致党分裂的那些问题保持沉默，仿佛对它们一无所知。13年后，当他在墨西哥站在杜威委员会面前时，他承认道，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之间如同敌人般的互相厮杀把他惊呆了。他说："冲突的爆发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代表大会期间，我疑惑地等待着，因为整个形势改变了。我完全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①]

事过多年之后，这样的回忆似乎相当不可信；但它却被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期间所写的尚未发表的日记摘要完全证实了。[②] 他向杜威委员会解释道，他之所以感到惊异，是因为他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但三驾马车小心翼翼地向他隐瞒他们之间的分歧，并趁他缺席时在起着真正政治局作用的秘密核心小组会上挑明了分歧。这个解释尽管是符合实际的，却没有说明什么。首先，围绕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重大争论是公开进行的。只要他留心事态的进行，就不可能无视它的重要意义。显然他没有这样做。其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克鲁普斯卡娅和索柯里尼柯夫不是在秘密的核心小组会上而是在10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公开争论的要求的。但即使季诺维也夫等人不这样做，即使围绕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公开争论没有显示新分裂的迹象，像托洛茨

① 《列夫·托洛茨基案》第322－323页。

② 参见托洛茨基日记摘要第255－256页。全文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基这样一位思维严谨、兴趣广泛、目光锐利的观察家怎么会意识不到这种倾向，怎么会对许多征兆视而不见，这多少是一个谜。他怎么会对好几个月里来自列宁格勒的沸沸扬扬的议论听而不闻呢？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托洛茨基的惊异在于他并未去观察、思考和分析。若说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伊万·斯米尔诺夫以及他的其他好友没有注意到发生的事，或说他们中间没人想引导他注意这一问题，这都是不可能的。显然，他的心灵之窗是关闭着的。他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上，深埋在自我天地和自我意识之中。他全神贯注于科学、工业和文学工作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免受周围环境的打扰。他躲避着党内事务。他充满优越感，蔑视他的政敌，厌恶那些争论的方式和各种阴谋诡计，他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感兴趣。他服从政敌们捆绑住他的纪律，但是他昂着头不看他们一眼。几年后在莫斯科有人告诉本书作者，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看上去总是那样安分守己，一坐下就打开书——通常是法国小说，全神贯注地读起来，根本不理会会议的讨论。这种轶事即使是编造出来的，也编得很不错：它比较符合这个人的性格。他可以将他的背转向其政敌，却未能冷静地看待他们。他离他们太近了：他视他们为小人、无赖，有时还视他们为骗子；但他忘记了：他们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一个伟大的党的领袖，他们的言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假如托洛茨基注意了列宁格勒人在说些什么，他就不能不马上意识到，列宁格勒人所捍卫的正是他自己所捍卫的事业，所抨击的正是他自己所抨击的立场。作为反对派，他们开始于他停止的地方。他们根据他的前提进行争论，他们接过他的论点并把它们推得更远。他曾批判政治局缺乏创新精神、忽视工业、过分迷恋私有成分。列宁格勒人正是这样做的。他曾怀着不安的心情注视着狭隘的民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促使党的领导集团按照自给自足

精神来制订未来的政策,设计未来的蓝图。同样是出于对"狭隘的民族精神"的对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首先站出来批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提法。在托洛茨基的眼里,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念头首先只能是枯燥无味的学究式教条主义的贩卖,几乎不值他一哂;因此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他未置一词,在此期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概念却愈益成了布尔什维克的新正统,而他以后将和这个正统斗争到生命最后一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新学说的征兆则更为敏感。他不能不同意他们对这个学说提出的反对论点,因为这是他们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武库里拿来的。列宁格勒日益高涨的要求平等的呼声也不会不拨动他的心弦。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和克鲁普卡娅声明抗议压制党内舆论时,他们只不过是托洛茨基的回声。他们跟他一样谈到了耐普曼、富农和官僚集团的邪恶同盟;他们跟他一样号召恢复无产阶级民主。他曾警告党防止其领导集团的"堕落",而现在同样的警告在列宁格勒人反对"热月政变"危险的呼声中回响得更强烈、更惊心动魄。这都是他很快就要提出来并在今后多年中加以阐释的思想和口号。然而,当他从他昔日的政敌口中听到对它们的阐释时,他却"疑惑地等待"了好几个月;而在这危急的好几个月里,他的支持者们也跟他一起等待着。

使他和他的追随者措手不及的原因是他们一贯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成党的右派领袖。托洛茨基在散布过这类的看法上做得最多。在《十月的教训》一书中,他提醒党不要忘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过十月革命。他证明说,1923年季诺维也夫之所以带领德国共产党"投降",正是因为他的思想状态还停留在1917年。当他告诉党说它的老近卫军像第二国际的领导集团一样已经蜕化成保守的官僚的"工具"时,他的矛头所向差不多就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毫不奇怪,当他们以新左派的代言人出

现时，他会不信任地望着他们。他怀疑这是在蛊惑人心。尽管这种怀疑并非毫无根据，却使他难以理解，这种角色的转化竟会是真实的，而且是这个国家极其危急的形势所导致的人与思想重新组合的一部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转化并不比布哈林的转化更不真实、更不惊人；布哈林这位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前领导人成了新右派的理论家——当然，这两种转化是互相补充的。当前布尔什维克的官方政策严重地倾向于右派，这使得昨天还领导着右派的一些人担心其后果，并发现自己正急剧地转向左派。

当然，个人野心和嫉妒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竭力要剥夺斯大林的权力。如果他们选择跟布哈林合作的道路，登上正在高涨的孤立主义和新民粹主义的浪峰，也许他们能有更好的机会。相反，他们却立足于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和国际主义的传统，这是不受那些操纵党的机关的人物欢迎的，而这次争论的结果却直接取决于他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世界观和性格及其追随者的情绪限制了他们的自我追求。不管他们在重要关头表现得怎样胆小怕事和机会主义，他们毕竟是列宁最亲近的学生；他们在本质上不可能摆脱铸就他们的那种影响。别人可以对欧洲工人阶级掉转身去并且美化富农，不管是否由衷；但是他们却做不出。别人可以为俄国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高唱赞歌，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思想却是荒谬的、令人厌恶的。对这些问题的态度竟已形成了一个分水岭，把布尔什维主义中各种不同的思潮区别开来。

角色的转化还有另一个方面。与以前托洛茨基和列宁一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挣扎于权威与自由、党的纪律与无产阶级民主的两难处境中。他们也感到权力与革命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一直恪守纪律。现在他们也被他们所强化的机械僵硬的纪律搞得厌倦、疲惫不堪。季诺维也夫在政治舞台上多年来趾高气扬，颐指气使，呼风唤雨，操控着升贬大权，为革命也为自己攫取着权力；

他仿佛为权威所陶醉了。现在他清醒了,感到不堪回首,渴望找到一条路回到那已无法寻觅的革命清泉。还有不少老近卫军跟他一道在同样的荆棘丛中跋涉,同样狼狈不堪地清醒过来,终于不知不觉地采取了跟刚刚被他们打败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没有区别的立场。每一件事都驱使着他们与1923年的反对派携起手来。

如果托洛茨基要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携手合作,现在正是时候。列宁格勒人行动的根基仍旧岿然不动。该市和该省的行政机构还掌握在季诺维也夫的手中。在那里他拥有大批热忱的信徒,并控制着颇具影响的报纸,还掌握着进行长期持久的政治斗争的物质手段。一句话,尽管斯大林在季诺维也夫的司令部里大挖其墙角,但他仍是他的北方区强大堡垒的主宰者,是共产国际的主席。在某些方面,季诺维也夫在与斯大林较量时的地位要远比托洛茨基原先的地位强大得多。托洛茨基从不为染指个人权力之争费心;因此,在他那震撼世界的业绩之后,他差不多是赤手空拳地同三驾马车斗争。他们发现很容易给他打上布尔什维克异己分子的烙印。但是斯大林和布哈林若想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克鲁普斯卡娅斥为顽固的孟什维克则相当困难。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中两派之间的冲突现在已经明朗了。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的联合若在季诺维也夫失败之前形成,将是战无不胜的。然而无论他们个人还是两派都还没有准备好。他们对彼此的怨恨以及给予对方的打击和伤害都还记忆犹新,这使他们无法结合在一起。

托洛茨基政治生涯中最难解的一个时刻来临了。12月18日,托洛茨基最后一次出席的党的代表大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开幕了。它自始至终都是政治风暴肆虐的舞台,这样的政治风暴,党在其疾风暴雨般的漫长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新政敌们就在全国人民面前扭打在一起,相互施以重拳。这场风暴关系到党和革命的命运。几乎所有占据托洛茨基后半生的重大问题都在这次大会上提出

来了。新政敌的每一方都盯住了托洛茨基,猜测他将加入哪一方,并且屏住呼吸等待他说话。但在大会开会的整整两个星期里,托洛茨基始终一言不发。当季诺维也夫面对震惊而激动的听众提及列宁的遗嘱及其对斯大林滥用权力的警告时,或者当他大谈来自富农、耐普曼以及官僚集团的威胁着社会主义的危险时,托洛茨基还是一言不发。在加米涅夫大声抗议凌驾于党之上建立的独裁统治后,那些经过精心挑选的代表中的多数唾沫横溅地大骂发言者,而且第一次把斯大林捧为"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团结在其周围的"领袖;面对这重大的一幕,托洛茨基仍然无动于衷。

当克鲁普斯卡娅谈到了对列宁个人崇拜的荒谬可笑的后果,请求代表们讨论面前的问题时就事论事,不要使争论淹没在对她丈夫著作毫无意义的引证中,最后警告地回顾反托洛茨基运动已经堕落为诽谤和迫害时,他都没有站起来宣布同克鲁普卡娅的一致。他仿佛漠然地听着本世纪最重大的争论之一,即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当布哈林根据党先前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反对而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辩解并继续讲到以"蜗牛速度"建设社会主义时,仍然没有激起托洛茨基任何抗议或异议的表示。三驾马车揭开了他们龃龉的内幕,其中总是晃动着托洛茨基的巨大幻影:斯大林讲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怎样想要托洛茨基的脑袋而他本人又是怎样抵制他们的。季诺维也夫则描绘了他和斯大林如何违反党章解散了以压倒多数声明支持托洛茨基的共青团中央。各派发言人都颂扬托洛茨基,表示友好。克鲁普斯卡娅发言时,会场里响起了一声叫喊:"列夫·达维多维奇,你已经赢得了新伙伴。"至今还是他积怨最深的政敌之一的拉舍维奇承认,托洛茨基在1923年并非完全是错的。斯大林派成员和布哈林派成员也不吝捧场:米高扬向新反对派举出托洛茨基的光辉榜样,说他在失败之后仍然一丝不苟地遵守党的纪律。雅罗斯拉夫斯基谴责列宁

格勒人狂热的、至今不衰的反托洛茨基主义。托姆斯基则把“托洛茨基观点水晶般的清澈透明”和行为的正直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糊涂与畏葸加以对比。加里宁则谈到他对他们打倒托洛茨基的企图一贯感到愤慨和厌恶。当季诺维也夫声明有权对官方政策持不同观点并抱怨没有一个反对派曾受到如此粗暴的对待时，斯大林派成员和布哈林派成员极尽嘲讽地将他过去对托洛茨基所做的事一古脑地抖落出来。后来，季诺维也夫在结束他那长篇发言时，劝说代表大会应既往不咎、重新改组党的领导机关、使布尔什维克各派意见得以合作和统一起来。全会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托洛茨基身上：这位雄辩的伟人要说什么？但他紧闭双唇。甚至当安德列耶夫要求中央委员会享有使它更有效地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特权时——也就是说，打断新反对派的脊梁时，他仍保持沉默。新反对派在投票中遭到严重挫败；但是在闭幕之前，大会接到一则报告而陷入一片骚动和忿怒：列宁格勒正在发生反对其决议的浩大的示威游行——列宁格勒人继续在自己的堡垒里战斗。直到大会结束，托洛茨基始终一言不发。①

托洛茨基的私人文件使我们能窥探到他当时的内心活动。12

---

① 他在争论中只有过一次插话。当对季诺维也夫解释道，在他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的前一年，鉴于他们泼到托洛茨基身上的所有罪名，再把他选进政治局就自相矛盾了。托洛茨基突然插话说：“对！”
在代表大会期间，路特·费舍正在莫斯科，但未获允与会，而是由斯大林的手下博格里宾斯基每日送给她报告，她写道：“博格里宾斯基对托洛茨基特别感兴趣……两大集团都畏惧他……而此刻双方都希望争取他；托洛茨基的态度对各州摇摆不定的代表将具有决定作用。博格里宾斯基每天都注意托洛茨基表情的阴晴，他同谁谈过话。‘我今天看见托洛茨基站在走廊里。他同某些代表谈过话，我仅能听到一点儿谈话内容。他闭口不谈重要问题。他不支持反对派，甚至连暗示也没有。好极了，列宁格勒的那些狗崽子们必将彻底失败。’”路·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第494页。

月22日，代表大会的第4天，他在潦草的笔记中评论道，在某些人表达的观点——列宁格勒人正在继续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工作——中有一点儿真实性，但并不太多。1923年掀起的所谓托洛茨基主义敌视农民的叫嚣为新民粹主义铺平了道路，这个主义现在已经成熟并激起列宁格勒人的反抗。这是自然的，他们必须这样做，尽管他们曾带头大反托洛茨基主义。代表大会对季诺维也夫派的强烈敌意实质上反映了乡村对城市的敌意。人们可能会想，这个看法应当促使托洛茨基立刻与列宁格勒携起手来。但是在他看来，这些问题和分歧还不像在他个人的分析中那样明朗；因此，他怀有某种希望，还要再等一等。

他感到奇怪，像索柯里尼柯夫这种在所有人当中最温和的人本应站到布哈林一边，为什么会加入列宁格勒人的行列。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间的分裂使他惊愕。他注意到他们之间人为制造出来的对抗掩盖着更深刻的根本冲突。他希望两首都的党组织团结起来，共同捍卫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想，反对亲富农的右派势力。他断定，只要所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起来反对官僚集团——就一定能使莫斯科的党组织摆脱斯大林的压制。局势还一直在波动。他指望会出现一种类似政治上大获全胜的事件——而三驾马车之间的分裂仅仅是开始——震撼全党，最终导致各种力量形成更广阔、更重大的重新组合。那时，政治分界线将不再那么意外，将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社会主义与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相符。同时，他一点儿也不急于同那些"吵闹的、庸俗的而且当然不可信任的"列宁格勒反对派领袖们同呼吸共命运。看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处于如此狼狈的处境，他所写下的日记未免有些幸灾乐祸——仿佛在说：罪有应得，罪有应得！

但是他不能老是这样幸灾乐祸下去，这样做不符合他的天性。虽然是违心地，但他仍得挺身出来搭救这些落水者。还不等代表

大会散会,中央委员会就开会研究驯服列宁格勒的措施。斯大林提议:首先解散《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部,把报纸变成官方政策的喉舌,下一步是将季诺维也夫免职,以基洛夫取代他担任北方区党的首脑。鞭子将要抽打在列宁格勒人的身上了。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托洛茨基打破了沉默——他反对报复。[①] 他并不打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盟,但由于想保护他们而触怒了一直围着他转并小心安抚他的斯大林。

在中央全会上出现了一幕奇怪的场面。布哈林发言赞成斯大林的提议。加米涅夫反对。他说:奇怪的是,一贯反对严厉报复托洛茨基分子的布哈林现在居然号召挥舞鞭子了。托洛茨基插话道:"啊! 他终于欣赏起鞭子来了。"布哈林仿佛猝不及防挨了一下打击般地叫喊起来:"你以为我终于欣赏起鞭子了吗? 但这种欣赏使我全身不寒而栗。"[②] 这一声痛苦的叫喊突然显露出一种不祥的预兆,布哈林将怀着这种感情支持斯大林。从这件偶然的事件开始,托洛茨基"经过长时期的中断"又恢复了与布哈林的"个人接触"——这是非常友好但政治上却毫无结果、昙花一现的接触,它的蛛丝马迹可以从他们的通讯中找到。[③] 还在"全身不寒而栗"的布哈林竭力说服托洛茨基不要帮助季诺维也夫。他试图给托洛茨基造成一种印象,即此事与党内自由的存亡无关,不能容忍反对派的季诺维也夫并不是党内民主的捍卫者。托洛茨基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争辩说:斯大林绝不会比他更好;罪过就在于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强制推行的铁板一块的纪律和全体一致的投票——这就使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两个最大的党组织在代表大会前夕以"百分之百的一致

① H.波波夫:《联共(布)党史纲要》第2卷第255页。

② 托洛茨基档案。

③ 同上。

性”各自推行其决议成为可能。他丝毫不为列宁格勒人辩护;但是他必须反对虚伪的纪律;他呼吁布哈林与他携手共同努力恢复“健康的党内体制”。但是布哈林担心:要求的自由愈多,则自由愈少;他得出结论:那些要求党内民主的人正是它最坏的敌人,而挽救遗留下来的民主和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要去动用它。

当这些感情上“推心置腹”的交流还在进行时,斯大林已对挑动托洛茨基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抱希望了。斯大林或许比托洛茨基更早意识到两个反对派将携手结盟。他因此发出了新的反托洛茨基运动的信号。他竭尽全力不让托洛茨基在工人区召开的共产党集会上发表讲话。这件事就由乌格拉诺夫负责,他已取代加米涅夫成了莫斯科党组织的首脑。他们以各种借口拒不准许托洛茨基到基层去。当他向科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演讲时,无产阶级支部成员就被告知说,托洛茨基只愿对资产阶级分子而不愿对工人讲话。官方的鼓动员不再把托洛茨基派与季诺维也夫派区分开来,煽动基层党员群众反对这两者,并且暧昧地暗示说:两者的领袖都是犹太人,这绝不是偶然的——他们扬言说,这是俄国本民族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同力图颠覆它的异己分子之间的一场斗争。

在标明3月4日写给布哈林的另一封信中,托洛茨基描绘了他心中的不安和又一次向他泼来的斥责。他不情愿地探讨了鼓动员话中的反犹太主义的言外之意。他希望引起布哈林的注意,写道:“我认为,能把我们两个政治局委员连结在一起的一切仍足以让我们平静而自觉地去考虑和检验这些事实:在我们党内,在莫斯科,在工人支部中,反犹主义的煽动莫非真可以逍遥法外?!”[①] 两周之后,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再次提出了这个令人震惊和愤慨的问题。政治局委员们耸耸肩,表示一无所知,或者是对这个问题鄙夷

① 托洛茨基档案。

不屑。布哈林则因困窘和羞愧而涨红了脸;但他不能再转而反对他的那些同伙和盟友了。总之,到了这个阶段,他同托洛茨基的"个人接触"已走到了终点。

鼓动员们奏响反犹太主义调子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受乌格拉诺夫的指使,而乌格拉诺夫则受不择手段的斯大林的暗示。然而有些手段放在一两年前他也是不敢采用的;挑动反犹偏见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直是最凶恶的沙皇反动派的拿手好戏;即使在1923—1924年,党及其老近卫军由于还沉浸在深厚的国际主义之中,因而不会赞同这种偏见,更谈不上利用它了。但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新右派暧昧地诉诸民族情绪;当这种情绪高涨起来后,政治气候发生了如此剧烈的改变,连共产党对自身中的反犹主义的暗示或表示也不再反感了。说穿了,对于"异端分子"的排斥只不过是俄国自我中心的反映,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则是它在意识形态上的抽象化。

在反对派当中,犹太人实际上是十分突出的,尽管他们同非犹太知识分子和工人中的精英人物们混在一起。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拉狄克都是犹太人[①](另一方面,

---

① 1918年,当乌克兰处于德军占领下并被斯柯洛巴茨基统治时,敖德萨的教士们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革出教门(《季诺维也夫全集》第16卷第224页)。另一方面,白卫军则大谈托洛茨基的犹太血统,并断言列宁也是犹太人。有意思的回声还可以在20年代的苏联民间传说和小说中找到。在谢芙林娜的一篇小说中,一个农夫说:"托洛茨基是我们自己人,是俄国人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是犹太人、共产党。"在巴别尔的短篇小说《盐》中,一个农妇对一名红军士兵说:"你不必为俄罗斯人伤脑筋了,你还是去救救那两个肮脏的犹太佬列宁和托洛茨基吧!"这位红军士兵回答她道:"现在我们不谈犹太人,你这个坏公民。犹太人并不是与此毫无关系。顺便说说,对于列宁,我不想说什么,我只想说,托洛茨基原是唐波夫总督不可救药的儿子,他转到工人阶级方面来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革命辛勤工作着,带领我们走向自由解放的道路……。"

斯大林派中只有极少数犹太人，布哈林派中的犹太人则更少)。虽然他们已完全“同化”和俄国化了，并且如同敌视任何其他宗教一样敌视摩西，敌视犹太复国主义，但仍然有显著的“犹太性”，即以其现代性、进步性、精力充沛和偏激而表现出来的城市生活方式要素。当然，关于他们在政治上仇视俄国农民的断言是错误的和虚假的，尽管不是出于布哈林之口而是出自斯大林之口。但是犹太血统的布尔什维克绝对不会把原始野蛮的农村俄国理想化，不会赞同以“蜗牛速度”拖着本国农民的大车。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无根基的世界主义者”，斯大林在其晚年意欲公然向他们倾泄自己的怒火。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也不是他们的理想。通常，在多种不同的宗教和民族文化的边缘成长起来的进步的或革命的犹太人，不论是斯宾诺莎还是马克思、不论是海涅还是弗洛伊德，也不论是罗莎·卢森堡还是托洛茨基，都特别易于在精神上超越宗教的和民族的界限，并将自己跟普遍的人类观等同起来。因此，每当一种宗教狂热或者民族主义情绪膨胀时，他们也最容易受到伤害。斯宾诺莎和马克思、海涅和弗洛伊德、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全都被革出教门，流亡国外，在精神上或肉体上受尽摧残；而他们的著作都被付之一炬。

※ ※ ※ ※ ※

1926年的头几周里，列宁格勒反对派的势力被粉碎了。[①] 列

---

① 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布哈林派和斯大林派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多数不断增长。新的政治局由9人而不是7人组成：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由于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在右派和中间派之间摇摆不定，斯大林派在人数上要比布哈林派稍弱些。现在加米涅夫仅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其他候补委员是乌格拉诺夫、鲁祖塔克、捷尔任斯基和彼得罗夫斯基。

宁格勒人不得不屈从于斯大林的命令。反抗他的命令就等于向支持斯大林的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和选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大会的合法性挑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并不打算这样干,他们与托洛茨基一样还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他们曾公开声明,斯大林操纵了党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央委员会只代表党的机关,并不代表党。但是这样说说是一回事,公开宣称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无效而拒不服从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特别是对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来说,怀疑上一届代表大会的合法性将是一桩很危险的事:他们不是跟斯大林一起操纵和包办了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并且用的是跟斯大林包办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样的手段吗?若向中央委员会的权威挑战,列宁格勒人实际上就是将自身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党,成了官方的全苏共产党的一个敌手。不能想象他们会这样干。他们都已接受一党制作为一种必要条件。谁也没有比季诺维也夫更狂热地捍卫这个原则并从中引申出更极端、更荒谬的结论了。列宁格勒人如要反抗莫斯科,那无异于宣布内战。

因此,当基洛夫(Киров)作为斯大林的全权特使出现在列宁格勒并被授权控制北方区时,季诺维也夫除了投降别无他路可走。几乎一夜之间,党的所有地方支部、编辑部门、五花八门的组织和反对派至今凭借的人力物力都转到斯大林和基洛夫任命的人的手中。季诺维也夫的两位副手曾控制着列宁格勒的武装力量:拉舍维奇是卫戍部队和军区的政治委员,巴卡耶夫(Бакаев)是格别乌的首脑。两人都交出了他们的权力,尽管拉舍维奇作为副国防人民委员仍是中央政府的成员。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的大溃败。只要这些领导人还大权在握,他们似乎就能使整个列宁格勒做他们的后盾。而现在,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城市却对他们的命运无动于衷。布尔什维克的昔日根据地维堡的工人首先抛弃了他们。季诺维也夫多年以来一直欺压凌辱他们;因此他们并没有为他代表

工人提出的最新请求和他对平等的呼喊而感动，而几年以后他们将留恋地回忆起这些请求和呼喊，但那时就已经太迟了。谦卑的人把这场动乱看成是两大巨人的争斗，不关自己的事。即使那些更少犬儒主义看法并且同情反对派的人也尽量收敛起他们的同情，因为失业现象非常严重，对"不忠"的惩罚将是丧失工作和忍饥挨饿。因此，列宁格勒反对派中的积极分子只剩下几百个革命老战士——紧密抱成团的少数人，他们忠于自己的理想和领袖，但是他们将慢慢发现一切大门都对他们关上了。

斯大林轻而易举地辗碎了列宁格勒人，这表明托洛茨基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所抱的希望是没有基础的。没有任何进一步重新组合的迹象，没有他所期待的党员工人奋起反对官僚主义的迹象。列宁格勒人的斗争没有在莫斯科基层支部中激起任何同情运动，甚至连一丝涟漪也没有。党的机关发挥了空前未有的高效率，哪里出现反抗，就在哪里粉碎它，甚至在它还未来得及形成就将其扼杀。这件事本身也说明了反抗的脆弱性。工人阶级不再像它早些年那样四分五裂，但是它缺乏政治意识、活力和表现自身的能力。而托洛茨基断言莫斯科与列宁格勒将采取共同立场时，他指望的却正是它自身的政治复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同样寄希望于此。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号召回到无产阶级民主上来，并说，工人阶级已不再像 20 年代初期那样四分五裂和萎靡不振，那时党的领袖们不能依靠工人阶级健全的政治本能和判断能力。布哈林反驳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自欺欺人；工人阶级通过吸收新成员而在数量上壮大了，但这些新成员是来自农村的未受教育的年轻人；因此，工人阶级在政治上仍是不成熟的，回到无产阶级民主上去的时机尚未到来。列宁格勒反对派现在发现自己被空虚所包围着，这表明布哈林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更接近事实。工人阶级是麻木的和冷漠的，它的麻木不仅是由于

内在的不成熟,也是由于官僚主义的威吓,而后一点正是布哈林要为之辩护的。不论这是否真实,对于托洛茨基来说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的等待一无所获。代表大会结束后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但在此期间,托洛茨基派与季诺维也夫派却没有彼此接近一步。自从1923年以来,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关系一直不好;他们之间始终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到了1926年4月,坚冰才被打破。在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李可夫作了经济政策的报告。加米涅夫提交一项修正案,敦促中央委员会注意日益尖锐的农民的社会分化并限制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托洛茨基提交了另一项修正案:他赞同加米涅夫对农村形势的评价,但补充道,工业发展的迟缓使政府失去了它所需要的对农业施加足够强大影响的手段。在讨论中,作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的加米涅夫感到对托洛茨基所批评的工业政策有一定责任,就说了几句挖苦托洛茨基的话。中央委员会否决了托洛茨基的修正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大概弃权了。后来当加米涅夫的修正案交付表决时,托洛茨基投了赞成票。这是一个转折点。当会议继续进行下去时,他们发现又站在同一边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了,彼此开始接近,到会议结束时,他们实际上已成了政治伙伴。

只是到了现在,这三个人才在多年里第一次私下会晤。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晤,充满着内心的反省、惊人的忏悔、悔恨与欣慰的叹息、预感、悚然的警惕和充满希望的计划。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急于把往事说明白。他们悲叹那引导他们指控托洛茨基为列宁主义首敌的盲目性。他们承认给他捏造了罪名以便把他踢出领导层。但是他就没有错吗？他不是也攻击过他们,提醒党记住他们在1917年时与列宁之间的冲突吗？而且他败坏他们的声誉不是更甚于斯大林吗？他们感到宽慰的是,他们终于摆脱了他们

自己亲手编织的稀奇古怪的阴谋网，又回到了严肃和真诚的政治思想和行动上。

当叙述那些五花八门的阴谋事件时，他们揶揄着斯大林，模仿着斯大林的动作和口音——这让托洛茨基有些反感；但后来他们回想起与斯大林的交往时却感到不寒而栗，仿佛经历了一场梦魇。他们描绘了斯大林的狡诈、刚愎自用和残酷。他们说，他们两人都写了这样的信，信中说，若是他们突然莫名其妙地死亡，那么全世界都应该知道这是斯大林干的；他们把信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还劝托洛茨基也这样做。[1] 他们坚持认为，斯大林在1923—1924年没有干掉托洛茨基，仅仅是因为害怕一些年轻狂热的的托洛茨基派成员进行报复。毋庸置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急于给斯大林抹黑并向托洛茨基标榜自己对他的抑制作用。托洛茨基当时对他们的揭露并未十分当真，直到多年以后大清洗运动才又在他心中唤醒它们。这些听起来就像是早期几位沙皇的克里姆林宫里血腥的宫廷倾轧的故事一样，很难把它们同其中回响着充满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思想争论的第三国际的克里姆林宫联系起来。难道沙皇旧堡垒把它的邪恶精灵注进了列宁的门徒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继续说，斯大林对思想争论不感兴趣——他孜孜以求的只是权力。如果他们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他们就无法解释他们怎么会跟他合作这么长时间。

这两个人从这些令人发指的叙述和阴暗的揭示中又转向未来的蓝图。他们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毫不怀疑一切都可以转眼之间改变。他们说，只要他们三个人一同出现在公众面前，重新和解，重新团结起来，就足以唤起布尔什维克的激情，引导党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但是最阴沉的忧郁很难轻易让位给最欢乐的

---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417页。

天真。

怎样解释他们的这种乐观情绪呢?才不过几个月前,他们两人还拥有充分的权力。季诺维也夫失去他在列宁格勒的封邑也才不过几个星期,但他仍是共产国际的主席。他们的垮台如此迅速和突然,以至他们不肯相信这是真的。他们已经习惯于看到,他俩之中不论谁点点头就会推动党和国家的巨轮。人民雷鸣般的喝彩声仍然在他们的耳畔回响,但这是虚假的喝彩声,它不是发自人民肺腑,而是由党的机关人为制造出来的。而突然之间,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他们。在他们看来,这就像是幻象、误会或者匆匆一现的偶发事件。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他们与斯大林的决裂,而这个人是他们亲手扶上台去指挥党的,至少他们自己认为如此。但斯大林是什么人?一个下流、没有教养、笨拙的机关操纵者,一个不称职者,他们曾多次把他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只因为他们认为他在他们反托洛茨基的把戏中还有用。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无论是作为人、领袖还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还没有托洛茨基的脚踝骨高。他们现在既然又与托洛茨基携手合作,那么把斯大林从他们的路上一脚踢开并把党重新置于他们的共同领导之下,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①]

托洛茨基摇摇头。他对他们的乐观情绪很不以为然。他比他们更了解失败的滋味。这些年来当党的机关开足马力反对他、把

---

① 路特·费舍描述了季诺维也夫在一次跟她谈话时怎样"难为情地首次提到"他同托洛茨基结盟的问题。"他说,这是一场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我们需要托洛茨基,不仅是因为没有他卓越的头脑和全面的支持我们就不会赢得国家权力,还因为胜利后我们仍然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引导俄国和共产国际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尤其是,除他之外没有别人能够组织军队。斯大林反对我们,并不是用宣言书,而是用实力,但他将遭到更强大的实力而不是宣言书的回击。拉舍维奇站在我们这一边,如果托洛茨基再同我们携起手来,我们一定会赢得胜利。"路·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第547-548页。

他赶下野的时候，他已感受到了它的全部重量。他更深刻地洞察到使党扭曲的那个过程，洞察到他自1922年以来就无可奈何地注视着其发展的“官僚集团的堕落”。他比他们更透彻地看到了党的机关后面旧俄国母亲尚未被驱走的深不可测的野蛮。他还担心他的新盟友的反复无常和不负责任。他无法忘记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但是他慷慨地宽恕了他们，而且尽量鼓舞他们去进行一场长期而又艰苦的斗争的意志。

他本人并不是不抱什么希望。他也相信他们的和解将使党受到鼓舞。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愿意公开承认：在托洛茨基警告党要反对自身的官僚集团这点上，他一直是正确的。作为回报，托洛茨基也准备承认，他错在不该抨击他们是那个官僚集团的领袖，他其实应把火力集中到斯大林身上。他也希望，两个反对派通过携手合作不仅能将他们各自的追随者联合在一起，而且能使他们成倍地增加。毕竟老近卫军一直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马首是瞻。谁都知道列宁的遗孀是同情他们的。列宁格勒反对派的领导精英虽然还比不上托洛茨基身边的那些人，但仍有这样一些杰出人物，如当时仍是副国防人民委员的拉舍维奇，他是内战时期最干练的政治委员之一，还有著名的经济学家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巴卡耶夫、叶夫多基莫夫(Евдокимов)等人。再加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狄克、拉柯夫斯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伊万·斯米尔诺夫、穆拉洛夫、克列斯廷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和越飞，只需举出这些人就可以看出，联合反对派所拥有的人才和声誉卓著者比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所拥有的多得多。而除此之外，工人阶级的政治复苏尽管推迟了，但也必将到来，它将为反对派的航船鼓满劲风。

这些伙伴们没有来得及制订出精确的计划，甚至也来不及确定他们协议的要点。就在他们第一次私下会晤的一两天后，托洛茨基就不得不离开俄国出国治病了。他在最近几年患下的恶性热

症非常顽固,体温经常上升到华氏100度以上,使他在最严重的斗争关头失去作战能力,并迫使他在高加索度过好几个月(他在那里度过了1924年至1925年的冬天及初春几个月)。俄国医生无法确诊,就催促他找德国专家就医。政治局没有对他的国外之行提出异议,但坚持要他自己承担责任。4月中旬,他剃光胡子,隐姓埋名,在妻子和一位年轻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柏林,他化名库兹缅柯,自称是乌克兰的教育家。他大部分时间是在一家私人诊所里接受治疗并动了一个小手术;但在治疗间隙他可以到处走动,因而能观察那几年一派萧条的柏林市,这座城市跟他所熟悉的帝国时期的首都已大不相同了。他还参加了五一节游行,观看柏林市郊的饮酒节,等等。他心情激动,因为自从1917年以来这是他第一次能"在人群里走动而不引起任何人注意,并感到自己是这无名整体中的普通一分子,只是听和看"。[①] 但后来不知因为什么,他化装就医被发现了,德国警察当局警告诊所医生:一些白俄流亡者打算谋杀他的病人。托洛茨基在戒备森严的护送下迁往苏联大使馆居住,不久就回国了,而他的体温仍像过去一样高。关于谋杀他的警告是否确有根据,至今没有查明。[②]

① "只有一次陪伴我们的同事(在五一游行中)小心地对我说:'这里正卖您的照片呢。'但是凭这些照片是没人能认出教育人民委员部成员库兹缅柯是谁的。"《我的生平》第2卷第269页。

② 他在柏林大使馆时化了不少时间跟大使克列斯廷斯基以及共产国际著名经济学家E.瓦尔加讨论问题。他与瓦尔加讨论的主题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瓦尔加承认,斯大林的学说作为经济理论毫无价值,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梦话。但是它在政治上毕竟是有用的,作为一个口号它能鼓舞落后群众。托洛茨基在私人文件中记录下了这次讨论,并且评论道:"瓦尔加是共产国际中的波洛纽斯。"(波洛纽斯系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中的著名形象,御前大臣,王子哈姆雷特的恋人莪菲莉娅的父亲因偷听王子与母后的谈话而被误杀,其性格圆滑世故。——译注)托洛茨基档案。

在他逗留柏林的大约6个星期里，两件重要性各不相同的政治事件吸引了他。在波兰，得到共产党支持的毕苏斯基元帅发动政变，确立了他的独裁者地位。在英国，煤矿工人的持久罢工导向大规模的总罢工。波兰共产党的荒唐行为部分是由于这个国家的错综复杂的形势，部分是由于共产国际内反托洛茨基运动所产生的混乱：波兰共产党在一定范围内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政策，这种政策同时也导致中国共产党支持蒋介石将军和国民党。英国总罢工证实了托洛茨基在《大英帝国向何处去?》一书中所作的预言；[①]而且立即使共产国际处于新的紧张关系之中。英俄委员会中的英国领袖们竭尽全力在总罢工还没有爆发成为革命之前就结束它；而且因为急于挽回面子，他们拒绝接受苏联工会向罢工者提供的经济援助。英俄委员会的反应就是如此荒唐。但是英国工联的领袖们仍从它的存在中捞到了某些好处：在总罢工的危急关头，共产党唯恐得罪英俄委员会，于是保持极度沉默，不肯批判英国工联的行动。托洛茨基甚至在回到莫斯科之前就已在《真理报》上抨击斯大林与布哈林寄予厚望的英俄委员会的政策。[②]

只是在托洛茨基回国之后，他才同两位前三驾马车成员开始认真统一两派。但这是不容易的。一方面，托洛茨基派已被驱散并必须重新集结，它的力量已远不如1923年了。另一方面，两派成员并不都是热心统一的。他们的昔日怨恨并未烟消云散，他们

---

① 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中说，他的预言得到证实比他预料的还要早。《我的生平》第2卷第272页。

② 《真理报》1926年5月26日。与此同时，斯大林把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都清除出去了。在5月的一次会议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投票把费舍、马斯洛夫、特伦特、多莫斯基和来自德国、法国和波兰的其他季诺维也夫派领导人降了职。

仍然彼此猜疑。在托洛茨基的盟友中,有些人赞成联合;但另一些人如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拉狄克则宁愿与斯大林而不是季诺维也夫联合。还有些人则讨厌这两伙人。姆拉奇科夫斯基说:"斯大林会欺骗,季诺维也夫会临连逃脱。"列宁格勒的基层托洛茨基主义者起初不肯向季诺维也夫派暴露自己,他们正是在季诺维也夫派手中遭受迫害的,而且他们惯于对季诺维也夫派隐瞒自己的行踪,正像他们对沙皇密探隐瞒自己的行踪一样。他们质问道:如果季诺维也夫派改变主意,又同斯大林言归于好,那时怎么办呢?那时我们就会自投罗网。托洛茨基不得不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到列宁格勒去消除顾虑和说服那些倔强的追随者接受合作。季诺维也夫派的困惑也不更少。当建议合作的消息刚传到列宁格勒时,他们冲到莫斯科,抗议他们的领袖"向托洛茨基主义投降"。季诺维也夫和拉舍维奇不得不解释道所谓托洛茨基主义是他们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个怪物;他们再也用不着它了。这个招认不禁使这些不幸的列宁格勒人大为震惊,他们一直认真地看待季诺维也夫指控托洛茨基的罪名,并且跟在他后面重复着。但是,即使两派相互间的嫌隙已经克服了或者清除了,即使两派融合了,双方成员仍然感到他们的合作是不协调的。①

几位首脑最初的兴奋也冷却下来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向后看。他们不想把同领导集团的分裂推到无法挽救的那一步。关于他们"向托洛茨基主义投降"的责难使他们很不舒服。他们在承认冤枉了托洛茨基的同时仍要为他们的过去辩护;他们急于挽回自己那半真半假的"纯列宁主义"的一份光荣,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本。托洛茨基在回国旅程中考察了最近几周来的事件后,开始论证说,波兰共产党支持毕苏茨基的政变,是因为共产国

① V.塞尔日:《阴暗的转折》第102页。

际指示他们去争取实现列宁早在1905年鼓吹的"工农民主专政"，而不是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同意这种看法。"民主专政"这个口号是他们"老布尔什维主义"的戒律；尽管它在波兰事件中并不很重要，[①] 后来却一再出现在次年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中。托洛茨基直率地抨击英俄委员会，说它从未服务于有用的目的，应当解散；这也使他们吓了一跳。季诺维也夫倒是愿意批判政治局和英国共产党同英国工联领导人打得"火热"；但他不肯"破坏"他帮助发起的英俄委员会。尤其是他唯恐疏远了那些老近卫军成员，他们或是有保留地支持斯大林，或是动摇于各派之间，并呼吁各派克制。简言之，这两位前三驾马车成员虽说愿意同托洛茨基携手合作，但在全面向斯大林和布哈林开战问题上先就退缩了。因此，托洛茨基刚一跟他们联盟，就不得不弥合分歧意见，并作出让步。他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诺，尊重"工农民主专政"这条戒律，并把解散英俄委员会的要求先放到一边。这样才使他与他们在其他方面达成了比较广泛的一致。

在6月的头几天，联合战斗打响了，这部分是由于斯大林首先发动。托洛茨基刚回国，斯大林立即在政治局里以两项新指控来迎接他，这两条指控是荒谬的，然而又是危险的：托洛茨基无谓地表现出"对英国共产党的敌意"，这是不能允许的；在国内问题上，当他声称"害怕丰收"时，证明了他的居心叵测和邪恶的失败主义。[②] 托洛茨基尽力驳斥这些指控。6月6日，他向政治局发出一

---

① 连布哈林和斯大林也都否定了波兰共产党的行动。参见多伊彻：《波兰共产主义的悲剧》，载《新时代月刊》1958年3月。

② 第一项指控根据的是英国共产党的抱怨；第二项指控根据的是托洛茨基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不管今年是丰收还是歉收，城乡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尖锐的。若收成不好，粮食必然短缺；若收成好，富农必然更强大、更自信、更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封挑战信,他说,除非党进行彻底、真诚的改革,否则总有一天会惊醒过来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位独裁者的赤裸裸的统治之下。

就这样,他再一次公开与斯大林进行较量。然而时机的选择却并不完全由他——列宁格勒反对派的行动和它悲惨的处境再次将他推进了此刻的争论。不管怎样,这几年来他在沉默或保留中的等待结束了。他知道等待一无所获:同斯大林"靠不住的妥协"到头来都是一场空,而这是列宁曾经警告过他的。他愿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妥协,为的是让他们和自己一同对抗斯大林;但是他也作好准备,即使没有他们,他也要把斗争进行到底。他已经了解了他的死敌,而且知道没有退路可走。他度过最近这几年正是为了来日的战斗。现在这一天已经到来,骰子已经掷出。

第五章

决战阶段：1926—1927 年

联合反对派与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进行了约 18 个月的争论。在此期间，托洛茨基投入这场政治战斗是如此紧张，以至相比之下他原先与三驾马车的遭遇只能算是儿戏。不知疲倦，不屈不挠，绷紧每一根神经，调动起他那无可匹敌的雄辩力和说服力，涉足于极其广阔的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并最终赢得了一直唾弃他的老近卫军中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大多数的支持，他作出了惊人的努力去唤醒布尔什维克党，去影响未来的革命进程。在子孙后代的心目里，他在 1926—1927 年作为一名战士的形象也许并不低于他在 1917 年的形象——甚至还要高大。他的精神一如既往地坚强。他身上燃烧的革命激情的火焰一如既往地炽烈明亮。他证明了他

的性格力量超过了他在1917年所需要并拥有的性格力量。他现在与之斗争的是革命阵营里的对手,而不是阶级敌人;要进行这样一场斗争,不但需要更大的勇气,而且需要不同性质的勇气。若干年后,甚至他的政敌们在私下里谈到这场斗争中的插曲并描述他在痛击之下的巨大冲力和行动时,也传达出一位失败了的泰坦巨人的形象——在欢呼他的失败的同时,他们仍然怀着敬畏回忆他们所击败的这位伟人。[1]

当然,其他领袖们也在这次争论中注入了高昂的激情、他们那浸透马克思主义的卓越智力、策略匠心及其能力和毅力,其中最弱之处也仍然超过了一般水平。他们所争论的问题是人们从未争论过的最重大、最严肃的问题:1亿6千万人民的命运;欧亚两洲共产主义的命运。

但是这场重大的争论却是在一片可怕的寂静中发生的。双方都只有一小部分人卷入争论。整个国家都是沉默的。谁也不知道或能够知道它在想什么;甚至连猜测人民同情哪一方都很困难。斗争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但却不被它理解。单从事情的表面来看,不论它感到和想到什么,都不影响斗争的结局——人民群众发表政治意见的一切手段都被剥夺了。然而对抗的双方一刻也未曾将自己的视线从工人和农民的身上移开过,他们尽管哑口无言,但最终决定问题的仍是他们的态度。若为取得胜利,执政派需要的只是群众的消极情绪,而反对派为了取得胜利则需要群众的政治觉醒和政治行动。因此,前者是更为容易的任务:搅乱群众的思想并培育他们的冷漠要比冒险使他们认清问题和唤醒他们的精神简单得多。尤其是反对派在试图诉诸群众时,从一开始就受到自身禁忌的掣肘。由于意识到自身是执政党的一部分并一直承

① 这里根据的是1931年在莫斯科许多党员对本书作者所作的关于这场斗争的叙述。

认党对革命负有至高无上的责任,反对派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呼吁大多数党外的工人阶级反对它的政敌。但当斗争继续下去并且愈益激化时,反对派被迫试图明确地在工人群众中寻求支持。而那时就发现最沉重的包袱正是普通群众的驯服和麻木。再没有谁像托洛茨基那样痛感到这一点了:他的雷鸣电闪都虚掷了。

并非所有这些争论问题在历史回顾中出现时都如当事人亲身感受得那样真实。随着争论事过境迁,有些重要问题已经变形并褪色了;一些原先似乎是深刻而不可弥合的分歧也随之模糊或消失了。斯大林冷酷粗暴地将托洛茨基斥为农民的敌人,而托洛茨基则指控斯大林是富农的朋友。而这种反诉的余音还飘荡在空中,斯大林就开始消灭富农了。同样,斯大林曾警告国家防止托洛茨基荒谬坚持的"超级工业化";然而后来正是他自己匆匆忙忙地实行他刚斥之为致命的行动方针。

随着斗争的推进,一片迷雾也笼罩了几乎所有的人。如果我们跟随叙述的过程留心注意降临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以及许多其他领袖身上的最后命运时的话,我们不能不为他们行为的反复无常和轻率鲁莽而感到震惊,哪怕我们能理解他们的动机。他们全都淹没在每日每时的琐事中,根本无法探出头来预见明天的危险。不仅仅是斯大林和事变本身将他们驱向灭亡——他们彼此都在驱赶着对方;他们每时每刻都着魔似的狂怒地驱赶着对方,这种狂怒扭曲着他们的性格,蒙蔽着他们的心智。这些领袖的雄伟形象在渐渐萎缩和消失。他们成了环境的可怜牺牲品。巨人变成了飞蛾,彼此疯狂地追逐,盲目地冲向火焰。似乎只有两个人物是在真正对抗着,并自始至终保持着这种敌对——这就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

※　※　※　※　※

1926年夏,联合反对派狂热地组织起他们的支持者。它向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党支部派遣密使,去同已知对官方政策持批判观点的党员接触,旨在把他们组成反对派的小组,引导他们以反对派的声音在他们的支部里说话。联合反对派急于扩展其组织网,还向许多省城派遣了密使,给他们提供指示、文件和各种“论点”,并且交代了反对派的立场。

密使的穿梭往来很快引起了总书记处的注意,它一直在盯着那些有同情反对派嫌疑的人的动向。托洛茨基派成员和季诺维也夫派成员被召到党总部去解释他们的行为。各个党委一经获悉反对派进行集会,就把自己的人派到现场以非法罪名遣散集会。当这一招无效时,他们又派出一队队的狂徒和流氓去捣乱会场。反对派只好在某种程度上秘密地进行组织活动。它的拥护者在市郊公寓区的贫寒工人家里悄悄聚会。当捣乱分子又跟踪到那里并把他们驱散时,他们就以更小的小组在郊区墓地、森林等地聚会;并且设置岗哨,派出巡逻队保护集会。但总书记处的手特别长,也伸到了这些偏僻的集会地点。当然也不乏许多荒谬的事。例如有一次,莫斯科党委的密探们发现了在城外森林里召开的秘密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位高级官员主持的,此人是季诺维也夫的副手;而在会上讲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副军事人民委员拉舍维奇。作为共产国际的主席,季诺维也夫利用职务之便散发反对派文件,联络各个小组。可以说,共产国际的总部已变成了反对派的总枢纽;而这件事也很快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

反对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尽力补充和组织起几千名正式成员。它的实际成员将近一半是托洛茨基派,另一半则是季诺维也夫派,总数估计有4000至8000人。[1] 工人反对派的残余分子至多

① 低的数字根据斯大林派的材料,高的数字则来自托洛茨基派。

只有几百人,他们也声明参加。联合反对派渴望将所有愿意参加的人都团结在一起,不管他们过去有过什么分歧;他们决心成为布尔什维克持不同政见者的最大实体。因此可以认为,他们若不能成功地补充更多的拥护者,在一开始就会遭到彻底惨败。当时全党党员的总数达75万人,相比之下,几千名反对派只构成了微弱的少数。

但是各派的实力不应该只根据这些数字来判断。党内的绝大多数是没有主心骨的群众;这个多数是由缺乏独立思想和独立意志的温顺服从的人组成的。4年多前列宁就曾宣称,党实际上已失去了作为决策实体的价值,唯有其成员不超过几千人的"一层"老近卫军是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和原则的宝库。[①] 反对派补充运动的结果应当按照这个声明来判断。反对派所获得的支持并不是来自麻木迟钝的群众,而是来自富有思想、活跃和精力充沛的成分,大多数是老近卫军,部分是年轻的共产党人。机会主义者与个人野心家则躲得远远的。目睹集会被驱散,耳闻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的狂徒们威胁反对派支持者的叫嚣,胆小怕事的人和谨小慎微的人都给吓跑了。1923年押错赌注自称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少数看风使舵者现在趁机改弦更张,投奔执政派去了。几千名托洛茨基派成员和季诺维也夫派成员不分男女都像老一辈职业革命家一样探索着重大的问题,甘冒巨大的个人危险。他们大多数人在最危急关头都是布尔什维克干部中表现最突出的人,并且同工人阶级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执政派的核心是否在数量上比反对派的核心更强大,是值得怀疑的。暂时看来,当一个布哈林派成员要比当一个斯大林派成员更时髦;然而两年之后,他们将比联合反对派败得更惨,尽管他们的领袖中有一个掌管着人民委员会,另一个

① 参见本书第一章。

掌管着工会,还有一个掌管着共产国际。至于斯大林派,它的实力并不在于其规模,而在于它的领袖完全控制了党的机关。这使他可以垄断全党的财力与物力、操纵选举、制造多数和掩盖其政策的派别性与个人性——总之,将他自己的派别等同于党。总的来看,只有约20000人出于自己的选择直接积极地卷入了这场重大的党内斗争。

联合反对派正式宣布自己的存在是在7月中旬的一次中央全会上。[①] 在会议开幕不久,托洛茨基宣读了联合反对派的政治声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声明中对他们过去的分歧表示遗憾,并宣布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把党从其"机关"的暴君手中解放出来并争取恢复党内民主。反对派将自己的立场确定为布尔什维克左派的立场,要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反对富农、新经济政策产生的资产阶级、官僚集团。它当前最迫切的要求是提高产业工人的工资。政府已经下令停止增加工资,不批准提高工人收入,除非能以生产率的提高作为保证。相反,反对派却认为工人阶级的处境是如此悲惨——工资甚至比革命前还低——以至若要提高生产率,首先必须改善工人的命运。他们应该享有自由,可以通过工会提出要求和与工业管理部门进行谈判,而不是被迫服从命令、目睹工会变成国家的驯服工具。反对派还要求实行税制改革。政府不断地从间接税中获得财政收入,其负担照例是落在穷人身上。反对派争辩道,这个负担应当减轻,应让新经济政策产生的资产阶级按照利润交付高税额。[②]

---

① 这是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共同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从7月14日开到23日。托洛茨基档案,《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148-169页。H.波波夫:《联共(布)党史纲要》第2卷第274页及以后各页。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60-275页。E.雅罗斯拉夫斯基:《苏共党史》第2卷第394页及以后各页。

② 反对派认为,政府从国家垄断伏特加酒经营中获得高额收入,群众酗酒现象包含着

反对派从同样的观点出发对待农业问题。它在这方面也要求实行税制改革,宣称正在执行的农业单一税有利于富农。它主张对大多数贫农和30%—40%的小土地所有者免税,让其余农民缴纳累进税,这将使富农承受最重的负担。反对派又进一步要求实现农业集体化。它并不是提倡强制性的或全盘"集体化",或者"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它设想的是,在农民自愿的情况下逐步实现长期改革,并通过政府信贷政策及利用工业资源使改革深化。反对派没有一项建议超越了以下要求:对富农提高税率50%;发行实际强制性的粮食公债——这样可使政府加速出口;继续进口工业机器。面对官方强烈的反对,反对派坚持认为,尽管提高工资和减免贫农纳税,但实行新税率和发行粮食公债能使政府增加工业投资基金。

反对派政纲的最高要求是加速工业化。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下,托洛茨基现在再次指责政府在预见与计划方面的无能。官方政策裹足不前,安于"蜗牛速度",因而工业发展照例远远超过了官方的预计。1925年,钢铁工业和运输业所达到的指标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认为在1930年前根本不能达到的。有远见、有魄力的指导能给予国民经济多么大的推动啊!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宣布同意提高指标与加快速度的提议。但这些决议没有任

它的既得利益,这是十分丢脸的事。由于工厂中酗酒工人的缺勤和频繁的事故,政府作为伏特加酒的生产者所得到的一切,作为工业雇主来说都将失去。政府为伏特加酒的垄断辩解道,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更糟糕的对私酿酒精饮料的消费。这是一个公认的困难问题。反对派建议,政府应当作一种试验,尝试停止垄断伏特加酒一至两年。大多数人反对这个建议。我们还记得,从十月革命后的第一周起,布尔什维克就不得不同大规模的酗酒灾难作斗争,这是俄罗斯母亲遗留下来的传统(《武装的先知》第九章)。10年以后,灾难依然存在;它被统治者当做了一个财源并且能让群众在政治上烂醉不醒。

何实际效果:它们被沉溺于例行公事的官僚完全忽视了。要打破这种惰性,再没有什么能比提前制定出一个综合具体的五年计划甚至八年计划更有效的了。“给我们一个真正的五年计划”,这就是反对派的口号。

反对派越是坚决要求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就越是无条件地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成了核心的“意识形态”问题。反对派否定民族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认为这是根本违背列宁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它认为,尽管国际革命的传播延迟了,但是党没有任何理由以为苏联的前途就在于孤立并事先否定国外革命发展的前景。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如何要进行几十年而不是仅仅几年——那么为什么要断定苏联在这段时间始终是作为一个工人国家而单独存在呢?这正是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所主张的,否则他们就不会顽固地坚持党必须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信条接受下来。

党的整个国际路线的危险就在于此。若事先断定苏联只能始终单独建设社会主义,那无异于放弃国际革命的前途;而放弃这个前途就是拒绝为它奋斗,甚至会妨碍它。反对派坚持认为,通过在理论观念上“取消”国际革命,斯大林和布哈林还企图将它从他们的实际政策中取消。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早就涂上了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这种观点的浓厚色彩;因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指出,斯大林和布哈林两人正操纵着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不是将它引向自我毁灭,那么起码也是引导它迁就第二国际各党和改良主义工会。其形式就是“机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各国共产党在这统一战线中追随着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适应改良主义的立场。这种策略的突出例子就是英俄委员会,这种消极的策略在共产国际最初几次代表大会上就已露头。它产生于两国工会领袖的协议。不论在哪一方面,它都没有、也不能使共产党人同改良主义者群众进行密切接触并影响后者。因此无论在哪一方面,这种

协议都没有也不能推动英国的阶级斗争。反对派争辩道,当英国工联领袖压制产业工人骚动甚至破坏总罢工时,苏联共产党却在培育与他们的友谊,这只能造成英国工人的思想混乱,使他们分不清敌友。托洛茨基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程度差一些)都集中抨击英俄委员会正是默许放弃革命目标的缩影,他们认为这种默许放弃正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前提和必然结果。

托洛茨基在7月全会上所宣读的声明内容几乎没有他或他的伙伴们未曾说过的话。但是他们把这些批评和建议一起写进一份全面的政治声明并联合起来向执政派挑战,这还是第一次。反应十分强烈。争论达到了白热化;而一次不祥的意外事件更加剧了这种气氛。捷尔任斯基撑着病体在会上极度亢奋地发表了激烈的长篇演说,谴责反对派领袖特别是加米涅夫。他那高分贝的叫喊折磨听众的耳朵长达两个小时之久。当他离开讲台时,心脏病突然发作,就在全体委员的眼前倒在了走廊上,当天就死去了。

中央委员会断然拒绝了反对派关于提高工资幅度的要求。多数派领袖们坚持认为,现在商品短缺,如果不根据生产率而提高工资,就会造成通货膨胀,使工人的命运更加恶化,而不是得到改善。中央委员会拒绝豁免贫农纳税并将重税强加到其他农民身上。它抵制加速工业化的要求。最后,它重申支持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产国际政策,特别是英俄委员会。但是,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执政派处境狼狈,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因此斯大林不是依据党的政策,而是依据党的纪律进行反击。

斯大林指控反对派领袖在党内形成一个正式派别,因而违反了已有5年之久的列宁禁令。他将打击目标瞄准反对派的薄弱环节季诺维也夫派。他指责季诺维也夫滥用作为共产国际主席的职权从自己的总部内推进反对派活动;他指控拉舍维奇和一部分基层反对派成员在莫斯科郊外森林里举行“秘密”集会;最后他扯上

了某位奥索夫斯基的事件,此人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反对派应当使自身形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运动,在党外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党公开敌对,而不是在党内作为忠诚的反对派去行动。托洛茨基将自己和反对派与这个观点划清界限;但是他指出,如果有些党员对党失去了信心,看不到从内部改革党的希望,那么应受谴责的则是竭力压制各种改革意图的领袖们。中央委员会决定把奥索夫斯基开除出党,把拉舍维奇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军事人民委员部,免去季诺维也夫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①]

联合反对派就这样在第一次正式接火中遭到了严重挫败。把它的一个支持者开除出党不过是杀鸡给猴看罢了,尽管他仅是个无足轻重的"极端分子"。拉舍维奇的降级使反对派失去了军事人民委员部。当然,最严重的打击是季诺维也夫被排除出政治局。由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加米涅夫只是一名候补委员,因此在政治局里前三驾马车中的两位都失去了投票权;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中唯有托洛茨基还保留着其席位。正是由于季诺维也夫在政治局里所起的作用,他才能掌管共产国际;而现在他要继续掌管共产国际是不可能的了。斯大林敢将不久前在许多人心目中还是三驾马车的车老大的季诺维也夫罢官,是他格外强大和自信的一个信号。他的行动迅雷不及掩耳,但又刻板地遵守一切法令细节。将季诺维也夫降级的建议被正当地提到唯一有权任命和罢免政治局委员的中央委员会上讨论,并以绝大多数票通过。

在这一阶段,从理论上看再没有什么能阻止斯大林褫夺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席位了。但是他还拿不准进一步报复能否同样获得

① 参见 H.波波夫:《联共(布)党史纲要》第 2 卷第 279－292 页;E.雅罗斯拉夫斯基:《苏共党史》第 2 卷第 2 部分第 10 章;托洛茨基档案;《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187－190 页;《苏共决议汇编》第 2 卷第 160－166 页。

绝大多数票。他意识到表现温和一点儿只能加强他的力量。他通过对反对派零打碎敲逐步培植起一种党内舆论,以便施行那最后致命的一击。同时,他也不在乎反对派的原则宣言和政治声明或它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内进行的抗议。反对派领袖所说的话很少能够渗透到党的基层支部去,更难在报刊上披露。只要这种局面不改变而且执政联盟能保持团结,那么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的纸上谈兵就不会给反对派任何取胜的机会。

因此反对派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条路可走,即呼吁基层群众起来反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1926 年夏,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指示他们的支持者:要使全党注意到他们的共同观点,散发政治声明、传单和"提纲",并在支部里站出来讲话。反对派领袖们亲自下到工厂和车间向集会群众演说。托洛茨基也出人意料地出现在莫斯科机车厂和铁路工场举行的大型集会上。但是,反对派领袖从基层造成党内舆论的努力并不比他们从上层影响党的政策的企图更走运。党的机关跑在了他们的前头。它的奸细、狂热分子和挑衅者到处用嘲弄轻蔑迎接他们,用可怕的嘈杂声音淹没他们的演讲,恐吓听众,破坏会场,使听众根本听不清演讲者的话。托洛茨基发现自己面对群众束手无策,这还是 30 年来的第一次,是他开始他那革命演说家生涯以来的第一次。面对辱弄鼓噪、偏执的嘘声和起哄,他那出类拔萃的辩才、天赋非凡的说服力和高亢洪亮的声音都无用武之地了。而其他演讲者的遭遇甚至更可怕。显然,反对派第一次同心协力诉诸党内舆论的行动遭到了失败。

斯大林马上夸耀说,正是优秀忠诚的基层布尔什维克给了反对派以应有的反击。反对派反驳说,斯大林煽动起来反对他们的人都是一帮坏家伙、流氓无产者以及暴徒无赖,他们不能容忍正直的党员群众接受反对派的观点。斯大林的确是毫无顾忌的;他的奸细用以对付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其朋友们而发出的叫嚣几

乎不可能被误解为“人民的声音”。然而,这并不能充分解释反对派的屈辱遭遇。这批流氓无赖之所以能够破坏大型集会,是因为多数人即使不是赞同他们这样做,起码也是漠不关心的。若是有兴趣的和能自我克制的听众,一般都知道怎样撵走或制止那些企图阻挠他们集中精力听讲的捣乱分子。在那些流氓无赖及其嘘声的背后站着的是沉默的人群,他们是那样驯服和冷淡,因此并不认为值得花力气去维持秩序。归根结底,正是基层群众的麻木才使反对派遭到了惨败。

然而,反对派代表工人利益所提出的如增加工资的要求本来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冷漠的。但为什么没有激起反应呢?执政派在工资问题上作出了让步的表示。7月他们还断然拒绝考虑这个要求,扬言增加工资将严重损害国民经济。但到了9月,斯大林和布哈林看到他们的政敌正要向基层群众发出呼吁,就抢先允诺为那些收入最低、最为不满的工人群众增加工资。为政策转变而辩护的理由是经济形势有了根本好转,其实在两个月里并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这种好转。反对派取得了部分胜利,但眼睁睁地看着最有力的论据被剥夺了。斯大林开始盗用托洛茨基关于工业化政策的思想时,进一步混淆这个问题。他到那时为止还丝毫没准备去实现全面工业化;但在形成他的决议和声明时,他却从托洛茨基那里抄袭了大量的提法甚至是整段整段的文章。

党的农村政策的主旨也同样是模糊不清的。斯大林硬说执政派和反对派之间的分歧不是对待富农的问题,而是对待中农的问题。反富农的呼声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已经产生了作用,在干部中激起了对新民粹派的潜在疑虑。布哈林也不再能公开谈论向富农让步的必要。布尔什维克的舆论气候发生了变化:富农再一次被当做社会主义的敌人。虽然政府一直小心地避免激怒富农,不肯对它课以重税,但也无意作出新的让步。现在不存在提出任

何新的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但是情况也并没有改进。官方政策被夹在各种冲突着的压力之间,进退两难、动弹不得。它欲生不能,欲死不得:它既不能指望因对富农让步而得到好处,也无法指望严格的社会与财政措施产生好处。反对派仍然有强大的基础。但是斯大林成功地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这个问题上转移开了,他指责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企图把党推入与几百万中农的冲突之中,这些典型的俄国农民并不是剥削者,因而他们对私有财产的迷恋是无害的,他们的善意是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基本因素。

反对派事实上并没有与中农反目,[①] 也没有要求党对他们施加财政压力——依靠小块自有土地仅足糊口的广大中农不能对解决全国粮食问题作出多少贡献。但是,关于反对派力图牺牲中农的指控却对它的事业造成了损害。如同 1923 年和 1924 年时一样,一帮宣传家再一次把托洛茨基描绘为农民的主要敌人;而且他们补充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感染了托洛茨基对农民的敌意。在党的基层支部中,人们对于指控与反指控无所适从。他们意识到布哈林在向富农讨好,但他们同时至少也不相信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诚意。大多数曾扎根于乡村的工人最不愿意与农民发生冲突。他们首先希望的是安全。因为这是斯大林似乎可以提供给他们的,因此他们小心提防着不要把脖子伸给反对派。

斯大林的力量就在于他的呼吁符合了对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普遍渴望。托洛茨基似乎又一次站在了这种渴望的反面并冒犯了它。群众的消极和对冒险试验的恐惧构成了这场斗争的固定背景。斯大林在为其对外政策辩护时更是变本加厉地玩弄这种消极和恐惧。他再次把托洛茨基丑化为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说他将

① 但是反对派声称,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经常把富农划分为中农而低估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势力。

把党拖进最可怕的冒险事业中去。

> (斯大林在捍卫英俄委员会时说)托洛茨基的虚张声势的政策所根据的不是具体的人,不是……进行斗争的具体的活的工人,而是一种从头到脚都革命的、理想的、没有血肉的人。……我们都记得,托洛茨基第一次运用这种政策是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当时他不签订德俄和约而虚张声势地反对和约,以为虚张声势就可以把全世界的无产者发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种虚张声势使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得很清楚。这种虚张声势帮助了谁呢? 帮助了……那些力图扼杀当时还不巩固的苏维埃政权的人。……不,同志们,我们不同意采取这种虚张声势的政策,我们今天不同意,正如我们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不同意一样。我们不同意,因为我们不愿意使我们党变成我们敌人手中的玩具。[1]

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条约同英俄委员会相提并论,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即使苏联与英国工联的关系直接破裂——由于季诺维也夫的反对,反对派才没有坚持要求这样做——那也不能想象苏联会遭到它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时期所面临的那种危险,二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布哈林提出的指责听起来更是匪夷所思:1918 年他领导的主战派之所以失败,就因为当问题取决于托洛茨基那一票时,托洛茨基投票赞成和约。[2] 但是谁知道、谁记得那出伟大戏剧的来龙去脉呢? 布尔什维克党的记忆是很差的;但要引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71-72 页。

② 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十一章。

起它对托洛茨基“英雄主义姿态”的担忧,则是太容易了。

一个普通的布尔什维克正是以这样的心情倾听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辩论的。要他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去判断问题是十分困难的。争论——只要没有陷入歪曲和诡辩的泥塘——是在两派经济学家之间展开的,一派设想能在一个民族自给自足的体系内“建成社会主义”,另一派则认为只有在更广泛的国际分工的环境中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文化水平最高的党员才能在这一层次上领会双方论点。基层党员不理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什么坚持认为俄国的国内资源即使丰富得足以取得很大进步仍然不足以建成充分成熟的社会主义。他们更不能领悟托洛茨基扎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更深层的论断。他证明说,尽管社会主义革命暂时可以局限在一国国界之内,但社会主义却不能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实现,即使在苏联和美国这样领土辽阔的民族国家之内也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始终把社会主义设想为一种国际共同体,因为它认为,从历史上看,社会总是以更大的规模向一体化发展。从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过渡时,欧洲克服了它的中世纪的排他主义。资产阶级创造了国家市场;现代民族国家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和经济活力不能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即使在具有其国际分工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们也超越了这些界限,这是资产阶级西方所取得的卓越的进步成果。① 在这一点上,作为斯密和李嘉图忠实信徒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写道:

> 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巨大的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

① 在30年代,托洛茨基从资产阶级西方向经济民族主义的倒退中(特别是在第三帝国专制时期)看到了它衰退的确凿迹象。

> 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产阶级……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①]

托洛茨基问道:我们怎么能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闭关自守的和自给自足的民族基础上呢?社会主义所预期的超过资本主义所达到的高技术、高效率、高产量不能通过一种封闭落后的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依赖"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它必须将国际分工推向纵深,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对国际分工的梦想;资产阶级只是断续、无意识地发展它,社会主义则是系统合理地给它作出规划。因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是反动的:它无视历史发展的逻辑和现代世界的结构。托洛茨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调欧洲联邦这个概念,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世界共同体的初级阶段。

不管这个论断的价值如何,它已超过了反对派力图争取其支持的布尔什维克基层群众的认识水平。两年后,拉狄克在流放中反省了反对派失败的原因,致信托洛茨基说,他们是作为宣传家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只拘泥于重大的但又抽象的理论,却没有作为政治鼓动家尽量提出一些普遍而实际的想法以激起反响。[②] 无疑,拉狄克此时是在失败主义者的情绪下写这封信的——他很快就向斯大林投降了,而且他的结论对反对派是不公正的。反对派已经提出过一些实际想法(关于工资、税收、工业政策、无产阶级民

---

① 重点号是我加的。伊·多·

② 参见拉狄克信函《想好了再做》,1928年(未注明确切日期),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主等等的建议),同样没有激起普通党员的反应。但是拉狄克的评论毕竟有某些道理。基层群众感到疲惫、幻灭,并倾向孤立主义。托洛茨基所展示的透彻的历史前途同样不为他们所关心。正如瓦尔加指出的,他们渴望的是一种安慰的学说,它能补偿他们已经作出的和号召他们作出的牺牲。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是神话创造的杰作,标志着斯大林主义的整个发展,并且旨在掩盖布尔什维克的诺言和兑现之间的鸿沟。在托洛茨基看来,这种神话创造是给人民的新鸦片,党应该拒绝向人民提供。

(他写道)在它的英雄时代,我们的党无条件期待着的是国际革命,而不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站在这面旗帜之下并在纲领上公开声明落后的俄国不可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我们年轻的共产党人经历了最严酷的内战年代,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瘟疫,自愿开展周末重体力劳动(星期六义务劳动),勤奋学习,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无数的牺牲。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前线战斗并(在他们的休息日)自愿到车站装卸木材,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用这些木材来建设民族社会主义——他们是为国际革命事业服务的,苏联堡垒屹然兀立是这个事业的根本;每一根木头都要用来加强这个堡垒。……时代已经改变了……但是原则仍然保留着它力量的全部。工人、贫农、游击队员和青年共产党员用他们直到1925年的全部行动表明,他们不需要新福音书。只有那些看不起群众的官吏、不愿受到打扰的小管家和党的机关里的寄生虫……才需要新福音书。正是他们以为……没有一种安慰的学说就无法跟人民打交道。……工人们懂得,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地狱里是不可能建成一个绿洲般的社会主义乐园

的;他们意识到,苏维埃共和国和他们自身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国际革命——比起那些被告知并相信我们已有了"90%的社会主义"的人,工人们将精神更旺盛地履行对苏联的义务。[①]

反对派和托洛茨基的不幸是,不仅"小官吏和寄生虫",而且还有疲惫、幻灭的群众更愿响应安慰的学说,而不愿响应不断革命的英雄主义号召。他们欺骗自己,相信斯大林会给他们提供一条更安全、更容易和没有痛苦的道路。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也激起了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而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号召则让头脑简单的人感到,他妄称俄国不能依靠自己并因此认为它的得救最终只能来自革命的西方。这不能不伤害那个已经赢得最伟大革命的人民的自信心——尽管日常生活是那样悲惨,但这种自信心却是相当真实的,哪怕可笑地掺杂着政治上的冷漠。托洛茨基强调古老的俄国观念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可怕障碍。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已意识到自身的落后;而十月革命则是他们对这种落后的反抗。但是正像个人一样,民族、阶级、政党也不能永远安于对他们自身落后的尖锐意识。他们迟早要努力压下这种自卑感。若是过于经常地向他们提醒这一点就会冒犯他们;若是故意向他们提醒这一点就会激怒他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辩护士们淡化俄国的落后,为之巧辩,或者干脆否认它。[②] 他们告诉人民,没有别人帮助他们也能实现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社会主义。斯大林似乎要开辟的那条道路不仅是更容易、更安全的道路

---

① 托洛茨基:《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第67页,英译本作了部分改动。

② 这一点甚至反映在布尔什维克的历史著作中,特别是在波克罗夫斯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俄国状况的观点中。波克罗夫斯基当时是正统的斯大林派历史学家。

——还是一条社会主义选民的道路,是几代民粹派所梦想的、俄国特殊革命使命的道路。的确,这两种相互竞争的准摩西式的信念似乎是在彼此对抗:托洛茨基主义坚信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使命;斯大林主义则美化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前途。由于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衰弱一次次地显示出来,这两种信念哪个能赢得更普遍的同情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尽管对西方革命抱着充满希望的信念,但是一般来说,托洛茨基比他的政敌更能以清醒的头脑观察当前国际时事。他的革命理想主义并没有妨碍他以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去探讨外交领域或共产主义运动的特定形势。但是就其本质来说,他这方面的活动和他对国际事件所作的权威性的观察和分析并不能打动基层群众,他们愈益(或被引导着)以一种虚无主义态度来看待围绕着他的革命浪漫主义气氛。

问题被争论所采取的那种特有的学究式的方式搞得更混乱了。作为比较,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世纪文献中神学家关于一个针尖上究竟能站多少天使的争论,或者回顾一下犹太法典中关于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论。一个普通的布尔什维克听到托洛茨基说,推进俄国社会主义的最好方法是促进国际革命,而又听到斯大林回答说促进国际革命的最好方法是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这其中微妙的差别简直让他摸不着头脑。双方争论时都是根据列宁主义的正统原则,那些用以压倒托洛茨基的正统原则是三驾马车首先确立的,他们也确实成功地将之强加于他了。从那时以来,这种正统愈益周密、严格和精微了。如同许多种正统一样,这种正统为了执政派的利益而利用所继承学说的道义权威,用以掩盖这个学说并未给新问题提供明确答案这一事实并重新解释它的教义,它还用来扼杀各种异议或怀疑以及训练信徒。如果试图从列宁著作中寻求对当代问题的解答,那是徒劳的。这些问题在几年以前还

大都没有出现或仅仅露了个头;即使对于列宁本人曾经处理过的问题,也只能找到互相矛盾的解答,因为列宁是在不同的条件和互相矛盾的环境下处理那些问题的。但这并没有妨碍党的领袖们利用列宁权当政治表达方式的那些词句并把它们当做神学教条。他们还引用列宁在争论中给同志们起的生动绰号,把它们当做教皇的诅咒。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愈是善于独立思考,愈是富有创新精神,就愈可能从列宁的著作和通信中拣出给他起的绰号——唯有那些看风使舵者和溜须拍马者用不着担心这类争论。列宁的影子就这样被召来,被用于迫害他那些现在领导着反对派的朋友和学生。反对派也竭力用列宁的影子回敬执政派。反对派断言,篡改列宁学说是它的政敌的罪过,而反对派则努力要把党带"回到列宁主义"。

不错,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反对派强烈要求回到列宁主义的正统:列宁曾经反复讲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和布哈林甚至直到1924年也是这样说的。[①] 如果斯大林和布哈林能自由坦率地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么他们就应该说:在列宁生前,问题还没有以现在这种方式提出来,他去世

---

① 对列宁立场的详细说明和分析可参阅本书作者所著《列宁生平》一书。这里只简单举出列宁的几句话就够了:"……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事业时,就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世界革命上,……而这在当时无疑是是正确的……我们一向强调我们是从国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在单独一个国家内是不可能完成像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任务的。"列宁是在十月起义3周年纪念大会上说这番话的。参见《列宁全集》第40卷第2页(1928年俄文版——但在后来的版本中,加重点的几行被删去了)。在内战最终结束后,他又一次宣告:"我们一贯并反复给工人讲……我们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在于革命向至少几个更先进国家的传播。"他在第六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一个国家内取得完全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俄国还算不上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列宁全集》第35卷第150页。

后俄国革命的孤立更加明显了,因此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过时了,他们有权抛开神圣经文而提出他们的新学说。但是斯大林和布哈林没有这样坦率地提出问题。他们也被自己制造出来的正统所束缚着。他们不愿以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的面目出现,虽然他们的确是。他们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时不得不把它说成是从列宁学说中合法推导出来的,而且还说是列宁本人所发展的思想。由于列宁著作毕竟包含着大量有利于反对派的证据,布哈林和斯大林就必须将党的视线从这些证据上转移开,把争论变成没完没了的、稀奇古怪的狡辩和吹毛求疵,使基层群众迷惑不解,恼火透顶,最后厌烦得要死。要通过对历史的叙述来表达这种执迷的罗唆和无法形容的单调,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争论所具有的这种风格却是事件的精髓;罗唆和单调在这出政治戏剧里具有明确的作用。它们扼杀了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和工人对争论问题的兴趣,使他们感到,这些问题只跟那些故弄玄虚的教条主义者有关,却跟老百姓不相干。这样就剥夺了反对派的听众,而使执政派能借"使徒式的打击证明他们学说的正统"。

当反对派提醒党记住它在列宁时代讨论问题和处理问题的那种自由空气时,反对派"回到列宁主义!"的号召同样是对牛弹琴。这种提醒是双重性的,因为尽管布尔什维克几乎直到列宁时代的末期确实一直享有充分表达意见的自由,但同样确实的是,列宁在晚期也宣布了对派别集团的禁令,严重剥夺了这种自由。看来,反对派为了自卫就应当谴责这条禁令是有害的,或至少是过时的,并要求取消它。但是此时的反对派也被正统的罗网缠住了,不敢大声反对禁令,因为在禁令的背后有列宁的权威。1924 年,托洛茨基甚至与他的朋友们反目,只因其中有几人鼓吹党内结派自由。[①]

---

① 参见本书第二章。

两年后,尽管他指出,这条禁令是为一个享有表达自由的党制定的,而在一个噤若寒蝉的党内,不满情绪和不同政见必然会趋向采取宗派形式;但是他仍然视禁令有效。因此,联合反对派虽然将自身组成一个固定派别,却没有勇气捍卫其行动;这种三心二意使它变得加倍脆弱。斯大林反驳说,唯有伪君子才会一方面号召回到列宁主义而另一方面又藐视派别禁令和作为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铁的纪律。他得出结论,中央委员会决不允许派别活动不受惩罚:对于反对列宁主义党性观念的人,在布尔什维克队伍内不能有他们的位置。

反对派在支部里遭到的挫败和斯大林高悬在它头顶上的开除威胁在它内部造成了混乱。幻想轻易取胜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现在泄了气。他们的失败意识因悔恨而加深。他们后悔不该发动支部去反对中央委员会,因而急于撤退以取得敌人的谅解。他们同时还对流行于反对派激进边缘的思潮感到不安,那些人断定,党已完全掌握在斯大林和布哈林手中而不能接受任何独立观点,它已经僵化、无可救药了,反对派应该吸取失败的教训,最终建立一个独立的党。这原来是那些来自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普遍观点,现在也开始在托洛茨基派中间传播开来——据托洛茨基说,拉狄克也倾向于这种观点。[①] "新党"的鼓吹者力图在更广泛的基础上为其立场辩护,他们争辩说:旧党正处于"后热月政变"阶段,已经"背叛了革命",不再代表工人阶级说话,变成了官僚分子、富农和新经济政策产生的资产阶级的先锋。有些人认为,苏维埃共和国不再是工人国家了,因为它的官僚集团已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抛弃了穷苦人,窃取了十月革命的成果,和1794年及以后的法国资产阶级所干的一样。因此,反对派必须努

① 《托洛茨基文集》第1卷第160-163页。

力推翻官僚集团,正如巴贝夫及其平等会密谋推翻后热月政变的法国资产阶级一样。

无论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还是托洛茨基,都不同意这种观点。在他们看来,"苏联热月政变"是应该防止的危机,而不是既成的事实;革命尚未结束,官僚集团并不是新的统治阶级或占有阶级,也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只是长在工人国家躯体上的寄生物。由于其社会成分和政治成分的驳杂,动摇于社会主义与财产权之间,官僚集团最终可能屈服于新经济政策下产生的资产阶级和新富农,并跟这些力量联合起来,摧毁公有制,恢复资本主义。但是只要这一切还没有发生,十月革命的基本胜利果实还完整无损,苏联在本质上就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旧党就仍然与过去一样是革命的保卫者。因此,反对派不应当与它决裂,而应当认为自己仍属于这个党,并以无限的忠诚和决心捍卫布尔什维克对权力的垄断。

照此推论,反对派是不能在党外寻求支持的。但是又不允许它在党内寻求支持。这就是无法解决的两难处境。一眼就能看出,反对派为了保全自己在党内进一步行动的机会而不得不让出阵地,特别是在斯大林暗示开除之后。但是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对此并不完全一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忠于旧党看得高于一切。他们绞尽脑汁地想怎样在斯大林完全控制了党的机关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斗争。他们要求休战,愿意声明从今以后遵守派别禁令。他们已准备解散他们所建立的组织派别,也就是解散作为一个派别的反对派。他们急于跟"新党"的拥护者划清界限,并将与那些怀疑布尔什维克权力垄断的人断绝往来。的确,他们准备将他们与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的主要问题搁置起来,至少是暂时搁置起来。他们的大多数支持者看来也同样急于打退堂鼓。托洛茨基派则具有更强的战斗精神,其中的激进分子同情地

倾听着为新党辩护的主张。

托洛茨基力图将反对派从这股逆流中挽救出来。为了阻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跪倒在斯大林面前,他愿意在让出阵地这个问题上多少迁就他们。他们达成协议,他们将联合声明愿意解散作为一个派别的反对派,并与“新党”的鼓吹者划清界限;但是他们也坚决重申反对派的原则和批判;他们将继续反对执政派,无论是在中央委员会还是在他们所在的其他委员会里。

1926年10月4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向政治局提出休战建议。斯大林答应休战,撤回开除威胁;但又提出了一些条件。只是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后各方才接受了反对派提出的声明。的确,反对派是在没有撤回它的任何批评并明确重申它们之后才宣告它承认中央委员会决议对它的约束力、停止一切派别活动并与前工人反对领袖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以及所有主张建立“新党”的人划清界限的。在斯大林的坚持下,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又进一步与那些宣布与俄国反对派团结一致而被本国共产党开除的外国团体和个人断绝了关系。[①]

反对派心情沉重地接受了这些条件。他们心中明白这无异于屈膝投降。尽管它重申了它的批判,挽回了面子,但已是前途渺茫,没有希望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实际上放弃了他们再次向基层党员呼吁的权利。他们承诺只在党的领导集团里讲自己的观点,而且也预先知道照例会被否决,他们的声音能传到基层的只是微乎其微,甚至毫无可能。他们用自己的手造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这完全是因为他们既不能通过试图向支部呼吁而给中央委员会施加影响、又不能让基层支部知道他们被赶回中央委员会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87-190页。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特别与德国的路特·费舍和阿尔卡季·马斯洛夫和法国的鲍里斯·苏瓦林断绝了关系。

所造成的;他们已经中了圈套。不管是什么理由,他们因为与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集团划清界限并与他们在国外的某些支持者断绝关系而削弱了反对派。他们宣布解散自己的组织,就是默认斯大林和布哈林最初指责他们是对的;他们承认派别禁令是有效的和必要的,就是赞美斯大林抽在他们身上的皮鞭。

把这一切沉重的责任背在自己身上并暴露了反对派的弱点之后,他们就无法再保住他们所提出的休战了。他们的声明是10月16日登在《真理报》上的。但只过了一个星期,在10月23日,休战就不剩丝毫踪影了。中央委员会在这一天开会讨论即将召开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议程。一个多少非争论性的议程已经准备就绪;但是,无疑是在斯大林的煽动下,中央委员会突然决定增加一个关于反对派的特别报告,由斯大林来作。这就不能不重揭旧疮疤。托洛茨基提出抗议,要求多数派中央委员遵守休战条件。但中央委员会仍然执意要斯大林准备他的报告。

为什么斯大林刚同意休战就来破坏它呢?他显然是想利用他的优势,趁反对派撤退时击溃它。也可能是宣布休战两天后所发生的某件事激怒了他。10月18日,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马克斯·伊斯特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列宁遗嘱——这是列宁遗嘱完整而真实可靠的文本的首次披露。一年前他在《列宁逝世之后》一书中曾公布过摘要;我们记得,托洛茨基与他断绝了关系,并在政治局指示下否认了遗嘱的真实性。斯大林现在不可能再次否认,但他肯定疑心伊斯特曼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受到托洛茨基的鼓励。这种疑心并非毫无根据。年初,反对派一位密使确实将列宁遗嘱的文本带到了巴黎,交给苏瓦林,苏瓦林则鼓励伊斯特曼把它发表出来。伊斯特曼写道:"我认为这不仅是苏瓦林个人的决定,而且也是整个反对派的想法——我应该是发表遗嘱的人。一个理由是,我作为托洛茨基的朋友是众所周知的,另一个理由是,莫斯

科无数有良知的人因为托洛茨基否认我的著作而不安。”①

伊斯特曼的猜测无疑是正确的。在“莫斯科那些不安的有良知者”中,没有人能比托洛茨基更不安的了。托洛茨基曾否认过列宁遗嘱的真实性并与伊斯特曼断绝了关系,是因为当时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朋友们都不想被重新卷入斗争旋涡并由此招来报复。但是在他组成联合反对派重启争端后,他有一切理由想弥补那走错的一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能亦步亦趋地跟着他。正是他们两人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重新要求公布列宁的遗嘱并利用以后的一切机会不断重申这一点。他们跟托洛茨基一样宁愿列宁遗嘱在《真理报》上公布。但这是连想也不用想的,因此他们就几乎毫不犹豫地设法让国外一家重要的资产阶级报纸把遗嘱登出来——不管怎样,列宁遗嘱既非国家机密,也非“反苏文件”。当然,他们必须谨慎行事,因为在形式上他们犯了破坏纪律的错误。文件副本是联合反对派在最得意的时候送到国外的,旨在通过遗嘱的公布获得外国共产党的帮助,同时也在苏联国内造成有利的影响。然而,遗嘱公布时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反对派已遭到惨败和要求休战,并与国外的支持者断绝了关系。10月23日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时,这一轰动一时的揭露已充斥着世界各国的报纸;这无疑恶化了中央委员会内的气氛。多数派决定不顾休战而痛挞反对派。

两天后,在政治局里掀起了一场风暴。斯大林正提出他要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作的关于反对派的报告“提纲”。他攻击反对派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要求它的领袖承认观点错误并且将其撤回。② 托洛茨基又一次抗议斯大林破坏休战,指责他背信弃义,并

① 引自伊斯特曼致本书作者的信。

② 斯大林的报告“提纲”刊登在10月22日的《真理报》上,即代表大会开幕那天。《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05页。

警告多数派说,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他们正在采取的行动路线必将以遭到全面排斥而告终。他愤怒地指出,继之而来的必将是自相残杀的倾轧,是党的最终毁灭,并给革命带来致命的危机。然后他面对斯大林,指着他斥责说:“你这个第一书记已经把自己摆到革命的掘墓人候选者的位置上了!”斯大林脸色铁青,站起身来,起初努力控制着自己,继而冲出会场,砰地把门撞上了。会场立即大乱,这次会议有许多中央委员是偶尔出席的。次日早晨中央委员会就褫夺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宣布季诺维也夫不再是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就这样,实际上而非名义上免去了他的共产国际主席之职。这一切事件像阴影一样笼罩着同一天开幕的代表会议。

反对派陷入了一片极度的混乱中。它已经让出这样多的阵地,结果一无所获。它曾抛弃了思想同情者和盟友,承认自己违反1921年禁令的错误,号召它的组织解散——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斗争的激化。而它的所得却是被卷入了更残酷的斗争,并且由于绑住了自己的手脚而遭到新的打击。它内部的不和在加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埋怨托洛茨基毫无必要去招惹斯大林、激怒多数派,而且恰恰是在反对派力图平息风波的时刻。连一些托洛茨基派成员也对托洛茨基如此猛烈地抨击斯大林感到惊恐。托洛茨基的妻子就此事描写道:

> 一天下午,穆拉洛夫、伊万·斯米尔诺夫、还有其他一些人来到克里姆林宫我们的家里,等候列夫·达维多维奇从政治局开会回来。皮达可夫先回来了。他脸色苍白,哆嗦着,端起一杯水一饮而尽,然后说道:“你们知道我是闻惯火药味的,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简直是糟透了!列夫·达维多维奇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 斯大林永生永世也不会饶恕他!"皮达可夫心烦意乱,以至说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列夫·达维多维奇终于走进了餐厅,皮达可夫向他冲去,问道:"您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列夫·达维多维奇摆了一摆手,没有理会这个问题。他当时精疲力竭,但仍很镇静。他已经向斯大林喊出了"革命的掘墓人"……我们都清楚这个裂痕是无可弥补了。[①]

这一幕是以后那些事件的预兆:一年之后,皮达可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抛弃了反对派。谢多娃肯定地说,即使是那时托洛茨基就已深信,俄国国内外"一个漫长的反动时期来临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精疲力尽,党被窒息了,反对派失败了。他始终坚持反对斯大林,但他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尊严和与他的同志们保持一致,而不是出于信念。

由于反对派领袖中有些人消沉失望,他们决定再作一次挽救休战的尝试:他们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将不再攻击执政派,只限于自卫发言。在会议进行的9天里,他们整整7天对敌人没有回敬一个字,而敌人们则自始至终为他们的失败而兴高采烈,挖苦他们,并力图把他们拖进争论。在第7天,斯大林终于发动了长达好几小时不折不扣的攻击。他为斗争定下了自己的调子,回顾了季诺维也夫关于托洛茨基是列宁主义首敌的所有讲话和托洛茨基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十月革命的工贼"的苛评,并以此揶揄

---

① 引自塞尔日《托洛茨基的生与死》第180-181页。其中有不少重要片段是谢多娃执笔的。她描述这次事件发生在1927年;但是她把日期弄错了。1926年10月,布哈林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提到了这次事件;而且引述了托洛茨基关于"革命的掘墓人"的词句。《联共(布)第十五次党的代表会议》第578页。

他们给予对方的"彼此大赦"。他兴高采烈地描绘反对派的失败，并说它只是因为失败才谋求休战以赢得时间拖延覆灭。但是党决不能给反对派以喘息的机会："党的任务是，对反对派仍保留的错误观点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不管它们用什么'革命的'词句掩饰着"，直到反对派放弃它们为止。斯大林还不厌其烦地罗列托洛茨基的生平事实来证明托洛茨基至今一直顽固地对抗列宁思想，并奚落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最后，他谴责反对派煽动党反对农民，谴责反对派的超级工业化主张将使"千百万工农群众贫穷化"因而并不比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式更好。斯大林及其同伙们——强迫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未来发起者——宣称，他们只赞同这样的经济发展形式，即能够立即促进人民的幸福，使国家免除社会动乱；他以此名义号召代表会议"团结一致地回击反对派"。①

当反对派领袖们终于站到讲台上时，代表们发现他们回答斯大林时的调子各不相同。第一个发言的是加米涅夫，他句斟字酌并且语气谦卑地阐释自己的观点，徒劳地想磨钝争论的锋芒。他抱怨斯大林的背信弃义，休战还不到两星期就发动粗暴的攻击。他试图把自己和季诺维也夫从"向托洛茨基主义投降"的罪名中开脱出来。他说，他们与托洛茨基的联合只是出于一定的和有限的目的，如同列宁经常做的一样。他再次提到列宁的遗嘱以及列宁对党内分裂的担忧；但是他的话只能在听众席上引起一阵哄笑。于是他半是警告半是自我安慰地冲口说道："同志们，随便你们怎么指责我们吧，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中世纪！决不能让宗教法庭重演！你们不能指责（我们）……我们呼吁对富农实施高税率，希望帮助农民并同他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你们也不能用企图掠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80－320页。

夺贫农的罪名来指控(我们)。你们不能把我们烧死在火刑柱上。"[①] 正好10年之后,加米涅夫就坐到了宗教法庭的被告席上。

接着,托洛茨基站起来作了他生平最精彩的演说之一。他语调温和,但内容却是深刻犀利的,层次结构的逻辑性和艺术性达到了纯熟境界,充满着幽默——但同时也暴露出他当前弱点的主要根源:坚定不移地信赖欧洲革命。他为整个反对派辩护,但是也为自己辩护,仿佛一举就掀掉了在代表会议上向他劈头盖脑压过来的歪曲和侮辱的大山。他受到过各种指控,如制造恐慌、悲观主义、失败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但是他的论据只是从事实和数字出发的;而"算术从来不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如果提到工业品短缺就是制造恐慌,那么难道不能关注本年度工业只完成计划的75%的事实吗? 斯大林给托洛茨基扣上失败主义的帽子并抓住所谓他"害怕丰收"这一条不放,理由是,他曾经说过:只要国家的工业品短缺,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必然存在,而不管是丰收或歉收。不幸的是,最近一次收成比预料的还要糟糕。农民的社会分化迅速扩大。所有这些困难暂时还不是灾难性的,但是这种兆头必须及时加以注意。反对派曾要求对富农课以重税而贫农可以免税。这个要求不管是对是错,但"里面有什么社会民主主义呢?"反对派不同意有利于富农的信贷政策——这也是社会民主主义吗? 它赞成适度提高工资——这也是社会民主主义吗? 它不接受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重新获得稳定的观点——这也是社会民主主义吗? 也许,反对派批评英俄委员会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吧?

他回顾了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他同列宁的亲密合作、特别是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给予列宁的支持,而人们硬说他希望终止这个新经济政策。他被指责为"不相信"能建成社会主义。但是难道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486页。

他没有写过这样的话吗?——“我们所拥有的对资本主义的全部优势,使我们在未来几年中不但有可能把工业发展系数提高到战前每年6%的两倍或三倍,甚至还可以提得更高,如果我们正确地利用这优势的话。”[①] 的确,他不相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他是不断革命论的倡导者。但是不断革命论被人为地夸大了:应对这个理论负责的只是他一个人,而不是整个反对派。作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让步,他补充说:“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早已进了档案馆了。”可是他的批评者说什么呢?他们抓住这个理论不放,说他在1906年时就预言革命后城市集体主义将不可避免地与农民个人主义发生冲突。难道他们没有活着亲眼看到这个预言被证实了吗?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冲突他们才宣布新经济政策的吗?1921年在喀琅施塔得以及其他地方,“中农不正是用海军大炮跟苏维埃政府对话”的吗?批评者抓住这个理论不放,说他预言革命的俄国会与保守的欧洲发生冲突。难道他们睡过了那些干涉的年头吗?“同志们,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活着,正是因为欧洲毕竟不是以前的欧洲了。”

但是,革命幸存下来这件事实并不能保证它同农民和资产阶级西方的冲突不再重演;这也不能成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根据。的确,他们将不得不面对新的冲突,而若是他们仅以“蜗牛速度”前进并且背弃国际革命,那么就将在更恶劣的条件下面对这些冲突。布哈林写道:“争论围绕着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撇开国际事务,我们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并完成这个建设……?”托洛茨基反驳道:“如

---

① 这的确是后来在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工业增长率(托洛茨基在这里引用的是他在1925年出版的小册子《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里的一段)。到了1930年,斯大林竟然要求每年增长率为50%!参见本书作者著的《斯大林政治传记》第321页。

果我们撇开国际事务,我们也能建成社会主义;但是关键就在于我们不能撇开国际事务(笑声)。你可以在一月的天气里光着身子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如果你撇开气候和民兵的话(笑声)。但是我担心,气候或民兵却不会撇开你……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革命获得了这种……自给自足呢?”

托洛茨基在这里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俄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欧洲将会发生什么事?迄今为止他们全都同意列宁的这种看法,即俄国“最低限度需要30到50年时间”才能实现社会主义。[①] 欧洲在这些年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如果在此期间革命在西方取得胜利,那么他们所争论的问题就没有意义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支持者确认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就必然从以下三种可能的假设之一出发:第一个假设是,欧洲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停滞不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彼此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均势。但这样的局面几乎不可能保持40年甚至20年。另一个假设是,欧洲资本主义可能有一个新的上升时期。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资本主义还能繁荣昌盛,如果它的经济和文化还能欣欣向荣,那就意味着我们来得太早了,”也就是说,俄国革命将在劫难逃。“……一个上升的资本主义将……具有相当强大的军事、技术和其他手段,可以窒息、扼杀我们。在我看来,这种暗淡的前途会被整个世界经济形势所排除。”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俄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建立在这种假设上。

最后,人们还可以假定,在这30年到50年过程中欧洲资本主义可能走向衰落,但是工人阶级却表明没有能力推翻它。托洛茨基问:“你们能这样设想吗?”

---

① 斯大林否认这是列宁的观点(《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6页),但是他拿不出任何否认的根据。

请问,为什么我要接受这种假设,它除了是关于欧洲无产阶级的阴暗的毫无根据的悲观主义外,什么也不是;我们为什么同时还要培养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即以为用我们一国孤立无援的力量就能建设社会主义?如果我假定欧洲工人阶级在 40 年或 50 年过程中不能夺取政权,那么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看不出有任何理论上或政治上的理由可以设想。我们和我国农民一道实现社会主义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还要容易。……即使今天我仍然相信,我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只能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来保障。这并不是说,我们建设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说我们不能或不应全力以赴地前进。……假如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哪怕它已经产生官僚主义畸变;……假如我们不认为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假如我们不是认为我国有足够的资源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假如我们不坚信能取得完全的和最后的胜利,那么我们当然不配站在共产党的行列中……。

他还谈到有关反对派要建立另一个党并力图唤起工人阶级去反对现行国家的谣言。但这并不是它的目的。这不过是要人们警醒:斯大林的背信弃义和不择手段的方法——新近的例子就是他撕毁休战协议的方式——必然在党内造成真正的分裂,导致两个党的斗争……。[1]

会议代表的敌意中混杂着崇敬,他们屏息静气地听着他的话,

---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 505－535 页。

即使他在最戏剧性的时刻中断发言并请求允许他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也是如此。大会一再延长了他的发言时间。他态度克制而又有说服力,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动摇或软弱。紧接着托洛茨基之后走上讲台的是拉林,他说出了大多数代表的心声:"这是我们的革命富有戏剧性的插曲之一……革命正在超越它的某些领袖。"[①]

在听取季诺维也夫发言时,代表们的情绪就大不一样了,他进行了一番哀怨的辩解,竭力讨好他们。代表们对他报之以粗鲁的蔑视和敌意,把他哄下讲台,甚至不让他谈论他所主持的共产国际的事务,根本不管他们还须投票决定"撤销"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职务这一点。[②]

一个人若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大小会议和比较一下其中的争论趋向,就会为执政派对待反对派的那种恶毒和粗暴而震惊;他几乎能亲身体验到那卑鄙而残暴的手段是如何随着一次次会议而不断升级,发展到疯狂的地步。有些事件事实更是具有极荒诞的效果:

---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535页。拉林直到1914年都属于孟什维克的极右翼,1917年夏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然后与托洛茨基保持友好关系。他对1923年反对派的态度是暧昧的;后来他加入了斯大林派。

② 以下逐字引用的季诺维也夫发言的最后部分:"同志们,我想就这个集团(即联合反对派)说几句。我想说几句(听众打断他的话:你已经说够了……够了! 嘈杂声)。我想就这个集团和共产国际说几句话……(嘈杂声:够了,够了! 你早就该说这件事,而不该说别的事!),这是不对的。难道你们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季诺维也夫刚谈过这个问题)不是重要的问题吗? 那么为什么斯大林就这个问题要讲3个钟头呢? ……(嘈杂声、抗议声)现在我只要求10到15分钟,使我可以谈一谈这个集团和共产国际的问题。(嘈杂声,叫喊声:够了!)同志们,你们知道,党决定停止我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会场上一片叫喊声:这事早已决定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决定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是不给我5分钟时间谈谈共产国际的问题,你们难道是公正的吗? (嘈杂声,叫喊声:够了! 会议主席摇铃。)同志们,我请求你们再给我10到15分钟讲完这两个问题。"(主席要求表决,压倒多数的人反对给季诺维也夫延长10分钟。)同上,第577页。

对反对派的一些最粗俗的和报复性的攻击和对斯大林的一些最肉麻的吹捧正是出自这样一些人之口,他们要不了几年就会憎恨他,成为他的过迟的批评者,并成为他的可怜牺牲者而被消灭掉。那些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以其狂热行为而大出风头的人中有加马尔尼克(Гамарник),他是未来的红军政治部主任,在图哈切夫斯基审判案前夕被指控为叛徒而自杀了;还有瑟尔佐夫(Сырцов)、丘巴尔(Чубарь)、乌格拉诺夫,他们全都死于"破坏者和阴谋家"的罪名之下;甚至还有前民主集中派的奥辛斯基,他现在宣称信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但照样作为"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而结束了他的一生。但是,在这方面的表演上没有一个人能胜过布哈林。不过数月之前他还同托洛茨基友好来往。现在他如同季诺维也夫两年前一样站到了斯大林的身边,肆无忌惮地恶毒攻击反对派,为其失败而雀跃、自吹自擂、威胁恫吓、煽风点火、冷嘲热讽,为党内那些最坏的家伙推波助澜。可亲的学者仿佛突然变了个样子,思想家变成了流氓无赖,哲学家变成了凶手,丧尽了他的良知和远见。他颂扬斯大林是自耕农的真正朋友和列宁主义的捍卫者;他向托洛茨基挑衅,要他当着会议代表的面重复他在政治局里说过的关于斯大林是"革命的掘墓人"的话。[①] 他嘲笑托洛茨基在代表会议上发言时的自我克制,这种自我克制仅仅是由于党"扼住了反对派的咽喉"。他说,反对派呼吁他们防止因分裂而造成的"悲剧",而这个警告只会让他,布哈林,感到滑稽。他在一片笑声中高声说:"才三个人离开党——这就是整个分裂了!""这是闹剧而不是悲剧。"他这样对加米涅夫的自我辩解嘲讽说:

加米涅夫走过来……说:"我,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578-601页。

携起手来,正像列宁曾与他携起手来并信赖他一样。"人们只能用捧腹大笑来回答他:他们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列宁!我们看得很清楚,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用一种很古怪的方式信赖托洛茨基的(长时间的笑声,鼓掌声)。他们是这样"信赖"他的,就是让他骑在他们的头上(哈哈大笑,鼓掌声),而且加米涅夫……尖叫着:"我信赖托洛茨基。"(大笑)不错,完全像列宁一样!(笑声)。

用不了两年,布哈林就要"依赖"被斗败了的、屈服了的加米涅夫,在他耳边恐惧地窃窃私语说:斯大林是新的成吉思汗。[1] 而此刻布哈林却踌躇满志、洋洋自得、断章取义和哗众取宠地引用列宁的话,又攻击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的"英雄主义姿态"与对农民的敌意,攻击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财政理论";而且再三颂扬他和斯大林的政策是稳定、可靠和审慎的并能确保同农民的联盟。他说反对派"惊呼"富农的强大、农民暴动和城镇饥荒的危险,它无非是想用怪物来吓唬人民。党不能原谅他们"关于苏联热月政变的废话",除非他们低头忏悔、承认错误并且恳求道:"请原谅我们反对列宁主义的精神、形式和实质的罪孽吧!"他在一片疯狂的喝彩声中继续讲下去:

说吧,坦率地说吧:托洛茨基错了,他竟然宣称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充分的无产阶级国家!为什么你没有勇气站出来痛痛快快地这样说呢?……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告诉我们列宁对待反对派如何宽大。……列宁没有驱逐反对派,正是因为在中央委员会里只有两票赞成他。

---

① 参见本书第六章。

> ……是的,列宁懂得他的工作。当一个人只能凑足两票时,谁还试图去驱逐反对派呢?(笑声)但是当你获得全票支持,只有两个人反对你,而且这两个人还怀着什么热月政变时,你就得好好考虑驱逐的问题了。

与会者为这种犬儒主义的表演而兴高采烈,一片欢腾。斯大林在会场中喊道:"干得好啊,布哈林,干得好,干得好。他不是在同他们争论,而是在宰他们!"①

怎样解释布哈林这种奇怪的、几乎是可怕的表演呢?无疑,他打心底恐惧反对派所鼓吹的政策。他害怕他们会挑起与农民的冲突;他没有看到,正是他本人和斯大林的政策才会导致这种冲突。尽管反对派力量软弱,无法取代执政派,但是它的力量仍然足以迫使斯大林派改变立场。确实,在这次会议上,看来是布哈林派在执政派联盟中占了上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三个主要报告。然而,即使是他们也不敢对反对派掉以轻心。布哈林本人现在在农村政策问题上不得不十分谨慎——他不再公开向富农呼吁了。他看到斯大林派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批评愈益敏感并乐于整页整页地剽窃他们的著作。斯大林已向加速工业化的要求让步;这在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也可以看出来。布哈林宁愿执政派联盟站稳立场击败反对派,而不必借用他们的观点把问题搞乱。他担心反对派的压力把党推得太远。他一想到这会把党驱向同农民的血腥冲突就"浑身不寒而栗"。因此,他在此时甚至比斯大林更渴望使官方政策从反对派的间接影响下摆脱出来。他拼命缠住斯大林,不让他作出更多的让步;他不惜纵容、唆使斯大林使用暴力和阴谋,希冀反对派的失败能确保国内和平。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601页。

对于他来说,为了这一点,即使是以牺牲一切才智、风格和面子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攻击之凶猛也是由于处境的为难和复杂。斯大林犹豫不定是否应该采取他两年以后将采取的那种罪恶措施。斯大林派发言人也在指责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唆使党强迫推行农业集体化。例如,在摧毁私有农业中将起到非常重大作用的卡冈诺维奇声称:"他们的道路是掠夺农民之路,是一条罪恶之路,不管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多么强烈地抗议这一点——这就是他们的口号。"[①]反对派又一次撞到了一党制的墙上。当它要求一党制内的自由时,便受到危及一党制本身的指控:布哈林和斯大林断言它要另建新党。莫洛托夫的发言虽然词不达意,却能击中要害。在抗议高压政策时反对派发言人重提那段历史,即甚至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时期列宁仍然允许左派共产主义者出版毫无顾忌攻击自己的报纸。对此莫洛托夫回答说:"在1918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报纸,甚至立宪民主党人也有。但是当前形势根本不同。"[②] 这话是要再次证明,布尔什维克不准别人享有自由,他们自己也无法享有自由。卡冈诺维奇重新提起托洛茨基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为反对工人反对派而说过的话。托洛茨基当时说,党员谈及自己的同志和领袖时用"你们"和"我们"是不能允许的,因为不管动机如何,他们这样做就是把自己置于同党对立的地位上,企图利用党的困难帮助那些竖起喀琅施塔得旗帜的那些人。卡冈诺维奇质问道,"那么,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您当时有权利对犯了错误的梅德维捷夫和施略普尼柯夫说这些话(而且这些同志都是老布尔什维克),为什么我们今天就不能告诉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637页。

② 同上,第671页。

您,你们正踏上喀琅施塔得之路? ……”①

被拖进对托洛茨基的猛攻中的不仅是喀琅施塔得和工人反对派的幽灵,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也亲自加入进来。反对派曾由于斯大林的坚持而声明跟他们断绝关系,斯大林又竭力以威逼利诱使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承认错误、表示忏悔和谴责反对派。然后中央委员会兴高采烈地广播了他们的悔过书,并且宣布饶恕他们。这两个人曾劝联合反对派抛弃对一党制的忠诚,以旧党内的一个派别自行组建新党。但是,面对他们自身被开除出旧党的威胁,又受到联合反对派跟他们划清界限的刺激,他们便向斯大林投降了。他们的悔过是斯大林第一次成功的威逼的结果,这为后来其他多次忏悔投降开了一个先例。在代表会议结束之前,斯大林又给了反对派另一个沉重打击:他宣布克鲁普斯卡娅已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断绝关系。② 莫斯科出现了一些流言蜚语说斯大林以暗示列宁私生活上的丑闻向克鲁普斯卡娅讹诈,据说他声称“我要指定另一个人做列宁的遗孀”。但更合情理的原因在于,克鲁普斯卡娅之所以退出反对派,是因为她害怕看到她丈夫所创建的党陷入四分五裂。由于克鲁普斯卡娅曾是斯大林和布哈林最直率的批评者之一,她的变节给反对派造成的损害更大。

最后,斯大林挑拨外国共产党领袖反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德国共产党老战士克拉拉·蔡特金曾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以整个国际的名义向托洛茨基表达过崇高的敬意,列宁当时已经病重。现在,她代表外国共产党领袖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划清界限,谴责他们给共产国际带来了危机和为共产主义的一切敌人效劳。她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即使笼罩在反对派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 638 页。

② 同上,第 754 - 755 页。

领袖名字上的光环也不足以赎救他们。……这些同志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他们不会被人忘记。他们的事业和功绩已载入革命史册。我不会忘记他们。但是……还有比个人事业和功绩更伟大的东西。"[①]

反对派一败涂地。代表会议批准将反对派的三位领袖开除出政治局,并且威胁说,倘若他们敢再挑起争论的话,就对他们采取进一步的制裁。

此时联合反对派所面临的处境和1923年反对派失败后所面临的处境很类似。正式裁决对他们不利,他们必须决定下一步怎么办:是继续斗争下去、冒着最终全部被开除出党的危险呢,还是承认失败,哪怕是暂时的失败呢?反对派的两班人马反应各不相同。季诺维也夫派准备忍气吞声。但这并非易事,因为争论尽管在形式上已经结束,但是官方对他们的攻击仍然有增无减。各家报纸一面声称只谈代表会议的决议,一面又以最恶毒的攻击充斥着版面,不给被攻击者以任何答辩的机会。反对派的基层群众因勇于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付出代价:他们或者失业,或者被流放,待遇比流放犯好不了多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好采取最温和的消极抵抗方式。他们急于保护自己的追随者,就建议他们实行韬晦之计,必要时甚至可以否认他们跟反对派的关系。这样的建议只能使反对派丢脸,并使接受建议者丧失斗志;他们开始变节和悔过。

相反,经过类似考验的托洛茨基派却清楚,无所作为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忍气吞声是毫无指望的。托洛茨基本人在11月底写的日记摘录中重温了这次考验。[②] 他比在公开场合或中央委员会里

---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698-707页。

② 参见1926年11月26日写的札记,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更加坦率地为自己分析了反对派的困境。他接受失败。他把它不仅归因于斯大林的背信弃义、官僚集团的威胁恐吓,而且也归因于群众的消极与幻灭,他们原来对革命期望过高,现在感到自己的希望破灭了,于是就对早期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和理想产生了抵触。年轻人一踏上政治舞台,就发现自己处于监护之下,发挥不出任何批判才能和政治判断力。执政派利用普遍的消极和对安全的渴望,拿不断革命的怪物来吓唬人民。托洛茨基在正式讲话中总是强调领导集团与基层群众之间的对抗,但私下里承认,领导集团的思想和口号迎合了基层群众的感情需要,掩盖了他们之间的对抗,而反对派却与普遍的情绪背道而驰。

那么该怎么办呢?托洛茨基在沉思。屈从于群众的反动情绪不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做法。只要他们的阶级自觉性还是模糊的,革命者就应当作好在群众中陷于孤立的准备。但这种孤立不会很久,因为现在正是过渡与危机时期;而在苏联国内外,革命力量还会高涨。无论如何,现在还没有到反对派竖白旗投降或动摇不定的时候,尽管形势对反对派不利。革命者必须战斗下去,不管他的命运是像列宁那样结束——活着看到他的事业胜利,还是注定遭受李卜克内西那样的命运——以生命去殉革命事业。托洛茨基在个人笔记里和与友人谈话中都暗示过这两者必居其一。尽管他没有放弃"像列宁那样结束"的希望,但看来他内心深处早已准备承受"李卜克内西那样的命运"了。

> (维克多·塞尔日回忆道)我不相信我们会胜利,而在心里我更确信必败。当我被派到莫斯科,向列夫·达维多维奇转交我们小组的信件时,我就是这样跟他说的。我们坐在租让委员会宽大的办公室里谈话……那时他的疟疾正在发作;他皮肤蜡黄,嘴唇苍白。我告诉他,我们太

弱小了,在列宁格勒召集的成员不超过数百人,而我们的观点在工人群众中唤起的只是冷漠。我感到他对这一切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但是他作为一名领袖,不能不尽到他自己的责任。而我们作为革命者也不能不尽到我们的责任。如果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除了鼓起勇气去迎接失败……之外,还能干什么呢?[①]

※　※　※　※　※

1926—1927年的冬天过得比较平静。反对派因内部不和而更削弱了。托洛茨基竭力避免使他与季诺维也夫的伙伴关系破裂;由于季诺维也夫的惊慌失措,联合反对派正在为这种动摇不定的统一付出代价。12月,反对派领袖们甚至抗议斯大林企图在莫斯科党支部中把他们拖进新一轮争论。[②] 当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了俄国党内的局势,反对派只好重申它的立场。托洛茨基不得不为他的过去辩护,他抗议把"传记方法"应用于党内争论,并展示了他与列宁的关系史,旨在向头脑闭塞的听众证明"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不可调和的对抗只不过是神话"。[③] 执行委员会

---

① V.塞尔日:《阴暗的转折》第116页。

②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致斯大林和政治局,1926年12月13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③ 托洛茨基借此机会颇有启发性地说明了他直到1917年时对列宁的态度。他谈到了"内心抵抗",正是这种"抵抗"使他越来越靠拢列宁。他最终格外真诚和彻底地接受了列宁主义。他把自己的情况同弗兰茨·梅林作了对比。梅林只是在作为自由派领导人与马克思主义斗争之后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尽管这样,或者说正因为这样,梅林的信仰才是不可动摇的,并在晚年为此献出了他的自由和生命,而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老近卫军"却抛弃了这面旗帜。参见托洛茨基档案12月9日声明。另见《斯大林伪造学派》第85页。

批准从外国共产党中把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清除出去,其理由是他们否定苏联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托洛茨基声明说,反对派一贯反对它的任何持有这种观点的外国支持者。苏瓦林被开除出党,他一半是听之任之的;他为罗斯默和莫纳特辩护,这两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是他的政治盟友,创建并领导了法国共产党,现在却被驱逐出了这个党。① 但是除了这些次要的政治干扰外,他默默度过了冬天,一面编辑他的全集,一面"对许多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

除了进行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论证外,他主要关心的"理论问题"就是"苏联热月政变"了。在反对派队伍内部以及它的国外同情者中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混乱的。有些人争辩说,苏联革命已过渡到热月政变阶段。持这种观点的人同时将官僚集团看做是已经摧毁无产阶级专政并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一个新阶级。另外一些人,特别是托洛茨基,则强烈反对这种观点。常有这种情形,当某种历史类比成为一种政治行话时,争论各方对他们所援引的先例都是一知半解;托洛茨基自己也在不断地修改他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在现阶段,他将"苏联热月政变"定义为根本性地"向右转",在对革命普遍的冷漠和幻灭这种背景上,它可能出现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导致布尔什维主义的毁灭和资本主义的复辟。托洛茨基根据这个定义得出结论,起码现在谈苏联热月政变还为时过早,但是反对派提出警告却是有理由的。"热月政变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群众已经厌倦并感到幻灭。不过,导致

① 除此之外,托洛茨基还过问了政治局的一项决定,当时政治局准备派皮达可夫去加拿大完成一项贸易使命。托洛茨基指出,皮达可夫在内战时期曾领导过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这项使命对于他是危险的,因为加拿大有不少乌克兰移民。皮达可夫因为"曾是被判死刑的俄国可敬公民"而刚刚被拒绝赴美国。托洛茨基致奥尔忠尼启则,1927 年 2 月 21 日。参见托洛茨基档案。

复辟的根本性地“向右转”还没有出现，尽管趋向它的“热月政变力量”已经积聚了巨大的能量。

倘若不是托洛茨基现在形成的观点部分地决定了今后几年他自己的行为和反对派的命运的话，倘若不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激起了各派一种莫名其妙的狂热的话，本来是没有多大的必要在这里探讨这场颇为深奥的争论的。这的确是斗争中似乎最无理性的现象之一。一个反对派成员只要在随便什么党的会议上说出“热月政变”这个字眼儿，马上就会点燃愤怒的火焰，听众立刻就群情激愤，尽管多数人对它仅有极为模糊的认识。他们只知道，热月政变者是雅各宾主义的“掘墓人”，反对派以此攻击执政派正在进行反对革命的某种密谋。这个微妙的历史口号甚至触怒了有教养的布哈林派成员和斯大林派成员，他们明白，它的含义远不那么简单。反对派争辩说，搞热月政变的人并没有故意去破坏雅各宾主义和葬送第一共和国——他们只是出于消极和迷惑而无意识地做出这种事的。同样，苏联的热月政变者在干同样的事时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种比喻折磨着许多布哈林派成员和斯大林派成员的思想，损害了他们的信心。这使他们想到了革命中无法控制的因素，他们不断地却又是模糊地意识到这些因素；这使他们感到他们已经或可能成为各种广泛的、敌对的、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手中的玩物。

许多布尔什维克很不舒服地感到这大概是真的。他们不论属于哪一派，都被反对派变出来的幽灵吓坏了。这就是所谓的“死人抓住活人”。当一个布哈林派成员或斯大林派成员矢口否认自己与热月政变有任何相似之处时，他并不坦然自信，而是怀着一种怨恨，受着内心彷徨的折磨，布哈林正是以这种心态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谈到反对派“关于热月政变的不可饶恕的废话”的。他对反对派的狂怒有助于他抑制自己的恐惧。在反对派眼里，热月政变

的幽灵正在莫斯科街头游荡,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翱翔,或在国庆纪念集会上和游行时站在列宁陵墓上的政治局委员中间。这种书呆子式的历史回忆所勾起来的狂热激情就从孕育并发展着一党制的荒谬的政治气候中喷发出来。布尔什维克感到与自己的工作——革命已经疏远。他自己的国家和他自己的党凌驾于他之上。它们仿佛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跟他的思想和意志没有多大关系,而他必须服从它们。国家和党对于他来说就像一股盲目的力量,它是突发的、无法预测的。当布尔什维克将苏维埃变成"政权机构"时,他们,包括托洛茨基在内,全都曾经坚信他们已经建成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清澈透明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空前地密切,人民群众在这种体制下可以前所未有地畅所欲言,直接行使自己的意志。但是几年过去了,再没有比一党制更不透明的了。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的全部透明度。没有一个社会阶级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任何阶级的意志都成了未知数。统治者和政治理论家们不得不去猜测它,并愈益经常地受到猜错事件的教训。因此,当社会各阶级看来要行动时,并且在关键时刻真正作为巨大的力量行动起来时,就出乎意料地从各方面压迫着党。党内集团与个人不知不觉地被推向最意外的方向。在人们的(关于他们自己的以及别人的)思想、意志与他们的所作所为之间到处都出现了或重新出现了断裂——政治行动的"主观"与"客观"方面之间的断裂。现在再没有比确定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更困难的了。执政派和反对派都在黑暗中摸索,既与现实的危险作斗争,又与想象的危险作斗争;既追逐彼此的实体,又追逐着彼此的影子。他们不再实事求是地看对方,而都将对方看做是神秘的社会实体和具有隐蔽与邪恶的潜在力量,必须加以译解并使之无害。正是这种与社会的脱离和彼此间的疏远使执政派宣称反对派是社会异己分子的代理人,使反对派声言执政派

背后站着热月政变的各种势力。

那么都是哪些势力呢?托洛茨基回答:富农、耐普曼、官僚集团——总之,所有对资本主义复辟感兴趣的阶级和集团。工人阶级仍然依恋“十月革命的成果”,无疑是反对热月政变的。至于官僚集团,托洛茨基期待着它在危机时刻发生分化:一部分支持反革命,另一部分捍卫革命。他把党内分裂看做是这种分化的间接反映。右派与热月政变者靠得最紧;但还不必把二者等同起来。布哈林为私有者的辩护体现了热月政变者的愿望;但布哈林派是真正的热月政变者抑或仅仅是他们不自觉的帮手——他们在危机时刻会不会重新站到革命一边来,这一点还不清楚。根据这种看法,只有左派即联合反对派才在党内代表着无产阶级利益和纯粹的社会主义纲领;它是反热月政变者的先锋队。中间派亦即斯大林派还没有任何纲领;尽管它控制着党的机关,却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只在左派和右派之间搞平衡,并寄生在两者的纲领上面。一旦中间派与右派联合起来,就会为热月政变铺平道路。但中间派将在必遭灭亡的热月政变中一无所获;因此,面临反革命的威胁,中间派或它的大部分将依附于左派,在左派的领导下反对苏联热月政变。

不必超越我们的叙述去指出事变在多大程度上证实或否定了这种观点。[①] 在这里只要指出托洛茨基从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的实际结论就够了。简单地说,在任何情况下他和他的同志们都不应该与布哈林派结盟反对斯大林。托洛茨基证明说,在一定环境和一定条件下,反对派甚至必须准备同斯大林结成联合阵线反对布哈林。在任何联合阵线中都要坚持下述条件:反对派决不能放弃它的独立、它的批评权利,必须坚持党内自由。按照那条著名的策

① 有关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可参见本书第六章和《流亡的先知》。

略公式,左派和中间派应当兵分两路,联合作战。当然,反对派暂时还没有机会实施这条原则: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还分享着政权,保持着统一。但是托洛茨基毫不怀疑他们很快就会散伙。他的策略原则就是在他们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以便形成新的组合,使反对派能够指挥所有的"反热月政变者",包括斯大林派。在后来的几年里,反对派的所有行动都是服从这条原则的:"同斯大林联手反对布哈林吗?——是的。同布哈林联手反对斯大林吗?——决不。"

若从降临在所有反斯大林主义的派别和集团身上的不祥命运来看,这个由托洛茨基负主要责任的策略决定显然只能是一种愚蠢的自杀行为。托洛茨基以为由无能的布哈林体现的这个热月政变的幽灵,看来不过是对历史过度想象的虚构。如果一个对后来事件了如指掌的人思索到托洛茨基关于"危险来自右派"(即布哈林派)这一含有诸多焦虑的警告以及他对斯大林力量的明显低估时,很可能会为这个素以先知式远见著称的人在这个事例中所表现出来的短视和盲目而惊愕。然而,单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是片面的。托洛茨基的决定也必须被放在他所处的环境背景上来认识。新经济政策正处于高潮,对资本主义复辟感兴趣的各种势力愈益活跃,到那时为止谁也想不到将对新经济政策下产生的资本主义采取暴力镇压和"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托洛茨基不可能想当然地知道苏联社会里敌对势力之间的斗争会有这样的结局。他所看到的热月政变的幽灵毕竟有一半现实性。1917 年之后过了 8 年甚至 10 年,复辟的可能性仍不能被排除。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自然感到他的首要责任是绷紧全部神经、动员一切力量去反对复辟。这就决定了他的党内策略。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为复辟铺平道路,那么这肯定出于布哈林,而不是出于斯大林。在这样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只能得出结论:反对

派必须有条件地支持后者,反对前者。这样的结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这个传统认可左派和中间派结盟反对右派,而认为左派与右派针对中间派的任何联合都是不符合原则的、不能允许的。因此,鉴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根据马克思主义概念来判断,托洛茨基的立场有它的逻辑性。他的不幸就在于,后来事变超越了这个逻辑,并且证明这是反对派自我毁灭的逻辑。这的确是托洛茨基的悲剧,他捍卫革命的过程也正是他政治自杀的过程。

※　※　※　※　※

1927年春天,党内斗争的火焰又一次燃烧起来。这次斗争是同到那时之前从未提出过的一个问题相联系的,但从此以后这个问题却自始至终都是斗争的中心,直到联合反对派最终被开除出党并解体为止。

这就是中国革命问题。

大约在这个时期,中国革命进入最严重的危机时刻,该危机是自从列宁时代结束以来发展形成的。布尔什维克很早就把眼睛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运动上,相信这些运动能构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战略后备力量"。列宁与托洛茨基都确信,如果切断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与为它提供廉价劳动力、原料并使它能获得额外利润的投资机会的殖民腹地的关系,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必将从根本上遭到削弱。1920年,共产国际声明把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与东方解放运动联合起来。但是它只限于提出原则声明,而联合的形式以及促进联合的方法却付诸阙如。它承认亚洲各国的独立斗争跟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同样的历史意义;也承认那些国家的农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资产阶级都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但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却不想明确界定亚洲反帝运动与

其自身社会主义斗争之间的关系或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对待本国反帝资产阶级的立场。

要解决这些问题为时尚早。十月革命对东方的影响刚刚开始。它的力量和深度还无法衡量。在亚洲最重要的国家中，共产党刚刚开始建立；工人阶级数量很少，而且缺乏政治斗争传统；甚至资产阶级的反帝运动也仍然处于形成阶段。只是在1921年，以几个宣传小团体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才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但在大会刚一开过、纲领刚刚制定、组织初具规模时，莫斯科就催着它设法跟国民党友好合作。国民党正沐浴着孙逸仙如日中天的道义权威。孙逸仙本人渴望通过联俄加强他的力量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他也准备在笼统的、“超阶级的”民粹派社会主义基础上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但要求后者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他的领导并支持国民党。他同列宁的政府签订了友好条约，但他发现更困难的是让中国共产党按他的条件同他合作。①

中国共产党是由陈独秀领导的，他是亚洲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先驱，中国第一批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一，毛泽东出山之前中国革命最杰出的人物；他作为策略家、实际工作领导人或组织家要比毛泽东逊色，而作为一名思想家和理论家却胜过了毛泽东。陈独秀是那场反对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特权的伟大运动的创始人。这个运动发韧于他身为其教授的北京大学，它的强大压力使北京政府拒绝在承认西方列强特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主要是在陈独秀的影响下，那些马克思主义宣传小团体得以发展，并建

① 这些篇页里的叙述说明主要根据的是布伦特、舒瓦茨、费尔班克：《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毛泽东选集》；M.N.罗易：《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陈独秀：《致党的一封公开信》（《战斗报》1930年）；《斯大林全集》；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唐灵黎：《中国革命内幕》；《布尔什维克》合订本、《国外通讯》和《革命的东方》等文件。

立了中国共产党。从党的创建之日起，直到1927年末革命的整个危急时刻，他都是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他从一开始就对他的党从莫斯科得到的政治建议抱有疑虑。他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是必要的，但又担心过分密切的联盟将妨碍共产党形成自己的特性；他宁愿他的党首先站稳脚跟后再同国民党携手并进。但是莫斯科固执地要他打消顾虑；而他既没有毛泽东那种强烈个性，也没有毛泽东的灵活；毛泽东在同样情况下从不对莫斯科的政治建议表示反对，总是假装接受，然后不予理睬、我行我素，从不跟莫斯科真正闹翻。陈独秀坦率，软弱，缺乏自信；这些品质注定他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他在每一关头都能坦率地表示他对莫斯科政策的反对；但是他却不能坚持下去。一旦受到否决，他就屈从于共产国际的权威，违反自己更合理的看法，去执行莫斯科的政策。

早在1922—1923年，有两个人对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联合以及为斯大林和布哈林所遵循的政策奠定基础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后来成为托洛茨基反对派中的重要人物，这就是越飞和马林－斯内夫利特（Maring－Sneevliet）。[①] 越飞曾作为列宁政府的特派使者与孙逸仙谈判并签订友好条约。他因急于完成使命而向孙中山保证说，布尔什维克无意于推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将利用自己的影响确保中国共产党按照孙逸仙的条件与国民党合作。他这样做无疑越出了他的权限。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了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他的创议下，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了接触，开始讨论加入国民党的条件。但

---

① 马林－斯内夫利特是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印尼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与他密切相关，他还是荷兰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在以后的年代里，特别是在30年代，他成为托洛茨基的热忱信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荷兰被占领区领导一个抗战小组，后被纳粹枪杀。

孙逸仙的条件是僵硬的,谈判因而破裂。

这一年晚些时候,马林回到中国,告诉陈独秀及其同志们,共产国际坚决指示他们加入国民党,不论条件如何。陈独秀不愿执行这个指示,但当马林抬出国际共产主义的纪律原则时,他和他的同志们就屈服了。孙逸仙——后来的蒋介石也一样——坚持共产党不得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政策,必须遵守它的纪律——否则他就要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并视他与俄国的联盟为无效。1924 年初,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但开始时,共产党并没有把孙逸仙的条件放在心上:它保持着独立性,本能地执行共产党政策,因而招致了国民党的不满。

共产党的影响迅速壮大起来。1925 年,伟大的"五卅运动"席卷华南,共产党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发动了对西方租界和商行的抵制,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广州总罢工。运动势如破竹,国民党的领袖们惊慌失措,力图扑灭它,遂同共产党发生了冲突。后者意识到内战即将来临,渴望放手大干,于是向莫斯科请示。1925 年 10 月,陈独秀建议让他的党退出国民党。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否决了这个计划,警告中国共产党要尽量避免内战。苏联军事顾问和外交顾问鲍罗廷(Бородин)、布柳赫尔(Блюхер)[①]等人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里工作,负责装备和训练他的军队。当时实际指导着苏联外交事务的布哈林和斯大林都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在不久的将来有夺取政权的可能;他们两人都急于保持苏联与国民党的联盟。共产党影响的日益壮大威胁着造成这个联盟的破裂,因此他们坚决要求中国共产党保持现状。

---

① 布柳赫尔,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1890－1938)苏联元帅,苏共党员,历任师长,远东共和国陆军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远东特遣军司令等职,1924－1927 年任广州政府军事顾问,化名加伦。——译注

莫斯科因此催促陈独秀及其中央委员会放弃对“爱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放弃革命农民运动,放弃对孙逸仙主义的批判,这个主义自孙中山死后就被奉为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为了用马克思主义词句为他们的立场辩护,布哈林和斯大林又引申出一套理论,即在中国开始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能以社会主义为其目标;国民党所依赖的反帝资产阶级还起着革命作用;因此共产党的责任是同它一致,不能做任何冒犯它的事。为了进一步证实他们的政策具有理论上的根据,他们引证了列宁在1905年阐述过的观点:在直接反对沙皇专制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应是“工农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举这个例证不太适合或并不适合中国的局势:列宁和他的党在1905年并没有试图联合资产阶级自由派去反对沙皇专制——相反,列宁不厌其烦地申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毫不妥协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派;即使是试图联合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也没有幻想去接受由资产阶级支配的某一个组织的领导和纪律。正如托洛茨基后来指出的一样,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政策不仅是对1905年布尔什维克立场的拙劣模仿,甚至是对孟什维克立场的拙劣模仿。

然而所有这些理论上的诡辩只有一个目的:从思想上美化莫斯科的政策,并安抚对此深感不安的那些共产党人的良心。这个政策的机会主义到了1926年初表现得愈加触目惊心:共产国际将国民党吸收为它的准会员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飞黄腾达的蒋介石将军选为名誉委员。斯大林和布哈林以这种姿态表明他们对国民党的“友好”,逼迫中国共产党就范。3月20日,蒋介石在“世界革命总参谋部”选举他为名誉委员之后仅仅几个星期就发动了他的第一次反共政变。他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司令部的各个岗位上清除出去,禁止他们批评孙逸仙的政治哲学,并要求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交出其加入国民党的全部党员名单。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在苏联顾问们的压力下只得同意了。但是，由于坚信蒋介石正在策划反对他们的内战，他们急于组建起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去对抗他的军事力量，倘若有必要的话；他们请求苏联援助。广州的苏联代表们断然否决了这个计划，拒绝一切援助。陈独秀又一次屈服于共产国际的权威。[①] 莫斯科各大报纸对蒋介石的政变未加只字评论——甚至连事件本身也没有报导。政治局唯恐事态复杂化，就派了"前民主集中派"布勃诺夫(Бубнов)到中国强制推行它的政策，并去说服中国共产党接受：它的革命义务就是为国民党提供"苦力服务"。[②]

在这些事件的过程中，中国问题似乎一直处于俄国党内争论之外。这个事实值得加以强调是因为：它澄清了庸俗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说法，即反对派从一开始就对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卖中国革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抵制。不错，托洛茨基早在1924年初就对这个问题抱有疑虑了。他曾就中国共产党依附于国民党这一点在政治局里阐述了他的批判观点；在后来的两年中，他又在某些场合重申过他的观点。但是他这样做几乎是偶然的。他并没有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也没有深入它的核心。他发现他在政治局里是孤立的——所有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支持现行的中国政策——因此他没有试图在中央委员会这个更广泛的讲坛上重申他的反对意见。在1924年至1926年的3年中，看来他没有一次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或共产国际委员会上谈到过中国问题。不管怎样，他一

① 陈独秀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请求广州的苏联军事顾问从已经运到的支援蒋介石的弹药中至少提供5000支步枪给共产党，使他们能武装广东的暴动农民。这个请求遭到了拒绝。

② 引自陈独秀的公开信。

次也没有公开暗示过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分歧。他似乎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和重视远远不如他对英国问题甚至波兰问题上的政策的注意和重视。他显然没有清楚意识到席卷中国的这场风暴的力量和中国共产党政策上所面临的危机的规模及严重性。

早在1926年时,托洛茨基更关注的是苏联对中国的外交动向问题,而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问题。他主持一个专门委员会——契切林、捷尔任斯基和伏罗希洛夫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的工作是及时向政治局提出建议,以供苏联外交使团在中国采用。除了托洛茨基在1926年3月25日向政治局提交的报告外,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很少为人所知。[①] 由于他对这个报告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可以断定他基本上是同意的。委员会严格按照外交要求提供它的建议,没有涉及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问题。当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合作中力图打破中国现状时,委员会指示了苏联外交部门在此现状中他们所应持的立场。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号召全国政治统一,即推翻盘踞北方的张作霖政府,并把革命从南方推向北方。托洛茨基委员会估计中国将会继续分裂;它的建议似乎是让分裂延续下去。这时蒋介石已准备开始他的伟大的北伐战争。在笼罩着苏联远东边境线的一片混乱中,托洛茨基的委员会并不是着眼于推进革命,而是想确保苏联政府的一切可能的利益。因此委员会建议,苏联外交使节应该谋求使南方的蒋介石政府与北方的张作霖政府之间暂时的妥协和势力范围的划分。

托洛茨基后来强调说,在政治局讨论该报告时,斯大林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即苏联军事顾问应该劝阻蒋介石进行北伐。委员会拒绝了这个修正建议,但以更笼统的措词建议苏联驻中国使节劝蒋介石"保持克制"。政治局主要关心的是确保苏联在满洲抗衡日

① 托洛茨基档案。

本侵略这一地位。因此委员会建议,苏联驻华北特使应鼓励张作霖采取一种在俄日两国之间搞平衡的政策。莫斯科还无力消除日本在满洲的影响,又不相信国民党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它愿意接受日本在南满的优势,只要苏联继续保有它在中国东北的铁路权并能控制北满地区。对于这项极可能挫伤中国人爱国热情的安排,委员会敦促苏联特使要"谨慎巧妙"地作舆论准备。政治局的动机是错综复杂的。它既关心着满洲,又担心蒋介石的北伐招致西方列强空前大规模地干预中国事务。它同时怀疑,蒋介石准备北伐是转移革命目标,是吞并和驱散南方革命力量的手段。

4月,政治局同意了托洛茨基的委员会所提交的报告。但是就在此刻,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完全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问题。他坚持认为,这个问题必须独立于苏联外交方面的考虑;同现存的资产阶级政府——甚至旧军阀政府——打交道是外交界的事;但是革命者的职业却是推翻它们。他抗议将国民党招收到共产国际中来。他说,孙逸仙主义是歌颂阶级调和的,与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选举蒋介石为名誉委员,是开了一个荒唐透顶的玩笑。最后,他重申了他原先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事的反对。[①] 政治局里的所有委员,包括正着手组织联合反对派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一次为有关中国共产党事务上的官方行为辩护。这次交锋也是偶然的。它发生在大门紧闭的政治局里,而且没有任何结果。

此后,在1926年4月直到1927年3月底的整整一年里,不论托洛茨基还是其他反对派领导人都没再提起这个问题(只有拉狄克除外,他自从1925年3月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以来不得不向困惑的中国学生解释党的政策,因请求指示而令政治局不胜"厌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33页。

烦"。然而他只是徒劳一场，因而表露了些微不满)。而这正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最关键性的一年。7月26日，即政治局讨论托洛茨基的委员会的报告4个月之后，蒋介石不理睬"克制的劝告"，发布了北伐进军令。他的军队推进的神速大出莫斯科的意料，他们挺进华中极大地激发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华北及华中各省纷纷起义，反对张作霖政府以及支持这个政府的堕落腐朽的军阀。城市工人是这场政治运动中最积极的因素。共产党占据着优势地位，它领导并鼓舞了各地的暴动起义。共产党员站在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萌生出来的工会的最前列，在解放了的城镇里得到群众的热情支持。蒋介石的队伍推进所到之处，受到沿线农民的欢迎，他们指望在军队的支持下起来反抗军阀、地主、高利贷者，准备剥夺他们的财产。

蒋介石被革命浪潮吓住了，企图遏制它。他禁止罢工和示威游行，镇压工会，派出讨伐队镇压农民，征集粮食。在他的司令部与共产党之间形成了强烈的敌对情绪。陈独秀在向莫斯科报告这些事件时，要求让他的党最终有权退出国民党。他仍然赞成国共两党反对北方军阀和西方列强代理人的联合阵线；但是他坚持说对于他的党最迫切的事是：摆脱国民党的纪律束缚，恢复行动自由，鼓动城市无产阶级运动，支持农民要求土地的斗争，作好跟蒋介石公开冲突的准备。陈独秀从国际执行委员会得到的答复仍然是拒绝。布哈林把他的要求斥为危险的"极左"异端。在1月的代表大会上，布哈林以中央委员会报告人的身份重申在中国只能"维持唯一的民族革命阵线"，因为中国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当前客观上正起着革命的作用……"。[1] 他继续说，在当前条件下，共产党很难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农民利益与反对农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27页。

村暴动的反帝资产阶级利益之间保持平衡。共产党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保证一切反帝力量的团结一致;他们必须抛弃分裂国民党的任何尝试。[①] 耐心、慎重,这就是口号——特别是当革命气氛也感染着国民党、导致它的"激进倾向"、"削弱它的右翼"的时候。

不久之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上讲话时也赞扬蒋介石的"革命军队",要求共产党完全服从国民党,并且警告他们不要在"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有任何建立苏维埃的企图。[②]

表面看来,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国民党向左转"的预言很快实现了。11 月,国民党政府改组,建立起更广泛的联盟,蒋介石的对手汪精卫所领导的左派集团登上前台,还有两名共产党人任农运部长和劳工部长。新政府从广州迁到了武汉。但是国民党的右派远远没有被"削弱"。蒋介石仍然握有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权,并且加紧为他的独裁作准备。在新政府里真正被削弱的倒是共产党。农运部长在竭力遏制农村暴动的浪潮,而劳工部长则不得不忍受着蒋介石的反劳工法令。[③] 从莫斯科来的每一位新特使都安抚中国共产党:在布勃诺夫离去之后,1926 年底,杰出的印度共产党领袖 M.N.罗易也带着这项使命来到武汉。

1927 年春天,仍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名誉委员的蒋介石又发动了另一次政变,从此开始明目张胆地反革命,而这时政治局却还在鼓吹同国民党的联合。政变发生在上海,这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商业中心,是在西方列强及其停泊在港口的军舰控制下的国中之国。蒋介石的军队进入上海前不久,上海工人起义推翻了旧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第 28 - 29 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321 - 334 页。

③ M.N.罗易:《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第 413 页及以后各页。哈罗尔德·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十四、十五章。

政权,控制着整个城市。孤立无援的陈独秀再一次向共产国际司令部呼吁,极力让他们明白事变的重大意义——这是亚洲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起义,并要求把他的党从国民党约束下解脱出来。然而他和他的同志再一次被迫重申效忠于国民党,同时把上海的控制权让给了蒋介石。困惑而又遵守纪律的共产党放弃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给予他们的援助,接受了这些指示,放下武器投降了。4月12日,就在他们起义胜利后仅仅3个星期,蒋介石下令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追随他们的上海工人倒在了血泊中。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人被迫在第一个工人国家的神圣利己主义的祭坛上献上了他们的一份祭品,这种利己主义被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学说提到了原则的高度。这学说的潜藏含义是用上海街头工人的鲜血揭示和写就的。斯大林和布哈林认为他们有权牺牲中国革命,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为了巩固苏联的利益。他们竭力避免采取任何这样的行动方针,即可能刺激资本主义列强反对苏联,打扰它得来不易的脆弱的和平与安宁。他们对其中国政策的设想是出于他们形成其国内政策同样的心理,即相信明智的第一信条是,处理一切国家事务时太平无事,一步步小心地向前走。他们在国内安抚"富农",同样的逻辑也促使他们在中国极力讨好国民党。的确,他们指望中国革命也以蜗牛速度发展,正如布哈林所想象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发展一样。

犹如历史上常见的那样,这种令人厌恶的、似乎可行的现实主义只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既然跨上了革命和反革命的龙骑,又想用蜗牛速度爬行,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事。但布尔什维克花了多年时间好不容易才为苏联赢得了喘息机会,机会一经赢得,他们又想竭力让它无限期延长下去;因此他们切齿痛恨一切可能中断或缩短这个喘息期的事情。在国内,凡冒与农民冲突危险的政策都

有可能中断它;在国外,激进的共产党政策也可能中断它。执政派决心不让这样的事发生;因此,他们几乎无动于衷地以牺牲中国革命来延长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喘息时机。[①]

只是到了1927年3月31日,即上海大屠杀之前的两星期,沉默了一年的托洛茨基才抨击了政治局的中国政策。[②] 他曾含蓄地反对过这个政策及其前提,这是不容怀疑的。他原先反对让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和反对共产国际授予蒋介石以名誉委员,就证明了这一点。他本人20多年来一贯坚持和发展起来的思想观念使他片刻也不能接受斯大林和布哈林力图为他们的政治战略辩护的理论依据。他们的观点是,由于中国的造反在性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放弃它的社会主义理想而与国民党资产阶级结盟。再没有比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这种观点更远离他所倡导的不断革命论了。托洛茨基的整个思想体系使他必然持这样的观点: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是合而为一的,犹如它们在俄国合而为一那样;工人阶级自始至终都是革命的主要动力;或是革命作为一场无产阶级运动而迎来无产阶级专政,或是革命完全失败。

那么他为什么在那重大的一年里保持沉默呢?当然,大部分时间他在生病;他深深地陷入一大堆国内问题和欧洲共产主义事务中;他被卷入一场寡不敌众的斗争中,必须精心策划反对派的策略;在1927年头两个月之前,他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中国问题上——他的私人文件说明了这一点。他并未意识到政治局的机会主义和犬儒主义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多

① 斯大林曾试图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下一次中国革命(1947—1949),但是那场革命声势浩大,使他无可奈何;而且毛泽东也从陈独秀的经验中得到了教训。

② 参见托洛茨基致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么勉强地执行政治局的指示。他对陈独秀提出的许多呼吁和抗议一无所知——斯大林和布哈林将它们作为秘密文件封锁了起来;他也得不到在莫斯科与广州或武汉之间来往的其他机密通讯。当他终于掌握了比一般新闻更多的消息时,他不禁震惊了,并在反对派的领导核心内提出这个问题,然而他发现即使在那里他也是孤立的。

直到1926年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没有什么谴责官方政策的意思。他们拘泥于1905年"老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也认为中国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将自身局限在资产阶级的任务和反帝任务之内。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中最得意的时候,肯定在推行这个政策以及压制陈独秀的抗议等方面起了作用。但当托洛茨基将不断革命论运用于中国问题时,即使是最重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看来还有皮达可夫和拉柯夫斯基,也都退缩了。[①] 他们全都认为,在社会发展比俄国更迟缓的一个国家里,是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只是当托洛茨基威胁以个人名义提出问题并不惜为此造成反对派的实际分裂时,而且只是当工人实际上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这一点愈益明显之后,以及当斯大林和布哈林阻碍中国革命早已远超过"老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学说的范围时,反对派领袖们才同意在中央委员会里展开关于中国问题的论争。即使这样,他们也只准备反对官方政策,而不是反对它的基本前提。他们只愿意抨击斯大林和布哈林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国民党镇压罢工、游行示威和农民起义的同谋犯所持的那种过分热衷的态度;但是他们却仍然坚持要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坚持认为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不可能导向无产阶

① 参见托洛茨基在1928年致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级专政。这是一种自相矛盾、自趋失败的态度,因为一旦承认了共产党员必须留在国民党内,那么指望他们不为此付出代价就等于打自己的嘴巴了。

只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皮达可夫愿意进行这场新的论争,托洛茨基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在1927年头几个月里,反对派主要领导人仍须设法调解他们的分歧;直到3月底,他们才确定了进攻的共同立场。他们现在进行的是一场新的危险的冒险。托洛茨基已经意识到了它的暗淡前途。3月22日,即上海工人拿起武器、蒋介石军队开进上海的那一天,他在私人文件里写道:"中央委员会里存在着这样的危险,他们将把问题化为派系斗争,而不是认真讨论它。"不管怎样,问题必须提出来,因为"当中国无产阶级的头颅危在旦夕时,怎么能保持沉默呢?"[①]

事实是,反对派着眼关注中国革命问题,不但为时太晚,而且还有许多思想保留,这从一开始就削弱了反对派的基础。在未来几周内将导致大崩溃的那种政策至少已经执行了3年之久,现在想在两三个星期里把它扭转过来是办不到的。即使托洛茨基决心"当中国无产阶级的头颅危在旦夕时"不再沉默,但那颗"头颅"已经受到蒋介石的铁锤打击了。当反对派指责斯大林和布哈林应对此负责时,他们却反问道,在这漫长的三年里,反对派到哪儿去了?它为什么一声不吭?[②] 他们振振有词地指出,这些批评家们的义愤是假的,反对派一直在寻找争论时机,现在抓住了中国问题,"就像一个要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这些反驳的话倒并非是完全冤枉他们的。斯大林进一步揭示出反对派态度的抵牾,并

① 托洛茨基档案。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7、21、25页。

尽量利用托洛茨基与他的同志之间的分歧。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件事实:反对派的批判即使是迟到的、半心半意的,但毕竟是合理的。至于托洛茨基本人——在这命定的几周内,他每天都以他全部的勇气和毅力为在紧急关头扭转政策而斗争。他对局势的分析像水晶般清澈透明;他的预言准确无误;他的警告犹如震撼人心的警钟。

后人只能惊异于这几个星期以及这一年剩余的日子里堵塞执政派视听的那种固执的恶意与刚愎自用,就在这一期间,中国正发生急剧的变化,托洛茨基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起码要挽救中国共产主义事业以使之免遭灭顶之灾。但在每一个阶段,他们都蔑视他的建议,这部分是出于政治考虑,部分是由于他们想证明托洛茨基是错的。当事变证明他是正确的并导致了新的灾难时,他们就慌乱而又半心半意地转向他所赞成的方向,但那时已经太晚了;于是又如同以往那样,他们千方百计地把指控诬蔑之词泼向托洛茨基主义,以便为自己辩解。

在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托洛茨基的某些干预。在他3月31日致政治局的信中,他一方面抱怨得不到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特使的报告,一方面指出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高涨正是这一阶段革命的主要特点。他质问道,起码在上海和汉口这样主要的工业中心,为什么党不号召工人去选举苏维埃?为什么不鼓励农民革命?为什么不建立起义的工人与农民的最紧密的合作?他坚持说,唯有这样才能挽救革命免遭反革命军事政变的危险。

3天以后,即4月3日,他出面驳斥《共产国际》杂志的社论,这篇社论强调当前的迫切问题是"进一步发展国民党的势力"。[①]托洛茨基回答,这恰恰不是迫切的问题。国民党不可能领导革命

① 《共产国际》1927年3月18日。

取得胜利。必须立即把工人和农民组织到工农委员会里。他每天都在抗议加里宁、鲁祖塔克以及其他人的讲话,他们在讲话里断言,中国社会各阶级都“把国民党看做是他们自己的党并愿意全心全意地支持国民党政府”。4月5日,即在上海危机前一星期,他强调指出,蒋介石正在酝酿一场准波拿巴式的或法西斯式的政变,只有工人委员会才能挫败他。这样的工人委员会亦即工人苏维埃,首先应该作为对国民党政府的制衡,然后经过“双重政权”阶段,成为起义机关和革命政府。4月12日,即在上海大屠杀那一天,他还在撰文严厉驳斥《真理报》上的一篇颂扬国民党的文章——作者马尔丁诺夫当了20多年的孟什维克极右分子,只是在内战过后几年才加入共产党,现在却成了共产国际中的一个人物。几天之后,托洛茨基写信给斯大林,再一次要求让他看到来自中国的机密报告,然而只是一番徒劳。令人啼笑皆非的是,4月18日,即上海大屠杀之后一星期,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局请他跟其他苏联领导人一样在送给蒋介石的相片上亲笔签名,作为友谊的象征。他轻蔑地拒绝了,并痛斥了共产国际官员及其指使者。[①]

就在这时,有关上海大屠杀的报告送到了莫斯科。至今每个人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辩解仍记忆犹新。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反对派的批判还不为公众所知——仅有某些党的干部、共产国际官员和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知道这次论争。斯大林和布哈林两人竭力缩小事态,把它们说成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偶然挫折。[②] 但是他们不得不去修改他们的政策。同蒋介石的“联盟”已经破裂,于是他们指示中国共产党更紧密地依附于“国民党左派”,即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国民党左派暂时与蒋介石不和,他们急于得到

① 这里所引用的往来信件均引自托洛茨基档案。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33-234页及以后各页。

共产党的支持。莫斯科则欣然承诺，并让陈独秀及其同志保证一如既往地阻止"挑衅性"的革命行动和服从汪精卫的纪律。[①]

托洛茨基断言新政策只不过是较小规模地重蹈错误覆辙。他指出，必须鼓励中国共产党最终采取激进政策、组成工农委员会和全力支持华南的起义农民，因为在那儿蒋介石鞭长莫及，他们仍可以有所作为。当然，他看到了革命行动的机会已经急剧减少：尽管官方竭力轻描淡写，蒋介石的政变毕竟是从革命向反革命的"根本转折"，是对城市革命力量的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他又认定，蒋介石并没有将分散而又捉摸不定的农民运动镇压下去。农民将继续进行要求土地的斗争，这迟早会再次推动城市革命的复兴。[②] 共产党必须全力投入农民运动。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最终与国民党决裂——不管它是"左"的还是"右"的——而奉行自己的方针路线。季诺维也夫派不同意这一点。他们宁愿让中国共产党一直留在国民党左派里；只是希望他们在那里执行一种独立的政策，与汪精卫对抗。反对派根据这些方针在许多声明中论述自己的主张，但没有一次公诸于世。

反对派重新抨击中国政策使执政派大为光火。他们的处境相当狼狈，因为他们政策的无用从未被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他们的领导人从未如此可耻和荒唐地丢尽了脸。大约这时，另一个较轻的挫折使他们更加尴尬。英俄委员会破裂了：英国工联领袖撕毁了协议。在外交领域，英国与苏联的关系十分紧张。官方政策上另一个巨大希望也烟消云散了。但是，执政派却尽量利用这种情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有关"提纲"，中文版第9卷第199页。中国共产党在它4月底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勉强接受了这种立场。参见陈独秀的公开信。

② 参见《蒋介石政变后中国的局势和前途》一文（写于1927年4月19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况转移人们对中国问题的注意力，堵塞所有讨论。他们发出关于战争危险和军事干预的叫嚣，制造公众恐慌和民族危急的气氛，以便混水摸鱼地指责反对派不爱国。斯大林挥动着鞭子，重新抛出开除出党的威胁，利用各种精神压力的手段迫使他的批评者们缄默。在他的指使下，克鲁普斯卡娅恳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要"为中国争吵"，并提醒他们将发现自己只能"从外面批评党"。反对派希望避免"争吵"。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建议召开中央委员会，私下澄清分歧，使讨论即使在中央委员会发给"积极分子"的机密公报上也不公布出来。但是斯大林甚至连非正式的讨论都不准许进行，因此政治局拒绝召集中央委员会。①

于是，在5月最后一个星期，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强行挑起争论。他是从苏联党内部向国际呼吁的。他这样做是行使他的权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名义上是上诉法庭，任何共产党员都有权向它提出对本国共产党的控诉。但是《真理报》抢先谴责这是一种背叛和破坏纪律。不管怎样，反对派还是利用这个提出控诉的机会去批判官方的全部政策，无论是国内政策还是国外政策、是亚洲政策还是欧洲政策。为了加强它的实力，免遭报复，或者像托洛茨基所说"让许多肩膀共同承担预料的打击"，反对派策动了一次类似于1923年46人行动的政治示威：在会议前夕，一个由84名杰出党员组成的团体公开宣布他们

① 5月7日，托洛茨基给克鲁普斯卡娅写了一封信。她的"为中国而争吵"这番话刺伤了他。他请求她不要回避这个重大问题。"谁是对的？我们还是斯大林？"他详述反对派为争得一次非正式讨论所做的一切，并且提醒克鲁普斯卡娅，她直到最近都是和反对派一道反对斯大林的"残酷和背叛"的。但是斯大林政权现在是否更好了呢？他写给列宁遗孀的信既有悲伤、失望也有热情——这是他向她告别的方式——他为信怎样结尾而踌躇不决："我衷心祝愿您健康幸福……坚信路线的完整……。"他删去，再写，又删去最后两行。信的草稿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观点一致。[1] 当然,斯大林不可能只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进行纪律制裁而不对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的84人以及后来的300人进行制裁。但是,他们的联合行动却使斯大林有可能宣布反对派破坏诺言、重组派别。[2]

5月24日,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发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不得不首先抗议执行委员会对季诺维也夫的处理;这位共产国际前主席不久前是在同一个执行委员会面前指控过托洛茨基的,而现在季诺维也夫甚至都没有获准出席这次会议。托洛茨基指出,"智力贫乏和犹豫彷徨"导致斯大林和布哈林向共产国际隐瞒中国问题的真相并指责反对派的上诉是犯罪行为。执行委员会应当公布它的记录——"中国革命问题是不可能塞在瓶子里并贴上封条的"。它必须谨防隐藏在以俄国党为模式的国际"体制"内的严重危险。某些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不能忍受反对派的行为,他们以为,一旦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排除出去,俄国党和共产国际就能恢复正常生活。他们正在欺骗自己。"相反的事将会发生。……在这条路上只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和进一步的动乱。"共产国际里无人肯让他讲话,他们担心批评会给苏联带来危害。但是,再没有比缺乏批评更有害的了。中国革命的大崩溃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和布哈林念念不忘的只是维护自己的面子和掩饰

① 这份文件有时是指83人声明,有时是指84人声明。文件在5月23日与26日之间递交中央委员会。后来签名人数增加到300人。

② 参见1927年7月12日托洛茨基写给反对派一位领袖的信,这位反对派领袖是派驻国外的大使(可能是克列斯廷斯基,或者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他的通信者认为,84人的联合行动毫无必要地使斗争恶化了。托洛茨基承认莫斯科的反对派也有同样的疑虑,但是他说,当时决定是把联合行动当做自卫措施的。他不相信事态的恶化是由于反对派的公开表态。他认为,他的通信者由于长期在国外,与俄国中断了联系,因此,托洛茨基请他回莫斯科一趟,以便感受一下那里的实际情况,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他们那灾难性的错误。他们声称,他们早已预见到了这一切,并且作好了一切准备。然而,就在上海危机爆发前仅仅一星期,斯大林还在党的会议上夸口地说:"我们应该利用中国的资产阶级,然后把它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这次讲话从来没有公布,因为几天后这只'榨干了的柠檬'就攫取了政权。"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特使,特别是鲍罗廷,其行为"仿佛代表某个国民党国际":

> 他们妨碍了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它的独立组织,特别是妨害了工人的武装斗争。……绝不会有这样的事:手持武器的工人会吓跑将拥抱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民族革命这位伟大的喀迈拉,[1]她将掌握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国共产党是戴上手铐的党……为什么它没有自己的日报,为什么直到今天也没有?因为国民党不准它有。……但是,工人阶级正是这样在政治上被解除了武装。[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会时,英国与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危急关头:英国警察查抄了苏联驻伦敦贸易使团的办事处,英国政府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斯大林利用了这种情况。他在结束讲话时告诉执行委员会说:"同志们,我应当说,托洛茨基所选择的……时机太不恰当了。我刚刚得到了英国保守党政府决定和苏联绝交的消息。用不着证明,现在到处都会展开对共产党人的进攻。这种进攻已经开始了。有些是以战争和干涉来威胁联共(布)。另一些则是以分裂来威胁联共(布)。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之类的东西。……不用怀疑,我们也能

---

① 喀迈拉(Chimera)系希腊神话中的吐火女怪,狮头、羊身、龙尾。——译注

②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91-92页。

够粉碎这种新的‘战线’。”[①] 斯大林把赌注全都押在了国民党左派一边，如同他先前把赌注押在国民党右派一边那样坚决：“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国民党左派有革命斗争机关的作用、有反对中国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起义机关的作用。”[②] 斯大林实际上是要求反对派保持缄默，若违反则控之以资敌通敌之罪。

斯大林暗示存在着“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真理报》早在几个月前就曾不点名地说过这点。[③] 不过，用直接的指控取代含糊的、不点名的暗示，这倒是第一次。托洛茨基的回答如下：

> 若相信反对派会抛弃自己的观点，那是极其荒唐的。……斯大林说反对派跟张伯伦和墨索里尼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对此我的答复是：帮张伯伦忙的莫过于斯大林的错误政策，特别是在中国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直的工人会相信存在着一条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联合战线这一无耻滥言。

在回答斯大林支持国民党左派的呼吁时，托洛茨基说：

> 斯大林应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政策承担责任并要共产国际也承担这份责任，正如他不止一次应为……蒋介石的政策……承担责任一样。我们与此毫无共同之处。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82页。

② 同上，第274页。

③ 托洛茨基档案里保存着就此向政治局提出的严正抗议的草稿，写于1927年1月6日。季诺维也夫反对抗议所用的严厉语气，提出了另一个草稿，恳求政治局保护反对派免受诽谤。

> 我们不想为武汉政府和国民党领导的行为承担丝毫责任;我们紧急建议共产国际拒绝这份责任。我们要直接对中国农民说,如果你们不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而是追随国民党左派的领袖的话,他们……必将背叛你们,……(他们)将十倍地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和农民。[①]

当克里姆林宫里还在进行这些交锋的时候,托洛茨基的预言却在遥远的中国南方应验了。5 月发生了所谓的马日事变。这次轮到武汉政府去镇压工会、派出军队扑灭农民暴动并且袭击共产党人了。几乎整整一个月,苏联报纸对这些事变保持沉默。[②] 执行委员会根据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指示通过的决议甚至在其出笼之前就可笑地过时了;于是斯大林又急忙为中国共产党炮制出一套新指示。他仍然命令它留在国民党左派内继续支持武汉政府;只是指示它应抗议动用军队反对农民并建议武汉政府不要诉诸武力而要设法取得农民委员会的协助限制农民运动,然而这时国民党左派正在把共产党人从自己的队伍中驱逐出去。从 6 月到 7 月整整两个月里,它们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了;而为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和解的舞台却已经搭好。

在莫斯科立刻响起了回音。托洛茨基差不多每天都在抗议对消息的封锁。季诺维也夫要求成立一个党内法庭审判布哈林,他作为《真理报》主编要为封锁消息负责。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最终同意跟托洛茨基一起要求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但是这个要求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国民党左派已与共产党决裂,连斯大林也只能建议共产党……与国民党决裂了。

---

① 托洛茨基档案;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 102 - 111 页。

② 反对派领袖是从苏联通讯社的机密简报中获知这些事变的。

实际上斯大林已准备好来一次政策上的急转弯,转到"极左"路线上来。1927年底,这条"极左"路线指引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无谓流血的广州暴动。7月,他把鲍罗廷和罗易从中国召回来,派去苏联共青团书记罗明纳兹(Ломинадзе)和德国共产党人海因茨·诺曼(Heinz Neumann)。这两个人对中国情况一窍不通,却都有"盲动主义"倾向,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内发动了一场政变。他们给不情愿但忠实执行斯大林和布哈林命令的陈独秀扣上一顶"机会主义"坏人的帽子,使他成为一切失败的替罪羊。

斯大林在国内继续大肆宣扬战争和反共十字军的危险,加紧追害反对派。他借口各种外交使命的需要把许多反对派领袖送往国外。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弗拉基米尔·柯秀尔被派往巴黎大使馆与拉柯夫斯基会合。加米涅夫被派到墨索里尼那儿当大使——对于这位前政治局主席来说,没有比这项任命更屈辱更丢脸的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被派往布拉格;共青团的季诺维也夫派领导人萨发罗夫(Сафаров)被派往君士坦丁堡;其他人被派往奥地利、德国、波斯及拉丁美洲。反对派的领导集团就这样基本上被驱散了。84人一个接一个地被降级受罚,或者借口行政任命需要被发配到边远的省份。愈到基层,镇压就愈少伪装,愈加赤裸裸:基层群众甚至毋需任何借口就被开除或发配到穷乡僻壤去。

反对派被激怒了,起而自卫,抗议那些变相的驱逐和流放。但毫无用处。执政派将反对派的每一种自卫意图都视为新的冒犯,作为新一轮报复的理由。每一次抱怨都被当做是又一次恶意反抗的信号;每一次抗议的呼声甚至窃窃私语都被当做是造反的号召。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就是如此顽固地歪曲反对派的意图,甚至它最谦恭的姿态也被当做前所未有的挑衅行为。结果,每一种这样的姿态就真变成了挑衅行为,反对派不得不以满腔愤懑倔强地发出不平的呼声,甚至一声不满的私语声也像是号召叛乱的嘹亮号

角。任何事件,不管它多么琐碎,现在都可能煽起各派的狂热,使他们热血沸腾,震撼着党和政府。

"雅罗斯拉夫尔车站集会"就是这样一次事件。大约6月中旬,斯米尔加接到命令,要他离开莫斯科前往满洲边境线上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任职。斯米尔加是十月革命时波罗的海舰队的领导人,内战时期杰出的政治委员,经济学家,是季诺维也夫派中最受尊敬和欢迎的一位领袖。在他即将离开莫斯科的当天,数千名反对派成员及其朋友聚集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为他送行,并举行示威,反对这种遮遮掩掩的迫害。人们群情激愤。示威的声势是空前的。它发生在公共场所,正值这个重要的铁路中转站的交通高峰期。旅客、行人、非党人士混在示威者中间,无意中听到了他们对党的领导人毫不客气的评论,听到了他们激动的呼喊。他们也听到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演说。正因为这些情况,为斯米尔加送行就变成了反对派针对执政派的第一次公开的示威,尽管它不完全是预先策划的。托洛茨基意识到形势的微妙,向群众讲话时态度十分克制。他丝毫未提及党内冲突。看来,他甚至也没有暗示这次示威的原因。相反,他却严肃地谈到了国际紧张局势和战争的威胁以及每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和苏联公民对党所应具有的忠诚。

执政派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控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企图把党内争论带到党外去。谦卑恭顺的反对派成员一经被发现去过雅罗斯拉夫尔车站就立即被开除出党。在不断的战争恐吓导致冲击粮站的背景下,因这一事件而引起的骚动一直持续了整个夏天。

6月27日,托洛茨基在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声称:"这是自革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①] 他指的是战争恐吓及其相反的效果;他

① 托洛茨基档案。

指出,如果中央委员会相信战争危险真是如同它的鼓吹者所宣扬的那样迫在眉睫,那么中央委员会更有理由回顾它的政策和恢复正常的党内关系,即“列宁体制”。他指出机会就在眼前:中央委员会正着手筹备新一届党代表大会——那么就开展一次会前的争论,召回实际上被开除的反对派支持者,并允许他们参加争论吧!但是,他的请求还来不及达到它的目标,报界就又在大谈反对派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次日,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上再次发言时首先指出,斯大林的居心显然是要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斯大林集团下一步要走的路已自动确定好了。今天,他们可以伪造我们的言论,明天,他们就可以伪造我们的行为事实。”“这个集团将被迫,而且是很快地被迫采取阶级敌人在1917年7月用以反布尔什维克的所有手段打击反对派”,在列宁不得不逃出彼得格勒的“那诽谤蜂起的一个月里”——他们会提起“铅封车厢”、“外国黄金”、阴谋策划,等等。“斯大林路线的目的就在于此,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结果。只有瞎子才看不出这一点;只有法利赛人[①]才不承认这一点。”[②]

斯大林愤愤不平地否认他要消灭他的批评者。然而不久之后,斯大林就决心把反对派的领袖们送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面前受审——这两个机构共同充当党的最高法庭。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要求提到了它们面前——这是将他们开除出党之前最后一道纪律程序。在原则上,唯有选举中央委员的党代表大会才能罢免他们的职务;但是1921年颁布

① 《圣经新约》福音书中的犹太教上层祭司,他们将耶稣出卖给了罗马当局,后来“法利赛人”成为“伪善者”的代名词。——译注

② 托洛茨基档案。季诺维也夫派一想到断头台将会落到他们身上就不禁毛骨悚然,充满疑虑,以至请求托洛茨基降低警告的调子。

的派别禁令将这个权力赋予了这个最高法庭,使它在两次代表大会的间隔期有权处置违反禁令的委员。大约在 6 月底,由雅罗斯拉夫斯基和什基里亚托夫起草的对两位反对派领袖的起诉书提出来了。起诉书仅有两条罪状: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从俄国党内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诉;雅罗斯拉夫尔车站的群众示威。这两项指控是如此薄弱,以至最高法庭——狂热的斯大林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几乎全都一样——在 4 个月里也没有找到判决的充足理由。

随着诉讼程序的拖延,斯大林越来越不耐烦。他很想在他召开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前就作出开除的裁决。只要反对派领袖们还坐在中央委员会里,他们当然有权向代表大会提出对官方政策的全面批判,甚至是正式的副报告,如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上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一样。这样,他们就可以揭露有关中国问题的全部真相,并使之成为公开争论的中心,让全国和全世界都能听到。斯大林不能冒这个险。由于这个原因或其他原因——事变本身迫使他在国内政策上再次改变立场,含蓄地承认失败——斯大林必须竭尽全力阻止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登上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为此,他首先要把他们撵出中央委员会。只要他能做到这一点,就有把握让代表大会的兴奋点集中到党内阴谋组织上来而不是停留在中国革命的大崩溃或其他政策问题上;那时反对派领袖即使出现在代表大会上,充其量也只能以被告身份抗议撤职裁决罢了。代表大会定于 11 月召开。斯大林必须只争朝夕。

7 月 24 日,托洛茨基第一次站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面前回答指控。自从他本人在这同一机构面前指控工人反对派以来已经过去了 5 年。当时担任主席的人——索尔茨(Сольц)是一位深受尊敬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列宁时代有人称他是“党的良心”——现在他作为一个斯大林派成员跻身于托洛茨基的审判者中。主持

控诉程序的是奥尔忠尼启则,他性格暴躁,但也有他真诚甚至宽宏大量的一面;他是斯大林的同乡和朋友,1922年时,由于他在格鲁吉亚时的行为,列宁坚持要把他开除出党,而托洛茨基表示反对。[①] 托洛茨基的起诉者雅罗斯拉夫斯基和什基里亚托夫也是主席团成员。还有一个叫做扬松(Янсон)的审判员,过去监察委员会曾由于他狂热地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而谴责过他。其余的人都是清一色执政派的忠实追随者。托洛茨基不能指望他们会公正地考虑他的案情。的确,他是以指责他们的偏向并要求至少取消扬松的资格开始他的答辩的。然而这些人即使在行将着手这件工作时也是意气沮丧,胆战心惊。他们和被告都想到了法国大革命,并被关于雅各宾党清洗运动的回忆所折磨着。130年过去了,但被判罪的丹东的凄厉呼喊仍回响在他们耳畔:"在我之后就轮到你了,罗伯斯庇尔!"

在开庭前不久,索尔茨跟托洛茨基的一位盟友谈话,想向他表明反对派所起的作用是多么邪恶,说:"这会有什么结果?你知道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吧——结果就是:逮捕和断头台。"这位反对派反问道:"把我们送上断头台不正是你们想干的事吗?"索尔茨对此回答说:"你以为罗伯斯庇尔把丹东送上断头台时没有怜悯他吗?不久罗伯斯庇尔本人也被迫走上了断头台。……你以为他没有怜悯吗?他确实怜悯他,但他不得不这样做……。"[②] 审判者和被告都同样看见了高悬于他们头顶之上的那柄巨大的滴着鲜血的利剑;但是,就像被噩运攫住了一样,他们无法改变将要发生的事;每个人都是惴惴不安地甚至战栗着去做他命定要做的事,亲手加速噩运的降临。

---

① 参见本书第二章。

② 托洛茨基档案;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第126-148页。

托洛茨基简要回答了对他提出的两大正式罪状,他否认法庭有权因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发言而审判他。他同样否认任何"地区性委员会"有权因他在中央委员会上说过的话而审判他——他的审判者,即党的领导机关承认自己应服从共产国际。至于第二条罪状,即为斯米尔加送行时的示威,执政派否认它有意加罪于斯米尔加。但是"倘若斯米尔加到哈巴罗夫斯克的任职只是日常行政事务的问题,那么你们怎么敢说我们对他的集体送行就是反对中央委员会的集体示威呢?"然而,如果说任命是一种变相的流放,那么"你们就是在耍两面派"。这些琐屑的指控都不过是借口而已。执政派已决心"迫害反对派,并准备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因此,战争恫吓无非是为了恐吓批评者,迫使他们缄默。"我们声明,只要你们没有从肉体上封住我们的口,我们将继续批判斯大林政权。"这个政权具有"要把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连根拔掉"的危险性。反对派跟那些把沙皇当成祖国的旧日"爱国者"毫无共同之处。尽管他们被指控为向英国保守党人献媚求爱,但是他们有充分权利把这种控告掷还给指控者。斯大林和布哈林对英俄委员会的支持倒是真正间接帮了张伯伦的忙;他们的"盟友"即英国工联领袖们在根本问题上是支持张伯伦的外交政策的,其中就包括同苏联断交。在党支部里,官方鼓动员提出许多含有煽动意味的问题,如关于反对派用于其活动的财源的问题,"你们和黑色百人团是一路货色"。"如果你们真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你们就应该义不容辞地终止这种卑鄙下流的典型斯大林主义的运动……。"如果执政派真的以国家安全为重,他们就不应该只因为斯米尔加、姆拉奇科夫斯基、拉舍维奇、巴卡耶夫和穆拉洛夫这些最优秀的军事将领是反对派成员就罢免他们。现在正是缓和党内矛盾而不是加深矛盾的时候。打击反对派的运动正是扎根于不断高涨的反动浪潮。

回顾了重大的争论问题之后,托洛茨基颇有说服力地引证了法国大革命史。他首先提到了上面所说的索尔茨与那位反对派成员的谈话。托洛茨基说,他同意索尔茨的观点,即他们都应当重新温习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但必须正确地运用历史类比。

> 在法国大革命时代,许多人被送上断头台。我们也把许多人带到了行刑队面前。但是法国大革命经历过两个伟大阶段:一个阶段就像那样(说话者指着天);另一个阶段就像这样(他指着地)。……在第一阶段,革命还在上升,那个时代的布尔什维克——雅各宾党人把保皇党人和吉隆特派推上了断头台。我们也经历过同样的伟大阶段,我们——反对派——和你们一起枪决了白卫军,流放了我们的吉隆特派。但是当法国革命的另一个阶段开始后……热月政变者和波拿巴分子从右翼雅各宾党人里冒出来,开始流放和枪杀左翼雅各宾党人。……我请索尔茨同志把他的历史对比推到底,首先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索尔茨准备枪决我们的这个阶段属于哪个阶段呢?(会场里一片骚动。)这不是什么可笑的事情,革命是严肃的。我们谁也不会被行刑队所吓倒。我们全都是老革命家。但我们必须知道,被枪杀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正处在哪个阶段。当我们枪决人的时候,我们是毫不含糊地知道我们处在哪个阶段的。但是,索尔茨同志,您是否清楚您准备枪决我们的这个阶段属于哪个阶段呢?我担心,……你们这样做,正是处于……热月政变阶段。

他接着解释说,如果他的对手认为他在骂人,那就错了。热月政变者还不是自觉的反革命——他们仍然是雅各宾党人了,但已

经是“滑向右翼”的雅各宾党人。

你们以为热月9日的第二天他们会对自己说:我们现在已经把政权转到资产阶级的手中了吗?没有这回事。看看当时的报纸吧。他们说:我们消灭了一小撮破坏党内和平的人,把他们消灭之后,革命就会取得彻底的胜利。如果索尔茨同志对此有所怀疑的话……

(索尔茨插话说:你实际上在重复我本人的话)。

(托洛茨基说)……我给你们读一段右翼雅各宾党人和热月政变者布里瓦尔在国民议会上作报告时说的话,这次会议决定把罗伯斯庇尔及其同志移交给革命法庭。布里瓦尔说:“阴谋家和反革命分子一面用漂亮的‘爱国主义’外衣把自己打扮起来,一面拼命破坏自由;国民议会下令逮捕了他们。他们是罗伯斯庇尔、库通、勒巴、圣朱斯特、小罗伯斯庇尔。主席问我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那些历来按山岳党原则投票的人……投票赞成逮捕。我干得更多……我就是提出这种措施的人之一。此外,我作为书记,还要加快对国民议会这项法令的签署,并将它移交给你们。”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索尔茨所作的报告。罗伯斯庇尔及其同志们——都是反革命分子。“那些历来按山岳党原则投票的人”,在当时的语言中就是指“那些历来是布尔什维克的人”。布里瓦尔认为自己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我作为书记,还要加快对国民议会这项法令的签署,并将它移交给你们。”今天也有这样一些要加快“签署和移交”的书记。今天也有这样一些书记……。[1]

---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

托洛茨基接着说,热月政变分子也是在"祖国处于危险中"的一片叫喊声中不断打击左派雅各宾党人的。他们坚信罗伯斯庇尔及其朋友们只不过是"孤立的个人",却不了解他们所打击的正是"那个时代最深刻的革命力量",是反对雅各宾中的"新耐普曼"和波拿巴主义的力量。他们给罗伯斯庇尔及其朋友们扣上一顶贵族帽子——"今天我们不是也从扬松的嘴里听到他对我喊出'贵族'这个同样的字眼儿吗?"他们诬蔑左派雅各宾为皮特的代理人,正像斯大林分子谴责反对派为"当代皮特袖珍版"——张伯伦的代理人一样。

> 现在,人们的鼻子已经闻到了"法国革命第二阶段"的气味了……党的制度在窒息着每一个敢于向热月政变作斗争的人。工人,来自群众中的人,在党内被窒息。基层组织噤若寒蝉(雅各宾俱乐部衰落时的情形正是如此)。一种无名的恐怖统治已经建立起来;缄默是被强迫的;投票要求百分之百,一切批评都被禁止;按照上头的命令去思考是一种义务;人们被驱使着不去想党曾是活生生的独立的有机体而不是自满自足的权力机关。……雅各宾俱乐部,这个革命的熔炉,变成了拿破仑未来官僚政治的温床。我们应当向法国大革命学习。但是真有必要重复这段历史吗?(叫喊声)

但是并非一切都已绝望了。尽管分歧严重,但分裂仍可以避免。"我们党内仍蕴藏着巨大的革命能量"以及继承列宁的丰富的思想和传统。"你们已经大量挥霍了这种资本,你们用廉价的次品代替了这种资本……但是仍有不少纯金留存下来。"这个时代是惊

人巨变的时代,是急剧转折的时代,场景或许会突然转换。“但是你们不要隐瞒事实,它们早晚会大白于天下。你们不能隐瞒工人阶级的胜利和失败。”只有允许党来衡量事实,并自由地形成它的意见,当前的危机才能被克服。因此,执政派不要作出任何轻率的、无法挽回的决定。“请注意,不要事后再说:我们与之分手的正是我们应该维护的人,而我们维护的正是我们应该与之分手的人。”

读到这些话不能不使人想起托洛茨基在1904年所说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当时年轻的托洛茨基刚踏上人生的旅途,他想到列宁党的未来,并把它同雅各宾党的命运相比较。23年之后,他也同样感到毛骨悚然。他在1904年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在一个革命法庭上控告无产阶级国际运动的全部调和主义,那么马克思的狮子头就会第一个掉在断头台下。”此刻在布尔什维克的法庭前面,他自己也在以狮子般的勇猛为他自己的头颅而战。1904年他还讨厌列宁这种“心怀叵测的和道德上令人厌恶的猜疑态度”,而此刻,他本人也求助于列宁的思想,反对列宁继任者的狭隘胸怀和“心怀叵测的和道德上令人厌恶的猜疑态度”。然而他现在对雅各宾主义的看法却同他年轻时的看法几乎完全相反。那时他认为雅各宾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这是“两种对立的世界、学说、策略、思想”,……因为雅各宾主义意味着“绝对信仰形而上学思想和绝对不相信现实生活中的的人民”,而马克思主义则首先诉诸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因此,他在1904年要求在两者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因为雅各宾党的方式一旦复活,必然会“把少数特选人物……或一个被赋予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置于无产阶级之上”。现在他面对着的正是这少数特选人物或一个正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然而他对这些人的主要抨击却不是因为他们按照雅各宾精神行事,而相反是因为他们摧毁了这种精神。他

现在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与雅各宾主义的类似之处;而且他将自己及其追随者等同于罗伯斯庇尔集团;也正是他将“调和主义”的罪名转过来指控斯大林和布哈林。

因此,“布尔什维主义的两个灵魂——马克思主义和雅各宾主义之间的冲突”,我们最早在1904年看到的这个冲突,[1] 在这些年里构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内所有事件的基础,现在却使托洛茨基从另一个与他最初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雅各宾主义了。这个冲突在不同程度上是布尔什维克所有派别的共同特点。有意思的是,所有派别都把自己等同于雅各宾主义的同一方面。托洛茨基把自己的态度与罗伯斯庇尔的态度相比,并将其政敌视做“调和主义者”,而索尔茨与他的同伙则视斯大林为新的罗伯斯庇尔,视托洛茨基为新的丹东。其实正如事变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类似和差别要远为复杂和混乱。雅各宾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有一个共同点——取代主义。这两个党都自居于社会的领导地位,却不能依靠社会的自愿支持实现它们的政纲。如同雅各宾党人一样,布尔什维克“不相信他们的真理能赢得人民的心和情感”。他们同样怀着病态的猜疑看待周围,并且“看到敌人从每一个裂缝中爬出来”。他们同样必须在自己与世界其余部分之间划出一条鲜明的分界线,因为“每一种模糊这条分界线的企图都威胁着释放出内在的离心力”;而且他们是用“断头台的利刃”来划分界线的,一旦消灭了队伍外面的敌人之后,就开始在自己队伍里寻找敌人了。而托洛茨基现在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重申他最初在1904年说过的话:“党必须从自身的根本上,从生气勃勃的自我依靠的无产阶级中去寻找自身巩固的保障,而不是在它的上层核心中去寻找,这个核心也许会被革命的翅膀……突然一扫而光……。”他又一次大声疾

---

① 参见《武装的先知》第三章。

呼:“任何一个严肃的团体……当它面临着困境时——不是出于纪律感而默默埋葬自己,就是不管纪律而为自身的生死存亡奋斗——无疑会选择后一条路线……并且说:让那妨碍运动的根本利益的‘纪律’见鬼去吧!”

※ ※ ※ ※ ※

7月底前,党的法庭未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作出任何裁决就解散了。大多数审判者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对他们两人的怜悯,正如“罗伯斯庇尔怜悯丹东”一样。但是斯大林却硬要作出裁决。他的“重大失误”的后果一天比一天明显。中国革命的最终惨败使他有身败名裂的危险。英俄委员会终于呜呼哀哉了:它的英国成员对英俄外交关系的破裂竟然没有发出一声抗议。在国内,战争的恫吓和冲击粮站又导致新一轮的商品缺乏。农民感到不安。人们有理由担心秋天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城镇。斯大林至此为止都能掩饰他的过失:他竭力把他的政敌们提出的所有警告和预言都压制下去。托洛茨基最近几乎每一次讲话都有可能把他惨淡经营起来但仍动摇不定的权威炸得粉碎;只是他从不让托洛茨基的声音穿透克里姆林宫的厚墙引起墙外的回响。但是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了;在会上,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就会有机会阐述他们的主张。全国都会听见。要捂住中央委员会上的那些批评之口是能做到的,但若用同样的方法压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是不可能的。因此,斯大林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剥夺他们的这种机会。

他焦急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不得不为领导集团联盟内部的紧张关系而担心。最近几年,右倾政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国外,在共产国际内继续推行这种政策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在

国内,每一种迹象都表明有转变政策的必要;尽管应在多大范围里转变政策还不太清楚,但是很显然,转变政策需要党以更激进的态度对待农民和实行更大胆的工业路线。对于这些重大问题,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至今还掩盖着他们之间的分歧,以便结成共同战线对付反对派。但是掩盖分歧已愈益困难,摊牌的时刻正步步逼近。只要斯大林还没有结束反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他就不能转身反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他不能同时对付两个反对派,特别是由于政策的转变会让许多人感到这证明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观点是正确的。他必须粉碎联合反对派,尽快腾出手来。

当托洛茨基发表了他的所谓克列孟梭式声明之后,斯大林终于以加倍的狂怒发作了。托洛茨基这个声明首先出现在 7 月 11 日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在 7 月底交给《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出现。托洛茨基在谈到战争恫吓时一再声称,一旦战争来临,人们就会看到执政派领袖的无能,他们是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的,而反对派将为了国防利益继续反对他们,并尽量承担起指挥战争的责任。这些话给托洛茨基招致了背叛祖国和失败主义的攻击。他在反驳时解释说,反对派主张"无条件保卫"苏联,而它在战争中努力取代执政派完全是为了以更饱满的精神和更清醒的头脑把战争进行下去;而这是不能指望现在领导党的那些人的。唯有"那些蠢货和恶棍"才会从"他们的垃圾堆中"指责这种态度是失败主义的。正相反,这是出于真正关心国防的态度——"胜利不能从垃圾堆里得到"。下面是颇多争议的"克列孟梭式声明":

> 在其他阶级的历史上也可以找到一些极有教益的事例。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在帝国主义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作者注)开始时,领导法国资产阶级的是个

> 既没有舵又没有帆的政府。克列孟梭集团当时是这个政府的反对派。不顾战争和战时的书报检查，甚至不顾德国人已经离巴黎只有 80 公里(克列孟梭说:"正是这个缘故")，他激烈地反对政府的小资产阶级的优柔寡断，拥护以真正的帝国主义者的暴戾残忍进行战争。克列孟梭没有背叛自己的阶级——资产阶级，相反地，他比维维安尼、庞勒维及其伙伴更忠实、更坚定、更坚决、更聪明地为资产阶级服务。后来事变的进程证明了这一点。克列孟梭集团登台执政后，就用更彻底、更带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政策保证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当时法国报界有没有人称克列孟梭集团为失败主义呢？大概是有的，因为在一切阶级的队伍里总会有一些糊涂虫和诽谤者拖在后边的。但他们并不总是能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1]

这就是托洛茨基声称要效法的实例；还可以补充说，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丘吉尔为了反对张伯伦[2]而效法的实例。顿时挞伐之声四起。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发出叫嚣：托洛茨基威胁要在战争中当敌人距克里姆林宫不到 80 公里的时候实行军事政变——他的叛国之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大约与此同时，一批军队领袖送交政治局一份秘密声明，表示与反对派一致，并批评军事委员伏罗希洛夫在军事上的无能。在签名者中，除了直到当时仍担任军队监察长的穆拉洛夫外，还有普特纳(Путна)、亚基尔(Якир)

---

① 在《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49 页上，斯大林全文引用了这份声明

② 张伯伦，N.(1869—1940)：英国首相(1937—1940)，慕尼黑协定的签订者。与前张伯伦(Austen 1863—1937)不是同一人，而是同父异母兄弟。斯大林提出"从托洛茨基到张伯伦的统一战线"指的是 A.张伯伦，他在斯坦利·鲍德温内阁时期曾任外交大臣(1924－1929)，促成英国与苏联断交。——译注

以及其他将军们,10年之后在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清洗中他们都被消灭了。[1] 执政派把这次军队行动看做是反对派意图的预兆。

围绕着所谓克列孟梭式声明的吵嚷一直持续到年底,直到托洛茨基被驱逐;而且多年以后它的余音仍未停息:它总是被用来证明托洛茨基的叛逆。能知道克列孟梭式声明究竟是什么意思的党员简直是凤毛麟角;实际上,在多数人的理解中,这即使不是一场政变的实际序幕的话,那么也是托洛茨基要把下一次战争转变为内战的威胁。尽管他的话里并没有包含这样的威胁,他举的这个先例也没有这样的含义,但那都无所谓。极少有布尔什维克能够搞清法国"老虎总理"干的是什么事,他采取什么手段才夺取的政权。托洛茨基提到克列孟梭是十分自然的——因为10年前他在巴黎亲眼目睹了克列孟梭的这场斗争。但是这个先例太生疏,太含混了,因而对于公众、对于大多数中央委员甚至新的政治局委员(在新的政治局委员中,除布哈林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懂得法国历史的)来说是邪恶的。无怪乎托洛茨基以讽刺的笔触描绘了这无知的惶惑,中央委员会正是以此对待他的历史类比的:

> 从我的文章中……莫洛托夫第一个学会了许多东西,然后他把它们作为这些叛乱阴谋的惊人的第一手证据向中央委员会作了汇报。莫洛托夫因此知道了在战争时期法国还有一位政治家叫做克列孟梭,这位政治家发动一场斗争去反对当时的法国政府,旨在强迫推行更坚决、更无情的帝国主义政策。……后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解释,而莫洛托夫又给我们解释了那个先例的真实意义:根据克列孟梭集团所创立的先例,反对派竭力争取另

[1] 图哈切夫斯基本人没有在声明上签名,而且他从未与联合反对派沾过边儿。

一种社会主义国防政策——就是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18 年)所采取的那样的叛乱政策。[①]

用这种神秘的谜语倒是很容易吓唬住基层支部,于是,先是在莫斯科,尔后在外省,激起了一片叫喊:该是制止反对派为害的时候了。

8 月 1 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重新考虑号召开除反对派的动议。斯大林、布哈林以及其他人再次借助于陈词滥调来嘲骂托洛茨基,并宣读了冗长的起诉书,逐一翻出托洛茨基自 1903 年起的政治经历,将之描绘得漆黑一团。甚至 1919 年军事反对派曾经提出的那些指控也重被捡起,比如说,在内战时期,托洛茨基与军队中的共产党员为敌,下令枪决一些无辜的英勇政治委员。[②] 然而在现在这个时刻,克列孟梭式声明正好为起诉提供了理由,起诉书宣称不能信赖反对派在战争中有献身于保卫苏联的忠诚。

托洛茨基在答复中回顾了他过去多年来在制订党的国防政策以及形成共产国际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时承担的最高责任。他抨击斯大林和布哈林把国防政策寄托在折断的芦苇上,或者如他所说,寄托在"霉烂的绳索"或"腐朽的支柱上"。难道说他们不曾欢呼英俄委员会是抵挡干涉和战争的屏障,而它不正是变成了一

① 参见托洛茨基的笔记"克列孟梭",日期是 1927 年 8 月 2 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 这一特别指控是雅罗斯拉夫斯基提出来的,但是这甚至让斯大林派也感到震惊,奥尔忠尼启则明确表示与此事无关,托洛茨基档案。雅罗斯拉夫斯基属于 1919 年军事反对派。反托洛茨基指控当时被斯米尔加、拉舍维奇送交政治局,所谓遭到托洛茨基迫害的政治委员是扎鲁斯基和巴卡耶夫——这 4 人现在都是反对派的中坚。此事详情可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十二章。

根"霉烂的绳索"吗?难道他们没有以破坏中国革命来削弱苏联吗?伏罗希洛夫曾声称"(中国的)农民革命会妨碍将军们的北伐"。但这恰恰与蒋介石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样。"为了北伐,你们就制止革命……仿佛革命本身不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一次北伐。""你们公然反对在'军队的后方'建立苏维埃——仿佛革命就是军队的后方!——你们这样做就是为了不去瓦解这些将军们的腹地,而两天之后他们则在自己的后方摧毁了工农革命。"国防人民委员兼政治局委员的伏罗希洛夫的此类讲话本身就是"一个灾难——这等于导致战争失败"。在战争中,"这些霉烂的绳索将会在你们手里断成碎片"——正因为这样,反对派不能不批判斯大林派的领导。

但是批判会不会削弱苏联的道义基础呢?这样提出问题正好"赢得了教廷和封建将军的赞赏"。天主教会要求它的信徒无条件地确认它的权威。革命者既提供支持,也进行批判;他的批评权利越有保障,那么,在斗争中他作为一名直接参与者就越能热心于创造性的发展和增强战斗力量。"我们需要的不是虚伪的神圣同盟,而是最真诚的革命团结。"战争的胜利并非主要取决于武器。士兵不能不拿起武器,但还必须用思想来鼓舞士兵。奠定布尔什维克国际政策基础的思想是什么呢?很可能由两种方式之一保障胜利:要么如反对派所建议的以革命国际主义精神进行战争,要么以热月政变者的方式进行战争——而这就意味着富农的胜利、对工人的进一步镇压或"分期付款式的资本主义"。斯大林的国际政策既非前者,也非后者;他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但战争容不得半点儿犹豫。它将迫使斯大林集团作出选择。不管怎样,斯大林集团由于连自己都不知道往哪儿去,因此它无法保证胜利。

当托洛茨基讲到这儿时,(会议记录上记着)季诺维也夫发出一声赞叹,但托洛茨基又停下来纠正他自己的说法,他不说"斯大

林的领导不能保证胜利",而说"赢得胜利将是困难的。"莫洛托夫突然插嘴说:"但是党在哪里呢?""你们早把党扼杀了"——托洛茨基怒斥道;他又字斟句酌地强调了一遍: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胜利将被证明是"更为困难的"。因此,反对派不能把保卫苏联与保卫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没有一个反对派会在战争前夕或战争期间放弃争取纠正党的路线的权利与义务……胜利的最重要的前提就在其中。一句话: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吗?是的!保卫斯大林的路线吗?不!"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斯大林的胜利光焰中,托洛茨基的这些预言似乎黯然失色了。斯大林毕竟保证了俄国的胜利;此后的事件也表明没有出现类似的"分期付款的资本主义"。但是,托洛茨基是在新经济政策高潮时期说这番话的,那时俄国仍然是工业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私有农业还在全国占据优势;富农势力还在不断增强;党还是一个各种敌对倾向的旋涡;而且他是视当时的条件而谈到执政派所宣扬的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的。人们只能在这种背景下推测战争可能遵循的方向以及斯大林将怎样进行这场战争。不管怎么说,托洛茨基在这种背景下对战争前途的估计要比把它挪到1941年至1945年时的苏联似乎更有道理。而且,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为了尽量克服苏联国内的紧张关系,斯大林主义也强行将其统治扩张到东欧和中欧。可能有争议的是,扩张是否完全就是托洛茨基所谓的苏联国内的"分期付款式的资本主义的替换"。就算站在胜利的角度来看,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无能的苛评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1941年,在德苏冲突的最初几个月里,伏罗希洛夫手忙脚乱,丑态百出,他作为一个将军再也抬不起头来了。至于斯大林,这位1927年的总书记尚还没

① 托洛茨基档案;《斯大林伪造学派》第161-177页。

有多少他在下一时期作为一个独裁者经过多年绝对专制积累起来的军事实践知识和经验。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在现在以及将来很长时间都是一个历史争论的课题,但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取得胜利的困难"远比可能遭到的困难要大得多;如果在比斯大林更有远见的人的领导下,苏联也许就不会遭到1941—1942年那样严重的初期失败;大概它也不会为最后胜利付出如它实际所付出的那样巨大的生命与财富的代价。①

托洛茨基立场的薄弱之处并不在于他对他的政敌说了些什么,而是在别的方面——即他对反对派在战争中的行为进行展望的方式。其中显然没有丝毫的失败主义。但是他怎么能把自己想象为苏联的克列孟梭呢?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继续讨论开除他的动议的8月6日,他又回到这个问题上。他说,指控他煽动叛乱是荒谬的:克列孟梭从来没有策动任何叛乱或政变,也没有采取任何违反宪法的行事方式;他通过最合法的方式推翻他所反对的政府,自己上台,他为此目的而利用了议会机构。或许有人说,但是苏联并没有这样的议会机构呀!托洛茨基回答说:"是的,幸好我们没有。"那么反对派怎样根据宪法推翻政府呢?托洛茨基继续说:"但是我们确实也有,我们有党的机构。"换言之,反对派将在党章规定范围内行事,并努力通过在中央委员会,或者有可能的话,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投票推翻斯大林。但是,难道托洛茨基本人不是一再论证说有名无实的党章只不过是摆设,而真正的党章是斯大林的官僚专制主义吗?托洛茨基回答说:这就是反对派努力改革党内体制的根本原因:"……在战争情况下也同样,党应

① 参见本书作者著的《斯大林政治传记》一书中对斯大林在战争期间作用的评价,第456-460页和第十二-十四章各处。

该保护,或毋宁说恢复一种更灵活、更合理、更健康的党内体制,使党有可能得到及时的批判、及时的警告、及时的政策转变。"然而执政派对此是毫不踌躇的:他们不能容忍这样的改革,不允许以任何合法方式更换领导。他们正是以这种心态看待托洛茨基的声明的;他们得出结论:如果托洛茨基不能通过任何议会程序或投票方式推翻斯大林,他必将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从这种看法出发,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一致认为他的克列孟梭式声明就是宣称反对派有权策动叛乱。即使他实际上没有宣布这种权利——但他在流放八九年之后还是要宣布这种权利的;而且执政派意识到,他宣布这种权利,正是他们所造成的这种局面的必然结果。

托洛茨基以更强的逻辑力量抨击道,正是他们自己威胁着要永远把持党并采取内战方式保持他们的权力;他们正准备使用这种手段来对付反对派。毫无疑问,当斯大林掀起反对克列孟梭式声明的一片鼓噪时,他竭力想迂回地建立起一种布尔什维克传统不容许他公开宣布的原则,即他的统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分割的,任何想取代他的统治的企图都以反革命论处。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围绕克列孟梭式声明的风暴揭示出执政派与反对派之间鸿沟的广度、深度和不可逾越性:在环境的驱使下,两派对话使用的语言已经是内战的语言了。

但即使就开除托洛茨基一事考虑了已有两个月之久,党的法庭仍然迟迟不能作出裁决。斯大林这一回又跑到了他的同伙和盟友的前头。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去执行他的命令。他们身上仍然留存着少许旧日的忠诚,仍然把他们的政敌当成同志,仍然拘泥于党章,并且一心想维护布尔什维克的表面礼仪,因而再次寻求同反对派达成协议;而后者也非常乐意迎合他们;于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试图平息克列孟梭式声明激起的情绪,宣布反对派忠于党和国家,承诺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无条件地捍卫苏联。新"休

战协定"达成了;8月8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束了讨论,不再提开除出党的动议,而只满足于通过一项批评反对派领袖的决议。

此刻看来,反对派有可能参加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再次向党呼吁了。领袖们准备了一份全面系统的政策声明,即反对派纲领,这是他们此前从未能提出过的。纲领在反对派集团内经过了反复讨论、详细修改和补充。[①] 但是问题早已超出了"正常化"有可能实现的的界限。这是最后一次"休战";它甚至比上一次休战更短命。执政派勉强同意休战,不言而喻地以为,反对派领袖们好不容易逃过惩罚,肯定会收敛他们的气焰。但后者却并非如此理解他们的义务。他们感到有权继续进行他们认为是正常的发表意见和提出批评的活动,特别是在数月后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这是进行全党大辩论的时机。斯大林及其心腹千方百计要撕毁休战协定。不管有没有借口,他以继续惩罚和流放反对派来刺激反对派。他把责任推到反对派身上,扬言说,它已经破坏了休战,因为它准备了自己的纲领、拒不参与谴责它在德国的同情者,等等。斯大林看到他这方的行动还没有准备好,就把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推迟了一个月。

9月6日,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们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交涉并指出,总书记处正在推行它自己的一套政策,这套政策甚至违背了斯大林—布哈林派大多数人的意愿。他们针对新一轮迫害提出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并抗议推迟代表大会的召开。托洛茨基再一次要求在大会召开之前进行一次允许被驱逐的反对派参加的坦诚的争论。他还要求中央委员会按照过去的光荣传统将反对

① 该纲领标题为《苏联当前形势》。托洛茨基后来在流亡中以此标题公布了这个纲领。

派纲领随同其他一切官方文件予以公布,使之在党的选举人中间传阅。由于斯大林粗暴无情的干涉,中央委员会否决了反对派的申诉,拒绝把反对派纲领作为讨论文件的一部分予以公布。此外,它也禁止反对派以自己的方式扩散这些文件。

无疑,这成了挑起新争端的原因。对于反对派来说,遵守这个最新禁令就是可耻的投降,甚至可能是永远的投降。然而蔑视它也是冒险,这样,反对派纲领就只得秘密或半秘密地印刷和散发了。反对派决定冒险。为了保护自身免受报复——再次被"分散打击"——也为了给代表大会留下强烈印象,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号召他们的追随者在纲领上集体签名。签名的征集将显示出反对派所得到的支持的规模;这样,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成为对反对派自身实力的检验,其形式是它以前从不敢采取的。

斯大林不能允许这种情况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9月12—13日晚,格别乌袭击了反对派的"印刷厂",逮捕了几个正在印刷纲领的人,并且大肆宣扬破获了一个阴谋集团。格别乌硬说,他们当场抓住了正与臭名昭著的反革命分子勾结的反对派分子,一个前弗兰格尔白卫军军官为反对派创办了印刷厂。在袭击当天,托洛茨基已经离开莫斯科前往高加索;但反对派的几个领袖,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站出来予以驳斥,并且声明他们对"印刷厂"以及出版"纲领"事宜承担全部责任。这三人当即被开除出党,其中姆拉奇科夫斯基则被投进监狱。把这种惩罚手段加之于反对派头面人物,这还是第一次。

这次事件预示着10年后作为大清洗基础的"大杂烩"。格别乌的揭露是为了说服所有对斯大林关于"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联合战线"的断言半信半疑的人。如果说这些人曾在良心上感到不安,怀疑"联合战线"是斯大林想象力的一种虚构,那么现在揭发出来的阴谋故事将打消他们的疑惑。"弗兰格尔军官"这个土生土

长的人物是作为反对派和世界帝国主义黑暗势力之间的一个环节而出现的。怀疑者和困惑者受到一次断然警告,并向他们展示了天罗地网,一旦他们从事或仅仅是以任何变相形式进行把矛头直接指向官方领袖的活动的话,而且不管这行动初看起来是多么无辜,肯定在劫难逃。

这次打击是精心策划的。当反对派力图指出格别乌的揭露只不过是一种捏造时,损害已经造成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他中断在高加索的逗留回到了莫斯科——跟捷尔任斯基死后继任格别乌首脑的明仁斯基交涉,以澄清这场阴谋的荒唐细节。格别乌抓住了几个正在复制纲领打印文本的反对派成员。这表明反对派甚至连沙皇时代所有地下组织都有的那种秘密印刷所也没有一个。几个青年自告奋勇做打印工作和复制工作。不错,其中几人还不是党员;但这是他们自己的唯一过错——斯大林后来也无法给他们找到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严重的罪名了。那个前弗兰格尔军官确实在这件事上帮了忙,并且答应协助散发反对派纲领;但明仁斯基承认——先是向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后来又向中央委员会承认:这个军官是雇来作内奸的,他的特殊任务是刺探反对派。斯大林本人也证实了这个揭露,并说:"但是,假如这个前弗兰格尔的军官帮助苏维埃政权揭穿反革命阴谋,那又有什么不好呢?谁能否认苏维埃政权有权把旧军官争取过来,以便利用他们破获反革命组织呢?"① 这样,斯大林首先把弗兰格尔军官作为一个人证,用以证明反对派的行动具有反革命性质,然后他又说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应该利用前军官来提供证据。反对派高声叫喊道:"我们的敌人、迫害者、诽谤者!"但是它已经无法消除诽谤的后果了。

---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62页。

托洛茨基匆忙赶回莫斯科并不仅是为了这件事。当他还在高加索时,共产国际主席团出人意料地宣布将在 9 月底前召开会议,并把开除托洛茨基出国际执行委员会这一提案列入议程。9 月 27 日,他站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面前,最后一次——怀着藐视和激愤的心情——向所有到会的各国共产党代表讲话。这是荒诞的审判。那些审判这位共产国际奠基人之一并将其革命功绩全盘否定的外国共产党人作为革命者几乎是清一色的可悲的失败者:流产起义的鼓动者,革命的职业输家,或是坐享十月革命荣耀的那些琐屑派别的领导——而被指控的这个人却在那次革命中发挥过卓越的作用。他们当中有:马赛尔·加香(Marcel Cachin),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托洛茨基作为齐美尔瓦尔德宣言的起草者被逐出法国时,他作为法国政府驻意大利使节支持墨索里尼的鼓吹战争的运动;多里奥(Doriot),未来的法西斯分子、希特勒的傀儡;[1] 台尔曼(Thalmann),于 1933 年时领导德国共产党向希特勒投降,后来死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还有罗易,他刚从中国回来,他在那里使出吃奶的力气引导中国共产党舐蒋介石脚下的尘土;J. T. 墨菲(Murphy),这个英国人是外国共产党中最无足轻重的一个党中的小小代表,被推选出来主持讨论开除动议。托洛茨基向这次会议投去的轻蔑与他们加在他身上的侮辱适成正比。

托洛茨基告诉执行委员会:"你们指控我破坏纪律。我毫不怀疑,你们的裁决甚至都是早已准备好了的。"[2] 执行委员中没有一个人敢自作主张——他们全都是听命而已。他们就是这样奴性十足,俄国党的总书记居然能傲慢地支使一位外国共产党的代表到

① 多里奥似乎并未参加这次会议;但他是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是托洛茨基最激烈的指控者之一。

② 托洛茨基档案。

俄国的边远省份去担任卑微的官职——这是指南斯拉夫驻共产国际代表武约维奇,他是季诺维也夫派成员,现在也被开除了。他,托洛茨基,被召来说明为什么越过俄国党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诉——"正如沙皇时代一样,现在的执行官也要鞭挞任何一个敢于向他的更高长官控告他的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所谓领袖们无耻到甚至都不想装装门面的地步:他们只顾奉承拍马,竟忘了把蒋介石和汪精卫开除出他们的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但是他们却高高在上地审判那些是俄国革命的血与肉的人物。①

托洛茨基继续说,在关键的4年里,共产国际没有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而在列宁时代,代表大会则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即使是在内战和军事封锁时期也是如此。现时出现的任何重大问题从来没有讨论过,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禁区——斯大林的政策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遭到了破产。"共产党的报纸为什么一声不响?共产国际的报纸为什么一声不响?"执行委员会几乎每天都在践踏他们的组织章程;他们却指控俄国反对派破坏纪律。他承认说:"反对派的……唯一罪过是太顺从斯大林书记处的方针了,而那些方针对于革命则是灾难。""俄国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的方式是一种自我嘲弄……斯大林心爱的武器就是诽谤。""懂得历史的人都会懂得,篡权者路上的每一步都是由这些杜撰出来的指控标志着的。"反对派不能放弃公开反对这种对革命有最致命危险的体制的权利:"当士兵的双手被捆住的时候,主要的危险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捆住士兵双手的那根绳索。"

"开除动议"的起草人墨菲回忆道:"他以他全部的气魄和力量发动进攻了。他从最近3年来付诸讨论的那些问题的各个方面向

① 《人道报》曾欢呼蒋介石是"上海公社的英雄",托洛茨基说。

我们提出挑战……唯有他才具有这样的辩才";然后他向这个他曾寄予最大希望的组织的执行委员会背转身来,"昂首阔步走出会场"。[①] 一直困扰俄共中央委员会的犹豫不决丝毫也没有让执行委员会为难——一点儿不错,执行委员会的裁决书是早已准备好了的!

正当这个节骨眼上,莫斯科的斗争导致了一场外交事件,激起了一阵国际骚动。自从英俄关系破裂以来,法苏关系也急剧恶化。法国政府和法国报界再一次弹起起所谓未还贷款的老调,这种叫嚣自从列宁政府宣布废除沙皇对外一切债务之后还是第一次听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断断续续地进行过讨论。1926年,托洛茨基主张安抚法国。那时英国正处于工业动荡的挣扎之中;中国革命正趋向高潮;法国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颠簸不定;而苏联地位稳固,这使他认为向法国人让步是可取的,可以消除那些小债主的不满。托洛茨基说,但是当时斯大林过分自信,听不进任何建议。1927年秋,当这些问题又被提出来时,斯大林又急于在某种程度上迎合法国的要求。然而这时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们却反对这样做。他指出,自从中国革命失败、英俄委员会破产、苏英关系破裂以后,苏联政府的地位已经虚弱得经不起让步了;在它这方面的任何让步都会被看做是进一步示弱的表现。

对于反对派来说,局面由于以下这个事实而更加复杂化了:担任大使的拉柯夫斯基正在巴黎进行谈判,成为法国人攻击的靶子。

① J.T.墨菲:《新地平线》第274-277页。墨菲回忆了开会前他在走廊上遇到托洛茨基的情景。"每个人都有自己厚厚的大衣和皮帽,会议大厅里衣帽架都已挂满了。托洛茨基环顾四周,……(墨菲的秘书)问道:'托洛茨基同志,需要我帮忙吗?'托洛茨基想也没有想就机敏地回答:'恐怕不需要吧!我正在寻找两样东西——忠诚的共产党员以及挂大衣的地方。但这里是找不到它们的。'"会议从下午9点30分一直开到次日早晨5点。

早在8月,法国驻莫斯科的使节就因拉柯夫斯基与托洛茨基反对派有联系而表达了法国政府的不满。[①] 另一方面,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上竭力嘲弄拉柯夫斯基,以此反对托洛茨基:他断言正是这个"忠实的反对派分子"拉柯夫斯基敦促莫斯科向法国投降。托洛茨基致信拉柯夫斯基,请他记住他在巴黎所起的作用已成了党内斗争的重大问题。[②] 拉柯夫斯基个人对反对派和托洛茨基是无比忠诚的,以至这个提醒使他十分惊愕。不过,还在收到此信之前他已经采取了一个步骤,造成当时外交界一场重大的风波。他在一份宣言上签字,号召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士兵在战争期间起来保卫苏联。在与资产阶级政府的外交关系方面"稳定"和"正常"的这几年,发出这样的革命呼吁是违反苏联外交的惯例的。法国报界舆论哗然。法国政府则宣布拉柯夫斯基为不受欢迎的人。法国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声明说,苏联政府应该更自觉地召回它不受约束的大使,因为一位反对派追随者在巴黎代表它无论如何是很不适宜的。

莫斯科的答复含糊其辞。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为他的大使辩护。但法国外交部有理由认为它对拉柯夫斯基的指责并非完全不为契切林的上级所欢迎。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在拉柯夫斯基的召回问题上玩弄外交游戏,苏联外交部必须直率地告诉白里安,不容许它干涉布尔什维克党的内部事务。但因法国政府已经宣布拉柯夫斯基为不受欢迎的人,莫斯科别无选择,只好把他召回。尽管拉柯夫斯基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但他对于外交工作已感到腻烦了,在间断了4年之后,他渴望重新投入国内斗争。托洛茨基也非常高兴老朋友回到自己身边。反对派从拉柯夫斯基被召回这一事

---

① 参见德格拉斯(编)的《苏联外交政策文件》第2卷第247－255页。

② 托洛茨基1927年9月30日致拉柯夫斯基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件中挽回了一定声誉；一位反对派领袖由于呼吁国际工人和士兵保卫苏联而遭到资产阶级政府的敌视，这件事有力地驳斥了有关反对派的失败主义以及"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联合战线"的无稽之谈。

斯大林意识到仅把罪名推到其政敌身上还是不够的，于是更加努力从正面加强他自己的威望。反对派在其纲领中重申一年前提出的那些要求，当时执政派假装要实现它。纲领要求给低工资工人增加工资、严格执行八小时工作日、给贫苦农民减轻赋税负担等等。纲领声称执政派许下的诺言连一个也没有兑现；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生活的穷困化反而变本加厉。为了回答这一点，斯大林迈出了惊人的一步：他宣布政府很快要实行 7 小时工作日和 5 天工作周，而工人领取的工资仍与以前一样。公布这一改革的时机是即将来临的十月革命 10 周年纪念日，政治局届时将以庄严的宣言形式向全国宣布，欢呼 7 小时工作日是迄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成就——是革命第一个 10 年的圆满总结。

这是纯粹的欺骗。苏联还十分穷困，它无力承受这种改革——即使 30 年之后它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工人仍然要每天工作 8 小时，每周工作 6 天。[①] 但斯大林不管这种办法在经济上有无可行性。他炮制这个耸人听闻的立法时事先并没有在工会、国家计划委员会甚至中央委员会里讨论过。布哈林派感到沮丧。领导工会的托姆斯基掩盖不住对这一惊人做法的不满。然而斯大

① 7 小时工作日和 5 天工作周名义上实施了 13 年左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政府下令又回到了正常工作周，回到了每日 8 小时工作制，这些规定强制保持了 20 年。只是从 1958 年开始，才逐步转到了 7 小时工作日（但仍没有实施 5 天工作周）。

林却无论如何要强行通过它;到了10月中旬,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列宁格勒召开特别会议,给予它正式和庄严的批准。

在10月15日会议上,在基洛夫提出正式报告后,托洛茨基当场揭穿了这个方案的欺骗性。他回忆说,当反对派要求适当增加工资时,这个要求竟被愤怒地看做是破坏国民经济资源的一种威胁而遭到否决。那么目前的经济状况怎能承受得了7小时工作制呢?反对派坚持认为,就连8小时工作制在国有工业中也难以认真执行——为什么斯大林却突然抛出这项堂皇的改革方案呢?如果给工人增加某些更低的但更实际的好处岂不是更诚实吗?用这种变戏法般的诡计庆祝十月革命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托洛茨基指出,在经过好几年准备才设计完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蓝图中丝毫没有缩短工作日的设想。他们在几年前订的计划就是以更长的工作日为基础的,他们怎能真正缩短工作日呢?托洛茨基得出结论,整个改革方案的唯一目的就是:在执政派与反对派作最后的较量时为前者增加筹码。

在这次争论中,理由、真理、诚实都在托洛茨基这一边;但是他们又马上让他掉进陷阱,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再没有什么比托洛茨基的抗议更中斯大林的下怀了。斯大林派成员成群结队地跑到工厂告诉工人托洛茨基最近对他们的侮辱。他们说,他要剥夺党恩赐给工人的福利,阻挠让每一个人都能看到社会主义曙光的划时代改革;他关于布尔什维克忠诚的那些漂亮话、他作为工人阶级捍卫者的那些姿态有什么用处呢?然而对托洛茨基的观点,工厂工人并不知道。头脑冷静的老工人也许能猜到它们,并且对斯大林这种可疑的恩赐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但大多数容易轻信受骗的工人群众为改革方案欢呼而讨厌批评者。反对派所争论的大多数问题远远超出了工人们的理解力:国民党、英俄委员会、不断革命论、热月政变、克列孟梭式的声明等等。反对派的语

言中唯一不深奥的是它改善工人命运的要求。这个要求曾经赢得了对反对派的广泛同情,尽管这种同情是消极的。但是现在,这种同情大部分都烟消云散了。在反对派的周围筑起了一堵冷漠而敌意的墙。

然而——在人们心里常常会强烈渴望"那只有一线微弱希望的事物"——恰恰在这样的时刻,一次奇特的事件给反对派领袖带来了安慰和鼓励。就在 7 小时工作日提交辩论的那次会议期间,在列宁格勒举行了一次庆祝胜利的官方游行。游行照例有隆重的的仪式和盛大的场面,党的领袖们检阅军队和群众游行队伍。然而在领袖行列中人们却看不到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或许是巧合,或许是有意安排,仿佛显示他们两人已经脱离官场。这时他们两人站在离政府官员的检阅台不远的一辆卡车上,而这里却是游行队伍接受检阅后出来时的必经之路。托洛茨基的背后正是塔夫利达宫,10 年前他就在这里怒斥克伦斯基,点燃首都工人的激情,鼓动他们去行动去造反。通过官方检阅台之后的游行队伍走近卡车时,人们认出了反对派的这两位领袖,停了一下,再往前走,又停了下来,默默注视着他们,向他们举手致意,挥舞着帽子、手帕,又往前走,终于停下来。卡车周围的人群越聚越多,交通阻塞了;而政府官员检阅台周围的场地上则空无一人。这仿佛是 1917 年群众热情的喝彩和欢呼的回声。其实,站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面前的群众尽管表现出明显的激动,但却是克制和胆怯的。他们的行为是含糊的。即使群众是想表达他们对反对派的同情,那么这次游行也只不过是一幕哑剧。它表达的只是群众对于失败者的尊敬和同情,绝没有同他们并肩战斗的意思。

但是反对派领袖们却误解了游行者的情绪。一位目击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这是一种沉默的、抑制的、骚动不安的欢呼。"但是"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却无限欣慰地把它作为力量的表现"。

他们在当天晚上说:“群众是与我们站在一起的。”[①] 但事件的后果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的重要性。主要是在但愿群众终于真的同他们站到了一起这种想法支配下,反对派领袖们决定3周后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时直接“向群众发出呼吁”。在另一方面,执政派却从群众的暧昧行动中感到了警告,他们意识到决不能拿人民的情绪去冒险。

斯大林当即转入进攻。10月23日,他再一次要求把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经过4个月之久,他已经粉碎了组成党的最高法庭的那些人心中的彷徨和抵制。他们终于准备执行他的命令了。但是恐惧和沮丧仍然缠住他们不放,并表现为诉讼过程中格外突出的神经质和狂暴。到处弥漫着病态的紧张气氛,就像在执行死刑中可感到的那样,刽子手及其帮凶看待他们的牺牲者时,既怀着深深的仇恨又怀着深深的敬畏,被有关其行为的正义性及其后果噬心的疑虑所折磨着。不管牺牲者说什么或做什么,都会在他们心里激起这些上升为狂怒的矛盾感情。他们全都坚信,如果他们要活着,牺牲者就得死;而且他们一想到可能随之而来的恐怖就不寒而栗。他们竭力想驱散自己心头的愧惧,就催促刽子手,要他们快点儿动手,自己也把无耻的辱骂和沉重的石头投向犯人。这就是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他们不时打断托洛茨基的最后申辩,爆发出仇恨的和粗俗的辱骂。他们塞住耳朵不听他的答辩,并且催促主席阻止他讲话。在托洛茨基发言时,墨水瓶、笨重的书册和玻璃杯从主席台向他头上飞来。雅罗斯拉夫斯基、什维尔尼克、乌克兰主席彼得罗夫斯基和其

① 维克多·塞尔日:《一位革命者的回忆》第239页。托洛茨基在他的《我的生平》中对同样情景也作了详细描述,参见该书第2卷第278页。这描述似乎反映了他最初看待游行时所怀着的某种希望。

他人大声煽动斯大林,怂恿他将这项工作进行下去。威胁、嘲笑、咒骂没完没了,使这次大会看起来就像是一次魔鬼的聚会。[1]

在执政派当中只有斯大林讲话时沉着自制、粗暴而又冷酷,没有丝毫愧疚。他列举了人们早已熟知的一长串罪状;他的讲话——正是在这次讲话中他为利用奸细(弗兰格尔军官)反对党员一事进行辩护——即使对他本人来说也是犬儒主义的杰作了。[2] 唯有托洛茨基一人在讲话时同样地沉着自制。他的声音超越了在他离开之前对他最后一次挑战的那种狂谵错乱。他警告各派说,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所有的反对派;而且,在一片嘲笑叫骂声中他预言将有一系列血腥清洗,说其中不仅他自己的支持者,而且多数布哈林分子甚至斯大林分子都将遭到灭顶之灾。他还表达了充满希望的自信,即斯大林的胜利是短命的,而斯大林体制将会突然垮台,彻底崩溃。他说,眼前的胜利者过分依赖暴力。当然,布尔什维克取得"巨大的成就"也是依靠暴力实现的,它打败了全都是站在过时的或反动的事业一边的旧统治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但是他们不可能用这种办法摧毁维护历史进步的反对派。"开除我们——你们仍然不能阻止我们的胜利。"这就是党的最高委员会从托洛茨基口中听到的最后的话。

※ ※ ※ ※ ※

接着是几个星期的紧张活动。反对派一直在为其纲领征集签名者,希望以支持者的数量影响党的舆论。季诺维也夫坚信,他们

---

① 第二天托洛茨基在致中央书记处的信中抗议正式记录中没有完整地记下他的讲话原文,并抗议对当时的所有情景都略而不记,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48-177页。

可征集到20000或30000个签名,斯大林面对如此大量支持的证据也许会停止进一步的报复,而反对派甚至可以东山再起。反对派领袖们决定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向群众呼吁";这种想法自从列宁格勒游行以来就吸引着他们了。但是采取什么样的呼吁形式,却颇费斟酌。呼吁的目的在于使群众了解反对派的要求,并鼓动群众反对官方领导,但又不给后者攻击反对派破坏党的纪律的口实。这两件事差不多是无法同时做到的;反对派夜以继日地进行讨论,准备去迎接实力的检验。

托洛茨基跟他的同志们一样,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郊区贫寒工人家里度过,犹如他还是一个年轻的、不出名的革命者时所做的一样;他争论着,解释着原则和观点,并对热烈而急不可耐的各支持者小组加以指导。他这时跟热月政变前夕的罗伯斯庇尔已经判若两人,而他曾将自己比做罗伯斯庇尔。在他身上仿佛混合了两种不同的性格——丹东与巴贝夫。但此刻他更像被追捕密谋平等会的的领袖巴贝夫。他呼唤着革命的再生,蔑视着新的利维坦国家的那些缔造者;但历史潮流却像当年反对巴贝夫一样凶猛地反对他。

(维克多·塞尔日这样描述一次典型的集会)大约50个人挤在一间简陋的餐厅里,听着季诺维也夫说话,他已经发福了,脸色苍白,头发蓬松,说话声音低沉;在他周围笼罩着某种软弱而又感伤的气氛……桌子另一头坐着托洛茨基,我们都看着他:他上了年纪,头发灰白,身材高大,脊背微驼,外貌惹人注目,态度和蔼可亲,始终能找到正确的回答。一位女工盘腿坐在地板上,突然问他:"如果我们被开除出党怎么办?"托洛茨基回答说:"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一个共产主义无产者成为共产党员。""也没

有任何力量真能割断我们同自己的党的关系。"季诺维也夫半带笑容地解释道,我们正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在党周围,许多被开除的和半被开除的人们要比挂着布尔什维克之名的党委书记更值得尊敬。这真是纯朴动人的一幕: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那些人,昨天还是强大的,今天就这样转到了贫民区,与工人们推心置腹地谈话,寻找支持,寻找自己的同志。楼梯的外面,志愿者在站岗放哨,瞭望着来往通路和出入口,因为格别乌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袭击我们。

有一次在一幢破败寒酸的住宅里举行会议,当我陪同托洛茨基离开会场走在街上时,列夫·达维多维奇高高竖起衣领,把帽子压到眼睛上,不让人认出他来。此刻,他像一位老知识分子,经过 20 年的风风雨雨仍然坚贞不屈。我们走近一个车夫。列夫·达维多维奇对我说:"请你向车夫讨个便宜价格吧,我身上钱不多了。"这车夫是留着胡子的老式农民,凑近他说:"您不用付钱,快上来吧,同志。您不是托洛茨基吗?"帽子遮不住这位曾在斯维亚日斯克、喀山、普尔科沃和察里津战斗过的人。托洛茨基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而又欢乐的笑意:"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谁都知道车夫属于小资产阶级,他的好意只会使我们倒霉。"①

当他对盘腿坐在地板上的女工说"没有任何力量真能割断我们同自己的党的关系"时,托洛茨基并不是在对她进行空洞的安慰。他与季诺维也夫一样考虑到了大规模开除的可能,然而他仍

① 维克多·塞尔日:《阴暗的转折》第 113 - 114 页。

然抱有一线希望,认为这只不过是有益健康的一次休克;党的良知将被唤起;人民将希望见到反对派纲领,以便亲自看看反对派拥护的是什么;到那时,反对派曾经多次徒劳地要求的大争论将从此能够展开了。他设想斯大林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成千上万的党员都被当做反革命分子而开除出党,他们也将免不了被投进监狱。这必然会"使党震惊",并使它意识到这样的镇压行动很可能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终结"。确实,当时许多斯大林派成员和布哈林派成员一想到自己将成为自己同志和战友的迫害者和狱卒就感到不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不得不向他们保证说,事情不会闹到这个地步,而且也没有大规模开除的必要,因为政治局会控制住反对派,在不太晚的时候就让它刹车投降。12 月 2 日,托洛茨基引用这些保证向反对派呼吁:要一如既往地采取攻势——唯有那时,当广大的斯大林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看清他们领袖的自吹自擂都不过是欺骗时,才会挺身而出制止迫害,并迫使迫害者畏惧和投降。[1] 然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自吹自擂并非毫无根据:他们抓住了反对派的弱点,并且预见到在关键时刻至少季诺维也夫派会动摇。同时,所谓不必大规模开除的保证也平息了不安和惊慌,使党消极地等待事变并因此与即将到来的事实妥协。

另一方面,对反对派指控和威胁的浪潮也阻碍了反对派的努力。很少有人敢在日复一日地被谴责为颠覆性文件的纲领上签名。与季诺维也夫所希望的 20000 到 30000 个签名相反,反对派好不容易才征集到最多 5000 - 6000 个签名。[2] 由于担心可能给签

---

① 托洛茨基档案。

② 这个数字是反对派提供的。维克多·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 243 页。斯大林派的资料称反对派征集到 4000 个签名者。按斯大林派历史学家 H.波波夫的说法,在代表大会选举中,反对派在总数 725000 票中只得到 6000 票。《苏共党史纲要》第 2 卷第 323 页。

名者带来严重后果,因此,为了保护他们的支持者,反对派领袖只披露了几百个姓名。围绕纲领的这场运动就这样再次显示了反对派的弱点。

※　※　※　※　※

借用谢多娃的话来说,托洛茨基这时"疲劳过度,精神紧张,健康恶化,经常发烧、失眠"。他对敌人横眉冷对,而对同志他则是自我控制和英雄气概的典范。但在家庭生活中,人的固有脆弱性却占了上风。他徒劳地同失眠斗争,药物毫无用处。他越来越频繁地抱怨头痛与眩晕。他消沉,厌倦。他的敏锐感受力常因从四面八方像洪水般涌来的大量恶毒诽谤而迟钝。他的妻子写道:"早饭时,我们会看见他翻开报纸,……瞥了一眼又无动于衷地扔到桌上。所有报纸上登的全都是荒诞无稽的谎言,最明显不过的歪曲,最不堪入耳的咒骂,骇人听闻的威胁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狂热地、奴性十足地重复着同样无耻谎言的电报,……'他们对革命,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都干了些什么事啊!'"[①]

托洛茨基最亲近的人与他一道喝干了这杯失败的苦酒。由于紧张并且期待着最不幸的事到来,全家人都患上了失眠症,在多少个不眠之夜等待着第二天的打击——但当天色破晓,朋友们进来时,大家又都露出坚毅的表情,继续斗争下去。谢多娃本人并不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她在博物馆和艺术画廊的四墙之内比置身于那些雄辩的、足智多谋的、斗志昂扬的党员中要更为轻松自如;但在女性的爱心和忠贞的驱动下,她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残酷的戏剧。她抛弃了个人兴趣,与丈夫形影相随;全心全意地以

---

① 《托洛茨基的生与死》第180-181页。

丈夫的生活为生活，想丈夫之所想，为丈夫的愤怒而震惊，为丈夫的苦恼和焦虑而战栗。

他们的大儿子廖瓦现在21岁，在他父亲的高尚精神熏陶下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还将这样地度过他短暂一生的其余岁月。作为托洛茨基的儿子，分享父亲的思想，沿着父亲的足迹前进，这不仅对于少年廖瓦而且对于青年廖瓦都是最大幸福的源泉。他还未到法定年龄就虚报岁数加入了共青团，而且还想办法参加了红军。他离开父母在克里姆林宫的家，住进公寓里，生活在那些忍饥挨饿、衣衫褴褛的工人和学生中；反对派刚一成立他就加入了。现在他看到共青团在挑唆下转而反对托洛茨基，这对他真是一种痛苦的经验，而不久前，他的父亲对于共青团员来说还是一位活生生的传奇人物和鼓舞者。既出于孝心，也出于革命激情，他憎恨那些被父亲斥之为被权力腐蚀了的官僚分子。他多年来一直参加争论，组织反对派小组，在党支部中穿梭式地发表演说，并且跟一些公认的反对派领袖，如皮达可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起到外州甚至远至乌拉尔斯克州的集会上并肩讲话。蓬勃的朝气使他充满了乐观与自信；但是在最近几个星期里，目睹不断滋长的苦难和暴力，他对父亲的生命忧心如焚，因此他作为助手和保镖须臾不离父亲左右，随时准备扑过去扼住袭击者的喉咙。

谢尔盖比廖瓦小两岁，他跟廖瓦不一样，在整个少年时代就开始反抗父母的权威，拒绝托庇于父母的伟大阴影里。他的叛逆形式就是厌恶政治。他不参加共青团，对党内事务漠不关心，跟反对派毫不沾边。他强健、勇敢、喜欢冒险，或者如他的父亲和哥哥所想象的——思想轻浮，整日沉溺于娱乐、运动和艺术爱好之中。他迷恋上了马戏（它在当时的俄国正渴望获得作为一门艺术所应享有的尊严），他似乎还被马戏团的一个姑娘迷住了，因此离开了克里姆林宫的家，随同一个马戏表演剧团过了一两年。经过一段放

浪不羁的生活之后,这位浪子终于回家了。但他仍然坚持他的独立,怀疑政治,却热衷于数学和科学,在这两个领域里,他跟父亲在相同年龄时一样也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然而,一种新的情感开始打破他与父亲和政治之间的对立。这个年轻人被父母的勇敢和牺牲精神所感动,并为父亲及其志同道合者的遭遇所激怒,因而焦虑地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和危险。

这个家庭的另一支系,即起源于托洛茨基第一次婚姻的那一支系,现在也深深地卷了进来。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虽然年纪不轻,但信念坚定,仍然如同她在 19 世纪 90 年代在尼古拉耶夫作为唯一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毫不畏惧地向一切人宣布她的信念,仍然是列宁格勒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核心人物。她的两个女儿季娜和尼娜都已 20 多岁了,住在莫斯科,而且都是热心的反对派成员。她们两人作为她们爸爸的女儿,如同 1917 年看到他处于上升期时一样感到紧张激动,也感到心碎欲裂。两个女儿都已经结婚,各有两个孩子;各自的丈夫都是积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而且都已丧失了工作和生计,被开除或将被开除出党并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了。这两位妇女陷入了贫穷、无援之境,并为孩子、丈夫、父母而心力交瘁,都得了肺结核病,她们注定是被毁灭的托洛茨基所有子女的同一悲剧命运的第一批牺牲者。

※ ※ ※ ※ ※

当十月革命 10 周年纪念日到来时,反对派已作好准备向“群众呼吁”。它指示它的支持者参加 11 月 7 日官方的庆祝大会,但是要以这样的方式,即让反对派的观点和要求引起挤满街头广场的千百万群众的注意。这里没有丝毫煽动叛乱甚至违抗的迹象。反对派成员所要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以密集的队形和醒目的组织行

进在官方的游行队伍中间,打出自己的旗帜,喊出自己的口号。这些口号表面上没有任何挑战的意思,其中针对执政派的口号都以暗示形式出现,唯有政治上最敏感的旁观者才能从中区分出反对派口号与执政派口号的不同。

"为反对富农、耐普曼和官僚集团而罢工!""打倒机会主义!""执行列宁遗嘱!""防止党的分裂!""捍卫布尔什维克党的团结!"——这就是反对派的口号。制订这些口号的目的只是要引起党员群众以及那些密切并同情地关注着布尔什维克党内政策动向的局外人的注意。因此,人们不能认真地把反对派的行动说成是真正的"向群众呼吁"——它在本质上是向党呼吁。但由于他们被驱逐出党,禁止他们接触基层支部,他们只好从党外、在全世界和全国人民眼前发出呼吁了。这次行动的弱点就在于此。反对派试图公开抗议官方的党务活动,同时表明它的自我纪律约束和对党的忠诚。但这个抗议从它提出的那一刻起就几乎不可能被听到;它的自我纪律约束的表现没有效果。按照对党纪的教条主义的严格解释——公开反对党的领袖的游行示威就构成破坏党纪的行为,不能指望斯大林会作出另外的解释。一句话,反对派既走得太远了,但又走得不够远。而它的态度和它的处境就是这样:它只能走到它现在这么远,并且无法走得更远了。

11 月 7 日使反对派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这对斯大林倒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他已严令:任何示威企图一旦露头就立即镇压下去,不管它如何无害。在他看来,这样的企图不可能是无害的,倘若这次他的政敌成功了,那就很难说他们是否迟早会唤起那些犹豫、不满而又胆怯的群众。斯大林明白,即使他马上就要登上峰顶,也仍有可能滑下去而丧失一切;他也明白,尽管他已经给了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但只要留给他们一点儿行动自由,他们仍然可能推翻他。因此,在 11 月 7 日,一队队拥护执政派的积极分子和

警察扑向凡是企图打出旗帜、高举托洛茨基或季诺维也夫的画像或者喊出未经批准的口号的反对派群体。反对派的队伍被驱散,遭到凌辱与殴打。他们赤手空拳地试图自卫,重新集合,继续游行。街头和广场大乱,到处是一片混战和警察的袭击,人群聚而又散,直到参加节日纪念会的无数旁观者中最缺乏政治头脑的人也意识到,他或她正目睹一场严重的危机事件,党内斗争已从支部转移到了街头,现在争论者在某种意义上呼唤着一切人的支持。的确,镇压把反对派的行动转变为类似向广大群众呼吁的行动,把它笼罩在丑恶的气氛中,使它显得是一场半暴乱。

维克多·塞尔日给我们留下了对列宁格勒那些日子的生动描写。[①] 自从 10 月 15 日以来,反对派对列宁格勒人满怀希望,季诺维也夫跑到那儿去,坚信会得到他们的响应。但是 10 月 15 日事件已引起当地党机关的警觉,因而他们早有提防。反对派各小组一开始是同所有其他游行者一起行进通过官方领导人检阅台的;接着打出了自己的旗帜和标语,但没有引起注意。然后,警察悄悄包围了反对派,并把他们隔绝开来。塞尔日叙述了他本人当时的经历:他因警察设置的障碍而无法加入到游行行列中而只好停下来望着工人队伍举着红旗向市中心走去。那些执政派的积极分子不时转向行进中的男女工人的方向,高呼口号。男女工人们对此无动于衷。塞尔日向游行队伍走近几步,呼喊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万岁!"或者类似的口号。但游行者的唯一回答是异乎寻常的沉默。于是一个积极分子醒过神来,以充满威胁和激怒的声调回喊道:"把他们扔进垃圾箱!"行进中的工人们仍然默不作声。塞尔日感到自己暴露了并"将被撕成碎片"。突然一片空寂笼罩了他——他发现他正孤零零地面对着游行队伍,只有一个妇女和一个

① 塞尔日:《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 246－247 页。

儿童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在这空寂中,一个学生向他冲过来,凑近他耳边低声说:"我们走吧!情况也许会变得更糟。我和您一块走,这样别人就不会从背后袭击您。"

在城市的另一个地方,埃尔米塔日外面,"几百个反对派成员情绪高涨地与民兵扭打在一起"。一个身着军服的高个子——他是列宁格勒前格别乌的首脑巴卡耶夫——率领着一股"人浪"对抗着前来阻挠他们的骑警。"人浪"每一次被击退,就又一次卷土重来。在另一个地方,一群工人跟在一个矮胖墩实的男人后面进攻骑警。这个矮胖子把一个警察从马鞍上拖下来,把他打倒在地,然后又把他扶起来,以"指挥官惯用的"威严口吻大声向他喊道:"你们应该感到害臊。你们应该为攻击列宁格勒的工人而感到害臊。"这个发泄着同志式怒火的人是拉舍维奇,前副军事人民委员,"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类似的混战出现在全城各处,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一群群旁观者"惊呆了,默默地"目睹着这一切。晚上在反对派召开的会议上,塞尔日又见到了巴卡耶夫和拉舍维奇——他们穿着撕碎的军服来讨论白天发生的事件。

莫斯科的骚乱和斗争远不像那般"情绪高涨"和"同志式的"。一队队积极分子和警察冷酷无情地、十分残暴地进行着攻击。全城处于紧张的危机中,一片恐慌。"在纪念日前夕谣言纷起,说什么聚集在红场准备一年一度的阅兵典礼的军队将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斯大林。一些大胆的红军官兵将高喊'打倒斯大林',而其他人则响应这口号。"① 一位目击者这样写道,但他也极想从官方渠道探听这些谣言。这位作者指出,根本没有这样的事。起初,一队队反对派从各处向列宁陵墓行进,奋力打出几面旗帜,但还没等他们到达红场,积极分子和警察就把他们包围起来,撕碎他们的旗帜,

① 路易·费舍:《人与政治》第92页。

强迫他们同官方游行队伍一起前进。就这样,反对派在对立者的裹挟下难堪地沉默着,与游行队伍中其他部分踏着同一步伐通过聚集在红场上的官方领袖和外国来宾的面前。唯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形成了一条蜿蜒的长龙。他们走到红场中心,把托洛茨基的宣言书撒向空中。”红场外的反对派成员被从普通群众行列中撵出来,受到警棍的殴打,被驱散或被逮捕。在许多地方,反对派在飘扬着红旗的窗口外挂出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肖像。但是这些肖像都被扯了下来,挂出肖像的人遭到虐待。在苏维埃大厦里,刚从哈巴罗夫斯克回来的斯米尔加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肖像装饰起他的阳台,并贴出“要执行列宁遗嘱!”的标语。一群暴徒闯进他的家,撕碎肖像和旗帜,捣毁他的住宅,并对他横加侮辱;而 10 年前,正是这个人率领波罗的海舰队驶入彼得格勒的涅瓦河,参加了十月起义——而他的罪名就是挂出这次起义的领袖肖像。此外还有谢多娃,她置身于游行者中间,也遭到了殴打。

托洛茨基在加米涅夫和穆拉洛夫陪同下,这一天乘车巡视全市。车到革命广场时,他停下来想对正向列宁陵墓前进的一队工人发表长篇演讲,警察和积极分子马上就向他冲过来。响起了一阵枪声。响起了一片喊声:“打倒犹太佬、卖国贼托洛茨基!”汽车的挡风玻璃被打得粉碎。行进队伍惊恐地注视着这一幕,但仍然继续前进。

聚集在节日街头的群众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谁也不知道,谁也猜不到。他们驯服地沿着指定的路线前进,喊着指定的口号,机械地服从着指定的纪律,既没有流露出他们的真实想法,也没有一点儿本能情感的迸发。他们跟 1917 年那些饥肠辘辘、举止粗鲁、心肠火热、慷慨无私、热情洋溢而醉醺醺的群众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当前各城市的情景与今天要纪念的 10 年前革命情景之间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领袖们的命运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

照！10年前，只要托洛茨基一声令下，两首都的工人就甘心献出他们的生命。而今天他说话时，他们甚至连头也不肯转过去。10年前，当托洛茨基看到马尔托夫带领孟什维克退出苏维埃时曾豪迈地向他喊道："滚吧，滚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吧！"布尔什维克雷鸣般的掌声淹没了他的声音。而今，当一位反对派成员试图称颂托洛茨基这个名字时，"把他扔进垃圾箱！"——这些话就像嘲弄的回音在列宁格勒广场上回响着。反对派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历史的车轮向后倒转了，或者被打碎了吗？难道这就是俄罗斯的热月吗？

这些问题也同样在托洛茨基的脑海里盘旋。他看到有这么多曾经领导过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人现在仍然与他站在一条战线上。倘若断言他和他们的失败和屈辱没有更深刻的历史意义，不标志着革命"走下坡路"，也不标志着他几个月前在中央委员会所谈到的革命发展的"第二阶段"，那似乎就太荒谬了。但是他也看到，尽管革命的景象——它的气候与色调——发生了变化，但它本来的总轮廓却像过去一样鲜明突出，一样不可动摇和改变。统治这个共和国的仍然是反对派将永远忠于的布尔什维克党。他仍然将这个共和国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尽管出现了"官僚集团的堕落"；而且他仍然坚决使自己和反对派跟所有那些人——他们诬蔑这个共和国是由一个跟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断绝关系的新阶级统治着的新的警察国家——划清界限。他不认为官僚集团就是新的剥削阶级——他只把官僚集团看成是工人阶级躯体上的一块"毒瘤"。在所有的地方，布尔什维克所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仍然完整无损。富农和耐普曼还没有胜利。第一个工人国家与世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并没有减弱，尽管还没有表现为任何军事冲突。变化是如此之大，但是又是如此之小。就好像一场飓风席卷舞台，把所有的演员抛向相反的方向，改变它所能改变的一切，忽左忽右地摇

撼着舞台,但是舞台的框架却依然岿然不动,坚如磐石。这不可能就是末日——飓风真的就是地震的预兆吗?托洛茨基得出结论,11 月 7 日"这还不是苏联的热月政变",但肯定是"热月政变的前夜"。①

塞尔日写道:11 月 7 日晚,列宁格勒的反对派成员开会时能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倔强地反复说:"豁出去了,我们只有继续战斗下去。"另一种声音苦恼地问:"我们将反对谁呢?反对自己的人民吗?"凡是反对派聚会时都能听到这两种同样的声音。照例是托洛茨基派主张继续战斗下去,而季诺维也夫派又提出那个苦恼的问题。季诺维也夫从列宁格勒回来时垂头丧气;他和加米涅夫开始为"向人民呼吁"的倒霉尝试而后悔,而他们原先对此曾是那样充满信心。托洛茨基则毫不后悔,认为反对派做了它必须做的事;他一再说:不管怎样,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在那命定的第二天,托洛茨基要求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正式调查那场事件;而且他仍然抱着一种相当乐观的看法。他告诉他的追随者说,示威游行的结局并不是那样糟糕:反对派在它的旗帜上写上"捍卫布尔什维克党的团结"的口号,因而表明了它的立场,终于把斯大林据以谋私的这个口号从他那里夺了过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回答说,11 月 7 日把他们带到了分裂的边缘,如果反对派希望捍卫布尔什维克党的团结一致,它就必须后退。

他们为下一步怎么办争论了好几天。托洛茨基很快又放弃了关于 11 月 7 日结局的看法。在他写下他为反对派把"团结一致的口号"从斯大林手里夺过来而感到满意这话之后过了 5 天,他又指出"现在谈团结一致为时已晚",因为党的机关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热月政变力量的工具",为了富农和耐普曼的利益而

① 参见托洛茨基的《纪念日的分析》一文,写于 11 月 8 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一心要把反对派驱逐出去。[1]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谈到斯大林政策重心的转移,说他已经转而反对富农与耐普曼了。不管怎样,他们两人不同意"现在谈团结一致为时已晚"。

11月14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非常会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他们的罪名是: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煽动叛乱。[2] 拉科夫斯基、加米涅夫、斯米尔加、叶多基莫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巴卡耶夫、穆拉洛夫等人被开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百上千的反对派成员被撵出了党的基层支部。此后,在若干月和若干年之内,党内各派别或者是动摇不定或者是重新组合,有的前进,有的后退,并且继续彼此对抗,总之,党的分裂已经造成。

※　※　※　※　※

11月7日晚上,托洛茨基回到家中告诉家人说:他们必须搬出克里姆林宫。他自己当即就搬了出来:他感到住在克里姆林宫外比较安全,搬到执政派住宅以外的地方就更安全了。他临时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3号别洛博罗多夫的家借用了一间小屋子,别洛博罗多夫属于反对派,还担任着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18年时就是他下令在叶卡捷琳堡处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托洛茨基的踪迹消失了几天。执政派多少有点儿惊慌失措,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是否转移到地下去了。其实他根本没有这种打算,因为像他这样一个遐迩闻名的人是不可能藏起来的。他在被开除

---

① 参见托洛茨基11月13日"札记",托洛茨基档案。

② 托洛茨基档案;《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368－370页。

出党的当天,就把新住址通知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他在名义上仍是它的成员。[1] 他主动离开克里姆林宫使自己免掉了一番凌辱:11月16日,其他反对派领袖全都被逐出了克里姆林宫。一位朋友描述了他们被逐出克里姆林宫时的狼狈情景。季诺维也夫离开时只在腋下挟着列宁逝世时遗容的蜡制模型,这模型是这样沮丧消沉,以至审查当局从来不允许出版它的复制品,于是它就成了季诺维也夫的个人财产。然后是加米涅夫搬出来,他的年龄刚过40,却突然变得白发苍苍,看起来就像一个"有一双明亮眼睛的温文尔雅的老人"。拉狄克在捆扎他的书籍,想把它们卖了;他从中抽出几卷德国诗集送给他周围的那些人作纪念品,一边不无自嘲地嘀咕着:"我们真是一群傻瓜!我们穷得身无分文,而我们本来是能准备好一笔可观的战备基金的。没有钱就要了我们的命。我们有着出名的革命忠诚,却只是优柔寡断不中用的知识分子……。"[2]

同时,另一个人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离去。11月16日夜晚,一声左轮枪响撕破了克里姆林宫上空的沉静。阿道夫·阿勃拉莫维奇·越飞自杀了。他留给托洛茨基一封信,解释说这是他唯一可以采取的方式,他以此抗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以此表达他对党麻木无情地接受这件事的痛恨。从1910年起他就是托洛茨基的学生和朋友,那时他还是一个神经质的学生,帮助托洛茨基编辑维也纳《真理报》。1917年,他与托洛茨基一起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并在十月起义时期成为中央委员。他心地宽厚,和蔼可亲,语调柔和,却是十月起义最坚定的拥护者和组织者之

---

① 他还通知执行委员会说: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因病不能立刻搬出,但他们在几天之内必定搬出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 塞尔日:《阴暗的转折点》第140页。

一。他很快就成了一位了不起的布尔什维克外交家。他率领第一个苏俄代表团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是苏维埃第一任驻柏林大使;1921年,他签署了同波兰的和平条约,一年以后,又签署了列宁—孙逸仙友好条约;他还先后出任苏联驻维也纳和东京的全权代表。1927年初,他从东京回来,患了严重的结核病和多种神经炎,后来被任命为托洛茨基在租让委员会中的代表。莫斯科的医生对他的病束手无策,催促他到国外去就医。托洛茨基为他向卫生人民委员和政治局交涉,① 但政治局拒绝送他到国外去,理由是医疗费用太贵——约共1000美元。有一位美国出版商刚提出要用20000美元购买越飞的回忆录;而越飞要求允许他自费出国就医。但是斯大林禁止他发表回忆录,拒不发给出境许可证,剥夺了他的一切医疗帮助,用种种麻烦的事来折磨他。由于长期卧床不起、痛苦不堪、穷困潦倒,尤其是由于反对派所遭受的野蛮攻击对他的精神刺激,他开枪打穿了自己的脑袋。②

越飞的遗书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表明了他对托洛茨基的态度,而且作为人性的和政治的文件以及革命家的道德宣言同样是无与伦比的。

越飞在遗书的开头首先为他的自杀辩解,这种行为一般是要受到革命伦理学的谴责的。他回忆道,他在年轻时就曾反对倍倍尔而替马克思的女婿女儿保罗·拉法格、劳拉·拉法格辩护,他们夫妇就是因为年迈体衰再也不能作为一名革命战士而自杀的。

---

① 托洛茨基致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科的信(1927年1月20日)和政治局的信均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 甚至就在越飞写这封致托洛茨基的信时他的妻子还跑来告诉他,政治局已经拒绝了允许他出国一两个月的最后请求。

> 我毕生坚信,一个革命的政治家必须懂得什么时候应该离开人世,必须懂得及时离开人世……当他一旦明白对所献身的事业不再有用的时候。30多年来我一直怀有这种看法,即人的生命只有在为永恒的事业服务中度过才有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人类是永恒的。为任何有限的事业服务——而且其他一切也都是有限的——生命就是没有意义的。即使人类生命迟早会有终止的时候,但这无论如何是发生在非常遥远的未来,我们仍然可以把人类看做是绝对永恒的。假如一个人跟我一样相信进步,那么他就可以承认,当我们星球毁灭的时候,人类早已找到了移民定居在别的更年轻的星球上的办法了。……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人类利益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将在某种程度上留传到未来的世纪;我们的存在就是通过这个途径获得它可能拥有的唯一意义。

越飞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和无神论的精神表达了自古以来人类对不朽——人类及其天才的不朽——的渴望后,继续写道,27年来,他的生命已经显示出充分的意义:他为社会主义而生;他没有浪费过哪怕一天的生命,即使在监狱中他也充分利用每一天进行学习,准备未来的战斗。但现在他的生命已经毫无意义了;他的责任就是离开人世。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以及党对此麻木不仁是对他的最后打击。倘若他身体健康,他一定站在反对派行列中继续斗争下去。但是,也许他的自杀"与你们被开除出党相比只是小事一桩"(而且是"对那些人的一种抗议姿态,他们使党陷于如此境地,使它不能对这类畸形事物作出任何反应"。)——也许他的自杀有助于唤醒党注意热月政变的危险。他担心党觉醒的时刻尚未到来——然而他的死毕竟要比他的生更有用。

越飞极为谦虚地回忆了他跟托洛茨基的长期友谊和共同工作,请求原谅他"借此悲剧发生之际"告诉托洛茨基他所看到的托洛茨基的弱点所在。他早就想告诉他这一点了,但总下不了决心。他从未怀疑过托洛茨基从1905年以来在政治上一直是正确的。他曾听到列宁亲口说起这一点,列宁还承认,在当年争论不断革命论时,对的不是列宁自己,而是托洛茨基。"人之将死,其言也真,现在我再一次重提这件事。"[1]"但我总觉得您缺少列宁那种在原则问题上不屈不挠、寸步不让的精神。只要列宁认定是正确的路线,即使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也要坚持下去。但是您往往为了满足您所过高评价的协议、妥协的需要而放弃您的正确立场。"因此,在他的最后遗言中,他希望托洛茨基能在自己身上找到那股"百折不挠的力量",这力量将有助于他们的共同事业取得最后的胜利,哪怕这胜利会被拖延。

这番批评发自一位临终友人心底的忠诚和热爱,不能不使托洛茨基深受感动;在他的余生中,他将几乎完全孤军奋战,"百折不挠,坚定不移"。但是,越飞的自杀在政治上并没有产生丝毫作用。他的信没有公布——格别乌甚至曾想把这封信瞒过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几乎是把信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越飞自杀这件事在反对派队伍里引起了消极情绪;它被看做是一桩绝望的行为。托洛茨基担心越飞的例子会有传染性。自1923年反对派失败后,它的好几个支持者已经付出了生命——尤金·博什,乌克兰内战时期的传奇式女英雄;卢托维诺夫,杰出的工会工作者和工人反对派中的老战士;格拉兹曼,托洛茨基的一位秘书。值此反对派正遭到空前

---

① 托洛茨基在自传里写道,越飞多次打算公布他同列宁的谈话和列宁的自责,但托洛茨基劝阻了他,因为他唯恐越飞会遭到攻击,那将会完全毁了他的健康。越飞的这封信证实了这一点。信的全文存放在托洛茨基档案中。

残酷的打击并且看不清前途的时候,此事更可能引发一场惊慌。只是当越飞的信在反对派内部流传开后,他当初意欲赋予他自杀的那种意义才更为人们所理解;这件事也就被看做是忠诚而不是绝望的行为了。①

11月19日,以托洛茨基、拉柯夫斯基和伊万·斯米尔诺夫为前导的长长的送葬行伍护送着越飞的灵柩,穿过莫斯科的大街和广场向市郊新圣母修道院的墓地进发。这天恰好是普通工作日的午后——当局有意将葬礼安排在这个时候,以便不引人注意;但是好几千人加入到送葬行列中,唱着挽歌和革命歌曲行进。中央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同反对派混在一起——他们急于掩盖丑闻,只得前来向他们死去了的敌人表示官方的悼念。当送葬队伍到达新圣母修道院(彼得大帝就把他的姐姐索菲娅软禁在这里,并下令把她数百个亲信杀死在牢房的窗户下面)时,警察和格别乌竭力要将送葬队伍挡在墓地外面。人群强行闯进了墓地小径,并聚集在公墓四周。他们对站出来致辞的官方代表报以愤怒的低声抗议。接着是托洛茨基和拉柯夫斯基讲话。托洛茨基说:"越飞离开我们了,并不是因为他不想战斗下去了,而是因为他已经没有战斗下去的体力了。他害怕使自己成为那些进行斗争的人们的负担。他的一生——并非他的自杀——为后来的人树立了一个榜样。斗争还在继续。人人都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谁也不得离开。"

这次集会是在被俄国可怕的历史幽灵缠住的墓地举行的;这是反对派最后一次公开集会和示威。这也是托洛茨基在俄国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他那在墓地上回响、号召勇敢斗争的声音也是

① 根据越飞的授权,托洛茨基在散发的传阅文本中删去了对反对派当前前途表现出一定的悲观主义的一些段落。

他最后一次公开演说。①

※　※　※　※　※

"人人都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谁也不得离开！"——在最艰难的内战岁月里，这样的话多少次出现在托洛茨基的军令里；这样的话多少次使那溃不成军、士气低落的师团重新投入战斗，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而现在这些话已经失去了威力。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正在"离开自己的岗位"，并已绝望地筹划撤退的后路了。还在越飞葬礼的前夕，莫斯科就盛传着他们要向斯大林投降的流言蜚语。在标明写于11月18日的笔记里，托洛茨基否定了这些谣传，声明说斯大林抛出这些谣言是为了造成反对派的混乱。托洛茨基再一次坚持认为，镇压只会有利于反对派；他警告他的追随者，他们必须继续将自己看做是党的一员，哪怕开除和坐牢也不能成为他们另组新党的理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回答说，如若反对派接受开除，那就不可避免地，甚至不以它的意志为转移地将自己组成一个新党了。因此，他们必须不惜一切地达到撤销开除的目的。他们说："列夫·达维多维奇，我们必须具有投降勇气的时刻来到了。"托洛茨基回答："如果这种勇气——投降的勇气就是所需要的一切，那么现在世界革命早就胜利了。"②但不管怎样，他们仍然同意给即将于12月初召开的代表大会递交

① 悼念越飞的演说和讣告均存于托洛茨基档案。目睹了这一幕的路易·菲舍写道，葬礼结束后，"所有的人都涌向托洛茨基，向他欢呼。他呼吁群众各自回家，但他们不肯走，托洛茨基久久不能离开墓地。最后，一批年轻人手臂挽着手臂相向而立，组成两堵人墙，留下一条狭窄的走廊，好让托洛茨基走向出口。"但是簇拥的人群挤进了那条走廊，而这时托洛茨基独自一人墓地的一个小棚里等待着；"……他没有一刻静静地站着，而是像一只踱步的老虎来回走动着。……我站得很近，明确感到他在担心暗杀。"路易·菲舍：《人与政治》，第94页。

② 塞尔日：《阴暗的转折》第149页。

一份联合声明。在这份由121名反对派成员签署的声明书中,他们宣称不能放弃自己的观点,但也认识到,这种分裂将导致两个党之间的斗争,是“对列宁事业最严重的威胁”;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反对派愿意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但不是主要的责任;党内争论的方式必须改变;反对派准备再次解散自己的组织,并呼吁代表大会让被开除和被逮捕的反对派成员复出。

很显然,代表大会将断然拒绝这个呼吁,也不会同意撤销开除。联合反对派必将由此解体,它的两个组成部分将分道扬镳。

大会进行了3个星期;而且完全集中于分裂问题。反对派的代表一概没有投票权。托洛茨基没有出席大会,甚至都没有邀请他到会为他个人被开除申辩。代表大会一致宣布,反对派所表达的观点跟党员的身份不相容。拉柯夫斯基试图解释反对派的立场;但是他被赶下了主席台。然后,代表们既惊讶又好笑地听着加米涅夫感伤地描述反对派的窘境。他说,他和同志们现在进退两难:要么他们必须组成第二个党——但这样将“损害革命事业”并导致“政治上的堕落”,要么他们必须“在激烈而又顽强的斗争之后”宣告“完全彻底地向党投降”。他们选择了投降——就是说,他们同意不再对官方政策发表任何批评意见——因为他们“深信正确的列宁主义政策只能在党内并通过党才能得到保证,而不是在党外或撇开党才能得到保证”。因此,他们愿意服从和执行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不管这些决议如何严厉。①

在将自己和同志们交付给代表大会的仁慈宽厚并且跪下之后,加米涅夫又想在半路停下来。他说,投降的反对派是作为布尔什维克那样行动的;但若要他们也放弃自己的观点,他们就不是作为布尔什维克那样行动了。他断言,以前党内没有任何一个人被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245-246页。

要求这样做;但他忘记了,他和季诺维也夫在1924年就曾要求托洛茨基这样做。“如果我们必须放弃一两个星期前我们所拥护的主张,那么在我们这方面来说就是虚伪的,你们也不会相信我们。”他又作了一次绝望的尝试,想要挽回投降者的尊严,于是他请求释放被关押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说:“如果像姆拉奇科夫斯基这样的人还在狱中,而我们却是自由的,这种情况是无法忍受的。我们曾和这些同志并肩战斗。我们为他们的一切言行负责。”因此,他乞求党代表大会给所有的反对派成员一次机会,使他们能对所发生的事情有所补救。“我们恳求你们,如果你们希望这次大会……作为一次妥协的大会载入史册:那就向我们伸出你们的援助之手吧。”[1]

一星期之后,联合反对派就解体了。12月10日,季诺维也夫派和托洛茨基派分道扬镳,用不同的声音说话了。加米涅夫、巴卡耶夫和叶多基莫夫代表前者宣布接受代表大会通过的所有决议。同一天,拉柯夫斯基、拉狄克和穆拉洛夫声明说,尽管他们也同意季诺维也夫派所谓“保持一党制的绝对必要”,但不管怎样,他们拒绝服从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不再在党内坚持自己的观点,就等于宣布放弃这些观点。”如果同意这样做,“我们就是放弃自己对党、对工人阶级最起码的责任”。[2]

季诺维也夫及其追随者实际上在重复托洛茨基1924年说过的话——党是“保障十月革命成果”的唯一力量,是“历史进步的唯一工具”,以及“没有人反对党而会是正确的”。正是这种信念把他们引向投降。相反,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现在却坚信他们“反对党这一行为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决定斗争下去时,却认为他们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248页。

② 同上,第1286-1287页。

的斗争并不是反对党，而是为了党——为了把党从它自身或毋宁说从它的官僚集团下挽救出来。实际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都是在做办不到的事，只是各人所采取的方法不同而已。季诺维也夫派希望留在党内，这样一俟条件许可他们就能把党“改造”过来；而托洛茨基派则坚信这只有在党外才能做到。双方都重复着同样的话：任何一种建立新党的企图对革命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双方都含蓄地承认，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不可能依赖它支持两个共产党；因此，号召工人阶级反对党的官僚集团目前是徒劳的，官僚集团尽管有其错误和罪恶，但仍然是无产阶级利益的捍卫者、革命的受托人、社会主义的代表。若说他们以前不是这样想的，那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一谈到“另一个党”就会感到的那种恐惧就无法解释了，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了。相反，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就会认为建立另一个党对于他们来说是义不容辞的。由于反对派承认——即使是含糊的并有重大保留——自己的敌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捍卫者和受托人，因此与他们发生冲突，反对派就陷入了矛盾之中。季诺维也夫听凭自己的良心，企图以接受执政派的专政来解决这个矛盾。而托洛茨基则坚信执政派充当革命捍卫者不会太久了，他也听凭自己良心的驱使，认为自我否定将一无所获。

就在他的周围，联合反对派分崩离析了，被开除者成倍增长，好几千反对派成员投降了；但托洛茨基仍然刚毅不屈，对这两个“死魂灵”——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充满蔑视，并预言说，他们必将从投降走向投降，从耻辱走向耻辱，而且一次比一次更糟糕。执政派现在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他们欣喜若狂，因为直到最后一刻他们还不敢肯定斯大林是否真能诱使反对派投降。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刚一宣布投降，执政派立即宣称不接受投降，投降者必须彻底批驳自己的观点并认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起初深信不疑,只要他们同意不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可以官复原职。而现在他们同意这样做后却又被告知他们的沉默是对党的侮辱和挑战。加里宁在代表大会上说:“同志们,对于那种一面宣布不再鼓吹自己的观点、一面仍坚持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人……工人阶级会怎么想呢?……要么这是存心欺骗……要么这些反对派变成了市侩庸人,把观点隐瞒起来不捍卫它们。”① 说实在的,执政派担心,如果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刚一宣布投降他们就接受,那就太没有面子了。人民将奇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允许党员坚持某种观点而又不允许他们表达出来?胜利者不能在半途停下来。为了保住刚夺得的阵地,他们必须乘胜追击,把失败了的敌人驱赶得更远。代表大会在禁止反对派发表异端邪说之后,还必须禁止他们哪怕以沉默来表明立场;剥夺了他们的声音之后,还必须剥夺他们的思想;而且还得再将声音还给他们一次,好让他们用来宣布抛弃自己的思想。

下一周尽是在条件问题上讨价还价,这也是季诺维也夫派在陷阱里越陷越深而拼命挣扎的一周。他们的第一次投降不能半途而废。为了保住投降的意义和得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他们又跌向新的投降。12月18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回来敲代表大会的大门,说他们宣告自己的意见是“错误的、反列宁主义的”。据说,布哈林用这样一些话来款待他们:“很好,你们终于下了决心——这是最后的时刻——历史的铁幕正徐徐落下。”——我们可以补充说,这历史的铁幕也将把布哈林压成齑粉。布哈林看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回头并屈服,无疑是十分欣慰的,因为他曾跟执政派中某些成员一样忧心忡忡:假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不肯悔过,重又跟托洛茨基携起手来,那怎么办?甚至代表中央监

①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1211页。

察委员会提出报告并推出开除动议的奥尔忠尼启则也表示了不安，他说，镇压措施所打击的人“曾为我们的党作出很大贡献，在我们的队伍内战斗了许多年”。但是斯大林和多数派陶醉于胜利的狂欢中，继续痛打落水狗，甚至在他们悔过之后也拒绝恢复他们的党籍。历史最喜欢捉弄人，正是李可夫——有一天他也将遭受到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样的命运——出来看到他们等在门口，就当着他们的面把门砰地关上了。他告诉他们，恢复党籍是不可能的，至少要留党察看6个月后，中央委员会才能决定是否恢复他们的党籍。

季诺维也夫派的投降变节使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陷入了孤立。这使许多良心麻木的斯大林派成员和布哈林派成员大感宽慰，他们从中看到了斯大林的做法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们回顾道，无疑托洛茨基是绝对错误的，连他以前的同盟者都背转身来抛弃了他。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代表大会和在那里发生的惊人的投降景象；他们并不十分关心哪部分反对派没有卷入这一幕。托洛茨基派自己也懵了。他们最终与党决裂了这种意识压倒了他们。他们不相信地看着在他们与季诺维也夫派之间展开的那条鸿沟。他们在思索他们的行动是否太鲁莽了：他们应该进行那种半秘密的宣传吗？他们应该在11月7日“向群众呼吁”吗？他们应该加速分裂吗？这些疑虑促使他们接受了开除裁决，同时又无休止地和亢奋地宣称他们对党始终如一的忠诚。少数人在步季诺维也夫派的后尘；另一些人在动摇。多数人仍然面对迫害坚持战斗。但是谁也不知道到底谁是“投降者”。代表大会之后，当即有1500名反对派成员被开除出党，2500名在悔过书上签了名。[1] 但是，在那些签名者中，

---

① 波波夫：《联共（布）党史纲要》第2卷第327页。

有少数人因为看到一次投降导致了另一次投降而又退出了;而在拒绝签名者中,也有些人因为遭受到进一步的威胁、利诱和劝说而动摇了。这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看做是工贼或叛徒。由于这两部分人混杂在一起,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因而混乱和猜疑笼罩着原先的整个联合反对派。

托洛茨基看出季诺维也夫的投降是徒劳的,从而更坚信他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狂热地工作着,把自己的信念灌输给气馁的追随者们。他向他们指出,任何谨小慎微、因循拖延的行为都不能挽救他们,斯大林总会找到开除他们的借口。重要的问题是把立场坚定的人集合起来,在他们与变节者之间划一道鲜明的分界线,要避免模棱两可的态度,要把分裂的原因向当代人和后代人讲清楚。尤其是,反对派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工作了——它从此必须"进入地下",去探索它的各小组之间新的接触形式,寻找新的工作方法,建立跟国外志同道合者的联系。

这些事都来不及做了。还在1927年末,斯大林就开始策划将反对派驱逐出境。但这位未来冷酷无情的血腥清洗大师当时还十分在乎自己的声誉,不愿被人抓住把柄,以便为自己塑造良好的形象。他竭力避免因公开使用暴力流放而引起的麻烦,所以他把放逐政敌安排得好像是他们主动离开似的。斯大林通过中央委员会建议让托洛茨基派的主要成员担任这一幅员辽阔国家边远地区的行政机构的次要职务:托洛茨基将"自愿"前往阿斯特拉罕。1928年1月初,拉柯夫斯基和拉狄克受反对派的委托,就这些建议与奥尔忠尼启则进行了激烈的交涉。拉狄克和拉柯夫斯基反对把托洛茨基派往阿斯特拉罕的任命,说托洛茨基饱受疟疾折磨的身体经受不住里海港口潮湿炎热的气候。这场游戏最后以托洛茨基及其朋友的声明而结束,他们声称,他们准备接受外省的任何职务,只要这不只是流放的借口,而且,只要这些任命能确保被任命者及其

家属的健康与安全,反对派将同意接受任何任命。[1]

1 月 3 日,当争论还在继续中,格别乌传讯托洛茨基。他对传讯没有理睬。闹剧就要收场了。几天以后,即 1 月 12 日,格别乌通知托洛茨基,根据有关惩罚反革命活动的刑法第 58 条,他将被流放到离中国边境不远的土耳其斯坦的阿拉木图。定于 1 月 16 日起程将他押往流放地。

有两位作者叙述了托洛茨基在莫斯科最后几天的情况,其中一位是旁观者,而另一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1 月 15 日,《柏林日报》记者保罗·舍费尔采访了托洛茨基。据他"粗略的观察",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托洛茨基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可以断定,这位德国记者在观察这类事情上没有经验)。他在托洛茨基的住宅里察觉到激动不安的情绪,那儿往来的人不断,被发往流放地的人行期将近,他们正在为这次远行整理行装。"在所有的走廊和过道里都放着一堆堆的书籍,这无数的书籍是革命者的食粮,正如公牛血是斯巴达人的食粮一样。"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描绘了托洛茨基本人,"此人中等偏下身材,皮肤细腻,面色略微发黄,一双不大的蓝眼睛时而非常友好,时而放射出火一样的光芒,显示出他'心灵的力量'。生动的大脸庞'反映出他的精神力量及崇高的精神境界',嘴小得与脸不成比例。他的手像女人的手那样柔软。""这个人,他创建了军队,把自己的热情灌输到阶级意识尚不够强的工人农民之中,把他们提高到一个远远高于他们原来的水平之上。……但乍一看,他却显得腼腆,甚至还有几分茫然失措……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魅力才如此之大。"

---

① 关于这次"交涉"的说明可参阅托洛茨基本人或他的一位朋友 1928 年初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一封信。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托洛茨基尽管彬彬有礼,却始终十分谨慎。面对这位资产阶级记者,他在谈到国内问题时非常克制。他对自己的政敌一字未提,没有一句怨言,也没有一条争论性的意见。在交谈中,涉及内政方面的话题仅有一次,当时这位记者指出了劳合·乔治的预言——"托洛茨基的拿破仑之路"。这是舍费尔对托洛茨基被驱逐和对他的未来的计划等方面最明确的暗示了。但是,托洛茨基抓住了这一比喻的另一面。他冷笑着回答说:"我竟然成了结束革命的人,这个看法真荒唐,这不是劳合·乔治的第一个错误。"值得注意的是,与拿破仑的比较使托洛茨基想到的不是他们两人都被流放的命运之间显而易见的表面的相似,而是他极力反对的热月政变继承者波拿巴主义的政治思想。对他来说,一般问题要高于个人问题。(舍费尔指出:"你要永远记住,这个人首先并主要是位战士。")他主要讲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没落及欧洲的革命前途,和以往一样,他总是把布尔什维克俄国与欧洲革命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交谈中,托洛茨基很快放弃了交谈时用的声调,变成了演讲者,并提高了嗓门,"他以"优美潇洒的手势"描绘世界革命曲线的起落。谈话被一位正巧当夜将赴流放地的同志打断,他来问他是否能为托洛茨基做点儿什么。"托洛茨基那张蓄着短唇须的脸上现出愉快的皱纹:'您今天晚上就要踏上旅途,不是吗?'这个喜欢辩论和嘲讽的人不放过可以展示这些特点的机会。……这个坚定不移的人始终保持着他的幽默感。"在分手时,他邀请舍费尔到阿拉木图去拜访他。①

与舍费尔不同,塞尔日描绘了处于包围中的托洛茨基,"他被同志们白日黑夜地守护着,而他们自己又受到特务们的监视"。骑着摩托车的格别乌特务们记下了出入这里的每一辆汽车。

---

① P.舍费尔:《苏联七年》第158-161页。

> 我从后楼梯上楼。……他坐在一间屋子里工作,窗户对着院子,屋子里只有一张折叠床和一张桌子。我们满怀尊重和热爱之心称他为"老头儿",就像我们称呼列宁一样。……他身穿一件旧毛衣,朝气蓬勃,庄重威严,一头几乎全然灰白的浓密头发,虽面带病容,但他在这间小笼子里却十分活跃。在隔壁房间里,人们正在打印他刚刚口授的电报。他在餐厅里接待全国各地来的同志。他在频繁的电话铃声中与他们匆匆交谈。所有的人都可能随时被捕——但到底是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所有的人都抓紧利用这最后时刻,因为这无疑是最后的时刻。[①]

1月16日,托洛茨基忙着开会、发指示并作临行前的最后准备。辞行的人络绎不绝,这是忙乱不堪的一天。起程的时间定于当晚10点。傍晚,疲惫不堪的全家人坐在一起,紧张地等待着格别乌特务的到来。指定的时间已过,他们却没来。大家纷纷猜测,但谁也猜不出所以然来。最后,格别乌电话通知托洛茨基推迟两天出发,没有说明原因。拉柯夫斯基及其他朋友的到来打断了新的猜测。他们都十分激动。他们是从车站来的。那里聚集了几千人来与托洛茨基道别,在他应乘坐的列车旁边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许多人跑到了机车前,发誓不让列车开动。警察企图把他们从铁轨上拉开并驱散人群,但当局看到示威的矛头所向,因而下令推迟放逐。反对派庆贺胜利,决定两天后再次示威。但是格别乌决定对反对派进行突然袭击:悄悄地把它的领袖逐出莫斯

① 塞尔日:《阴暗的转折》第155页。

科。它计划先把他带到另一个车站,从那里再送到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站,然后让他换乘开往中亚的火车。格别乌通知托洛茨基,让他作好1月18日启程的准备,但1月17日格别乌的特务就来押解托洛茨基了。奇怪的是,这一天托洛茨基一派的人并没有守护这所住宅。因此在格别乌的工作人员到来时这里只有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两个儿子,还有两位妇女,其中一位是越飞的遗孀。[①]

接下来的场面极具悲喜剧性。托洛茨基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不让格别乌工作人员人内。这是消极反抗的标志,以前他总是以这种方法对付企图逮捕他的各类警察。托洛茨基隔着紧闭的门与指挥这支队伍的军官谈判。最后,军官命令破门,特务们闯进屋里。由于种种机缘的巧合,奉命逮捕托洛茨基的军官竟是内战时期托洛茨基的军用专列上的一名警卫。在过去的首长面前,他失去了自制力,绝望地嘟哝着:"打死我吧,托洛茨基同志,打死我吧。"托洛茨基尽一切可能来安慰逮捕他的人,并劝他执行命令。然后,托洛茨基再次采取不服从的姿态,拒绝穿戴。武装特务脱下了他的便鞋,给他穿上衣服。由于他拒绝跟他们走,于是在跟在后面的家人和越飞遗孀的哭喊声中被他们架下了楼梯。除了几位身居高位的邻居及他们的妻子之外,这一场面没有其他见证人。这些邻居听到了楼梯上的喧闹声,便打开门,瞅了一眼就马上害怕地缩了回去。

流放者及其一家被扔进一辆警察局的卡车,于是它载着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红军的奠基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疾驰过莫斯科的街道,把他带到喀山火车站。由于托洛茨基拒绝上火车,押送人员便把他拖上一节孤零零地停在备用线上的车厢里,车站被团团包围,所有的旅客都被赶走了,附近只有几个铁路工

---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87页。

人。被驱逐者的家属跟在押送人员后面。小儿子谢尔盖和格别乌的一个工作人员动手厮打起来,长子廖瓦试图打动铁路工人,他高声喊道:"同志们,看啊,看啊,他们要抓走托洛茨基同志!"工人们却冷眼看着这一场面。没有一声惊叫,连低声抗议也听不到。

※　※　※　※　※

从年轻的托洛茨基第一次见到莫斯科的城墙与钟楼至今,已有30年了。那是在他从敖德萨监狱被押往西伯利亚流放地的路上,他隔着囚车的铁栅栏看了这座"历代沙皇的庄园、未来的共产国际的首都"第一眼。现在他隔着同样的铁栅栏又看了莫斯科——这座他胜利和失败的城市最后一眼,他再也不能回到这里了。他初次来到莫斯科时是一位受迫害的革命者,离开时仍是如此。

第六章
阿拉木图一年

在离莫斯科约有50公里的一个小站上，托洛茨基及其家人乘坐的那节车厢被挂到开往中亚的列车上，载着他们离开了首都。谢尔盖想继续学习，就下了火车返回莫斯科。患病的妻子谢多娃和廖瓦陪伴着托洛茨基前往流放地。押送他们的12名押送人员在车厢过道里通过半掩着的包厢门监视他们。托洛茨基和妻子躺在包厢的木制长凳上，包厢昏暗，烛光摇曳。押送队的长官就是逮捕托洛茨基的那位军官，他在这辆列车上出现，好像是对另一辆名满天下列车的荒谬提示，那就是作为野战司令部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专列，这位军官当年曾在那辆专列上当过托洛茨基的警卫员。谢多娃回忆说："近几天来的种种意外、动荡不安和紧张使我

们疲惫不堪，现在正好休息。"托洛茨基躺在阴暗的包厢中，看着广漠无垠的白茫茫的原野，列车正穿过它驶向东方，他开始使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新环境。他就这样从那活生生的世界及其种种诱惑中被连根拔出，脱离了他的工作和斗争，与他的战友们彻底隔绝。今后还会出现什么情况？怎么办？他试图在日记中写下简短的札记或抗议信，但他发现手边没有"文具"，这使他多少有些吃惊。这种情况他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甚至在1907年那次极其危险的从遥远的北方逃亡时也不例外。现在他身边危机四伏，他甚至都不知道是否真的把他流放到阿拉木图。危险是对他的挑战，激起了他的反抗精神。他对妻子说，现在对他来说，在克里姆林宫舒适床上的庸人之死的威胁至少不存在了。

第二天，列车在萨马拉停车时，托洛茨基给加里宁和明仁斯基发了一份电报表示抗议，他说，在其漫长的革命活动生涯中还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警察像格别乌这样狡猾和不守信义地对待过他，格别乌绑架他，却不告诉他要把他押往何方，迫使他在没有换洗衬衫、没有最必需的生活用品、没有为患病的妻子带药的情况下上了路。[①] 押送人员对他倒很客气，甚至还很友好，正如1907年押送这位被判处流放的彼得堡苏维埃领导人的沙俄士兵一样。在途中，他们为托洛茨基一家买了毛巾、肥皂等物，并为他们从车站小卖部买饭。他们的囚徒仍能唤起他们的敬畏之情，正如旧制度下一个被驱逐出境的大公也可能受到押送人员的礼遇一样，因为他们拿不准他是否还会很快东山再起。当列车进入土耳其斯坦境内时，押送队的长官请犯人给他一份受到礼遇的证明。[②] 在途中，托洛茨基的两位忠诚的秘书谢尔穆克斯（Сермукс）和波兹南斯基

① 托洛茨基档案。

② 证明文本见托洛茨基档案。

(Поцнанский)乘上了这趟列车,希望能瞒过格别乌。这些插曲为单调的旅途生活增添了某些乐趣。

乘火车的旅途到皮什佩克—伏龙芝镇[1] 为止,离阿拉木图大约还有250公里。这段路只能乘汽车、卡车、雪橇,有时还要徒步翻过冰封雪盖、狂风怒号的山口,穿过高高的雪堆形成的深沟,在荒原上无人居住的简陋的破房子里过夜。经过一个星期的行程,托洛茨基一家终于在1月25日凌晨3点到达了阿拉木图。流放者及其家属被安排住进了果戈理大街的"七河旅馆"。这家旅馆可以追溯到"果戈理时代",那位伟大讽刺作家的精神仍主宰着这家旅馆,托洛茨基对阿拉木图的许多观察描述和他写的抗议书信、电报的风格显然是受了它的影响。

在20年代末,阿拉木图还是一座纯东方式的小城镇。虽然它以其茂盛的果园和葡萄园而著称,但仍是贫穷、闭塞的吉尔吉斯草原上的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这里经常遭受地震、水灾之害,冬天狂风怒号,夏天酷热难忍,文明的足迹还未来到这里。热浪吹得飞沙走石,疟疾和牲畜瘟疫肆虐。这座小城镇将要发展成哈萨克斯坦的首府,但在当时,加盟共和国的行政机构刚刚兴建,官员们征用了所有的好房子,而贫民居住区人满为患。"在市中心的集市上,吉尔吉斯人在泥泞中和商店的台阶上晒太阳,抓虱子。"[2] 这里还有麻疯病。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度过的那一年夏天,牲畜瘟疫流行,疯狗满街乱跑。

这一年阿拉木图经常闹粮荒,生活更加艰难。在托洛茨基到达这里后的头几个月中,面包价格涨了3倍。市里有数的几家面包店外面排起了长队,其他食物更少。对阿拉木图的供给还未走

① 皮什佩克镇刚被命以伏龙芝的名字,他继托洛茨基之后任军事人民委员。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296页。

上正轨，邮政工作更不正常，当地苏维埃机构试图借助私人力量来改善邮政传递工作。在从托洛茨基信中摘取的下述片断中把该市阴暗的局面、地方当局的软弱无力、愚昧无知刻画得淋漓尽致："不久前当地一家报纸报道：'在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本市时，断粮的流言却在城里流传。'正如报上报道的那样，粮食确实在源源运来，可流言仍在散布。疟疾横行，但粮食却不能发挥作用。"

这就是托洛茨基要呆的地方。斯大林千方百计使他远离莫斯科，让他听天由命。托洛茨基的两位秘书都被逮捕了：一个是在从莫斯科赴阿拉木图的途中，另一个是在阿拉木图，然后把他们流放到别的地方。不过，看来斯大林对其政敌暂时还没有新的打算，格别乌对托洛茨基仍十分尊重，这在后来是不可思议的。格别乌费了不少劲儿把托洛茨基那些数量可观的藏书和档案材料从莫斯科给他来运来，其中有许多重要的国家和党的文献。书籍和档案装了满满一卡车运到了阿拉木图。托洛茨基因居住条件不好而向加里宁、奥尔忠尼启则和明仁斯基提出抗议，要求给他更好的住宅，要求给他打猎的权利，甚至要求把他的爱犬从莫斯科送来。他抱怨说，让他住在果戈理大街的旅馆中只是为了格别乌的方便，流放实际上变成了监禁。"你们同样可以把我关在莫斯科的监狱里，用不着把我发配到4000俄里之遥的地方。"[①] 抗议起了作用，他在到达阿拉木图 3 个星期后，在市中心的克拉辛大街 75 号楼中得到了一套 4 居室的住宅。街道的名称是为了纪念他那位已逝的朋友。他还获得了打猎的权利。他仍不断地往莫斯科打去冷嘲热讽的电报，提出种种要求，其中有些是严肃的，有些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把原则性的辩论与琐碎的纠缠混在一起，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那亲爱的玛雅（他的爱犬）根本想不到，它现在正处于重大的政

① 摘自 2 月初发出的抗议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治斗争的中心。"他拒不承认自己是犯人,所以追害他的人不得不在形式上对他客气些。

在多年不倦的工作和长期的紧张之后,托洛茨基在这里得到了休息。因此他到达阿拉木图的头几个月居然具有意想不到的奇异的田园诗般的情调。草原、群山、河流、湖泊像在童年时那样深深地吸引了他。在他的许多信中,政治论点和建议往往与对风景的诗意描写以及对打猎奇遇的幽默叙述掺杂在一起。开始时,托洛茨基被禁止离开阿拉木图。后来,允许他打猎,但离开城市不得超过25俄里。托洛茨基给明仁斯基打电报说,他不理睬这种限制,因为在所允许的活动范围内没有适合打猎的地方,他不想打那些可怜的小动物,至少应在离开城市70俄里的地方狩猎。他请莫斯科据此通知当地格别乌,以免发生麻烦。他去那里狩猎了,并没有遇到麻烦。然后,他又向当地格别乌领导抗议特务们对他的明目张胆的盯梢,并声明,如果这种监视形式不是莫斯科直接规定的话,他将"怠工",并停止打猎;如果是莫斯科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他理解格别乌的处境,将撤回他的抗议。这样一来,对他的监视变得客气和隐蔽一些了。

托洛茨基来到这里后不久就开始狩猎,在春季野生动物沿伊犁河迁徙时期,他的狩猎始终未断。有几次狩猎活动长达10天,尽管这样的打猎极为艰苦,却给了他休息的机会。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不无骄傲地讲述了他打猎的成果。起初他在当地人的粘土茅舍的地上或蚊蝇乱飞的帐篷里与十几个哈萨克人一起过夜,强忍着恶心,把不干净的水煮开沏茶。他写道:"下次我将露宿,并强迫我的随行人员也露宿。"[①] 在下一次打猎时,他真是这么做的。那是在3月末,猎人们连续9个夜晚在严寒中露宿。有一次

---

① 摘自托洛茨基档案。

骑马过河时，托洛茨基还掉到了河里。收获不大，"总共只有 40 只鸭子"。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诚然，在远处巴尔拉什湖狩猎更好，那里不仅有豹，甚至还有老虎，但我决定与老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我全身心地享受着这短暂的野蛮生活……连续 9 晚露宿，没有洗涮、穿衣脱衣的必要，吃在水桶里煮的羊肉，从马上掉进河里(那是这些天中唯一一次脱了衣服)，在水中的圆木上，在乱石中，在芦苇丛中度过几个白天和黑夜，这也是难得经历的。"[①] 狩猎季节过去了，渔汛来临。后来，连娜塔利娅都加入了捕鱼者的行列。但他们捕鱼与当地人在周末懒洋洋地用渔具捕鱼的消遣完全不同，因为每次捕鱼之行都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几只大船，而且要重载，还要精心策划。

6 月初，阿拉木图刮起了热风，托洛茨基一家搬到了离城市不远的山脚下的一座别墅中。他们在一个大苹果园里租了一栋苇顶小房子。从这个小房子里可以居高临下地眺望城市。城市的一边是广袤的草原，另一边是终年积雪的连绵山峰。下大雨时，房顶哗哗地漏雨，所有的人都匆匆跑上顶楼，用水桶、罐子和煎锅接雨水。在苹果园里用木头建造了一间陋室，这是托洛茨基的办公室和工作间。很快，这里面就堆满了书籍、报纸和手稿，一台旧打字机的嗒嗒声响彻了整个苹果园。托洛茨基坐在办公桌前，看到一棵从地板缝中长出的灌木，这株灌木很快就长到了齐膝盖高。这一切都表明他在这里的"临时性"，不过，总算找到了摆脱城市喧闹的避难所。在城里，人们正在追赶射杀疯狗，扬起漫天尘土。在头几个月里托洛茨基和谢多娃一直饱受疟疾的折磨，靠吃"奎宁"维持生命，现在热病的发作已经停止。[②]

① 摘自托洛茨基档案中一封写于 1928 年 4 月 1 日的信，未注明收信人。

② 参见托洛茨基 7 月 14 日致拉柯夫斯基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流放者不得不自己挣钱谋生。诚然,他享有官方的津贴,然而毕竟数额有限。尽管家里人口不多,家庭消费也十分简单,但津贴连购买食物都不够。国家出版社刚刚停止出版《托洛茨基全集》,问世的仅有13卷,还都被从书店及公共图书馆中收回了。托洛茨基却又酝酿着新的写作计划。他打算撰写有关亚洲革命的研究著作,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和印度的参考书籍。在另一本著作中他试图总结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和世界的发展。抵达阿拉木图之后他马上起草有关反对派原则的详尽声明,该声明将提交给定于夏季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他的朋友们,特别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坚持要托洛茨基撰写回忆录。他于4月就开始了这一工作。他借助于南俄报纸、尼古拉耶夫市和敖德萨市的城市地图再现他的少年及青年时代,他的回忆录《我的生平》就是从回忆少年和青年时代开始的。

不过写这些东西赚不到一分钱,因为这些著作根本不可能出版。但是,根据刑法第58条,即使是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流放的人仍可靠翻译、助理编辑或校对工作谋生。当他得知允许他翻译、校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时,他迫不及待地投入了这项工作。他的老朋友梁赞诺夫现任莫斯科市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准备出版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他请托洛茨基翻译《福格特先生》一书。在这部篇幅巨大却鲜有人知的论战性著作中,马克思回击了卡尔·福格特对他的诽谤和诬蔑,后来查明,这位福格特是拿破仑三世的密探。初次读到这种排炮般回击的文字,托洛茨基评论道,马克思用了几百页的篇幅来反驳福格特的指责,而现在,他这个马克思著作的译者却要用"整整一套百科全书"的篇幅来驳斥斯大林对他的诽谤和诬陷。后来,梁赞诺夫又请他校订其他译文,并请他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他几卷校样,这些工作他也完成了。[①]

① 托洛茨基在一封信中提到,他还翻译了托玛斯·霍奇金的《英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

从托洛茨基写给梁赞诺夫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其中有对译文风格的详尽得近乎迂腐的批评，还有关于译文质量的详尽建议。这些书信不带丝毫政治色彩，完全是业务性的。托洛茨基在这些信中对他在苏联所能找到的唯一一项可给他带来收入的工作也没有丝毫嘲讽。梁赞诺夫付给他的稿酬保证了他一家的生活开支，也支付了他的大量通信的费用。[1]

※ ※ ※ ※ ※

托洛茨基抵达阿拉木图后就努力与朋友和支持者建立联系，当时他们都与世隔绝，默默无闻地散居在全国各处。开始时这一工作只能通过正常的邮政渠道。他所处的环境也极其原始落后，能在当地搞到一支钢笔、铅笔或几张粗糙的纸或几根蜡烛，几乎都可称为功绩。廖瓦成了他的"外交部长和邮电部长"、警卫、研究助手、秘书、狩猎的组织者。在廖瓦的帮助下，信件和通告源源不断地从阿拉木图寄往全国各地。残疾的邮递员每周骑马来两到三次，每次都送来满满一袋信件和剪报，后来甚至还有国外的书籍和报纸。这些往来信件无疑都经过了格别乌的书刊检查机构的审查。绝大部分信函往来是在他与下述几个人之间进行的：流放到阿斯特拉罕的拉柯夫斯基，在托博尔斯克的拉狄克，流放到乌拉尔斯克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住在纳雷姆的斯米尔加，流放到北至科米共和国乌斯季库洛姆的别洛博罗多夫，住在中亚地区谢米巴拉廷斯克的谢列布里亚科夫，在塔拉的穆拉洛夫，在亚美尼亚新巴泽

---

[1] 自1928年4月到10月间，托洛茨基共发出800多封政治信函，其中许多封的篇幅如同论文，还发出550封电报，收到1000封来信、700封电报，私人信件还不算在内。

塔的伊万·斯米尔诺夫和在沃罗涅日的姆拉奇科夫斯基。托洛茨基还与其他流放者通信,但不如与上述这些人频繁。就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他告诉索斯诺夫斯基[①]说,他与西伯利亚和中亚的主要流放区都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定期联系,如巴尔瑙尔、卡缅斯克、米努辛斯克、托姆斯克、卡巴尔舍夫、叶尼塞斯克、新西伯利亚、坎斯克、阿钦斯基、阿克纠宾斯克、塔什干、撒马尔罕等等,他通过拉柯夫斯基与俄国欧洲部分的流放地保持联系,后者在阿斯特拉罕负责伏尔加河南部流域的反对派中心的工作;他通过在沃罗涅日的姆拉奇科夫与北方流放点联系。通讯和通报在主要的流放地复制,再转寄到次要的流放地。从4月起,在阿拉木图与莫斯科之间建立了秘密的邮递联系,每隔两三个星期传送或转交一次信件。

通过这种方式,人数和规模不断壮大的反对派建立起了自己的有其紧张政治生活的共同体。托洛茨基是被流放的反对派的鼓舞者、组织者和象征。流放者的情绪很不平衡,其中一些人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惊,另一些人则把他们遭受的迫害看成是恶作剧。显然,大多数人起初都坚信:斯大林的胜利不会长久,而且事件很快就会证明反对派的正确,它的成员将会从流放地返回,他们的远见、勇气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将受到赞扬。

他们的生活条件尽管是艰苦的、屈辱的,但还不那么可怕。反对派成员又恢复了他们所熟悉的革命前的生活。这些政治犯和流放犯的工作就是利用被迫赋闲期间的时间去清理自己的思想、进行学习,为有朝一日重挑直接斗争的重担或执政的职责作准备。这种环境似乎很适合于这种工作。在许多流放地都不乏有教养的人、杰出的理论家和有天分的作家。同志们就是他们精选的听众。紧张的思想交流有助于保持自律和自尊。托洛茨基从阿拉木图密

① 托洛茨基档案中11月7日的信。

切关注着这种思想交流，不断地给它鼓劲。他在写给同志们的信中援引了歌德的语录：在精神和道德方面，为保持已有的东西必须不断地重新赢得它。于是，流放地成了重要的精神活动和文字—政治活动的中心。那些有关当前事件的札记和“提纲”因其数量太大就不用说了，许多人还撰写长篇著作；拉狄克着手撰写研究列宁生平及学说的宏篇巨作；拉柯夫斯基为圣西门作传，并研究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起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完成了几部有关苏联经济和中世纪欧洲经济的著作；斯米尔加则著书论述布哈林及其学派；丁格尔施泰特完成了有关印度社会结构的论文；等等，等等。但是，无论这些精神活动本身多么有价值，都无法直接回答在流放者头脑里这个压倒一切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事件将会重新提出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

※　※　※　※　※

尽管是在西伯利亚或中亚这样的边远地区，冬末之前就已经感到了新的社会危机的震荡。其实危机蕴蓄已久，尚在秋季时就已到达了临界点，那时正值放逐反对派的前夕。国家的大粮库有一半已见了底，城市居民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连军队的给养都不充足。面包店外排着长队，面包价格不断上涨。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看到的这种现象，在整个苏联都能看到。

但是乍看起来，农业的状况还不错。耕作的土地面积与年景最好的那些年一样多，而且连续 3 年丰收。但城乡“结合”再次遭到破坏，农民拒绝上缴粮食，也不愿按固定价格出售粮食。征收粮食引起骚乱，征粮人员被赶出村庄，两手空空地回到城里。农民完全没有或很少有上缴或出售自己产品的积极性，因为现在和从前一样，他们不能以此换来衣服、鞋子、农具和其他工业产品。农民

要求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他们为此吵闹不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追随着富农的领导。

布哈林派与斯大林派正是在他们联手开除了托洛茨基派成员的党籍并粉碎了季诺维也夫派之时就上述问题在政治局里吵翻了脸。布哈林派主张对农村采取让步政策以安抚农民;可那时斯大林派已倾向于采取暴力对待农民,尽管还有些犹豫。在1月的第一个星期,即在放逐托洛茨基的10天前,政治局不得不对下一步粮食征购工作作出决议;无疑,正是局势引起的恐慌迫使他们急忙将托洛茨基流放。1月6日,政治局密令各级党组织,要严惩那些妨碍征收粮食的农民,强行"借粮",坚决抵制提高粮价,并警惕地监视富农。指令没有取得效果,5个星期后,政治局不得不更坚决地重申这一指令,并扩大传达范围。

2月中旬,《真理报》敲起警钟:"富农抬头了!"4月下旬,中央委员会终于毫不讳言地宣称,国家正受到一场严重危机的威胁,这一威胁是由于政府财经政策未能监控的富农经济力量的增长而造成的。这些术语似乎都是从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那里抄来的。"由于农村进一步分化,由于富农经济比重的增长……使富农获得了对整个市场行情施加重大影响的力量。"[①] 然而——中央委员会宣称——党却一直对富农抑制不力。非常措施颁布了,其中规定对富农强行征税,以便降低他们的购买力;规定征收多余的谷物;规定固定粮价;最后,那些一贯对富农采取迁就态度的官员及党员要被罢免职务。但这些决议并不是对既定方针的偏离,而是为了应付突发困难而采取的非常措施。中央委员会的几个决议根本没有提到"全盘集体化",不仅没有提到,而且坚决否定了这种思想。但是,中央委员会对紧急状况的解释和对坚持危险来自富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373页。

农而党未能加以抵制的说法其实都已经表明了政策的根本改变。斯大林派在中央委员会中占了上风。在获得权力强化党的反富农措施的同时，斯大林也增强了他反对布哈林派的力量；他肆无忌惮地把他们从行政机构和党的机关的许多中下层岗位上撤掉。

被流放的托洛茨基派对这些事件的最初反应是高兴、吃惊、嘲讽，甚至欢欣鼓舞。他们问道：反对派的预言不是兑现了吗？斯大林不是被迫采取反对派捍卫的左倾方针了吗？党还不明白在过去几年的大争论中谁对谁错了吗？大多数反对派成员都庆幸万分，他们更加信心百倍地等待着把他们召回并请他们在克服当前非常局面和使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纳入新轨道的工作之中大显身手。托洛茨基在他本人的书信里也谈到了反对派的这种预见，而且表达了一种乐观的情绪，尽管他并不赞成其追随者过于乐观的期待。[①]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左倾方针虽有发展，但当局对待反对派的态度却依然如故。流放地欢欣鼓舞的情绪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不安和担心。事件的转折使人对反对派的几个主要前提和预言，特别是对它对党内政治倾向的估计产生了疑问。某些托洛茨基派成员开始怀疑：我们指责斯大林为富农的保护人，在这点上我们是否正确？我们曾声称，在粉碎左派反对派之后党内平衡将受到破坏，布哈林的右派将得到加强，它将除掉斯大林中间派。我们这个预言是否正确？我们是否对党内保守分子估计过高？斯大林派不仅没有失败，而且在与右派的斗争中占了上风，那么我们对热

① 参见托洛茨基1928年3月5日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他在其中谈到强加于他的失败主义的指控，因为他曾说过，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政策下，无论丰收和歉收都会巩固富农的地位。现在，《真理报》突然发现了富农的力量，讲到连续3年丰收时"好像在描述3次地震一样"。

月政变的危险所作的卡珊德拉式预言[①]是否有些危言耸听了？因而总的说来，我们在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中是否走得太远了？

大多数流放者甚至不允许对他们的思想产生这种怀疑，但少数人更加固执地提出这些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又引发了许多其他的问题，其结果导致严肃地反省反对派的纲领和行为。答案取决于反对派对待斯大林的左倾方针的严肃性的看法。斯大林的反富农行动可以看成是应急的策略性举措，它并不妨碍他重新推行亲富农政策。大多数反对派成员正是这样想的。但也有一些人相信左倾方针的严肃性，把它看成是重大转折的前奏，并对反对派的前途产生了忧虑。他们说，当党在进行反对派所号召进行的反对国内资产阶级和准资产阶级分子的危险斗争时，反对派怎能消极地袖手旁观呢？

反对派过去一直认为，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右派都起着领导作用。软弱的、优柔寡断的斯大林派简直就像影子一样追随着右派。反对派的所有活动都建立在这一观点上，因此，斯大林对富农的第一次或初步打击就动摇了它的基础。甚至在12月里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是以斯大林打算推行左倾政策为理由而宣布投降的。此后不久，皮达可夫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两位重要的托洛茨基派成员步他们的后尘，宣布与托洛茨基决裂。1923年时他们是反对派最勇敢、最得力的领导人，但在后来几年的斗争中却十分消极，现在又以斯大林实施反对派的纲领为由来为自己投降辩解。开始时，流放者们轻蔑地嘲讽皮达可夫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背叛行径，这是人们通常对待变节者的态度。尽管如此，他们变节的论点却给人留下印象，并激起人们的怀疑。

① 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特洛亚王普里阿摩斯的女儿，预言家。——译注

5月初，托洛茨基对流放者当中人心动摇的状况尚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他仍旧在给他们的一封信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宣称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标志着一次重大转变的开始。[①] 他指出，反对派完全有根据骄傲地认为自己是新政策的鼓舞者和首创者。不错，当反对派想到他们自己为别人摘走的成果所付出的代价时，在他们的骄傲中必然掺杂着难言的苦涩。但是，革命者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不止一次用沉重和悲壮的自我牺牲为代价，迫使其他人乃至自己的敌人完成他们革命纲领中的一部分。巴黎公社就是这样被浸在血泊中的，但它战胜了扼杀它的刽子手，因为就是这些刽子手不得不实施它的部分纲领。尽管它作为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公社遭到了失败，但它使君主政体无法在法国复辟，最起码它保证了议会共和国的建立。反对派与斯大林的左倾方针的相互关系可能也是这样：反对派可能被粉碎，可能看不到它的纲领完全实现，但它的斗争最起码使执政派无法在资本主义因素面前继续退却和倡导新的新经济政策。

反对派应该怎么办？托洛茨基回答说，反对派有责任批判地支持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联合布哈林和李可夫去反对这个方针。相反，我们应该鼓励摇摆不定的斯大林中间派与右派一刀两断，促使它与左派联合起来。反对派与它的迫害者——斯大林派结盟共同反对富农的庇护者，这一可能性不应排除，尽管它是渺茫的。反对派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要求党内民主，而“左倾方针有助于争取无产阶级民主的斗争”。托洛茨基这样推理在逻辑上是与他自己前后一致的：他从1923年起就坚持认为，斯大林体制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护党内官僚免遭工人的反对，党内官僚又在保护富农和耐普曼。对他来说，

---

① 参见托洛茨基5月9日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得出下述结论是理所当然的:一旦官僚集团不再保护富农和耐普曼,那么它将向工人阶级靠拢,并将力求与其代言人和解,恢复他们的言论自由。因此,反对派虽然支持斯大林的左倾方针,但应当更坚决地抵制他的压制,并应警告党,只要镇压还在继续,就无法保证斯大林会推行新政策、不再次向富农让步。托洛茨基承认他建议的是一种很难遵循的"双重立场";但是他宣称局势将会证明只有它是正确的。皮达可夫认为托洛茨基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托洛茨基驳斥说:"但是对一个投河自尽的人(类似皮达可夫这样的人)来说,一切矛盾都会荡然无存。"

托洛茨基的观点具有辩证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是不确定的局面所要求于他的。他把斯大林对富农的进攻看成是重大的、使人产生希望的事件,所以他更加坚定地坚持批评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必要性,把它看成是新政策得以巩固的重要保证。他所建议反对派的不是另起炉灶,而只是应该捍卫的原则。当托洛茨基的敌人又从他的书中摘出一页时,他承认这是他自己的观点,并敦促他的追随者们在这件他们认为是必须的事情上支持自己的敌人。但在托洛茨基的书中还有许多他不打算放弃的其他篇章。至于反对派的前途,托洛茨基既不赞成极端的乐观主义,也不支持极端的悲观主义。他认为,事件可能会迫使斯大林派与反对派和解。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会重获道义和政治领导权,但是它也应作好分享巴黎公社命运的准备,以其牺牲推动社会主义和进步事业。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持一种相对赞赏的看法,承认它的积极意义。这一事实使托洛茨基派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把他们搞糊涂了。这增强了他们当中的那些在开始时批评反对派的人的论据。他们声称,如果托洛茨基现在是正确的,那么他过去敲响反对热月政变危险的警钟是否是错误的呢?他当初对斯大林政策的评价莫非是错误的?历史将证明反对派是正确的,正如它

曾证明巴黎公社是正确的一样，反对派以这种想法自慰难道是明智的吗？托洛茨基主义者若参加反对在国家中产生私有财产这一重大斗争以此来帮助创造历史，难道不比消极等待预期的历史裁决更好吗？后代可以赞扬巴黎公社社员的殉难精神，但公社社员浴血奋战并非是为了殉难者的荣誉，而是为了他们认为是实际的、可以实现的目的。

这种推理反映了托洛茨基派立场中固有的两难矛盾；而失望又引起了仇恨。流放、迫不得已的无所作为和沉重的疑虑折磨着这些精力充沛、智慧超群的人，正是他们使革命获胜，正是他们在国内战争中浴血奋战，正是他们建设着新的国家。他们为党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了党，他们曾在沙皇的监狱中受尽折磨，而且仍认为党是人类的最高希望，现在他们却被党所抛弃，这本身就是最沉重的负担。当他们意识到，使他们和斯大林派敌对的某些重大分歧正在消失，党开始做那些他们一心要做的事时，这个负担就难以承受了。当一位政治斗士清楚地意识到他捍卫的是什么并感到他的事业完全取决于他和他的同志们为事业所作的努力时，他承受失败和屈辱并不困难。但是，即便是久经考验的战士在这种荒谬的情况下也难免气馁：当他看到他的事业或其最重要的那部分正在由他的迫害者来完成，看到他的事业不再取决于他是否为它奋斗，于是斗争忽然失去了目标，他所遭受的迫害也变得毫无意义。他开始怀疑过去把他的迫害者看成敌人是否正确。

斯大林冷静、准确地看到了反对派的思想波动，但他也有他自己的两难之处。托洛茨基派对左倾方针的任何称赞都是对斯大林的帮助，但是他又害怕他们的帮助。在局势的压力下，他犹豫不决、步履蹒跚地走上了一条他不熟悉的危险道路。他冒着与农民发生重大冲突的危险，没有也不可能估计到他所面临的反抗的规模及强度。他谨慎地反对自己昔日的盟友布哈林派，因为他并没

有低估它的声望与影响。他不知道这场新的斗争会把他带到多远以及会给他带来什么危险。像托洛茨基一样,他不排除在极端危机的形势下与左翼反对派结盟的可能。但是他也意识到这将是托洛茨基的胜利,所以他决心在不与托洛茨基妥协的情况下竭尽自己的全力击败布哈林派。但他有理由担心,他那一派的力量不足以担当此任,光凭他的支持者还不能管理国家机构,不能应付在这困难的新阶段中迅速发展国有化工业和管理财政。斯大林的支持者主要是党务工作人员,而理论家,政治家,经济学家,管理工业、财政和农业的专家和有政治才干的人都在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季诺维也夫派当中。斯大林需要那些坚定而热情地推行反富农政策的人的帮助。他可以在左翼反对派中找到这样的人。因此,他急于尽可能地把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中有才干的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但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却寸步不让。他背着托洛茨基向托洛茨基派发出呼吁。他通过自己的代理人以左倾方针诱惑他们,竭力说服他们相信:反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开始时,流放者几乎一致拒绝这种呼吁,但是呼吁已经落在肥沃的土壤之中。这些呼吁加强了某些托洛茨基支持者的怀疑和以幻灭的眼光重新审视反对派的过去的倾向。

直到5月中旬,托洛茨基才对这些事情有所了解。别洛博罗多夫在一份寄给他的报告中谈到了流放地的争论。另一名尚在斯大林外交机构工作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柏林把斯大林拟定的行动计划通知了他。据此人提供的情报说,斯大林企图诱使有影响的反对派流放犯忏悔——指望凭藉他们的帮助实施左倾方针并彻底打垮托洛茨基,期望以此来改善他的困境;在对许多重要的托洛茨基派成员投降还没有把握之前,他甚至推迟了全力推行左倾方针的日期。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他在这点上能否成功;如果反对派使他的计划落空,如果它没有被变节所削弱,如果它起码能支持到秋

天,那时斯大林就会看出他那一派是渡不过难关的,反对派就将有一切机会赢得主动权并重新得到权力。但是,如果斯大林成功地摧毁反对派的士气,如果变节的托洛茨基派成员变为他的救助者,那么他就能保住权力以粉碎布哈林集团和推行他的左倾方针,而无须与托洛茨基及其不肯悔改的追随者和解。通报人担心斯大林可能获得成功,因为反对派的士气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许多反对派成员都准备放弃斗争了。[①]

托洛茨基似乎不相信反对派的士气会如此低落。目前流放者中投降的仅是个别人。声名狼藉的投降例子只有前共青团领导人萨法罗夫(Сафаров),他签署了悔过声明而被召回莫斯科。但是,萨法罗夫一事只能看做是例外,因为他不是托洛茨基派成员。他本属于季诺维也夫集团,起初他拒绝和他的领袖一起投降而与托洛茨基派成员一起被流放,只是后来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便投降了。他的行为显然与托洛茨基派的情绪无关。不过,萨法罗夫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表达的情绪却打动了托洛茨基派成员的心弦。他大声疾呼:"现在一切都将在没有我们参与的情况下完成!""一切"指的是反对富农与耐普曼、扩大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和可能实施的农业集体化,因为左倾方针囊括了所有这些方面。托洛茨基派成员一想到在没有他们参与的情况下完成这些巨大的转变,即"第二次革命",都痛苦万分。托洛茨基越是客观地强调斯大林近期的措施是必要的、进步的,并坚决主张反对派有责任支持这些措施,他们就越是感到失望,越是进一步考虑反对派的政策是否正确,因而就更加为这一事实而痛心疾首:他们已被开除

① 这封重要的匿名信写于 1928 年 5 月 8 日,寄自柏林。托洛茨基知道写信人是谁,但他在晚年整理档案材料时已想不起他的姓名。1928 年时,该写信人在将被召回国询问托洛茨基是否应该拒绝回国,托洛茨基似乎劝他回国。

党籍,在这边远地区,他们无法对左倾方针给予任何实际的支持。

在5月底之前,托洛茨基给自己的支持者发了几封信。[1] 他为反对派的过去辩护,并试图指出新的前途。托洛茨基的论点主要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有人认为他高估了布哈林右派的力量,其实并非如此。这一派的力量仍很强大。对反对派号召党反对热月政变的危险,不能说是错误的。由于反对派的行动,热月政变的力量才被遏制。反对派的行动和工人阶级的压力迫使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一刀两断,否则,当前的粮食危机会使他们在对农业中资本主义因素让步的路上走得更远,这样一来就不会有左倾方针了,而是更急剧地向右转。托洛茨基担心,那些断言反对派夸大了来自右的方面的危险的人最终会向斯大林投降。

第二,反对派没有丝毫根据谴责自己在斗争中走得太远。相反,由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怯懦,它走得还不够远。"我们的全部活动都是宣传性的,而且也仅仅是宣传性的。"反对派从未以足够的勇气坚决向党的普通党员发出呼吁。当它终于在11月7日准备这样做的时候,斯大林则企图把它推向内战;于是它只好退让。

最后一点,斯大林抄袭反对派的纲领这一事实不应使反对派沮丧。斯大林派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开始实施左倾政策,但它不可能把这一政策推行到底。因而托洛茨基对自己的支持者保证说:"党还会需要我们的。"

这些论点和保证并不能使许多托洛茨基支持者们感到满意。他没有给他们指出明确的前途。他们继续问,斯大林反对富农是

---

① 参见托洛茨基致别洛博罗多夫(5月23日)和尤金(5月25日)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长期的呢，还是他的左倾方针仅仅是装模作样？他们希望得到一个清楚的答案。这个答案托洛茨基也不知道；而且很可能连斯大林自己也闹不清自己立足于何处。托洛茨基也没有告诉其支持者们，在他们当时的处境下应如何贯彻他的建议以及他们怎样做才能同时既支持斯大林又与他对抗。

1928 年春天，在托洛茨基派流放地中已经形成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一部分人认为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支持斯大林的左倾方针，这是托洛茨基反复向他们交代的责任；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首先继续反对斯大林，这也是托洛茨基敦促他们做的。这样一来，在托一季反对派联盟中的矛盾就再现于托洛茨基派的队伍之中了，它划分为妥协派和不妥协派。妥协派离向斯大林投降的想法还很遥远，但是他们希望反对派缓和对斯大林派的敌意，并准备在左倾方针的基础上与它达成妥协。他们断言，诚实和反对派本身的利益要求他们批判地分析反对派的观点并根据事态的发展改变他们的观点。赞成这一立场的是老一代反对派，他们都是比较稳健的人，在这类人中有思想家和对老党十分怀念的人，还有那些“有教养的官僚”，即经济学家和行政人员，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反对派纲领中的工业化和经济计划，而不是它对党内自由和无产阶级民主的要求。赞同妥协的还有一种人，他们继续反对执政派的意志已被他们承受的磨难所削弱。作为个人，指导他们的动机往往是混杂的，在许多情况下，几乎无法确切地指出到底是哪个动机占了上风。

不肯妥协的托洛茨基派成员主要是年轻人，对他们来说，被开除出党的打击全然不像对老一代那么严重。他们加入反对派是响应它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号召，而不是考虑它的经济愿望和社会愿望。他们是最忠诚的反对派成员，官僚集团的死敌，狂热的反斯大林主义者。这一派人的个人动机也同样难以确定。对大多

数年轻人来说,被开除出党并没有产生巨大的道义上的震撼,他们对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相对来说也不那么关心,但对反对派关于言论自由这一呼吁却热烈拥护,对官僚集团深恶痛绝,这种憎恶情绪由于迫害和流放而变得更为强烈。

托洛茨基反对派中这两翼都倾向于与该派之外的其他集团联合。妥协派越来越接近从前他们蔑视的季诺维也夫派。他们开始重新评价季诺维也夫派,尽管还不想追随他们,但开始对他们的投降论调表示理解,注意倾听他们的论点,同情地注视着他们的行动。另一方面,最极端的不妥协派发现他们与一块儿被流放的那些坚持到底、拒不悔改的工人反对派和以萨普龙诺夫、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为首的民主集中派成员有不少共同之处。工人反对派的最后残余和民主集中派在仇恨官僚集团方面远比托洛茨基的拥护者们走得更远。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公然声明与现存国家和党决裂。他们断言,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死亡,工人阶级应该从头开始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斗争,以此把自己从“国家资本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中产生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富农的剥削中解放出来。在许多年轻的托洛茨基拥护者看来,这两派的目标明确、旗帜鲜明的纲领比托洛茨基煞费苦心、面面俱到的分析和他那“双重政策”更有说服力。他们的纲领更容易理解: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没有那些复杂的辩证分析。民主集中派评论说,像托洛茨基那样既指责斯大林是革命的掘墓人又强调其左倾方针具有进步含义,这样做是十分荒谬的。与斯大林斗争,就意味着反对他而不是支持他。

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中的两派都在等待托洛茨基给他们指明方向,尽管两派都只准备接受其建议中符合各自胃口的部分。两派都大谈反对派的主要原则和共同利益,但随着分歧的加深,同志间的友谊逐渐减弱,彼此产生了猜疑。现在,这两派之间除了彼此仇

恨的目光和辱骂之外，已一无所有。在不妥协派看来，他们那些更温和的同志即使不是逃兵，起码也是懦夫。温和派则蔑视不妥协派，认为他们是极左分子或赤裸裸的无政府主义者、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性的纪律观、对革命的命运没有责任感。不妥协派在怀疑妥协派有意或无意地为斯大林效劳，而妥协派却断言，正是教条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狂热分子的过激言行更严重地败坏了反对派的声誉，更有效地帮助了斯大林。

这两派的发言人都是有影响的反对派成员，都是托洛茨基忠实可敬的朋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第一个讲必须与斯大林主义进一步妥协的人。作为反对派成员，他从未动摇过，在他的性格中没有丝毫自私的或机会主义的痕迹。他的弱点（如果可以称之为弱点的话）在于他根本不管什么策略和通俗性，在于他的观点所具有的理论彻底性上。他开始颇为自信地鼓吹妥协的观点，可追溯到1924—1925年间他撰写的著作。我们知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理论家。他在《新经济学》一书中写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是内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中最危机的时期。……尽快地渡过这个时期并尽快进入社会主义体制并充分发挥其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对社会主义经济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在这一时期中，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承受两种体制的灾难，它既不能从资本主义的优势获益，也不能从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中得到好处。它只得"剥削"农民，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提供资金和积累。我们还应记得，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布哈林及新民粹派发生了冲突，他把后者定性为"我们苏联的曼彻斯特学派"。他当时论证说："（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垄断资本的压力只能以社会主义垄断来对抗。"这种垄断主义应当利用财政政策和通过国家调节价格的机制使经济中的私人经济成分，特别是农村经济服从自己。对布哈林的愤怒叫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回答说:"但是,哪里还有其他出路呢?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能把发展国有化工业的重担……只扔到我们300万产业工人的肩上吗?难道我们的2200万小农不也应该献出他们的一份力量吗?"但是就连他也不赞成剥夺小农和强迫农民集体化;不过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铁蹄下"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冲突如此剧烈是必然的。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热切地响应斯大林的左倾方针,这并不足为奇。他把它看做是对自己理论的肯定,并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完全符合需要的发展。他从一开始就比托洛茨基更坚信新方针的巨大意义。在此之前,他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仅仅流露在他们的理论著作中而不曾表现在实践中,现在却影响到他们各自的立场。托洛茨基从来没有同意过工人国家理应"剥削"农民的观点,起码他从未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样公然地阐述过这种观点。他也不赞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预言的那种强制性的工业化步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中的定理并不排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他的定理暗示,原始积累这一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最困难的过渡阶段可以在一个国家,而且是工业不发达的国家中完成。最后,与托洛茨基不同的是,他强调向社会主义过渡规律的"客观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将迫使党和领导人违背他们的意志成为社会主义的领路人。他指出,所有大型工业的国有化必然会导致计划经济和高速工业化。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反对这一理论就是反对历史必然性本身——只有反对派及时看到了这种必然性并力图使所有布尔什维克都能理解它。让斯大林和布哈林粉碎反对派好了,但是"他们不可能骗过历史规律"。"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往往比我们的经济领导体制更进步",它最终将迫使他们

① 参见本书第五章。

去实现反对派的纲领。

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早期著作中，这些思想还仅仅是一些旁白和暗示，而现在却支配了他整个的思维。在他看来，斯大林因向富农宣战而不自觉地成了这一必然性的违心执行者。托洛茨基多少怀疑地看待左倾方针，并琢磨它会不会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没有任何疑虑，他相信，斯大林绝不是在开玩笑，绝不会从左倾方针后退，而且将被迫愈益无情地与富农斗争下去。其结果是将造成一种全新的形势，不但对于整个国家是如此，而且对于反对派尤其是如此。他坚持说国家正站在重大革命剧变的门坎上，并指出：富农将继续拒绝出售粮食，并用饥饿威胁城市；中农和贫农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但政府对富农的进攻也将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从而导致政府与基本农民群众的大规模冲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他写于1928年春天的一篇文章中断言，斯大林的威胁和非常措施已经在全国掀起如此猛烈的风暴，而为了平息这场风暴，政府将不得不对资本主义作出重大的危险的让步，以至不仅斯大林，甚至布哈林和李可夫也会退缩，拒绝执行这些让步。[①] 只有极右或极左政策可以防止灾难，而所有的迹象表明，斯大林将进一步向左转。

那么反对派在这场剧变中应该起什么作用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指出，反对派一直是历史必然性的自觉阐释者，它表现出卓越的预见能力。它的思想“反映在斯大林的新政策中就像反映在哈哈镜中一样”。如果党早些听取反对派的劝告，今天的危机就不会如此严重。反对派应该一如既往地提倡加速工业化，并同样坚持不懈地号召实现无产阶级民主。但是，尽管反对派正确地解释了时代的需要，它却没有致力于在实践中满足这些需要。斯大林及

---

① 参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农村左倾方针和前途》，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其支持者正承担着实践的任务。他们是历史必然性的实施者,虽然他们并不理解它并长期与之对抗。反对派的行为也有失误之处:它夸大了来自右派的危险以及斯大林派对富农的放纵;它对党内各种倾向及它们与党外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因此,反对派应当坚决改变自己的态度并努力与斯大林派接近。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建议,为达到这一目的,反对派应该请求当局允许召开反对派成员会议,让所有流放地都派代表参加,以便讨论当前的新局势以及反对派的行动。托洛茨基曾谈及左派与中间派联盟反对右派的可能性及合理性,但他没有提出实现这种联盟的任何措施。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此感到不满足。他指出,如果应该建立这种联盟的话,那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因为斯大林正在打击右派;反对派的责任在于行动起来而不是坐等事件产生现成的联盟,因为事件也许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导致结成这种联盟。

托洛茨基断然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建议。他断言,尽管中间派与左派联合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反对派不可能在实现联合上有所作为。看守和囚徒不能成为同盟者。他担心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左倾方针评价过高,但即使不是这样,斯大林派与反对派之间的鸿沟也依然如故。迫害仍在继续。党内仍没有民主自由,党内体制越来越糟糕。领袖绝对正确的教条已经建立;它不但被运用于过去,也被运用于现在。为适应这一教条,党的整个历史已被篡改。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不能采取任何步骤主动迎合执政派。请求迫害者允许召开会议,这本身就是奇耻大辱——请求本身就带有投降的色彩。[①]

5月,所有流放地都讨论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建议。这是

---

① 参见托洛茨基的《致友人书》1928年6月24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对流放者对左倾方针反应的第一次检验。建议被断然否定。绝大多数人的情绪都是反对妥协的，特别是对左倾方针，他们仍像以前一样倾向于认为斯大林是富农的保护人和热月政变分子的同谋犯；他们对反对派的事业充满信心，不愿意考虑对它的政策作任何更改。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虽然没有成功，但他的思想却在许多人的心中播下了种子。看来拉狄克是第一个受其影响的反对派领袖。他从前可并不属于那些瞻前顾后者之列。1927年整整一年他都极力主张反对派更大胆地向执政派进攻、发动党外的产业工人、更积极地表达他们的愤懑，而且认为他们不应当满足于“顾全声誉的姿态”和自诩高深的理论。他没有在建立新党的想法面前退缩，而且赞成支持这一思想的民主集中派加入反对派。他在被流放后更加斗志昂扬，在文章中充满蔑视地谈到季诺维也夫和皮达可夫的悔过以及他们所散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式的病态气息。“他们背弃了自己的信念，并对工人阶级撒谎。谎言是不能帮助工人阶级的。”[①] 甚至在5月里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召开会议时，拉狄克还显然是反对的，最起码他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妥协立场持批评态度。

才不过一个月，这个人就似乎完全变了个样。他本人也以其全部特有的机智、热情和聪慧鼓吹妥协了。他的改弦易辙极大地加强了妥协派，因为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流放地反对派中是仅次于托洛茨基和拉柯夫斯基的最权威的领导人。正如拉狄克的大量书简所表明的那样，此后他反斯大林主义的意志每个星期都在衰退，尽管从这时到他彻底投降还要经过几乎整整一年的

---

① 参见拉狄克1928年5月10日自托博尔斯克致其夫人的信，和5月25日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时间。

如果把拉狄克的变化归咎于生性好变和怯懦,那就太简单了。他的动机要复杂得多。无疑,他没有像别人那样在地下斗争中、在沙皇的监狱中和在西伯利亚的流放中锤炼出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拉狄克地下工作的经验不多。1917 年之前,他的政治生涯主要是在奥匈帝国和德国合法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度过的。拉狄克基本上是个西欧人,豪放不羁,爱交际,习惯于呼吸大都市的气息,习惯于它的骚动,习惯于处在公众事务的中心。在长达 25 年多的时间内,他的观点和机智迷住了各个著名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央委员会和各大报纸的编辑部。他担任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已达 10 年之久。只要他被活跃而忙碌的政治生活包围着,他的信念和勇气就不会抛弃他——即使是 1919 年身陷柏林莫阿比特监狱时,他也保持了他的勇敢、活跃,始终处于事件的中心。而一旦突然被抛到严酷、阴沉、蛮荒的西伯利亚的北部旷野上,他的精神就开始沉沦了。孤独压迫着他。他感到自己仿佛已被逐出生活本身。他的现实感已动摇:他曾作为列宁可敬的同志和顾问,协助后者领导国际运动,莫非与列宁共同度过的岁月仅仅是一场梦?就连精神比他坚定得多的人都受到了这类感受的冲击,例如,国内战争的英雄伊万·斯米尔诺夫从南亚美尼亚写给西伯利亚的拉狄克的信就是这样:

> 亲爱的卡尔卢沙,[1] 你为我们被开除出党而痛苦。的确这对我和其他人也都是极大的痛苦。起初噩梦折磨着我,深夜我常常突然醒来,我不能相信我是个流放犯。从 1899 年起我就为党工作,没有间断过一天,不像老布

[1] 卡尔和查利的爱称。

> 尔什维克团体中的那帮恶棍，他们在1906年以后脱党竟长达整整10年之久。[①]

但是折磨拉狄克及其朋友们的并不仅仅是这种困境。他们还忧虑着革命的命运。他们已习惯于把自己看做是"十月成果"的真正捍卫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一真正代表，而这一理论已被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所冲淡和篡改。他们习惯于相信，凡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有益的东西必然对反对派有益，反对派的失败就是革命的失败。现在他们看到，反对派变成了一个小团体，几乎成了一个软弱无力的小宗派，跟这个伟大的国家和党隔绝了；而它一贯把自己等同于它们。他们在思考，力图完成最崇高使命的运动竟陷于如此可怜的境地，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面临着非此即彼的抉择：如果他们真是十月革命唯一可靠、合法的捍卫者，则他们的悲惨失败只能给革命带来无法弥补的灾难，十月革命的遗产也会丧失殆尽；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十月成果"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下来，尽管发生了上述一切，苏联仍是一个工人国家，那么就可能是反对派错了，它认为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一代表，否定了它的对手们的一切革命美德，这难道不是狂妄自大？难道这场伟大的、震撼世界的布尔什维克运动留下来的一切仅仅是几千个反对派成员？难道革命的大山就只生了一只小老鼠？拉狄克在给索斯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我不能相信，列宁的全部工作和革命的全部工作只给整个俄国留下了5000名共产党人。"[②] 但是，如果拘泥于字面去理解反对派的某些声明，如果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其他派别无非是为反革命铺平道路，那么这个远离现实、背离马克思对历

---

① 此信写于1928年，没有标明日期，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 1928年7月14日托姆斯克来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史的理解的结论就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充满了英雄主义、牺牲、希望、流血和历尽艰辛的布尔什维克的史诗不可能仅仅是毫无意义的夸夸其谈。只要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共同保护富农,反对派的声明和指责就是有道理的。但是,左倾方针使斯大林派与私有财产发生了殊死的对抗,它表明:列宁的事业和十月革命给整个俄国留下的东西绝非几个圣徒和"5000名共产党人",革命的火山不仅不是只生了一只小老鼠就熄灭了,而是仍在喷发。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评论说,正是公有制的"客观力量"推动着俄国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客观力量"通过人——它的主观代表——体现出来。斯大林派是历史必然性的代表。尽管他们思想混乱,犯了许多错误甚至还有罪行,但他们仍是十月革命的捍卫者,是忠于社会主义的人。拉狄克认为,斯大林派证明了他们自己远比反对派所想象的更有价值,反对派应该而且有必要承认这一点,这无损于它的威望;在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反对派是先锋,斯大林派是后卫;这两派之间的矛盾不是敌对阶级的利益冲突,而是同一阶级两支队伍之间的分歧,因为先锋和后卫属于同一个营垒;所以消除分歧的时候到了。许多反对派成员一想到斯大林派会与托洛茨基派和解就感到震惊,而拉狄克指出,这样的重新组合并不比以往党内联盟中的转化更奇怪。"我们一度认为,斯大林是杰出的革命者,而季诺维也夫则无可救药。但后来发生了变化——它们还可能再次变化。"

在上述议论中无疑可以听出绝望的音调,但这是力图摆脱自身并转变为希望的绝望。妥协者的情绪是由布尔什维克俄国日益加深的孤立主义所孕育出来的。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是在苏联国内而不是在它之外去寻找共产主义命运中伟大的、充满希望的变化的。这一事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

后来发生的事件。

那一事件是中国革命失败的结果。1927年12月广州的共产党起义被镇压下去了。这次起义是1925—1927年悲剧的最后一幕，或更确切地说是它的尾声。失败使整个布尔什维克的思维方式本身都受到震动：它甚至更深地侵蚀着并淹没了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传统，加强了俄国的自我中心论的倾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示出是唯一的出路和安慰。但是这一次，孤立主义的浪潮也席卷了反对派，它波及到最边远的流放地，影响到妥协派的思想。最近的这次失败如同斯大林的向左转一样，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有了新理由对反对派的过去感到失望。他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反对派对俄国国内事件的估计部分是错误的——它对国际前途的估计就没有错误了吗？托洛茨基关于苏联热月政变这一看法是错误的——他的不断革命论会不会也同样是错误的呢？

在流放仅仅几星期后，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开始通信交换对广州起义的看法了。托洛茨基由于对真实情况知之甚少，他试图根据《真理报》过时的、少得可怜的报道形成自己的看法，他们就这一问题重新恢复了始于莫斯科时的意见交流。同反对派中的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一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接受不断革命论及其有关中国革命的结论，即中国革命的胜利只能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样，他认为中国革命不能超越资产阶级革命阶段。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各自的流放地在这种分歧的基础上讨论了广州起义的意义。《真理报》曾报道说，起义者在广州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并着手实施工业社会化。托洛茨基在3月2日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中写道，尽管广州起义失败了，但是它为下一次中国革命留下了启示和一个重要的指导方针，即中国的下一次革命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

阶段,它应该建立苏维埃并向社会主义迈进。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回答道,斯大林策划起义仅仅是为了在向国民党一连串的投降之后挽回面子,起义是一次鲁莽的冒险,广州市“苏维埃”及其“社会主义”口号并不是群众运动的有机产物,并未反映出真正革命过程的内在逻辑。[1]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当然比托洛茨基更接近事实,托洛茨基这次是根据不可靠的证据推导出关于中国下一次革命性质的结论的。尽管如此,他的结论仍是正确的:1948—1949年的革命就超越了资产阶级的局限;在这点上,它注定要成为“不断的革命”,尽管它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也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预见大相径庭。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声称:“我们这些反对派中的老布尔什维克必须在不断革命论这个问题上与托洛茨基划清界限。”这个声明本身对托洛茨基来说并不新鲜,使他感到意外的是它那特别强调的语气。托洛茨基的对手们经常提到他过去不是布尔什维克一事,甚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久前还重提过,对此他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此话出自从1922年起就是他亲密的同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之口,就另当别论了。他知道旧账重提不是无缘无故的。更让他吃惊的是拉狄克也对不断革命论加以批评了,拉狄克并不是老布尔什维克,而且迄今为止一直在忠诚地捍卫着这一理论。就是现在,拉狄克也依然承认1906年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进程的预见比列宁的更准确;但他补充说,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不断革命的公式对其他国家也适用。拉狄克断言说,列宁提倡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更适合中国,因为它允许在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可以有一个间歇。

---

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复信(没有标明日期),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显然，这些分歧跟当前争论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托洛茨基被卷进来是很不情愿的。他回答说，中国为下述结论提供了最新证明，即任何一场当代革命，如果它不能在一场社会主义剧变中达到自己的高潮，它就注定会失败，哪怕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例外。不论争论双方谁是谁非，这两个妥协者攻击不断革命论这一事实就很能说明问题，因为托洛茨基并不想把这一理论变成反对派的经典。国外共产主义的失败所引起的失望和孤立主义的倾向使布尔什维克转而反对这一理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单是它的名称就是对他们的孤立主义的挑战。从1924年开始的就不断革命论而展开的教条主义的斗争，其结果是使这一理论在党的眼中变成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象征，变成了托洛茨基主要的异端邪说，成了他所有政治罪名的理性根源。对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来说，不断革命论成了引起恐惧的禁忌。深受怀疑和思考困扰的反对派成员在寻找着重返党内、回到他们失去的乐园的道路，因而他们本能地想离这一禁忌越远越好。不应忘记，托洛茨基因渴望更易于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他建立统一阵线而曾经宣称，他过去写的有关不断革命论的著作现在应该放到历史档案馆中，他不会再在每个问题上捍卫它们，尽管他深信他的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但是他却无法把它们放进历史档案馆。不仅他的敌人不断把它们翻出来，迫使他来捍卫它们，而且他的同盟者也一再这么干。这是他的政治同盟或政治联合体濒临崩溃边缘的又一个确凿的标志。

不久，分歧在一个更具有现实意义而较少理论性的问题上变得公开化了。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按照共产国际章程，反对派有权就他们被开除出俄国共产党一事向大会上诉，它也准备这样做。然而，反对派的申诉被认真听取或反对派领袖被允许出席大会阐述此案的机会几乎等于零。托洛茨基写道："代表大会将会以最权威的方式给我们压上最沉重的

墓碑,值得庆幸的是,马克思主义将会从这座纸做的坟墓中重新站起来,像不屈的鼓手那样发出警报!"[1] 托洛茨基原打算写一篇简洁、直率地批评共产国际政策的文章和一篇简略陈述反对派目的的声明,把它们寄给代表大会。但这一声明在他手中变成了长篇论文,为写这篇论文他用了整个春天和夏天。[2] 可以预料,大会一定会通过主要由布哈林撰写的一项纲领,其草案业已发表,中心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托洛茨基的声明采取了批判这个新纲领的形式。他6月份写完了声明,然后在7月写了一封致代表大会的信,其标题为《何去何从》。他"没有任何保留、含糊,没用任何外交辞令",总结了"5年来共产国际的失败"和"5年来反对派的工作",打算明确划出反对派与其对手之间的鸿沟。在共产国际会议开幕前夕,托洛茨基把这一文件的文本寄到所有的流放地,请反对派成员以集体或个人名义给共产国际大会寄信,以此来支持他。

同时,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准备好了自己的声明,他们的声明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调上都更倾向于妥协。诚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共产国际近几年的政策画出了一张一塌糊涂的资产负债表;他还说出了使各类托洛茨基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和共产国际对立的分歧。但是他在结论中声称:"由于共产国际政策已改变,这些分歧很多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共产国际追随俄国共产党也已"向左转了"。[3] 拉狄克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当即把自己的声明寄往莫斯科。他写道:"如果历史表明,我们昨天还与之唇枪舌战的某些党的领导人比他们所捍卫的观点要好得多,那么,

① 1928年6月17日托洛茨基写的传阅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 该文的英译本以《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为标题。

③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意见书》,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没有人对此比我们更满意的了。”[①]

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分别给共产国际会议写了信，而且其中部分内容彼此矛盾，这件事只能给反对派的事业造成损害。反对派未能展示出团结一致，反而以两种声音说话。当托洛茨基得知此事时，他给反对派主要流放地打了电报，要求全体流放者公开与拉狄克划清界限。各流放地都义愤填膺，一致谴责拉狄克，并把有关的声明寄往莫斯科。最后，拉狄克本人通知大会，撤回自己的信件，表示完全赞成托洛茨基的观点。拉狄克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向同志们道歉，并辩解说，这是因为与托洛茨基联系困难，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批评到达他手中太迟。托洛茨基接受了他的道歉，事情到此暂告一段落。托洛茨基宣称，反对派“调整了阵容”。但是，深刻的分歧并未消除，它只不过是暂时平息了而已。

※　※　※　※　※

一个重大事件帮助托洛茨基把流放者团结了起来。7月召开了中央全会，在这次全会上布哈林派对斯大林派占了上风。最主要的争论问题仍是粮食危机和俄国各城市面临的粮荒威胁。年初采取的非常措施没能遏制威胁，由于乌克兰、北高加索等局部地区冬小麦歉收，使局势变得更为严重。农民极度不满。他们交售的粮食总额只达到革命前总量的50%。一切谷物出口只得停止。[②]征收粮食中采取的粗暴手段足以激怒农民，却不足以吓倒他们。

① 拉狄克致大会的信是1928年6月在托姆斯克写的，存于托洛茨基档案。托洛茨基肯定看过上面所引的“心理分析”段落：在拉狄克论及党的领袖的那句话“我们昨天还与之唇枪舌战的某些党的领导人”中，他用红笔在“昨天”一词下划了着重记号。

② 《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392页。

中央委员会注意到"农民的不满情绪……表现为对随心所欲的行政措施的抗议",承认"这类措施有助于资产阶级分子利用农民的不满而唆使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为(即将)取消新经济政策的说法提供了口实"。[①]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在米高扬作过报告之后,布哈林派呼吁停止实行左倾方针。李可夫要求废除反对富农的政策。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Фрумкин)走得更远,他要求彻底修正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对农民的政策(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为了造成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的混乱,接受了他们的某些思想),并且要求回到上一届代表大会的主要是布哈林的政策上来。中央委员会宣布仍坚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但废除了它的"反富农"非常措施。中央委员会宣布,从今后必须"遵守法律",禁止搜查和袭击各种粮仓和农庄,停止征收粮食和强行借粮。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中央委员会批准将粮价提高20%,而这是仅在3个月前还被它断然禁止的。[②] 事后看来,这是过渡到镇压私人农业之前中央委员会安抚农民的最后一次尝试。这一回合看起来仿佛是富农赢了,仿佛斯大林放弃了左倾方针,仿佛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决定着政策。

不难设想流放中的托洛茨基派将如何对待这一消息。他们又回到了熟悉的战场。他们习惯于在其框架中思考和辩论的旧公式又恢复了。他们看到,"富农的保卫者"在重申自己的主张,动摇不定的斯大林中间派像以往一样再次让步。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更高的粮价,从而打击了产业工人,迎合了富农的利益。但这绝不算完。斗争仍在继续:右派还要重新进攻;而斯大林派将继续退却。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395页。

② 同上,第396页。

热月政变的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近，热月政变分子在进军。托洛茨基正是这样想的，他宣称："李可夫的发言……是右派对十月革命的挑战。……应该接受挑战。"提高粮价仅仅是新的新经济政策的开始；为了安抚富农，右派很快就会坚决试图破坏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他认为李可夫和布哈林作为胜利者很快就会"把斯大林当成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迫害，就像斯大林当初迫害季诺维也夫一样"。李可夫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托洛茨基派认为它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右派获胜"。托洛茨基回答说，这的确是反对派的主要任务。[①]

妥协派一时间在托洛茨基派中完全孤立了。流放者兴高采烈，他们质问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大林的左倾方针在哪儿？它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这居然使你们妄图把我们久经考验的原有思想观点抛到九霄云外并鼓动我们与斯大林派妥协！"他们又一次把斯大林的优势看做是他们与布哈林派的主要斗争中的一个小插曲；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所有忠于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很快就会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即这基本上是右派和左派之间的一场斗争，而且必将选择左派。斯大林表面上的失败激起了他们巨大的希望。杰出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索斯诺夫斯基（Сосновский）这样写道："召回托洛茨基将轰动整个世界，这一天就要来到了"。[②]

※　※　※　※　※

当这场政治风潮正在进行之中，悲剧降临到了托洛茨基家中。

---

① 《七月全会和右倾危险》，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 参见索斯诺夫斯基8月24日致拉菲尔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托洛茨基的两个女儿季娜和尼娜都患有结核病。小女儿尼娜当时26岁,她丈夫涅韦尔松(Невельсон)的被捕和流放彻底摧垮了她的健康。托洛茨基是在春天捕鱼时得知这一消息的,他当时没有充分意识到尼娜病情的严重性,但在其后的几个星期他一直忧心忡忡,痛苦万分。他得知他的两个女儿及她们的孩子们在贫困线上挣扎,不能指望朋友们的帮助,季娜本人因患肺结核发着烧,但她还得昼夜守护在尼娜的床前。他在给女儿的电报中说:"我不能同尼纽什卡在一起,不能照料她,感到十分痛心。把她的健康状况告诉我。吻你们两人。爸爸。"他一再打听消息,但杳无音信。他致函拉柯夫斯基,恳求他了解一下莫斯科的情况。最后,他得知尼娜已于6月9日去世。过了很久,托洛茨基才收到女儿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此信在途中被检查机关扣压了10个星期以上。托洛茨基一想到女儿在死神的门坎上枉然地企盼着他的复信,就心如刀绞。他哀悼她,因为她不仅是他的女儿,还是火一样热情的革命者和反对派成员。他把在她病重和去世期间他所撰写的《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一文献给她。

许多流放者表示同情安慰的信陆续寄到了阿拉木图。这时,又一个打击使托洛茨基深感忧伤和痛苦。尼娜去世后,季娜准备前往阿拉木图。她丈夫也被流放,她为照料妹妹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她的行程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拖下去,最后,阿拉木图等来的是她病重不能成行的消息。长期严重的精神失常使季娜的病情变得更为复杂。她只是在她父亲被驱逐出俄国之前才得以和他见面。

不过,他的一家人还是在阿拉木图城郊的别墅里团聚了一次,那是在谢尔盖来这里度假的时候。廖瓦的妻子和孩子也随他一起前来。他们在这里只呆了几星期。这是这一家的惶惶不安、悲悲戚戚的一次团聚。

※　※　※　※　※

在官方政策"向右转"之后，极端不妥协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几乎在所有的反对派中心都占了上风。大部分流放者对缩小他们与斯大林派之间鸿沟的任何意图连听都不要听。但是，极端不妥协派中却没有一个发言人能具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那样的威信与能力。他们的观点是由索斯诺夫斯基、丁格尔施泰特（Дингельштедт）、埃尔津（Элзин）及其他几个人所形成的，他们表达的与其说是明确的政治思想，不如说是一种情绪。

在这一派中，最有才干、最雄辩的是索斯诺夫斯基。当他信心十足地宣称"召回托洛茨基将轰动整个世界"时，他表达了其他许多同志的渴望。索斯诺夫斯基是托洛茨基的挚友，是最出色的布尔什维克记者之一，他的声望远远超出了反对派的范围。但他既不是政治领袖，也不是理论家。他以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新闻专栏作家和关于道德风俗方面目光敏锐的批评家而著称。他生来就是个叛逆者，发自内心地仇恨不平等、不公正，他愤怒地注视着工人国家里特权官僚的步步高升，尖锐地揭露它的贪婪和腐化（《后宫因素加轿车》）、它的势利和它欲与旧官僚和贵族同化并联姻的暴发户的野心。对那些哪怕稍有与执政派妥协念头的人他也唯有轻蔑。在这一点上，他与拉狄克形成了两个极端。拉狄克说他不相信列宁的党剩下的仅仅是极少的正直的反对派这句话的那封信就是写给索斯诺夫斯基的——对索斯诺夫斯基来说，反对派确实是十月遗产的唯一捍卫者。索斯诺夫斯基写给瓦尔金的一封信最鲜明地反映出他的性格。瓦尔金是他的老同志，与萨法罗夫一起抛弃了反对派并向执政派"投降"。为表达无情的蔑视，索斯诺夫斯基提到犹太人葬礼的一个旧风俗：当死者被抬到墓地时，前来送葬

的犹太教徒便冲着死者的耳朵高喊:"某某,是某人的儿子,要知道你已经死了!"他,索斯诺夫斯基,现在正是这样冲着他的老同志的耳朵喊道,并准备对每个投降分子的耳朵这样大喝一声。他猜疑地注视着拉狄克的转变,琢磨着是不是也该冲着拉狄克的耳朵喊出这些话。[①]

反对派这一翼的其他领导人都是些羽翼未丰的年轻人。丁格尔施泰特是个前程远大的学者、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时就已在波罗的海舰队中以宣传鼓动员而出名,那时他刚30岁出头。埃尔津曾是托洛茨基手下最有才华的秘书之一。这些人对托洛茨基本人是否有动摇的苗头都表示怀疑。因此丁格尔施泰特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他的有关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无疑向我们又迈近了一步"以及反对派应该"无条件地支持这一方针"的意见"使某些同志极为不安。"[②] 他们也指责托洛茨基"纵容"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们同样不赞成托洛茨基对党内改革和恢复党内无产阶级民主抱有希望。

因此,如果说反对派的一个极端包括了那些越来越急于跟迫害者达成协议的人,那么它的另一极端则几乎跟民主集中派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和萨普罗诺夫的追随者以及工人反对派的残余没有区别了。我们还记得,这些"极左"集团1926年就加入了联合反对派,但后来退出或被开除了。在流放中,他们和托洛茨基派成员混杂在一起,并与后者进行着永无休止的争论。他们从托洛

---

① 几乎同时,拉狄克也给瓦尔金写了一封信,此信与索斯诺夫斯基的信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当时是5月,拉狄克刚刚开始产生妥协情绪。他也指责瓦尔金,但语气和缓,并且抱着同情的态度,远没有认为投降是"道义上的死亡"。拉狄克和索斯诺夫斯基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 参见丁格尔施泰特1928年7月8日致托洛茨基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另见他在8月22日致拉狄克的信。

茨基派的思想中推出极端的结论，有时是合乎逻辑的，有时是荒谬的，有时则又合逻辑又荒谬。即使托洛茨基的许多理论超出了他们的理解力，他们仍以夸张的形式表达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内心的各种感情。因此，他们偶尔也说出了托洛茨基起初愤慨地反对、只是后来才接受并表述出来的东西。他们批评托洛茨基优柔寡断，并指出对实行党内民主改革的希望是徒劳的（托洛茨基还需五六年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斯米尔诺夫在1928年写道，斯大林领导下的党是一具“散发着臭味的僵尸”。他和他的追随者坚持认为，斯大林是1923年就已经露头的俄国热月政变获胜的领袖，是全体富农和私有者的真正领导人。他们把斯大林体制斥为一种“资产阶级民主”或“农民民主”，认为只有一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翻它。斯米尔诺夫写道：“1923年党内民主和整个无产阶级民主的消灭已被证明仅仅是农民—富农民主发展的序幕。”[①] 萨普罗诺夫认为，“各资产阶级政党在俄国已经合法地建立起来了”，而说这话是在1928年！[②] 他们这样指控斯大林复辟资本主义，恰恰是在他打算消灭农村私有经济这个俄国资本主义主要的潜在温床之时；他们指控斯大林赞成资产阶级多党制，也恰恰是在他把一党制推向极端并把自己确定为它的唯一领袖之时。这是不折不扣的堂吉诃德式的做法。在托洛茨基身上也能找到这样的因素，只不过他的现实主义和自律制约着它罢了。但是，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和萨普罗诺夫和他们的追随者却丝毫不受这样的限制，狂热地与斯大林的“富农民主”这架风车搏斗；而托洛茨基的某些不理智

① 摘自一篇民主集中派的文章《在列宁的旗帜下》，托洛茨基认为作者是斯米尔诺夫，托洛茨基档案。

② 参见萨普罗诺夫6月18日致其一位不知名朋友的信中的陈述，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的年轻追随者却也被吸引加入其中，尤其是在7月里"左倾方针破产"之后，一时给这架风车造成敌人进攻这一极其虚幻的假象。[1]

在反对派面临歧路之时，托洛茨基尽一切可能防止它的崩溃。他认为这些分歧是反对派中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即"父与子"之间的矛盾，前者过于成熟并承受着知识和经验的重负，后者却充满了纯真的热忱和勇猛。他本人对二者都表示同情，对二者都很理解，同时又为他们担心。他对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有种预感：他在他们的情绪和论证中发现了可能把他们引向投降的苗头。但是他小心地不去疏远他们。他准许他们怀疑，保护他们免遭狂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攻击。托洛茨基耐心地、但却坚定地与他们两人辩论。他承认，他们对左倾方针与国内形势的变化的评价有道理，但请求他们不要得出过于轻率的结论和夸大与斯大林主义真正妥协的机会。同时，托洛茨基竭力约束另一方面的极端分子，告诉他们，他们对反对派的前途过于乐观最终将导致失望：他们不要以为安抚富农的最新尝试是"斯大林的遗言"，不要相信继之而来的只能是斯大林体制的"不可避免的垮台"。托洛茨基认为前景要复杂得多：要想断定目前沸腾局面的结局是不可能的。虽然他也说过"党还会需要我们的"，但他远不如索斯诺夫斯基那样深信"召回托洛茨基将轰动整个世界，这一天就要到了"。[2]

他力图在"为党内改革进行持久而不调和的斗争"这种基础上保持反对派的统一。他坚决拒绝"与斯大林主义接近的幻想"这一立场受到年轻的不妥协者的欢迎，另一方面，他对党内改革的强调

---

① 托洛茨基把赞成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及萨普罗诺夫的观点的人描述为反斯大林主义的无知狂人，但是他赞成与拉法伊尔、柯秀尔、德罗布尼斯和鲍古斯拉夫斯基这类更温和的民主集中派合作。参见他于1928年9月22日写的那封有关民主集中派的传阅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 参见托洛茨基1928年8月30日致"В.Д."(埃尔津?)的信。

又使他与妥协派建立起联系。他反对民主集中派对党的“完全消极否定的立场”,同时尽量抵制老一代反对派沉湎于其中的对党的怀旧迷恋、潜在的孤立感和自暴自弃。他试图重新唤醒他们的使命感,使他们坚信:即使在流放之中,他们也仍代表着沉默的工人阶级,他们所说的一切也是有意义的,工人阶级和党迟早会听到他们的话。他补充说,这种信心不应该导致反对派自吹自擂、狂妄自大,尽管只有反对派始终不渝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但它绝不能忽视它的对手而把他们看成废物,它也绝不能以为列宁的党所遗留下来的仅仅是几个反对派成员。反对派揭露党的“官僚蜕化”虽是正确的,但同时要有分寸感,因为有“各种程度的蜕化”,何况党内仍有许多未腐化的和坚定的党员。“斯大林的地位不仅仅有赖于党的机关的恐怖措施,还取决于部分布尔什维克工人对他的信赖和半信赖。”反对派不应与这些工人失去联系——它必须做他们的工作。[①]

托洛茨基煞费苦心的调停并不总是能被很好地接受。极端分子继续就他对妥协派的宽容而吹毛求疵,同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却指责他纵容那些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民主集中派立场”,后者把反对派看做是一个新党而不是旧党的一派。派别间的隔阂逐渐增长。但只要托洛茨基仍在阿拉木图并从那里施加影响,只要斯大林因其政策仍摇摆不定而没有进一步加深反对派的困境,托洛茨基就能成功地防止其各派支持者的分歧扩大和反对派的崩溃。

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托洛茨基得到了拉柯夫斯基有力的精神支持。他们之间久经考验、坚如磐石的友谊愈加牢固,他们之间

① 参见他论反对派与民主集中派分歧的传阅信(1928年11月11日)以及讨论同一问题的其他信件(7月15日、8月20日、10月2日、11月10日)。

感情更加深厚，更加亲密无间，在思想上更加一致。拉柯夫斯基也曾身居要职，曾是乌克兰布尔什维克政府首脑和外交官，现在被放逐到阿斯特拉罕，在地方计委任低级行政官员。在拉柯夫斯基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书信往来以及一些目击报告中所表现出的他那坦然平静地承受着命运考验的态度和他在流放中的脑力工作的紧张程度与宏大的规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①] 他把圣西门和安凡泰(Enfantin)的著作、许多法国历史学家论述法国大革命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狄更斯的小说和俄国文学经典作家的作品放在手提箱里带到阿斯特拉罕。在他被流放的头几个星期中，他特别喜欢阅读塞万提斯的作品。他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重读了《堂吉诃德》，它使我感到巨大的满足。"他在怀念故乡多布罗加时就重读奥维德的作品。他关心阿斯特拉罕地区的经济规划工作，因此勤奋地研究里海草原的"地理剖面图"。在对托洛茨基叙述自己的工作时，他大量引用了但丁、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但他最热衷于从事的是重新研究法国革命史，[②] 他还撰写了一本书《圣西门传》。他向托洛茨基讲述自己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向后者复述圣西门有关俄国和美国是未来的两个敌对的巨人这一预言(这个预言不如托克威尔(Tocqueville)后来作的同类预言那样知名，但更独特)。他虽然抱怨年龄不饶人、记忆力和想象力都逐渐衰退(拉柯夫斯基被流放时已年满55岁)，但仍"十分勤勉地工作!"他以慈父般的温情劝告托洛茨基不要把精力和才干仅

① 路易·费舍曾在阿斯特拉罕拜访过拉柯夫斯基，他说，他看到地方当局让拉柯夫斯基为一个美国旅游团当翻译。拉柯夫斯基面容憔悴，疲惫不堪。当翻译结束时，一位美国游客想给他小费，他以礼貌的手势半正经半幽默地拒绝了。

② 拉柯夫斯基任驻法国大使时，为鼓励苏联历史学家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档案材料做了很多工作，他本人对法国大革命十分感兴趣，在他带到流放地并且十分珍爱的书籍中有奥拉尔的著作《法国革命政治史》，此书是作者赠给他的。

仅浪费在眼前的事务上："对你极为重要的是，你也应该选定一个类似我的圣西门那样的宏大课题，它能促使你以一种新眼光看待许多问题，从一定的角度重读许多东西。"[①] 拉柯夫斯基为托洛茨基搞到了一些阿拉木图所没有的书刊杂志。他与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孩子们保持联系，分担着这个家庭的不幸。托洛茨基反对妥协派和激进派的斗争都得到了他在政治上的支持，在反对派的所有领导人之中，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吉耶维奇·拉柯夫斯基是托洛茨基最依恋的一个。[②]

拉柯夫斯基的政治品质在很多方面与托洛茨基的政治品质不同。当然，拉柯夫斯基不具备托洛茨基那样的思想力量、热情、雄辩才能和蓬勃的精力，但他头脑清醒，思想深刻，或许还更擅长哲学抽象思维。尽管拉柯夫斯基忠于反对派，但并不是它的狂热分子，因为他看事物的视野更开阔，超越了反对派的当前目标和策略的框架。他坚信反对派的正确，坚信它的正确性最终会得到证明，但对它获得政治成功的机会却没有多大信心。他站在远处打量着革命的宏大画面，清楚地领悟到贯穿其中并影响所有敌对派别的那个悲剧旋律。这旋律就是："革命胜利后，革命政党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

拉柯夫斯基在《致瓦连廷诺夫的信》中发挥了这一思想。1928年夏天，这篇随笔在托洛茨基派成员的流放地引起了骚动。[③] 拉柯夫斯基问道，如何解释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出现的深不可测的邪恶与道德沦丧？而这个党却是由最正直、最忠诚和最勇敢的革命

① 参见拉柯夫斯基1928年2月17日至托洛茨基的信，载《反对派通报》第35号。

② 托洛茨基将其著作《文学与革命》一书献给"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吉耶维奇·拉柯夫斯基，战士、人和朋友"。

③ 指1928年8月2日的信件文本，存于托洛茨基档案。瓦连廷诺夫曾任《劳动报》主编，后来被打成托派分子而遭流放。

家组成的,仅仅指责执政派和官僚集团是不够的。更深刻的原因在于"革命后群众的冷淡和获胜的工人阶级的麻木"。托洛茨基曾指出,俄国的落后、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孤立以及资本主义的包围是造成国家和党的"官僚主义蜕化"的主要因素。在拉柯夫斯基看来,这个解释是正确的,但不充分。他争辩说,即使在最先进的和全面工业化的国家,甚至在由清一色工人组成的并且只被社会主义国家环绕的国家,群众在革命后也会陷入消沉而冷漠起来,放弃缔造自己生活的权利,使专横武断的官僚得以篡权。他宣称,这是任何获胜的革命所固有的危险,它是执政的"职业风险"。

通常,在革命和内战之后继之而来的是革命阶级的社会分化。法国第三等级在战胜旧制度后解体了。它自身内部的阶级对抗,即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冲突破坏了它的统一。由于其成员的"职能专业划分",其中一部分人成了新的统治者,另一些仍是被统治者,因此,即使由同一阶级组成的集团也会解体。"职能调整其机构使之适应自己并改变它。"由于第三等级的解体,革命的社会基础缩小了,权力掌握在更少数人的手里。任命制取代了选举制。甚至在热月政变之前这一过程就发展得很远了。罗伯斯庇尔加速了这一过程,尔后又成了它的牺牲品。最初,处于饥饿和贫穷中的人民的愤激使雅各宾党不能把革命的命运交付于全民表决,后来,雅各宾党的专政和恐怖统治把人民驱向政治上的冷漠,这使热月政变分子得以消灭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党。在俄国,在工人阶级的"机体和生理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并导致了类似的结果:选举制被取消,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任命制,等级制代替了代表机构。布尔什维克党也分解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它解体了;其性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此,"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到1928年时已变得面目全非了"。

极度深重的冷漠仍在麻痹着工人阶级。与托洛茨基的观点不

同,拉柯夫斯基并不认为是工人的压力迫使斯大林推行左倾方针的。这是一种从上面推行的官僚操作。基层党员没有表现出丝毫首创精神,并不怎么热衷于捍卫自己的自由。拉柯夫斯基提到巴贝夫于1794年说过的一句名言:“教育人民热爱自由比赢得自由更困难。”巴贝夫发出战斗的号召是:“自由加普选制的公社!”但是他的号召根本没人理睬。法国人“忘记”了自由。还需要从1793年到1830年长达37年的时间,法国人才重新学会要求自由、抛弃冷漠并投入新的革命。拉柯夫斯基没有明确提出藏在他心中的问题:俄国群众恢复他们的政治生命力和能量还需要多久?但是他的论据却暗示,俄国的政治复兴只能出现在相对遥远的未来,要经历许多重大的社会变化,要等工人阶级成长壮大、重新团结一致、从无数的打击和失望中恢复过来之后。他“承认”他从未指望反对派会迅速获得政治上的胜利,他总结说,反对派应把自己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对工人阶级的长期政治教育上。拉柯夫斯基说,在这方面反对派做得不多,也不想做得太多,尽管它比执政派做得要多,应当记住,“政治教育果实的成熟期是极其漫长的”。

其言外之意是:反对派即便有对当代事件进程施加影响的机会,那也是微乎其微的,尽管它可以满怀信心地等待最后的平反,可能是死后的平反。拉柯夫斯基形象生动地描绘出反对派的主要困境:它被夹在道德败坏、背信弃义、专横残暴的官僚与无动于衷、消极冷漠的工人阶级之间。他强调说:“我以为,指望在官僚集团统治基础上进行任何党内改革都是极不实际的。”他预言在今后许多年里也不会出现来自群众的复兴运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虽然拉柯夫斯基没有说出此话),可能在几十年里,现有的官僚集团仍将是唯一能够倡导和实际改变苏联社会的力量。反对派根据自身的原则必然仍对官僚集团怀有不可调和的仇恨;但是它却不能依靠人民的支持有效地反对这一集团。因而,它不可能在党和国

家的进化过程中起任何实际作用,它已被过早地从当今苏联社会改造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排除出去了。它只有指望主要在思想领域中为未来工作。

拉柯夫斯基《致瓦连廷诺夫的信》所隐含的这一结论在一定场合可以满足狭小圈子中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但它对任何政治运动都意味着死刑判决。拉柯夫斯基以其冷静、深邃的洞察力沉着地看待革命的进程和反对派的前途。对于读过《致瓦廷京诺夫的信》的几千名反对派成员来说,是不能期望他们也具有这份超然与沉着的。不管他们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他们都是革命实干家和斗士,都热切地关注着自己斗争的直接结果,关注着震撼并塑造他们国家的剧变。他们加入反对派就是参加政治运动,而不是参加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聚会,而且他们希望反对派在一场政治运动中获得胜利。甚至最英勇、最忘我的叛逆者和革命者也往往是为了他们相信自己这一代就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目标而战斗的,只有极少数杰出人物和思想家才能为自己身后的历史嘉奖而斗争。

大多数反对派成员曾努力为巩固苏联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促进工业化、复兴国际主义精神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党内自由进行过斗争。他们不肯相信这些目的对他们来说是不能实现的。他们已经发现仅凭自己的努力无法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必须或是求助于群众,或是求助于官僚集团。但他们不能接受那种观点,即求助哪一方都同样枉然。为了谋求政治上的存在,他们不得不相信:或是群众迟早会起而反对官僚集团,或是官僚集团出于其本身的需要而完成反对派坚持的许多改革。那些激进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把目光转向群众,而妥协派则把目光转向执政派或它的某一部分。这两个希望都是幻想,只不过程度不同。在这个国家中没有任何有利于反对派目标的自发群众运动的迹象。不过,官僚集团显然处于动荡之中,它在诸如工业化和农民政策等问题上产生了

对立。妥协派看到，在这些问题上，毕竟斯大林派更接近反对派，而这一点鼓励了他们，他们指望斯大林派在其他方面也会更接近他们。官僚集团是唯一表现出有效的社会首创精神的力量这一事实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希望：官僚集团或许还会恢复党内民主。但这一可能性是如此渺茫、难以指望，因为总的来说，党内自由和无产阶级民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空想。

托洛茨基对拉柯夫斯基的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并把这些观点介绍给反对派。但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其中某些更深刻但比较悲观的含义。在托洛茨基身上，超然的思想家和积极的政治领袖现在正处于冲突之中。思想家同意这种分析的结论，即反对派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实际上已经失败；领袖则对这一结论不屑一顾，更谈不上接受它了。理论家能够承认，俄国如同当年的法国一样"忘记了自由"，而且很可能直到新一代登上政治舞台后才能重新学会要求自由。实干家则必须从自己的头脑里赶走这种前景，并力图给自己的支持者们指出一个实际目标。思想家可以超越自己的时代并为后代的裁决而工作。反对派的领袖则必须回到自己的时代并生活在其中，还要和自己的支持者一起相信，他们在这个时代中起着伟大的建设性作用。身兼思想家和政治领袖的托洛茨基不愿脱离世界而去孤立地考虑他的国家。他始终坚信，布尔什维克最糟糕的困境在于他们的孤立，革命向其他国家的传播有助于苏联各民族人民比他们在别的情况下更早地重新学会要求自由。

※　※　※　※　※

1928 年夏末，莫斯科的托洛茨基派秘密组织把令人吃惊的消息传送到阿拉木图。消息中的详细证据表明斯大林准备恢复左倾方针，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已经决裂，而且不可挽回。此外，来自

莫斯科的消息还证实，无论是布哈林派还是斯大林派都在考虑与反对派结盟，两派已经开始为获得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的支持而竞争。召回托洛茨基的时候似乎终于就要到来了。

莫斯科的托洛茨基派与加米涅夫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后者将自己与索柯里尼柯夫在中央委员会7月全会上的谈话告诉了他们。索柯里尼柯夫当时还是中央委员，他算是半布哈林派成员半季诺维也夫派成员。看来他对建立反斯大林中间派的左右翼联盟抱有希望，而他本人愿意充当中间人。他对加米涅夫讲述道，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夸口说，他在反对布哈林派的斗争中很快就会得到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的支持，他们"已是他的囊中之物"。布哈林惊恐万分，他通过索柯里尼柯夫恳求左派反对派不要帮助斯大林，甚至建议进行反斯大林的联合行动。但是在7月中央全会结束时，布哈林取得了表面的胜利，或毋宁说他与斯大林达成了和解。不过他们很快又发生了冲突；于是布哈林与加米涅夫秘密会面，索柯里尼柯夫也在场。布哈林对加米涅夫说，他和斯大林都将被迫求助于左派反对派，试图与它结盟。布哈林派和斯大林派对于向宿敌求援尚存畏惧，但两派都知道，这一进程"在两个月之内将是不可避免的"。布哈林说，无论如何可以肯定，被开除和流放的反对派很快就会被召回莫斯科并恢复党籍。[①]

加米涅夫将他与布哈林会晤一事详细告诉了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当时正在沃罗涅日处于半流放中。这番叙述向我们再现了当时的场面及其特有的情调和气氛。与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

① 莫斯科的托洛茨基派的报告存放在托洛茨基档案中。有关索柯里尼柯夫与加米涅夫谈话的叙述写于1928年7月11日，有关布哈林与加米涅夫会见的叙述写于1928年8月11日。有关托洛茨基派与加米涅夫会见的叙述写于9月22日。几个月后，关于加米涅夫与布哈林谈话的叙述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派中秘密传开时，正值托洛茨基被驱逐出俄国。

夫秘密会晤的布哈林和仅7个月前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帮助扼杀反对派的那个布哈林已判若两人。在他身上，昔日的自信和自鸣得意已踪迹皆无，当时他曾嘲笑加米涅夫"投靠托洛茨基"，斯大林对他大加赞赏，说他不是在与反对派领袖"争论"，而是"宰杀"他们。如今，他悄悄地来到加米涅夫的住宅，胆战心惊，面色苍白，浑身颤抖，东张西望，连说话都压低了嗓门。谈话开始时他请求加米涅夫不要对任何人讲他们会面的事，甚至在信函和电话中也不要提起，因为他们两人都在格别乌的监视之下。他来"投靠"昔日的政敌时精神已经崩溃，而后者自己的士气也已经垮了。布哈林由于惊慌失措而语无伦次。他不提斯大林这个姓，只是像疯了似的一个劲儿地说："他会杀死我们"，"他是新成吉思汗"，"他会把我们都掐死"。布哈林留给加米涅夫的印象是"注定要毁灭的人"。

布哈林断定领导层的危机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他说，仅上半年，格别乌就不得不镇压了150起遍布全国的自发农民暴动，这是斯大林的非常措施把农民逼上了绝路。7月，中央委员会万分恐慌，斯大林只好假装退让：他暂时取消了非常措施，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麻痹布哈林派，从而更好地准备新的进攻。从那以后，他成功地把同情布哈林派的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争取到了自己一边，这使他在政治局中成了多数。布哈林说，现在斯大林准备对私有农业发起总攻，他接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思想，证明社会主义只有靠"剥削"农民才能在俄国进行原始积累，因为与早期资本主义不同，它不能靠剥削殖民地和借助外国贷款而发展。斯大林由此得出结论（即布哈林称之为"愚蠢无知"的结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民众的反抗也愈强，只有"坚强的领导"才能粉碎这种反抗。布哈林评论说，"这意味着警察国家"，但"斯大林将无所不用其极"，"他的政策正把我们推向内战，他必将把反

叛淹没在血泊中","他将指控我们是富农的保护者";党正面临着深渊;如果斯大林赢了,那就没有丝毫自由可言。然后又是:"他会杀死我们","他会掐死我们","罪恶的根源就在于党政不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布哈林决定求助于左翼反对派,他认为昔日的分歧大部分都已经失去了意义。他对加米涅夫说:"我们与斯大林的分歧比起与你们的分歧要远为严重。"现在生死攸关的问题已不是一般的政策分歧,而是捍卫党和国家的问题,是所有反斯大林者起而自卫的问题。布哈林知道,虽然左翼反对派支持反富农的政策,但它并不愿意采取斯大林所采取的那种轻率的、血腥的手段。在任何情况下,思想对斯大林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他是个无原则的阴谋家,使一切都服从于他的权力欲……他一心只想报复……背后下毒手……。"因此,斯大林的反对者们不能再让昔日的思想分歧妨碍他们携手自卫。

布哈林急于鼓励潜在的伙伴,就列举了他认为准备反对斯大林的所有组织和有影响的人物。他说,工人对斯大林的仇恨已经公开化了;有一次,喝醉了的托姆斯基附在斯大林的耳边低声说:"我们的工人很快就会朝您开枪,肯定会的。"基层党员对斯大林无原则这点十分不满,当推行左倾方针时,他们问:"为什么李可夫仍是人民委员会主席,而托洛茨基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布哈林断定,罢免斯大林的"心理条件"尚未成熟,但正在成熟。确实,斯大林把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争取过去了;奥尔忠尼启则开始仇恨斯大林,可惜他不够勇敢;但是安德列耶夫、列宁格勒的那些领导人(基洛夫是否在其中?)和亚戈达(Ягода)与特里利谢尔(Трилиссер)这两位格别乌主要副手加上其他一些人都准备转而反对斯大林。尽管布哈林断言这两位格别乌领导人都站在他一边,但他说到格别乌时仍不免谈虎色变,因此他那番关于他可以调动起反斯大林力量的话并不能让他的对话者信服。

几个星期后，莫斯科的托洛茨基派将他们与加米涅夫最后一次会晤通报给阿拉木图。"斯大林要跟左派反对派讲和了"，加米涅夫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告诫季诺维也夫不要急于响应斯大林的呼吁，以免损害他们的地位。他坚信圆满的结局即将实现；他"与托洛茨基一致"认为，斯大林的政策不仅激起了富农的反抗，也激起了所有农民的反抗，局势紧张到了爆炸的边缘。因此，党的领导层的人事变动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今年年底就会出现"。但是，加米涅夫恳求托洛茨基采取行动，使他回到党内更容易些。"列夫·达维多维奇现在就应当发表声明说：'让我们回来，让我们共同工作。'但是列夫·达维多维奇太固执，他不会发表这样的声明。若不派专列去接他，他会一直呆在阿拉木图。然而，到了他们真正下决心派出专列的时候，局势就将不可收拾了，克伦斯基就会站在大门口了。"①

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像加米涅夫预料的那样直接提出建议。相反，他多次意味深长地暗示和解的可能，而且他确信这些暗示会以迂回的方式传到托洛茨基的耳中。他对一位亚洲国家的共产党人这样说，他承认，即使在流放中，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也与民主集中派不同，仍坚持"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立场"；而他，斯大林，他一心想的就是一有机会就让他们回来。斯大林的亲信们，特别是奥尔忠尼启则，已公然谈论托洛茨基复出之事。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外国代表团被告知，应该认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联盟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②

---

① 加米涅夫对托洛茨基攻击投降派不满；尽管如此，他和季诺维也夫仍为托洛茨基的利益与布哈林和莫洛托夫交涉，抗议他们仍把托洛茨基留在其条件有损于他健康的流放地。

② 参见托洛茨基档案中一封没有标明日期、题为《大会的筹备工作》的信及其他寄自莫斯科的没有标明日期的信。

危机感这时已从俄国共产党传染到了共产国际。尽管有表面上全体一致和形式上的热情,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对斯大林和布哈林共同主管的共产国际事务仍感到失望。经审查删改过的托洛茨基针对新纲领写的批判书在大会上传阅开来,按托洛茨基的通信人的说法,它对大会产生了影响。[1] 甚至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中那些被公认为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在私下交谈时,也对斯大林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的教条和仪轨表示十分厌恶。有人告发陶里亚蒂－埃尔科利(Togliatti－Ercoli),说他抱怨大会工作不切实际、是"无聊、可悲的炫示忠诚的表演"和他对俄国领导人的傲慢态度的不满。据说他这样讲:"绝望得真想上吊。悲剧在于你在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上不能说真话。我们不敢说话……。"陶里亚蒂发现托洛茨基的批判书"非常有意思……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作出了非常敏锐的分析。"法共领导人多列士(Thorez)描述这次代表大会的情绪是"不安、不满和怀疑的";他也非常赞成托洛茨基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中的许多观点。他问道:"为什么要强迫我们接受这个理论?"即使俄国共产党需要与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它也不应接受斯大林的教条。他称共产国际的蜕化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对大会隐瞒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能的,因此,那些受信任的外国代表预先得到通告,在与布哈林彻底决裂的情况下,斯大林可能认为与托洛茨基建立联盟是可取的或必要的。

在8至9月间,类似的消息通过许多渠道陆续传到阿拉木图。无疑,斯大林本人一直有意让人相信,他赞成马上召回托洛茨基。其中部分是欺骗,是兵不厌诈。斯大林暗示与托洛茨基讲和,主要是为了恫吓布哈林和李可夫,迷惑托洛茨基派,使其中的妥协派更急于妥协。但是,斯大林并不仅仅是在虚张声势。对于他与布哈

---

① 美国共产党从俄国带出来批判书正是这个版本,于1928年在美国发表。

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最后较量的结果和他在国内危机的压力下同时对付左、右两个反对派的能力，他还没有十分的把握。为使两个反对派屈服，他不厌其烦地做工作；但只要他还没有完全获得成功，他就不能不把门留出一条缝隙，以便和其中一派联合。由于他的地位已经远比布哈林的牢固得多，所以他用不着提出直接的建议。但他继续放他的试探气球，观察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们的反应。

托洛茨基对其中某些事件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一些事件也出乎他的意料。城乡冲突以如此危险的程度重新爆发，斯大林与布哈林决裂，他的某些对手和投降派重新把目光投向他，这些都在托洛茨基的预料之中。他当时仍倾向于认为，斯大林集团不可能自救，而且将被迫求助于左翼反对派。他曾一再非常正式庄重地声明，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反对派将"履行自己的职责"，不拒绝合作。他现在再次重申这一保证。但是他补充说，他蔑视任何"与官僚主义的同流合污"；他不愿为他在政治局的地位而做幕后交易，也不会满足于陷入困境的斯大林在对党的机关的控制上分给他一杯羹。他声明，他和他的同志只能是在完全恢复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重回党内，而且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党的领导的产生应该通过普通党员不具名投票选举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秘密会议上派别斗争的狡诈手段。[1]

斯大林的处境尽管困难，但还没有绝望到只能接受托洛茨基的条件的地步。托洛茨基却在等待斯大林的处境进一步恶化，那时，斯大林派的大多数人可能会或者和领导一起或者在甩掉领导的情况下按他的条件寻求联合。由于事关原则和自身利益，他不考虑其他任何条件，根据他的全部经验，他不相信"机关"的仁慈。

况且，托洛茨基正面临着出乎预料的事件转折。他几年来从

① 参见托洛茨基致C.A.的信(1928年8月20日)。

未停止谈论“来自右派的危险”,警告党应提防富农的保护人和热月政变分子。他准备与斯大林结成“统一战线”反对布哈林。但现在,正是布哈林恳求左翼反对派与他联合反对共同的敌人和压迫者——斯大林。当布哈林胆战心惊地嗫嚅着“他会掐死我们”,“他会杀死我们”时,托洛茨基不能把它仅看成是吓破胆的人的病态想象而不屑一顾。他本人也反复谈到“革命的掘墓人”正策划对党的一场屠杀。当然,布哈林的转变太晚了,因为他已经帮助斯大林镇压了反对派,消灭了党内自由。但在斯大林的对手中,他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行径同他如出一辙,而这并没有妨碍托洛茨基与他们联合。那么,他要不要推开布哈林伸过来的手呢?如果说斯大林从托洛茨基的书中剽窃了一页,即左倾方针,那么布哈林则拿了另一页,他以无产阶级民主的名义求助于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进退维谷:如果他对布哈林的求援充耳不闻,那就否定了他本人的一个原则;如果他同意布哈林的请求,则破坏或使人觉得他在破坏他的另一个原则,而正是出于这一原则,他有责任支持左倾方针。

为了寻找出路,他对斯大林的左倾方针采取了更慎重的立场,而且也不那么强调反对派对它的支持了。这除了布哈林的靠拢外,他还有自己的理由。他在苏联各地的追随者在给他的信中都谈到了斯大林在春天和夏初在全国搞的恐怖活动和对待中农甚至贫农的“骇人听闻的残忍行为”。官方试图推卸责任,对人民说是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的压力促成了反农民运动。所有迹象表明,斯大林一旦重新推行左倾方针,必将导致血腥的灾难。托洛茨基预先拒绝对此承担任何责任。1928 年 8 月,距开始“消灭富农”约有 1 年,他给其追随者写信说,尽管反对派决定支持左倾方针,但他从未建议采取斯大林那种方式对待农民。反对派赞成对富农征收更高的税、国家对贫农的扶持、公正地对待中农、鼓励自

愿的集体化，但不赞成那种主要靠行政力量和残酷打击的左倾方针。在判断斯大林的政策时，“不但必须注意他在干什么，还要注意他怎么干。”[①] 托洛茨基没有建议反对派不要支持左倾方针，但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强调把支持与严厉的批评结合起来。他坚决反对那些看到斯大林与布哈林决裂和斯大林将要再次攻击富农这一迹象而情绪再度高涨的妥协者。托洛茨基轻蔑地驳回了加米涅夫的试探。他声明，他不会为了“更容易”回到党内而采取任何行动，决不会乞求迫害者把他召回莫斯科。如果他们愿意这么做的话，那是他们的事。但即使那样，他也不会停止抨击他们，也不会停止抨击投降派。[②]

这不仅是托洛茨基对加米涅夫建议的答复，也是对斯大林模棱两可、遮遮掩掩的讨好而作的答复。他们之间的和解是不可能的。对布哈林的呼吁，他的反应要友好得多，他在9月12日《与一位善良党员的坦率谈话》的通函中表明了这一点。“善良党员”指的是一位布哈林派成员，他给托洛茨基写信询问后者对右翼、今日的右倾反对派的态度。托洛茨基回答说，在工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的重大问题上，他们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但是他补充说，他愿为达到一个目的与右派合作，即恢复党内民主。如果李可夫和布哈林愿意与左派共同努力，旨在筹备通过公正选举的、真正民主的代表大会，他就赞成与他们合作。

这一声明在各流放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中引起惊讶甚至愤

---

① 参见托洛茨基8月30日致流放到阿克秋宾斯克的“红色教授”兼经济学家帕拉特尼科夫的信。在7月13日致拉科夫斯基的信中托洛茨基写道，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斯大林已经向左转，只不过还拖着一条“右倾尾巴”，应劝他丢掉这条“尾巴”。托洛茨基指出，即使真是如此，那也没有意义：“猴子就是没有尾巴也不是人。”托洛茨基档案。

② 《致友人书》10月21日。

怒。除了妥协派,还有许多其他流放者表示反对,他们提醒托洛茨基:他本人曾多少次将右派与左派以反对中间派为目的的联合称为是无原则的、毁灭性的,说它不只一次导致了革命的失败。难道热月政变分子不正是雅各宾党中反对罗伯斯庇尔中间派的这种左派与右派的罪恶联盟吗?反对派的全部政策迄今为止难道不都是以在适当条件下准备与斯大林派结盟反对布哈林派为前提而决定的,而并非相反吗?难道不是托洛茨基本人刚刚不久前还再次庄严地肯定了这一原则并向共产国际保证,左翼反对派永远都不会与从右面攻击斯大林的人结盟吗?

托洛茨基回答说,他仍像从前一样认为主要敌人是以布哈林为首的右派而不是以斯大林为首的中间派。他没有在政治问题上建议与布哈林结盟。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为实现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恢复党内自由而与右派联合。他准备与布哈林谈判,"像决斗者通过助手就他们所应服从的规则和条件进行谈判一样。"① 左派所希望的只是在党内民主的原则下与右派辩论,如果右派也愿意的话,那么,为党内民主原则的胜利而与他们合作,将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这一声明对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来说并没有说服力,他们已经习惯于把布哈林派看成是主要敌人,所以根本不会考虑与后者合作。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不懈地攻击斯大林派的两面三刀,并视其为右派的同谋,以至现在一想到他们自己也要成为右派的同谋就惊慌不安。他们同样也不同意托洛茨基的解释,即他向布哈林派建议的仅仅是技术性的合作,就像决斗双方商定决斗规则一样。从一方面来说,这不是决斗,而是一场有3派参加的斗争,在这场

① 参见《当务之急》(没有标明确切日期),这是托洛茨基对批评者的答复,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斗争中，任何一种两派联合自然是针对第三派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党内民主是政治课题，它本身对所有争论的问题都有影响。左派与右派的联盟尽管其目标有限，但它如果获得成功，必将导致斯大林派的垮台，而且这将是在它开始推行左倾方针之后。左倾方针那时必然会废止，后果将取决于左右两派斗争的难以预料的结局。如果右派获胜，他们肯定会提倡新的新经济政策，而这正是托洛茨基派极为担心的。能进行这种冒险吗？当国家濒临经济灾变和农民骚动时，他们能否让党经受这种考验？在这一过程中，斯大林派可能垮台，但是布哈林派和托洛茨基派却不可能通过民主途径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联合执政。这样，他们可能无意中毁了党，为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开辟道路。那时就会真正出现典型的热月政变局面，因为正是备受恐怖折磨的左派与右派结成这样的同盟而导致了罗伯斯庇尔的失败。现在托洛茨基不是正在玩热月政变之火吗？而这些年来不正是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告诫人们要警惕这种危险吗？

托洛茨基和反对派陷入了绝境。若说他们还有自救的机会的话，就是应与所有反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结成最广泛的联盟。但是，他们很难指望通过这种联盟获救，他们有理由担心这种联盟会葬送布尔什维克党。无论托洛茨基还是布哈林都是出于自卫的瞬间反应而考虑暂时联合的，但他们之中谁都无法在这一反应基础上走得更远。两派更关注的不是保护自己而是保护党，再不然就是他们并没有认清他们面临的走不出来的怪圈。无疑，某些领导人还是意识到这点了。加米涅夫在叙述他与布哈林的会晤时说了这样一些不祥的话："有时我对叶菲姆说：'难道我们的处境还不令人绝望吗？如果我们的国家毁了，我们也将跟着完蛋；但若它得救了，可斯大林最终又改变了方针，我们仍难逃脱毁灭的命运。'"在致同志们的一封信中，拉狄克描述他们所面临着的抉择是在"两类

政治自杀之间"的抉择:或是彻底与党隔绝,或是放弃自己的信念重回党内。[①]

布哈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提议的结盟和托洛茨基试探性的答复因此而不了了之。布哈林派成员抵制其领袖的建议,正如托洛茨基派成员抵制其领袖的答复一样。他们认为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是主要敌人,而且他们在不久前还指责斯大林是变相的托洛茨基分子(或像布哈林所说的那样,斯大林接受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能考虑与托洛茨基派结盟呢?他们知道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都暗中对左倾方针抱有好感。布哈林从他与加米涅夫的谈话中肯定猜到了这一点。如果说连在流放中的托洛茨基派都惧怕党会因左右派的联盟而受到打击,那么与执政派有着千丝万缕关系并一直置身其中的布哈林派对这种前景就更加担心了。斯大林暗示,如果他们不老实的话,他本人就将与托洛茨基联合。这使他们胆战心惊,他们决定要老老实实。他们甚至都没有尝试把反对斯大林的斗争公开化——像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当时所做的那样。要是他们这么做的话,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当初剥夺了托洛茨基派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同时也剥夺了自己的这种自由。因此,布哈林不能继续靠拢托洛茨基派或响应托洛茨基"有限合作"的想法。

这些事件加强了托洛茨基派中妥协者的力量。现在,被流放的反对派领袖中威信最高的3个人——斯米尔加、谢列布里亚科夫和伊万·斯米尔诺夫站到了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边。他们争辩说,看来斯大林在7月间要向富农让步时显然并没有做出"他最后的决定",左倾方针仍在继续。托洛茨基含蓄地承认,左翼反对派不应执著于自己光荣的孤立,它应当寻找同盟者;它理所

---

① 此信所标日期是9月16日,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当然的同盟者是斯大林派，而不是布哈林派；但这并不表明妥协派应该因斯大林整右翼反对派的方式而欢欣鼓舞。斯米尔加写道：“今天政权打击布哈林就像它当初打击列宁反对派一样，扼杀（布哈林派）也是背着党和工人阶级干的。”但是“列宁反对派并没有因此而在政治上同情右派”，它的口号仍是“打倒右派！”[①] 这是托洛茨基在夏季提出的口号，但并不是秋季的。他与妥协派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和敌对起来。他几乎中断了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联系，与拉狄克的通信也已剧减，而且充满了谴责。拉狄克抗议托洛茨基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投降者的讽刺攻击。拉狄克写道：“认为他们仅仅是出于怯懦而投降，那是十分可笑的。今天反对投降但第二天就同意投降的人一批接一批，而且这种情况接二连三地发生。这一事实表明，我们遇到的是原则的冲突而不是单纯对镇压的恐惧。”[②] 无疑，投降者的所作所为是政治自杀，但拒绝投降同样也是政治自杀。剩下的唯一希望是，党内进一步变动以及朝左的进一步演化会净化空气，使左翼反对派体面地回到党内。

拉狄克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动机表示谅解，同时在他的同志们中散发旨在反对不断革命论的长篇文章。[③] 但是他没有把文章寄给托洛茨基，后者是通过别人从莫斯科搞来的。托洛茨

---

① 摘自斯米尔加的《联共（布）右派的立场》（1942 年 10 月 23 日），此文旨在评论布哈林的文章《一位经济学家的札记》，该文刊登在 10 月 23 日的《真理报》上（这是布哈林反对左倾方针的唯一公开声明）。斯米尔加同时还在写一部论布哈林及布哈林主义的著作，但不知完成没有。

② 参见拉狄克 10 月 16 日致同志们的传阅信。

③ 文章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的发展及意义》（该文至今未公开发表），存于托洛茨基档案中。托洛茨基撰写了《不断革命论》一文作为回答，这是他从思想与历史的角度为他的思想所作的最详尽的辩护。

基在致拉狄克的充满讽刺意味的答复信中附上了拉狄克本人过去捍卫托洛茨基主义的作品,说他(拉狄克)可以在其中找到对他自己最新论点的最好答辩。[①] 托洛茨基当时并没有猜疑拉狄克想投降,而是相信拉狄克的幽默感和他那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习惯会使他无法接受"拜占庭"式的忏悔仪式。托洛茨基仍然喜欢和欣赏这个人,他把拉狄克的行为归结为"情绪",并继续在那些年轻多疑的不妥协派面前保护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②]

即使在这时,所有的反对派成员不论是妥协派还是不妥协派都仍然认为托洛茨基是他们无可争议的领袖。他们对他的感情最充分地体现在一封抗议信中,此信恰是拉狄克本人在10月份寄给中央委员会的,当时流放者们得知托洛茨基健康恶化的消息都感到极度不安。

> (拉狄克写道:)托洛茨基的疾病使我们忍无可忍。当疟疾摧毁这支十月革命的利剑、这个将其一生献给工人阶级的战士的力量时,我们不能再对此保持沉默。如果派别利益消除了你们对共同战斗的记忆的话,那么听听理智与平易的事实之声吧。苏维埃共和国与之斗争的危险与日俱增。……只有不理解为战胜这些危险需要什么的人,才会对列·达·托洛茨基战斗的心脏这样慢慢地死去而无动于衷。但我相信,在你们之中有不少人为明天而感到恐惧……奉劝你们停止对托洛茨基同志的健康

① 参见托洛茨基10月20日致拉狄克的信,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② 甚至在几个月后,1929年5月底,已被驱逐到王子群岛上的托洛茨基在初次得到拉狄克投降的消息时根本不相信。他写道:"拉狄克干了25年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工作……他能否加入斯大林派是很值得怀疑的。起码他无法和他们站在一起,因为他毕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和生命玩弄这种毫无人性的把戏吧！[1]

※　※　※　※　※

自夏季以来，托洛茨基的健康确实恶化了。他再次受到疟疾、剧烈的头痛和终身折磨着他的慢性胃病之苦。得到有关托洛茨基健康恶化的消息，流放者的大批信件和电报纷纷涌来，对他进行慰问并对莫斯科表示抗议。某些流放者急于采取更激烈的保卫托洛茨基的行动，并计划进行集体绝食。托洛茨基费了不少力气才说服他们放弃这种极端的决定。他在发往各流放地的信中写道，没有任何必要为他的健康担心，它还没有坏到影响他工作的地步；更广泛地推广反对派已经进行的抗议是可取的，但如果采取极端措施则太冒失了，因为它只能使参与者的命运更加恶化。[2]

秋天，在托洛茨基的头上聚起了新的乌云。从 10 月开始，他再也收不到朋友和支持者的来信了。他只能收到那些准备背叛反对派的人的信件。检查机关对他的往来信件加以筛选。他本人的信函和电报也不能达到接收者的手中。连他询问季娜健康的电报也没得到答复，而她的病情总是令他十分担忧。托洛茨基在孤独和不安中度过了十月革命庆祝日，他连一封普通的祝贺信也没有收到。此后，不祥的征兆越来越多。一位当地工作人员一直暗中支持反对派，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却突然被投入监狱。一位反对派成员大老远地从莫斯科跑到阿拉木图找了一份司机的工作，并经常与托洛茨基在浴池秘密接头，他可能是莫斯科与阿拉木图之间的秘密联络的负责人，可是也突然失踪了。此时，他的一家人已

① 引自《战斗报》1929 年 1 月 1 日。

② 例如在 1928 年 10 月 14 日拍往叶尼赛斯克的电文中写道："坚决反对你们建议采取的抗议形式……我的病不是直接危及生命的疾病。请遵循总的（行动）路线。此致兄弟般的问候。托洛茨基。"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从果园里花坛环绕的别墅中搬回沉闷的城里。谢多娃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从10月底,我们就再没有收到亲属的一封来信,我们拍出的电报也没有回音。我们陷入通讯封锁之中。当然,事情不会到此为止。我们等待着更糟糕的事情发生。……这里正值严寒,室内冷得叫人受不了。这里的住宅建筑抵挡不住当地的严寒。劈柴贵得不得了。"

最后,有流言通过种种渠道传到托洛茨基耳中:当局不让他再住在阿拉木图,很快就要把他流放到更远的地方,更严酷地将他与世隔绝。他起初对这些传闻不屑一顾,10月2日,他给埃尔津的信中写道:"我不认为会有这种事。他们还能把我流放到地球上的什么地方?"他仍在考虑冬季在阿拉木图紧张的研究及写作工作,当然,还有在临近地区的打猎。但是,流言不断地传来,通讯封锁及其他征兆表明"更糟糕的事情"真的要发生了。

这是一个古怪的秋天。在十月革命11周年庆祝日,从莫斯科红场上传出的官方口号是:"警惕右倾危险!""打击富农!""抑制耐普曼!""加速工业化!"这些口号响彻了整个国家,扩散到了最边远的角落,甚至也传到了阿拉木图。这正是托洛茨基长期以来试图说服党采取的政策!仅仅一年前,即在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那天,他的拥护者还由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着写有同样标语的标语牌走上街头而被驱散、遭到殴打,并被指责为反革命。可以这样认为,执政派现在被迫抄袭托洛茨基派的思想,这一事实就是为反对派所作的最好辩解。每个对社会问题哪怕稍有兴趣的人都能发现这点。对托洛茨基的猛烈攻击,例如说他是"超级工业化者"、"农民的敌人"等,至今言犹在耳。如今这些攻击都被证明是弥天大谎,它们的无耻和欺骗性昭然若揭。很多布尔什维克这样想:斯大林自己不是也变成了超级工业化者,变成了农民的敌人了吗?

但这一年和前一年一样，几百万公民参加了官方组织的游行，按着指定的路线，喊着指定的口号，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的事情，他们似乎都不会思考，不会反省，不会行动。

人民的冷漠使斯大林可以毫无顾忌地偷偷穿起托洛茨基的衣服。托洛茨基暂时只能以这一想法自慰：斯大林穿不了他的衣服，因为它们不合他的身。托洛茨基仍认为斯大林派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战胜日益加深的国内危机。危机确实进一步加深了。由于农民暴动，城市笼罩在对饥荒的恐怖之中，全国极度紧张。气氛是神经质的，其中充满了危机感和担忧感。党的机关果断地集中全部力量，号召所有的人准备应付这种沉重的、当前尚不明了的非常情况。然而，它没有任何召回被流放的反对派的意思。

年底，斯大林的地位比夏天更为牢固。他已不那么害怕同时对付两个反对派了。右派被镇服下去，他们士气低落，已经投降。左派内部矛盾重重，已经瘫痪。斯大林注视着托洛茨基、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妥协派与民主集中派之间的争论，断定时间对他有利。他仍在加紧着手准备推行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总路线，而托洛茨基派中的妥协派感到他们不应袖手旁观。一旦他从准备工作转入实际操作时，这一感觉将会增强到什么地步呢？诚然，他们还没想投降，但已越来越接近这一阶段，他们达到这一阶段所需要的不过是时间和一点点鼓励。斯大林通过他的代理人用所有可能的手段鼓励他们：时而以革命的最高利益为借口，时而诉诸布尔什维克的忠诚。他恩威并施，对不妥协的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惩罚得更加严厉。[①] 斯大林希望以此实现他那为时过早的夸耀，

① 秋天，警方对流放者的监视突然加强了，许多流放者被逮捕。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因去地方格别乌作定期汇报迟到5分钟而被捕。托洛茨基的秘书布托夫在狱中绝食50天后去世。

即左派反对派已是他的“囊中之物”。其实,他正需要左派的帮助来推行他的新政策,但他决心在不与左派联合的情况下得到这一帮助,他要让对方分裂,使其中大部分人服从自己,并利用他们反对托洛茨基。他希望对托洛茨基进行一次远比以往更严酷的打击。

尽管斯大林羽翼已经丰满,但他对能否达到目的仍没有把握。他即将开始的巨大计划是前无古人的。斯大林打算一举剥夺2000万农民的财产并把他们及他们的家属赶进集体农庄。他打算强迫俄国城市实施工业化,在这一进程中,原始积累的恐怖将被浓缩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以极大的规模再现。他尚不知道人民对此持何种看法,绝望、愤怒、胡作非为和骚乱可能会引起剧变,他本人也可能会被卷入其中,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对手们能不尝试利用出现的各种机会吗?如果他们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他们必然要把托洛茨基扶上台。甚至在阿拉木图,托洛茨基的思想和人格仍然环绕着无畏的殉道者的光环,吸引着布尔什维克的精华。尽管在流放者中也有骚动和绝望,但托洛茨基主义在党的基层组织中不断赢得新的追随者。1928年底,格别乌不得不对付多达6000至8000名左翼反对派成员,他们或被关押或被流放,而在年初时,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的力量估计只有4000至5000千人。加米涅夫认为党在紧急情况下将不得不派“专列”接回托洛茨基,持这种看法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在悔过者中,甚至在斯大林派成员中也有不少动摇的人,其中有些人暗自这样想:既然左倾方针已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托洛茨基不就始终是正确的吗?对托洛茨基的诬陷诽谤和残酷打击已令他们厌倦。斯大林知道,在那6000至8000反对派成员中,几乎每人都宁愿被捕或流放也不愿放弃自己的观点,至少有一两成的投降者在内心深处赞同其更坚定的同志,他本人这一派中也有一两成的怀疑者或是妥协派(他称他们为两

面派)。现在他们都老老实实,但若形势转向,他们会不会起而反对他呢?

同样,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与布哈林结盟的威胁也不能掉以轻心。尽管这个联盟没有结成,但只要托洛茨基仍是左翼反对派无可争议的领袖,只要存在着派"专列"接他回来的可能性,这种威胁就仍然存在。因此,斯大林加倍努力去摧毁反对派的意志。他的代理人对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及其朋友们又是许愿,又是提出诱人的建议,答应为他们恢复名誉,大谈共同的目标,说他们可以为党和社会主义完成光荣伟大、硕果累累的工作。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遇到了强烈的抵制,这是由于来自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的影响所致,它至今防止着反对派的崩溃。斯大林决心把这一障碍从自己的道路上清除掉。

但怎么做呢?他克制着自己而没有派杀手,也不敢把对手投入监狱。因为这样做的后果过于严重,虽然发生了那么多的事,然而人民对托洛茨基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仍记忆犹新。因此斯大林决定把托洛茨基驱逐出俄国。他深知,即使这样也会引起震动,因此他煞费苦心地制造舆论。首先,他散布有关驱逐的消息。随后又下令加以驳斥,最后重新散布这一消息。他用这种方法来麻痹舆论。只有通过散布、驳斥、再散布,才能使人们习惯于将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的想法,只有那时斯大林才能实施这一意图而不至引起太大的震动。

※　※　※　※　※

在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的时候,托洛茨基再次提出"革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而又令人困惑的问题。现在,苏联正处于两个

时代——即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的"二次革命"① 之间的暗淡的空隙时期。未来事件的轮廓尚不清晰,在最好的情况下看它们也只能像隔着毛玻璃看东西一样。托洛茨基开始意识到:近几年来他所阐述的某些思想即将被事变超越。他试图超越这些思想,但是它们却牢牢地拉住他使他难以自拔。他想勾画出新的前途,但他那形成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并适应当时现实的思维习惯和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回忆仍妨碍着他的视线。

例如,他意识到,他有关苏联热月政变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现在再断言布哈林和李可夫是私有财产的捍卫者、斯大林是他们不情愿的帮手、他们是斯大林政策的最后受益者,那就荒谬了。因此,托洛茨基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他关于苏联热月政变的看法。② 在写于 1928 年 10 月的他在阿拉木图时期最著名的随笔之一(虽然是用反对派特有的文风写的)《致友人书》③ 中,托洛茨基指出,布哈林和布哈林派是不成功的的热月党人,他们没有勇气按自己的信念去行动。他对他们的行为作了一番生动的讽刺描写:"(在捍卫富农和耐普曼的利益上)在所有的右派领袖中布哈林走得最远,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则站在一段适当距离外观望。但每当布哈林进入(热月政变的)冷水中时,便浑身打战,冻得直哆嗦,赶紧跳回岸上,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则躲进树丛。"因而,富农、耐普曼和保守官僚对布尔什维克右派的领导大失所望,于是他们就转向别处寻找更强有力的领导,特别是在军队中寻找。托洛茨基根

① 我在《斯大林政治传记》第 294 页中第一次使用了"二次革命"这一术语,我为此遭到了批评。批评者声称,集体化和工业化并不是革命。但是,一举剥夺两千多万农民财产所导致的所有制关系的改变,这不是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又是什么呢?

② 但是,他在被驱逐到土耳其之后又回过头来捍卫这一观点;然而在其后的数年中他对该观点只修正了一次。

③ 10 月 21 日《致友人书》,存于托洛茨基档案。

据法国的先例指出"波拿巴危险"的临近，意指俄国革命有可能越过热月政变的阶段而直接从布尔什维克阶段进入波拿巴阶段。

他接着说，波拿巴式的危险可能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可能是典型的军事政变，即俄国的雾月18日，或是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他认为，很可能军队会直接向拥有私有财产的农民呼吁，在他们的支持下企图推翻斯大林并彻底埋葬布尔什维克制度。至于军队首脑中谁能充当这次运动的领导，对他来说则是次要的问题。如果条件有利，连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之类的庸才都能把握主动，获得成功。(托洛茨基引用了一条谚语："用垃圾也能造出一位公爵"，据他说斯大林喜欢这条谚语。)有利于政变的条件都已具备。农民对斯大林领导的党充满了仇恨，而工人阶级却大失所望，心灰意懒。如果建立军人独裁，它理所当然地会获得广泛的支持。就其性质和后果来说它是反动的。它将力图保障私有经济成分的安全、稳定和扩展，摧毁或削弱社会主义成分。它将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托洛茨基得出结论：面临这种危险，所有渴望捍卫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都应该联合起来，而左翼反对派不得不与斯大林及其派别合作，因为斯大林代表的不是私有者，而是"无产阶级新贵"，而且他始终避免与工人阶级公开决裂。

另一方面，斯大林本人有可能成为苏联的波拿巴。这将会给国家和反对派造成完全不同的局面。斯大林只能通过党的机器而不是军队实现其个人独裁。他的专政不会立即导致随一般军事政变接踵而来的反动结果。但是它的基础十分狭窄，并将是极其脆弱的。斯大林将与社会各阶级处于长期冲突之中。他将今天镇压这个阶级，明天镇压那个阶级，挑动它们彼此敌对。为了使党的机关、国家官僚集团和军队服从自己，他将不得不与它们进行永无休止的斗争。他将在它们任何一方的反抗中时刻胆战心惊地维持统

治。他将压制所有自发的社会积极性和政治积极性以及所有的言论自由。在这种条件下,左翼反对派与斯大林派的“统一战线”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之间只能是不可调和的斗争。

在这方面,托洛茨基以其非凡的预见力简明扼要地分析了斯大林执政的社会基础、机制、形态和前景,而它在其后的20年中果然就是如此发展的。托洛茨基预先描绘了这位总书记将变成羽翼丰满的专制独裁者。但是作了这一预言后,他又带着不信任的目光看着他本人所描绘的肖像。他认为,总的来看,存在纯军人独裁的危险更现实一些。他觉得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或任何一个将军指挥军队反对斯大林的可能性更大,而那时托洛茨基派将与斯大林派在“同一街垒后边”共同战斗。他补充说,至于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之中谁“跨上白马”,谁被踩在马蹄下面,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是无关紧要的。但目前这一差别却很重要,因为这是两种情况之间的区别,即反社会主义力量在军人独裁下公然、迅速的胜利和在斯大林统治下更复杂、更混乱、更缓慢的发展。托洛茨基断言,斯大林专政归根结底对社会主义是有害的,他甚至在斯大林道路的尽头看到了获胜的富农和耐普曼。“革命的影片正在倒播,斯大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克伦斯基扮演的角色恰恰相反。”克伦斯基主义集中体现了俄国从资本主义到布尔什维主义的过渡阶段,而获胜的斯大林主义则标志着向后转。

事后看来,很容易发现这些结论的错误;但是,更容易忽视隐藏在其中的真理的内核。托洛茨基想象伏罗希洛夫或布琼尼可能成为波拿巴,这近乎荒谬,用这样的“垃圾”是造不出公爵来的。但是,作为一位政治分析家,托洛茨基不能不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和现实性,而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当时确实存在。尽管这一可能性没有变为现实,但至少在其后30年中,政变的威胁不断出现,先是折磨着斯大林,然后折磨着他的继承人,1937年斯大林与图哈切夫斯

基及其他将军的冲突、1946年与朱可夫的冲突以及1957年赫鲁晓夫与朱可夫的矛盾就是明证。在这里，托洛茨基触及到了苏联政治的内在趋势，但显然过高地估计了它的力量。他同样过高地估计了这一趋势蕴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称之为社会脉搏的力量：即农民捍卫自己私有财产的坚决性与力量和他们通过军队捍卫自己利益并对抗城市的能力。托洛茨基本人于1906年曾写道："资本主义史是强迫农村服从城市的历史"。他以此为背景分析了旧制度下俄国农民的无组织状态和他们在政治上的软弱无力。[①] 苏联历史最主要的特点也是强迫农村服从城市。斯大林的铁锤很快就以骇人听闻的力量打击农村私有经济并打垮了农民，但这并不能防止农民反抗集体化，无形的、零星的、同时又是长期的反抗使集体农庄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低效率和落后状态之中；但反抗不能以任何全国规模的有效政治运动的形式出现。而正是眷恋私有财产的农民的失败解答了军人候选人为何没能成为苏联的波拿巴这个谜。

农民的软弱和沉默是革命后整个社会的政治昏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一点形成了执政的官僚集团异常活跃和表面上有无限权力的基础。托洛茨基不断试图把局势中这一方面分析清楚，但总是半途而废。克鲁普斯卡娅曾指出，托洛茨基对群众消极的一面总是估计不足。她的看法极可能是从列宁那儿来的。[②] 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始终忠于自己，他的性格是革命家的性格。当整个社会活跃起来、展示出它的全部活力时，当社会各阶级都竭尽全力地追求各自的抱负时，革命家就如鱼得水。这时他的感受力最敏锐，他的理解最深刻，他的目光最迅速、犀利。但当社会陷入麻

① 参见《武装的先知》第六章。

② 克鲁普斯卡娅：《评〈十月的教训〉》，载《捍卫列宁主义》第155页。

痹状态时,当各阶级昏昏欲睡时,即使像托洛茨基或马克思这样伟大的革命理论家也会丧失预见和理解事件的某些能力。这种社会状态对他来说是最为陌生的,他无法从思想上适应它。这就是托洛茨基判断失误的原因。即使他对革命后群众的疲惫作了最大限度的假定,但他始终不敢测量一下它的全部深度。他在思想上仍超越现实,仍然想象各个社会阶级与集团——富农与工人、军事首脑与各个布尔什维克集团——在行动、在活动,相信它们充满自信、生气勃勃、随时准备扑向另一方展开一场巨人间的殊死搏斗。而当他发现这些巨人却是萎靡不振、被官僚集团驯服和捆住手脚时,不禁大惑不解。

因为他最终总是把革命过程与劳动群众的社会理解力和积极性等同起来,因此,他从社会理解力和积极性的缺乏中得出结论:随着斯大林主义的获胜,"革命的影片正在倒播",斯大林在这部影片中的角色与克伦斯基的角色正好相反。这里的判断失误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不应该忽略这一判断中的正确成分。电影情节的发展出乎革命先驱和革命组织者们的预料,它部分地进入了其他方向,却没有向后倒转。斯大林在其中的角色也并不与克伦斯基相反。影片在继续向前播放,显然,对它盖棺论定为时尚早。从理论上可以设想,影片以革命失败告终,而且这一失败是与前几次大革命,如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同样严重的失败。但是,这一可能性看来却十分遥远。当托洛茨基说影片正在倒播时,他指的是革命正朝资本主义复辟方向发展下去。实际上,影片正朝着计划经济、工业发展和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而它们正是托洛茨基本人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最终完全实现革命承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尽管它们遭到了官僚集团的歪曲和偷换。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先决条件并没有实现,50 年代的苏联有充分理由用悲观失望的目光回顾斯大林主义的政绩,至少是在它的某些方面。

然而在斯大林道路的尽头，在苏联并没有见到获胜的富农和耐普曼。[1]

斯大林的顶点是否是波拿巴主义？托洛茨基并没有在通用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只是用它来指"暴政"和个人独裁。马克思主义对波拿巴主义更广义的界定指的是由国家机器或整个官僚集团实施的专政，而军人独裁只是其中一种特殊形式。根据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波拿巴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是：国家和执政者在政治上凌驾于社会各阶级之上，建立起对社会的绝对统治。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独裁当然与波拿巴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这一等式只是为理解复杂矛盾的现象提供了一种笼统模糊的思路。与其说斯大林是通过"独立"的国家机器实现其个人的统治，还不如说他是通过"独立"的党的机器控制了国家。这一区别给苏联的革命进程和政治气候带来重大后果。党的机关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思想和传统的唯一合法捍卫者和解释者。因此，它的统治意味着，在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和传统虽然经过连续不断的实用性的和教会式的改造，但仍是苏联的统治思想和主要传统。这之所以是可能的，只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和传统牢牢植根于苏联的社会结构之中，首先植根于国有化的城市经济之中。如果能从法国大革命中找到任何与这一情况有局部相似之处，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只能想象，倘若罗伯斯庇尔没有被热月政变分子推翻，如果在那些如今被历史定性为督政府时代、执政府时代和帝国时代的年代中他一直能以残缺不全、俯首贴耳的雅各宾党的名义统治下去的话，那么革命的法国会是什么样子——总之，如果拿破仑根本没有冒出来，革命始终在雅各宾的旗帜下进行的话，法国会是

① 可是在斯大林时代末期，东欧（匈牙利、波兰、东德）却几乎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边缘，是苏联武装力量（或其威慑力量）防止了它们的资本主义复辟。

什么样子。[1]

我们已经看到,党的机关的统治事实上在列宁时代末期就已开始了。它是一党统治所固有的,列宁本人把它看成主要是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统治。因此,在列宁时代的最后几年中,列宁政府的性质可用托洛茨基的术语"波拿巴主义"来说明,尽管没有达到波拿巴主义的最高体现——个人独裁。因此,1928 年托洛茨基提到波拿巴主义的危险时,他是将多年以前就已大体上完成的一个发展阶段看成是正在逼近的阶段。当然,列宁逝世后党的机关专制变得更有侵略性、更残暴。然而,狂风暴雨般的 1921—1929 年的政治历史的特定内容并不单单或主要在这里,而是在从一党统治到一派统治的转变中。这是布尔什维主义政治垄断能生存下来并得以加强的唯一形式。正如我们在本卷开头所指出的那样,一党制就其定义来说是矛盾的,布尔什维克中各派、各集团和各学派在一党之内形成某种类似于影子多党制的东西。一党制的逻辑毋庸置疑地要求取消所有这些派别。斯大林成了这一逻辑的代言人,他声称,布尔什维克必须团结得坚如磐石,否则它就不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党了。(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党若团结得坚如磐石,它也就不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党了。)

如果闭塞孤立、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的苏联其全部历史不是充满着几乎威胁民族生存本身的连绵不断的灾难、紧急状态和危

---

[1] 当斯塔尔夫人称第一执政官是"骑马的罗伯斯庇尔"时,奥古斯特·布朗基认为罗伯斯庇尔是"生不逢时的拿破仑"(参见丹尼尔·盖兰的《第一共和国中的阶级斗争》第 2 卷第 301 - 304 页。书中对这个问题有许多有趣的见解)。但是,"骑马的罗伯斯庇尔"身后的社会力量与雅各宾党领袖身后的那些社会力量并不一样。他主要依靠军队,而不是小资产阶级,而且他不受雅各宾思想的限制。米什尔提到罗伯斯庇尔时说:"他的心与其说是帝王的心,不如说是神父的心。"但拿破仑仅仅是帝王,而不是神父。而斯大林既是教皇又是沙皇。

机的话,那么一党制的逻辑就不会表现得如此强烈,它也不会如此残酷,它的潜伏的本质也可能始终不会明朗起来;甚至这一体制都可能因工人民主的成长壮大而解体。几乎每一次紧张状态和危机都把所有有关全国政策的重要问题放到了刀刃上,驱使着布尔什维克各派和各集团相互敌对,将他们之间的斗争变得空前残酷、紧张,以至导致一派统治取代一党统治。在我们现在所描述的那个时刻,即在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搏斗之时,这一过程已接近尾声,剩下的只是准波拿巴主义的最后完成:在30年代初,个人独裁取代了一派统治。尽管托洛茨基在其他方面说错了,但他却明确预见到了这一过程的顶点——斯大林的个人独裁。

但是,即使到了这时,托洛茨基也不认为斯大林主义登基加冕是布尔什维克权力垄断的必然结果,相反,他认为这实质上是布尔什维克执政的末日。因此,当斯大林将他那一派独掌政权说成是对一党统治的最终肯定时,托洛茨基则认为这是对一党统治的否定。事实上,对于列宁和托洛茨基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权力垄断来说,斯大林的政治垄断既是对它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它的否定。而这两位政敌各自专注的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我们已经展示了从一党统治到一派统治的转变,正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斯大林主义取代了列宁主义。我们看到,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开始阶段隐含的东西在结束阶段变得更加明确,而且以极端的和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斯大林宣称他在处理党务上遵循的是列宁制定的路线,这是符合事实的。但是,托洛茨基对这点的断然否定同样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一派统治确实既是对一党统治的滥用,又是一党统治的结果。托洛茨基和继他之后的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相继进行抗议,他们指出,在列宁时代,他们建立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垄断,他们力图把它与工人阶级民主结合起来,不仅不想把铁的纪律强加于党,而且认为党内自由是理所当然的,并也确实捍卫了它。

只有聋子和瞎子才发现不了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区别。这一区别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领域、道德和智力气候上的反映比在组织工作和纪律问题上更强烈。在上述领域中,革命的影片确实在倒播,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是如此,即斯大林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原始、古老、半亚洲式的东西——一方面是农民的无知、野蛮,另一方面是旧统治集团的专制传统——混合而成的大杂烩。与此相反,托洛茨基捍卫的是纯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全部理性力量和道义力量,也包括它的全部政治上的弱点——这弱点在于,它本身无法适应俄国的落后和社会主义在西方的失败。斯大林驱逐了托洛茨基,也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驱逐出了俄国。

但是,这两个对手的命运就是这样古怪,当托洛茨基被驱逐出俄国之时,斯大林却着手以野蛮的方式消灭俄国的落后和野蛮,仿佛是要经典马克思主义回流,而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将要实现托洛茨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纲领。托洛茨基是二次革命的真正鼓吹者和倡导人,但在其后的十年中,斯大林却是它的执行者。如果要问:托洛茨基会把这次革命引向何方?他是否既能使广大苏联人民免遭斯大林统治下所受的损失、贫困和压迫,同时也能以相同的速度和规模实现工业化?或者他能否说服而不是强迫农民合作经营农业?进行这样的推测毫无意义,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回答的。历史学家在分析现实发生的事件和形势时就够忙的了,他没有时间考虑可能会发生的事件和形势。事实上,20年代的政治演变已事先决定了30年代俄国社会改造得以完成的道路。这一演变导致独裁和铁的纪律,进而导致了强行的工业化和集体化。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所需的政治工具在20年代就早已造好了,现在可以使用了。它们不是在为完成未来任务的准备过程中被有意识地、自觉地锻造出来的,而是在导致布尔什维克专政转变为斯大林个人独裁的自发的党内斗争进程中锻造出来的。但是,如果独裁和

铁的纪律能构成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政治上层建筑，那么它们也能从中推导出自我辩护的手段。斯大林的支持者可能争辩说，没有独裁和铁的纪律，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积累是完全不可能的。简言之，经过长期的布尔什维克派别斗争，产生了斯大林的"铁腕领导"，而他本人则可能把它当成目标本身。一旦他掌握了这一权力，他就用它来实现苏联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并改造国家的整个面貌，然后他又以炫耀他的"铁腕领导"的成绩来为它辩护。

托洛茨基并不接受斯大林强词夺理的自我辩解，他继续把对手指责为篡位的波拿巴。不过，他开始认识到斯大林的二次革命中的"积极和进步"的方面，认为它们是他本人纲领的部分实现。我们记得，托洛茨基曾把他本人和反对派的命运与巴黎公社的命运相比较，尽管巴黎公社社员在1871年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失败了，他们仍切断了君主专制复辟的道路。这就是他们失败中的胜利，而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伟大改造则是托洛茨基失败中的胜利。但巴黎公社社员并没有与第三共和国即资产阶级共和国妥协，而没有他们，它根本不能取胜。他们始终是它的敌人。同样，托洛茨基永远是官僚集团的二次革命不可调和的敌人；为了进行反对它的斗争，他呼吁工人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维护自己的权利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思想自由。踏上这条道路，注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孤立，因为他的许多最亲密的同志部分由于失望和疲惫、部分由于信念改变而被斯大林的二次革命争取过去或被收买。那些被流放的反对派事实上到了自我灭亡的边缘。

这样，托洛茨基岂不是陷入与其时代的冲突之中？他不是在进行"反历史潮流"的绝望斗争吗？尼采对我们说：

如果你们需要传记，不要看那些传奇传记："某某先

生如何如何,他所处的时代如何如何",而要找这样的传记,其扉页上写着:"反时代的斗士"。……如果历史仅仅是"种种激情和错误的包罗万象的体系"的话,就应当这样去读它,像歌德希望人们读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样,其寓意在于:"做个堂堂的男子,不要步我的后尘!"但幸运的是,历史为我们保留了对"反历史潮流的伟大斗士",即反对盲目的现实力量的斗士的生动记忆……并赞扬人的真正的历史品格,他们很少关心"这如何",而是怀着更大的喜悦和更大的自豪走在"这应该如何"的道路上。不把自己那个时代的人引入坟墓而是想造就一代新人,这一动机永远推动他们前进……。

这些话尽管浸透着主观浪漫主义的精神,但确实精彩。对于"反时代潮流的斗士"之称,托洛茨基当之无愧,但不是尼采想象的那种。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非常关心"这如何",但他知道,"这应该如何"是从"这如何"中派生出来的。但他拒绝对"盲目的现实力量"俯首称臣,拒绝为"这如何"的利益而放弃"这应该如何"。

他不是作为堂吉诃德或尼采式的超人,而是作为先驱者与他的时代搏斗;他是为了未来而不是为了过去搏斗。诚然,当我们认真研究任何一位伟大的先驱者的性格时,我们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堂吉诃德的特征,但是先驱者既不是堂吉诃德也不是乌托邦主义者。历史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能像托洛茨基在1917年和其后的几年中那样如鱼得水般地与其时代交融在一起。尔后来他与时代发生冲突并非是由于他天生与他这一代人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所造成,而是因他固有的先知的性格与气质所致。在1905年,他就是1917年革命和苏维埃的先驱;在1917年,苏维埃领袖无人

能超过他；从20年代初起，他就是计划经济和工业化的倡导者；而且他始终是未来某些革命民族再觉醒的伟大预言家，尽管不是没有失误的预言家(1953—1956年笼罩全苏的克服斯大林主义的愿望就是这种政治再觉醒的重要标志，虽然它还十分微弱，但却是肯定无疑的)。他以历史本身的名义"反对历史"。在反对那些往往使人压抑沮丧的既成事实时，他坚信最美好的、使人获得自由的那些成就总有一天会变为现实。

※ ※ ※ ※ ※

12月初，托洛茨基就他受到的"通讯封锁"向加里宁和明仁斯基提出抗议，两个星期中他一直在等待答复。12月16日，一位格别乌的高级官员来到阿拉木图，递交给他一份"最后通牒"：他必须立即停止"反革命活动"，否则"将把他完全排除出政治生活"并"强制改变他的居住地"。托洛茨基当天就给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写了一封挑战的复信：

> 要求我放弃政治活动，意味着要求我放弃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斗争，而这一斗争我已孜孜不倦地进行了32年之久，也就是我自觉生命的全部时间。……只有腐朽透顶的官僚集团才会要求作出这种放弃，只有卑鄙的叛徒才能作出这种承诺。我无须对这些话作任何补充！[①]

此后，托洛茨基一家人在阿拉木图度过了难眠、不安、焦虑等

① 托洛茨基档案。

待的一个月。格别乌的使者没有返回莫斯科,而是就地等待新的命令。这命令还得取决于政治局的决议,可政治局尚未下定决心。当斯大林请求政治局批准驱逐命令时,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激烈地反对。布哈林为自己从前对托洛茨基的做法感到后悔,同时又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惧怕"新成吉思汗",他在会议上大喊大叫,声泪俱下,号啕大哭。但大多数人都按斯大林的意愿投了赞成票。于是在1929年1月20日,正好是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莫斯科整整一年之后,一群武装人员包围并闯入他在阿拉木图的住宅,格别乌官员向托洛茨基出示了新的驱逐令,这次是"驱逐出苏联国境"。他在回执上写道:"1929年1月20日格别乌对我宣读了判决,此判决在实质上是犯罪的,在形式上是非法的。"[①]

类似于他在莫斯科被捕时的那种悲喜剧场面再度出现了。他的看守们因接到这一命令而陷入窘境,他们在执行交给他们的任务时战战兢兢,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否应该逮捕他。他们对托洛茨基的家属十分关心,并向托洛茨基暗示关心和友好。但命令是严厉的:解除托洛茨基的武装,在24小时内把他押解出阿拉木图。命令还声称,他只有在途中才能得知他被驱逐到何地。

1月22日黎明,囚犯和家属们在大队押解人员的押解下离开阿拉木图,前往伏龙芝。他们穿过空旷的山地和库达依山口,走的是去年来时的同一条路,冒着同样的暴风雪,但现在的旅行显然更艰难,因为这是个百年不遇的严冬。"拖我们翻越库达依山口的大马力拖拉机和它拖的7辆汽车一起深深地陷入积雪之中。翻越山口时,冻坏了7个人和不少马匹,只好把行李都搬到雪橇上。用了7个多小时才走了30公里的山路。"[②]

① 托洛茨基档案。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314页。

在伏龙芝，托洛茨基及其家人被押上开往俄国欧洲部分的专列。途中得到通知，他被驱逐到君士坦丁堡。他当即向莫斯科提出抗议，声明在没有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政府无权将他驱逐出国；君士坦丁堡是从克里木逃亡的弗兰格尔残部的聚集地，政治局难道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听任他受到白卫军的报复吗？政治局难道不能至少为他搞到去德国或其他国家的签证吗？他要求允许他与生活在莫斯科的亲人会面。他的最后一个要求得到了满足。谢尔盖和廖瓦的妻子被从莫斯科送来，在这辆专列上与被驱逐者团聚。托洛茨基再次拒绝前往君士坦丁堡，与他们同行的格别乌特使转达了托洛茨基的抗议并等待指示。此时，列车改道——

> 在一个空荡荡的小站旁边的岔道上，停在两行小树间不动了。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列车两旁的空罐头盒越来越多，大群大群的乌鸦和喜鹊聚到这里来找食。一片荒凉，渺无人烟。这里连野兔都没有，秋季一场严重的瘟疫把它们一扫而光。不过，狐狸的诡秘行踪一直到了列车近旁。火车头每天都带着3节车厢到火车站去置办午餐和报纸。我们车厢里的人都得了流感。我们翻来覆去地阅读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作品和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史教科书。气温降到列氏零下38度。我们的车头缓慢地在铁轨上来回开动，以免冻住……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1]

这样过了12个昼夜。在这期间，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车厢。报纸带来的只是外部世界的回声——它们充满了针对托洛茨基主义

---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315页。

的最激烈的威胁和谩骂,以及新的"托派核心"被揭露、数百名反对派分子被捕的消息。[①]

12天后,他们再次启程。列车开足马力,穿过熟悉的乌克兰大草原,驶向南方。莫斯科方面声称,由于德国政府拒绝给托洛茨基入境签证,因此只能把他驱逐到君士坦丁堡。谢尔盖渴望继续读书,他和廖瓦的妻子返回莫斯科。他们希望今后能在国外重新团聚,父母对此充满了不祥的预感,但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所以不敢让孩子们一起分担流亡的命运,只能与他们拥抱而别。不料这一别竟成永诀。

在夜色中,托洛茨基从车窗口最后一次眺望俄国大地。列车驶过敖德萨的街道和港湾,他在这座城市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在这里产生了他早期的雄心和对世界的最初的幻想。帝俄时期敖德萨市长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记忆中,此人"大权在握,专横跋扈","挺直身躯站在轻便马车上,挥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叫骂,声音响彻整个街道"。现在,另一个声嘶力竭的声音,另一只拳头,(是同样的吗?)仍在他童年时代走过的街道上追逐着这位50岁的人。当时那个暴君曾把他吓得缩成一团,他"拉紧书包带,急忙走回家"。现在,囚车匆匆疾驰向港口,他将在那里登船,船将载着他驶向陌生之地,现在,他只能思考他乖戾的命运。港口的码头被军队团团包围住,这支军队仅在4年前还由他统率着。好像是专门为了嘲弄他似的,那艘等着载送托洛茨基的空客轮竟是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伊里奇号"!在死寂的深夜,客轮在怒吼的狂风中起锚离港。那年连黑海也结了冰,一艘破冰船在前方开出约60海里的

---

① 被捕者中有《红色处女地》的主编沃隆斯基,有布杜·穆季瓦尼和从1921年起反对斯大林的其他格鲁吉亚共产党员,还有140位散发上面提到的托洛茨基《致友人书》的莫斯科反对派成员。

海路。当“伊里奇号”起锚后，托洛茨基回首眺望渐渐远去的海岸，他一定会感觉到，似乎留在他身后的那整片国土都变成了冰雪的荒原，似乎革命本身都被冻僵了。

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任何人造的破冰船能为他打开一条回国之路。

参考书目

（同见《武装的先知》参考书目）

Bajanov, B., ***Avec Staline dans le Kremlin***. Paris, 1930.

Balabanoff, A., ***My Life as Rebel***. London, 1938.

Beloborodov, Unpublished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quoted from ***The Archives***.

Brandt, Schwartz, Fairbank,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London, 1952.

Brupbacher, F., ***60 Jahre Ketzer***, 1935.

Bubnov, A. (Бубнов, А.), 'Урок Октября и Троцкизм', in *За Ленинзм*, 1925.

Партия и Оппозиция, 1925 г. Москва, 1926.

ВКП (*б*). Москва – Ленинград, 1931.

Bukharin, N. (Бухарин, Н.), ***Пролета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Петроград, 1923.

Кр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латформы Оппозиций. Ленинград, no date.

К Вопросу о Троцкизме. Москва, 1925.

'Теория Перманент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in ***За Ленинзм***.

В Защиту Пролетарцкой Дикт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28.

(co - author with Preobrazhensky, E.) ***The ABC of Communism***. London, 1922.

Chen Tu - Hsiu, 'Open Letter to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under the title 'How Stalin - Bukharin destroye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as published in ***The Militant***, November 1930.

Degras, J. (ed.), ***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 London, 1952.

Dingelstedt, I., Unpublished essays, articiles, and letters to Trotsky, Radek, and others, quoted from ***The Trotsky Archives***.

Dzerzhinsky, F. (Дзержинский, Ф.),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и Речи***. Москва, 1947.

Eastman, M., ***Since Lenin Died***. London, 1925.

Engels, F., ***Dialektik der Natur***. Berlin, 1955.

Fischer, L., ***Men and Politics***. New York, 1946.

The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vols. i - ii. London, 1930.

Fischer, R., ***Stalin and German Communist***. London, 1948.

Fotieva, L. A. (Фотиева, Л. А),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и о Ленине', in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4, 1957.

Frossard, L - O., ***De Jaurès à Lénine***. Paris, 1930.

Sous le Signe de Jaurès, 1943.

Guèrin, D., ***La Lutte de Classes sous la Première République***, ***vols***. i – ii. Paris, 1946.

Herriot, E., ***La Russie Nowelle***. Paris, 1922.

Holitscher, A., ***Drei Monate in Sowjet Rußland***. Berlin, 1921.

Issacs, H.,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1938.

Kamegulov, A.A. (Камегулов, А.А.), ***Троцкизм 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и***. Москва, 1932.

Kamenev, L. (Каменев, Л.), 'Партия и Троцкизм' and 'Был-л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Ленин Вождем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и Революции', in ***За Ленинзм***.

His letter about his meeting with Bukharin in the summer of 1928 is quoted from ***The Trotsky Archives***, as are also other documents of which he was co – author.

His speeches are quoted from the records of party congresses and coferences.

Karolyi, M., ***Memoirs***. London, 1956.

Khrushchev, N., ***The Dethronement of Stalin*** (this is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edition of the 'secret' speech at the XX Congress), 1956.

Kollontai, A., ***The Workers' Opposition in Russia***. London, 1923.

КПСС в Резолюциях, т. i – ii. Москва, 1953.

Kritsman, L. (Кридман, Л.), ***Геро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 Велик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й***. Москва, 1924(?).

Krupskaya, N. (Крупская, Н.), 'К Вопросу о Уроках Октября', in ***За Ленинзм***.

Speeches, quoted from party records.

Kuusinen, O. (Куусинен, о.), 'Неудавшееся Изображение "Немецкого Октября"', in ***За Ленинзм***.

Latsis (Sudbars), ***Чрезвычайные Комиссии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Москва, 1921.

Lenin, V. (Ленин, В.), ***Сочинения***, т. i – xxx. Москва, 1941 – 1950.

All quotations are from this, the fourth, edition of Lenin's Works, except in one case, indicated in a footnote, where the 1928 edition (vol. xxv) is quoted.

Сочинения, т. xxxvi. Москва, 1957. (The first of the additional volumes of the fourth edition, published after the XX Congress and containing Lenin's previously suppressed or unknown writings.)

Still unpublished parts of Lenin's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and others are quoted from ***The Trotsky Archives***.

Лен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т. xx. Москва, 1932.

Manifest der Arbeitergruppe der Russischen Kommunistischen Partei. Berlin, 1924.

Mao Tse – tung,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 i – ii. Москва, 1952 – 1953.

Marx, K., ***Das Kapital***.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Das 18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Herr Vogt.

Molotov, V. (Молотов, в.), 'Об Уроках Троцкизма', in ***За Ленинизм***.

Speeches quoted from records of party congress and conferences.

Morizet, A., ***Chez Lénine et Trotski***. Paris, 1922.

Muralov, N., Unpublished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and others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Murphy, J. T., ***New Horizon***. London. 1941.

Pokrosky, M. N.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осква, 1929.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й, т. i – ii. Москва, 1927.

Popov, 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C. P. S. U. (b)***, vols. i – ii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16th Russian edition). London, no date.

Preobrazhensky, E.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Е.),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т. i, часть 1. Москва, 1926.

Essays, memoranda ('Левый Курс в Деревн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Что Надо Сказать Конгресу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т. д.,) and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Radek, and others, quoted from ***The Trotsky Archives***.

(co – author with Bukharin), ***The ABC of Communism***.

Пять Лет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Москва, 1922.

Radek, K., ***In den Reihen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Munich, 1921.

'Ноябрь,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и', ***Красная Новь***, № 10, 1926.

Пять Лет Коминтерна, т. i – ii. Москва, 1924.

Портреты и Памфлеты. Москва, 1927. (This edition includes the essay, omitted from later editions, 'Лев Троцкий,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Победы' (Trotsky, the Organizer of Victory), which originally appeared in ***Правда***, 14 March 1923.)

Китай в Огне Войны. Москва, 1924.

Развитие и Значение Лозунга Пролетарской Диктатуры. (This is Radek's long, unpublished, treatise about Trotsky's theory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written in exile in 1928 and available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It was in reply to this treatise that Trotsky

wrote his book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

Unpublished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K. Zetkin, Dingelstedt, Sosnovsky, Preobrazhensky, Ter – Vaganyan, and others, ***The Trotsky Archives*** .

Speeches quoted from party and Comintern records.

Rakovsky, Ch.(Раковский, X.), 'Letter to Valentinov', unpublished memoranda and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and others, ***The Trotsky Archives*** . A 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Letter to Valentinov' is in ***Les Bolcheviks contre Staline*** . Paris 1957.

Ransome, A., ***Six Weeks in Russia in*** 1919. London, 1919.

Rosmer, A., ***Moscou sous Lénine*** . Paris, 1953.

Roy, M.N., ***Revolution und Kontrrevolution in China*** . Berlin, 1930.

Rykov, A.(Лыков, А.), 'Новая Дискуссия' in ***За Ленинизм*** .

Speeches quoted from records of party congresses and coferences.

Sapronov, T. (Сапронов, Т.), Memoranda and Correspondence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

Scheffer, P., ***Sieben Jahre Sowjet Union*** . Leipzig, 1930.

Sedova, N. (part author with V. Serge) (Седова, н.), ***Vie et Mort de Trotsky*** . Paris, 1951.

Serge, V., ***Le Tournant Obscur*** . Paris, 1951.

Mémoires d' un Revolutionnaire . Paris, 1951.

Vie et Mort de Trotsky . Paris, 1951.

Sheridan, C., ***Russian Portraits*** . London, 1921.

Smilga, I. (Смилга, И.), Correspondence and essays ('Рлатформа Правого Крыла ВКП (б) ') are quoted from ***The Trotsky Archives*** .

Smirnov, I.(Смирнов, И.), Unpublished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Radek, and others. Ibid.

Smirnov, V. (Смирнов, В.), Под Знамя Ленина (an unpublished essay expounding the Decemist viewpoint in 1928. Trotsky attributes its authorship to V. Smirnov, but is not certain of it.)

Sokolnikov, G. (Сокольников, Г.), 'Теория тов. Троцкого и Практика Нашей Революции' and 'Как Подходит к Истории Октября', in ***За Ленинизм***.

Sorin, V. (Сорин, В.), ***Рабочая Группа***. Москва, 1924.

Sosnovsky, L. (Сосновский, Л.), ***Дела и Люди***, т. i – iv. Москва, 1924 – 1927.

Unpublished correspondence with Trotsky and others quoted from ***The Archives***.

Stalin, J. (Сталин, И.), ***Сочинения***, т. v – x. Москва, 1947 – 1949.

Tang Leang – Li,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1930.

Thalheimer, A., 1923, ***Eine Verpasste Revolution***?. Berlin, 1931.

Trotsky, L. (Троцкий, Л.), ***Сочинения***. Москва, 1925 – 1927. The following volumes of this edition of Trotsky's collected writings are quoted or referred to in this work:

Т. III: (часть 1) ***От Февраля до Октября***; (часть 2) ***От Октября до Бреста***. It is as a preface to this volume that the much debated 'Уроки Октября' (The Lessons of October) first appeared.

Т. XII: ***Основные Вопросы Пролетар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й***.

Т. XIII: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Т. XV: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в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Т. XVII: ***Совет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и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тский***

Мир.

Т.XX: ***Культура Старого Мира***.

Т.XXI: ***Культура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Как Вооружалась Революция, т.i – iii. Москва, 1923 – 1925.

Пять Лет Коминтерна, т. i – ii. Москва, 1924 – 1925. An American edition under the title ***The First Five Year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s. i – ii, appeared in New York, 1945 and 1953.

Моя Жизнь, т. i – ii. Berlin, 1930. The English edition ***My Life***. London, 1930.

Терроризм и Коммунизм. Петерсбург, 1920.

Война и Революция. Москва, 1922.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Революция. Москва, 1923. An American edition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appeared in New York, 1957.

Вопросы Быта. Москва, 1923. The English edition ***Problems of life***. London, 1924.

Межд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ом и Революцией. Москва, 1922.

Новый Курс. Москва, 1924. The American edition ***The New Course***. New York, 1943.

О Ленине. Москва, 1924.

Запад и Восток. Москва, 1924.

Поколение Октября. Москва, 1924.

Куда Идет Англия? Москва, 1925. The English edition ***Where is Britain Going***?, with a preface by H.N. Brailsfod, appeared in London. 1926.

Куда Идет Англия? (Второй Выпуск). Москва, 1926. This is not, as the title may suggest, a second edition of the previous work,

but a collection of criticisms by British authors, Bertrand Russell, Ramsay MacDonald, H.N.Brailsford, George Lansbury, and others, and of Trotsky's replies to his critics.

Europa und Amerika. Berlin,1926.

Towards Socialism or Capitalism. London,1926.

The Real Situation in Russia. London, no date.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Platform' of the Joint Opposition of which Trotsky and Zinoviev were the co – authors.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1932.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 New York, 1936. The American edition of the ***Critique*** of the Programme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written in 1928.

Что и Как Пройзошло?. Paris,1929.

Перманент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Berlin,1930.

Сталинская Школа Фальсификации. Berlin, 1932. The American edition ***The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 New York,1937.

The Supprresed Testament of Lenin. New York,1935.

Écrits,vol.i. Paris,1955.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London,1937.

Stalin. New York,1946.

The Case of Leon Trotsky. London,1937. Trotsky's depositions and cross – examination before the Dewey Commission in Mexico in 1937. This list of Trotsky's published works includes only books and pamphlets quoted or referred to in this volume.

The Trotsky Archive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A description of ***The Archives*** was given in the bibliography of ***The Prophet Armed***.

Speeches and statements by Trotsky are quoted either from ***The Archives* or from published records of party congresses and conferences, as indicated in footnotes.**

Yaroslavsky, E. (Ярославский, Е.), ***Рабоч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Москва, no date.

Против Оппозиции. Москва, 1928.

Вчерашний и Заврашний День Троцкистов. Москва, 1929.

Aus der Geschicht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 Sowjetunion, vols. i – ii. Hamburg – Berlin, 1931.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ВКП(б). Москва, 1936.

Yoffe, A. (Ñоффе, А.), 'Farewell letter to Trotsky'. The full text is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За Ленинизм, Ленинград, 1925. A collection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by Stalin, Zinoviev, Kamenev, Rykov, Bukharin, Sokolnikov, Krupskaya, and others to the discussion on Trotsky's ***Lessons of October***. It includes also ***The Lessons of October***.

Заявление о Внутрипартий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The statement of the 'Forty Six', of 15 October 1923, is in ***The Trotsky Archives***.

Zinoviev, G. (Зиновьев, Г.), ***Сочинения***, т. i, ii, v, xvi. Москва, 1924 – 1929.

Двенадцать Дней в Германии. Петербург, 1920.

'Большевизм или Троцкизм', in ***За Ленинизм***.

История РКП(б). Москва, 1924.

Ленин. Ленинград, 1925.

Ленинизм. Ленинград, 1926.

Memoranda, essays, and other unpublished documents are quoted form ***The Trotsky Archives***, and speeches from the published party

records.

The following editions of protocols and verbatim reports have been quoted:

Congresses and conferenc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10 – ***ый Създ РКП(б)***. Москва,1921.

11 – ***ый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КП(б)***. Москва,1921.

11 – ***ый Създ РКП(б)***. Москва,1936.

12 – ***ый Създ РКП(б)***. Москва,1923.

13 – ***ый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КП(б)***. Москва,1924.

13 – ***ый Създ РКП(б)***. Москва,1924.

14 – ***ый Създ ВКП(б)***. Москва,1926.

15 – ***ый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КП(б)***. Москва,1927.

15 – ***ый Създ ВКП(б)***, т.i – ii. Москва,1935.

Протоколы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РСДРП. Москва, 1929.

Congresses of Soviet trade unions:

3 – ***ий Създ Профсоюзов***. Москва,1920.

4 – ***ый Създ Профсоюзов***. Москва,1921.

5 – ***ый Създ Профсоюзов***. Москва,1922.

6 – ***ой Създ Профсоюзов***. Москва,1925.

7 – ***ой Създ Профсоюзов***. Москва,1927.

Congresses of Soviets:

8 – ***ой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зд Советов***. Москва,1921.

9 – ***ый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зд Советов***. Москва,1922.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Congresses:

3 – ***ий Всемирный Конгресс Коминтерна***. *Петроград*,

1922.

4 – ый ***Всемирный Конгресс Коминтерна***. *Москва*, 1923.

5 – ый ***Всемирный Конгресс Коминтерна***. *т. i – ii. Москва*, 1925.

Sessions of the Executive:

Расширенный Пленум ИККИ. Москва, 1923.

Расширенный Пленум ИККИ. Москва, 1925.

Шестой Расширенный Пленум ИККИ. Москва, 1927.

Путь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й (session of November – December 1926), т. i – ii. Москва, 1927.

Расширенный Пленум ИККИ. т. i – xii. Москва, 1930 – .

The Lessons of the German Events. London(?), 1924.

(Report on the discussion at the Praesidium of the Executive on the 'German Crisis' of 1923.)

Varia:

The Second and Third International and the Vienna Union (reports of the 1922 conference of the Three Internationals in Berlin), no dat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Die Freiheit, ***L' Humnté***, ***Internationale Presse Korrespondenz***, ***Kommunist***, ***Labour Weekly***, ***Labour Monthly***, ***The Militant***, ***The New International***, ***The Nation***, ***The New Leader***, ***The New York Times***, ***Przeglad Socjal – Demokratyczny***, ***Z Pola Walki***.

Большевик, ***Бюллетень Оппозиц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Жизнь***, ***Известия Ц. К. РКП(б)***, ***Искусство Коммун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Красная Летопись***, ***Красная Новь***, ***Кузница***, ***На Посту***, ***Октябрь***, ***Печать и Революция***,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 ***Правда***, ***Проле-***

***та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Восток*, *Труд*,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Знамя*.**